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金的一个世纪 / 唐金海、张晓云著 .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03. 10
ISBN 7 - 5411 - 2201 - 7

I. 巴 ... II. ①唐 ... ②张 ... III. 巴金 1904 ~
- 史传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3034 号

巴金的一个世纪

BA JIN DE YIGE SHIJI

著者 : 唐金海 张晓云

责任编辑 : 龚明德
封面设计 : 任兆祥
版面设计 : 史小燕
责任校对 : 汪 萍等
责任印制 : 黄 迅等

书 号 : ISBN 7 - 5411 - 2201 - 7 / I · 1860

开 本 : 889 × 1194 1 / 16

字 数 : 1066 千

印 张 : 40. 25

插 页 : 41

版 次 :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经 销 : 新华书店

电 话 : 028 86666700 [发行部] 028 86662959 [编辑部]

邮政编码 : 610012

网 址 : www. scwys. com

照 排 :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定 价 : 170. 00 元 平装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 (028) 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 (0755) 28458333

目 录



一九〇四年 001
出 生

一九〇五年 004
二 岁

一九〇六年 005
三 岁

一九〇七年 007
四 岁

一九〇八年 008
五 岁

一九〇九年 009
六 岁

一九一〇年 011
七 岁

一九一一年 013
八 岁

一九一二年 015
九 岁

一九一三年 017
十 岁

一九一四年 019
十一岁

一九一五年 021
十二岁

一九一六年 023
十三岁

一九一七年 024
十四岁

一九一八年 026
十五岁

一九一九年 028
十六岁

一九二〇年 030
十七岁

一九二一年 034
十八岁

一九二二年 039
十九岁

一九二三年 042
二十岁

一九二四年 047
二十一岁

一九二五年 051
二十二岁

一九二六年 057
二十三岁

一九二七年 063
二十四岁

一九二八年 078
二十五岁





一九二九年 088
二十六岁

一九三〇年 096
二十七岁

一九三一年 105
二十八岁

一九三二年 114
二十九岁

一九三三年 126
三十岁

一九三四年 140
三十一岁

一九三五年 152
三十二岁

一九三六年 166
三十三岁

一九三七年 180
三十四岁

一九三八年 190
三十五岁

一九三九岁 203
三十六岁

一九四〇年 208
三十七岁

一九四一年 215
三十八岁

一九四二年 223
三十九岁

一九四三年 228
四十岁

一九四四年 232
四十一岁

一九四五年 237
四十二岁

一九四六年 244
四十三岁

一九四七年 251
四十四岁

一九四八年 257
四十五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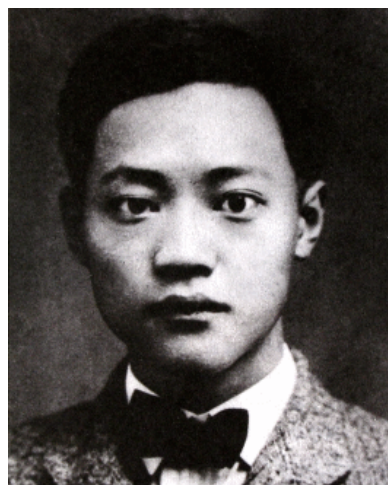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 261
四十六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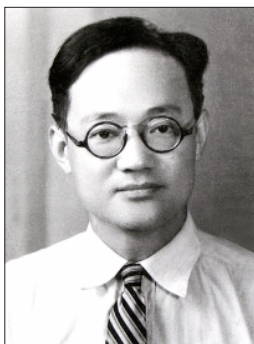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 269
四十七岁

一九五一年 276
四十八岁

一九五二年 280
四十九岁

一九五三年 286
五十岁





一九五四年		291
五十一岁		
一九五五年		295
五十二岁		
一九五六年		301
五十三岁		
一九五七年		311
五十四岁		
一九五八年		318
五十五岁		
一九五九年		324
五十六岁		
一九六〇年		330
五十七岁		
一九六一年		336
五十八岁		
一九六二年		343
五十九岁		

一九六三年		352
六十岁		
一九六四年		358
六十一岁		
一九六五年		364
六十二岁		
一九六六年		369
六十三岁		
一九六七年		377
六十四岁		
一九六八年		380
六十五岁		
一九六九年		383
六十六岁		
一九七〇年		385
六十七岁		

一九七一年		386
六十八岁		
一九七二年		387
六十九岁		
一九七三年		390
七十岁		
一九七四年		392
七十一岁		
一九七五年		394
七十二岁		
一九七六年		396
七十三岁		
一九七七年		399
七十四岁		
一九七八年		407
七十五岁		





一九七九年 414
七十六岁

一九八〇年 431
七十七岁

一九八一年 445
七十八岁

一九八二年 458
七十九岁

一九八三年 469
八十岁

一九八四年 479
八十一岁

一九八五年 497
八十二岁

一九八六年 509
八十三岁

一九八七年 519
八十四岁

一九八八年 528
八十五岁

一九八九年 536
八十六岁

一九九〇年 546
八十七岁

一九九一年 557
八十八岁

一九九二年 566
八十九岁

一九九三年 573
九十岁

一九九四年 583
九十一岁

一九九五年 591
九十二岁

一九九六年 600
九十三岁



一九九七年 607
九十四岁

一九九八年 611
九十五岁

一九九九年 614
九十六岁

二〇〇〇年 620
九十七岁

二〇〇一年 623
九十八岁

二〇〇二年 626
九十九岁

二〇〇三年 628
一百岁

巴金的“笑声”和“眼泪”
代后记 635





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古老的大家庭里”。

这个据母亲说由送子娘娘托梦送来的婴儿，就成为“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

出生

十一月二十五日，此日为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巴金诞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的李公馆。这一天，正是巴金母亲的生日。

巴金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母亲陈淑芬知书识礼，性情平和厚道。她坚韧地经历着产程的剧痛，终于迎接到小生命的平安出世。此时此刻，她欣慰的笑容在苍白的脸上浮现，慈爱的目光在婴儿绯红的小脸上久久地流连。她想起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奇异的梦，梦见送子娘娘对她说：“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父亲李道河给新生的儿子起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诗句。甘棠是一种大树，传说这种树质地坚硬，树龄又长。召伯南巡时曾在甘棠树下憩息，百姓为感念召伯恩德，作歌叫大家不要伤害这种树。父亲的意思很明显，希望婴儿吉祥长寿。

从此，巴金沐浴着“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确实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

巴金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中。



李公馆位于成都北门的正通顺街上。街由石板铺设而成，东西长约一公里。街上有一口双眼井，所以，当地街坊又称正通顺街为“双眼井”。街两边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公馆、商铺、酒楼和茶坊，李公馆器宇轩昂地建在街的中段。和其他公馆一样，李公馆门前有一对石狮子高踞大门两侧，屋檐下挂着一对大红灯笼。夜幕降临时，街上方形玻璃罩子里的清油灯和各家公馆门前的大红灯笼亮了。灯光在黑暗和风中摇曳，相映成趣。李公馆两扇黑漆锃亮的大门上，各站着一位手执大刀的彩色门神。门两边的墙上挂着红漆的雕木对联，上面写着八个黑色的隶书大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门外石阶下是一对长方形的大石缸，名曰太平缸。缸里储满水，许是取水兆

财源之意，亦可在万一发生火灾时，能及时扑救。门内是照壁，“长宜子孙”四个字赫然在目，绕过照壁，方能依次进入五进三重堂的深宅大院。

李氏原籍浙江嘉兴塘汇镇，高祖李介庵率家移居四川成都。曾祖父李璠做过县官，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李镛，号浣云，也做过多年县官，后广置田产，建造了五进三重堂的李公馆，著有《秋棠山馆诗钞》，娶妻汤氏、续弦濮氏、妾曾姨太，共生六子三女，祖父是李氏大家族中权力至高无上的老太爷。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号子舟，是祖父的长子。他曾以过班知县的资格，进京见过光绪皇帝，并做过两年广元县令。辛亥革命前夕辞官回家，帮助管理李氏大家庭。巴金生母病逝后，父

亲又娶妻邓景蘧。继母生性亦仁厚。父亲结婚两次，共生五儿六女。

二叔李道溥，清末举人，娶妻刘氏。他后来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民国后，在成都开办律师事务所。当巴金丧父后，他对这个和他同一天生日的侄儿倍加钟爱，给巴金讲解过《春秋》、《左传》。

三叔李道洋，娶妻濮氏。后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南充知县。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赋闲在家。生活安适、雅逸，写得一手好字。

大姑妈李道沅，是祖父的长女。

五叔李道沛，系继祖母濮氏所生，娶妻固氏。他眉清目秀，秉性聪颖，颇有才气，深得祖父宠爱，后染上吃喝嫖赌等恶习。

双眼井，一九九四年五月被列为“成都市青羊区文物保护单位”。罗韵希摄



祖父死后，他坐吃山空，积习难改，终被妻儿逐出家门，沦为小偷，病死狱中。

六叔李道鸿，为祖父宠妾曾姨太所生，娶妻曹氏。

巴金出生时，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

大哥李尧枚（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字卜贤，小名果儿，母亲呼其“果儿”；二姐李尧桢（一八九八—一九一四）；三姐李尧彩（一八九九—一九二四）；三哥李尧林（一九〇三—一九四五），字茂生，小名安儿，母亲呼其“三儿”；巴金除了名“李尧棠”外，字芾甘，小名升儿。又因他在大家庭同辈男孩中，排行第四，母亲呼其“四儿”，兄姐叫他“四弟”，弟妹们称他“四哥”，其他人称他“四公爷”，后来的小辈们称他“四爸”，孙辈们称他为“四爷”。

就在这个“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的“古老的大家庭里”，由送子娘娘托梦送来的婴儿，自然而然成了父母珍爱的宁馨儿。

但是有谁能准确地预料出他的未来呢？！

当我们跟随巴金成长的足迹，转首回顾，这才发现：

——就在这一年，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逝世，契诃夫的作品在几十年后对巴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在这一年内，俄国著名的民意党人薇娜·妃格念尔出狱，妃格念尔曾参与一八八一年暗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事件，一八八四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席鲁塞堡狱中被囚禁了二十年，她日后撰写的惊世骇俗之作《狱中二十年》，竟会由巴金翻译出版；

——就在这一年，生于俄国、后来侨居美国的爱玛·高德曼被选为第二次无政府党大会的代表，二十多年后高德曼成为巴金“精神上的母亲”；

……

漫长、坎坷、辉煌的生活之旅、艺术之旅、人格之旅和精神之旅已经展开，命运之神将会把巴金引向何方？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



一九〇五年



二 岁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李家大公馆过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周岁生日。

“李家大公馆”是一个大家庭。左三是巴金的外婆抱着幼童巴金，右三是巴金的母亲。





母亲成了巴金“世界的中心”和“第一个老师”。

“把我和这社会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全性格的根底。”

三 岁

巴金的母亲陈淑芬，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媳，上上下下，得一碗水端平。好在她知书识礼，性情温和，对公婆尽孝，成为大家庭中众妯娌的楷模；对丈夫的仕途官运荣辱升贬能随遇而安，对孩子充满了爱和呵护，但绝不娇宠；对下人则宽厚、同情。她在幼小的巴金心目中，是如此完美和崇高！“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多少年来，成了巴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卷。她的爱心似一泓清泉，点点滴滴滋润着幼小的、纯洁孩子的心田。她对“爱”质朴的诠释和理念，犹如一颗神奇的种子，在巴金漫长的人生中茁壮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终于成了母亲赋予他的完全意义上的生命之源。

巴金在母亲去世多年后的回忆中，不止一次充满深情地写到：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先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一个‘爱’字”，“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是富是贫；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爱一切人，不管他们是富是贫；……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拿来分给别人，才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点事情。把我和这社会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全性格的根底。”



巴金的母亲
陈淑芬。



右脚被烧伤。

失足跌入池塘。

母亲眼中的“淘气娃娃”。

四岁

过年放炮仗的热闹景象让巴金心驰神往，他乘“母亲出去拜客”的机会，“穿着臃肿的黄缎子棉袍和花缎棉鞋”，“一个人躲在花园后面一个小天井里燃着叫做‘地老鼠’之类的花炮”，玩着玩着，却把自己的棉鞋烧着了。他又急又怕，却又不知道自己脱鞋。直等到右脚被烧疼了，才哭着叫人，等到老妈子来时，右脚上已经烧烂了一块，以后又误于庸医，于是在床上躺着呻吟了两三个月”。

这一年，巴金似乎“流年不利”，经过了“火”的考验，又差点遭遇水的“灭顶之灾”。还是在花园里，他一不小心，失足跌入池塘。幸亏施救及时，总算有惊无险。这事再次惊动了老太爷，父母自然受到责备，负责照顾他的下人也难辞其咎。最后，祖父心疼孙子，干脆叫人把池塘“填塞”了。

母亲在朝南的屋子里一边陪着她的四儿，一边做针线，还不止一遍地向身边孩子或老妈子叙述四儿出生前她做的那个奇异的梦。然后，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笑着对四儿说：“想不到却是这样一个淘气的娃娃。”

“火”和“水”确实让长辈特别是慈爱的母亲担惊受累，但却没有让幼年巴金畏惧：“当时仍然过得很幸福，脚一好我也就把那件事忘掉了。”天天关在书房读那些不懂的书，不免乏味，一有机会就溜出来玩。

他依然期待放年假，在期待中，年假一天天近了。“心里的快乐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他沉浸在“热闹”和“毫无顾忌地痛快地玩个十多天”的想象中。

幼年巴金在外婆怀抱中。





怕狗。

到川北广元县。

五 岁

这年年底，光绪皇帝死了，慈禧太后死了，年号改成宣统。长辈们的心里像天空变幻莫测的云彩，忽而阴了，忽而晴了。巴金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新年又在期盼中来临，他到舅舅家拜年时，遇到一条大黄狗追赶，骇极惊呼。以后的若干年中，他怕狗，一看到狗，就躲得远远的。

约同年，跟着母亲到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其时任广元县县令。

广元县衙门的大堂。





一九〇九年

生活平和，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

但却看见了死的挣扎，看见了《烈女传》，并产生了疑惑。

六岁

在广元，巴金有了一片新天地。

衙门很大，迎面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还有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草地、桑林，大概有六七进。

全家住在三堂，他和母亲同睡。不久，母亲生了一个女儿，他有了妹妹。妹妹叫李琼如，小名广儿，按排行称九妹。

书房在二堂，窗外有花园。白天在书房读书，先生姓刘，是个温和的中年人，面目和善，会绘地图和画铅笔画。学生就是巴金和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人小，坐着不方便，就跪在凳子上认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刘先生从来不骂学生，巴金书背不出来，老师就让他慢慢地重读，愿意什么时候放学，就什么时候出去，由老书童贾福带着到母亲房里吃糖、玩耍。他喜欢书房，里面充满阳光，看哥哥姐姐认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温和的笑脸、看贾福和气的笑脸，很高兴。他喜欢读书，因为他喜欢老师。

晚上，母亲给孩子们一人一本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有她用娟秀的小字抄写的词，是从《白香词谱》中依次抄下来的。灯下，他和三哥李尧林靠着母亲站着。听母亲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用温柔的声音朗读和讲解词的内容。这成了巴金幼年时代惟一的、美妙的音乐。

最让巴金着迷的是四堂后面的草地和桑林。在丫头香儿的带领下，他和三哥可以尽情地在草地上嬉戏，在两排桑林之间的宽宽的过道上奔跑，或者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高高的干草堆上晒太阳，眯着眼睛，看群鸡嬉戏。他们快乐地在桑林中拾桑葚、吃桑葚，弄得满手、满嘴红红的，互相对望着，哈哈大笑；母鸡下蛋后的“咯咯”声，又吸引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找鸡蛋。巴金没有他们跑得快，但是，他也能找到鸡蛋，因为他知道鸡喜欢在哪儿下蛋。

说起鸡，小巴金对它们充满了感情。三堂后面有几只鸡笼，养了二十几只鸡。这些小生物，成了他的“伴侣”和“军队”。他给每只鸡都取了名字，每天清晨，他到三堂后面去，把鸡依次放出来，一边放，一边“点名”，然后给它们“开饭”；每天傍晚，他把鸡赶进笼子，照例也要“点名”。如果少了一只，

他就四处寻找，直到找到了，才安心地笑着回屋。他会关照它们“好好地去耍”，关照“大花鸡”生蛋后“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或者鼓励被啄后逃开的小凤头鸡“不要跑呀，你怕麻花鸡做什么”。下学后，拉着三哥到三堂后面，想出种种办法来指挥群鸡做游戏。对此，他觉得开心极了。

生活平和，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在广元，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然而，他曾亲眼目睹过一次“死的挣扎”。

死的是他最爱的“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不少白色斑点的母鸡。当香儿告诉他，鸡将杀了做菜时，他“气得流出眼泪来”，还捏起小拳头要打知情的香儿。

后来，当他发现“大花鸡”即将被杀时，就拼命跑着去找母亲，并急得大哭，嚷着：“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母亲立刻叫厨子把鸡放了。可惜为时已晚，“大花鸡”被宰后，在地上乱

扑，伤口还在滴血……巴金第一次看见了“死的挣扎”，又无法救助他的“最好的兵”，于是气得全身发抖，在母亲的怀中放声大哭。吃饭时，他不曾在鸡肉做的菜中下过一次筷子。

他幼小的头脑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做了鸡，就应该被人杀了做菜吃？”

在广元，巴金还在姐姐看过的书中发现一本插图本《烈女传》。“书上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子，但是她们总带着忧愁、悲哀的面容。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投身在烈火中，有的在汪洋的水上浮沉，有的拿宝剑割自己的头颈……”书上的字看不懂，他就问母亲和姐姐。

这才知道，这些牺牲的都是“烈女”，她们是女人的榜样。巴金不喜欢这本书，觉得书中的道理充满了血腥味。

他幼小的心涌现出疑惑：“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为了那些可笑的陈腐观念忍受种种的痛苦，而且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一本充满着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



一九一〇年

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身边有了一个婴儿。

看到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不合理的。

见到照看自己和三哥的杨嫂病死，痛哭不已。“死”第一次在眼前走过。

七岁

早晨醒来，旁边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声，巴金有了第二个妹妹，按排行称“十妹”，小名元ㄥ。从此，他不再跟母亲睡了，他和三哥睡一个房间，由女佣杨嫂照顾。

春天，在母亲带领下，家里人为养蚕忙碌着。因为大哥李尧枚有冷骨风的顽疾，用了许多偏方都无效；母亲心疼大儿子，不忍心他受折磨，从乡绅薛太太处得到新偏方，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熟，包在发痛的地方。母亲养蚕不是为了蚕丝，而是为了得到蚕沙。她还让父亲托人买来一坛黄酒备用。二更时分，巴金躺在床上，能听到母亲或姐姐蹑手蹑脚地到蚕房添桑叶。这一年，大哥李尧枚的病果然好了。

母亲爱儿子，同样爱女儿。后来，九妹广ㄥ出水痘，按中医的吩咐，奶妈应该“忌口”，不能吃“发物”。谁知奶妈贪嘴，偷吃了黄瓜。母亲嗅出了奶妈口中的黄瓜味，又在她枕头下面搜出半碗凉拌黄瓜。母亲非常生气，请父亲来发落。父亲在夜里坐堂，命差人抽了奶妈二十皮鞭，第二天把她辞退了。奶妈走的时候脸色凄惨，含泪抽泣，巴金觉得奶妈可怜，也忍不住哭了。随后，他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对待奶妈，母亲叹气无语。

巴金为这件事有好几天不快活，他想起母亲曾对三哥发脾气的事。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事情的起因是三哥为了一件小事痛骂了香儿，并打了她几下。母亲听了香儿的哭诉，把儿子叫到面前，温和地责备：“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打人骂人。我不愿意你以后再这样做！”

母亲的话他懂，他也记住了，但是，现在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为什么？

他想不通的事儿，渐渐多起来。

父亲在巴金眼中是慈祥可亲的。记得父亲有时带他去新都的桂湖玩耍，有一次，他玩得迷了路，吓得哇哇大哭，好不容易才找到父亲，父亲没有责备他，还

温和地安慰他。而现在，父亲的严厉让他吃惊：父亲知道佣人们在过年的时候推牌九，就去捉赌。连夜坐堂，把参赌的佣人都打了二十板子！

还有，在广元，只要听见“大老爷坐堂……”的喊声，巴金就寻找机会到二堂，站在公案旁，看父亲审问犯人，看见犯人挨打、“跪抬盒”、哭着喊冤枉……

他想不通为什么在家里和善的父亲，在坐堂时却变成阴沉着脸的人？为什么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还要向大老爷磕头谢恩？

他这时候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广元，“死”还在巴金眼

前第一次走过。死者是照看他和三哥李尧林的女佣杨嫂。杨嫂高身材，有一张笑脸，眼神和善。她爱清洁，把他和李尧林的房间、床铺收拾得很干净。她口才好，每天晚上还给他们兄弟俩讲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的故事。但是，杨嫂病了，她回到佣人住的平房里。没有地板，只有破方桌和瓦油灯，很冷。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又黄又瘦的手”，再后来，巴金常常听见杨嫂“奇怪的呻吟声”和关于她“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的传闻。最后杨嫂死了，母亲流泪了，巴金也伏在桌上哭了，哭得很伤心。一个熟悉的善良人的“死”，在他的眼前第一次走过。



跟随辞了官的父亲回成都。

第一次跟西洋人接触。

对于清政府的灭亡，觉得高兴。

八岁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辞了官。回到成都老家，又换了一个新环境。二叔、三叔都从日本回来了，头上装着假辫子，有些人在背后骂他们是革命党。巴金却喜欢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因为他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每天要由母亲或佣人梳理，他觉得麻烦，巴不得早点剪掉。

二姐得了“女儿痂”，差一点死去。母亲请来了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女医生给治好了。巴金是第一次跟西洋人接触，觉得她们很和气，还喜欢她们送的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

这一年，风云变幻，战争烟云密布。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实质上是将铁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列强。这就触发了全国范围的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斗争尤为激烈。在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四川省内掀起了游行、示威、请愿的高潮。教书的龙先生在书房里也传递了有关消息，对被捕的请愿代表表示尊敬，对总督赵尔丰流露出满情绪。后来，四川“保路同志会”举行武装起义，包围成都，与清军枪战激烈。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十一月，袁世凯取代皇族内阁，任内阁总理大臣。二十五日，成都宣布独立，立宪党人成立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了四川都督府，遭到革命党的反对，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人们忧心忡忡，个个惶惶而不可终日。而巴金却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还是害怕，只有十月十八日的兵变给他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下午，全家人正在忙着摆供为祖母举行“生忌”时，仆人报告外面发生兵变。家中顿时乱作一团，忙着逃难。母亲带着众多子女逃到外祖母家。晚上，大家挤在外祖母房间里，听见枪声，看见半个天都被染红了。继而听到变兵进入附近赵公馆的人声、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

……于是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又在舅舅的帮助下，大家翻墙，到野外的菜园子里躲了一夜。

过了不久，长辈、教书的龙先生和客人都谈到了总督赵尔丰的下场，他终于被革命党捉去杀了头。

巴金看到的“革命”的结果，是二叔、三叔取下了头上的假辫子，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仆人姜福用洋剪刀把他和三哥的小辫子剪了。他拿着剪下来的那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开心地晃着头笑了。从此，就免去天天由母亲或女仆给他梳头扎辫的麻烦。接

着，全家的男人们也先后剪掉辫子。让他更感兴趣的是跟着父亲做国旗，先将白布摊在桌上，再用一个极大的碗，涂上墨汁，在布上印了个大圆，在圆中写了个“汉”字；再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周围印十八个圆，国旗就做成了。没有多久，大汉旗不用了，他又跟着父亲做起了五色旗。

这一年，巴金已经懂事多了。他发现“革命”给祖父带来了悲哀。从长辈谈话中，他明白二叔断送了四品官，三叔给自己取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只有和他同辈的小孩子们，依然无忧无虑地读书、玩耍。



读书不是一件苦事。

用花瓣“写”的“春”字。

第一次看见像“梅”那样的女子。

九岁

这一年，中国的政治风云仍然变幻莫测。中华民国已经成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于是辛亥革命成果被窃。袁世凯下令屠杀参加武昌起义的两千多名革命党人。腥风血雨肆虐，中国进入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陈焕章等接受逃亡海外的康有为的指令，在上海组织成立孔教会。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师复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晦鸣学舍”。

巴金依然和同辈的众多兄弟姐妹们生活在李公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依然蹦蹦跳跳，依然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即使有时因为背书背不出来而挨板子，事后依然高高兴地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最热闹的是，参加以大哥为中心的聚会，把他们这一辈的好多亲的、堂的、表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大家一面行酒令，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评论《红楼梦》里的人物。家中既有父亲在广元买的《红楼梦》十六本的木刻本，又有母亲保存的石印小本，还有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他虽然不曾读过，但是常常听家里人谈起，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也十分熟悉了。他从来不曾把读书当做苦事或负担。家里有许多书籍，他喜欢看《彭公案》、《施

一九二一年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公案》、《七侠五义》等。他一读完“早书”，依然急急跑到院子里去玩，那里是他童年的乐园。有时见园子里落英缤纷，觉得可惜，他就撩起衣襟，把散落的桂花、茶花兜起来，既不抛入湖中任其随波逐流而逝，也不心绪伤感地将其用土掩埋起来。他在地、在桌上，专心致志地用花瓣“写”出一个个金黄色、火红色的香气馥郁的“春”字。

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对戏剧产生了特殊的爱好。因为父亲是“可园”剧场的股东，他和三哥常常由仆人姜福带到“可园”的包厢里看戏。京剧的武打、川剧的变脸艺术，使他迷恋不已。回家后，和三哥玩

得高兴时，就在床上翻跟斗、竖蜻蜓。家中常常有川剧演员出入，长辈们也爱好戏剧。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和兄弟姐妹们组织起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的竹林里自编、自导、自演新戏。主角是六叔、二哥、三哥和香表哥，他和五弟（二叔的儿子）总是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后，做翻杠杆的表演。观众就是姐姐、堂姐和表姐们，有时还有父亲。父亲爱他们，也爱看戏，后来干脆编了一出《知事现形记》给孩子们演。

大约在这一年，家中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客人。她身材苗条，穿着一件淡青湖绉衣服，还罩上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一双眼睛

水汪汪的，更让人觉得她善良、温和、美丽。尽管她见到他和三哥时，脸上露出笑容，但是却让人感到她心中并不快活。巴金只知道她是远房亲戚，父亲去世了，家境不好，却怎么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带发修行”。她住了几天就走了。然而，她的美丽和凄凉的笑容如此对比鲜明，特别是那件玄青缎子的背心，深深地、深深地留在他的脑子里。谁知道这位女客人竟成了巴金童年时代“第一次见到的像梅那样的女子”！她的外貌和心绪在他心中潜藏了二十多年，终于在他一九三一年四月发表的代表作《家》中成功地创造出梅这个人物形象。



在公馆里的两个环境即“上人”和
“下人”中生活。
添了一个弟弟。

十岁

巴金在李公馆，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快乐、自由、无忧无虑，充满了长辈和兄弟姐妹们对他的关切和友爱；而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听到他们诉说痛苦的经历和发出绝望的叹息。

母亲教他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母亲教他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亲教他同情、怜恤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这些都使他在幼年时期有机会自由出入于马房、门房、厨房，并能和这一生存环境中的“下人”如轿夫、马夫、厨子、仆人平等相处。

仆人们给他们的四公爷取了个“稽查”的外号，为什么呢？因为四公爷丝毫没有“上人”的架子，他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轿夫、马夫们一起玩，向他们问这问那。

小“稽查”最喜欢的是年老瘦弱的轿夫老周。老周走过不少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知道许许多多事情。老周住在窄小的、没有窗户的马房里，白天拉着主人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烧烟泡。小“稽查”就躺在老周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故事。于是，他知道了李公馆外的另一种生活。老周的儿子死于战场，老婆跟他的朋友跑了，老周孤零零地生活着。老周受到社会的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却不憎恨社会，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他煮饭的时候，小“稽查”帮他烧火。柴草多，点不着火，老周就教他：“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老周的忠心是指忠实地依照自己的信



仰活下去。老周信仰的是什么呢？他对小“稽查”讲述了社会的黑暗面，讲述了自己的悲痛经历后，总是再三劝告激动和气愤的四公爷：“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此时此刻，巴金心里十分难受。他听着、想着，老周说的都是些连母亲也不知道的事，但是，老周说的“人要忠心”和母亲说的“要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是多么相似啊！

母亲是巴金的第一个老师，她的永远温和与带着微笑的脸和教导，在巴金的幼小心灵上镌刻了一个“爱”字。在他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他用毕生的力量和劳绩充实和放大着“爱”这个闪光的字眼；轿夫老周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和他的“人要忠心”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深刻地烙在他单纯的头脑中，并且升华为他在做人为文中毕生信奉和实践的座右铭。巴金成名后，公开地尊称老周是他的“第二个老师”。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巴金在“下人”的生活环境中，看到、听到许多在“上人”的圈子里看不到、听不到的悲剧。

六十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因为

偷了祖父的字画而被逐出公馆，沦为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李公馆，到斜对面的另一家公馆当看门人，后来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边……

不论是在污秽寒冷的马房，还是在灯光暗淡的门房，巴金总是用颤抖和愤怒的心去聆听“下人”们叙述的痛苦经历和发出的绝望叹息。

“下人”们的痛苦和绝望，不仅让年幼巴金洒下一掬同情之泪，而且逐渐地在他心中引燃了反抗的火苗，他立誓要做一个站在“下人”一边并帮助他们的人。

他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他采取了不服从的反抗方式。有两次除夕，全家人聚集在堂屋里，由老太爷率领，按辈分依次敬神。巴金悄悄地躲在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黑咕隆咚的。他一点儿也不怕，静静地，似乎在听老周讲那些辛酸的故事，似乎跟着老周低沉的叙述，走出李公馆，进入一个贫穷多难的世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感受他们的忍耐和真诚。他听到屋外有许多人在叫他、找他。他依然静静地躺在破床上，默默地坚持着这小小的反抗。除夕的鞭炮声响起来了，往常是他和兄弟姐妹们最高兴的时刻。但是，现在，他仍然坚持着抵抗欢

乐的诱惑。一直到鞭炮声结束了，“上人”们都上席吃年夜饭了，“下人”们要回到他们黑暗冰凉的破屋时，他才悄悄地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他的小小的反抗，常常被人嘲笑，他不在乎，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甚至连平日敬神的时候，他都设法躲避。

作为“上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巴金的平民意识无疑是超前和叛逆的。但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他的观念却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尽管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已经在艰难中起步了。就拿他日后一度十分景仰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元老刘师复（一八八四—一九一五）来说，曾在同年创刊的《晦鸣录》的《绪言》中声称：“《晦鸣录》既以平民之书自勉，其言论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状之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同时，他提倡用世界语作为统一的语言，“披支那社会之真相于世界”。

这一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个小弟弟。父母给新生儿取名尧椽，小名开^ㄥ，在男孩子中排行十四。



慈母病逝，从此“竟为无母之人
矣……”。
二姐也死了。

十一岁

这一年，在巴金的生命中抹上了黑色的一笔。

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巴金和三哥等围在母亲的病榻前。母亲已经病了二十多天了，神情十分痛苦。他知道母亲最疼爱他，但是他不能够安慰她，也不能够减轻她的痛苦。这天，屋里进进出出的人多，父亲十分着急，叫老妈子照料孩子先去睡觉。巴金见母亲人不能动，但是神志还清醒，于是和三哥一起回屋了。

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他和三哥醒来时，看见一口棺材已经进了屋。

他和三哥没有看到母亲的死，却含着眼泪看到母亲的“闭殓”。棺材停放在签押房。母亲仍然像生前一样娴静，她的“爱”在人们心中流淌，许多人围着棺材大声哭喊。巴金呆呆地望着母亲没有血色的脸，期待着那温和的笑容浮现在母亲圆圆的面庞上，期待着紧闭的双唇能传发出母亲亲切的呼唤。他依然呆呆地望着，恨不能把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个时候饱看她，许多人依然大声哭喊着，宣泄着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块红绸覆盖在母亲的遗体上，棺盖盖上去，母亲被闭锁在冰凉和黑暗中。漆匠敲钉子的声音沉重而尖厉，撕裂着亲人们的心。二姐、三姐哭着把头往棺材上撞。

夜晚，巴金躺在床上默默地流眼泪。他仿佛觉得母亲温柔的手正轻轻地给他拭去泪痕，耳边响起“四儿”的亲昵熟悉的呼唤。他想像往常一样，伸出双手搂住母亲的腰，把头埋在母亲怀里，长长地舒一口气……然而，李公馆的长房一家沉浸在凄凉和悲痛中，签押房传来的姐姐们彻夜不息的悲啼，让他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窖里。

白天，巴金兄弟姐妹们在签押房为母亲守灵，他望着灵帏前母亲的放大的照片，依



然是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带笑的嘴。他想，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呢？

也许，母亲到亲戚家去借金手镯去了。因为，前几天，母亲向姨妈借了一对金手镯，后来，嫌样子不好看，让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到二伯母那里借了一对。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母亲说不定亲自去借一对最满意的了。

也许，母亲去四圣祠医院拜望那几位英国女医生去了。这几天二姐的咳嗽又厉害起来，母亲大概又在担心她的“女儿痨”复发了吧。

巴金巴不得天快黑，吃了晚饭，又可以和三哥围站在母亲身边，就着母亲剔亮了的油灯，听她亲切地教他们念《白香词谱》；他巴不得新年快来，再偷偷地放一回鞭炮，再把脚烧伤了，变成母亲充满疼爱的“淘气娃娃”；他巴不得春天快来，母亲张罗着养蚕，为大哥收集蚕沙做药，他则可以高高兴兴地去采桑叶，得到母亲的夸奖；他巴不得厨子再杀了他心爱的大花鸡，他可以在母亲面前再哭闹一回，让母亲再叫他一声“痴儿”；他巴不得再来一次战乱，他可以由母亲抱着坐在轿子里，去外婆家避难；他巴不得做错一件让母亲十分生气的事，让母亲用戒尺打他的手心。此刻，挨母亲打的痛

楚会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

然而，母亲只打过他一次，为的是祖父生日时，不肯敬神而挨打。母亲亲切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要“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

在家祭时，巴金和大哥、三哥匍匐在灵前的蒲团上，听表哥代他们宣读父亲写的祭文，当听到“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时，他的眼泪落在蒲团上了。第二天，母亲的灵柩就抬出家门，寄殡在城外的古庙里。

母亲的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恢复了原状。巴金放学后，玩累了，依旧自然而然地跑到母亲屋内，依然温和地叫一声“妈”，依然想一边吃母亲给的云片糕，一边向母亲讲述一些有趣的事。但是，母亲屋内的陈设依旧，却悄然无声，母亲亲切的声音永远消失了。他久久地凝视着屋内新添的母亲的半身照片，研读那熟悉的温和的笑容。此时，磨盘山上的坟墓，冰凉地浮现在眼前：左边一个用黑笔写着母亲的名字，右边一个用红笔写着父亲的名字。山风凛冽，旷野萧瑟，想到母亲孤身躺在墓穴中的景象，他才真正意识到母亲永远离开了他！后来，他敏感的心更能从

有母亲的堂兄弟们身上，深深地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母亲死后，作为母亲助手的二姐尧桢伤心欲绝，本来就病弱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为骨瘦如柴的二姐向母亲祈祷，然而，二姐一天不如一天，她的死似乎不可避免。他的心沉浸在为爱、为怜悯的痛苦中。旧历十二月初的一天早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到了一个四面很宽、长满了草的坟场。中间有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阳光在树梢闪耀，山鸟在树枝上唱歌。坟前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蓝的野花，几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他正在看墓碑上的名字，却被坟后响起的哭声惊醒。他心跳得厉害，迷迷糊糊中，坟场、柏树、野花、山鸟消失了，但是哭声还是声声入耳。是三姐悲哀的哭声在清晨寒冷的空气中颤动。他没有疑惑，二姐真的死了！母亲的死让他感到悲哀，二姐的死让他感到恐怖。他无法想象年轻的生命也会逝去，何况是从小就照顾、关心他的二姐。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入侵我山东半岛，袁世凯为恢复帝制而造舆论，并自封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长房又接连失去两个亲人。李公馆内特别是长房，宁静有序的生活和心境被破坏了。



爱读《彭公案》、《水浒》等，
“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
为了一个异国女郎流下了不少眼泪。

十二岁

父亲不忍心孩子们处于无母的现状，娶了江西籍的女子邓景蘧为继室。巴金感到这位新母亲虽然对他和兄弟姐妹们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医好他心上的伤痕，也不可能像死去的母亲那样爱他；当然，从小就把母亲当成第一位老师的他，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爱这位继母。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互不相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两代人。

为了排遣丧母后的伤痛，他搜寻了许多中外小说来看，并深受影响。他喜欢看《彭公案》、《施公案》、《水浒》等，为英雄好汉劫富济贫的正义行为而振奋，特别是《水浒》中林冲的故事更让他着

巴金的大哥供职的“劝业场”，这里有书报杂志可买。





迷。他爱林冲这样的英雄，憎恨陷害林冲的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

当时，发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杂志《小说海》、《小说新报》等相继在上海创刊，不时到“劝业场”去的大哥常常把最新的杂志买回家，兄弟姐妹轮流看。大哥还成了李公馆第一个写小说的人。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人合办了一份旬刊《十日》，发表大哥和他们自己的作品。巴金花九个铜板就得到九本《十日》。他对《十日》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不感兴趣，因为，他亲眼看到大哥他们写小说并不费力，几乎是从尺牘、文选、笔记上抄袭摘取。他钦佩的倒是六叔、二哥和香表哥等，因为他们为《十日》的抄录、装订、绘图颇费苦心。

他从杂志上看到了岭南羽衣女士著的章回体小说《东欧女豪杰》，为书中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的事迹感动，为了一个异国女郎流了不少眼泪。他曾说，在当时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就成了他所知道的最可敬爱的人了。后来，他从《民报》第十五期中又看到了无首君的《苏菲亚传》、从金一的《自由血》中看到了《苏菲亚略传》，更加深了对她的了解和崇拜。

深深感动少年
巴金使其认为是
“世界上最可敬爱
的人”的苏菲亚·
柏罗夫斯加亚。





把“良心印花”贴在书上。“我当时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父亲用拮据的方式为大哥完了婚。大哥美丽的幻想破灭了。

十三岁

这一年的四月下旬成都举行“五七”和“五九”国耻纪念日活动，声势和影响颇大。爱国者的正义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巴金。甚至几十年后，也没忘记他“当时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景。

当时公开发行的“良心印花”，这种印花比普通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他购买了“良心印花”贴在书上，以激励自己，记住国耻纪念日，永远不忘卖国政府和日寇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大哥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巴金和兄弟姐妹一起向大哥表示祝贺。大哥也高高兴兴地向弟弟妹妹们描绘美丽的梦想：他对化学感兴趣，打算先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念书，以后再到德国留学。但是，没有多久，父亲用拮据的方式，让大哥与张和卿小姐订婚并结婚了，家里着实热闹了一番。接着，父亲为大哥找了一份工作。大哥的理想破灭了，大哭了一场。巴金也为大哥惋惜，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就断送了自己喜爱的前程。

三哥李尧林进中学。不久家里又添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十二妹李瑞珏。

巴金的祖父 右 和大哥李尧枚 左。





“没有……父亲了”，家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

读《说岳全传》，背诵《古文观止》，特别喜欢《桃花源记》。

十四岁

今年的春天不太平，给巴金的心灵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先是成都发生了七天的巷战，川军和滇军激战，发生了不少流血事件。巷战给李公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二房的两个男孩突然患白喉，因为战火纷乱，请不到医生而耽误了。等两个轿夫背着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经奄奄一息。才几天工夫他就失去了二哥和五弟。

接下来，他和三哥李尧林也患了白喉。

谁知，他们的病还没完全好，父亲病逝！

父亲的死，给家中造成惊天动地的巨变。

在暗淡的清油灯下，大哥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大哥的话，似利刃划在心尖，三兄弟抱头痛哭，悲哀在春寒料峭的暗夜中弥漫；在磨盘山上，父亲安葬在母亲的旁边。看着父亲墓碑上的红字一个个地被描黑，他的心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他默默地呼唤着两位爱他和他爱的亲人，心随山风缥缈而逝，剩下一片空虚。这片空虚，在父亲死后，久久地盘踞在他心间。他常常独自踟躅街头，仿佛仍然依依地跟着父亲在街上漫步闲走。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

的人争路时，再也没有父亲温暖的手拉着他了，才明白自己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虽然，继母不久生下了遗腹子十七弟李尧集，大哥的儿子也出生了，但他的寂寞仍然有增无减。

父亲的死，使他懂得了更多事情，他突然看清了李公馆这个富裕大家庭的真面目。

首先 父亲去世后引起了家庭的第一次剧烈纷争以致分家。他们这一房除了继承父亲留下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儿分到两百亩田，独立支撑门户的担子就落在大哥肩上了。分家的过程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加上大家庭积聚多年的明争暗斗的明朗化，他在平和的、友爱的表面下，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更使他不能承受的是，在他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受到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的重重压迫。尽管祖父开始关心和爱他，还出钱为他订了一瓶“养人”的牛奶，但是在从来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的祖父的“关心”下，他连进中学的希望都断绝了。他越来越明白，在李公馆封建专制势力代替了公道；也越来越看清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笼里挣扎、受苦、憔悴以至于死亡，而他却爱莫能助。于是“憎恨”的苗在他心上越来越发芽生叶了，在他充

满“爱”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对封建专制的种种憎恨。

他感觉到身子绑得太紧而不能动弹，精神上的压迫太重而不能卸掉。于是，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白天仍在私塾学习古典文学，背诵《古文观止》，特别喜欢《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等。不久，得到一本白话本《说岳全传》，更加尝到了读书的乐趣。谁能想到，他熟读和背诵的二百多篇古文，像涓涓细流，滋润着他的心田，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启蒙先生”。按照老师的意思写作文让他“很感痛苦”，但是文章交卷后，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些圈，还写下了“水静沙明，一清到底”等评语。

他记得，大哥曾从二叔处借来《说部丛书》，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种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

读书让他摆脱寂寞、痛苦，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阳光，但是也蚕食了他的健康。他日渐消瘦，差不多每隔十几天就要病倒一次，整个冬天都在吞丸药。

三年中，相继失去了母爱和父爱，又陆续失去了嫡亲的二姐和两个堂兄弟，加上体弱多病，原本无忧无虑的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

在大家庭中，二叔对巴金特别关心，教他读日文，也给他讲史书。留学日本的二叔李华封是成都有名的大律师。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就设在李公馆内，还常常让他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去玩。二叔有一名姓郑的书记，他和郑书记熟悉了，晚上常常去找郑书记下象棋。有一次，听郑书记说二叔的辩护很精彩，并安排巴金去旁听。在广元时，他从小就喜欢去大堂看父亲断案，现在，很想去旁听。可惜案子审讯临时改期，没有亲眼目睹二叔精彩的辩护。

三叔是二叔的助手。三叔对巴金兄弟也不错。冬天，他和三哥、濮表哥在三叔屋里围炉谈天，看三叔写字吟诗。晚上，他有时还在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和三叔、郑书记下棋。半个多世纪后，他还记得：“有一回，郑书记请假回家，三叔写了一首诗，跟我开玩笑。‘跃马人何在，争车愿又乖。电灯光如雪，唯有四公来。’”



爱读大哥买的不少新书报，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等。

两个发展他的智力、帮他摆脱孤僻的人。

十五岁

既不能进中学读书又渐渐陷入孤僻的巴金，得到了两个至爱亲人的帮助，他们就是表哥濮季云和大哥李尧枚。

这一年的秋天，他终于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祖父听说学会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工作，一旦进了邮局，仿佛捧了一只工资高、逐年加薪的银饭碗，也不会因为政变而失业，于是不再干涉他。可惜，巴金在青年会上了一个月的英文，就生了三回病，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静养。祖父同意请香表哥濮季云到家里给他补习英文，并且支付一二枚银元的束脩。

香表哥当时是巴金崇拜的人。在他眼中，香表哥性格健全、勇敢，是他们圈子里最有前途的人。他除了在清油灯下跟着香表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英文小说，还接受了香表哥的思想见解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滋生了“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的信念。

让他特别感激的是，大哥买了不少新书报，他可以贪婪地读完它们，连通信栏都不放过。其中《新青年》开始使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他看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看到了李大钊的《偶像破坏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

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由李劫人任社长兼总编的《川报》，积极介绍新文化、新思潮，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精神上的窗口。连《民国日报》、《时报》、《晨钟报》等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有时他也能看到，知道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这些，让长期生活在李公馆的年轻人攫取了新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在一片混沌中看到了亮点，意识到封闭的小世界外面还有崭新的天地。

若干年后，巴金在他的文章中，倾吐了他对香表哥和大哥的感激之情：“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是得到两个人的帮助的”，“在我的心里永远藏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人吧”。

十五岁的巴金
就读的青年会的英
文补习学校。





“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
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
……”

十六岁

一九一九年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一年，也是在十六岁的少年巴金的精神世界中产生最大震撼力的一年。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川报》及时转载、报道了北京学生集会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的消息。这一正义、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席卷了全国，《川报》也向各县民众发出了声讨国贼的通电。当他和大哥、三哥、香表哥读到这些消息时，感到从未有过的震动、新奇和兴奋。大哥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回来的书报杂志更多了。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



五四时期巴金
购读的部分刊物。

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即WEEKLY）等，甚至连《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设法买到了。

罗家伦、傅斯年主编的《新潮》月刊，提出“文艺复兴”的口号，公开反对封建文化，主张个性自由、妇女解放；提倡文学革命的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批判林纾等封建复古主义者；《每周评论》上刊载节译的《共产党宣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论述了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刊物，学员有马克思

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他们发表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客观地反映出五四初期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的实际情况，涉及新文学、西方哲学、人生观、妇女解放，以及到法国留学等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星期日》，由李劫人主编，在创刊号中提出“要人人自觉地去创造光明的世界，坚决与老世界一切束缚的、掠夺的、残酷的有形制度，无形思想学说，以及社会中保守的、恶劣的、腐败的风俗习惯等宣告脱离关系”。《星期日》先后出过《妇女问题专号》、《劳动问题专号》、《社会问题专号》，刊登过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陈独秀的《男子制与遗产制》、吴虞的《非孝》和《反

孔》等文章，在成都有很大影响，提倡新文学、宣扬新文化，鼓励青年人勇敢地向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礼教进行无畏的斗争；留法勤工俭学学会创建人之一的吴玉章从巴黎回到成都，在爵版街上的志成法政专门学校内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宣扬法国的民主自由思想，组织培训赴法留学生……

他和大哥、三哥，后来还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每天晚上，读这些书报杂志上的文章，讨论文章中的问题。他们五个人还组织了一个研究会，遗憾的是只活动过一次，后因为六姐的母亲阻止六姐参加而夭折。

总之，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从此，他一再声称：“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

陈独秀创办的
《青年杂志》后改
名《新青年》。



五四运动后
出现的新刊物。



“接受了更激进的新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结识新的朋友……”

有一段时间，每夜都读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被烧成灰了……我倒希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

又读到廖·抗夫的三幕剧《夜未央》，“第一次找到了”“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终身的事业”。

十七岁

四月

在巴金如饥似渴地吸收五四带来的新鲜养分时，李公馆的掌门人即祖父李镛发狂病死在孤独里。按照封建大家庭的惯例，“祖父去世时，我还有四个叔父，祖父的丧礼却由我大哥作为‘承重孙’来主持，行礼时他站在正中，点主时（‘主’指祖父的神主牌位）就取他指上的血。他为祖父服丧三年，我们却只服丧一年”。

祖父的死，在李公馆内掀起了更大的风波，叔父们在祖父的灵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大哥虽然是长房的代表，毕竟是小辈，几乎没有发言权。巴金害怕祖父，也憎恨过祖父，因此，祖父的死，就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卫道者那样消失了。但是，想起祖父晚年对他的关心，想起祖父病重时，又黑又瘦的老脸和淌着眼泪的微笑，一种对曾经爱过他的人的悲悼之情油然而生。当然，祖父的死，使巴金获得了自由，从此，家里再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

二叔自愿做了巴金兄弟俩的语文老师，亲口讲解史书。“每天晚上我们到他的书房，讲解告一个段落，我们便告辞回屋。”

二叔讲到《聊斋》中席方平告倒冥王的故事时，“必讼！说得好！”的拍案叫绝声

把巴金兄弟吓了一跳。二叔一边重复着席方平在严刑拷打下坚持说的“必讼”二字，一边用席方平的故事，剖析了《聊斋》中的“春秋”笔法：“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二叔的讲解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写文章要有骨气！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五月 他依然沉浸在新思潮的激流中，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第一次和朋友们在成都大街上散发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

八月

和三哥一起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开始了从补习班、预科到本科的系统学习。外专的负责人廖学章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校中可以自由传播反封建的思想。在外专，他聆听过以“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著称的吴虞老师的课。吴虞就是在《星期日》上发表过《非孝》和《反孔》等反封建檄文的作者；他念过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原版《随笔集》和英文修辞学、狄更斯的《大卫·柯柏菲尔》、司蒂芬孙的《宝岛》；和外专的学生们一起，在四川学联的领导下，卷入了罢课和请愿斗争，反对军阀刘存厚对进步学生的暴虐和专制……

少年巴金的生活中射进了一线阳光。他不再把自己封闭在弥漫着自私倾轧、散发着封建陈腐气息的李公馆中，不只在传统文化中排遣内心的孤独和寂寞，甚至蚕食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了。他和五四时期的许多有思想、有激情的青年人一样，浑身充满活力。此时的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

一九二〇年，无政府主义对四川的青年运动影响比较大，由陈小我组织的适社是四川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曾印发了《红潮》、《共产》等小册子。他们传播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主张，宣传“真正的幸福，还要我们自己去干无政府革命”，认为“只要大家起来革命，革命便立刻成功”。这些宣传在青年学生

中有一定的影响。成都还出现了青年学生办的刊物《半月》。

《半月》是综合性的小刊物，半个月出一期。内容涉及当时青年学生学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揭露社会黑暗，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势力。在创刊号《本社宣言》中指出：“吾人生此时代，世界仁爱正义的光，已在这几千年进化路上的前端闪着了……不过有许多可怜的弟兄还不觉悟，所以我们才组织这报，要使多数人觉悟……”从第十三期起，《半月》开始发表和转载介绍无政府主义社团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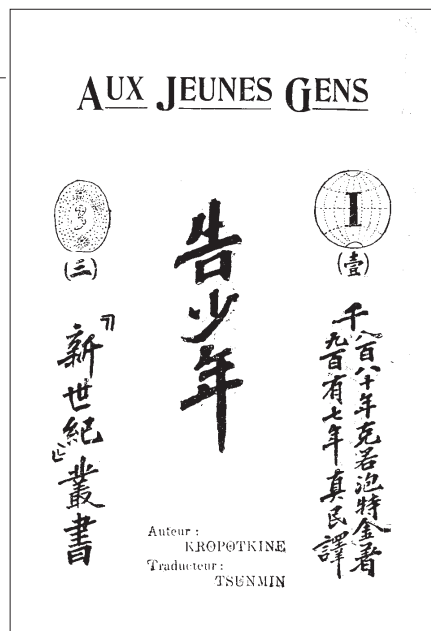
十二月

朋友从上海给巴金寄来一本真民节译的小册子《告少年》。封面上印着“天下第一乐事，无

克鲁泡特金
《告少年》书影。



克鲁泡特金。





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的警句。他满怀热情，闭了门用颤抖的心去读这本小册子，如此聚精会神，仿佛灵魂也被书中带有煽动性的文句吸引去了。

《告少年》的作者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是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生于莫斯科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在军队供职，又从事地理和地质考察。一八七二年在瑞士参加第一国际，回国后因为参加民粹派运动而被捕。一八七六年逃亡国外，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主张消灭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二月革命后回国，对十月革命抱敌对态度。去世前不久，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因肺炎，逝世于莫斯科。殡葬时，声势浩大，各界人士高举几百面深黑色的无政府党的旗帜，二百多人组成的乐队高唱“永久毋忘”的《安魂曲》。克氏的主要著作有《亚洲山岳传》、《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法国大革命》、《面包略取》、《互助论》、《人生哲学》。在《告少年》中，克氏抓住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讲述了青年人怎样才能做一个使人民大众摆脱痛苦、争取光明和幸福的人；用通俗、生动、活泼的富有感情和煽动性的语言，指出妇女、工、农、兵团

结起来，汇成人山人海，定能埋葬旧世界；还用雪莱“当奴隶正在毁坏他的铁链的时候，不要怕！”和“站在自由人的前面的时候，不要怕！”的诗句鼓动青年人。

他终于被《告少年》征服了：“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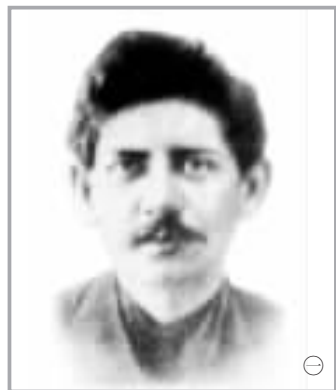
此时此刻，他渴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

找谁呢？

他首先想到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敬告青年》、

《欧洲七女杰》、《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偶像破坏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等，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青年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于是，他给陈独秀写信，这是他一生中给陌生人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个人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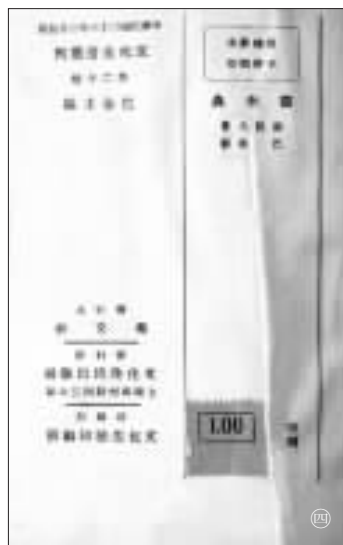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等了好久，他没有得到回信。但是，他不灰心。





此时，从《申报》上看到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他立刻汇款邮购。不久，就收到了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夜未央》是波兰人廖·抗夫（一八八一～？）写的三幕剧，一九〇七年在巴黎公演，中译本一九〇八年由巴黎世界社出版。该剧讴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同沙皇统治者进行斗争而英勇献身的一群青年英雄。“那些人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但已经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参加了为人民求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那些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是那么忠诚、那么慷慨、那么英勇！”他“看见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第一次找到了”“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终身的事业”。此时，他“刚刚信奉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看了《夜未央》，天真地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会与明天的太阳同时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灭”，“便把那本书当做宝贝似地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让他们抄录了几份。大家把剧中的青年人作为模仿的榜样，而且排演了《夜未央》，并在万春茶园公演。

他心中蹿动着一簇簇跳动的火焰，有各种不同的时代音响震撼着他的敏感的心灵，他无法让自己平静和安宁，他像一股炽热的岩浆，在地壳大变动的时刻，终会找到自己的突破口，释放出热力，哪怕在喷薄中燃成灰烬！



- ① 《夜未央》作者廖·抗夫。
- ② 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之正文页。
- ③ 廖·抗夫《夜未央》插图之一。
- ④ 廖·抗夫《夜未央》版权页。
- ⑤ 廖·抗夫《夜未央》书影。
- ⑥ 李石曾。



兴奋地参与“适社”和《半月》编辑部一群激进青年人的宣传活动，同时参加了秘密团体“均社”，自称是“安那其主义者”。

发表第一篇政论文《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我只有一个希望：谦虚地牺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的心中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空泛的爱。”

十八岁

二月

从第十四期《半月》上，读到转载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了解了该社的旨趣在于“铲除统治权力”、“灭绝经济制度”、“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冲破恶劣的环境……改造美丽的新环境，来适应人类全体生存的要求”，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他边读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厉害。”于是，一种做一点实际工作的渴望油然而生。但是，家庭环境的阻力，还是让他下不了决心。夜深了，他无论如何不能安静下来，两种冲突的思想在脑子里斗争着。此刻，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接着，听见大哥把轿子的玻璃砸碎了。大哥在李公馆中被扭曲的性格和作揖主义造成的心灵创伤，历历在目。玻璃的破碎声似重锤砸在他的心坎上！青年巴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个《半月》的编辑，要求他作我的介绍人”。第二天，这封贮满了新希望的信，就到了成都北门狮子巷四十号《半月》的编辑章戡初手中。

这一次，他寄出去的信没有泥牛入海无消息。第三天，章戡初的回信送来了，并约

定了见面的时间。

马上就要和自己心仪已久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从事社会活动的青年人见面了，他感到十分兴奋，曾经在翻译小说中看到的俄国革命党人活动的情景，在《飞将军》、《昙花梦》等书中描写的秘密会议的神秘气氛，顿时在脑子里浮现出来。此时此刻，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好奇、激动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如约前往章家，在那里和《半月》的创办人袁诗荃、吴先忧、张拾遗、章戡初等见面了。

在章家小小的客厅，几个青年人敞开心扉，谈自己的痛苦和渴望，充满了信任、理解、温暖和友谊。谈话过程中，青年巴金才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不久成都也会有类似的组织。年轻的朋友们答应以后会吸收他加入。临别时，他们送巴金一些“适社”的小册子，并介绍他和“适社”的负责人陈小我通信。这次谈话对青年巴金有很大影响：“这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个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

当晚，他“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组织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适社”的陈小我写了信。

青年巴金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看到刊登的全是新文学作品。该刊由沈雁冰主编，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他也获悉了该刊宗旨：“一，是联络感情。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二，是增进知识。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三月

他正式作了《半月》的同人，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第十七号《半月》“本社社员录”中印有“芾甘”这个名字。他结识了《半月》的其他成员希宋、斌叔、砚僧、若仙、梦文、望云等新朋友，参加了二十日在云南会馆街召开的《半月》第二次社员会议。自此，他的生活方式渐渐变了，白天上课，每天晚上总要去设在商场楼上的“半月社”去卸铺板、打扫房间、回复读者来信、处理杂事等：“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

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

有一次，“我们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几条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回到家里。晚上，我悄悄地叫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浆糊，我挟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贴上去”。

“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去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到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在《半月》同人中，吴先忧的毅力、刻苦精神和言行如一的品格使他十分敬佩，他称吴为“我的第三个先生”，并说：“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响。……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做到像他那样的‘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吴先忧后来成了《家》中进步青年学生张惠如的原型。

开始为《半月》撰稿。

四月一日

在第十七号《半月》上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署名芾甘。这是目前发现的巴金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大胆地凭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社会制度”；认为“妨碍人民自由的的就是政府”，由于“那些资本家垄断世界公有的财产”，所以世界上才没有平等；认为“安那其才是真自由，共产才是真平等”；要“废弃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机关”，“把生产机关及它所产生的物品属于人民全体，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受平等的教育，没有智慧的分别”；为了实现“这自由平等的社会”，必须“推翻那万恶的政治”。

在第二号《人声》上发表《五一纪念感言》，署名芾甘。文章介绍了五一的历史，阐明了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思想。向劳工们指出：“你们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你们要晓得今天是你门做人的日子，望你们赶快起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争回你们的人

格，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万恶的资本阶级。”

和三哥读冰心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超人》。“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我们弟兄从书本上抬头相对微笑”，因为两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失去的母爱”。

五月一日 把一大卷宣传“社会革命”的传单放在大提包里，心情紧张、兴奋地在离家很远的一条巷子里去散发。走来走去，但是散发得很好，很顺利。散完后到指定地点集合，和大家愉快地交谈散发传单的经过并参加五一纪念活动。

五月十五日

在第二十号《半月》发表《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署名芾甘。文章指出：“今欧战告终，和平开始，离世界大同时期将不远矣。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习‘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安那其主义”源于法文 Anarchisme，又译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此外还有日本的古田大次

郎和大杉荣、美国的柏克曼、俄国的高德曼以及我国的刘师复等。

本文发表后，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的朝鲜学生高自性，高是携了《半月》来找他商量如何推广世界语的。

不久，参加由《半月》编辑部组织的进步学生的秘密团体“均社”的活动，一起翻印小册子，并自称是“安那其主义者”。“我只有一个希望：谦虚地牺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的心中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空泛的爱。”他和“均社”的朋友们一起读书、看报、讨论问题、办刊物、散传单，沉醉在“把个人的感情消融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的狂热中。

参加讨论袁诗荃起草的《均社宣言》。该宣言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废除私有制”；“凡统治包办的一切制度，概废去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权利义务的享受服务应当均等，贵贱主奴统治者被统治者的阶级应当铲除”；建立一个“无强权、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无武力、无私产、自由生产自由消费、无宗教、智能均等……平等、博爱、自由社会”。怎样去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宣言”主张：“我们确信世界是

‘爱’组成的，不是‘杀’组成的，即世界是互助的，不是竞争的；‘爱’是人类的天性，是世界进化的要素，应当极力发挥的，‘杀’乃是一种病态的现象，是妨碍破坏进化的危害物，我们应当消灭它……；用各个人真实的‘爱力’去实现我们将来的‘爱的世界’。”

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获悉该刊宗旨：“我们确信文学的重要与能力。……惟有他能曲曲的将人们的思想与感情，悲哀与喜乐，痛苦与愤怒，恋爱与怨憎，轻轻的在最感动最美丽的形式里传达而出；……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惟文学可以实现之。”目前我们“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

六月一日 在第二十一号《半月》上发表《I. W. W. 与中国劳动者》，署名芾甘。I. W. W. 是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的缩写，即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认为“中国劳动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纯粹劳动者组织的团体”，走美国的“世界产业劳动者”实行“总同盟罢工”的道路，“组织一个极大的革命劳动团体，同心协力，打破‘国家’、‘政府’、‘法律’等制度，推翻劳动者的最大敌人资产阶级，再把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归

劳动者所有。”

七月

因在《半月》上编辑和推荐刊发了两篇痛斥四川封建势力、宗法思想对女子束缚的文章，加上同期刊物上还发表了当时四川带头剪发的一位女子的文章，引起了当局对《半月》的注意。当时成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女子剪发在北京和沿海大城市已经不足为奇，但在成都还遭到封建卫道士们的反对。一时间，认为女子剪发“有碍观瞻”的舆论四出，巡官汪顷波上书要求明令禁止女子剪发。几天后，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半月》。青年巴金和《半月》的同人巧妙地与当局抗争，经过策划，出了一期停刊号，刊登了袁诗荃等写的文章，记叙了《半月》被查禁的经过，对军阀压制民主自由的封建黑暗进行揭露。《半月》创刊一周年，被迫停刊，这是五四运动后，四川第一个被查禁的进步刊物。

他和《半月》的同人们继续设法争取创办新刊物，编辑了《革命》，可惜“印刷交涉失败。洪先生说要检查后才能印。我们这样的东西怎么能送去检查呢？版已排好，结果由我们付了六元半钱的版费……现在大约油印出版”。

八月 《半月》被查封后，成都聚兴诚银行有几个年纪大的

人正要创办《警群》月刊，他们自己办不成，想利用《半月》编辑部的年轻人。他和吴先忧、张拾遗决定参加进去。“我们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也不懂得客气。”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第二次开编辑会议，他和吴、张各拿出一篇文章。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先生”看了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后，警告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青年巴金不甘示弱地顶了回去：“不要紧，我负责！”

九月上旬 在《警群》第一期上发表短论《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署名芾甘。借用托尔斯泰、高德曼的话驳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鼓吹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观点，并指出爱国主义与私产、与侵略势力毫不相容，认为“现在中国人民走向幸福之路的障碍，是私产、政府和宗教等”——“政府之所以能维持久远，都是私产的缘故”，“宗教是束缚人群思想，阻碍人群进化的东西。我们求真理，他却教我们迷信，我们要进取，他却叫我们保守”，因此“我们到幸福之路的第一步，就要推倒这些”。

九月二十二日 致信袁诗荃。署名芾甘。告知“《革命》印刷交涉失败……现在大约油印出版。……《警群》停刊”以及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远东运动会场散传单被捕的同志”，因其中有“四人不肯低首于民贼之前”被判刑坐牢，虽经筹款营救也无效。还通报了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一些信息。

十月 《警群》出版后，学监之类暗暗到警察厅告发，巴金等三人登报声明与《警群》脱离关系。旨在“警醒”“群众”、“实行互助”的《警群》，仅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那位姓闽的编辑居然做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并伺机报复，铁板着黑瘦脸不让巴金从办公室通过。

冬

经陈小我介绍，与重庆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通信。卢剑波笔名黑囚等，五四时期即接受无政府主义。青年巴金认为卢剑波“锋芒毕露”、“年少气盛”，“有极强的精神力量”，是一个“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家”。

通过卢剑波又结识了泸县川南联合县立师范的张履谦和毛一波，他们都是积极宣传和参加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青年学生。

读到了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在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致西欧工人的一封公开信》。



读冰心的《繁星》等，试作小诗。《被虐者的哭声》吹奏出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音符。

发表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

十九岁

春

脱离《警群》约半年，他又和吴先忧等创办《平民之声》周刊，并主持编务，通讯处就设在自己家中。封面和扉页上印着“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印了一千份。送审后，警察厅认为“对于国家安宁恐怕妨害”，不允许发行。巴金和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只得半公开地零卖。终刊号出《师复纪念号》，刊载刘师复制定的“心社”十二戒律：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乘轿和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

得上海一月创刊的世界语杂志《绿光》，继续学习世界语，并与该刊主编胡愈之通信联系。《绿光》，胡愈之主编，郑佩刚负责排字和发行工作，华强印务所印刷，民智书局代售。《绿光》前身是一九一六年在上海创刊、由盛国成主编的世界语杂志《华星》。《绿光》发行处设在上海法租界褚家桥双十医院。当时，每逢星期日就有一些世界语学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双十医院聚会，出席者有胡愈之、郑佩刚、盛国成、陆式卿、沈兆瑛等。该刊主要发表世界语文章，宣传、介绍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

读鲁迅、胡愈之、汪馥泉等人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当时，俄国著名盲诗人



爱罗先珂担任北京大学世界语和俄国文学讲师。巴金大量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并很感兴趣。“我比较喜欢的倒是托尔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几个”，因为“俄国人的生活的环境很接近那时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他们的嗜好和性格也与我们中国人相似”。

三月

在《平民之声》第四至第六期上发表《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署名芾甘，根据黄凌霜的《托尔斯泰之生平及著作》提供的资料编写。“这自然说不上研究，惟一的秘诀是抄书。”

他把刚出版的《平民之声》带回家，放在他和三哥住房对面的空屋子里。有一天，刊物被二叔发现了，上面还印着“成都双眼皮井二十一号李芾甘”。二叔露出不满意的眼神，巴金以为二叔要训他，结果，二叔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开了。事后从大哥口中知道，二叔让大哥劝告他，在外面活动时要多加小心。当时，他听了还颇不以为然，在他的印象中，二叔似乎是个“守旧派”。

在二十三日《晨报》上读到李大钊的《黄陂流血记序》，记叙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黄爱和庞人铨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血腥事实，文中深刻的见解打动了他的年轻的心。特别是黄、庞流血事件的悲壮更激起了他的愤慨。



五月

读《文学旬刊》第三十六期上西谛（郑振铎）的诗《悲鸣之鸟》，被作者对人间痛苦的同情、对残杀无辜的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控诉所感动：“西谛君的《悲鸣之鸟》何等沉痛呵！我读这篇时已陪了不少的眼泪了。”

从众多报刊杂志和宣传资料上获悉北京举行五一纪念大会，李大钊到会演说，介绍五一运动史略和俄国纪念五一的情况。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共产党、国民党、无政府党、无党派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出席大会，讨论工人组织全国总工会等问题。

六月 在满园蝉声中，他和堂弟读《晨报》上刊载的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从繁星和大海中去感受诗和生活的美，去吸收精神的滋养。还陆续读了当时文坛上活跃的诗人的写景抒情的佳作，开始模仿写白话新诗，



并投寄到《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

七月二十一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四十四期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署名佩竿。这是巴金第一次启用“佩竿”的笔名，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新诗。全诗十二节，表达了对劳动者的同情和对黑暗统治的不满，也抒发了追求理想和创造光明的激情。

《被虐者的哭声》是巴金走向文学创作道路时吹奏出的第一个音符，它贮满一个十九岁进步青年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四圣祠北街十号刘叔勋经办的《民钟》成都代销处购得《民钟》。《民钟》创刊于广东，是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在全国设立代销点。

这段时期，巴金更关注文坛现状和热衷于创作实践。

八月二十三日 致《文学旬

刊》编者信，署名李芾甘。载九月十一日《文学旬刊》第四十九期。对当时专门发表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刊物提出批评：“《礼拜六》、《半月》、《快活》、《游戏世界》等等杂志很发达，不能算是好现象”，“很希望《文学旬刊》能改出周刊”，“我以为现在最好一面做建设的工作，一面做破坏的工作；双方齐进，那么就可得很大的效果；将来中国文学便可立足于世界文学之间，并能大放光明”。

九月三日 作散文《可爱的人》，署名佩竿。载《文学旬刊》第五十四期。描写年仅二十

岁的瘦小的轿夫，冒着大雨，抬轿挣钱、养家活口的痛苦生活。作者称他为“可爱的人”，对他表示“同情”和“崇敬”，同时也愤怒地诅咒了欺压轿夫的有钱的“魔鬼”。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巴金最早的一篇散文，体现出巴金早期作品中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

九月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诗歌《路上所见》，署名佩竿。作品描绘负重行进的“瘦牛”被“雄壮的人”举起“鞭子”重抽的悲惨图画，用象征手法表现作者对苦难深重的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憎恨。

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五十六期发表诗歌《梦》、《疯人》、《惭愧》、《丧家的小孩》，署名佩竿。

《梦》写“污泥的地上”“昏睡”着许多瘦弱、衣不蔽体而“脸上带着欢乐的颜色”的人，在他们中间“一个穿着绿衣的人”微弱地呼唤昏睡的人们“起来”。最后，绿衣人的呼声变成了“叹息”，也“躺在污泥里了”。“绿衣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然而却是孤独和寂寞的。作者抒发了对深受压迫但已处于麻木状态的劳动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

《疯人》中的“疯人”是诗人对那些把所有的“金钱”、“货物”、“租米”、“散于一切贫民”的“极富的人”、“商人”和“大田主”的统称。尽管“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面对严酷的现实，作者认识到，在充斥“聪明人的世界中”已“没有一个疯人存在了”。作品表现了作者热烈的幻想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丧家的小孩》和《惭愧》分别剪裁了一幅幅人生悲惨的图画：年仅十二岁的孤儿头上，“插着草标儿”出卖自己；老乞丐病饿街头，呻吟、乞讨。作品形象地表达出作者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同情和无力改变黑暗现实的悲愤。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被译为“杜思退益夫斯基”等。
- ② 托尔斯泰。
- ③④ 《礼拜六》杂志封面。



“怀着一腔热情”，“怀着极大的勇气离开了”“住过十七年的成都”。

和三哥一起到浙江嘉兴塘汇镇李家祠堂寻根问祖。

二十岁

一月二十日

在第二期《草堂》上发表《诗一首》，含《哭》、《沉没》、《铎声》、《母亲》四题，署名佩竿。抒发对“弱者”和“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倒在街心寂然地死了的”乞丐的同情，以“更夫沉重的铎声”象征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在“冷酷”的人世间，更忆起“亡故的母亲”的爱和温暖。

在第二期《草堂》上发表译作《旗号》，俄迦尔洵作短篇小说，署佩竿译。作品通过轨道工瓦西里受欺压后，认识到“地球上没有比人类还凶恶的野兽”了，决定撬开铁轨，向上司报复，而管理员西蒙·伊凡诺夫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列车的故事，表达了只有善和爱才能“把灵魂从罪恶里救起”的思想。

三月二十八日 中午，第一次感觉到“死”和自己隔得很近。是日，成都发生了军阀混战，城外的军队用大炮攻

《旗号》
作者迦尔洵。



巴金 右 与家人合影。



城，炮弹大半落在李公馆。炮声隆隆，房屋倒塌声、家人的惊叫声乱成一团，各人散乱地躲藏起来。他起先还在大厅上踱步，后来和三哥跑到书房里，“躺在床上……炮弹带着春雷似的巨响从屋顶上飞过。我想，这一次它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吧。只要一瞬的工夫，我便会落在黑暗里，从此人和我隔了一个世界，留给我的将是无穷的寂寞。……这时我的确感到很大的痛苦。死并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那种不定的情形”。

四月

参加三姐尧彩的婚礼。三姐只有二十三岁，但在当时，已经错过了女子择偶的最佳年龄，不得已而求其次，做了填房。三姐出门前幽怨哀婉的啜泣，成婚时三姐夫一家的俗气，让他心中掠过一抹阴影，预感到三姐的命运不佳。

和三哥获悉，因没有中学文凭，即使继续在成都外专读完规定的年限，将来也得不到毕业证书。三哥年长，提出“去上海读书”的想法，青年巴金本来就受“离开家庭到裁缝店去当学徒”的吴先忧的影响，“我也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三兄弟说服了继母和二叔，青年巴金与三哥积极作好出川准备。

五月五日 在第三期《草堂》上发表四首诗。均署名佩竿。通过“没有母亲保护的孩儿”和“在花盆里死了”的“梅花”抒发了孤寂之情；通过“月夜”“徘徊”的“我”，对“如梦如烟”的“小孩时代”的眷恋，倾诉了内心的苦闷。

五月十五日 在第一期《孤吟》上发表诗歌《报复》，署名

P.K.。P.K.系“佩竿”两字的英文缩写。诗前有小引云：十七日是长沙工人罢工领导者黄爱、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一周年，“愤怒”中写了这首“不像诗”的诗，“但是只要能感动人，是不是也不要紧”。全诗四十余行，感情真挚热烈，认为黄、庞等工人兄弟“是为着我们全人类的利益而死的”，高喊“这杀兄弟的仇终久是要报复的”。号召“一切有良心的朋友们”，“预备着我们自己的血，来与恶魔决一死战”。

五月下旬

与继母、大哥、三哥、十四弟李采臣、十七弟李济生等合影留念，准备离川。

起程当天，向二叔、三叔辞行。二叔从箱子里取出二十银元相赠，并再三嘱咐要小心谨慎。在大门口与众亲人作别，离别的酸楚顿时涌上心头，默默地拉着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三哥的手，在大哥带领下，终于离开亲人，向码头赶去。猛回首，亲人还在挥手，他的心抽紧了。这儿毕竟是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家！一时间，父亲温和的笑容和母亲慈爱的叮咛都跳入眼帘、激荡着心魄，他差一点不能自控。天天进进出出、习以为常的“家”，此时此刻，清晰鲜明地烙印在心坎上，永远保留在记忆中：“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行李安顿在竹篷木船内。他和三哥各自紧紧握住大哥的手，久久难放。三十来岁的大哥竟如此苍老憔悴！去年夏天，爱子庆斯死于流行性脑膜炎，把大哥的心都撕碎了。现在，两兄弟又要远离他而去，老家的担子彻底地擢在大哥肩膀上了。曾几何时，大哥是他们这一辈兄弟姐妹中最有前途、最充满理想和青春活力的青年啊！

船终于开了，大哥“流着眼泪离开，感到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但是我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

着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然而“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尽管他和三哥“怀着一腔热情……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仍毅然地“怀着极大的勇气离开了”“住过十七年的成都”。

艄公的川江号子激越而苍凉，一叶竹篷木船载着他们，缓缓“送入茫茫海中去了”。

渐渐地，故乡模糊了，大哥清瘦的身影消失了，身后夕阳西沉，波光潋滟；极目远眺，天水一色，苍苍茫茫，心随着水波荡漾起伏，眼弥漫着由远及近的黑暗。“夜幕下降，江面一片黑，船缓缓地前进，想念亲人的时候，我看见远方一盏红灯闪闪发光，我不知灯在哪里，但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面引路”。巴金触景生情，构思了短诗《黑夜行舟》：“天暮了，在这渺渺的河中，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罢！”

木船经乐山，上岸去看望了姑妈和两个表哥，因离船的时间有限，只得匆匆作别。但是言谈间，发现昔日意气风发的香表哥濮季云，因为背上家庭的包袱，变得沉默和消沉了。途经泸县，上岸购得冰心的《繁星》。在泸县改乘外国小火轮到重庆，经宜

昌，到汉口。在汉口打电报给早半年到上海、目前在浦东中学的四川学生江疑九，告知抵达上海的时间，希望他能到码头接船。

船顺水行舟，提前五小时抵沪。估计江疑九尚未赶到，遂与三哥上岸。经生意人介绍，乘马车到四马路（即今福州路）。途中，因车夫违犯交通规则，被弄到巡捕房罚款一元六角。最后，在“神仙世界”游乐场对面的小旅馆安顿下来。入夜，福州路上，红灯初上，浪声艳语从窗下传入，让旅途劳顿不堪的两个年轻人反感不已。第二天，与在《新申报》工作的族叔李玉书联系，经他介绍，换到汉口路的申江旅馆。

后来，由李玉书安排，前往浙江嘉兴塘汇镇。这也是二叔临行前的嘱托，让他们寻根问祖，看看李家祠堂是否需要重新修建。到了塘汇镇，受到八十多岁的四伯祖的热情款待。但是，从四伯祖口中，了解到因管理祠堂的裴二哥抽鸦片，管理无方，他梦想中的“嘉兴祠堂”早已不成样子，“一团火热的心”顿时“冷了一半”。

后来，就从四伯祖家坐江南的小船去祠堂祭祖。

嘉兴塘汇镇山清水秀。“船虽然小，然而湖面却宽。望着一碧无际的水波，令人眼界爽快。两岸有几处种有柳树及其他的树

木，投影于波中，载沉载浮。最妙的是摇橹的声音，橹一摇，水便起了一种声音，这是很有节奏，不急不徐，不高不低，并且很幽雅的，这种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

他兴奋地第一个跳上岸，谁知，李家祠堂颓败不堪，和成都老家的气派迥然不同：祠堂年久失修，外观似“破庙”，而且进门处“很狭”，路不平，堆着“碎石残瓦”，“神龛”的玻璃“碎了”，还“生满了尘埃”，“面前放着一张破桌子”，“屋顶是漏的，抬头可见着青天”，因为裴卿把祠堂租与成衣匠，所以“天井中放着一张桌子，一个成衣匠正在那里缝衣”，“四伯祖将蜡烛燃起，我们把礼行

了”。事后，他们将李家祠堂的现状如实向二叔和大哥函告。

在嘉兴稍作逗留，就回到上海，住春江旅馆。

与江疑九见面。据江疑九《巴金初到上海》回忆：“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走进了巴金他们住的房间，首先看见一张方桌的两侧，面对面地坐着两个着深灰色布长衫的青年，每人面前放着一本书，……巴金比一年前寄给我的照片，似乎太多了。他圆形的脸庞，红润丰满，顶平额宽，微露头顶，一望而知是个聪明的形象，但谈起话来，口齿却有些迟钝，不仔细听还听不清楚。他的三哥李尧林比他稍高一点，瘦长的脸型，又带上略显灰暗的脸色，似乎有些病态。但说

起话来，声音清亮、流畅，加上一口成都口音，听起来十分入耳。”

由二叔在海关工作的朋友丁桂苓介绍，他们决定搬到可提供食宿可温课迎考的虹口武昌路的景林堂谈道学舍。至此，他们在上海有了一处安心复习功课的住所。

在此期间，按时给大哥等亲人通信，聊解乡愁；同时，也看到了卢剑波在南京创办的《民锋》杂志。卢剑波此时是南京省立一中高三文科班的学生。《民锋》的主旨是介绍世界无政府主义名著，抨击军阀政府。由化名吴清的卢剑波与高三理科校友化名“绿华”的胡迈担任编辑。该刊经费来源由读者自由赞助，主



影响巴金的冰心小诗集《春水》和《繁星》的书影。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要的赞助者是南京私立建业大学的教师卫安仁，字惠林，别号非子；另一位是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的范雄毅。原为不定期刊物，后改为半月刊。《民锋》出了七期，即被军阀齐燮元查禁。

五月三十一日 在第二期《孤吟》上发表《小诗》，署名佩竿，含小诗四首。第一首，写“安静着”的“一株小草”被“一阵风”就“吹动了”，觉其“不幸”；第二首，对被“秋雨”“秋风”“打落在地上”“吹到污泥里”的“桂花”表示“可怜”；第三首，抒发“病了的我”的寂寞情怀；第四首，写“曾高飞天空”的“笼中的鸟”，“嘲笑在空中彷徨的乌鸦”。

六月十五日 在第三期《孤吟》发表《小诗》，署名 P.K.。含小诗三首，其中一、三和《诗四首》中两首相同。第二首，为《小诗——哭侄诗之一》，用想“再听一回”“可爱的小口”叫“四叔”的声音，抒发了对早逝的侄儿庆斯的深切思念。

七月 考取上海南洋中学。他读二年级，李尧林读三年级。他和三哥离开虹口的景林堂谈道学舍搬到斜桥的南洋中学住读。

十月一日 在第九期第十号《妇女杂志》上发表诗歌《一生》、《寂寞》、《黑夜行舟》，均署名佩竿。《一生》通过花儿“未开”、“将开”、“已开”的三个阶段，概括了花的“一生”，抒发了心中淡淡的哀愁和寂寞。《寂寞》为“一株被扎过的梅花在盆子里死了”而惋惜忧郁，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黑夜行舟》抒发了年轻人远离故乡时的彷徨、苦闷，以及对新生活的朦胧憧憬。这几首诗是他离开老家和亲人到上海求学期间思想感情的真实抒发。

十二月 南洋中学的学制长达五年，学费、住宿费又贵，为了减轻继母和大哥的负担，经江疑九介绍，他们决定转学到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补习班。



一九二四年

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结识低两班的张光人即胡风。每晚星群密布的天空，“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学习世界语；作文立誓为“无政府运动继续战斗”。

惊悉婚姻不幸的三姐死于难产，悲痛万分。

二十一岁

一月十三日 腊月初八，带着二叔寄来的二十块钱，与三哥再去嘉兴。在此前二叔根据他们对李家祠堂破败实况的叙述，已寄八十银元，嘱李尧林代其处理修缮事宜，这次是去查验结果。兄弟俩到达塘汇镇，见李家祠堂已大为改观。四周很干净，堂内两块石碑上，用工楷刻书蓉州二伯祖捐资修葺李家祠堂的缘起；砖砌的新供桌上陈列着祭品；神龛前烛光通明，香烟缭绕……三哥代二叔做神主，主持祭祖仪式。兄弟俩又出钱把裴卿典当出去的大门赎回来，让木匠重新安上。

一月二十三日 在嘉兴住了十天，晚五时，和三哥、德良弟“伏处”在小船中离开嘉兴乡下，前往火车站。天黑、夜寒，风声、流水声、摇橹声和人声组合成“奇异的音乐”产生了“复杂”“奇异”的感觉：一是大有“英雄末路”在“荒凉”中“万念俱消”的体验，二是从眼前“与烈风奋斗之一黑暗小船中”联想到去年此时在老家的“温暖”，顿生“人事之不常若是”的感慨。好不容易下了船，结束了“度日如年”的水上之旅；在火车站，又经受了冬雨绵绵的“凄凉”，晚八时，终于坐上了三等车，向南京驶去。

一月二十四日 早晨，他们到南京。接着，在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石城中学租了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一间屋子。每天早起晚睡勤奋学习，晚上他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一张破方桌上读书，他们屋里的灯总比别的房间熄得晚。天还没亮，就听见他们屋里朗读外语的声音了。他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没有朋友。梦境和家信安慰着他们身居异地的乡愁。令巴金难忘的是：“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寂静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记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说话一样。”

一月 在南京作《嘉兴杂忆》，未竟。

二月四日 除夕。这是他们远离故乡和亲人后，过的第一个“年”，回想成都老家过年的热闹景象，兄弟俩倍增思亲之情。在最想家和亲人的时候，他习惯于借助纸笔来倾吐内心的感情。他先后将自己想家想得最多时的伤感记录在《写给母亲的信》和《鸿爪集》中，并把它们当做“作业”寄回成都。后来，从大哥的回信中，获悉大哥读后，流了不少眼泪。

三月 开学了，他们高高兴

兴地进校读书，认识了新同学。他原来对数学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汪老师的数学确实教得很好，他改变了对数学的看法。他对世界语的自学持之以恒，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课本均从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借助于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英语小词典》，先后通读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编的《基本文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卜利瓦特的《柴门霍夫传》等世界语著作。

五月一日

在广州无政府主义团体“真社”所创办的刊物《春雷》第三期上发表诗歌《悼橘宗一》、《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和译文《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以及《蒂甘启示》、《大杉荣著作年表》等。均署名蒂甘。

《悼橘宗一》是巴金取材于重大政治事件、直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早期诗作。橘宗一系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之甥，一九一七年生于美国，一九二三年与大杉荣同时被捕和被害，年仅七岁。诗中称七岁的日本孩子橘宗一为“小兄弟”、“光明的先驱者”，通过他被惨遭杀害，控诉了“恶魔”的“罪恶”，并主张复仇：“要使饮你的血的毒剑转去喝一切恶魔的血呵！”

《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之灵》是对大杉荣的颂歌，称大杉荣为“伟大的殉道者”，他虽然牺牲了，但他“血染透的旗子是永久在我们手中的”，他的“生命却永远不朽，永远指挥着东亚的劳动者向着光明自由的路上走”。大杉荣 一八八五—一九二三 是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被宪兵绞死后抛尸井中。

《蒂甘启示》是一份广泛征求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启示”，旨在对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全文如下：“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籍，同志们若有此类书籍（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

《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揭露和谴责“日本政府和军阀的强权者”是迫害日本、中国、高丽无政府主义者的元凶，号召“世界上的同志们，永久不要忘记日本政府这种残酷的蛮行”，立誓“将为着谋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继续战斗”。

《大杉荣著作年表》介绍大杉荣著作《克鲁泡特金研究》、《自由的先驱》等及其译述《男女关系之进化》等。

《民钟》杂志封面。



大杉荣 一八八
五~一九二三。



八月一日 在《民钟》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大杉荣年谱》，署名芾甘。本年谱系巴金参考日本《劳働运动大杉追悼号》上刊载的《大杉荣略传》和《Biografo de Sakae Osugi》写成。

九月

巴金与三哥李尧林一起升入东南大学附中高三。

结识刚入学的新生张光人即胡风。“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

与神交已久的卢剑波第一次见面。此后常在南京北门桥兴高栈、鼓楼吃茶，议论时政，交流国内和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信息。

从刊登在《民钟》上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左派与最高限度派驻外代表司太恩堡君信中知道，俄国民粹党人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的近况，颇为感动：“每想起那个在冰天雪地中度着放逐生活的伟大的女革命家，读到我们这个‘谜之国’的《妇女杂志》上关于她的文章而感到慰安时的心情，我底心也受了大的感动，我觉得我底心更是强健起来了，那么我怎么能不写点东西而献给她

以表示我的感激呢？”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因反对苏维埃政府缔结布列斯特条约及农民政策，又卷入了一起暗杀活动及暴动事件，被苏维埃非常委员会逮捕。高德曼访问过她，并在国际无政府组织中掀起了援俄在狱党人运动。巴金参考高德曼《摧残革命的暴力》、《俄国革命之失败》等文章，为《民钟》撰稿。

十一月

陆续得大哥信和照片，看到老家由于成都城里修马路而进行门面翻修，“翻修的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三姐死于难产的消息，如五雷轰顶，把他和三哥惊呆了。他们捧着大哥的来信，不忍卒读。然而大哥信中哀婉的言辞，把三姐临终之凄凉形象地展示在他们眼前：“时已十时半，医院已闭门，母与兄不时为尧彩调药，正十一时，服药甫毕，声息即无，虚脱而死，呜呼痛哉！当即命人到陈府报信，料理衣物，又命人为尧彩净身移正，诸事略备，痛哭不已。此夜大家守至天明，泪眼相对，回视尧彩瘦不盈握，伤心惨目未有如今夜之甚者。……二时入棺，二时半大殓，三时出院，三时半抬至东门外普慈寺暂寄。陈府事事推诿，对尧彩后事极为冷淡，兄当时气极矣！伤心极矣……”此时此刻，三姐温顺亲切的面庞、母亲死后她对弟妹的悉心呵护、出嫁时的哀怨和叹息，历历在目……谁能想到，离开老家前和三姐的话别，竟是同胞手足的永诀！一个善良的、年轻美丽的生命又悲惨地消失了，悲伤和愤恨煎熬着他的心。他们又从六叔的来信中获悉，六叔为三姐鸣不平，给陈家送了一副挽联：“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夜深了，他仰望着天上的点点繁星，默默地把对三姐的爱和怀念深埋在心里。



高德曼“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我底青年的生命可以牺牲，我底血可以再一次地流到南京路上，然而正义终于是要争回来的。活着给别人做枪靶子这样的命运，我是要反抗的。”

读鲁迅的《呐喊》等作品，云鲁迅是“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

已能熟练驾驭英语、世界语，努力学习日语、法语、俄语等。

身患肺病。

二十二岁

一月一日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杂文《“欠夹”——布尔雪维克的利刃》，署名芾甘。这是巴金早期的政治论文。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译作《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作者为美高德曼，署芾甘译。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 译者附言》，署名译者。说明该文是从“高德曼女士的《俄国革命之失败》中译出来的”，不是“直译”，有时“加减了一两句”，“意义却一点儿也没有改过”。

巴金从报上获悉高德曼将访华的



被青年巴金常称为“精神上的母亲”的爱玛·高德曼。



消息，非常兴奋。他的朋友秦抱朴在莫斯科时，认识高德曼。经秦抱朴介绍，他和高德曼开始通信。他对这位“为了信仰而坐过牢，希望革命建立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甚为崇拜，称她是自己“精神上的母亲”。信中还向她叙述了自己出生在封建旧家庭的苦恼，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追求和信仰。后来，高德曼访华计划未付诸实现，但巴金却收到了她的回信，得到她的鼓励：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出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我们并不能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得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了一些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巴金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信后，异常兴奋，说高德曼“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



柏克曼。

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为高德曼的恋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柏克曼写传。柏克曼曾经暗杀美国的一个大资本家，失败后被捕入狱长达十四年之久。他的生平和事迹让巴金十分感动，于是，他应山西早期留日学生景梅九即景定成之约，为景在北京主办的《国风日报》撰写《柏克曼传记》等一系列文章。

他的写作进行得很顺利，但高中化学考试得了三十分，是全班最后一名。

二月十八日 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开始连载《柏克曼传记》，署名极乐。

二月二十日 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发表文章，署名蒂甘。认为无政府主义才是民众的希望。

二月二十四日 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发表《克龙士达脱暴动记实》，署名蒂甘。叙述克龙士达脱暴动的原因、经过和意义，称赞“暴动的伟大价值”，在于“显示民众的巨大觉醒和力量”，“它是永存的”。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逝世。巴金参加了青年学生们的悼念活动，不久，在校园墙报上看到了胡风发表的长诗《死去的太阳》，听到胡风在纪念会上充满感情的朗诵。胡风及其长诗《死去的太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二十九日 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发表《日本劳动运动社同志的来信》，署名极乐。

四月七日 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与暴行——无政府主义者暴行的心理》，署名蒂甘。认为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不同，一般不主张暴行，但提倡“牺牲精神”。

五月三十一日 得知上海发生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遭英国巡捕屠杀的五卅惨案，与三哥义愤填膺：“我底青年的生命可以牺牲，我底血可以再一次地流到南京路上，然而正义终于是要争回来的。活着给别人做枪靶子这样的命运，我是要反抗的。”

六月



蒲鲁东。

参加南京学界声援五卅的救国运动，虽然不是活跃分子，但是张光人在国民外交后援会常委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就以张光人为模特儿，创作了方国亮的形象。

散会后和学生们乘火车到下

关，深入罢工斗争濒于失败的和记工厂，亲眼目睹了女工宁死也不愿复工的情景。于是“在无穷的绝望中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悔”：学生“只是演讲，发宣言，拍通电，作文章”，而工人却在“受苦”。

和三哥李尧林阅读、讨论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巴金一面读，一面洒下了激动的泪水：“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底幼稚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形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在我们底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叫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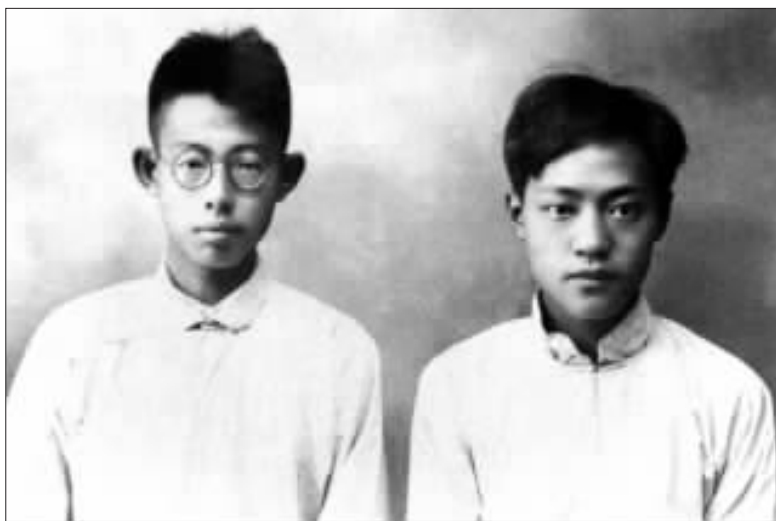
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也就是后来巴金着手翻译的《何

谓财产？》，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曾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七月一日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节译《俄罗斯的悲剧》，这是柏克曼对苏联现存政权进行攻击的长文。并同时发表《俄罗斯的悲剧 译后记》，署名芾甘。

虽然这一阶段忙于写作和翻译，又生病，但是在开考前夜，化学成绩终于打了翻身仗，



巴金 右 和三哥李尧林 左 合影。



得了一百分！

暑假，和三哥同时毕业于东南大学附中后，两人各奔前程，青年巴金北上报考北京大学。出川后，一直相依为伴的两兄弟在浦口火车站分手。他以后就开始了独来独往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决定。”

八月初

到北京后，经朝鲜族朋友沈茹秋（沈龙海）介绍，住在北河沿的同兴公寓。沈茹秋此时接替周索非任《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的编辑。在沈茹秋的介绍下，结识了朝鲜青年柳絮，并在漪澜堂见面畅谈。柳絮比他大一岁，是朝阳大学经济系的高年级

学生，曾为翻译《狂人日记》访问过鲁迅。与朝鲜黑帜团有联系，并写过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谁知在检查体格时，医生摇摇头，似乎说巴金的肺不好。这对他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并未接到不能参加高考的通知，但是他担心不会被录取，于是放弃了报考北京大学的机会。

在同兴公寓暂住期间，心情不好，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朝夕相处、陪伴他的就是一本鲁迅的《呐喊》。《呐喊》给了他消除苦闷的精神力量，他第一次感到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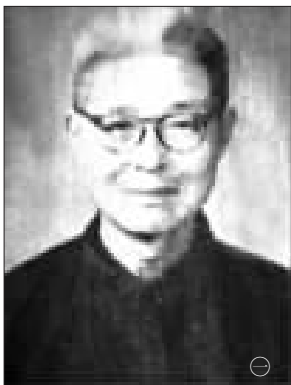
艺术的冲击力，在《忆鲁迅先生》中，他认为鲁迅是“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鲁迅成了他“暗暗崇拜着的一个老人”，以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

八月十至十二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署名芾甘。文中介绍了英劳工代表约翰·杜尔纳的报告，还介绍了约翰参观克鲁泡特金博物馆时看到的盛大纪念活动的情景。

半个月后，他从北京返回南京，与考取苏州东吴大学的三哥李尧林见面。三哥见到他很高

- ① 巴金的朝鲜友人柳絮 一九四〇~一九八〇 遗像。
- ② 一九二二年的鲁迅。
- ③ 鲁迅《呐喊》初版书影。



兴，没有责备，反而安慰他，并陪他去找一位同乡的医生看病，确诊有肺病，但是不厉害。为了让巴金散散心，三哥和他在南京游了鸡鸣寺、清凉山。两天后，巴金坐火车到上海养病，兄弟俩又分开了。

他到上海后，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即今黄陂南路一四九弄与卫惠林、毛一波住二楼，卢剑波和夫人邓天裔住底楼。不久，迁往康悌路康益里即今建国东路四号二楼。他此时心情苦闷、孤独，也许“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于是，我不能忍受下去了，便重新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劳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人受苦”。

在上海养病期间，多次去找华光医院院长邓梦先看病和交谈。邓梦先于一九一一年作为同盟会会员东渡日本，在千叶医科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回上海，在霞飞路和李梅路相交的地方开了华光医院。邓梦先与郑佩刚、王亚樵等担任了“AF”秘密同盟的组织领导工作，并接待过景梅九、大杉荣、石川三四郎等中外著名无政府主义者。

这时他受卫惠林的影响比较多。卫惠林，山西人，是日本早

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认识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并参加劳工运动，五卅运动爆发后，放弃学业，专程回国致力于爱国运动，和毛一波、卢剑波等在上海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曾创办了《正义日报》。当时，沈仲九办的《自由人》停刊，卫惠林和巴金联合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北京《实社》的一部分骨干共同创办了《民众》半月刊，该刊是国内特别是当时南方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联络的纽带，发表阐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论文，报道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动向，其影响仅次于《民钟》。《民众》半月刊的发起人除卫惠林和芾甘外，还有《民钟》的主编黎健民、《自由人》杂志主编沈仲九、笔名“AA”的《微明》半月刊主编周索非以及出版《爱波》的毛一波、卢剑波、秦抱朴等。公开发起创办《民众》半月刊，并在《民钟》上发表《出版 民众 半月刊宣言》：提倡“民众自己的利益，需民众自己去谋”，“要把为资产阶级所独占的学术取回后交与民众全体”。

九月十五日 从《民钟》第一卷第十三期起连载译作《财产是什么？》，这是蒲鲁东的理论著作，署名芾甘译。在同一期《民钟》上发表《芝加哥的惨剧》，署名芾甘。

十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评陈启修教授之 劳农俄国之实地考察》，署名李芾甘。

十二月四日

大量阅读并参照高德曼、柏克曼的论著以及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为《时事新报·学灯》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对“无产阶级专政”发表评说。

为《民钟》撰写《东京的殉道者》。叙述了日本政府杀害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和他们七岁的侄儿，以及由此引起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抗和复仇的经过。认为：“所谓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形式（至少含有反抗、考究、批评、革新四种）的人。他热烈地爱着自由，有敏锐的求知心和好奇心，并且他还应该具有对于他人热烈的爱情和正义的态度，他并应该渲染着宣传的热诚，和浓厚的道德感情。……举止的庄严，生活的朴素，整齐和刻苦，尤其应有一个无比的勇气。……他们相信他们的殉道是可以拯救人类的。”

十二月二十九至三十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列宁论》，署名李芾甘。该文主要参考高德曼《列宁论》的观点和材料，针对《赤心评论》发表的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文章中，对称列宁是“无产阶级救星”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一九二五年内 这一年，身患肺病的巴金，生活极其艰苦，“一度曾靠两个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然而，他对“主义”的热忱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常常和毛一波冒雨去印刷所取书报和《民众》。他虽然高中毕业，因病没有参加高考，不能入学深造，但是他学习外语的热情很高，除了熟练地驾驭英语、背诵世界语本的《茵梦湖》外，还努力掌握日语、法语和俄语。他参阅木幸德秋水的日译本着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据世界语译本用英文本对照翻译阿利兹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之战略》，与法国巴黎《新世纪》杂志的负责人约翰·格拉佛通信。另外，他还同意在法国悉尼的吴养浩的倡议，在《民钟》上呼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收集各种旧邮票寄赠格拉佛，供他出售后积累办刊资金。



一九二六年

“我是一个愿献身于克鲁泡特金主义，终身为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奋斗的人。”

“我自己早在心灵中筑起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立下誓愿：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

二十三岁

一月十七日 在《国闻周报》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介绍》；在《上海黄庞四周年纪念大会特刊》上发表《黄庞死后的第四年》，这是为四年前被军阀残害的长沙工人、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和庞人铨写的杂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把黄、庞的殉难日规定为劳工纪念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高德曼《彼得格勒之五一节》的译作。

一月十九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文章，署名李芾甘。指出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主义之一种”的观点是郭沫若“自己建立起来的”；希望“郭君以后多做诗，少谈主义”，“以免闹笑话”。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四期上发表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古田大次郎《狱中绝笔》的译作，这是他和卫惠林共同翻译的，署非子。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四期上发表若克尔《近代劳动运动中的议会活动观》的译作，这是根据《自由报》第四二二期的英译文重译的，署芾甘译。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四期上发表译作《科学的无政府主义》。



古田大次郎。



二月上旬

到苏州东吴大学探望放寒假的三哥李尧林并一起过年，和三哥无话不谈，讲述为了寻求真理，准备去法国留学的打算。为什么去法国呢？这是因为：“法国较其他国家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其次是费用较低。但最主要的是法国是许多被放逐者的庇护所，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来到法国生活。”李尧林听后，望着弟弟，默默无语。这可不比当年兄弟俩相依相随出川之行，这毕竟是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弟弟身体单薄，经受得了吗？他凝视着弟弟充满激情的年轻面庞和闪烁着智慧、毅力的眼神，顿时明白，弟弟已经在独来独往的生活磨练中成熟起来，一经决定的事很难更改了。他既不反对，也不鼓励，兄弟俩默默地对望着，理解的暖流在心中涌动。

几天后，兄弟俩友爱地分手了。李尧林把离开成都老家时大哥给他的怀表塞在弟弟手中。表上传递出三哥的体温，手足深情驱散了隆冬的严寒，温暖着他的心。

回到上海后，与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好友卢剑波等见面。获悉章锡琛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脱离《妇女杂志》，打算创办《新女性》月刊。章锡琛的这段反封建的个人奋斗的光荣历史使他和卢剑波十分感动，并表示撰稿支持《新女性》月刊。卢剑波先翻译了高德曼的《俄国革命之妇女》，准备交给《新女性》发表。巴金“觉得异常高兴。我希望此篇能引起国人注意，使他们抛弃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来援救那些在困苦中的俄国女同胞”。看完卢剑波

的译稿后，发现高德曼的文章是在一年前写的，不免有遗漏之处。于是收集最新材料，准备把《俄国革命之妇女》中人物的最近的消息补译出来。

为《洪水》半月刊作《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署名芾甘，赞美主人公们“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爱人类，爱自由”、“刻苦”、“朴素”、“具有积极地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是“拯救人类的先驱者”。

三月二日 为《新女性》月刊作《俄罗斯革命中的妇女补》，署名李芾甘。

三月十三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地底下的俄罗斯》，署名李芾甘。

三月十九日 日本舰艇袭击大沽港，制造了“大沽口事件”。北京学生集会请愿遭镇压，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消息传来，他和朋友们十分气愤，爱国主义热情和正义感在他心中燃烧。

三月二十三日 为《民国日报·觉悟》作《一封公开信》，署名李芾甘。这是致北京高丽青年社的信。信中对该社出版《高丽青年》周刊，用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压迫，团结民众的做法表示明确的态度：“我是一个愿献身于克鲁泡特金主义，终身为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奋

斗的人，对于你们的运动当然要尽力赞助的了。”高度赞扬牺牲者：“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来为自由、平等、人道而奋斗。他们的人格是何等的伟大，我实在不能不被他们那种精神感动了。”

三月三十日

高德曼在信中要求他把她的著作译成中文贡献给中国的青年。他当然乐意做这件事，因为他自己便是一个受了她的作品感动的青年。他在征得高德曼同意后，用“意译”和“间有增减”的方式，为《新女性》月刊译完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

还写了《译后记》，署名李芾甘。

为《克鲁泡特金纪念专刊——纪念克氏逝世五周年》译完若克尔的《克鲁泡特金学术概要》和《克鲁泡特金学术介绍》。

四月二日 读郭沫若发表在《洪水》第二卷第十四期的《卖淫妇的饶舌》，感到该文使自己“遭了不白之冤”，打算作文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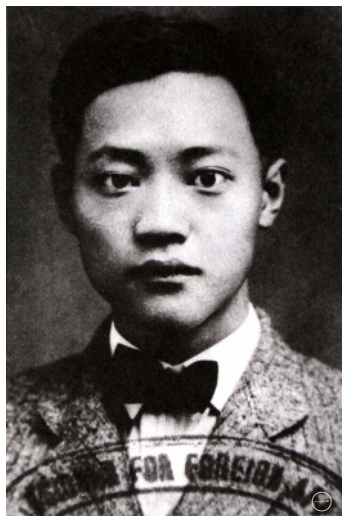
四月三日

给《洪水》主编周全平写信，谈了对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的意见。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近代史上的两次工人革命——巴黎公社与克龙士达脱暴动（上）》，署名李芾甘。认为巴黎公社“虽未做到完全不要政府”却也“带有安那其主义色彩”；“工人是巴黎公社的主动力量”、“巴黎公社是真正的工人革命”；总结了巴黎公社成功的原因“全是靠着民众的热诚”，失败之因有四点，“然而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仍保留着政府的形式……以致使许多的野心家也握得了公社的权力”。文末引用马克思的话：“巴黎公社将永远被人赞颂”，“殉道者将永远存在于



郭沫若。



工人的记忆中”，“历史已经把那些歼灭公社的人钉在刑架上了”。

四月四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第八卷第四册第六号上发表《近代史上的两次工人革命——巴黎公社与克龙士达脱暴动（下）》，署名李芾甘。评述了克龙士达脱暴动的始末、意义和失败原因；认为克龙士达脱暴动是“为着全体劳工群众奋斗的”是“不朽的”。

四月十六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第八卷第四册第十八号上抄译发表格拉罕的《布尔塞维克专政下的俄罗斯文化》，署名李芾甘。

四月下旬

为迎接五一的到来，将旧作《芝加哥的惨剧》编成美洲平社小丛书之一，又受民众社委托，花两个晚上编述五一运动纪念册，并撰写《五一运动史》准备在纪念会上散发。



① 巴金赴法前为办理出国护照拍摄的照片。
②③④ 《芝加哥的惨剧》的封面、《绪言》和插图。

作《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热血”、殉道者的“精神将永远存在”。

用英译本为卫惠林校改《十九世纪道德学说之发达——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之一部分》。

这段时期，去法国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考虑再三，决定向大哥提出要求，要大哥给他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生活费。大哥先是强调经济困难，无法筹款，后又来信，建议推迟两三年。他仍继续写信与大哥商量。

五月一日 前往上海公共体育场，出席五一纪念会，与“民众社”同人，向到会的工人散发《五一运动史》八百册，余二百册，附于《民众》合订本内。

六月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译作《无政府主义之社会学的基础》及《译者按》，署名甘。这是从世界语报《自由工人》中译出的，在《译者按》中说明他并不同意原作者的意见。

在同期《民钟》上还发表《讨论进行的两封信 蒂甘附记》，公开表示反对克鲁泡特金“两虎相斗，应先击最残忍者而毙之”的主张。理由是：德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是几个同样凶狠的虎。两虎相斗的时候，你帮

助一个老虎打败了，弄得精力疲倦，于是那只老虎便很容易的把你吃了”。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上发表《杂感》，署名蒂甘。该文针对太乙的“无政府党人以暗杀有特权者为义务”的观点，提出看法：“刺杀一两个食人者总可减少贫民的痛苦”，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于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进而引证大量暗杀事件的材料，说明恐怖手段造成的种种弊端。这篇杂感发表前不久，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席瓦次巴德在巴黎某咖啡店刺死屠杀犹太人的帕鲁特拉将军，被捕入狱。

八月二十八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署名李蒂甘。

八月

据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版本和人人会同志的中译本以及白性、冰弦、凌霜的中译章节重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面包略取》是日文本的译名。……面包本是人人应该有的，不幸一般平民的面包被人掠夺去了，现在应该略取回来。……

《面包与自由》，这是克氏替俄文译本所改的名称。”这是无政府主义者计划出版的中文《克鲁泡特金全集》的第一部。克氏在书中论述了劳动一体化和个人自

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只要打破现存的社会形式，将所有的财产充公，立刻可以建成一个万人享乐的新社会。该书于十二月一日译完，一九二七年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一九四〇年又易名为《面包与自由》，由平明书店出版。

巴金与一九二五年底从法国返浙江临海、又自临海抵上海的毕修勺（震天）来往甚密，了解了在法国留学的一些朋友们的近况，还获悉毕修勺在南市唐家湾开设“法文专修馆”，不久，向《民钟》主编黎健民建议，由毕修勺在上海接编《民钟》。

十月 在《民众》第十四、第十五期合刊上发表《无政府主义岛的发现》，署名甘；发表《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 附识》，署名蒂。

约十月 在巴黎的《自由劳动者》Libera Labristo 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用世界语写作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

十一月

在《民众》第十六期上发表译文《访克鲁泡特金》，高德曼作，署蒂甘译。

在《民众》第十七期上发表《谈时局》，署名蒂甘。

十二月一日 译完《面包略取》并作《译者序》，署名蒂甘，交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十二月十五日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上发表《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及《小引》，署名芾甘。《小引》中说明，本文原是据《自由工人》上的一篇文章翻译的，但是译到中间，增加了不少的话进去，简直不像原文了。为避“不老实”之嫌和对得起原作者，就将“译”字也不要了。本文称“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理想和观念学，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想”，“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并非和平的，而是武力的，只有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在《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上发表译作《科学与无政府主

义》及《译后记》，署名芾甘。这是据西班牙文和法文转译的著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老将”马拉铁司达的论文。

这一年中，他的精力和时间几乎都花在阅读、撰写、翻译、学习外语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中去了。有时静夜搁笔，发现自己一天天走向孤独了，和家里人差不多断绝了消息，便是和大哥、三哥也很少通信。这段时间，充溢他心中的激情是什么呢？“我自己早在心灵中筑起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立下誓愿：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

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同时，他根据柏克曼的《狱中记》和司特普尼克的《地底的俄罗斯》中提供的材料，又参考无政府主义者金一（金松岑，又名天翻）的《自由血》和无政府主义者无首（韩晨首）的《苏菲亚》等传记，开始写作《断头台上》。

十二月 他与卫惠林过从甚密，向卫惠林学日语，共同捐赠《民钟》印费五元，还多次商量赴法留学事宜。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大哥将变卖田产后巴金应得的两千元中寄八百元到上海。他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办留学手续，买好船票，准备启程。



一九二七年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凡宰特给他的长信中的话激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他时常久久地伫立在卢梭铜像前，“向那个被称为‘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心声；于是在巴黎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把他的“痛苦化成一行行的字”。

“尊敬卢骚，称他为‘老师’，一，我学习他写《忏悔录》讲真话，二，我相信他的说法：人生来是平等的。”

撰文颂扬李大钊视死如归的精神。

二十四岁

一月初 经好友毕修勺热心奔走，终于取得了护照和签证。只见护照上写着“中华民国外交部特发给李尧棠（年龄二十一岁，职业学生，籍贯四川成都）以五五八三号赴法国护照，务盼沿途文武官员遇事妥为照料”。接下来，就是兑换法郎、购船票，准备启程了。

一月十四日 收三哥李尧林苏州来信。希望他“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写得越详越好”，“遇事要虚心请教。……到法国后应当以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应当特别注意……多运动，免得生病”。三哥信中的话，他当时并不完全听得进去，但是，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手足深情让他十分感动。夜深了，窗外清冷的月光，增添了深冬的寒意。明天一早将要启程了，思绪似脱缰野马，纵横驰骋，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像清澈的河水滤过他的心田。他分明感到大哥变卖田产，匆匆地将钱汇到上海，久久地伫立在老家的大门口，向远行的四弟送来由衷的祝福，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和沉郁的情怀，让几根白发过早地出现在头上；他仿佛看到苏州东吴大学的某个窗口，灰黄的灯光在暗夜里闪烁，三哥也许在为他远涉重洋而担心、思索和辗转难眠吧……几颗清泪滴在信纸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上，他提笔疾书：“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见你一面，但是苏州和上海间的距离阻隔了我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我们离得很远。但是我又想到以后我会一天一天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了。你不能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流眼泪。话是说不完的，我们且留着将来再见时谈个痛快吧。沿途我自然会写信给你，告诉你我所见到的一切，使你的心也跟着我游历世界的一部分。”

一月十五日

早晨八点，和卫惠林一起乘车到码头，与前来送行的毕修勺等朋友告别。昂热 Angers 号，是法国邮船公司用德国兵船改装的一只小船。他和卫惠林在三等舱的三〇六舱房内找到了自己的铺位，开始了三十几天的赴法远行。

当昂热号解缆启程时，就意味着他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此时此刻，他心里涌出浓浓的悲哀和离愁；当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兵舰时，他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旧俄时代在西伯利亚监狱里流行的《断头台上》的歌词陡然在心头盘旋，他脱口而出：“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他是如此深切地眷恋着“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伟大的历史”和“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他眷恋着曾经赐予他苦乐的土地

上继续生活着的亲人和朋友，他又眷恋着这片充满了人间悲剧、有着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和用旧礼教杀了他的一些亲人的国土，因为它烙印着他的痛苦和挣扎。

他在心中呼喊：“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不得不爱你。”

在昂热号上，他为了让大哥、三哥的心跟着他游历世界的一部分，“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于是在船停靠西贡期间，上岸买了两本法国学生用的作业本，在上面写下了三十八则游记，真实地记录了他赴法途中和初到巴黎的见闻。游记记叙了香港、西贡、新加坡、哥伦波、意大利、瑞士等的风物和巴金其时的心境：一碧如洗的印度洋、深蓝色的红海、落日余辉中的苏伊士运河和风吼浪啸的地中海、海上日出、夜空明月繁星，听到了安南乐器的凄凉、逃出囚笼又被抓的猴子的哀叫、非洲黑孩子的泪水乞讨……

旅途漫漫，他借助德语词典，拿德文原本和世界语译本对照着读斯托姆的《茵梦湖》，可惜，不慎将世界语译本的《茵梦湖》坠落在印度洋中；在舱里，参考宫崎龙介的日译本《地底之露西亚》（原作者是司特普尼克）、金一的《自由血》和《民

报》上抄来的无首君的《苏菲亚传》，伏在床铺上写出了苏菲亚生涯的轮廓。“这一次我愿把我的幼年时代为她流过的眼泪化为一瓶清澄的墨水，用了她我要画出一生中的一个光荣的女杰的面影来。”

在旅途中写了两封信。一是表达了对两个哥哥的强烈思念：“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这一年来我是一天天地走向孤独了。我和家里的人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消息，便是和你们两个也很少通信。然而我又不能不思念你们。”“无论什么人，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还有一封是写给一位年长的沈姓朋友，谈到了在锡兰岛上的哥伦波瞻仰卧佛时的感想：“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的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便重

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二月十七日

终于，“苦尽甘来”，经过三十四天的漫长之旅，次日上午就可到达法国马赛港了。他的心交织在既激动、快乐又痛苦的矛盾中。他睡不着，只身伫立在甲板上。万顷烟波，皓月一轮，他的心飞到故乡和大哥的身边，他轻轻地吟诵起唐朝著名诗人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白居易《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中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等诗句。

夜深了，读狄更斯的《双城记》不忍释卷，忘不了书中怀才不遇、“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卡尔顿：“就像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了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二月十八日 终于告别了昂热号，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和卫

惠林一起先给巴黎的留法学生吴克刚（即吴养浩，笔名君毅，青年无政府主义者）拍了电报，接着，参加在昂热号上结识的朋友们的告别宴会，大家依依不舍地各奔前程。他感到：“前面有不可思议的未来，后面是三十五天的长途旅程，我的心真难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

二月下旬

抵里昂车站，第一次见到了如约来接站的吴克刚。先住在Blanville街五号旅馆三楼，因旅途劳累，病倒了。虽有吴和卫的照料，但看着窗外茫茫大雪，不禁平添一层愁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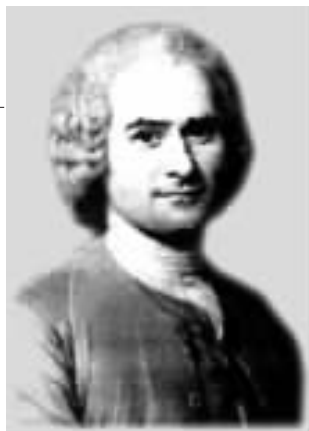
病愈后，搬到Tournefort街的旅馆，即国葬院附近拉丁区（第五区）的一处公寓里，安顿下来

后，他开始在法国文化协会主办的Alliance Francaise夜校补习法文。

月租一百法郎，三个小房间分别住着三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他好静，善思索，不善言辞；卫惠林北人北相，快人快语；吴克刚忙于外务，交游广泛。但是，在处理或者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他们都能独立思考，各抒己见；业余时间，则各自埋头于著译。

初到巴黎的生活是平静的、寂寞的。“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的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

卢骚。



巴金摄于巴黎。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悄悄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我才踉跄地站起来，向着热闹的圣米尔大街的方向走了。”他除了每天照例到卢森堡公园去一两次，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外，就把自己关在六层高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里面，在巴黎圣母院沉重、悲哀的钟声中，默默地整理在昂热号上写的海行杂记和一些初到法国的观感。他将这些为两个哥哥写的散文寄给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的三哥李尧林，又由李尧林转寄给在成都的大哥李尧枚。

和游记同时寄出的，还有他给大哥和三哥的信：“寄上一本我亲笔写成的小书，这是我赴法途中的见闻，这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记录，请你们好好地保存它。”

“我没有给你们多写信，一个人充满手足之情的时候，还有写许多话的必要么？便是一个字一张白纸也可以表示我是怎样地怀念着你们了。”“我知道你们也不会忘记我，但是请寄一点东西来，从你们那里来的一切，我

都是异常宝贵的。”“我虽然知道我们的心不会被那无边的海洋所割断，但是现在我的心确实寂寞得很！冷得很！望你们送点火来罢。”

巴金身处异国他乡，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到达法国后，获悉，正值昂热号载着他漂洋过海时，国内的北伐战争已取得胜利。

三月

在巴黎，他瞻仰过先贤祠，记住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雅克·丹东面对外敌入侵时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身处异国他乡，巴金首先努力追寻的是精神支点。

他和吴克刚、卫惠林参观了蜡人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学者马拉，在一七九三年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建立了雅各宾派政权后，被贵族少女哥代暗杀。这一悲剧场面使他十分感动。回家后，激情不能自抑，翻阅拉马丁和马得楞的书，以及道布生的《四个法国妇人》中论述哥代的章节。“我的愤怒又从心底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我便起了个念头，想草就一篇文章描写这历史上的大悲剧：马拉的死。”但是，在读了米席勒、米涅、克鲁泡特金、阿拉等人的书后，“我的愤怒渐渐消了下去，文章起了几个头，都被我把原稿撕毁

了”。

他在国内读过日译本《地底下的俄罗斯》，现在出重价搜求，终于先后得到了该书的西班牙文、英文、法文译本，“对照着读了几遍，被该书的文笔感动到极点，便起了翻译的念头”。

他除了带着感激的眼泪续写《苏菲亚评传》，还应邀为岳熯的译作作序，并将这本法国米儿波的中译剧本改名为《工女马德兰》。他认为这是“一本充满着希望的书，它的‘英雄’对于革命是有坚定的信仰的。……就艺术方面讲，这本书也是成功的作品。全篇无异乎是一首很长的散文诗，句法短劲有力，修辞也很美丽，还带有极强的扇动力”。

他与卫惠林、吴克刚等关注着国内的动态。上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进入上海，国内政治风云和时局的变化，牵扯着他们的心。在经过反复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后，他们合作撰写《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关系》一书，后来寄回国内《民钟》月刊。他分工撰写第二章，针对“北伐战争不符合无政府主义的原理”的观点，他指出“假如原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不妨修正它。因为我们不是迷信的宗教徒”，认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

者也不反对。”明确表示：“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者等，我们是不反对的。”同时，针对当时种种污蔑北伐战争的论调，作了义正词严的驳斥：“许多万的工人罢工，许多的青年跑到战场上去作战，在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者带着献身的精神去受列刑，去进监狱，要说他们是完全盲目的受少数人的指挥，要说他们是妄想升官发财的人，要说他们是新的军阀的走狗，要说他们是纯正三民主义的信徒，要说他们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工农运动和人民的一边：“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组织农会抵抗地主，工人组织工会以抵抗资本家等等都是好现象，我在上海时看见报上载武汉劳动阶级‘横暴’的情形，通信者的意思是反对这些现象，而我却觉得是很好的。”卫惠林负责撰写第一章，主张投入到北伐革命运动中去，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吴克刚负责撰写文章的第三章，指出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要解决如何实现的实际问题，他主张既可以与国民党保持独立，参与国内的革命运动，使运动转入平民化或无政府主义化，也可以加入国民党，逐渐在国民党内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目标和理想。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四月

由民钟社出版，一九三〇年被国民党以“煽动军队”罪名勒令查禁。

在巴黎他和中国留法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交往比较多，继续和高德曼通信联系。有一次，他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人发起为生活困难的高德曼募捐的活动，他给高德曼寄去一百法郎。不久，高德曼回信并把钱退还给他。他还和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奈特罗通信，就奈特罗著作中关于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有关问题提出商榷。奈特罗在回信中赞扬他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热心”和“兴趣”，解答了他的质疑。他还与法国、美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社会活动家格拉佛和柏克曼见面，关注准备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大会召开时，法国军警包围了会场，除法国代表外，所有与会者被逮捕。

他还结识了为着自由而舍弃了蓝天的意大利亡命者路易居·发布里。在多雨的巴黎，他不仅像发布里那样热爱阳光，即使在微雨的黄昏和夜晚，他的心中依然阳光灿烂，因为他可以走到国葬院前，久久地伫立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让·雅克·卢骚的铜像脚下“向那个被称为‘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一个年轻异



一九二七年春，巴金左与詹剑峰右、桂丹华摄于法国。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邦人的痛苦的胸怀”。在一天几次走过的卢骚铜像前，他渐渐地由对卢骚掏心掏肺的倾诉转入对这位“屹立的巨人”的全神贯注的“阅读”。于是，“从他那里学到”了“讲真话，讲自己的心里话”；于是，“尊敬卢骚，称他为‘老师’，一，我学习他写《忏悔录》讲真话，二，我相信他的说法：人生来是平等的”；

.....

初到巴黎，人地生疏，想念亲人时的孤独；晚上，没有朋友来时的寂寞；关心祖国的命运的热情和焦虑；从报纸上知道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的悲惨的消息后引发的愤懑.....如同火山爆发前的热流，在他胸中奔腾撞击。又如同密布的阴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没有在爆发前沉默，也没有在窒息中走上绝路。他在“老师”卢骚的引领下，“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于是，晚上回到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和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



“萨、凡事件”的当事人
萨珂 右 与凡宰特 左。

恨、悲哀和快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他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借纸笔抒发感情，在练习本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

就这样，巴金在宣泄孤独寂寞、痛苦挣扎的真情实感中，用“讲真话”的方式，创作出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的前四章即《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梦境与现实》、《四年前》、《女人》。

巴金孤独寂寞，痛苦挣扎，感情汹涌奔突——命运之神引导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期间，正如他给大哥李尧

枚的信中所述：“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我的心里又有希望，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强，我觉得经过一次与恶魔的搏斗后，我又复活了。我有创造力，我有生命力！.....我的生活曾是如此的绝望和痛苦，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气给了我，使我仍然抱着坚强的决心继续与环境搏斗，不屈服于敌人之前。”当他获悉家中破产的消息，感到郁闷，但是绝不气馁屈服，为了解脱经济拮据的困境，他决定放弃到夜校补习，改为自学法文。

四月

十二日于《每日新闻》上获悉在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将于七月十日被处以极刑的消息。萨、凡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为抗议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警察局杀害，准备

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后被美国政府逮捕并横遭诬陷，被判处死刑。

不久，援救“萨、凡”事件掀起高潮，法国文学家法郎士、罗曼·罗兰、巴比塞，科学家爱因斯坦、音乐批评家比阿席等均投书、发表宣言、演讲，反对判处萨、凡两人死刑。英、美、德、日、西班牙、瑞士等开展国际声援活动。他在巴黎街头，看到到处张贴着为援救萨、凡而举行的讲演会、抗议会等等的海报。他买到了英文版凡宰特的《一个无产者的生涯底故事》，一口气读完，深受感动。特别是书中的一段话，更激起了他强烈的共鸣：“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凡宰特仿佛讲出了他的心里话，于是，这两个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被诬陷为盗窃杀人犯、判决死刑并在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一下子仿佛成了他的“向导”，他除了投入国际性的援救萨、凡的活动，还“坐下来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向他申诉我的寂寞和痛苦”。信很长，“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全写在信纸上”。“信寄到波士顿，请萨、凡援救委员会转交”。

从报上获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布埃那文士拉·杜鲁底、阿斯加索和何威尔在法国监狱绝食，抗议法国政府同意引渡他们回国。他们曾在一九二六年策划暗杀访法的西班牙国王而被捕。他们的抗议，得到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声援。他和吴克刚、卫惠林等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并将详细情况在《平等》杂志刊发。《平等》的撰稿人主要是他和吴克刚、卫惠林，稿子寄给美国旧金山的华侨朋友钟时，再由美洲华侨郑彼岸编辑后印刷发行。

“萨凡事件”和杜鲁底等人的绝食事件，让他感到：“整个的西方世界几乎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了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到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苦恼着。我不能够说一句话，我的痛苦是言语所不能表现的。”

五月 在巴黎，从报上和从上海赴法的青年学生中获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开杀戒，国内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的严峻局势。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的他，决定“以像克鲁泡特金在俄国革命横被摧残之际著述《人生哲学》时那样的心情，在这中国人大开杀戒之时期中，来拼命地翻译《人生哲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克鲁

泡特金的这部代表作“世界各国都有译本，惟有中国尚付缺如”，所以他决定据英译本并参照法、日、西班牙、德、世界语等诸种译本，又广泛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进入夜以继日的、异常艰苦的译述中，但是精神上却处于异常亢奋的状态。他在给三哥信中，也提及此事：“近来我在拼命地译《人生哲学》，我底全副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自然要这样渡过一个人的青春，也许是可怜的事，然而现在我也找不到更美丽的方法。……这样的工作并不曾使我厌倦，反而它是我的唯一安慰，唯一的快乐；它坚强了我的信仰，鼓舞了我的勇气。”“我便感觉到有了屹立不动的精神，我可以在这个浊流滔滔的大海中做一个坚定的岩石了。”因为放下一切事务，拼命译述此书，连《灭亡》的创作也中断了。

五月底 为《民钟》第二卷第六、第七期合刊作杂感《死囚牢中的六年——萨珂与凡宰特果然会被杀么？》，署名蒂甘。主张“只有总同盟罢工才能够阻止这两重的谋杀，争回我们两个劳工同胞的自由”。

六月

巴金收到国内寄来的《革命周刊》第一期，证实了国共两党分裂、无政府主义运动受挫、国



内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出现分化。吴稚晖、李石曾等进入国民党并公开支持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好友毕修勺放弃了《民钟》，接受了主编《革命周刊》的工作，而该刊由李石曾出资，公开宣传支持国民党清党的观点。“这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就使得我们（与君毅、惠林）决定去信叫上海同志不要发表我们的文章。”但是，《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已于四月由上海民钟社出版。不久，得卢剑波信，对《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他立刻给卢剑波回信，并准备撰写几篇短评，作进一步申述和反驳。

获悉吴克刚和波兰女社会活动家亚丽安娜等三十六位外籍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参加无政府主义党大会，被法国当局下令驱逐出境。不久，吴克刚向他倾诉了与亚丽安娜初恋的欢乐与痛苦，并看到了亚丽安娜给吴克刚的告别信。一对志同道合的异国情侣，即将劳燕分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用法文背诵了左拉《萌芽》中赛威林说的话：“我们不应该相爱，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以此来劝慰吴克刚。吴接受了他的劝告。第二天，他陪同吴到旅馆，向亚丽安娜告别。事后，吴克刚也准备返国。他又陪同吴参观了巴黎圣母院，爬到了钟楼顶上，鸟瞰巴黎全景。当他

想到了亚丽安娜、挚友吴克刚回国后的处境和前途，想到了华沙和中国的白色恐怖，想到了社会运动前进中的艰难险阻，不觉流下泪来。他紧握着吴的手说：“不要失望，我们底理想一定会胜利的！”后来，驱逐的期限延长了，亚丽安娜和吴克刚等几个月后才回国。亚丽安娜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和吴的爱情经历也感动了他。以后，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亚丽安娜》和散文《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七月一日

在《平等》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加索快被释放》，未署名。

当时，与吴克刚等醉心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热衷于善行学说，对于《革命周报》宣传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倾向十分反感。于是致上海《革命周刊》主编毕修勺信，认为毕修勺与李石曾等合作，说明已经“堕落”了，拒绝毕的约稿，表示决不为《革命周刊》写文章，而且断然表示要与毕修勺“绝交”。

七月上旬

收到凡宰特六月九日从美国监狱中寄来的英文信和一包书。信长达四页，称他为“亲爱的同志”，感谢他对“萨凡事件”的声援和对“我们的信仰”的“辩护”；谈到了历史的发展和人类

的将来，指出“‘无政府’的真意义就是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个人、废除人对人的压迫和掠夺等等方法，来消灭这种历史的消极结果”。鼓励他“继续前进吧！为‘无政府’而奋斗”。他几乎是含着热泪把信读完的，此时此刻，理想的翅膀早已飞渡万重关山，冲破高墙阻隔，狱内狱外，把他和凡宰特的心融汇在一起；尽管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要实现理想的过程是如此艰难纷繁，但是，他感到：“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于是，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在几天之内，一口气写出了《灭亡》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就在他收到凡宰特长信的时候，又传来了好消息，美国当局迫于世界舆论，不得不宣布对萨珂和凡宰特缓期一个月执行死刑。

七月十一日 给凡宰特写回信，并寄去照片。

七月十四日 是法国人民纪念捣毁巴斯底监狱的盛大节日，他在巴斯底广场看到法国人民围绕着自由女神像跳舞、狂欢时，“一阵热气温暖了我的心，我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顿时，联想到在“痛苦”和“灾难”中的祖国和人民，想到了甘愿为之牺牲的“信仰”，同时也增强了

“人民终于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七月十九日 获悉杜鲁底等三人因绝食抗议和狱外援救成功而获释，心中充满了光明，立即翻译了他们的“宣言”，及时传递出他们“回到自由的天地”时对援救他们的“朋友们”的“深的感激”。

七月二十五日 在《民钟》第二卷第六、第七期合刊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复太乙同志的一封信》，署名蒂甘。明确表示“我不承认暗杀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有直接关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我却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方法”。当然，他也表示了对已成为历史的日本搞暗杀而被捕的古田大次郎、小说《灰色马》中的社会革命党人佛尼埃等表示崇敬，认为他们是“殉道者”，承认他们“崇高的人格，血和泪结晶的心情”“是人间最优美的”，他们是“世间最优美的人”。

夏季

巴金因旧病复发，遵医嘱要找安静的地方疗养；朋友们也劝他，认为他还年轻，工作和奋斗的日子还长，千万不能因为理

想的热情毁坏了健康。后来，经吴克刚介绍，他离开了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移居巴黎以东一百多公里的马伦河（即马恩河）畔的小镇沙多—吉里（蒂埃里堡）。

小镇有茂密的森林、绿茵茵的草地、和煦宜人的海风和清丽芬芳的鲜花，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生活费也比较低。他相当满意，身心都获得了休养。小镇是法国十七世纪著名诗人拉·封丹的故乡，他经学哲学的朋友詹剑峰介绍，住入以诗人名字命名的拉·封丹中学里。

在拉·封丹中学里，他受到看门人古然夫人和她做花匠的丈夫亲如家人的关照，使他对法国的风土民情和法国人民有更多的了解。他和詹剑峰在节日里总要到附近的花店买花送给校长夫人，校长的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玛丽·波尔和音乐教师，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为他回国后创作异域题材的短篇小说提供了素材。

除了詹剑峰，他还结识了山西籍留学生岳煥、安徽籍留学生巴恩波。其实，他早就和岳煥有过文字之交，曾为岳煥翻译的剧本《工女马德兰》写过序。他们谈文学、谈戏剧。

他除了继续学法文外，大部分时间用来广泛阅读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拉马丁

的《吉隆特党史》、道布生的《四个法国妇人》、马德楞的《法国革命》、米席勒的《大革命史》和布洛斯的《一七八九—一八〇四年的法国革命》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屈不挠地反抗封建专制的英勇气概使他崇敬，他们宣传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令他向往，他们的献身精神更使他感动。

他还到先贤祠瞻仰法国杰出的作家、哲学家伏尔泰，阅读他的哲学经典著作《哲学书简》及哲理小说《老实人》，对他的批判精神和献身精神深为敬佩。

与此同时，他又搜集俄国革命家的材料，开始编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苏菲亚·柏罗夫斯基的生涯》，署名蒂甘。收入《俄罗斯十女杰》。篇首引周作



伏尔泰 一六九四～
一七七八。



人翻译的葛理斯的诗《苏菲亚》，称赞将“沙皇置于死地”的苏菲亚是“照那最黑的暗夜”的“火花”；引用了克鲁泡特金和妃格念尔等对苏菲亚的赞颂，全书叙述苏菲亚深沉的“爱人类”的思想，坚决地抛弃贵族生活而投身社会活动的崇高行止、悲苦的放逐生活和勇敢机智地指挥暗杀沙皇的活动等，由衷地赞她“是一个温柔可亲，而且有一个爱人类的黄金似的心”的女子……又是一个阴谋的天才”，是“我一生最敬爱的人中的一个光荣的女杰”。

他根据资料，在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其他女革命家的事迹的基础上，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以前喜欢读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他的女主人公总是比男主人公强，她们有勇气、有毅力，而他们却能说不能行，没有胆量，没有决心。我常常想不透这是什么缘故。直到我预备写俄国女革命家传记时，我的疑问才得到了解答。对着那么多的事实，我还能有什么疑惑呢？”于是，他激动地“绘出了妃格念尔、沙苏利支、海富曼、布列施柯夫斯加亚、巴尔亭娜这些女人的面影”。

特别是，看到俄国著名民粹派活动家薇拉·妃格念尔（一八五二—一九四二）的回忆录后，被这位贵族女子投身社会活动，

同情人民疾苦，参与俄国虚无党人刺杀沙皇的恐怖活动，后来被捕入狱的英雄事迹感动。薇拉·妃格念尔被沙皇政府诬为“俄国最可怕的妇人”，而更多的人则称她为“俄国革命之贞德”。“她的著作《狱中二十年》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于是，他“发愿”要把薇拉·妃格念尔的书“全部译成中文”。

他借助资料，为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作传，还因两年来没有听到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的

消息，文中流露出对这位“在冰天雪地中度着放逐生活的，有伟大的心的女革命家”的思念，“我常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现在我要拿出这个称呼来呼玛利亚，玛利亚，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哟，如果我底呼声还能够入你底耳里，那么就请来接受我底诚心诚意的祝福！”

这段时间，占据巴金主要精力的还是继续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这两个月来我底全部的精力差不多全耗在这上面，每天一字一字地写，尤其在黄昏及深夜的时候，日间的功课已经不来缠绕我了，我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地做我底



⊖



⊖



⊖

⊖⊖

薇娜·妃格念尔。

⊖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

工作，往往写到十二点以后，学校附近的钟声已叫了二三次了，我才从书中惊了起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好像刻好了的木板似的，很少有变化。”

八月一日

在《平等》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八篇短论。

《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组织问题》，署名壬平。指出“无政府主义……需要严密的组织”，“它是以自由联合的原则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所需求的社会，并不是无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目的在援助劳动阶级，进行革命的事业”。

《空前绝后的妙文》，署名黑浪。批评李石曾的“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所谓“大同革命”、“社会革命”的观点。

《无政府党并不同情于国民党的护党运动》，署名佩竿。痛斥李石曾、吴稚晖投靠国民党所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护党救国”主张。

《迷信军阀的中国“共产党”》，署名亦鸣。

《理想是杀得死的吗？》，署名极乐。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血腥罪行：“单靠刀枪的力量，纵然弄到伏尸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要是理想是杀得死的，那么今天堂哉皇哉做总司令做委员的



⊖ 吴稚晖。
⊖ 被巴金誉为“殉道者”的李大钊。

诸公，这时乃会脱了裤子伏在那拖着猪尾的畜性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高呼谢恩咧！”

《谁前进，谁后退》，署名甘宁。指出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向后倒退。

《反共与反动》，署名黑浪。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是真正共产的原则。这是必定要来的，社会进化的趋势是如此。你们要反对它……哪里是‘反共’，明明是‘反动’。”

《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署名蒂甘。颂扬李大钊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李大钊“以从容的态度，无畏的精神走上了绞台，为主义而死。在法庭上那样慷慨申辩，临死又如此勇敢！

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他是极为钦佩，我确慕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的殉道者”。

《国家主义者在捧蒋介石》，署名赤波。揭露国家主义者以前曾为北洋军阀“大吹大擂”，现在倒向国民党“又向蒋介石送秋波”，是丑恶的两面派。

八月十日 晚，尚未获悉萨、凡获救的消息，遂找出载有萨珂给他六岁女儿信的报纸，为将被判处死刑的萨、凡感到痛苦，一夜难眠。

八月十一日 担心萨、凡已遇害，没有勇气到街上买报。幸亏吴克刚带来了萨、凡被缓期十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二天执行死刑的“喜讯”。

八月十二日 用英文作《致波斯顿“萨凡援救委员会”信》：“你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两个纯洁的同志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多活了几年，你们的能力使得我们这两个清白的同志的无辜得以大白于天下。”

八月中旬 收到凡宰特七月二十三日从狱中寄来的信。信中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确实在不断地进步”，并希望“我过去的经验能够使你的精神更为成熟和坚强。”凡宰特还鼓励他读蒲鲁东的著作。在凡宰特看来，“蒲鲁东是比较接近真理”，虽然当时他并不完全同意凡宰特的话，事后还是因了凡宰特的劝告读了几本蒲氏的著作。

八月二十日 作《黑浪给急弦的信》，署名黑浪。指出国民党是“无望的党”，三民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同时，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由人民自己组织的自由联合的团体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业，这在各国都适合的”；“南京政府也好，汉口政府也好，都是一套鬼把戏”；“我们无政府党在中国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大的势力，那样多的党员”，但坚信“革命之少数未尝不可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平等》杂志。

八月二十四日

收到吴克刚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现在等的是那有罪人的死！我告诉你，不会久候的！”此刻，他已从当天下午巴黎的《每日新闻》上读到“可怕的消息”：萨、凡是在二十三日凌晨一点十六分至二十六分被“使用电椅的酷刑予以杀害的”。他带着悲哀和愤怒回到家，吴克刚已在屋中等他了。吴痛苦，他沉默无语，泪水早已流完了。吴走后，他仍沉浸在愤怒和悲哀中，不停地向朋友们写信报告萨、凡被害的噩耗。

此时此刻，从小就植根他心中的“爱一切人”、“宽恕别人”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感到每天只见着人吃人的悲剧。人能爱人吗？为什么在一

个同样的人的世界中，一边是光明的、热的，而一边却是黑暗的、冷的呢？他的诸多的“先生”们、朋友们，包括他自己，尽管以美丽的梦来安慰人们，然而人们依然是不断地饿死、冻死，被同类摧残而死。对于那些人，“梦”还有什么力量！他们会带着憎恨的记忆死去。痛苦中，他立誓要做一个替他们复仇的人。

正如他在《灭亡》中所写的那样：“我恐怖死，然而憎的力量却胜过了死底恐怖。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却愿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

晚上，卫惠林来，他向卫惠林倾诉了内心的思索和痛苦。他们谈到深夜，彼此获得了力量。卫惠林走后，他重读凡宰特给他



《平等》
“萨、凡”专号之
一页。

的两封信，“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

用英文给美国“到自由之路”社同志写题为《From Chinese Comrade》的信 署名 Li Fei-Kan。信中高度赞扬了萨、凡之死，因为“他们为着信仰而流了生命之血，并且相信着他们的死可以拯救人类”，他们的死“体现出无政府之美”。坚信：“正义永不会死！无政府永不会失败！”鼓励他们：“坚定你们的信仰，勇敢地前进！”

八月下旬

撰写了《萨珂与凡宰特之

死》，记述了萨、凡被害的经过。此文后收入《革命的先驱》。

给爱玛·高德曼写信。“用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语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称高德曼是“我的精神上的母亲”，是“惟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收到美国“到自由之路”社书记泊沙达的回信，获悉美国同志为萨、凡被害感到“痛苦”，表示，为了继承“两个最好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决定继续前进”。

续写《灭亡》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九章。继续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

原和发展》。

九月一日 在《平等》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杂文《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署名黑浪。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实质是“必欲一齐杀尽”“失了抵抗力的工人”。

十月二十八日

为《平等》撰写《一封公开的信——致钟时同志》，署名黑浪。论述了无政府革命的目的是在消灭“主人和奴隶这两个阶级的对立”的“大沟”后，才能“得到全人类的幸福”；认为在无政府的社会中“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就无他们容身的地位”，“构成那社会的惟一分子便是工人”；指出“人道主义这个名词是资产阶级用来杀工人的



最好的托词”，“把无政府主义染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色彩的人，简直是不懂无政府主义”。认为“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是工人”，并自云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化”，才“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在《平等》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五篇文章和三篇译作。

《法律下的大谋杀——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之后》，署名黑浪。愤怒地控诉和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和罪恶；认为萨、凡“死得像殉道者像伟大的英雄”，“只要正义不死，真理不灭，法律是决不会胜利的，无政府是决不会失败的”。

《俄国革命的第十周年》，署名蒂甘。

《不要瞎做劳资妥协的梦》，署名黑浪。

《死者与生者（一）》分别载于第四期和第十一、第十二期，署名佩竿。叙述萨、凡被害后世界各国舆论对美国法律和裁判官的谴责，表示“我们是站在殉道者一边而反对刽子手的”。

《沙哥与凡宰特之死》，署名佩竿。“沙哥”即萨珂。

《萨珂与凡宰特致全体同志的信》（译作），无署名。萨、凡在信中表示对中国同志的感激，希望大家不要“忧愁”、“灰心”和“让步”，坚信敌人“不能消灭真理和正义”。发表

时“萨”误植为繁体字“阴”。

《萨珂给他儿子但丁最后的一封信》（译作），无署名。萨珂鼓励儿子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应该帮助那些正需要人援助的弱者”，坚信敌人能“杀死我们的身体”，却不能“毁灭我们的思想”。

《凡宰特致本社黑浪同志信——殉道者遗书之一》，无署名。

十月下旬 关注巴黎举行的对席瓦次巴德的审判。席瓦次巴德是犹太革命者，一九二六年在巴黎因为为被屠杀的犹太人复仇，刺杀白俄军官彼得留拉而被捕，关了一年多，本月二十六日由于全体犹太人支持，控诉了彼得留拉式匪徒残杀犹太人的罪行，法国当局经调查、审判，最后宣告席瓦次巴德无罪释放。他关注事件的全过程。一九三二年他以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海的梦》。

十一月五日 作《寄 革命周报 编者的信》。云自己“曾反对过《革命周报》的主张”，也许将来还要“攻击”它，但是，对《革命周报》发表文章，“防护”萨珂、凡宰特的生命，“力争他们的自由，证明他们的无罪，辩护他们的信仰”，则表示“感激”；批评了胡适之在“萨凡事件”上的观点，盛赞萨、凡的殉道精神，控诉裁判官

的罪行。

十一月十一日 为对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被绞死的芝加哥四个无政府主义者“菲失儿、恩格尔、伯尔森司、司伯司的纪念”，据大量资料撰写《革命的先驱》一书中的第一篇《无政府主义者殉道者的壮剧》中的第一章《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在第一小节《殉道者的祭坛前》中说：“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渗透着殉道者的热血。……现在已积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海。总有一天，这血海中的波浪会冲上岸来，把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冲倒，洗出一个新鲜的世界！”坚信殉道者的“精神却永远存在。真理是不死的，正义是不灭的……不顾一切地向前猛进，我们是会得着最后的胜利的”。

十一月十八日

译完《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巴尔托罗美·凡宰特的自叙传》，意大利凡宰特作，署蒂甘译。后易名为《一个卖鱼者的生涯》。

译美国辛克拉的《介绍 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称被诬为“无名小卒”的凡宰特为“伟大人物”，颂扬他的“穷人的精神”。

作《译后记》，称萨、凡是“二十世纪中两个最好的人”，表示“我确实以我的全心灵爱他

们”。

旧译著《面包略取》交从法国返沪的好友朱永邦即乐夫承印，由上海江湾自由书店出版。这是由几位同情克鲁泡特金的青年捐款集资创办的书店，乐夫担任经理。

署名蒂甘译的另两部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法国大革命》（上、下集）和《英国之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也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由民钟社出版译作《科学的社会主义》，阿里斯作，署蒂甘译。

十二月二十七日 用英文给波斯顿“萨凡援救委员会”写信，署名佩竿。陈述萨、凡被害后自己的“沉默”和“痛苦”；谴责了那群“渴血的畜牲”的罪行；表示“作为这两个同志的信徒”，“愿尽力”“合作”；既“继续他们所身殉的理想而奋斗”，又“证明他们是无罪的”。

约一九二七年底 意外地获得在美国已绝版的高德曼的《近代戏剧的社会意义》，始译其中的《斯特林堡底三本妇女问题剧》，认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在我是很荣幸的”。

一九二七年内 在《自由工人》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萨珂和凡宰特的短文。



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贯穿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

“巴金”笔名的来龙去脉。

在由法回国的航船上，“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杀害的兄弟姐妹，……为时代的年轻人控诉”。

在一张连抽屉也没有的小书桌上写作，通宵达旦，文章一脱稿，“就沉沉睡去”。

二十五岁

一月二日

为《新女性》月刊译完高德曼对斯特林堡的三个剧本的评介，作《斯特林堡的三个妇女问题剧 译后记》。认为高德曼的剧评对女子虽“过于苛刻”，但她是“最能懂得斯特林堡的人”，称高德曼对近代戏剧研究“渊博而精深”。

为《一般》月刊译高德曼的《易卜生底四大社会剧》，署名李芾甘，并作《译后记》。云和高德曼“共鸣”，一致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攻击的“不仅是国家”，凡是“基础在诈伪上面的一切制度在他看来都是罪恶”。

一月 在《平等》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祖国——穷人的话 之一》，署名李冷。指出“爱国”是资产阶级骗人的话，穷人没有土地，没有主权，“是无祖国的”，应该爱没有“压迫”、“掠夺”的世界，鼓励“全世界的工友们，快来打倒那些资产阶级的祖国”。

二月五日

邮购到英国康·加尔纳特翻译的《往事与随想》，该书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和思想家赫尔岑所作。他一口气读完，心潮激荡：“《往事与随想》

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当时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们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作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了赫尔岑的影响。”

后来，他还在编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中写了《赫尔岑与西欧派》，认为：“赫尔岑底一生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完成了新的一章”，把“自由之精神吹入俄罗斯之平原”；认为赫尔岑“在几十年中”“不断地眷恋地在尸体一般的俄罗斯身体的伤痕上涂满了香膏，一直到他看见它苏生了，而且产生了新生活”。

将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俄罗斯的伟大儿子》、妃格念尔的《克鲁泡特金的一生》、齐可特可夫的《克鲁泡特金与托尔斯泰》、柴果屋斯基的《克鲁泡特金与列宁》等九篇文章编译成《俄国革命党人眼中的克鲁泡特金》，署名蒂甘，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三月

翻译廖·抗夫的小说《薇娜》、斯特普尼亚克的《三十九号》、蒲列鲁克尔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这些“都是描写旧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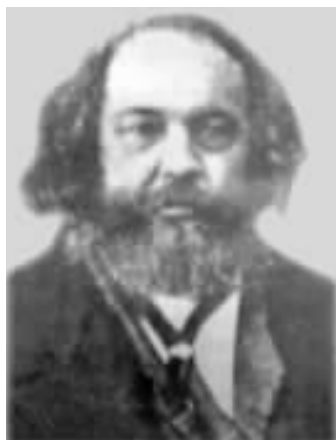
在塞那河畔旧书摊上花两个半法郎，购得日本秋田雨雀《骷髅的跳舞》的世界语译本和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题为《嫉妒》的《怎么办》的法文译本，打算把《怎么办》译出，和前面的几篇译作编在一起，印一本书。

在《平等》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四篇著译文章。

作短论《工人的实力》，署名鸣希。指出“无产阶级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实力”，它“不只是铲平这不平的地狱”，“还要造成理想的新社会”。

作短论《法律——穷人的话之二》，署名李冷。指出“鲜血淋漓”的法律是“吃人魔王”，是一切“不平之事”的“主持者”，“立誓要做一个法律的大仇敌”。

四月三日 针对吕干和梅梅在《民锋》上发表的批评他和《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观点》，以及去年八月在《平等》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组文章后遭受的攻击，被诬为“机会主义者”、“野心勃勃”、“背叛无政府主义”等，为《平等》撰写《答诬我者书》，署名蒂甘。对“诬陷”表示“愤怒”；声明“我与一切的政党都没有发生过关系”，“行为”“光明磊落”；声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文章》一文是在“我们自己主张不发表此文之后而不通知我们，



巴枯宁 一八一四—
一八七六 像。

居然就私自印成小册子，这种举动无非是想利用我们的文章来图私利罢了。我借此机会宣言我反对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认为“美丽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就是我的惟一光明”、“是我的生命”；承认“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

四月十二日 译完《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上编，并作《译者序》，署名蒂甘。认为这一译本的出版可以“还原克氏学说”，为愿意献身事业“而又找不到适当道路的人”“开辟一条新道路”。

四月

译完《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的俄文本序、英译本序、世界语译本序、西班牙文译本序、法文译本序。



作献词，署名蒂甘。云：
“译者以一颗热诚的心将本书献给一个工人同志，一个克鲁泡特金的真正信从者，一个相信着人类之较好的将来不断地为真理与正义而奋斗的人：钟时。”

作《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 例言》，署名蒂甘。说明本书是根据英、法、日、世界语、西班牙语五种译本重译，并“加了几十条注释”，意识到翻译的“责任重大”，因此力求“忠实地解释我们底大师底思想”，使译本“成为全世界上更完备的版本”。

看《小巴黎人》报，获悉法国南部某滨海城市，有一男子为救落水小狗而跳下海，因不会游泳，眼看要沉下去。岸边一个不相识的英国女郎奋不顾身地跳下海去救男子和狗。结果悲剧产生了，这一男一女和狗都被淹死了。“这一段消息使我很感动，回到自己房间里翻开《人生哲学》一面自语道：‘如果克鲁泡特金读到这消息的话，他恐怕会流泪呵！’”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底心上了，我每一次读到克氏的《人生哲学》总要联想到那件事，一想到那件事，我对于克氏底道德学说就更有强固的信仰”。

五月二十日 为《平等》第十三期撰写《怎样做法（讨论之一节）》，署名黑浪。对无政府

主义的相关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认为在革命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但是，这组织“不是集权的组织，而是以自由联合的原则为基础的组织”，“社员”不是“领袖人物”的“盲目的工具”；二，指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两条道路”——是仿照法国、欧洲各国以及俄国的大革命，“由自发的民众暴动开始”“向旧制度进攻”，或者进行“总同盟罢工”，“由工人与资本家不息的斗争中”，壮大“工人组织的力量”。

五月二十七日

译完俄国蒲列·鲁克尔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署名蒂甘。

在《译后记》中说明“很爱

这篇东西”，它“可以被视为一篇简短的虚无党运动史”。

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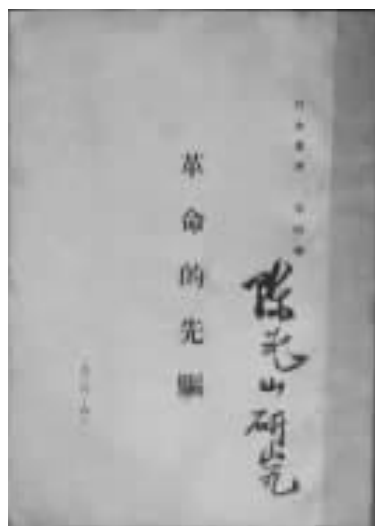
在《平等》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四篇文章和一篇译作，均署名蒂甘：《答诬我者书》；《感谢国民党人铮铮君代登广告》，认为国民党驻古巴总支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财务部长顾铮铮，在该支部的机关报《正义特刊》上提到无政府主义者信爱著的《我的国民党观》，使“国民党人”“受其影响”而“倾向无政府主义”，这是为宣传无政府主义“代登广告”，表示感谢；《左派国民党在哪里？》，驳斥顾铮铮以“国民党左派”自诩的论点，云“你们口口声声拥护总理的三大政策，总理夫人的宣言”，“又拥护那位‘反共’的



一九二八年春季巴金留影。

‘汪精卫先生’。你们到底是‘孙夫人’的信徒呢，还是‘汪先生’的信徒”；《勿为我们杞忧》，声称无政府主义将“随时进化日趋完善”，无政府主义者是“自由”、“有思想”、“有判断力”的人，正告顾铮铮等人“勿为我们杞忧”，至于无政府主义党执政后，会比国民党更“不良”的观点是“幼稚”得出人“意料之外”的；译作《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克鲁泡特金著，署黑浪译，至第十二期载完。《译后记》中说“本篇原稿为法文，但印成小册子的只有德文本一种。我是根据世界语和日文两种译本重译的”。

参与编译并出版《革命的先驱》，由自由书店出版。事后获悉，本月上海的自由书店被冠以发行革命刊物、“宣传共产主义”遭查封，毕修勺、黄子方及



《革命的先驱》的封面和版权页。

工人黄丕德、龚柄生被捕，几天后交保释放。

六月二十四日 本日正值薇拉·妃格念尔七十六岁寿辰，作《薇拉·妃格念尔》，署名李芾甘。“我愿把这一章献给她作生日礼物，……诚心诚意地祝她：‘福寿康宁。’”《薇拉·妃格

念尔》记叙薇拉·妃格念尔的生平和社会活动。

发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署名芾甘。

在巴黎《每日新闻》上看到一篇杂感，“讲一个十九岁的安南青年自杀的事……我的一个姓巴的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被压迫者的悲哀压倒了我。经过了短时间的痛苦生活之后，我的激情渐渐地消退了，但是悲哀的痕迹却永远留在心上。我想写点东西来申诉我的以及与我同为‘被压迫者’的人的悲哀，我决定用我所经历的五卅事件为主题。”这就是他回国两年后才动笔创作的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的原创构思。

六月 在《平等》第十一期上发表：《死者与生者（二）》，署名佩竿；《工人，



《狱中二十年》的作者薇娜·妃格念尔。



组织起来》，署名鸣希；译作《巴黎公社与克龙士达脱暴动纪念日》（柏克曼作），署壬平译。

七月八日 致大哥信，并寄近照一张。告知写小说《灭亡》等情况。

七月

在《平等》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呢？——给CA同志的一封信》，署名黑浪。认为“在这时代底前进中愈看出我所认识的真理是不错的”；“如果我能死一百次，又复活一百次，我仍要走现在所走的道路，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不得不靠刀剑的力量”，要“为人民解放这一伟大理想而奋斗”。

获悉挚友索非以AA笔名主编的《开明》半月刊创刊、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民团训练所在福建泉州成立。

八月

收到大哥来信，大哥仍希望他早日学成归国，“扬名显亲”、“光宗耀祖”。他感到与大哥在思想上有严重分歧，决定续写完《灭亡》，把这本书呈献给大哥。“如果他读完之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吧，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

足，十分满足了！”

《灭亡》是在比较宽舒的环境和心境中完成的，每天早晨巴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完全沉浸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脑底里却出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的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种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下来。”

《灭亡》的第一位忠实的读者是詹剑峰。《灭亡》中流露出来的文学创作才能让詹剑峰为之欣赏，作品中袁润身的爱情故事，让詹剑峰感到亲切和熟识，因为它取材于他们共同的朋友桂丹华的恋爱经历。当然，詹剑峰对《灭亡》的某些文字或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和不同的看法。

《灭亡》终于在沙多—吉里这美丽、恬静的小镇完成了，他是“流着眼泪来写这本书的”。虽然其中的人和事都是作者的艺术创造，然而“贯穿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灭亡》写完后，他的心仍然沉浸在痛苦中：“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憎恨我自己。”

作《灭亡序》。称凡宰特为“先生”，“先生……教我

爱，教我宽恕”，“哥哥……爱我，我也爱他”，但是“为了爱我底哥哥”，“爱我底‘先生’，我不得不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说明是为哥哥“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

最后，他在沙多—吉里的格南书店购到十本硬面抄练习本，把《灭亡》誊清。

《灭亡》是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计二十二章。作品以一九二五年孙传芳在上海的黑暗统治为背景，愤怒谴责了段祺瑞、孙传芳、吴佩孚军阀统治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对革命青年的屠杀，描绘了为砸烂旧社会、创建新世界而勇于献身的一群革命青年的形象，如激进的、抑郁型的、病态的杜大心，抱着赎罪心情接近革命并逐渐成长的李冷和李静淑兄妹，宁死不屈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张为群，等等。

《灭亡》作者善于展示人物的灵魂，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富有激情的语言和动人的场面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灭亡》写成了，该署名了。他署上了“巴金”二字。自此，他诸多的笔名渐渐淡出，而“巴金”带着他的长达六七十年的、上千万字的著作和翻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长廊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为什么取“巴金”为笔名？



○ 创作《灭亡》时的巴金。
○ 对青年巴金影响颇大的克鲁泡特金著《面包略取》。

几十年来文坛有不少强加于人的、随心所欲的臆测和解释。还是让巴金自己告诉我们吧：“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到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为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一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这本书的英译本还在我的书

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就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巴金说的“姓巴的北方同学”即巴恩波，“安徽朋友”即詹剑峰。

“巴金”笔名的由来有了第一手资料和最可靠的解释。“巴金”这一笔名是一九二八年八月写完《灭亡》后第一次启用，署在稿子上的。但是“巴金”的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文坛、第一次面世并不是和《灭亡》在一起，而是在《灭亡》连载之前，“巴金”是和他的译作脱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第一次出现在同年十月十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号上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巴金在《我与开明》的回忆录中也作了第一手最可靠的诠

释，“巴金”是和他的译作脱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第一次公开出现。

《灭亡》寄走后，他离开了沙多—吉里，回到巴黎。在巴黎他第一次与胡愈之见面，以后的两个月中，常常到胡愈之处去。从胡愈之口中好几次听到他对沈从文的赞许，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写得很好。“愈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脱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这几天法国各报为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大做文章大出特号；……我近来恰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脱洛茨基的文章，觉得有些地方‘实扰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看看托尔斯泰是否‘污卑的说人’”。译稿完成后，“忽然想起那个新的笔名，不加考虑就写在译稿上面”。因该文发表时间比《灭亡》公开问世早了近三个月，所以该文成了巴金所有著译中第一次公开以“巴金”笔名面世的文章。

巴金将誊清在五本硬面抄上的《灭亡》原稿，寄给上海开明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书店门市部经理周索非。尽管《灭亡》得到詹剑峰等朋友的赞扬和欣赏，但是巴金当时还缺乏自信，不敢投稿，只是委托挚友索非为他自费代印几百册。《灭亡》直至一九二九年才得以在《小说月报》第一至第四期连载，一九二九年十月开明书店初版印行。

九月

隔了一段时间，他收到索非从上海寄来的开明书店版《薇娜》。这是经索非手，将巴金的译作《薇娜》和李石曾的译作《夜未央》合编而成，原作者均是波兰作家廖·抗夫。

将法文本《夜未央》和李石曾的中译本“对照读了一遍，发现那里面有不少删节的地方，觉得不满意”，遂动笔“翻译了全本《夜未央》……译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可惜，译稿在寄往上海的索非时，被邮局弄丢了。

《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上编）》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正文前第一页为克鲁泡特金像，照片背面是给钟时的题词。含五种译本序和克鲁泡特金的正文七章。

在《平等》第十三期上发表《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署名黑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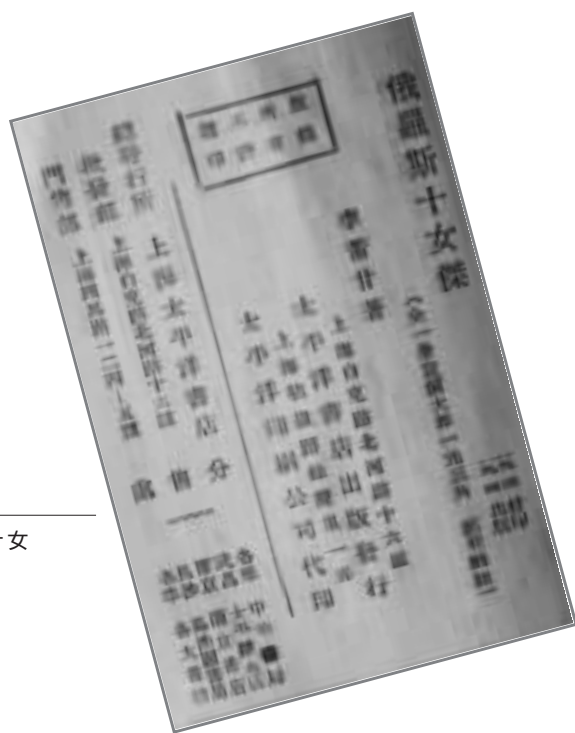
在离开沙多—吉里前，巴金借助资料，在无数的俄国女革命

党人中选出了十个代表人物，撰写《俄罗斯十女杰》。扉页有题词：“都格纳夫读了青年女革命家苏菲·包婷娜底法庭演说后，把头俯在报纸上面，深深地吻那报纸。”

之所以要写《俄罗斯十女杰》，是因为他觉得她们是“一种典型”，即抛弃个人的财富、爵位、家庭甚至生命，牺牲一己来救济人民的典型，她们的力量来自信仰；他认为自己并非“不是一个‘英雄崇拜者’”，“之所以替这十个女杰作传，并不是……在无数的俄国女革命党人中，只有这十个人才是不朽的，……反之，我却以为那无数无名的死于

贫困，死于监狱，死于流放地，死于非命的女儿与这十个人在革命史上是同样不朽的，我写这十个人，是拿她们来做一种（或可说十种）典型，从这十个人的生涯与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底无数姐妹底面影来，我敬爱这十个‘女杰’，我也同样敬爱那无数无名的‘女杰’”。

巴金的写作是痛苦的，《俄罗斯十女杰》是他“两个月来的心血和眼泪的结晶”。他在给大哥的回信中表达了当时的心情：目前“所足以维系我心的只有工作。终日工作，终年工作。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满足。……几年来我追求光明，追



《俄罗斯十女杰》的版权页。

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结果我依旧得到痛苦，但是我不后悔，我还以更大底勇气走我的路”。

巴金的创作情感是投入的，“我的心里筑了一道墙，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一壶茶，一瓶墨水，一管钢笔，一卷稿子，几本书……我常常写了几页，无端的忧愁便来侵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膛里激荡，我再也忍不下去，就掷了笔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俄罗斯十女杰》含十人传记。

《薇娜·沙苏丽奇》，叙述她因暗杀行动而震惊世界，曾“使得全欧洲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忘掉了一切”，“在她看来，除了主义而外，什么东西都是渺小的；但她后半生“反对恐怖主义，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苏菲·包婷娜》，叙述她坚持在工人中宣传正义、自由等革命思想，遭受沙皇摧残，历尽艰难，但“这样优美的精神不久就和那衰弱的身躯一同走到死亡的路上去”，三十岁时为不影响同志们工作而开枪自杀。

《游珊·海富孟》，叙述“四年的监狱”生活把犹太女子海富孟“造成为一个激烈的社会主义者”，赞她是为“把自己底一切都奉献在革命之祭坛上”，甘愿做“很少而且琐碎”的工作的“名满全球的人物”。

《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叙述苏菲亚深厚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类深沉的爱，并赞赏她反抗沙皇专制的英雄行为，称颂她是一个温柔机智的、光荣的女杰。

《薇娜·妃格念尔》，叙述她的求学、婚姻、行医，从事虚无主义宣传、暗杀运动以及被监禁二十二年、出狱后仍从事宣传工作的经过，赞颂她“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一生。



加塞林·布列
斯科夫斯加亚。

《路狄密娜·福尔铿席太因》，大量引用薇娜·妃格念尔《自叙传》中对路狄密娜的介绍内容，说明她这个主张对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实行恐怖主义的犹太女人，却不忍杀死一只昆虫；她原先“坚决地相信善与爱能够征服一切的恶”，但俄国“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罪恶和劳工阶级的受压迫和人民的无自由，迫使

她“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恐怖主义者，而“在革命的反抗中”，她又以“自己牺牲的精神”表示了“利他”的崇高品质。她出狱后依然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殉道。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简要叙述加塞林八十余年坎坷、艰辛的生活历程，称颂这位抛弃“富裕”、“繁华”、“家庭幸福”，“为俄国人民底自由奋

斗了六十多年”、历经二十余年“监狱和放逐生活”，“却能够屹立不动地保持着自己底信仰，完成了自己底人格之一致”的“民粹派老将”为“俄国革命之祖母”，“是一个兼有着‘真实’、‘纯洁’、‘坚强’、‘勇敢’这四种美德的女人”。

《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叙述社会革命党一位年轻



的女党员齐奈达从事社会革命运动的简历；她暗杀沙皇一司令官是因为遵照“我们党底决定”——“对于政府底渴血的白色恐怖以赤色恐怖来回答”，而她不畏惧，因为“有坚定的信仰”；称颂她是“把人民底安乐和幸福看得比自己底生命还宝贵的英雄与女杰”，是“真理之圣徒与殉道者”。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瓦》，生动地描绘社会革命党左派玛利亚暗杀一总督的壮举和多次惨痛的监狱生活，歌颂她在残暴的兽性前的顽强的斗争意志，以及为“信仰”、“正义”和“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博爱平等”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高尚精神，称她为“俄国农民底领袖”、“伟大的革命家”和“殉道者”，“我底‘精神上的母亲’”。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

叙述伊林娜与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一德军司令和哥萨克大将等的经历，赞颂她虽经多次坐监、病魔、流放摧残，而“理想”和“信仰”依旧的革命精神。

十月 巴金想离开法国回国，但是成都的旧居李公馆都卖掉了，大哥早已无力支付他在法国的费用了。经济拮据的他，陷入为筹集路费而不安的窘境，幸亏钟时及时为他解决了困难。去马赛前夕，赶回沙多—吉里，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签字，又到中国公使馆签证，十七日傍晚取到了归国手续的相关证件，向古然夫妇和朋友们依依惜别。特别让他感动的是和古然夫人的离别，老太太慈祥的笑脸，久久地浮现在眼前，他仿佛在和自己的母亲离别。终于，巴金带着她的祝福离开小镇，返回巴黎。

十月十八日 到达马赛，由

于海员罢工，昔日繁忙的港口，成了“死港”。他只得在海滨美景旅馆五楼的一个小房间内逗留了十二天。在马赛结识了一位姓李的四川同乡。对方很热情，经常陪巴金出入于大大小小的电影院；另外，在马赛看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很难想象，在近代化的城市马赛，劳动人民居然仍旧生活在脏、乱、臭的环境中，还看到竟然有不少迫于生计卖淫度日的法国和安南妇女！在马赛最大的收获是，读了左拉的《卢贡—马加路家族》等近二十部小说，感到很有启发，于是产生了通过一些事件或人物来描绘整个时代的构思：“《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过着幸福的日子”。

十月三十日 马赛海员罢工风潮平息，在四川同乡李先生的帮助下，乘船启航。在漫长的和寂寞思念交织的旅途中，“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杀害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时代的年轻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

人控诉”。《春梦》就是后来巴金的成名作《家》的原创构思，《家》初载时名《激流》。

十月或十一月 在柏林的德语周刊《自由工人》上发表一篇关于萨珂和凡宰特的短文。

十二月中旬

巴金结束了海外和海上漂流的生活，抵达上海，回到朋友们中间。

他先住在旅馆，从索非处得知《灭亡》不用自费出版，因为《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看了《灭亡》后，决定明年第一期开始连载。索非带来的《小说月报》上的《内容预告》，是叶圣陶对《灭亡》的推荐：“《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

索非又拿出刚出版的《开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面有陈鹤、流云、吴铁声分别撰写的三篇关于巴金的译作《薇娜》的评论，对巴金译笔的“简洁且清顺”、“译品”和译作的“志趣”作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巴金很激动，此时此刻，他沉浸在浓浓的友情和深深的理解和支持中，寂寞和漂泊的心顿感温暖，心境也安定下来。

他应索非约请，到闸北鸿兴路鸿兴坊七十五号世界语学会同住。索非除了在建明书店供职，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秘书。

经索非介绍，巴金参加了世界语学会，并担任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晚饭后，他常和索非散步到鸿兴坊。他批改完函授学生的作业后，令他高兴的是，可以在两个大书橱里翻看世界语的图书和报刊，有机会读这么多世界语文章，大大提高了他的世界语水平，也更增强了他用世界语写文章的兴趣。当时索非和盛国成为世界语学会编辑世界语杂志《绿光》，巴金应约用世界语在《绿光》上发表文章。后来《绿光》由巴金一个人接编，变成大开本，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不久，索非结婚，他们搬到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索非夫妇住二楼，巴金住楼下客堂间。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闸北陷于日军炮火之后，他才离开了这座几乎变为废墟的住所。

巴金的屋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桌面四周有雕花的木纹，连抽屉也没有，为了能摆放稿子之类，桌下添一层木板。巴金就在这张小小的书桌上写作。

从法国回来之后，索非为他营造的写作环境，使他永远难以忘怀：“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朋友在建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我的小说就这样送到各种各样报刊，用不着我携带



索非。

稿子去拜访名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常常写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会把它送出去。”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为《开明》译波兰作家高尔恰克的《茶房也是一个人》并作《译者小引》。

一九二八年内 在法兰克福的一份世界语杂志“INO” Bulletin 上，发表用世界语写作的《东京烈士》。



《革命的先驱》旨在表现“革命先驱者对于所革命的努力和献身革命场中饱尝的痛苦与其崇高的牺牲精神”。

《俄罗斯十女杰》是巴金“两个月来的心血和眼泪的结晶”。

“每种译本里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

二十六岁

一月初 经索非介绍，在沈仲九负责的自由书店任编辑。自由书店出版过一系列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作，曾被国民党查封。现在巴金决定加盟，担任责任编辑，并与乐夫、毕修勺、梅子、中天、黄子方等共同经营自由书店，以“马拉”的笔名主编《自由月刊》。编完第一卷第一期后，他亲自送到印刷局发排。

一月二十日 在《革命周报》上发表《替巴枯宁洗一洗不白之冤》，署名春风。嘲笑该刊的作者“没有读过巴枯宁的书”；说明“为了我所崇拜的巴枯宁”，不得不向《革命周刊》投稿；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含义有三点：一、无神论，二、无政府论，三、自由共产主义”。

一月三十日

《自由月刊》创刊。在创刊号上巴金发



《自由月刊》封面。



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的《断头台上》书影和版权页。

表了一组文章。

《说几句开场话》，署名编者。说明《自由月刊》是“公开”的“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是“书店和主顾（读者）的通讯机关”。

《我们的广告（一）》，未署名。计两则：其一，介绍《俄国虚无党人运动史》的作者司特普尼克“是一个血性男儿……他的书本可以使人流泪，同时又可以使使人兴奋。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读了他的书也不能不感动，就是顽固的反动分子读了他的书，也不得不同情于革命的党”；其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俄国革命党人柴米凯索夫的杰作……在批评马氏的著作中这部书应该首屈一指了”。

《我们的广告（二）》计五

则：介绍《断头台上》“是各国革命党人殉道的故事”，文字“充满了血和泪”；介绍《卖鱼者的生涯》作者凡宰特“是为同胞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殉道者”，该书“是天地间之至文，非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写不出来的”；介绍《巴枯宁学说》，认为在对巴枯宁有种种“误解”的今天，该书提供了“了解巴枯宁的材料”；介绍《革命者的生涯》“是二十个欧美亚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介绍《人生哲学（下编）》。

《我们的广告（三）》，计八则：介绍《国家论及其它》的作者“克鲁泡特金是安那其主义集大成者，同时也是科学家”；介绍《面包略取》“是克鲁泡特金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介绍

《近代科学和安那其主义》的作者克鲁泡特金，认为“安那其主义不是一件信仰的东西，而是一件为科学所研究的东西”；介绍《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上编）》“是克鲁泡特金的一部遗著。他的目的是想继孔德、斯宾塞、巴枯宁未竟之志，创造一种人类的、科学的综合哲学”；介绍《克鲁泡特金学术概要》是“欲了解”、“批评”、“反对克氏思想者，不可不读之书”；介绍《苏俄革命小史》“译述苏俄革命的状况，有理论的批评，有事实的记载，实为研究苏俄革命史的最好的参考资料”；介绍《革命的先驱》旨在表现“革命先驱者对于所革命的努力和献身革命场中饱尝的痛苦与其崇高的牺牲精神”；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是“研究过马克思的主义和想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不可不人备一册”。

在《自由月刊》上发表译作《凡尔加的岩石上》（俄国民歌）；发表译作《她》（左拉著），署名马拉。

一月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至第四号上发表和连载《灭亡》，在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文学史家王哲甫说：“这一年出版的小说虽多，但是轰动当时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将《灭亡》版税送给朋友。因为“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

在《平等》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一首译诗《遗言》和三篇杂感：《栽赃》，署名春风，针对有人把李石曾、吴稚晖等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栽赃”和“造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首领的；是根本反对首领的”；《革命》，署名春风，指出“什么是革命的工具？口号，标语；什么是革命的目标？拥护，打倒？”；《无的放矢》，署名春风，认为攻击吴稚晖、李石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无的放矢”，因为他们现在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内的职务，“思想、言论、行动”和无政府主义不一致了。

由自由书店增订出版《断头台上》，署名李芾甘。本书收集了十八幅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图像，正文及附录大部分曾发表过，编入本书时，略有改动，全书记叙、描绘和歌颂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命运、信仰以及作为殉道者的英雄悲剧和献身人类事业的精神。

二月十日 在《开明·儿童读物专号》上发表《读木偶奇遇记》，署名一切。虽然这是一本“皆说好的一本书”，但仍表示“不满意本书之带有很浓的教训主义色彩（我以为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的）”。

二月二十五日

在《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三则《编者的话》，均署名马拉：《老了十年》更正该刊第一期误将“一九二九”植为“一九一九”，用幽默的文笔，称为“老了十年”；《一个与其他一个》云“巴金”与“马拉”无关，“一个是本刊的编者”，“其他一个”是诗的作者；《偷得不像》通过对话表明《自由月刊》虽然“偷”《开明》，但“偷得不像”，有自己的特色。

在同一期《自由月刊》上发表：《工女马得兰之考察》，署名芾甘，认为《工女马得兰》是“不朽的名剧”，主人翁马得兰是“革命的女性”，“世界只有由马得兰来救”；

《克鲁泡特金八年祭》署名编者抄，云克鲁泡特金的死是“悲痛的事”，全人类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光荣的作家”。

发表译作《母亲之死》（赫尔岑作）和译后记，署名P.K.

发表译诗《露西德木兰》及译后记。

为《平等》第二卷第三期作散文《我的心》，署名P.K.。向读者袒露从法国回国后的真实思想，觉得几年来走在“人心的沙漠”中感到“痛苦”，呼唤着“正直”、“幸福”、“和平”的到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尽管周围依然是“黑暗的孤独”，可是“这一切不能毁坏我的心”，仍要“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

这个月是农历新年，巴金早已习惯了没有家人团聚的孤独了。值得高兴的是，他三次观看轰动上海的美国影片《党人魂》。“因为《党人魂》虽然够不上说是一套解释革命的影片，对在现今《怪魔》、《漠中情血》、《皇后私奔记》等流行的电影界中总算是一套难得的片子，所以我看了一次、二次、三次”，而且也被“感动过”，事后，还看了据《党人魂》改编的小说《火榴》。

三月二十五日

在《自由月刊》第三期上发表：《党人魂 及 火榴 之考察》，署名芾甘，认为宣传该片是“世界第一革命爱情片”是不可靠的，指出这部“朋友……差不多个个赞好”的影片的“一大缺点”，是“不曾做到艺术上的忠实”，没有“抓住时代”，认为《火榴》是“失败”的，因为作者“不懂得俄国革命”；译诗《普希金安慰在西伯利亚矿坑中的十二月党人诗和十二月党人的答诗》，在《译后记》中称赞十二月党人的答诗“尤能动人”；译诗《凡尔加，凡尔加》；《郭沫若的“坠落”》、《郭沫若的“周刊”》、《浮士德 里的妙句》等三则补白，均署名芾，指出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中的误译之处。

在《平等》第二卷第三期上发表：《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



钱杏邨。

人》，署名黑浪；《分治合作与无政府主义》，署名春风，认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论，“和无政府主义无关”；译作《请大家熟读这一封信——凡宰特致但丁信》及译后记，未署名。

从钱杏邨在泰东书局的《力的文艺》上发表的《力的文艺 自序附记》中，看到有批评自己的文字，涉及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拟在下期的《自由月刊》上发表分析托尔斯泰的长文，回答“现代文坛最有力的批评家”钱杏邨。后来，听说“几个某大学的学生预备帮助钱杏邨来骂我，因此……把我要说的话留着不说，且等他们骂够了，再出来辩不迟”。

四月二十五日

在《自由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杂文、随笔、剧评、译作等。

《随便写几句话答复钱杏邨先生》，认为批评“托尔斯泰是说教者”的钱杏邨才是“卑污的说教人”。

《Marxism 与绿林英雄》，署名芾。指出钱杏邨的文章用“Marxism 的方法”“检讨”“普希金的情盗”，“重行估定”的结果是认为“在黑暗的当时……要劫富济贫……锄奸伐暴……为被压迫阶级报仇”，“只有当强盗去”，因而讽刺：“原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银，劫

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绿林英雄是和 Marxism 相和的”。

《现代文坛上最有力的批评家之真面目》，署名芾。引用岳真《批评钱杏邨的批评》和钱的《力的文艺 自序》中的文字，归纳出：钱的“考察方法”是“在作品一言一语中肯定了这作品根本思想以及艺术态度”。而“所谓‘现代文坛上最有力的批评家’钱杏邨先生的真面目”就是“很幼稚，很不充实”。



屠格涅夫。

《我的答复》，署名芾甘，回答中天关于《人生哲学》中译本的质疑。

《黑暗之势力 之考察》，署名芾甘。认为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是一部描写黑暗之革命的剧本”，读了该剧“一定要对现社会制度表示反抗，一定要主张铲除这种黑暗之势力”。

《在门槛上》，屠格涅夫



作，署蒂甘译。

《失去的万尼亚》，A. S. Rapport 作，署马拉译。

因为五一节快到了，将旧作《五一运动史》修改后，寄《平等》刊出。

在自由书店第一次遇见马宗融，马宗融是到自由书店来找朱永邦的。“当时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杂志上读过他翻译的法国短篇小说，也听到几个朋友谈到他的为人：他大方好客，爱书如命，脾气大，爱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见他，交谈了几句话，我们就成了朋友，他约我到离索非家不远的上海大戏院去看德国影片《浮士德》。看完电影又请我喝咖啡。”在交谈中知道他准备回四川接女朋友罗世弥，然后双双赴法。

自此，巴金和这位法国文学翻译家、作家马宗融及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的罗淑（即罗世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马宗融每天晚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翻译居友和蒲鲁东的著作。巴金常去马家，和也常去马家的文化界人士陈望道、方令孺、陈子展都很熟悉。

五月十四日 为《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下编）》作《人生哲学之介说》，署名蒂甘。指出该书的要旨是：给我们证明“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

喜，真正的幸福是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五月中旬

作《读八太周三氏底人生哲学新译本》，编入《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下编）》附录，署名蒂甘。指出八太周三氏译本的“忠实”、“可爱”，指出该译本“根据的只是英译本，而英译本又有错，所以他把英译本底错处照样翻译出来了。现在我替他指出来，希望他在再版中把这些错误一律改正”。

在《平等》第二卷第四、第五期合刊上发表《革命的性

质》，署名春风。文中的《革命》系指《革命周刊》。指出该刊的内容有了变化，认为其“性质”是“替国民党辩护，十分忠实；赞美国民党，十分透彻”。

五月下旬

译完《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下编）》，并作《译者序》，交自由书店出版。说明因考虑到该书内容之艰深，又觉得译文太倾向于直译，所以想“写一卷《克氏人生哲学的大意》，章节与原书一样，不过是用我自己底话来述克氏底见解罢了。这一卷将载入我的《克鲁泡特金研究》第二集，此书现正起稿，将



一九二九年夏
巴金 后 与大哥摄
于上海。



来亦由自由书店出版”。

译作《蒲鲁东底人生哲学》
(克鲁泡特金著)，署芾甘译。
由自由书店出版。

七月十日 在《开明》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据世界语翻译的日本民间故事《爱情》，署名一切。

七月约中旬

巴金终于和阔别六年的大哥见面了！随大哥同来的还有堂弟李西舲和其他的几位亲戚。这是巴金出川后和大哥的第一次重逢，猛一见面，大哥明显比从前苍老多了。巴金久久地握着大哥的手，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袭遍了他的全身。

在霞飞路的一家临时租借的公寓里，巴金和大哥等叙述别后。三姐的不幸和惨死、二叔家道的衰落，失望、郁闷的心境蚕食了大哥的健康；还有大哥独立支撑门户的种种艰难，为了一家

人的生存和亲戚间的应酬往来，他学做投机生意承担的风险和压力。当然，大哥还是热切地希望巴金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白天，巴金陪大哥外出参观购物看电影，晚上，兄弟俩一边听新买的唱片，一边畅谈。巴金感到“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

当巴金对大哥谈到了《春梦》的构思，并要拿他做作品的主人公时，他表示同意，也愿意提供他知道的往事，希望巴金能顺利地写出来。

兄弟俩都很想念李尧林，巴金曾以自己和大哥的名义邀他南下到上海欢聚，但是没有提到帮他解决路费问题，李尧林也不愿增加大哥的负担，并想利用暑假替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所以没有成行，错过了和大哥见面的机会。

八月

巴金和大哥在上海欢聚了一个多月，终于又要分别了。大哥给四弟买了一支自来水笔，鼓励他写《春梦》及继续创作；巴金在谋得利洋行替大哥精心挑选了一张格雷西·菲丁的唱片《Sony Boy》，希望能给大哥返家后沉重的生活增添一点儿轻松和快乐。

一个炎热的下午，十六铺码头，他和表弟高惠生、李丕龙送大哥上船。两人都十分痛苦，大哥早已泪痕满面。船快开了，巴金紧握住大哥的手，哽咽着说了一句：“路上保重！”抽身要走时，大哥叫住他，从箱子里找出那张格雷西·菲丁的唱片《Sony Boy》，坚持要给四弟，因为他知道四弟喜欢。巴金原不肯接受，但想到不应让大哥伤心，便含泪接了过来。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兄弟俩的诀别！

几年后，巴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我明白你的举动是想给我留下一个纪念，接了唱片我不曾说一句话，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话语表现出来的。我坐上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我看着外滩一带的灯火，我记起了我是怎样地送别那个人的，我的心开始痛楚，我底不常哭泣的眼里却淌下泪来。”

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俄司特普尼亚克作，署李芾甘译，另附



司特普尼亚克。

《译者小言》署名蒂甘及《司特普尼亚克传》（E作，李蒂甘译）。《地底下的俄罗斯》是巴金据西班牙、法、英、日四种本子译出，“这部书是叙述在俄皇专制政治下男女青年革命党人的运动，被捕，逃狱，牺牲，殉道，其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实”；“该书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一部名著”，“曾轰动全世界”。

九月十日 在《开明》第二卷第三号上发表随笔、书信和译作：《两个质问》，署名B. B.；《读者的交通》，署名B. B.，解答读者的问题；《老秋客的梦》（Ninoshvili作），署一切译。

九月十六日 从毛一波在《真善美》上发表的文章，读到他对《灭亡》的评析：“以一个革命者杜大心的活动与灭亡为中心，而表现了整个的革命形象”，这是“和流行的所谓标语

式口号式的革命文学所不同的地方”，作者又“受了俄国虚无主张的影响”，“同时综合的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阿志巴绥夫式的虚无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该书的“价值和伟大”在于“技术”，“已获得最好的成绩”，“思想是很成熟的”。

十月

《俄罗斯十女杰》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几个月前，该书经索非手没有“推销”出去，于是巴金把稿子拿回来，送到熟悉的太平洋书店编辑部，表示放弃稿费，书店欣然接受，并很快出版。

《灭亡》经索非交开明书店出版。他认为：“写作只是为了

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为了最初出版的书不好意思收取稿费，我或者把‘版税’送给朋友，或者就放弃稿酬。”

出版译作《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署名蒂甘。

发表为梅子著的《争自由的儿女》作的《序》。

十二月

根据英文、法文、日文三种本子，继续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我底自传》，原书只有六章，巴金将第四章分为三章，各加上标题，成为八章。该书的译述倾注了巴金大量心血，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底知识发展阶段上给了极大底影响底一部书。我能够把它译出介绍



《俄罗斯十女杰》版权页。



《我底自传》等书影。

给同时代的年轻朋友，使他们在困苦的环境里从这书得到一点慰藉，一点鼓舞，并且认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我觉得非常高兴”。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自我”的译笔，他认为“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的成分，……每种译本里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书译完后，托索非转请丰子恺为这本书写了封面题字，得到丰氏手迹时，十分喜悦。该书交启明书店印一千册。

在《一般》第九卷第四期上发表译作《不能死的人》高尔基作。

见《小说月报》在“最后一页”上报道：《灭亡》“引起读者的注意”，“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

大哥来信，云，在李国嘉夭折后，连生四个女儿，现在终于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国辉。怕养不活，就将李国辉“过继”给巴金。于是，巴金就成了李国辉的“爹”，而李国辉的生父李尧枚被称为“伯伯”，生母则被称为“大妈”。对大哥的这一要求，巴金默认了。



认为《我底自传》中的传主克鲁泡特金舍弃家产、爵位等，“在人类中是优美的精神”，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是一个“最纯洁最伟大的人”。

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在巴金创作道路上的神奇力量。

巴金自云，他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曾先有一种思想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

巴金惟一的一部介绍、论述无政府主义的论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出版。自云“在安那其主义的阵营中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生活”。

二十七岁

一月上旬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号上发表译作意亚米契斯《过客之花》剧本和《过客之花 引言》。该剧一九〇六年四月于罗马初演，轰动剧坛，同年八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万国世界语大会上演出，深受欢迎。巴金据巴塞尔出版的世界语译本重译，原题为 La Florodela Pasinto。在《小说月报》发表时，巴金引用了世界语译者 Rosa Junck 女士在其译本前的献词：“献给亚米契斯，靠了他高贵的感情，不幸的人得以恢复勇气；靠了他的教训，残酷得以变为善行。”

作《我底自传 译本代序》，载四月上海启明书店初版《我底自传》，原题为《给十四弟——我底自传 代序》。此系给作者十四弟李尧椽的一封信。一九二九年秋，巴金曾收到十四弟李尧椽希望译著点书给他读的信。认为弟弟的思想和主张应该由他自己去发展，决不向他“宣传什么主义”，现在“经过了长期的选择之后”，作者选定了《我底自传》，并要弟弟把它当做“终身伴侣”。书中主人公克鲁泡特金舍弃家产、爵位等，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因为他“在人类中是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是一个“最纯洁最伟大的

人”，会“教给你一个怎样为人怎样处世的态度；希望弟弟“爱他敬他”，当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这本书是所有的青年们底福音”。

一月中旬

译完《前夜》，波兰廖·抗夫作，三幕话剧，四月上海启智书局初版，一九三七年校改重印时，改题为《夜未央》。

作《前夜 译本序》，云：曾怀着“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来阅读和翻译该剧，这个剧本“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第一次找到了他底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他底终身事业”；十年过去了，“我底思想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我底小说般幻梦却消失了”。

作完《廖·抗夫略传》，载四月上海启智书局初版《前夜》。概述《前夜》作者廖·抗夫生平和该剧演出受禁而后又令“观众着魔发狂”的情形，并摘了当时几位批评家赞美这个“不朽的名作”的文章的片段，认为在写“感情与义务之斗争，爱与死之角逐”方面，“《前夜》要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

为《绿光》第七卷第一、第

二期合刊和第三期作《世界语创作文坛概况》。此文系参考《世界语史》及有关材料写成，概述学习世界语及其发展简况，论述世界语的特点及其用世界语创作对“事业”的意义。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号发表短篇小说《房东太太》，根据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朋友朱乐夫的初稿改作。作品通过“我”在工厂中的悲惨生活和房东太太叙述的悲惨故事，控诉了战争的罪恶，揭露了法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后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巴金对这篇作品并不满意，认为：“写得不好，很扫兴，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宜于写小说，想从此搁笔。”

二月一日 在《开明》第二十期发表译作《我们女人》，荷兰吴黛女士作，署名一切。

二月六日 致大哥李尧枚信。谈到创作《春梦》的构思，但担心写不好；对个人生活问题，明确表示“我对生活不感兴趣”。

三月上旬 获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近日在上海成立，知主要发起人中有鲁迅和沈端先、茅盾、胡风等。

三月中旬 出版译作《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作，独幕剧，署名一切。开明书店初版。在《骷髅的跳舞 译者



周扬。

序》 中回忆在法国卢森堡公园读完这本书时宽松的心情，数年后译完时“又恰逢着上海的春天”，心里“充满了希望，相信春天是决不会死亡的”。

三月二十九日 代表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接待日本著名世界语学者长崎。

三月三十日 出席上海世界语学会第五次会员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

四月二日 收大哥李尧枚农历三月初四来信，曾一直保存着，后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文库。信中谈到关于《春梦》的事：“《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写成罢，怕什么！《块肉余生述》若怕，就写不出来了。”又说：“写出来给我看，亲手签名，我抱着书，就像抱着小弟弟与我摆龙门阵了。”巴金看完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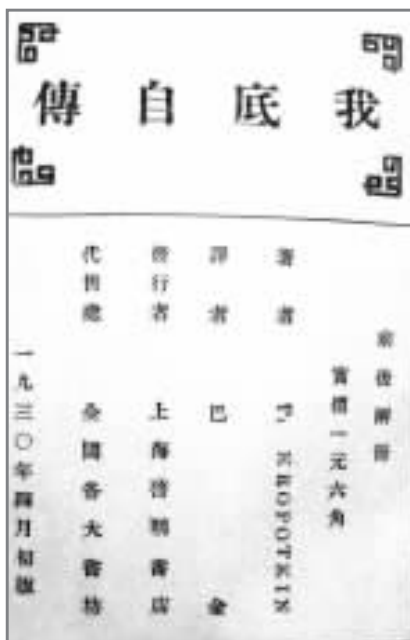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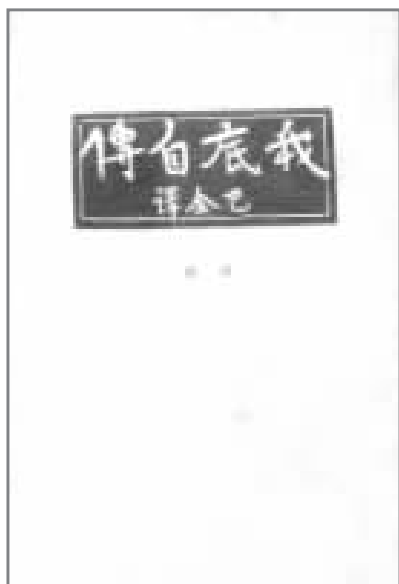
四月中旬 在《开明》第二十二期发表《 灭亡 作者底自

白》。本文对刚果伦、毛一波等批评《灭亡》的文章表示异议，认为杜大心思想“近于”安那其、虚无主义、个人主义，但他“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他的思想里面“含得有不少的矛盾”，他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正确的，后来走上了“用暴力来毁坏生活的一条路”，尽管“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的死而哭”；针对有人否定作品中第二十二章的看法，指出该章“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我自己底希望就寄托在这里面”，同时承认前一章“抹杀了群众底

力量”，但“依然觉得中国民众是可爱的有望的”；最后又总结自己的创作思想：二十几年来，“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就把生活中得到的东西写下来，“并不曾先有一种心思想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希望批评家……了解我”。

四月 出版译作《我底自传》，俄克鲁泡特金著，署译者巴金，上海启明书店版。

五月初 收到友人毛一波看了《 灭亡 作者底自白》后写



巴金译《我底自传》的封面和版权页。

来的信。读后，两年前在法国《每月新闻》看到的一个安南青年被迫自杀的消息以及巴恩波在法国项热投水自杀的事，又一次涌上心头。“想写点东西来申诉我的以及与我同为‘被压迫者’的人的悲哀”，“决定用我所经过的五卅事件为主题”，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由盲目到幻灭再到觉悟的故事。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自云作品“不成功”，但“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我已经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申诉自己底悲哀了”。

六月十日 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十一、第十二号上发表译作苏高尔基短篇小说《为了单调的缘故》。

六月下旬 作完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及《死去的太阳 序》。书名原为《新生》，初时拟为《灭亡》续篇。作品写完后，看到的却是一部在内容上与《灭亡》没有联系的小说。另外，作品中写到王学礼等人的牺牲，巴金没有失望和悲哀，却坚信“他底死只是短时间的，恰像死去的太阳一样，在流了那么多的热血消灭了以后，仍然会和第二天的黎明同升起来，以它的新生的光辉普照人间”。遂定题为《死去的太阳》。作品以五卅事件为题材，“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

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最初投寄《小说月报》，被退回，很失望，后又作较大的修改，送交开明书店列为“微明丛书”。一九三一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作品中的方国亮还是以当时的校友、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张光人即胡风为原型的。

六月 在《绿光》第七卷第六期上发表随笔《一个更正》，更正了《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中一处“误写”。

七月初

做了一个悲惨而奇异的梦，加速了巴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的进程。当晚，“我忽然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我还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那篇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小说叙述了法国穷音乐师洛伯尔对一位姑娘深沉而不幸的爱情故事。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巴金生活过的马伦河畔，主人公洛伯尔的模特儿是拉·封丹中学的音乐教师。《洛伯尔先生》在巴金文学创作生涯中起过独特作用，他曾在创作了短篇小说《房东太太》、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后，自己很不满意，想从此搁笔不写了。然而，《洛伯尔先生》“这一篇开了端，所以我接连地写了好些短篇小

说”。

自此，巴金终于找到了感情宣泄的泉口，把他多少年来想通过无政府主义来拯救苦难的信仰，以及“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的苦闷、矛盾、烦恼找到了疏导的方式， he 可以用文学创作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而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决定继续走文学道路的时候，我曾在我心灵的祭坛前立下这样的誓言：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洛伯尔先生》发表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七号。

七月

在《绿光》第七卷第七、第八期合刊和第九、第十期合刊上连载《世界语文学论》，论及世界语是一种“活的语言”，是构成世界语文学的要素；世界语表现的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的感情，无论是对于欢乐悲哀、生存死亡”。

为《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十五号作短篇小说《亡命》。叙述流亡巴黎的意大利青年尼可拉·发布里为追求理想而背井离乡、横遭驱逐、未婚妻被杀害的痛苦经历。巴金在作品中借发布里的故事，倾吐了自己“漂泊”异邦而被“歧视”、“压迫”的痛苦真实的感情，因而“喜欢《亡命》”。



- ⊙ 阿·托尔斯泰。
⊙ 巴金译作的广告。



译作苏阿·托尔斯泰著十一幕话剧《丹东之死》，由开明书店初版。该书在付印前，巴金接受了开明书店总编辑夏丏尊的建议，写一篇《译者序》讲讲法国大革命的经过。于是，巴金在《丹东之死 译序》中说明“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中间大部分都是极勇敢、极高尚、极诚恳的人”，“都甘愿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登断头台不悔”，原剧作者“把当时的斗争表现得适如其分”，“捉住了那时代的精神，同时还利用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该剧是“不朽杰作”。

《丹东之死》一书还含有巴金作《法国革命的故事》，以生动、精练的语言叙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和王权、三大党派（吉隆特党、山岳

党、平原党 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最后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右翼保皇党篡夺的历史故事。认为“捣毁巴斯底狱”、“打倒封建制度”、“抵抗外国军队侵略以保卫法国的”“英雄”“就是法国民众”；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是“离开了民众”，迷信“恐怖制度”和“专政压制”；称颂大革命的主要历史功绩，是“自那天以来所有的君主顶上的圆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没有那个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是能够生存的”。

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论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署名蒂甘。该书在研读、综合柏克曼寄赠的《安那其主义的ABC》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

社会经验写成。这是巴金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阐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原理的论著。巴金认为“资本制度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之制度”，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关系是抢劫和被抢劫的关系，而政府、法律、宗教，就是“保护资本家抢劫全体人民”，是“奴役工人掠夺工人的机器”，因此“所有希图依靠法律和政府来实现‘改良’社会的计划都是梦想”。第一次从理论上肯定了“十月革命乃是法国大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它不仅废除了沙皇及其绝对的统治，……它还毁坏了有产阶级、大地主、工业大王等等经济的权力，是有史以来惟一的大事业”。同时巴金又反对一切政府的法律，反对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党专政，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途径是“工人要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原理上组织起来，全国各行各业都由下而上地建立工团组织”，时机成熟时，“用总同盟罢工的方法，由有组织的工人来把工业管理权抓到手里”。巴金总结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代替了政府，这就是安那其，平等使用代替了私有财产制，这就是共产主义。”他指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理想是：“我所描写的社会制度是一个自由共产主义，一个志愿的合作与平等的享用之社会。要获取经济的平等，除了

自由而外，并无其他的路。”

写《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的目的，巴金在该书序中说得很清楚：“我在安那其主义的阵营中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生活。运动的经验常常使我感觉到理论之不统一，行动之无组织，乃是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之致命伤。在中国安那其主义的宣传虽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然而至今能够明确地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人可说是很少”，因此准备写一部“正确地解释安那其主义的书”。又说：“安那其主义没有教主，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信徒，因为安那其的理想并不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不过

大体上我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信奉克鲁泡特金阐明出来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

欣悉三哥李尧林在燕京大学毕业，成绩优良，得到校方颁发的刻着李尧林三字的金钥匙的奖品。不久“考进南开中学做英语教师，……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走马上任’了……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为他高兴”。

八月中旬 与友人卫惠林、卢剑波、郑佩刚等十余人游杭州西湖，并商谈宣传无政府主义事宜。同人委托巴金与卫惠林化名李一切和卫仁山，创办《时代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封面和版权页。



前》杂志。初议《时代前》杂志社设在上海嵩山路李梅路和平坊一四三号。

八月下旬

接泉州北门黎明高中校长吴克刚信，决定在卫惠林陪同下，经厦门赴泉州度暑假。巴金连续三年去泉州，在古城泉州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梦想、他的友谊、他的如火如荼的名篇佳作。

吴克刚自法国回来后，决心到泉州助有闽南英雄美誉的秦望山办学，汤文通、卫惠林、柳子明、杨人梗、李又观、陈范予、陈君冷、范天均、许谦、丽尼等都在该校任教。黎明高中的校址是原来的武庙，由海外侨胞捐款，澳门归侨联合会主席梁披云（梁龙光）任校长。这群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年纪和我相差不多，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封建流毒还在蚕蚀人们的头脑；他们看见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仿佛一块大石头压在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又像一只魔手掐住他们的咽喉。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学校门



巴金。

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他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在《南国的梦》中对他的朋友们有这样的记载：“都是献身于教育理想的人，他们在极其贫困的环境里支持两三个学校，使许多可爱的贫家孩子也尝到一点人间的温暖，受到一点知识的启迪。他们的那种牺牲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泪。”“没有充足的饮食、没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足的休息，他们沉默地把那些沉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从没有一个时候发出一声怨恨，他们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九月一日 在《中学生》第八号发表短篇小说《复仇》。叙

述一个排除万难为爱妻和同胞复仇之后又自杀身亡的犹太青年福尔恭席太因的故事。巴金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喜欢让主人公自己讲故事，像《初恋》、《复仇》、《不幸的人》”，“很可能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启发写成的”。

九月上旬

赴闽途中经厦门，在鼓浪屿一家靠海的旅馆内结识作家王鲁彦。见到王鲁彦拖家带口，又为生活所迫，从上海到了厦门。于是，介绍鲁彦为《民钟日报》编副刊。同时在厦门大学兼课，教授中国文学。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巴金搭汽车到达福建泉州的古城晋江。

当时，很多友人以晋江黎明高中和平民学校为基地，办报纸，搞教育，建立总工会、人力车工会、妇女会、学生会等，巴金和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一起学习、工作，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巴金继续研究克鲁泡特金学说。在泉州翻译了蒲鲁东的著作《何谓财产》的下半部，可惜《何谓财产》稿未发表就全部遗失了。他在泉州，还鼓励朋友们组织世界语学会。“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的阴影。个人融合在群体中间，……友爱包围着我……”

同月

与挚友吴克刚一起生活、工作。一次巴金发烧到华氏一百〇二度以上，教生物学的老师陈范予照料服药，数天后退烧。后来吴克刚患了伤寒症，巴金帮助他料理一些学校的事情。

在黎明高中住了一个月的光景，巴金结识了几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结识生物学家陈范予。陈崇尚科学，通过宇宙问题的探讨构成了自己的生活哲学。巴金和他在一起，白天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晚上在露台上看星空，畅谈社会革命的理想。从陈范予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星球的事……看见了无数的原生动物的活动与死亡……我知道怎样节制我的幻想，不让夸张的迷梦迷住我的眼睛”。特别使巴金钦佩的是，当

“别人把崇高的理想用来作自己头顶上的圆光的时候”，陈“却默默地打算着怎样为它工作，为它牺牲”。

结识林语堂的哥哥林憾庐。

“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结识英语教员郭安仁即丽尼、数学教员叶非英。开学的那天，还看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学生吴彩蕴，她给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九月

构思《新生》。得悉湖北人董寄虚曾经组织厦门机器工会，领导电灯厂工人罢工，后与同伴被捕入狱。根据被捕朋友狱中日记，又进一步了解了这些斗争的经过，作为《新生》的素材。

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同时翻译了《木星的人神》。该集收有鲁迅、夏丏尊、胡愈之、觉农、希可、卫惠林等人分别据日文、世界语和俄文翻译的作品十六篇，编辑中“发现爱罗先珂的全部童话和小品中只差了《木星的人神》一篇没有被译过，我便不量力地把它译出了。这篇童话在爱罗先珂的作品中并不是最好的”。巴金在《幸福的船序》中称俄罗斯

盲诗人爱罗先珂“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他“不忍见人类的痛苦，想造一只为全人类乘坐的幸福的船来普救众生”。巴金坚信，“我们终有一日会见着那样的幸福的船航行在人间之海里”。又借盲诗人作品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幸福的船”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愿将“个人的生命之发展”与“群体的生命之发展”“连带”一起，愿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在《幸福的船序》后作“附言”：感谢鲁迅等人把译文的版权赠上海世界语协会。

吴克刚患伤寒住院，得力于众多师生悉心照看，才成为惟一病后余生的幸存者。巴金因照看吴克刚也染病，好在不重。痊愈后，离晋江返沪。称在晋江一个月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是另一些事情把我拉开了。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他，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

作短篇小说《初恋》，写在异国留学的主人公，叙述自己与一位法国姑娘曼丽相互初恋时的忠诚和喜悦，以及失恋后的痛苦和悲伤。

十月

在《现代文学》第一卷第四



期发表短篇小说《苦人儿》。写穷鞋匠的儿子和男爵小姐纯洁真挚的爱情和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悲剧。题材取自凡宰特流亡美国前在意大利的一段经历，以及巴金一九二八年离开法国前在马赛逗留时的一些见闻。

和朋友们一起去杭州，第一次游西湖。到岳王坟，联想儿时读的第一部小说《说岳全传》：“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感到“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在我的心里”，“我偏爱西湖……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的化身”，西湖是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从此，经常到西湖，“寻求鼓舞和信心”，抒发对“崇敬的伟大的爱国者”的“崇敬之情”。

十一月十六日 在《现代文学》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谢了的丁香花》即《丁香花下》。叙述法国青年安得烈在战场上杀死了已失去抵抗力的敌人即妹妹的情人后的痛苦心情，以及安得烈牺牲后给亲人带来的悲痛，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十二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摧残》，以日记体形式，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

表现了女主人公西蒙娜诚挚的爱情和遭到“爱的摧残”后的痛苦与悲哀。

十二月十五日 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四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父女俩》。用日记体形式叙述女儿在母亲死后，以纯真的爱使父亲得到慰藉，而父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和爱情，毅然出走。歌颂为别人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精神。

十二月下旬 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新生》，至次年八月完成第一稿。手稿及连载此稿的《小说月报》一九三二年“新年特大号”，均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日军炮击时与商务印书馆同时被焚毁，一九三二年七月重写。

约十二月

作短篇小说《狮子》，载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中学生》第十一号。叙述异国一位外号“狮子”的学监莫勒地耶，因贫困不能继续求学、维持家庭生活，继而仇恨社会的故事，形象地揭示了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将导致“狮子”即人民的怒吼和反抗的历史规律。

作短篇小说《哑了的三角琴》，载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后改题为《哑了的三角琴》。叙述俄国一个因失去心上人而犯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囚人拉狄焦夫悲怆的命运，以失去哑了的三角琴象征着失去爱情、自由、幸福等的悲哀。



青年巴金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



“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激流》开始在《时报》上连载，巴金被称作“新文坛巨子”。

惊悉大哥李尧枚在成都服毒自杀，巴金万分痛苦和愤怒，决心用笔控诉封建专制制度，“替一代人伸冤”。

“我的诅咒中同时也闪耀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

“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
——眼泪“变成”了小说。

二十八岁

巴金与卫惠林合编的《时代前》版权页。



《时代前》第一卷第一号封面。

一月二十日

化名李一切 与卫仁山即友人卫惠林合编的《时代前》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出版。并发表书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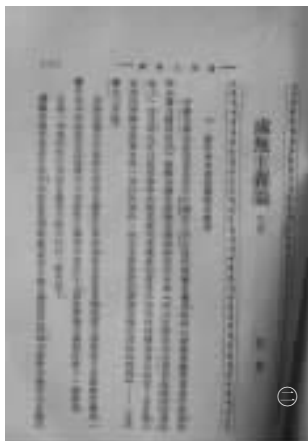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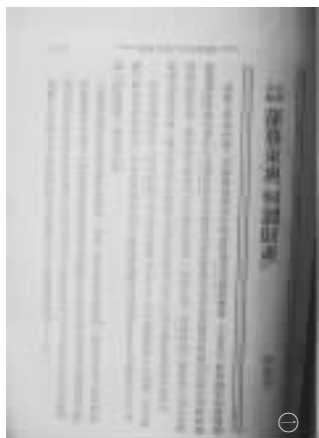
《批评与介绍——法国革命史》，署名一切。认为克鲁泡特金著、杨人梗译的《法国革命史》，“不宣传安那其主义”，“公平地记述着民众活动的历史”，在法国大革命史领域中，它是“公认的权威的作品”。

《蒲鲁东与何谓财产》，署名李芾甘。回顾一九二五年读该书的激动和钦佩心情，认为蒲氏底



巴金

的一个世纪



- ⊖ 巴金在《时代前》发表《蒲鲁东与 何谓财产 》。
- ⊖ 巴金在《时代前》发表《虚无主义论 上 》。

书“可比一座金矿，里面有无穷的宝藏”；但现在“虽然爱读这本书”，却“并不完全赞同书中的议论”，“蒲氏虽然天分极高”，但“不善作文”，“甚至自相矛盾”。

《虚无主义论·上》，署名巴金。认为虚无主义分新旧两种，前者是“恐怖主义”，后者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认为旧虚无主义是“哲学的和文学的运动”，“创始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人物是毕沙列夫。

“虚无主义以脱离一切的羁绊，获取意志之自由为出发点。凡所谓社会、国家、宗教、家庭所强加于个人身上的一切义务责任之负担，它都借口于个人底自由对之一概否定”，因此虚无主义“不仅反抗政治的专制”，而且

“反抗那束缚个人心意自由之道德的专制”。

一月 从晋江来的友人叙述中，获悉郭安仁和吴彩蕴的恋爱悲剧。巴金回想起去年九月在黎明中学看到的可爱的女学生吴彩蕴，原来她爱上了英语教员郭安仁，父母却逼她嫁给有钱的校董，但是吴彩蕴奋力抗婚。郭安仁被开除出校后，吴逃到鼓浪屿找郭，愿一起到天涯海角。怎奈郭安仁性格软弱，不敢贸然和吴彩蕴自由结合。同时，一介穷书生，担心组织家庭后，耽误了对方前程，遂劝吴彩蕴回家。吴彩蕴终于绝望返家，郁郁成疾，卧病垂危。这一活生生的悲剧，深深地烙印在巴金心中，后来成为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的原创构思。

约一月

自费编辑印刷题名《过去》的画册，印了五十本，赠送朋友，自留一本，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画册中印有俄、法等国的一些革命家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亚等。图片旁边有巴金写的这些革命家的简要生平事迹和简短的评语。

与从法国归来、中途顺访莫斯科的胡愈之晤面，甚欢。并获悉爱罗先珂还健在。

二月十五日 在上海《马莱亚》半月刊第一期上发表诗歌《失去的星——代 AA 献给“上海先生”》，署名 B. B.。抒发在“黑暗”中的痛苦和对“光明”的期待。云“曾堕入……黑暗”，在“荒原”“彷徨”，这时“天畔的明星”，“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虽然如今失去了明星，又在黑暗和荒原中“彷徨”，却仍“期待着那失去的星”，“重回来照彻我的灵魂的黑暗”。

二月十七日 接到朋友蔡从美洲寄来的萨珂和凡宰特的书信集。刚读到淡黄色封面上杂志的评语——“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就想起四年前的旧事，在法国关于“萨、凡事件”的全过程，记忆犹新，不禁流出了眼泪。



高尔基。

二月二十日 在《时代前》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十二月党人的故事》，署名一切。叙述十二月党人秘密结社、组织暴动、壮烈牺牲的过程，赞美被判死刑或流放罪的英雄“在法庭、监狱中、沙皇面前……冰天雪地中、矿坑里的坚忍精神”和“牺牲精神”；认为十二月暴动已与新虚无主义的暗杀不同，它是“对专制政治的公然的反抗”，为后代“灌溉了自由之种子”。

二月 在宝光里十四号，参阅席民特金和郭尔特堡英译本，翻译了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加尔·周达》即《马卡尔·楚德拉》及《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编成《草原故事》交上海马来亚书店出版。在《草原故事 小引》中说：自己生活在“狭的笼”中，渴望着“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但现实“摧毁了这一切”。相信高尔基、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

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

三月二十日 在《时代前》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赫尔岑论》，署名一切。全文八节。叙述赫氏生平及与蒲鲁东、巴枯宁、马志尼、加里波等社会活动家、思想家的关系，认为赫氏的“基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压制的力量，谋个性之绝对的独立”；他是“唯物论者……社会主义者”，他底一生“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完成了新的一章”。

三月

在《妇女杂志》第十七卷第三号上发表短篇小说《亚丽安娜》，叙述流亡到巴黎又被法国政府驱逐的波兰女革命家亚丽安娜与朋友吴即吴克刚的恋爱故事，歌颂亚丽安娜为改变故乡“女工的命运”而坚持斗争的革命意志，以及真挚深切的恋爱感情。

这篇小说“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敬爱的朋友，金自然是我”。《亚丽安娜》是巴金在上海闸北宝光里十四号“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创作的。这篇小说原是应叶圣陶约请，为其主编的《妇女杂志》撰写的。《亚丽安娜》发表后，获悉叶圣陶已离开该刊，“我今后就不曾再给《妇女杂志》写稿，因为新的主编思想右倾”。

四月一日 在《中学生》第

十四号上发表短篇小说《赖威格先生》即《老年》。叙述历史教员赖威格先生不许儿子自由恋爱因而儿子出走后的寂寞、忏悔的心情。

四月上旬

上海《时报》文艺编辑吴灵园委托世界语学会巴金的朋友火雪明约请巴金为《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吴灵园当时是写流行小说的才子，在担任《时报》文艺编辑时，拟革新版面，刊发新文学作品。巴金想到酝酿已久的小说《春梦》，“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答应《时报》要求。在宝光里十四号楼下很快写下了一个《引言……》和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将稿子交火雪明，托他转交吴灵园。

写《引言……》后，巴金将小说定名为《激流》，作品的总体构思不再写“消失了的渺茫的春梦”，而要写“奔腾的生活的激流”。

吴灵园看稿后，同意在《时报》发表《激流》。巴金又撰写三章：《两个面庞》、《灵魂底一隅》、《母与女》。稿子写成后，巴金亲自送到山东路望平街的《时报》收发室，“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

四月十三日 下午出席上海



世界语学会第六次会员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

四月十八日

发表《激流引言……》即后来的《激流总序》。自此《激流》在《时报》第五版开始连载。该报刊登醒目广告，称作者为“新文坛巨子”。

《激流引言……》云：“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并不孤独，并不绝望”，因为有“对于生活的信仰”，决心“征服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又说“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请读者“在里面去找它”。

写《激流》第六章《做大哥

的人》。作品中的大哥觉新的形象是以大哥李尧枚为模特儿的。

“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

巴金在《激流》主人公之一的“觉新”身上，倾注了他对大哥李尧枚的深厚感情。他写得十分顺畅，大哥的许多往事不期而至。他从大哥儿时的聪慧，到读中学时的充满美丽的幻想；从打算留学和了解自己的表妹结婚到顺从祖父和父亲放弃升学与不认识的女子结婚；从父亲死后挑起生活的重担，对大家庭的尔虞我诈愤怒、抗争到敷衍、麻木；写了他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和五四以后的双重性格……大哥的形象如此清晰真切，栩栩

如生。巴金心中的感情如喷泉，笔下的文字似野马脱缰，一气呵成。

然而，有谁知道，就当巴金在为《激流》中的大哥“觉新”塑像时，他的大哥李尧枚却在成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

四月十九日 下午，刚写完《做大哥的人》，就收到电报，惊悉大哥李尧枚于十八日自杀的噩耗。读完电报，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发痴一样坐了一两个钟头。也不想吃晚饭，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怒，我不肯认输。……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决定以觉新为中心结构小说，为许多屈死的冤魂，发出对封建制度的控诉。”控诉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们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接

《激流》首次
刊布于《时报》。



《时报》
刊登的连载巴
金《激流》的
广告。



罗洪。



待匆匆赶来的三哥李尧林。但是，大哥的死，增加了他对家族中的复杂关系的反感；更重要的是“激流”在胸中翻腾，他要“控诉”、要“伸冤”，他不愿意卷入家庭事务的漩涡而牵制精力，所以没有和三哥一起回成都料理大哥的后事。

四月二十日 在《时代前》杂志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巧尔里雪夫斯基论》即《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署名一切。叙述巧氏流放及著述的艰苦生活；认为他的小说《何为》即《怎么办》是“俄国青年底纲领”，“指示出真正虚无主义者应该走的道路”；他“憎恨专制”、“反对国家”。

四月三十日 在南京《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生与死》。叙述小学教员陈子渊由于自己热恋着的、投身革命的女青年被逮捕后而愁苦、绝望直至病故的悲惨故事。

四月

作《复仇集序》，载六月《创作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白云：每夜“心痛”，“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眼泪”“变成了”小说——“这是人类的痛苦的呼吁”；“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因为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

编成中篇小说集《复仇》列入《新中国文艺丛书》，八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复仇》是巴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我回国后想念法国的朋友和我在法国过的日子的时候写成的。这是我早期的作品，它们保留了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爱憎。……在我这些作品里还可以找到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物。”

在索非家初次结识文学评论家贺玉波，谈及准备筹集稿费到欧洲去旅游。巴金温和的态度、

诚恳的谈话给贺玉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友人观看在中国公开放映的第一部苏联电影《成吉思汗的后代》又名《国魂》。

五月一日 在《中学生》第十五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管墓园的老人》。小说用沉郁的笔调描绘了墓园的萧索与凄凉的氛围，刻画了管墓园老人的悲愤积郁的心理，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死亡和不可弥合的精神创伤。

五月中旬 与索非夫妇、毛一波等友人游苏州。看望友人杨人楩，并结识东吴大学学生朱雯和罗洪。以后，在朱雯成长为中国现代作家和翻译家的道路上，长他六岁的巴金成了朱雯的“良师益友”，不论在文学创作或是文学翻译上，朱雯“都得到他万分热情的指点和帮助”。

六月约中旬

得成都老家寄来的大哥的遗书，长达二十几页。遗书披露了自杀的动机：“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次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借贷而来的，要受着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二则不受时间影响。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取出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一百几十



元。做了几个月很是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谁知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 因为好几家银行倒闭。等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的根源已经化成了水。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又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如此痛苦，望从重对我之尸体加以处罚……”这遗书巴金一直珍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也随身携带，度过了战乱动荡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中迫于红卫兵抄家，忍痛付之一炬。

获悉三哥和继母料理完大哥的后事，为了维护家庭的门面，倾家荡产了结了所有的债务。以后又由三哥按月寄钱回成都，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六月

在《时代前》杂志第一卷第五、第六号合刊上发表《虚无主义论·下》，署名金。下篇主要论述恐怖主义 即新虚无主义者坚信“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不得不靠着刀剑的力量”。他们抛弃“锦衣”“美食”，“读蒲鲁东、巴枯宁、马克思等人底著作”，

抱着“牺牲之决心”，“到民间去”，为的是宣传“社会主义”、“解放那般匍匐在特权阶级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云“旧虚无主义”“死灭”，“新虚无主义就如此诞生”。

与当时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学生章靳以初次见面。

到苏州一游后，又去南京拜访左兄。在成贤街结识了《文艺月刊》的编辑、散文家缪崇群。巴金和缪崇群通了半年信，两人神交已久，虽然现在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般，谈得十分融洽、投机。

七月十一日 在上海《草野》周刊第五卷第十一号上发表杂感《作家素描回音》。

七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最后的审判》，载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南京《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八期，通过“我”在“梦”中“死”而“复活”，同时在死亡的法庭上接受威严的“裁判官”“最后的审判”的情景，倾吐“我”“吃了人，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的矛盾和痛苦心情，认为：“吃人”和“被吃”，在一边是“争斗”、“倾轧”和“欺骗”，一边是“饥饿”，“死亡”和“痛苦”的世界，“我”“日也写，夜也写”，“结果我所恨的依然高踞在那些巍峨的宫殿里”，“我所爱的……只得到更多的不幸”，决心“不再拿纸笔来浪费

我的青年的生命”，而要“忠实地去生活，去受苦，拿行动来爱人，来帮助人”，“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他们的命运上面”。

七月 在《创作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短篇小说《光明》。写青年作家张望想通过作品“给人们指出一条到光明去的路”，结果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苦恼，四周“依旧是黑暗与隔膜”。作品表现了作家欲以文字匡时救世而又无济于事的矛盾、痛苦心情。

夏

应胡愈之之约，为《东方杂志》撰写连载小说。当时正巧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张晓天和巴金同住在宝光里。得知张晓天和一位江苏姑娘恋爱的故事，于是动手写中篇小说《雾》的第一章，张晓天看了很高兴。在张去南翔游玩的一星期中，巴金除了续写后改题为《家》的《激流》外，还完成了《雾》的写作。

为什么要创作《雾》？巴金如是说：“我想写这篇小说，给他指出一条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实地绘出来给他看，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但是，事与愿违。张晓天从南翔回来，读完《雾》很生气，要求巴金重写，巴金根据他的要求删改了一些地方。张晓天第二天对别人说，看了《雾》，他“找不到一线的希望和光明，……甚至想到自

杀”。巴金听后很痛苦，为了朋友，想把《雾》付之一炬。

在把《雾》付之一炬之前，巴金重读一遍原稿，认为没有错。“我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是在描写我的朋友。所以我不能够为了我的朋友烧毁我的作品。不过为着使这位朋友安心起见，我又把《雾》删改一次，把我从这位朋友那里借来的事实都还了给他。”作品仍以主人公自杀的悲剧结束，但是，巴金坚信：“在《雾》里，绝望的云雾也并不曾淹没了希望。”

《雾》删除了张晓天认为“纪实”的部分，增加了属于巴金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容，终于保存下来了。

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十至二十三号上发表《雾》。作品主要描写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周如水渴望获得张若兰的爱情，当张主动表白后，周又优柔寡断，不敢背弃父母为他选定的结发妻子，结果张另嫁他人，周亦一事无成，导致自杀的悲剧。

《雾》的创作，让巴金感到意犹未尽，萌生了写续篇的构想，这就是《爱情的三部曲》的原创构思。

八月 在《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爱的十字架》。用第一人称书信体形式，叙述一个青年在失业的困境

中与妻子先后被逼自杀的悲剧故事，揭露和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这期间，看到了一些关于《灭亡》、《死去的太阳》等创作的评论，比如惘然在评论文章中指出，读了《灭亡》，“热血沸腾”，认识到“要解放自由就要起来革命”；郦崇业的评论文章指出巴金“把握着了一时代的一般青年的心”、“创作的技巧方面”“巴金是比郭沫若高明得多”等。巴金意识到文学创作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影响，更进一步坚定了他通过文学作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的信念。

九月一日 在《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译诗《凡尔加的岩石上》 俄国民歌。

九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九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狗》。作品用新颖的构思和荒诞的手法，把“我”异化为“狗”，表现“在国内外压迫和剥削下”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悲惨生活”，揭露当时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写《狗》的起因是：一天下午，编辑来向巴金约稿，晚上，他照例到北四川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构思，走着走着，看见外国水手在人行道上发酒疯，骂中国人是“狗”。巴金激愤，反抗意识油然而生，回家后，一口气写完这

一短篇。巴金坦言：《狗》在创作上受到“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影响，在思想和艺术构思上“《狗》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狗》还是巴金文学作品中最早被译成外文的一个短篇小说。童丘 Tung Tso 英译本《狗》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中国呼声》第一卷第一期。

九月约中下旬 九一八事变后，抗战消息增多，《时报》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巴金“仍然继续写下去”。前半部是在宝光里一幢石库门二层楼房楼下客堂间里写的，因为战乱，宝光里居民大部分迁入租界，索非全家迁往提篮桥附近，房东也搬走了，宝光里十四号只有巴金一人，因此搬到二楼，《激流》后半部就是在二楼方桌上写完的。不久，在写到瑞珣死亡的时候，收到报馆来函，埋怨写得太长，已超过原先约定字数。遂回信，“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希望登完余稿，可“不取稿酬”。

九月 作书信《给一个中学青年一》，载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中学生》第二十一号“贡献给今日的青年”栏。云：“生在这个时代……没有悲观的理由”，要“在荆棘中开辟一条平坦的路”，因为“黑暗的后面便隐藏着光明”，现在要“享受”“读书的权利”，以后到中国的



“腹地”、“民间”、“农村”去，“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九月二十九日 深夜，作散文《我们》，载《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通过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恐惧和愤怒要求哥哥杀死他的描写，痛斥了日军的侵略行为，控诉“高举太阳旗的兵在抢劫，在放火，在杀人”的侵略罪行。又作诗歌《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发表。愤怒控诉“武士道的军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呼唤民众不要流泪和哭泣，而“要站起来”，“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十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好人》。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巴黎某书店老板穆东先生获得比他年轻得多的养女玛尔爱的爱情，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十月三十日 在南京《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我的眼泪》。深情地叙述接到四年前在美国监狱被害的两个革命者萨珂和凡宰特的书信集后的激动、思念、痛苦、愤怒、崇敬和振奋等感情；表明“我”在异国感到寂寞、绝望的时候，萨、凡的著作和他们为人类事业

的献身精神，使我“不再徘徊”，有了生活的“目标”和“向导”，称颂萨、凡是比卢骚“还要伟大的巨人”，代表着“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

十一月一日 在《中学生》第十九号上发表短篇小说《苏堤》。用抒情的笔调描写游西湖和苏堤的喜悦，同时表现了“我”对贫困、纯朴的船夫的同情。

十一月十一日 作短篇小说《马赛之夜》，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写两个马赛：一个是“近代化的大都市”、“绅士和夫人”，一个是“臭街”和妓院、一群群“肥胖的裸体女人”、街头一个个“做生意”的“卖春妇”，揭露“西方文明”的虚伪和阶级压迫的罪恶。

十一月二十九日 《时报》终于暂停刊登《激流》，版面载抗战消息，巴金仍续写高家的故事。

十一月 《雾》序载上海新中国书局版《雾》。郑重声明：“我写《雾》，和写以前的几部长篇一样，我用来作主人公的‘模特儿’不止是一个人，却是许多人。”十一月作《光明集》序，载十二月一日《新時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题为《奴隶的心》序。说母亲“教我爱人，祝福人”，“我”

长大后“却要来诅咒人了”，“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但“我的诅咒中同时也闪烁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

十二月二日 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奴隶的心》。通过主人公奴隶彭自叙祖孙三代奴隶的悲惨命运，控诉地主阶级的罪行；同时，又歌颂为了“去给别人谋幸福”，“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的金子般闪光的“奴隶的心”。

十二月中旬 应胡愈之之约，为《东方杂志》撰稿：“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但‘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遂作短篇小说《杨嫂》，载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一号。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和对比手法，写女仆杨嫂的勤劳、朴实、慈爱和她悲惨的命运。

十二月下旬

作短篇小说《白鸟之歌》即《天鹅之歌》，载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四号。写父女对待爱情和事业的不同态度，最后沉溺于爱情中的父亲在女儿感化下，决心放

弃爱情，为事业和“他人的幸福”奋斗到底。巴金以一个友人为模特儿。“那朋友在我过去的生涯里有过极大的影响。他答应过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人生哲学》做我们的生活的指针。”后来朋友却“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甚至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被他看见了”。“我爱护那个朋友，我不愿意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我不愿意他牺牲了过去的一切，去走个人的路，所以写了这篇小说来劝他”。但朋友仍固执己见，放弃事业，陪了太太到边远的省份做官去了。

译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作，载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七月《中学生》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号。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作《秋天里的春天 译者序》，署名译者。认为这篇小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在这个温和的悒郁的故事里，我也感到了一种反抗的心情”，指出作品悲剧的根源“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同时坚信“春天是不会灭亡的”。

十二月

应散文家缪崇群之约，为《文艺月刊》撰写完中篇小说《雨》的前三章。又在路上遇见到上海出差的朋友李少陵，遂应邀到朋友工作的地方浙江长兴煤矿去做客。第二天，同友人乘火车到杭州，经湖州转车到长兴。李在煤矿任科长，向巴金介绍矿工生活。住一周，到矿工家做客，与矿工谈话，还不顾塌方的危险，要求到一个月前发生大爆炸、死掉十五人的矿井下面，与矿工交谈数小时。矿工的苦难生活震撼他的心灵，联想到曾从自由书店的黄子方 巴金好友，曾留学日本，《雨》中的人物高志元即以他为模特儿 口中，听到过黄介绍的云南个旧锡矿矿工的生活，当地人称锡矿工人为“砂丁”，黄还讲述了不少关于“砂丁”活生生的苦难、悲惨的故事。现在亲眼目睹了矿工的悲惨处境，创作冲动难以抑制，他打算以矿工生活为题材写小说《死城》。当时，“我本想拿这题材写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样庞大的作品”。这就是中篇小说《砂丁》的构思。

作短篇小说《煤坑》，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上发表。描写矿工们在“一百多丈深的”井下的艰苦劳动，以及他们贫困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



尤利·巴基。



日军轰炸炮击上海闸北等，巴金的中篇小说《新生》毁于战火。他怀着仇恨，在“阳光焦炙的窗前”“把《新生》重写出来”。

到福建泉州、晋江、厦门等小住，并去当时颇有影响的黎明高中、平民中学访友，“深为敬佩”友人敬业的“苦行”。

陷在“造谣”、“攻击”、“捧场”等烦恼之中，一再声言：“我虽然是某一个主义的信徒，但我并不是个说教者”，作品中“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是“追求光明的呼号”。

二十九岁

一月 在《中学生》第二十一号“贡献给今日之青年”栏发表给一个不认识的青年朋友的信，针对一青年信中“苦闷、徘徊、愤怒、绝望”的心情，云“生在这世界上”应“作为一个劳动者”，“在荆棘中开辟一条平坦的路”，“在黑暗的背后便隐藏着光明”；“我们应该去走我们自己的路”，就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那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乡村”，在“负担着整个中国底生存的人民中间”，“他们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他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那就是我们的路”。又在日记中“为自己”“写下悲痛的自白”：在“黑暗、恐怖、孤独”中“度过了一年”“心痛”，“满是创痕”；但决心“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把自己的命运”“连系在群体的命运上面，在人类的繁



匡互生。

荣里看出你的前途来”，这就是“我的力量”，因此“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约一月中旬 偕一个安徽朋友到匡互生家。在匡家看到他简朴的生活，与其亲切地交谈，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兄长，“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

一月二十三日 见大批日本军舰集结上海。又见宝山路一带人们用沙袋在筑工事。

一月二十四日 《激流》停刊两个月后，复又续载。至三月十五日，因版面关系，仅登了五期，又暂停。

一月二十五日 应在南京工作的陈范予之邀赴宁，与从河南百泉中学来宁的吴克刚和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卫惠林相聚。离沪时，把宝光里的家，托在浦东中学念书的表弟高惠生照管，随身携带了中篇小说《海底梦》的开头几页稿纸坐三等车到南京。

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天通庵车站，并向江湾、吴淞等地进攻，制造了一二八

事件。日军轰炸炮击，闸北大火，商务印书馆被焚毁，巴金的中篇小说《新生》与《小说月报》社一同化为灰烬，江湾的立达学园也毁于一旦。日军开始进攻闸北的那个夜晚，他正在由沪至宁的火车上，所以很安全地给火车从丹阳载到南京了。

一月二十九日 早晨四点钟，在寒气的包围中进了下关的火车站，在各处徘徊一直到七点钟。又从警察口中得悉，在南京车站与上海北站通电话时，能听到机关枪的扫射声和难民的呼救声。“这个消息……使我热血沸腾。憎恨迷住了我的眼睛，我在心里发出了恶毒的诅咒”。天亮后，火车仍不通。只得回旅馆。

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到缪崇群处打听消息。从《新民报号外》中看到“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数”的消息。缪崇群劝他在南京多住几天，巴金没有回答，他丢不下上海的许多朋友以及住所里十多年辛苦搜集起来的书籍，他想：“在日兵用大炮轰击、用机关枪扫射、用炸弹炸毁上海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地住在南京。……如果找不到机会牺牲我的生命的话，我至少也应该回到上海去经历那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晚上，回到旅社，又见到《新民报号外》上刊载的日军烧杀的暴行，同时，又得悉喜讯：

十九路军开赴前线，士兵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市民鸣鞭炮欢迎将士出征。

一月三十日 在南京《文艺月刊》第三卷第一期起开始连载中篇小说《雨》。“《雨》是《雾》的续篇，……虽然还是以爱情作主题，但比起《雾》来这部小说里的爱情的气氛却淡得多了。……我自己更爱《雨》，因为《雨》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朋友。”

一月三十一日

早晨，接卫惠林电话，冒雨前往成贤街五十八号国立中央研究院。一见面就得知南京政府搬家的消息。遂与卫惠林一起拜访朋友，没有获得一点“报纸上不能够发表的消息”；又到中央大学，找到卫惠林的未婚妻，她行色匆匆，准备离校回家。巴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分手时，卫惠林约好晚上到旅馆看他。在路上，看见南京处于一片骚动之中，人心惶惶。在朋友处看见一位青年政治家，得意地解释这次迁都的必要性。巴金很反感，用嘲讽的口吻说：“洛阳太近了一点，最好是迁到迪化去，那里军舰开不到，飞机也要飞两天才到得了那里。那里才是安全的地方。”

晚，到缪崇群处，听到一些消息：日本兵和美国兵在虹口冲突，日军派飞机三十架向长江上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游飞来、南京增加了四艘日本军舰等。安慰缪并向缪借一笔路费。后到鼓楼一家旅社，找到从汉口来的朋友，商谈后，决定第二天到中国旅行社打听船期，搭船回上海。因回沪心切，遂和朋友又乘人力车从城北赶到城南访友，打听确实的消息。

二月一日 晨，汉口朋友来访，捎来中国旅行社没有到上海的轮船的消息。卫惠林来访，为昨晚失约事致歉，并诚恳邀请巴金与他一起到未婚妻家去住一段时间。巴金只想回上海，婉言谢绝。送走卫惠林和汉口的朋友，到城北和其他地方访友。闻上海市民联合义勇军五百余名开赴闸北前线，协助十九路军抗战。市内骚动，又未买到船票。晚十点钟才疲惫地回到旅馆。深夜，朝鲜朋友来访，同榻而眠。

二月二日 清晨，汉口朋友来访，带来南京情况紧急的信息，又闻东方图书馆和《时事新报》报馆被日军纵火焚毁的情况。继续奔走于下关车站、轮船码头之间，仍没有买到车船票。

二月三日 市面萧条，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决定“坐津浦车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我本来打算到天津去，我要找他商量家里的事情，而且我还可以从天津搭海轮到上海”。以此打算告诉朋友们，大家反对，劝他暂留南京。巴金执意要走，独自到浦

口，偶然遇见一位湖北人，告诉他有船到上海。立刻决定不去天津，与湖北人讲好价钱，随他坐小划子用人工划桨的小木船到江心换大轮船。当看到“大英国——武昌”号轮船时，“心里更不好受，又羞又气：我现在居然托庇在帝国主义的屋宇下面了”。在统舱里过了大半个白天和一晚上。船仍泊在浦口。

二月四日 清晨，南京大雪。中午仍无开船的征兆，后悔没有坐船到天津。下午两点“武昌”号终于启航。“我又过了一个焦急的夜晚，轮流受到希望和疑惧的折磨。”

二月五日 中午，“武昌”号抵吴淞口外。亲眼见被炸毁、被火烧的房屋废墟和日本飞机对吴淞炮台的轰炸。下午船驶进吴淞口，停泊在浦东。看见北面的黑烟，听着隆隆的炮声，热血沸腾：“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烧罢，让它痛快地烧罢。让它烧热我的血，烧热我的血来洒到那些屠杀者、侵略者的脸上。我不再为我的被烧毁的书本痛惜了；我也不再为那些被屠杀的人民和被烧毁的房屋痛惜了。……我知道一个大的变动快要来了。……历史上没有一次血是白白流了的。我们的血会淹没了你。我们的血会给我们带来解放。为了求得自由，没有一个人害怕流血，没有一个人害怕战争！”带

着《海底梦》的七页原稿、缪崇群送的手杖、几本《文艺月刊》和一包书，从外滩太古码头上岸。一个朋友来迎接，并问：“这时候你跑回上海来干什么”巴金说：“不是打算在必要时交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准备做一个难民，等待慈善家来收容。”闸北大火，无处安身，暂到嵩山路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在那里意外地遇见索非夫妇和他们新生的婴儿。在医院住了一宿。

二月六日 离开嵩山路索非住所，外出访友。路遇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黄子方和伍禅。获悉他们从闸北逃出后，暂借步高里五十二号客堂间存身。经商议，决定应邀搬去与他们同住。与黄子方、伍禅分手后，又找到表弟高惠生，一起前往环龙路志丰里十一号，此处系白俄开设的一家公寓，找到了从虹口战火中逃难出来的舅父陈林一家。

二月八日 出席上海作家抗日会成立大会，选举戈公振为主席。

二月十日 应索非之约，为他编辑的抗日报纸的副刊撰稿，写完散文《从南京回上海》，载七月一日上海《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记载一二八事件后在南京逗留期间的见闻和冒险重返上海的经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巴金认为这“是

一篇真实的见闻，写了不宣而战的‘一二八’事变的一些情况，虽然没有技巧，没有文采，却记下了一些值得记住的事情”。

《从南京回上海》最初是在上海文化界发行的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上连载。在这报上巴金还发表了诗歌《上海进行曲》。因为年代久远，连报纸的名称巴金也想不起来了，《上海进行曲》至今未能找到。

二月上旬 在《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上签名。在该宣言上签名的还有戈公振、丁玲、陈望道等一百二十九人。

二月中旬 接挚友卫惠林来信，认为中篇小说《雨》的前三章“阴郁气”太重，并希望巴金“多向光明方面追求”。《雨》中吴仁民是以卫惠林为模特儿的。卫惠林看完《雨》后，把《雨》中陈真当做现实生活中的巴金，误以为巴金因身体不好而绝望，遂致函劝慰。

二月下旬

与索非两次从北四川路底和虬江路绕道前往闸北。看到残垣、瓦砾、鲜血和尸体。鸿兴坊的世界语学会已经成一片焦土。“我回到了我的家，……亭子间我放书的地方，被一枚炮弹打破了，不过只毁了十几本书。除了书和家具外，什么东西都给人拿走了，却留下地板上的几堆人

粪。”巴金站在书桌前，用手轻轻地拭去桌面上的碎墙砖和尘垢。他在这张书桌上写过不少东西，《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前半部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写的。巴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像老朋友一样，默默地听着巴金发自内心的、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控诉。它曾经多少次“亲眼目睹”巴金在写作时感情的起伏变化，在它的木纹里贮满了巴金的叹息和呼号、眼泪和欢笑、痛苦和激情、爱和恨……现在，小小的书桌连同它上面的碎石尘垢成了日寇侵略暴行的见证，巴金默默地听着它们无声地叙述一二八那天炮弹呼啸，大火冲天，人群的惊叫、哀号……

巴金离开宝光里的住处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把劫后余生的书和那张小小的书桌搬出来了。

和立达学园的创办者匡互生到江湾，见立达学园屋顶都没有了，残留着一枚二百五十磅的炸弹，还看见了狗吃剩下的人腿。

约二月下旬 因负责《绿光》月刊工作，经常前往北四川路重新开设的绿光书店与郑佩刚等晤面。该书店在一二八江湾出版合作社、江湾书店等毁于炮火后，由郑佩刚等重建的，专门发行代售世界语书籍。

三月二日 十九路军与日军对峙三十三天，国民党政府不增

派援兵。后路被日军切断，只得撤退，闸北陷于火海。当晚，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绝望的呼叫。

“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诅咒，这时候我睁开眼睛做了一个梦。我决定把那个未完的短篇改写成中篇小说。”这里指《海底梦》。回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找出了《海底梦》的开头几页原稿，看来看去，“我又一次被恶毒的憎恨压倒了，……我要让血海怒吼起来把那些侵略者淹没掉”。

三月三日 开始了中篇小说《海底梦》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

“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中那个犹太女人里娜是编造出来的，故事的叙述者犹太人席瓦次巴德也是虚构的。本来我没有必要把叙述故事的人写成一个犹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想介绍一个真实的故事：犹太革命者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用手枪打死白俄将军彼得留拉。人是真的，故事是真的。小说里叙述的那些‘波格隆’罪行，都是当时在法庭上揭露出来的”。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三月上旬

与友人黄子方、伍禅将宝光里旧居的书搬到租来的汽车上，载到步高里五十二号。在宝光里十四号曾写过初名《激流》的《家》以及《雾》、《新生》等中长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在发展，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虽然不与索非住在一起了，“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

中篇小说《海底梦》，载五至七月《现代》第一卷第一至第三期，十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后改题为《海的梦》。描写岛国中的四种人：酋长、贵族、奴隶和侵入岛国的“外国人”。酋长、贵族屈从于侵略者，他们又互相勾结，压迫、剥削奴隶。作品展示奴隶惨遭杀害的情景和愤怒反抗的图画，歌颂青年英雄杨和里娜“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使这个世界”“翻转过来”，“用全体的力量来谋求大家共同的幸福”而忘我献身的精神。作品假托“童话故事”，揭露当时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的罪行，赞颂人民的抗日力量。

三月

在《中学生》第二十二号上发表杂感《几件新奇的发明》。

散文《一个回忆》，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上海《读书中学》月刊创刊号。回忆亲眼看到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虬江路、鸿兴坊等处制造的惨象，发出呼喊：“血不会白流！”

四月初 整理完《海底梦》。不久施蛰存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巴金组稿，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

四月中旬 作书信《呈献给一个人》，载五月一日《创化》月刊第一卷第一号。系为十八日大哥一周年祭写的悼念散文。写也曾有过“新的理想”的大哥，“拿‘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麻醉”了自己的头脑，“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反抗的话”，“是一个懦弱的人”；知道已“逼近深渊”，仍“向深渊走去”，三次写遗书，“又三次毁了它”，“终于写了第四次遗书”，但仍“爱我的哥哥”，决心用大哥“送给我的这管自来水笔”，“写尽我所要写的”，“它会使我时时刻刻都纪念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将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四月

写《雨》第四章。巴金把朋

友黄子方写进作品，成了《雨》中的高志元。“《雨》里面的高志元可以说是真实的人物，大部分的描写都不是虚构的，连那个绰号‘活的气象表’也是真的。”

步高里五十二号房东愿把房子顶让，让承顶者做二房东。巴金等苦于钱不凑手，只得迁出，遂搬到环龙路志丰里十一号舅父家暂住。黄子方、伍禅则另觅住所。一天接待来访的黄子方，获悉伍禅到朋友家洗澡，被法租界巡捕房当做“共产党嫌疑犯”误抓，当即与黄子方等设法奔走营救。又与陈范予一起找到立达学园创办人匡互生，经匡托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的李石曾写信证明，伍禅及其同时被捕的两位朋友，终因无罪交保获释。

在志丰里十一号住了不到一个星期，接待从泉州黎明高中到上海买蜂箱的朋友袁志伊，遂应邀同去泉州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小住。

乘“太原”轮到福建晋江访友，在船舱里继续写《雨》。

从鼓浪屿转乘汽车，傍晚冒大雨到达厦门，第二天到达晋江平明中学。该校旧址是文庙，也由侨胞捐款筹建。当时与主持教务的叶非英即“耶稣”同住一室。在短短的十天中，终于发现叶非英不似两年前的黎明中学时年轻、服装干净整齐，而是微驼

的背，凹进去的脸颊和“一头乱发”，人瘦多了，老多了！然而“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照他那种生活方式生活。……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在中学的破庙里写完《雨》第五章。据给朋友的复信写了一段按语，与《雨》第五章原稿同寄《文艺月刊》。此时友人缪崇群已离开南京《文艺月刊》编辑部。按语针对朋友认为《雨》前三章有“阴郁气”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承认“生下来就带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灭了我一生的幸福”，但认为《灭亡》、《死去的太阳》、《激流》、《复仇集》、《光明集》、《雾》、《海底梦》等作品中都有“追求光明的努力”，没有停止过“光明要到来”的呼喊，“这阴郁气也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作品的光明的希望”。并进一步指出，在被烧毁的《新生》中，已明显地认识到，“把个体的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决不会有个人的灭亡”。后来听晋江书店主人沈一叶几次讲到一女郎因婚姻不自由而发疯的故事。为了帮助这位读者，在沈一叶和另一位朋友陪同下，前往浮桥外高山村。走过那

泥泞的道路，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一个不曾会过面的患着疯病的女郎。“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我看见了我们所要看的人。……她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样。……留在那里的半点多钟的时间里我们谈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話。看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从女郎家出来，陷入痛苦之中，“我差不多要哭了……我一生里第一次懂得疯狂的意义了”。外面是南国明朗的春天，四周是生气盎然的葱绿，巴金的心却沉浸在疯姑娘生存的阴暗，那“秋天”的“和哭一样的笑”在眼前晃动，巴金突然想起黎明高中见过的情况。巴金为青年的生命发出“控诉”的激情，创作冲动在巴金心中撞击……

在晋江，由叶非英等朋友带领，前往盛产荔枝的延陵村和城南侨乡清菴村访问，去西街象峰巷参观袁志伊的养蜂场，调查当地学生、农民和军阀陈国辉的斗争事迹。

作《激流 后记》，载五月二十二日上海《时报》。云这部长篇是写“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的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高家正是一个这类家庭的典型”，“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声明不是自传，“大部分是出于虚构”，不过自己是“从和这相似的家庭出来的”，并“借了两三个我认识

的人来做模特儿”；因为作品“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所以还将“写一个社会底历史”，第二部“题名便是《群》”。

五月上旬 自晋江至厦门，游鼓浪屿后返沪。舅父陈一家已搬入环龙路花园别墅一号 现南昌路一三六弄一号，并把巴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巴金回上海，就住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 一九三三年 春天，他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约五月中旬

应约为上海综合性杂志《申报月刊》创刊号写小说。“在月刊社主管文艺栏的是黄幼雄，以前担任《东方杂志》的编辑。……他同我熟，他来组稿我一口答应。”遂决定把以前构思的《死城》写出来。但没有到过盛产锡的“锡城”云南个旧，只听黄子方讲起过那里的一些情况。“我还是决定写，决定编造故事。……我年纪轻，创作力旺盛，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写得快，一坐就是半天。”

原《小说月报》的编辑徐调孚来访。徐当时正在编辑即将复刊的《东方杂志》文艺栏，希望重写《新生》。巴金一口答应。

黄子方动身回故乡，“他在动身前两夜来看我，我们谈了些话，……这个晚上我送走了他



回到自己的房里，想起种种事情，觉得寂寞，便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劝告这位以“单纯”和“真诚”获得大家友爱的“大孩子”要少喝酒，改掉一些坏习惯，多做点实际工作，别让痛苦摧残自己的身体。第二天早晨坐火车赴杭州一游。几天后回来，收到黄子方的回信。信中表示接受劝告，并为离开了巴金这位“最了解我的人”而深感遗憾。巴金也为他信中的友情而深深感动。以后又收到黄子方从故乡寄来的信和以前在东京的两册英文版《克鲁泡特金自传》。遂在扉页上写了“子方赠我”四字，并回一封短信。

五月二十二日

《激流》在上海《时报》上连载结束。前后共二百六十四期，历时一年零一个多月。

五月在上海环龙路作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载五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三日上海《时报》。巴金曾回忆当时写作该书的情况：“我回到上海，一口气写成一部中篇小说。放下笔，吐了一口气我才感到轻松，我觉得替疯姑娘讲了话了。其实我在小说里写的并不是疯姑娘的故事……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南国的姑娘，她没有发疯，却默默地憔悴死去。”这个姑娘就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在黎明高中看见过的女学生吴。写作时她和郭安仁的爱



沈从文《虎雏》书影。

情悲剧又重现在眼前：“我把两个少女不幸的遭遇合在一起了。其实，我奋笔写作的时候，在我脑子里活动的人物形象并不止这两个。”小说写成后，苦于没有恰当的题目。“当时我翻译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刚刚在《中学生》月刊上连载完毕，我准备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我把全书重读一遍时，忽然‘灵机一动’，给我的中篇想好了一个题目：《春天里的秋天》。”《春天里的秋天》描写青年男女林和瑶初恋的纯洁热烈和爱情悲剧的忧伤悲痛，揭露酿成悲剧的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罪恶，赞美漠视

封建礼教、渴求个性自由而又盲目幼稚的少男“我”和少女郑佩容，作品氛围优美、抒情而忧郁。

作《春天里的秋天序》，载二十三日上海《时报》。记叙春天会见疯姑娘的经过，抒写作者丰富复杂的感情：“《春天里的秋天》不只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第一个拿起笔来做武器，来给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最后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来。”

短篇小说集《光明》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应南京《创作月刊》主编汪曼铎约请，前往俄国西菜社吃中

青年沈从文。



饭。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巴金答应汪曼铎，愿为《创作月刊》写稿；另外，和沈从文谈得十分融洽，“因为去法国之前读过沈从文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过他的文章”。饭后，一起到沈从文下榻的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坐了一会儿。获悉沈从文“身边有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地方出版，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在四五个月以后印出来的，是那本《虎雏》。他当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书局门口分手。他要我到青岛去玩，说是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约五月 应叶非英的嘱托，整理出两箱书，寄赠平明中学图书馆。

六月一日 在《中学生》第二十五号发表传记《克鲁泡特金的少年时代》，后改题为《克鲁泡特金的少年时代》，介绍克氏青少年时代的爱好、性格、思想的变化和初步形成等，旨在“使许多中国青年”，有“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又在《创化》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父与子——献给一个朋友》。叙述年轻的父亲怕孩子“夺走”妻子对他的爱和“夺去”他的

“精力”，对孩子产生“憎恨”感情的变态心理和行为，描写母爱的真挚、无私，隐约揭露使人“负债”、毁坏家庭“幸福生活”的旧社会。

六月

作《海底梦 序》。云：侵略者的“炮声响了”，我的“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在这血海泪海里有“中国人民的”血和泪，也有“我自己的血泪”，这血泪的海有一天怒吼起来，将“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人民将建立自己的“自由国家”。

作中篇小说《沙丁》（即《砂丁》），载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一卷第一号、第二号。描写木工徒弟升义，为了挣到三百块钱，替自己爱着的大公馆里的婢女银姐赎身，到锡矿去做工。矿主残酷的压榨和折磨使矿工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升义也悲惨地淹死在矿井里。作品是中国矿工血泪史的缩影。“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面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产生么”

作《砂丁》后，重游厦门鼓浪屿。

七月上旬 从鼓浪屿归沪，住环龙路花园别墅一号。“我坐

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的《新生》……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弹，忘了饭食，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念碑’。”写作时怀着对点燃一二八炮火的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我是一口气写完它的。……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七月中旬 作完中篇小说《新生》，载一九三三年二至六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四至第十一号。这是《灭亡》的姊妹篇。用第一人称自叙的日记体裁，着重描绘主人公李冷投身工人运动过程中的彷徨苦闷，进而“为着人民谋幸福”，不幸在罢工中被捕，勇于“牺牲”的故事。作品在描写投身工人运动的几个男女青年的同时，赞颂了集体主义和人类爱的精神。

七月十五日 作《新生 自序·二》，载九月一日《现代》第一卷第五期，题为《我底夏天》。叙述在“坟墓”和“蒸笼”一般的房间里，“忘了动，忘了吃”，重写被日军一二八炮火焚毁了时的《新生》时的艰苦情景，为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毁灭我创作的冲动，更不能毁灭我的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精力”而自豪。“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八月中旬 写完中篇小说《雨》，全稿连载在一至六月南京《文艺月刊》第三卷第一至第六期。描写一群知识青年对待现实斗争、社会矛盾、爱情生活等的不同观点和思想交锋，着重刻画富有正义感的主人公吴仁民在爱情漩涡中的苦闷、绝望直至振作、充实的心理和行动，同时也刻画了留洋回国、崇尚空谈的张小川，以及主张从事实工作、到群众中去的高志元等形象；通过这三种不同的青年形象，揭露黑暗现实，歌颂反抗专制强暴、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实际上《雨》和《雾》一样，……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恋爱小说。”

九月一日 在《现代》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罪与罚》。“它写一个普通珠宝商人所犯的‘罪’同他自己和他一家人所得到的‘罚’。这是根据一九二八年巴黎报纸上的新闻改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我把报上几天的记载剪下来拼凑在一起说明我的看法：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盲目的；‘罚’往往大于‘罪’。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却没有能够指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实：有钱有势的人犯了‘罪’却可以得到很轻的‘罚’，甚至免

于处‘罚’。这的确是一个缺点。说老实话，我缺乏生活，我了解生活不深，我也缺乏驾驭文字的能力。”

九月初

写了封信给沈从文，接着就出发赴青岛。在朋友沈从文那里做客，大约住了一星期。沈从文当时在山东大学教书，还不曾结婚，住在宿舍里面。“他把房间让给我，我晚上还可以写文章。我就借用他的书桌开始写短篇小说《爱》，也写了《砂丁》的《序》。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去樱花林中散步。”这一个星期，巴金过得很愉快，对沈从文有了进一步了解：“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下点功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沈从文有空就来找巴金，两人有话就说，无话就沉默。沈从文听说巴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很有同感。告诉巴金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的尴尬，只得在黑板上写“请等五分钟”的趣事。说完两人开心地大笑。巴金还知道沈从文在恋爱，女朋友是大家闺秀张兆和。

巴金在沈从文处看到新寄来的《现代》九月号，上面载有施

蛰存批评巴金短篇小说集《复仇》的文章，不及细看，杂志被别人拿走了。一个星期后，巴金离开青岛，去北平，沈从文给他写了两个朋友的地址，他们可以接待巴金。

九月上旬

作完短篇小说《爱》，载十一月一日《新月》第四卷第四期。叙述莫华老头由于狭隘的爱，把心爱的女人弄得伤残，又为了赎罪，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前途，服侍她到死的故事。

作《砂丁 序》，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开明书店版《砂丁》。指出《砂丁》饱含了作者的“同情”、“眼泪”、“悲哀”、“愤怒”和“绝望”，“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坚信“聪明的读者”“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起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产生”；明确表示“我仍然爱这篇小说”，“就在阴云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也“永远”“不会悲观”。

到北平，在缪崇群家住了几天。患肺病的缪崇群与新婚的妻子祖英热情地陪巴金游览北平颐和园、大三殿等。巴金在缪家开始写散文《灵魂的呼号》。在北平，巴金去看了沈从文介绍的两个朋友，一个姓程，一个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夏云。三四天后，由缪氏夫妇送上火车到天津与在南开中学任教的三哥李尧林相



青年施蛰存。

会。在天津，购到《现代》第一卷第五期，仔细读了两遍施蛰存的文章。

九月十三日 作《我的自剖——给 现代 编者的信》。针对施蛰存批评《复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和“写外国题材”“凭想象凭皮毛”创作等论点，云“每篇里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有“过去的生活”，《复仇》中的“悲哀”也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因为“青春，生命，活动，爱情”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自剖作品“阴暗”，没有给读者“指示一条出路”，但“我虽然是某一个主义的信徒，但我并不是个说教者”，不愿在结尾时“加上一些口号”，因为真实的故事常常是“很阴暗的”；声言写文章时“忘掉了自己”，许多人“借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苦痛”，这时自己“不能够自主”，总是在“艺术”和

替许多人“申诉苦痛”的“矛盾中挣扎”。

九月中旬

读两封称巴金“为第一流的作家”的“索稿信”，以及一远方陌生青年赞“我的文章写得怎样使人感动”的来信，感到“心痛”、“孤独”，渴望“真正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续作散文《灵魂的呼号》，载十一月一日上海《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五期。在天津三哥同事的一间小屋里用给知心朋友写信的形式，真实地袒露自己的灵魂。“日也写，夜也写”，是在“逼近坟墓”，虽然写作无快乐，“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又总是在“鞭打我”；“自认不是文学家”，“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对自己和别人，“永远是忠实的”，“爱我的文章”，因为其中“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

一篇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虽然“艺术是长久的”，但“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为此“甘愿舍弃艺术”，认为真正的艺术要“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为此，决心“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在暗夜里呼号”；但自己又一直处在“结束写作”和继续“陷在文学生活”里的痛苦的矛盾中，渴求人们“了解我”。

十月上旬 从天津回到上海，途中看见一个老妇因为没有车票就被赶出车厢，在扶梯边的走廊上蹲踞着，一个土匪在火车行驶的当儿跳了下去。到上海后，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从北方回来，巴金的生活就陷落在更多的造谣、利用、玩弄、攻击、捧场里面，这些侮辱伴着病把他压得不能够动弹。面对那些攻击的文章“放暗箭似地”，“拿种种的谣言来掩埋我……对于这些谣言，我并不曾发出过一声抗议，我只有苦笑，我只有呻吟”。其中有一篇化名“辣夫斯基”写的分四节的《中国长篇小说家巴金访问二》，更让巴金反感不已。辣夫斯基云：在“去年晚秋的一个上午”“访问”巴金，说巴金“身量不高，头发乱乱的，面色苍黄。嘴边有一枝纸烟”，身上穿安那其主义者常穿的“绿色天鹅绒的俄国农民穿的



高尔基装的外衣”；问用巴金笔名有无“深深的用意”，巴金让他看墙上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的今的像片；又问“写作的新计划”，巴金说“多写长篇，长长的，长长的，长到几百万字，或几千万字。……想使我的作品的长度打破全世界的小说长度的记录，作一个世界长篇小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别看我身量短小，要知道我的思想，我的热情是长，长，长极了”。又云巴金说：“我计划写一个长篇，以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的斗争的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和在FQRA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的战斗的阿根廷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生活为题材，写成大约要两千多万字……因此我想在最近的将来到西班牙和阿根廷各游历一次，并且这部小说以世界语来写。”巴金对“辣夫斯基”编造的谎言，无比愤怒，又非常蔑视，遂一笑了之。

十月中旬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译作《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作。得到样书，立即寄一本给缪崇群夫妇，希望肺病缠身的缪崇群有信心“活下去”，能“强健起来，享受生活里的幸福”，让书和友谊像“春风扇起朋友生命之烈焰”。

十月下旬 从成都大嫂处要回从前寄给大哥的全部信件和《写给母亲的信》、《鸿爪

集》、《海行杂记》等“作业”，边整理边烧毁，只留下一本“作业”，编成散文集《海行》，并作序，叙述重读这些信和散文，更加思念“大哥的悲惨的一生”的心情，决定把这本文集“献给我的在粉笔灰里度岁月的三哥，祝他永远健康，祝他永远幸福”。《海行》十二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

约十月 作短篇小说《第二的母亲》。叙述叔父的小妾用母爱温暖“我”的心，表现对心地善良、因贫穷而沦为妓女的“被践踏、被侮辱的人”的同情和对不合理制度的“诅咒”。

十一月一日 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电椅》。本篇为纪念萨珂和凡宰特被害五周年而作，系据有关资料

撰写的传记体小说，真实而动人地叙述了萨、凡的生平、思想和最后被残酷地处以电刑而英勇不屈的经过。

十一月上旬 作《雨序》，载一九三三年一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雨》。云“《雨》是《雾》的续篇……实际上《雨》和《雾》一样，而且也和将来的《雪》一样，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恋爱小说”。文中还针对作品的忧郁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贯穿他“全部作品的”是“光明和希望”。

十一月 作《抹布集序》，载《抹布》。概述创作思想和动机：用脏抹布象征被压迫者，在黑暗中发现了从抹布上放射出的“一线光芒”，“这光亮渐渐地照彻了我的心……使我看



巴金著《海行》等书影。

见了许多从前看不见的东西”。于是决定把“两篇被踏践、被侮辱的人的故事”即《杨嫂》和《第二的母亲》收入《抹布集》，并“愿意拿这管无力的笔带一点阳光到他们的坟墓上”。

十二月九日 作《我的写作生活》，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读书》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十月改题为《写作生活的回顾》。该文回顾一九二七年发表《灭亡》以来的生活、思想以及写作经验。

约十二月中旬 读谷非即胡风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的评论文章《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用现代第一卷的创作例子，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中心问题之一》。看到谷非点名批评他的《罪与罚》和《海底梦》。谷非认为“《罪与罚》的作者努力想证明法律和‘人性’的冲突，这个证明是徒劳的”，作者是“多少受了主观的歪曲”；认为《海底梦》“故事写得很冗长”，是政治上“错误”和艺术上“失败”的作品，只有“抽象的‘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的合理的东西的渴望’”，没有“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统一了感性和理智的实践情绪”，“把梦境当做了真实”。巴金虽然受了朋友的批评，但是“我对他并

无反感”，但拟作答辩文章，“说明我并非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我有自己的见解”。后来，胡风觉得对巴金没有作具体的研究，不应该那样说，加上对整篇文章不满意，以后编集子时不愿收入。

十二月下旬 得缪崇群本月二十四日信。信云巴金“身体衰竭”，劝其南游；又告之自己的小品文难卖，感谢巴金“为他出力奔走”。

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南京《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堕落的路》。以第一人称“我”在绝望中写信求救于朋友的手法，和通过“我”自述青年时代学习生活和初恋的痛苦、希望、忏悔、努力、绝望、奋斗、幻灭、求生等的内心感情，塑造了一个在几经挫折、打击后由“堕落”而不“堕落”终于决心另求“一条新路”的真实动人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到处都是“歧视、凌辱、寒冷、苦恼”的“大的世界”。

十二月 应约在《新年的梦想》总栏下发表随笔，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对凝聚着封建文化传统的艺术宝库，感到“那些线装书，那些偶像，那些庙宇，那些军阀官僚，那些古董，那些传

统……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并表示：“我不愿意我底文章被少数人珍藏鉴赏……我底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

约十二月 在台州小住期间，一次在图书馆里遇到跟随吴克刚学过法文的学生徐懋庸。徐认为巴金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巴金认为：“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表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我是有一种信仰的人，我也曾在我的作品中暗示着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写出几句标语来。”又说：“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当徐懋庸建议巴金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时，巴金回答：“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初识北京故宫里的大量“线装书”、“偶像”、“庙宇”、“古董”等“传统”，“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

认为“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将作品放入“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中衡量的批评，是不“正当”的。

应邀游厦门、泉州、晋江、南普陀、广州等地。长篇小说《家》初版。

认为克鲁泡特金是“安那其主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人，战士，学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对“天才的批评家”，“拿一个短篇来代表我的思想”，“去找寻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从而大发一通议论”，表示不满。

经章靳以介绍，结识万家宝即曹禺。

三十岁

一月一日

在《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在门槛上》。本篇是根据屠格涅夫同名散文诗改写。巴金承认“从《在门槛上》一篇里”，可以看到爱玛·高德曼的“面影”。

《在门槛上》叙述“吴”在巴黎遇到“全世界劳动阶级敬爱的革命家”意渥多和他女儿马德兰的经过，赞颂革命家后面有“广大的群众”，有为理想和信仰甘愿“牺牲自己的精神的人”，赞马德兰是美丽的、坚定的“新的革命家”；赞意渥多的女友“被那崇高的献身精神鼓舞着”，无畏地成了“在俄国受绞刑的第二个女人”，是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坚信“革命的两代人”的力量可以“摧毁黑暗”，迎来“黎明”。

一月初 应《大中国周报》编辑部之约，决定用一九三一年冬天在长兴煤矿获得的生活素材，创作中篇小说《萌芽》。巴金曾说：“《萌芽》并非全是空泛的想象，我确实充分地利用了我的一部分生活经验。”

一月九日 《萌芽》开始在《大中国周报》上连载。以后的几个月在“不安定的漂

游的生活”中，仍续写《萌芽》，有时还带着原稿跑了好几个地方，“中间分十一次，每次执笔还不到一天，写成一章便送到一家周报去发表”。

一月十日 在上海《新中华》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短篇小说《幽灵》。用荒诞手法写一个“平凡的人”死后成为幽灵的所见所闻：汽车在修马路工人的头上驶来驶去、绅士等不理睬众多受苦“幽灵”的惨叫、“幽灵”家中妻儿饿饭、“黑影子”“舐”“幽灵”流在“地上的血”等。

一月

经索非手，将旧译作《过客之花》重新校阅一遍，交开明书店出版。

作《 过客之花 译者序》。收六月开明书店版《过客之花》。云原剧本系意大利著名作家亚米契斯“晚年”的作品，虽然“亚米契斯与我的思想之间显然有一道鸿沟”，但“不能阻止我译出这个剧本”；“我之所以爱它，是因为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贫穷与不幸的图画”，认为“这是一篇可以一读的剧本”。

经过巴金在分章和内容上都作了一些改动的中篇小说《雨》，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并应书店约请，为一百册书签名后发售。此书由大学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赵家璧编

入“良友文学丛书”。该丛书欲印刷一流作家的作品，故纸张精美，并用软布面包装。第一册是鲁迅的译作《竖琴》，第三册是巴金的《雨》。

由开明书店出版中篇小说《砂丁》，书内有插图一幅《矿中的灾祸》，选自阿根廷出版的西班牙文报。

二月一日 开始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三号上连载中篇小说《新生》。巴金对责任编辑徐调孚很感激，因为徐调孚为《新生》的出版花费了不少的心血。

二月 短篇小说集《电椅》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三月一日

在《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五十多个》。此篇在沪写成。叙述因天灾、人祸和剥削制度压迫下弃家出走的一群难民在铁匠的带领下，历经艰辛谋生的故事。用象征手法，表现了黑暗统治下，人们对光明和 future 执著的追求和向往。

在《创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短刀》。

在《创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散文《童年》。文中通过对被“埋葬”在“江底彼岸山的那边”的童年和对母亲的回忆，抒发了寂寞、苦闷的情怀；又把母亲的叮咛“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帮助人”，喻作

“高悬的明灯”，使“我”“重新拿起桨，划起独木的小舟，再向着广阔的人间的海洋驶去”。

在《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杂文《我的自辩》。针对谷非《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一文中对《罪与罚》、《海底梦》的批评作了“自辩”。首先认为谷非的批评“没有恶意”，不是“攻击”，其次承认自己的作品中确实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继而指出谷非的批评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把自己的作品放入“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中加以衡量，因此“不能承认这批评就是正当的”。又云，虽然自己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我的作品的立场常常不一定就与安那其主义相合”。

春季

与从南开中学请假来上海的三哥李尧林晤面。偕三哥游杭州，然后与表弟高惠生一起送他到南京浦口车站，搭津浦车回天津。这次十天的相聚，“我们在一起没有痛痛快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少大的牺牲”。这次相聚，了解三哥“平淡而痛苦的生活的全部”，为了每月八十元的薪水，担起大哥扔下的生活重担，失去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了“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因此当朋友们劝他别再回到天津那危险的地方时，他只有带笑地说出：“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在临别前一晚，巴金曾对三哥说：“我要找一个机会把我这年轻的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我想做一件痛快的事情，甚至就毁掉我的整个生活也不顾惜。”这时巴金已下决心要“开始我的漂泊的生活”，因此送李尧林上火车时，只“松松地握了握手，淡淡地笑了笑就转身走了”。离开车站后却不肯走向江边，一直到听见火车启程的鸣笛声和车轮转动声时，“我的眼前模糊地现出了你的瘦脸，我的心隐隐地痛起来。我没有流泪，但是我的声音有些哑了”。在卫惠生的陪同下，才恍惚地离开车站。

在南京访友。从朋友处看到“他们从反抗现社会的路出发，结果却走到了拥护现社会的路上。他们自己似乎没有疑惑，也没有悔恨，却使得一些人暗中为他们痛惜”。这种痛苦的心情，使他构思了《一个女人》。

巴金返沪后，因舅父举家迁往湖北宜昌，遂离开花园别墅，迁至狄思威路麦加里二十一号 现溧阳路九六五弄二十一号 居住。结识黎烈文。“我和烈文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还在编辑《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他托人向我约稿，我寄了稿去，后来我

们就结识了。”以后往来频繁，成为挚友。

巴金从索非处听到叶圣陶和徐调孚的关照：“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四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 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散文《苦笑、呻吟与呼号——给我的哥哥》即《我的呼号——给我的哥哥》。文中记载了这次与三哥难忘的相会与离别，同时也倾诉了这两年来由于文人们“造谣、利用、攻击、捧场”给他带来的痛苦。下决心“投身到实际生活里面，在行动中去找力量”。文末对是否能“冲出重围而得到新生”尚不知道，向“惟一的哥哥”呼号，希望他能在“危险和困苦中时时记着我，给

我帮助”。

四月

从《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看到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才知道“左联”五烈士已被杀害。从五烈士英勇就义，巴金记起曾在了一本西班牙画册上的题辞：“死并不可怕，为理想死更不可怕。今天他们把我们牵到刑场去。可是明天会有无数的人尊崇地念着我们的名字。我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了理想。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

看《家》单行本校样，修改了一遍，又增补了“第三十五章最后‘分家’的几段，……一共三张稿纸”。这三张稿纸就是《家》仅存的手稿，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已赠给北京图书馆；其他手稿均给《时报》馆弄丢了。

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抹布》。

五月十一日 作《萌芽》付印题记》，收八月现代书局版《萌芽》。云：写完《萌芽》很



巴金
《萌芽》等
中篇小说书影。

高兴，但却不想多说话，因为能预料到，这小说“在那般写读后感的专家的笔下当然不能得着好的命运”。又进而指出这种批评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或一个人的说话，就当做我的思想来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做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

五月约中旬 接待广东西江乡村师范的教员陈洪有后，应邀到南方旅行。临行之前，与陈洪有去医院探望患肠癌住院的匡互生。匡已昏睡，病已沉重。巴金“不敢多看他那张带着痛苦表情的瘦脸，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轻轻地拉了一下朋友的衣袖，我们走出了医院”。

五月约十七日 晚上与陈洪有登上济南号轮船。并非喜欢名山大川，而是为了“到各个地方去看朋友们亲切的面孔，向他们说一些感激的话，和他们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间”。在轮船尾部的舱面上安放了帆布床，天下雨，把被褥都淋湿了。一个送行的朋友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他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厌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带了颤动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秘密：他的恋爱悲剧。去年里先后有两个女性追逐过他，她们愿意毫无代价地把她们的爱情给



叶非英。

他，却被他残酷地拒绝了。……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一个理想，他不能再有一点个人的感情了”。朋友的叙述引起了巴金的赞美。巴金对他说要写一本中篇小说，题名叫做《雷》。以后巴金在短篇小说《雷》里借用了这位朋友的两件事情，并在中篇小说《电》中拿那个朋友做模特儿写了方亚丹。第二天天亮，这位朋友上了岸，六点钟，济南号载着巴金向南方驶去。在济南号上有了充裕的时间，整整思索了两天。两天后，船到了厦门。

五月约二十日 自厦门坐汽车抵晋江，在叶非英的平民中学逗留了一周。看到学校有了发展，而叶非英的健康更差了。巴金就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叶非英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叶非英“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

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种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拼搏’是不够的”。同时，在晋江为朋友们在没有充足的饮食、没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分的休息的条件下，勤勤恳恳为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的精神所感动。和叶谈到刚在《东方杂志》载完的《新生》时，受到叶批评：“当面责备我的那部小说写得太软弱。……他知道我写小说只不过是浪费我的青年的生命，……我也答应有一天我是要抛弃写作生活，去做一点有用的事情的。”

五月约二十二日 在晋江一个朋友处看到以前从未晤面但却十分敬爱的朋友C即庄重，现已移居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来信，知道他已第二次离开西班牙，返回法国，过着贫苦的生活，并准备第三次再到西班牙去。C是一九三一年西班牙处于骚动状态时，到巴塞罗那去“学习革命”的。巴金从C给他的朋友们的来信中了解了“那里的生活，每一封信都会给我扇起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把我的心引到那南欧的‘诗之国土’去”。

五月约二十六日 离开晋江，重返厦门，游日光岩。一九三〇年以来巴金曾多次与朋友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游此处，“那些朋友都是我一生所最爱的人，年纪也和我差不多，是沸腾着年青人的血液的。就像怀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样，我们这一群人把为人类找幸福的船这个重担子不量力地放在肩上胡乱地忙碌过了……”这次在厦门逗留的一个雨夜，“热情开始来折磨我，……我拿起笔一面流泪一面给他们写信”，信中说自己的心还留在晋江，愿做他们脚下的“柔软脚垫”。与陈洪有谈起广州的事，加深了对于广州的憧憬。决定从香港搭小火轮去广州访朋会友。第二天，乘太原轮到香港。

五月二十七日晚抵香港，与陈洪有乘登山电车游览太平山，鸟瞰香港全景。下午坐两层电车，自先施公司至筲箕湾游览市容。晚十时，坐小火轮驶广州，在船上与陈洪有远眺香港夜景。回到舱房，声音嘈杂，只休息了三四个小时。

五月二十八日 早晨，小火轮驶进珠江，是日恰逢端午节，忽闻锣鼓声，看到龙舟竞赛的壮观场景。到达广州后，找到永汉路广告公司的朋友由其安排住宿。

五月二十九日 在《大中国周报》第二卷第十期连载完中篇小说《萌芽》。作品系据一九三一年冬在长兴煤矿的一段生活经验写成，着重描写矿工牛马般的

悲惨生活、苦难中的觉醒以及与矿主的斗争，控诉了煤矿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和勾结军队镇压工人的残暴罪行，歌颂了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战斗精神。在反映工人斗争失败结局的同时，也表现了“力量……在斗争中成长”、“胜利……慢慢地发芽”的信念。

五月下旬 在晋江结识了在黎明中学任教的陆蠡。巴金在平民中学，曾应高年级同学邀请到教室和同学们谈心，有时和同学们一起坐在大榕树下的石板条凳上交谈。有一次他曾经给同学们讲述一二八日本侵沪战争时十九路军孤军浴血苦战、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动人事迹，以及这次抗战为何失败的原因，巴金的话给青年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巴金在教室里回答同学“关于如何读书和写作的问题时”说：“要多读书，中国的、外国的书都要读，而且要读好的书。读后要好好想想，学会思考。”又说，写读书笔记、组织读书会、办墙报对练习写作都有帮助，“要多读、多想、多写；练笔、练思想。并且要走出校门，了解社会，学习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还“向同学们征询对他的作品有什么意见”。

五月

作散文《西班牙的梦》，载八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

五号。文中通过朋友到西班牙的“活动”，抒发了作者对这个“南欧的‘诗之国土’”的向往；认为能够到那里去目击着西班牙“革命的民众”“怎样和统治阶级苦斗、失败、继起、入狱以至于死亡”是一种“幸福”；也为自己尚不能实现到西班牙去的“梦”而感到惆怅。

作《克鲁泡特金全集 总序》，署名黑浪。云：“克鲁泡特金被称为安那其主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人类的最忠实的朋友，最有热情的叛逆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前进的科学家。在他一身，人，战士，学者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完全的整体。他底八十年的生涯就像一块纯洁的白玉，没有一点儿污点。所以甚至他底敌人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我们应该认识整个的克鲁泡特金”，即“一个忠实的归纳的科学家，一个前进的哲学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编印克氏全集的“目的”，“就是想把整个的克鲁泡特金介绍到中国来。一方面使青年认识他底学说底真面目，一方面给中国学术界供给一点可信赖的宝贵的材料”。

整理完旧译作《我的自传》，增加插图，易题为《自传》，九月由上海新民书店初版。此书封底注明由上海江湾出版合作社经售，新民书店出版，

翻译者巴金，编辑者黑浪，发行人铁心。卷首有黝·尼克拉的克氏剪影及题辞：“在现实的矛盾生活所充满了的黑暗的我们的的心灵中，他是惟一的明灯！为巴金先生作。黝·尼克拉于上海。”笔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偕日本巴金研究者岛田恭子女士访问巴金，巴金云：“上海江湾出版合作社负责人是郑佩刚，广东人。二十年代初曾参加陈独秀为



一九三三年五月开明书店初版本《家》，封面由莫志恒设计。

首的社会主义者同盟，郑在该同盟开办的又新印刷厂工作，出版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印刷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自由》 发行者铁心，是已故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妹夫的化名 剪影作者黝·尼克拉，原名

周尧，是一位昆虫学研究者。那时约二十岁，在中学读书，到过意大利。他会剪纸，剪得很好。”

作《 克鲁泡特金全集 第一卷序》，署名黑浪。云《自传》不仅是克氏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八六年“前半生的生活记录”，而且“是一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本书所着重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这人的周围的一切人物和社会状况。而作者本人，就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安那其主义者”。

长篇小说《家》由开明书店初版。书系三十二开本，封面为白底上浅印双钩字“激流”，正中上方有橘红色的美术体“家”字，正下方黑体竖排“巴金著”三字，十分醒目。

约五月 收到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写来的信，信中获悉这孩子的担心：“有人告诉我说，你将来会自杀，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自杀是一件愚蠢的举动。”还收到另一个女孩的来信，获悉她在信中流露出的关切：“我怜悯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实在太苦了。”阅完信，为“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纯白的心越过了那许多栅栏到我的身边”而感动。

六月初

在陈洪有担任校长的新会江门郊区簞庄乡西江乡村师范住了



陈洪有。

五天。结识了叶渠均、区巾雄夫妇和梁朝令等人，并为他们的“献身精神，真挚的友情，乐观的态度，坚强的信仰”所感动。曾想是否也能够像朋友们那样献出自己的一切，“做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小小的基石，来报答朋友们对我的爱护”。

作散文《庶务室的生活》，分上、下篇，载十月《生活》第八卷第四十二、第四十三期。文中记录了乡村师范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亲爱”、“热情和天真”的生活，并感到“乐观”，因为“从这生活里我仿佛看见了理想社会的轮廓”，“生出了大的希望”，忘却了社会里的“仇视”、“欺骗和倾轧”，愿意“粉身碎骨”“做一块改造理想社会的基石”。

六月约上旬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由朋友梁朝令、叶渠均和他的兄弟陪同，参加了叶主持的一次农民集会，形象地认识到那些单纯的农民怎样在不断的斗争中渐渐地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又经叶的夫人区巾雄介绍了几位中年农妇，称她们为“经常很勇敢地跟土豪劣绅们斗争”的勇敢的战士。

作散文《农民的集会》，载八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五号。记录了作者参加一次农民集会的实况，了解农民“和土豪劣绅斗争的情形”。

离开乡村师范前夕，参加同学们的谈心会，在同学们的一致要求下，他作了一次讲演，因方言的隔阂，由陈洪有担任翻译，旁征博引居友、司特普尼亚克、薇娜·妃格念尔等人的话，勉励学生们要“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讲演完已是深夜十一点四十八分了。

作散文《谈心会》，分上、下篇，载十月《生活》第八卷第四十五、第四十六期。文中记载了在离开广东乡村师范前夕和该校学生谈心的内容：以英国古卜尔、俄国的司特普尼亚克和薇娜·妃格念尔的言行为榜样，阐明了自己的生活信条：“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帮助那需要爱

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傍晚，在同学们的热烈欢送中，巴金由陈洪有送上小船，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访问，心里有点“难过和惆怅”。这次旅行，巴金从朋友们那里得到“帮助”和鼓励：“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末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作散文《别》，载十月《生活》第八卷第四十七期。文中记叙了一个月夜，告别乡村师范的学生和朋友回广州时的情景，表达了作者的依恋、惜别和惆怅之情。

坐新宁铁路从会城到公益探望朋友。在潭江火车停下来，看到铁路边工人劳动时昂首自如的神情，深受感动，引起巴金诗情的联想。

六月十日 作散文《机械的诗》即《机器的诗》，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三号，记载在火车横渡潭江时看到工人操纵机器、指挥渡船的情景，“心里发生了对于这些工人的钦慕”，联想到学生时代的克鲁泡特金对机械的赞美，仿佛也“读了一首真的诗”，感到一种“散布生命”的“愉悦”；又作散文《朋友》，载八月一日《文学》第一

卷第二号。文中叙述了朋友们诚挚的“友情”，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在感到“温暖”和“幸福”的同时，抒发了对朋友们所赠与的“友爱”、“帮助”和“鼓励”的感激之情。

六月约中旬 重返广州，住在机器工会三楼面临珠江的房间，喜欢用望远镜观看珠江的景色、风物。

六月十五日 作散文《捐税的故事》，载《文学》第一卷第二号。文中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反映了“贫民”在名目繁多的捐税中“维持最卑贱的生存也不可能了”，但相信“这情形是不能够长久继续下去的”。相信“将来”不是“那一群贫民被压成肉饼”，就是“站起来，抛开桌面，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情”。

六月十七日 作散文《鸟的天堂》，载《文学》第一卷第二号。文中描绘了那“展示”出“全部生命力”的“美丽的南国”的榕树，描绘了南国初夏的早晨“到处是鸟声”、“鸟影”的“鸟的天堂”的胜景，抒发了作者愉悦的心情。

六月十八日 与中山大学教授朱洗等几个搞自然科学的朋友在西关一家大酒店欢晤。席间第一次目睹“在公开的场所把女人当一件商品来招揽主顾，展示给

人们看，当面讲价钱”。晚，作散文《一千三百元》，载《文学》第一卷第二号。文中虽然“感激”朋友们为自己提供“写小说的材料”，在茶楼目睹一些“被人们当作生物来卖”的女人，但心里却“没有一点快乐”，只有“愤怒”。

六月三十日 作短篇小说《还乡》，载《现代》第三卷第五期。小说通过唐敬返回离开六年的故乡，看到家乡的农民在哥哥唐义的领导下，与勾结衙门、制造假选举票而谋取乡长职位的土豪劣绅唐锡藩所展开的斗争，反映了农民的觉醒和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塑造了农民运动领导者唐义勇敢、顽强、宁死不屈的形象。

六月

到珠江北岸太平路新亚酒店访朋友郑，郑原来也是一个有“献身热诚”的青年，以后在新亚酒店当了账房，用“三十元毫洋的月薪”“来养活他一家”。晚上，郑约巴金和另一朋友坐船夜游珠江。巴金他们坐的船，行进在由许多船连接而成的水上“街市”中，亲眼见“街市”中有“傅粉的年轻女子”被“男子”或“老头儿”搂抱着。最后看见一条“灯烛辉煌”，站着警察，挂着“×××××捐征收处”招牌的大船。深夜携带郑推荐的法国福耳著、伍光健译的

《拿破仑传》回到住所。

作散文《鬼棚尾》，载《生活》第八卷第三十六期。文中记录了与朋友郑等夜游珠江时的所见所闻。揭露了有钱人寻欢作乐的社会现实，抨击了国民党公开收“花捐”的“德政”，蔑视那些“靠着女人的皮肉吃饭”的统治阶级。

为了搜集创作素材，由朋友陪同，前往珠江南岸一家较大的赌场，观看了各式人等在“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为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禁赌，还“每月要抽去一百数十万的赌税”从而使赌博公开化，形成“广东人爱赌博的那种豪气”而感到愤懑。

从朋友处获悉广州粤剧名伶薛觉先十年前为《春雷》月刊捐赠二十元大洋，赞成过社会革命。决定与朋友一起前往珠海戏院，观看薛觉先主演的《华丽缘》第二本。然而，所谓“缘”只是皇帝、妃子、大臣、武将、小姐、公子在舞台上整整闹了好几个钟头。剧终时，大失所望：“心是寂寞的，许多忧郁的思想包围着我。眼前是一片阴暗，没有光明，没有前途。所有的只是一些鬼影。”悲愤地感到“我们的民族的前途”“需要忘掉一切，以一种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迈进。这是我们惟一的出路”，然而现实却是统治者“拿种种古董来抓住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永

远陷在奴隶的深渊”；于是“一种强烈的憎恨在我的心灵燃烧起来，我诅咒中国的一切旧戏，我诅咒中国的一切旧的遗产。我诅咒整个的东方文化”。深夜回到住处，与朋友谈到薛觉先，感到无言的悲哀，因为“薛觉先十四五岁就参加了社会运动，他抱了改良戏剧的决心去演戏，结果却是戏剧改良了他”。

作散文《薛觉先》，载九月三至四日《申报》副刊《自由谈》。文中记叙了观看薛觉先演出全过程中，由“奇怪”到“沉重”、“寂寞”、“绝望”和“悲愤”的心情变化，认为“薛觉先和别的戏子一样，不过是旧时代的一个鬼影罢了”，“广东戏和平剧以及一切的中国戏”一样，“都是尽量把在旧时代的毒汁注射进民众的身体里”；继而抨击了一切旧文化，指出《四库全书》、故宫里的古董“都是统治阶级的宝物”，是“向新路上挣扎的民族的脑里留下的阴影”。

作散文《海珠桥》，载《生活》第八卷第三十四期。文中描绘了连接珠江北岸和南岸“两个不同的世界”的“新建的”海珠桥，抒发了“被一种创造的愉悦占有了”的情怀。

作散文《长堤之夜》，后易题为《长堤》，载《生活》第三卷第三十七期。文中描绘了“静



静的珠江”和“躺在珠江旁的”“长堤”的夜景。

与朋友到珠江北岸的茶楼饮茶，体验广州人每天总有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茶馆里面的风俗民情。正值两个女伶在唱戏，被响得太厉害的锣声吵得心烦，匆忙地吃了两碗面就离开了。

应朱洗约请，经常出入中山大学，看到听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大学生为赚钱大办补习班，大部分的广州报纸靠类似上海所谓“报屁股”的文章吸引读者；电车公司因捐税太重，铺设了车轨，却不愿通车；“广州逃不掉外国势力的压迫”。

遇一商界朋友，交谈后获悉捐税那么重，“大家都咬紧牙关”度过这“不景气”的一年，广州的“市面繁荣”是“表面的”。

巴金曾独自一人到永汉路一家茶楼饮晚茶，见许多“打扮得十分漂亮的”男女进出于对面“灯烛辉煌的饮冰室”，联想到商界朋友的谈话，觉得广州和别的都市一样，“是一个谜”，有时“被外表迷了眼睛”，“不能够判断了”。

应《中学生》杂志约请，为该刊《地方印象记》专栏整理、撰写在广州的印象。

作散文《广州》，后易题为《广州二月记》，署名马琴。载《中学生》第四十三号。记载了

两个月来在广州的所见所闻所感，认为广州是一个阳光常照的温暖都市，假如我们爱春天爱太阳，广州还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

出版译作话剧《过客之花》，意大利E. 亚米契斯著，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七月一日

在南京《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五篇散文。《海上》记叙了乘济南号在海上行驶时的思绪，通过朋友为了“理想弃绝幸福弃绝爱情的事实”，抒发了为“巨大的生活的斗争”，为“我们的事业”所怀有的“热情”。《南国的梦》回忆了与那些“所敬爱的”人相处一周的情景，抒发了对“献身于”“教育理想”、给“贫家孩子”尝到“一点人间温暖”的朋友们的赞

美之情，同时，表示愿“给他们做一个柔软脚垫”，不使“他们的脚太费力”。《香港》记叙了作者在香港游览市容、登临太平山的见闻。《香港之夜》通过作者深夜远眺，勾勒了香港的夜景：“山上有灯，街市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这些灯，“在追逐”，“在眨眼”，“在说话”，“在奏着伟大的交响乐”，终于使“我”到了“忘我的境界”。

《省港小火轮》通过坐小火轮自香港抵广州的途中所见，展示了“全中国的缩影”。

在《文学》月刊创刊号发表短篇小说《一个女人》。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芸，从一个投身革命的妇女，到陷于家庭、丈夫、孩子的生活圈子不能自拔，并在生



发表巴金
《一个女人》的
《文学》创刊
号。

活的重压下，日趋平庸、消沉的故事，表现了作者的失望和痛惜的心情。

作论文《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载《中学生》第三十七号。借用从中山大学生物教授朱洗处获得的一些生物知识，针对罗广庭医生的《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书，提出不同的见解，是为达尔文辩护的文章。对罗的论点进行驳斥和讽刺，“开了个玩笑”。这一篇文稿先投寄《东方杂志》，但因笔锋犀利，点到了《东方杂志》编者身上，编辑便以“文笔太锐，致讥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误会”为理由而拒绝刊登。巴金又把退稿改寄《中学生》，又被《东方杂志》编辑托人去说，把那“文笔太锐”的处所删去了一两个，以后便没有引起误会。“不过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

七月中旬 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朱洗的实验室去，晚七时偕朱洗和陈洪有冒雨外出吃饭，碰到朱家女佣；听朱洗讲述女佣回乡亲手枪杀了作恶的地主的故事，颇为钦佩。

七月十七日 作散文《一个女佣》，载《生活》周刊第八卷第三十三期。叙述了朋友家的女佣为了替兄弟报仇，亲手枪杀了欺压百姓的地主的“真实的故事”，感到以前把女佣当做“贪财的女人”是“错误的”，并称

她“女英雄”。

七月下旬 与朱洗夫妇及其亲属游南普陀。船停泊厦门时，与两个从泉州赶来的朋友欢晤。三人坐划子游日光岩，并畅谈南国的梦想。临别，巴金托他们把剩余的旅费转赠平民中学的叶非英即“耶稣”治病。游南普陀时，曾独自一人奋力登上佛顶山巅。在海滩旁为朱洗搜集生物标本，为取得一只佛手，差点被海浪冲走，俟浪平后，再度冒险登上岩石，终于取得了佛手。后来乘小火轮到舟山，再乘船赴上海，结束了为期两月的南国之行。

八月十二日 在《生活》周刊第八卷第三十二期发表散文《扶梯边的喜剧》。文中记载了船泊厦门时亲眼见一“黑汉子”行窃的事。

八月十六日

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发表《中国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系与鲁迅、胡愈之、茅盾等一百〇五人联合签名。

从广州回上海后，获悉匡互生早已去世。后在旧作《南国的梦》中增加了一段表示对于所敬爱的人的死的“悲痛”心情。

与刚从法国归来的马宗融、罗世弥夫妇晤面，不久马氏夫妇迁居法租界拉都路敦和里二十一号即今襄阳南路三百〇六弄二十二号，巴金与他们过从甚密。

获悉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跟随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的杨振声到了北平，并与张兆和定于九月九日举行婚礼，巴金很高兴，发去贺电，祝沈从文夫妇“幸福无量”。

作散文《游了佛国》，载十一月二至五日《申报·自由谈》。文中记叙了“伴了几个朋友到普陀”，“在友谊里消耗一点我的沉闷的光阴”，抒发了游览前山、后山、佛顶山等处的“痛快”心情。

作速写《赌》，为系列散文《广州》中第六节《河南》之改作，载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记载在广州与朋友参观赌场的见闻，认为“赌”是“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上”。

作散文《在普陀》，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大众》月刊。文中记载了与朋友在普陀山海滩上，捉蟹、挖海葵、采佛手等趣事。

出版中篇小说《萌芽》，上海现代书局初版。

九月约月上旬 接缪崇群南京来信，获悉他思念“纯洁与伟大”的心灵，向往“洒脱和轻松”的生活，又流露出身患重病的悲哀。

九月约中旬

卫惠林夫妇来沪，欢聚数日后，巴金到北站为卫惠林夫妇送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行。归家途中与朋友梅谈论未来和理想：“我们的心中都刻印着一幅未来的图画，这图画上所展示的，我们相信，是人类社会进化途中所必定经过的一个阶段。然而别的人不承认，他们说我们是拿了幻想来欺骗了自己。我们不觉我们的错。那图画是洗涤不去的，当初它被刻印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那也曾费过不少的工匠的力量，也经过长久的时间。对于我们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它不断地给我们带来希望。”与梅谈着，来到四川路中国旅行社，想起日前接沈从文来信，邀请他前往北平做客。决定买当晚的车票，到北方旅行。

深夜十点多，由周索非夫妇送至车站，和梅等告别。虽然“心里都充满着离别的情绪，但我们并不曾感到悲哀”。十二点，坐三等车离开上海。第二天早晨八时抵南京。冒雨坐小火轮到浦江。中午十一时转乘津浦线离开南京。由于天雨，没有能在南京小住和访友而感“遗憾”。火车上“挂念”病中的缪崇群，心上感到“重压”，默祝他恢复健康、获得幸福。离南京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火车抵天津车站。在天津作散文《三等车中》后，坐当天晚上九点一刻的火车赴北平。在闷热的车厢中继续读日本出版的袖珍本德文斯托姆的《迟开的蔷薇》，有日语的

注释，是巴金自习德文的课本。

深夜十二时抵北平正阳门车站。巴金提了个藤包，装着一套西装、两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乘人力车到府右街达子营沈从文家。沈从文热情地把巴金安顿在自己的书房里，让巴金和新婚的妻子张兆和、九妹沈岳萌见面。

巴金住在沈从文的“一枣一槐斋”，天天能看到小院里的一棵枣树、一棵槐树。书房很小，但是非常安静，住得很舒适，适宜创作。他每日三餐到客厅吃饭，成了名副其实的“食客”。在沈从文家，他觉得十分温馨。巴金结识了经常在沈家出现的杨振声、朱自清、林徽因、梁思成、朱光潜、卞之琳、章靳以等教授、学者、作家、学生和一些文学青年。

当时，沈从文正在为“失踪”的女作家丁玲“伸张正义”，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记丁玲》。巴金对此事有深刻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欢迎，得到重视的……作者用真挚的感情讲出读者的心里话。”沈从文写《记丁玲》的事，巴金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清晰地记得：“写到结尾他有些紧张，但不愿辜负读者的期待，又关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写作通宵。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

为她的自由奔走。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巴金从沈从文身上发现“不少闪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巴金想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赵家璧所托，向沈从文组稿，建议沈从文将《记丁玲》完成后，交良友出版。沈从文欣然同意。

九月二十七至三十日 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散文《三等车中》。记载了自沪抵津途中的感受：当火车启动时，对上海产生了“一点留恋”，在“沉默”中抵达南京后，却因天雨未能访友而“遗憾”，引起对老友缪崇群的“挂念”，但随着北方平原的出现，心境也豁然开朗，发出了对北方的赞美“沉着，朴实，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掩饰，北方的景物就像北方的人，他们沉默地挑起生活的担子，坚忍地和困难战斗着直到死不发出一声叫唤。”

九月

在《中学生》杂志第三十七号发表短篇小说《父子——一件小事》，后易题为《父子》，现易题为《一件小事》。小说叙述了菜农小宝爹因卖不掉菜、又因缴不起税被警察毒打，无法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终于怀着“愤怒和悲痛”抛妻别子投海自杀的

悲惨故事，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在上海《良友》画报第七十九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玫瑰花的香》。小说的女主人公馨为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三年前从家里逃出来，然而现实生活使她感到人间太冷，加上捐税太重，不愿加重姐姐和姐夫的负担，“需要男性的热来温暖”自己，于是在象征“自由”、“爱情”的玫瑰花香气中，她大胆、热烈地与“文”结合了。经过了四天的“快乐的生活”，馨突然走了。文从她留下的纸条中获悉，她“不愿再做一个瞎子”，因为她发现“毒已经蔓延到病人的全身”，连“玫瑰花上”也“溅上了病人的浓血”，于是决定抛弃“一刻的快乐”，“去做一个医生”。馨走了，留下那束枯萎的玫瑰花“透出了淡淡的异香”。

在《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月夜》。小说叙述了在一个“没有风雨”的“美丽的月夜”，农民根生被地主唐锡藩暗杀的故事，控诉了土豪劣绅与官府勾结镇压农民的血腥罪行。

作散文《平津道上》，载《现代》第四卷第一期，记载自天津抵北平途中见闻以及读德文版斯托姆的诗集《迟开的蔷薇》引起的联想；仿佛“唤醒了另一

个世界”，在“茂盛的草原”，“一对青年爱人唱着爱之高歌骑着两匹白马向远方去了”。然而，火车中嘈杂的人声，打断了“梦幻”，发现四处“都是些受苦的黄脸”。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中篇小说《新生》。

作《给 E. G. 》即易题后的《将军集 序一》，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天津《大公报·文艺》。这是巴金读高德曼的自传《Living My Life》后，“生命之火燃起来了”，给她写的一封长信，倾诉和她别后五年的心情。决定“回到那活动的生活里去，我也要历尽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和热烈的希望”。准备到地中海畔的巴塞罗纳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巴金接受笔者访问时说：地中

海畔的巴塞罗纳是西班牙的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当时西班牙形势很好，年轻人热情高涨，想到西班牙去观察，也想能够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但是后来因故没有成行。

约九月

与从巴黎回国的好友成晤面，获悉波兰女革命家亚丽安娜的近况及其身患肺病的消息，引起对昔日旅法生活的回忆，拟构思创作以亚丽安娜革命及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在北京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章靳以处结识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万家宝即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曹禺。万家宝与章靳以是南开初中的同学，过往甚密，后与巴金结为挚友。这时与沈从文和卞之琳也有频繁交往，还结识了西方文艺评论和俄国文学的翻译家曹葆华等人。

在蔚秀园初识萧乾。看过萧



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大学的曹禺。



李健吾。
南枝提供

乾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还挺受感动。当萧乾向他请教有关创作问题时，巴金指出：应该把视野放宽，把心放宽，不要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应该更多地关怀同胞以至人类。这样，作品才更有力量。萧乾后来回忆，巴金的话，对他为人作文都有很大影响，使他从小创作“忘记大时代”的胡同中走出来，写出了《平绥道上》等富有时代气息、关心民众疾苦的好作品。萧乾发自内心地称沈从文是他的第一位师傅、巴金是他的第二位师傅。

十月一日 发表杂文《墨索里尼这个人》，载《现代》第三卷第六期。云：近来读一本关于墨索里尼的小书后“觉得非常不舒服”，在别人眼里他是“盖世英雄”，“但我才不佩服这个人，我才高兴说几句这个人的坏话”；认为墨索里尼“不是凯撒，是一个犹太”，是“怪杰”，是“善变的人”。

十月二十二日 发表短篇小说《亚丽安娜·渥柏尔格》，载天津《大公报·文艺》，描述了波兰女革命家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的生平及爱情生活。她十三岁就投身在社会运动里面，后来她所敬爱的人在华沙的绞刑台上牺牲了性命，从此浪迹天涯，为“理想”而斗争。她关闭了“爱的门”，“不要任何男子的爱情”，但又不愿放弃“享受快乐的权利”，和杭可、吴克刚、成等都有过亲密的交往。最后患了肺病，下落不明。文末抒发了作者“带了感激的眼泪”的“怀念”之情。

十月二十五日
得现代书局上海总店经理张肇庐来信和《萌芽》一书的版税清单。获悉书店二十四日被“搜查”，《萌芽》已被“中央明令查禁”，“把纸版全部缴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各出版商和杂志主编开会，提出今

后不准出版和发表“反动”书刊和文章。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保存的文物和历史资料中，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日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签发的“教字第一四五六七号密令”，该密令云：“查有现代书局出版巴金所著之××有鼓动阶级斗争……奉此，业经公安局会同捕房前往该书坊查抄纸版书本，一并销毁。除呈复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书坊一律禁售为要。”

在北平与章靳以等筹办《文学季刊》。与章靳以、郑振铎等出面在什刹海北岸“会贤堂”大饭庄聚会，宴请朱自清、周作人、杨振声、沈从文等作家。席间郑振铎讲了话，提出创办《文学季刊》，希望大家协力办好刊物。这次聚会时，与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现代戏剧家李健吾晤面，听说他是李卓吾之弟而一见如故。不久到李健吾家，拍照、欢聚，得李健吾赠长篇小说《心病》。

住在达子营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家，花几天时间匆忙地写短篇小说《雷》：“这篇小说似乎结束得太快，有许多地方都被我省略了，后来才在《电》里面补写出来。这样一来我就无意地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文学》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雷》。小说通过男主人公德为事业而“憎恶女人”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巴金摄于北平圆明园遗址。



以及女主人公慧既愿为“大事业”“牺牲一切”，又要追求“快乐”和爱情的矛盾，表现青年男女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对理想、爱情的热烈追求。

作《将军 后记》，对近来一些“天才的批评家”喜欢“拿一个短篇来代表我的思想，从而大发一通议论”的“纠缠”表示不满，并且“单为了使教授们不舒服，我就应该写小说，让他们看见斯文扫地而叹息；单为了使批评家不舒服，我就应该写短篇小说，让他们在几千字的文章里吃力地去找寻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去”。文末坚信“贤明的读者”是“公平的裁判官”，“我们作品的生存与死亡全由他们来决定”。

十二月四日 与郑振铎在北平图书馆同日本作家、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会面，并前往十三陵摄影留念。

十二月月中旬 收到沈从文转交的施蛰存从上海写的信，再次获悉中篇小说《萌芽》被禁之事。

十二月

在《文学》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父亲买新皮鞋回

来的时候》。写为理想献身的三代“父亲”，坚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鼓励幼小的孩子在“寂寞”和“痛苦”中“长大”，用曾祖、祖父和父亲的血去改造历史。

在郑振铎北大寓所小住三周。为《文学》第二卷撰稿，决定写作长篇小说《电》，打算这样结束《爱情的三部曲》，并定题为《雪》。《雪》写了几章后，又改题为《电》。在写作《电》时，巴金文思汹涌，字句从自来水笔下面流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我的激动都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整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里活动起来，他们和活人没有两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笑乐，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这篇文章，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在那三个星期里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看见那一群人，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一刻的安息。”小说写完后，巴金把前四章寄到上海环龙路 现南昌路 《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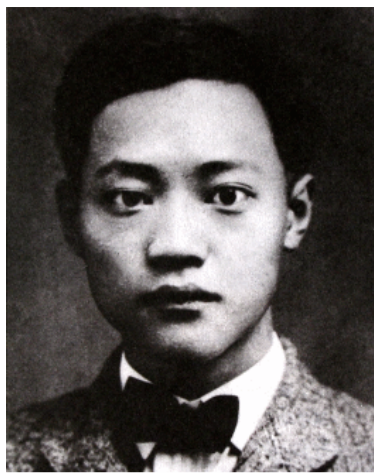
编辑部。

小说着重表现一个革命团体的幸福与快乐，以及在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的反抗斗争、失败和死亡，描写了在“漆黑的天空中”像“许多电光在闪耀”的一群革命青年，并以全部的心血、爱和理想全力塑造了“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李佩珠这一女革命家的形象。

作《旅途随笔 序》，把朋友们的爱比作“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光彩”，并将这些记载着一些见闻和一点感受的旅途随笔编成“一本值得纪念的小书”，真挚地“奉献给朋友们”。

作散文《新年试笔》，署名比金。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文中解剖了自己既“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诅咒敌人”，“攻击敌人”，又像“一个弱者”的“两重人格”。

获悉《文学》第二卷第一期稿子送印刷所时，经官方检查，中篇小说《电》被抽出；另外《新年试笔》原署名“巴金”，为免被审查官发现，傅东华遂代署“比金”。



“一口气读完”来稿《雷雨》，并“为它掉了泪”，建议发表。

声言“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我应该回到他们里面去”，不屑于和“文豪学士”“登艺术的宫殿”。

第一次结识鲁迅，感到“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善良”、“平易”，“觉得我贴近地挨到他那颗善良的心了”。

离沪赴日本横滨前，又有幸面聆鲁迅先生教诲。同时为摆脱一些误解，到“陌生的地方”“求暂时的安静”。

“真正的艺术……是在把人类联合起来”。

三十一岁

一月一日

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将军》，署名余一。写一个流亡到中国的旧俄“将军”实际上是中尉，靠妻子受“美国水兵”“蹂躏”的钱为生，内心痛苦、消沉、麻木而整天借酒浇愁的故事。

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随笔四篇，均署名余七。《批评家》，认为“单凭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一时的印象”，“这决不是批评”，批评家“应该理解艺术的基本原理，……丰富地体验生活，……充分地了解他所批评的作品的的内容”；“在中国似乎是读者比批评家更能够认识作品的价值”。《一个读者的要求》认为报刊不应记述关于作家的“捕风捉影之谈”，而应“采登”“重要的资料”，“譬若一个作者不能够用他的作品却用他的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作者就不能将自己的“文学生命继续下去”。《自白之一》，自云“在最可怕的黑暗里也不曾失掉信仰”，但却永远痛苦，因为“永远在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中挣扎，在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中挣扎”，“然而我却……努力给自己找机会要取得勇气”。《无题——一个自白》，用“我”的“影子”在“我”的心灵中对“我”整日写毫无用处的文章的批评，表现作者矛盾、痛苦的

内心，以及作者的社会观、人生观和文艺观。认为自古以来有成千上万的文章“遗留下来”，而现在人类还在“互相残杀”、“流血”、“争斗”，“黑暗、压迫”包围世界，青年受“家庭束缚”、“教育麻醉”、“社会宰割”；当人们为光明奋斗“受苦以至死亡”时，你却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隔开，在书堆里“销磨着生命”。

一月十七日 读友人萧乾写的短篇小说《邮票》，很感动，鼓励萧乾说：“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一月

中篇小说《新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以“鼓吹阶级斗争”明令查禁。

寒假期间，三哥李尧林到北平文学季刊社看巴金。与三哥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过去所想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与李尧林同往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购书，见有美国版的《沙宁》，因书价昂贵，只得买了四元钱一本的现代丛书版《沙宁》。

因著译时需要参考，常常去北平图书馆查目录屉里的卡片。但却发现找不到一本法文书目录，连左拉也只是一本德文的

《巴勒加医生》。找图书馆管理人员，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

二月十三日 作随笔《倘使龙眼花再开放时》，署名镜蓉。载四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云自己的小说《龙眼花开的时候》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历史是用血来写的”，“我把我的血托在这小说上面”。这是因为署名巴金的《电》不能公开发表，遂改题为《龙眼花开的时候》，署名欧阳镜蓉。为使读者相信欧阳镜蓉是一个生长在闽、粤一带的人，始创作这篇随笔，对审查机关起一种“烟幕弹”的作用。

二月

作短篇小说《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署名王文慧。载《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在《沉默序》中巴金介绍了当时的写作动机：“那时我正读到拉马丁书中丹东等上断头机时，罗伯斯庇尔躲在房里悲叹的一段。罗伯

斯庇尔说：‘可怜的加米，我竟不能够救他！……至于丹东，我知道他不过给我带路；然而不管是有罪无辜，我们都必须把头献给共和国……’我想抓住这心理来描写，……他爱革命，但却相信自己，不顾人民……结果他自己必然地走上了断头机……我相信抓住这题材认真来写，一定可以成功。”其时鉴于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加剧，一九三三



巴金 右
与新婚后的沈
从文夫妇在一
起。



罗伯斯庇尔 一七五八—一七九四。



年底《生活》周刊被查封，《文学》更加战战兢兢，许多好作品都不敢登了。这时巴金取材于法国历史人物的作品，如《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丹东的悲哀》、《马拉的死》，意在“将数百年前的旧事重提，既非‘替古人担忧’，亦非‘借酒浇愁’”。而《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并非在写历史，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单靠恐怖政策不能解决问题”。这时期巴金作品已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为避“留难”遂用笔名“王文慧”。

《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着重描写主人公为了获得共和国最高权力意志而疯狂实行屠杀政策时的心理状态，又以在幻觉中出现的一个个将被处死刑的人发出“打倒暴君”的呼声贯穿全篇，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权欲狂和恐怖狂的历史人物的形象。

中篇小说《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明令查禁。

约二月 带《电》第四章以后的原稿回沪。至沪才知道小说已由《文学》月刊排好两章，但清样送审时，国民党市党部却禁止发表。

三月初 受“左联”成员、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陈君治之邀，答应为《春光》杂志撰稿。该刊三月一日创刊，五月一日出至第三期却被国民党政府查禁。

三月十七日 与周作人、闻

一多和沈从文等赴《大公报》社举办的酒宴。

三月约上旬

携带着从《文学》抽回的《电》的原稿回北平，和朋友们商量了几次，决定分上、下篇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为了不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就把《电》的内容稍微删改了一下。巴金当时曾作了一个表“佩珠——慧珠 仁民——仁山 志元——志成 剑虹——剑峰 陈真——天心 亚丹——继先 影——小影 慧——一萍 敏——炳 碧——碧玉 德——宗 熊女士——洪女士”。

题目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另外加了十个小题目，作者的姓名变成了欧阳镜蓉，把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也改为“一九三二年五月于九龙寄寓”上篇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于九龙”下篇，另外在上篇和下篇前各引用《新约》和《启示录》中的话，既含蓄地表现了对国民党政府杀戮、围剿进步文化的卑劣行径表示愤怒、蔑视和嘲笑，也表现了对光明到来的渴望和追求。

三月

和章靳以忙于校对、出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排版时，因抽去季羨林一篇文章，也没有采用李长之稿，并讽刺李为“即成式评家”，李长之匿名撰稿在《晨报》责难巴金。

因散文《广州》的发表，引起一场纠纷：“文中提到了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

四月一日 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龙眼花开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上篇），署名欧阳镜蓉。巴金曾说这部小说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喜欢它”。不能认为这部小说是以爱情作主题的，也不能说是以革命作主题的，同时它又不是一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小说。“它只描写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心灵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小说中众多的青年形象，大都是“把几个朋友拼在一起”作为模特儿写成的，惟独李佩珠，“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儿’。但是我

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四月

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随笔四篇。《读书杂记——陆凡的第二部小说》，署名马琴。简述吉隆特党人陆凡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又冒险潜入巴黎偕挚爱着的妻子安全逃到瑞士，引历史家朱席勒的话评道：“爱把陆凡救了。”

《读书杂记——龚多塞的最后》，署名马琴。简述哲学家龚多塞“藏匿在卢森堡监狱旁边一个阁楼上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人类精神之进步表》”，他妻子做苦工维持丈夫和家人生活。在“为征服死”“为拯救人类”而完成著述后，龚多塞为了妻子的“安宁”而服毒，引历史家朱席勒的话评道：“对于龚多塞的死，爱也有同样的责任。”《“点戏”》，署名余五。是对攻击和“狂骂”作者《一个读者的要求》一文的反驳，认为报刊热衷于“作家消息”一类是不足取的。

《再说批评家》，署名余三。认为现在的一些“意识”批评家，正确的“说上了天”，歪曲的“骂入了地”，往往“剪头去尾”嘲讽作者。只有“铲除了那一群”批评家，中国才可能有“更好的作品”。

春假期间，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文学季刊》编辑部，与章靳以一起听旅日回来的清华大学研究生曹禺谈日本的情况，遂产生“到日本去看看”的兴趣。

同意将李健吾剧作《这不过是春天》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其间曾观看李健吾参加演出的《委曲求全》王文显编剧和《说谎记》萧伯纳著。

约四月

从章靳以积稿处看到曹禺的剧作《雷雨》，在南屋里“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但“感到一阵舒畅，……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而且“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小的精力”。又云，《雷雨》第三幕，写侍萍和四凤母女间感情的矛盾冲突，为她们之间纯真的爱而感动，另外周萍深夜来敲四凤的窗，四凤陷于精神上极度矛盾痛苦的那场戏，读时也深受感动，并自然而然地把这场戏和托尔斯泰《复活》中马丝洛娃与聂赫留道夫的那一段联系起来。虽然觉得《雷雨》中这一段“是从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脱胎出来，……在这一点作者把四凤那婢女写成了一个斯拉夫的女性。……四凤不大像一个中国婢女”。然而这些缺点，并不妨碍巴金对它的偏爱，看完后主张马上发表。据曹禺回忆：“我记得《雷雨》的稿子就是巴金亲自校对的。……巴金曾对我说过：‘《雷雨》是一部不但可以演，也可以读的作品。’”



第一卷第二期
《文学季刊》封面。



巴金对不认识的文学青年同样倾注了热情，支持他们的文学创作。他接读友人丽尼推荐的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阅后与章靳以商量，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发表。这是失业青年陈荒煤的第一篇小说，从此，年仅二十一岁的陈荒煤走向文学创作道路。

五月上旬 作短篇小说《一个人的死》即《马拉的最后》，署名王文慧。载《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发表后，巴金接朋友来信，受到鼓励，希望巴金多写几篇这类作品。巴金遂将在巴黎毁弃的原稿找出，在北平重写，稿成后寄上海《文学》月刊社。作品系据朱席勒的《大革命史》等书中的材料写成，除最末一段外全有



马拉 一七四三~一七九三。

根据。作者自云曾是一个“马拉的崇拜者”，“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出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认为“马拉爱护人民，而且他比谁都更爱人民，他是人民最忠实的友人……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得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情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陷，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愤激”。认为刺杀马拉的凶手哥代，“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心家，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事。……哥代性格很可爱，死得也勇敢”。小说着重叙述被法国民众称为“人民之友”的马拉，不幸被贵族少女哥代刺杀的故事。

六月十八日 作《我希望能不再提笔》，该文又曾先后易题为《将军集 序》、《序二》和《我与文学》，载七月上海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倾诉半年来沉默和苦闷的真实心情。“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驱逐我，要我拿起笔”，写出一些“吸吮我的血液”的文章，却遭到批评和误解。现在决定放下笔，要做一些更有用的事；声言“我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我应该回到他们里面去”，而不屑于和一些“文豪学士高视阔步地

走进文坛”、“登艺术的宫殿”。

六月

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我与文学》上发表两篇创作谈。《我是个外行人》，署名王文慧，九月改写为《沉默集 二 序》，简述应当时郑振铎、傅东华之约，为《文学》撰写《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和《一个人的死》的动机及经过。声称对于文学“我是一个外行人”。《我的中年的悲哀》，署名黄树辉。假托一中学教师和文学上尚未建树的中年作者“黄树辉”的自白，曲折而又辛辣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我因为谨守明哲保身的遗训，故不敢抓住时代的洪流描写。我未失恋，亦未打过某一位女人的主意，故不会写爱情小说。我又未进过舞场，又未曾到轮盘赌窟巡礼，故不明白都会主义。我生性愚蠢，既不知宇宙之大，又不知苍蝇之微，故不懂幽默。要之登龙乏术，投机无力。我所写的不过一些平凡人的平凡的悲哀而已。”又真实地袒露了自己苦闷的心境：“我仿佛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堡垒，妄想用来抵御时代的洪流。可是在洪流的冲击中我的堡垒禁不住动摇了。我究竟往何处去呢……”

作散文《一个车夫》，署名余一。载《太白》半月刊创刊号。赞扬一个“没有家，没有

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的十五岁的小车夫，倔强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的抗争精神。

作短篇小说《丹东》，后改题为《丹东的悲哀》，署名王文慧。载《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期。以罗伯斯庇尔上台后在全国推行恐怖屠杀政策为背景，描写



丹东 一七五九~一七九四。

丹东盲目自大、麻木、绝望直至被押上囚车的悲剧命运，塑造了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狮子”渐次厌倦革命、沉溺赌场和妓院而又傲慢、麻木的丹东的形象。

七月一日

在《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电话》，后改题为《知识阶级》，署名黄树辉。揭露和讽刺院长及一些大学

教授和大学生的虚伪、丑恶的灵魂。

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随笔两篇，均署名马琴。《读书杂记——塞西尔莲诺》，简述法国革命中二十岁的姑娘塞西尔莲诺“受了好奇心的指使”偷偷去看陆伯斯比即罗伯斯庇尔的案件里”，“判决了死刑”，“她的全家都陪着她上了断头台”。《读书杂记——两个女人》，简述两个上了断头台的革命党人的妻子的悲哀和愤怒，“一个女人的血会激起人民的心灵里的愤怒”，“暴政会跟着……倒的”。

七月

与萧乾见面，谈到创作时，巴金认为：“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又说：“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

作散文《点滴》，后易题为《生命》，署名余一。载《漫画生活》第三期。一个不认识的青年朋友在信中表示愿意跟巴金去死。巴金为此感到困惑，重新剖白了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的矛盾：“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然而……

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

从北平回到上海，同《美术生活》杂志社编辑吴朗西 原在东京上智大学学习德国文学 和伍禅 原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生物 谈起到日本去的打算：“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 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景 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做客。”

八月五日 应邀出席生活书店为《文学》月刊社举行的宴请《文学》主要撰稿人的宴会。宴会由《文学》主编郑振铎主持。同席有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八人。这是巴金第一次结识鲁迅。“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然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平易、多么容易接近的瘦小老人。我觉得我贴近地挨到他那颗善良的心了。”

八月约下旬 因处理《文学季刊》编辑、出版事务返北平。

八月

修改去年八月出版、十二月



被禁止发售的《萌芽》稿，替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改名换姓，并重写结尾，又将书名改作《煤》，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在郑振铎来沪期间，巴金介绍当时组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赵家璧与之见面，一起商谈有关事宜。当时，如赵家璧《话中国新文学大系》所说的，“《大系》的基本轮廓有了，编辑这样一套《大系》的必要性已肯定了，但如何分卷，请哪些人来担任编选，都未着落。”经商谈，郑振铎答应担任《文学论争集》的编选工作。

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将军》，署名余一，一九三七年四月四版时改署巴金。

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散文集《旅途随笔》。书店送审时，被删去《捐税的故事》、《海珠桥》、《薛觉先》、《鬼棚尾》

四篇，仅存目。

九月四日 应《太白》主编陈望道之邀，前往东亚酒店赴宴。席间与鲁迅、茅盾晤面，共商《太白》月刊事。同席十一人。

九月十六日 在《译文》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译作两篇，均为美柏克曼作。《独房》，记叙柏克曼被单独关押在牢房中的孤寂和“难堪”的生活；《记忆的客人》，记叙柏克曼借回忆往事缩短了“独房”中的时间，但却又增加了“痛苦”。

九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活》第一期上发表散文《两个孩子》，署名竟容。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因不幸的遭遇而产生的早熟的爱情悲剧。

九月

为筹备《水星》创刊和撰稿事奔波于北平与上海之间。



陈望道。

在北平，把中篇小说《龙眼花开的时候》改题为《电》，人物名字也相应作了改动，交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作《电序》。云《电》是在燕京大学“一个极舒适的”教职员宿舍蔚秀园中写成，“《电》是《雨》的续篇，写完了它，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完成了”。“事实上这三部曲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写，我用恋爱故事来表现一个人的性格。《雾》的主人公周如水是一种性格，模糊的、柔弱的；《雨》的主人公吴仁民是一种性格，粗暴的、浮躁的，但比周如水已有了进步；至于《电》里面的李佩珠的性格则可以说是近乎健全了。”

在上海作散文《知识阶级》，署名余一。载《太白》第一卷第二期。对文坛上出现的“玩玩古董，游览山水，提倡明



巴金著
《将军》等书影。

朝文章，甚至仿效明朝人生活”的尊孔读经思潮不满，通过讽刺那些“懦弱”的逃避“历史的任务”的知识阶级，着重揭露国民党政府及其帮闲的丑恶行径。

修改旧作《第二的母亲》，易题为《母亲》。“改动了一半，连题目也是新的。”

据旧作改写《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用浅显的文笔叙述了法国大革命发展的阶段。巴金“颇满意这篇文章”，云“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那三篇所谓历史小说”。

作《沉默序二》，本篇系将《我是个外行人》改作，原题《沉默集序》。辑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时，分为两部分：《沉默序》和《沉默序二》。简述写作《马拉的最后》等三篇历史小说的经过和创作动机，“不敢忘历史的教训而已”。

获悉中篇小说《煤》的出版受挫，遂当机立断，买下纸型，另改书名为《雪》，拟自费出版。

作《雪序》，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平社出版部版《雪》。说明该书“确实充分地利用了我的一部分生活经验”，“冒险”下过煤山矿窑“体验生活”。

作《雷序》，载一九三七年六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雷》。云《雷》的故事发生的

时间在《雨》和《电》之间，慧、敏、碧等几个人物在《电》和《雨》中都出现过。

十月一日

发表译作《鲁特米娜》，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署名王文慧译，载《文学》第三卷第四号，系摘自原著自传中的一章。

在《文学》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化雪的日子》。写一对彼此相爱的年轻夫妇，由于婚后不同的理想和追求造成的痛苦，以及离异后各自获得解脱的故事。

十月六日夜，赴文学社的黎烈文、傅东华等在南京饭店为他即将赴日专设的饯行宴会。鲁迅偕茅盾同往，同席八人。当时，鲁迅“很高兴。他对我谈了些日本的风俗人情，也讲了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闹过的笑话”。

十月十日

与卞之琳等共同筹备的《水星》月刊创刊，编著署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章靳以、郑振铎，具体编务由卞之琳负责。共出版两卷九期，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刊物出版后，巴金认为《水星》很好，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曾委托三哥李尧林代为推销，学生们都很喜欢看，买这个刊物的人不少。

在《水星》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作品两篇。《生之忏悔

题记》，即《生之忏悔前记》，云《生之忏悔》是“我的忏悔录”，“第一部”杂文集，“它也可以代表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因为“至今还没有脱离他们的圈子”；短篇小说《春雨》，署名余一，叙述社会生活的重压使哥哥寂寞、贫穷、死亡，“我”却在生活中像“堂吉诃德”似地冲撞、抗争；并鼓励绝望的嫂嫂“向前走”。

十月十三日 在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上发表散文《一九三〇年·双十节·上海》，曾易题为《双十节在上海》和《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叙述国民党统治下上海“国庆”之夜的见闻，说明上海是有钱人、殖民主义者的天堂，是穷人们的活地狱。

十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活》第二期上发表随笔《保护动物》，署名竟容。指出目前中国的情形是“人还没有得到什么安全的保障。到处都展现着人被虐待，人被宰割的事实”，而报纸却“喜趋时髦”大肆宣传“动物节”，这是“舍本求末”、“装饰门面”的“可笑”之举。

十月三十日晚，应吴朗西之邀，去上海梁园宴聚，同席有鲁迅、茅盾等十人。席间吴朗西代表《漫画生活》向他们约稿并征求意见。大家晤谈甚欢，鲁迅、茅盾等表示支持，巴金亦同



周作人。

意撰稿。

十月

由生活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沉默》。

因《水星》需要连载小说，作中篇小说《利娜》，署名欧阳镜蓉。载《水星》月刊第一卷第二至第五期。小说分上、下两篇。以一个俄国贵族少女利娜在监狱里写给她的波兰女友亚丽恩娜的十九封信构成全篇，以抒情诗的笔调叙述女青年利娜和男青年波利司热烈的爱情故事，歌颂因反对沙皇专制统治被捕入狱的虚无主义者波利司的斗争精神，赞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抛弃富裕家庭和个人安逸的贵族小姐利娜的献身精神。《利娜》是根据《一个虚无主义者的书信》的法文小册子改写的，原信二十六封，经巴金删改合并，缩成十九封，故事也有了一些改动。“我借用别人的文字发自己的牢骚，不是用我的嘴讲别人的话。那么文章总还是我的吧。但严格地说来，它却不是‘创作’了。”

十一月一日 在《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沉落》。作品塑造了一个口称“勿抗恶”、用古书来蚕食青年灵魂的名教授的形象，表现“我”这类的青年人对这位教授精神上的“沉

落”所表示的愤慨、蔑视和唾弃。巴金是以燃烧的热情和沸腾的血液来创作这篇小说的。他从当时国民党政府及其帮闲们提倡复古、尊孔的思潮中看到整个民族将被推向深渊、不断沉落的命运，决定用小说来攻击这种倾向和风气，“替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悲愤地叫了一声：‘少为我们造下一点孽吧！’或者更狂妄点地喊道：‘我们要活！’”《沉落》意在批评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小说写成后，一个朋友劝告巴金，怕发表后会得罪人。但巴金毅然地把文章交出去了。当另一个朋友劝巴金改用一个笔名再发表，巴金也没有听从朋友的话。

十一月五日 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散文《木匠老陈》，署名余一。记故乡成都一个安分守己的木匠老陈，勤劳、善良、能干，但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中，仍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作品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旧制度的诅咒。

十一月二十日 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杂感《论语的功劳》，署名余一。用讽刺笔调抨击了林语堂、邵洵美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半月刊《论语》提倡脱离时代和人民疾苦的小品文和复古的倾向。

十一月中旬 短篇小说《沉落》在第三卷第五期《文学》上发表后，收到北平“一个关心我的朋友”即沈从文的信，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不必写，……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巴金虽然把他视作“敬爱的畏友”，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回信中坚持认为：“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即使我没有这能力，但我确实想拿过我的笔尖做武器的……但这里所谓‘泄气’和我那朋友所说的不同。我个人并没有仇敌，……然而在这时代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 个人是随时随地都会灭亡的，可是社会却将永远地存在下去。那么对于目前的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努力，无论如何也不能闭着眼睛放它们过去了。”正如巴金在

《怀念从文》中所说：“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评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上：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早晨，乘浅间丸号轮船离沪赴日本横滨。麦加里寓所由友人索非一家居住。

十一月二十四日 到横滨。由吴朗西介绍的武田博先生及其夫人带着两个女儿即七岁的芳姑儿和五岁的喜姑儿打着“欢迎黎德瑞先生”的小旗在码头上等候。“为什么叫‘德瑞’呢 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常常听见陆孝曾经讲起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德瑞’，这个名字很普通，我改姓为‘黎’，因为‘黎’和‘李’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用别的姓，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听见别人突然一叫，可能忘了答

应。”为了应付警察的盘查，将三哥改名为“黎德麟”。这样，“黎德瑞”先生就住横滨本牧町小山上武田君家了。武田是横滨一所高等商业学校的副教授，曾到北平进修中文。武田的妹妹同巴金的一个朋友讲过短时间的恋爱。他教授中文，也需要找人帮忙。因此巴金就做了他家的客人。在武田君家，“黎德瑞”受到关心和照顾，温暖了客居异国的寂寞的心。就在这天夜里，开始作短篇小说《神——一个人写给朋友的信》，载《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一号。作品通过长谷川在难以根除的“凡心”的绝望挣扎中，借神来解除精神的痛苦，展示了在政治、社会、家庭压力下造成的“一个人一生的悲剧”。巴金为什么要创作这篇小说呢？到达横滨的当夜，在武田君家“精致的小书房”里，看着书橱中堆着“种种流行过的西洋文学名著，还有蒲鲁东、欧文、巴枯宁、拉萨尔以及日本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耳畔传来武田诵经的声音”，原来“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因隐瞒了“作家”的身份，写作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书，有人推门，立即将书盖在稿子上。就这样，用几天

时间就创作了短篇小说《神》。担心小说发表后，武田可能看到，故在开首加了这样一段话：“因了朋友L君的介绍，我最近到神户去住了九天，在回东京的前一天给L君寄发了如下的信函，并在信封上写着‘No God high or low’这一行标语似的字。”小说结尾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PK 在神户”。

十一月

在上海一家公寓里与刚从南京来上海的缪崇群相会。同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偶尔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一两篇短文的作家，巴金平日很讨厌他那油滑的面孔，坐了大约半点钟，匆匆告辞。让他高兴的是无意间花三元钱购得美国版的、有插图的大字本《沙宁》。而遗憾的是忘了要缪崇群的地址，此后一别竟二十一个月没有通信联系。

给在湖北武昌一所教会学校上中学的表妹陈宗浩写信。她是巴金舅舅的大女儿。信中告诉她关于海的感受：“可惜你从未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

作散文《海的梦》，署名余一。载十二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四期。赴日时，已下了搁笔的决心，然而刚到那儿，决心就动摇了。文中为“恹恹惶惶地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离开祖国到日本”感到“留恋、惭愧和悔恨”，但坚信还有“勇气”、“活力”和“信仰”，尽管“周围是一片黑暗”，“不久天边有一线微光开始出现”。

与到日本度蜜月的梁宗岱、沉樱相遇，从木下走到逗子车站的途中谈裴多芬、尼采、悲剧和音乐。“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抬杠，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

作散文《繁星》，署名余一。载《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一期。记述宁静的、繁星满天的夜晚，和友人D的不同感受，抒发胸中的孤独与郁闷。认为“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合理，不让人来触动它们，这就是卫道；不承认这个的人算是抗道”，感叹在中国“抗道的路也许是崎岖难行的”。但自己“离开了那崎岖的

道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求暂时的安静，在一些无用的书本里消磨光阴”，而“所要求的自由这里……也没有”，这样的生活无异就是“放逐”的生活。

作杂文《几段不恭敬的话》，署名余一。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对日本当时音乐、绘画，特别是芥川龙之介等日本文坛著名人物的一些作品，逐一进行分析评价，并与托尔斯泰、左拉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日本文学内容不外乎个人的悲欢离合、英雄侠士的超人事业，艺术上“故意雕琢刻画，在文字上玩尽了巧妙的把戏”。认为“真正的艺术……是在把人类联合起来，而不是将人类分离”，由此看“日本文学实在是无足观”。

参观日本第十五次“帝国美

术展览会”，门票一元。感到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笔致”、“景色”和“颜料的堆积”。“在罗浮宫里我认识了艺术的伟大，而在这集全国之视听的帝展中我感到艺术的渺小了”。

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巴金自传》。本书原题为《断片的回忆》，书店改名为《巴金自传》。获悉第一出版社拟出《巴金自传》，不愿写，仅作几则片断的回忆送去。《巴金自传》含《小序》及散文三篇。《最初的回忆》，文中回忆了在广元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母爱的温馨，宁静而愉快，但又耳闻目睹了犯人的哀号和勤劳善良的杨嫂的死。

《家庭的环境》，文中记载了在成都少年生活的片断，叙述了母亲、二姐、父亲和祖父的相继去



⊖ 梁宗岱。
⊖ 沉樱。

世，以及从轿夫、仆人口中获悉的另一个世界人们的痛苦、贫穷。《做大哥的人》文中记叙了大哥李尧枚“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的一生”，寄托了对“一个爱我最深的人”的哀思。

约十一月

花了一元五十钱在横滨几家古木屋里购得十几本《现代文学全集》，里面有森鸥外、岛崎藤春、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的作品，心中很高兴。然而无意间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呢 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 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读后很气愤。

得郑振铎赠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十二月一日 在《水星》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散文《吃语》。通过“我”的吃语，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作品意在表现面对黑暗现实敢于抗争的精神。

十二月十日 《漫画生活》第四期上发表散文《话语》即《话》，署名余一。抒发远离祖国和朋友的孤寂、苦闷之情，但并未泯灭对未来的希望。

十二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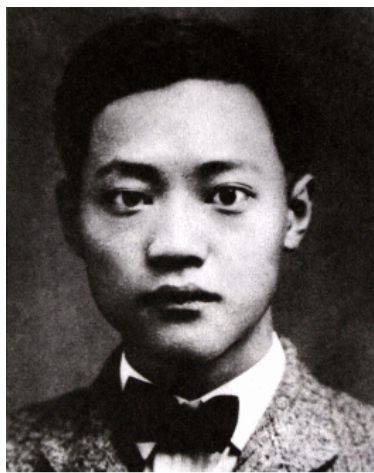
作散文《神》，署名余一。

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认为“世界上没有神的存在”，声称“我是神的敌人”，坚信“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的力量都显得比假想的神更伟大”，希望年青人更努力工作，“显出比神的更伟大的力量来”。

作童话《长生塔》，载《中学生》第五十一号。后来曾谈到《长生塔》的构思、内容和主题的提炼：“读了森鸥外的《沉默之塔》 鲁迅先生译，忽然想起胡愈之译的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我对自己说：‘写篇童话试试吧。’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高塔，只摇晃了几下，塔就崩塌下来了！”白云：“我的《长生塔》就是从爱罗先珂的两座宝塔来的。不过爱罗先珂的塔是两个互相仇视的阔少爷和阔小姐花钱建筑的，为了夸耀彼此的富裕，为了压倒对方，为了谋取个人幸福，而结果两人同时从宝塔上跌了下来，跌死了。我的童话里的长生塔是皇帝征用民工修建的，他梦想长生，可是塔刚刚修成，他登上最高的一级，整座塔就崩塌下来，他的尸首给埋在建塔的石头下面。这就是皇帝的结局。皇帝就是指蒋介石。我通过这篇童话咒骂蒋介石。我说，他的统治就像长生塔那样一定要垮下来，童话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沙上建筑的从来是立不稳

的。’”在创作《长生塔》时，武田君到小书房闲谈。巴金按惯例用手边的书遮住了桌上的稿纸。武田讲述了他对现代女作家凌叔华单相思的故事，至今还把凌叔华在报上发表的写给外国读者的信珍藏着，并说神告诉他，中国女人还在想念他。巴金也间或教武田学习中文。但日本的所谓“支那语”权威宫越健太郎、杉武夫、清水元助编的教材中，词汇陈旧，多用前清时代常用词和满洲土话，内容反动，宣传“共存共荣”、“爱满洲国”思想，甚至直录伪满的政府组织法、外交部宣言，感到：“读这样的书，说这样的话，这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好几次对武田说这书编得不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杂感《关于翻译》，署名余一。赞扬《译文》月刊几个负责人的严肃的忠实的态度。“我希望它能够在这恶草丛生的翻译界中撒播一点新的花种”，并针对王了一即王力在翻译左拉作品中的谬误和粗率的文风进行了批评，重申“翻译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认为“奴在心者”的文人的“鬼脸”，
终将被青年识破。

回忆当年《新青年》、克鲁泡特金的
《告少年》等对他思想的明显影响，重申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

在东京，被日本警方无辜拘留一夜。

有感《文学季刊》停刊，云其原因是
“文体操纵在商人手里……在文坛上活动的
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人文”。

三十二岁

一月五日 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
八期上发表短论《几段不恭敬的话》，署名
余一。针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中国“政
治、经济、艺术……全都堕落了”的论点，
援引日本音乐、绘画、文学等诸方面材料，
论证现代日本的艺术“已经堕落到了怎样可
惊异的程度”。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巴金
就对芥川龙之介的观点十分反感，到现在
“气还未消”，再加上当时中国人在日本经
常受到歧视，更增加了他心中的不痛快，于
是写了这篇短论，用以“泄气”。



巴金摄于日本横滨。

一月十日 在《水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散文《过年》。感叹时光流逝人渐
老，“白白浪费”了光阴，但仍愿带着“创伤的心……去走险途”，与时代青年一起
“爱那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

一九三五年一月
巴金 后左一 与朋友
摄于日本横滨。



一月二十日 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发表漫谈《支那语》，署名余一。对“号称支那语界的三权威”宫越健太郎、杉武夫、清水元助编的“支那语教科书”，仍然“装满了满清的老话”、“土话”和伪满政府外交部宣言、满洲报纸的时评等表示不满和愤慨。

一月 自费出版中篇小说《雪》。假托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其实是委托上海生活书店在国内秘密发售。该书总共印了“不过千册”，“售出的一部分算是第一版，未卖完的由我收回，换了封面和版权页，改装为‘新时代小说丛刊’精装本，这是第二版”。

约一月 与到日本购买中学生用的动植物图谱的友人伍禅见面。

二月一日 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发表散文、随笔各一篇。散文《沉落》，从一九

三四年创作短篇小说《沉落》发表前后引起的反响谈起，说明创作动机是为了攻击“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要“做一点事情，来拯救这个在‘沉落’中挣扎的民族”。随笔《书》，从在上海和北平买书和借书的不愉快事情引起联想，对书店的衙门作风和北平图书馆在中国“生死关头”花重金购买《金瓶梅词话》，“缺乏”“一般人需要的书籍”的现状提出批评。《沉落》和《书》发表时总题为《点滴》。

二月初 晚，已就寝。武田推门进来，说屋子里有鬼，他来念经，把鬼赶走。感到好笑又不便阻止，只得埋下头，让他煞有介事地在头上比划着念了一通经，等他离去后，才安然入睡，但是已下决心离开武田家。后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的宿舍预定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是我受

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里赶了出去的。”

二月三日 作完短篇小说《鬼——一个人的自述》，载《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期。《鬼》是《神》的补充。曾与武田君一起到海边抛掷供物，见他在路上向“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膜拜加上深夜念经驱鬼的事，觉得他“可怜”、“愚蠢”，遂创作了《鬼》。通过一个极普通的爱情故事，塑造了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屈服于命运，妄想从鬼的世界中去寻求公道、找到精神慰藉的日本知识分子堀口君的形象。《鬼》中的堀口君和《神》中的长谷川君属于同一类型，然而“《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后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觉醒”。

二月上旬 把《鬼》手稿寄上海《文学》助理编辑黄源，在第一页上写下了“神——鬼——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人”，此时，已经有了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的构思。

二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活》第六期上发表散文《梦》即《木乃伊》，叙述梦见一个曾是将军、高僧的木乃伊“几千年”“走遍天下”“追寻”“所爱的女人，哀求她给他一个灵魂”的故事，但“她还是一个活人”，没有将“灵魂”给他。木乃伊没有灵魂就不能生存，终于“成了一堆白骨”。

二月下旬 编《点滴》，寄上海开明书店。第二天离开横滨，武田博曾恳切地挽留。虽然巴金不想再在他家与“神、鬼和平共处”，但是却铭记着这位信仰不同、国籍不同的朋友的深情，珍藏着和他们全家的合影到达东京。在东京，住神田区的中华留日青年会宿舍，独居一室，在楼下食堂吃饭，生活颇有规律，也交了一些朋友。每天三顿饭饭后坚持散步，到附近的几家西文书店购置了不少旧书。白天听陈文澜讲日语，教材是本岛木健作的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晚上专心看书或写作。“读书的时间很多，在这时期读过二三十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述，觉得自己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并没有错。”除此之外，还观看杜宣、吴天在楼下大礼堂内排演曹禺的《雷雨》。不久，获悉经在日本

商科大学学习的郑振铎的安排，《雷雨》将在该校新建的一桥讲堂作首场演出，遂欣然前往。当戏演到第三幕时，日本警方借故已超过晚上十一点，违反了日本警察法，戏被强制停演。

二月

作散文《雨》，后易题为《点滴 序》，载《水星》月刊第二卷第一期。记叙离开横滨前夕，因风雨交加引起的寂寞之情，并把在排遣寂寞中写的十几篇杂文、散文和在上海、北平写下的几篇补白结集为散文集《点滴》，“这小书是我三个月来的一点一滴的血”。

卞之琳特约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奇的《维多利亚女皇传》，从京都到东京访巴金，结识在早稻田读书的广东朋友和两位福建朋友袁国钦和叶。和袁曾在晋江见过面，格外亲切。通过袁和叶又结识了两位四川籍女学生。

作《沉落 题记》，即《沉落集 序》，载三月十日《水星》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简述本集创作主旨：“是以对于‘勿抗恶’的攻击开始的。……是在同样愤慨的感情下写出来的。……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也没有宽容。……里面却跳动着—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心。……为了这生存，我们要踏过一切腐朽了的死骸和将腐臭的

活尸走向那光明的世界去。”

作《草原故事 小引》，据一九三一年二月同题文章略作修改写成，载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草原故事》。《草原故事》，高尔基作，巴金译。

三月五日 与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丰子恺、老舍等二百人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载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

三月十日 在《水星》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散文和随笔各一篇。散文《月夜》，在异国的月夜追怀在厦门、晋江月夜和朋友们相聚的“幸福的日子”，但“没有伤感”，对未来充满自信：“我看见了新的巨灵像背负地球的阿特拉斯那样在空中立着。……他会来完成我们所不能完成的一切！”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被罚用双肩或双手和头支撑天空。随笔《雪》多用曲笔，从接到托辞在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的《雪》又名《萌芽》和《煤》写起，由书名《雪》巧妙地写到“窗外白茫茫的雪”，又用大自然雪的消融，暗示反动派的灭亡，用“窗内的雪”象征真理和人民。

三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

活》第七期上发表三篇杂感。

《蓝天使》署名余一。就日本教授借《蓝天使》（系德国据亨利·曼原作改编的电影）被改作舞台剧在东京歌舞伎座上演制造事端，讽刺和揭露了日本教授们的“没见识”。《直言》，署名余一。讽刺国内那些“靠着‘历史’吃饭，但同时又出卖‘历史’”的文人，指出他们从前“提倡新的什么，反对旧的什么”，骗取青年的信仰而成为名流，现在却又变成“拥护旧的什么，反对新的什么”以取宠于统治阶级而自鸣得意，认为这是“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并“直言”警告：社会在变化，他们的“鬼脸”将出现在“未来青年们的眼里”。《河马》，署名余一。全文分三小节，从未见河马而崇拜到见后“偶像”“幻灭”写起，痛斥某报副刊上恭维希特勒的文章，并愤怒指出希特勒“摧残科学、践踏文化”，是“断送德国”的“狂人”，同时对鹤见祐辅在东京中华留日青年会“空泛”、“浅薄”的讲演加以讽刺。

三月

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被国民党加以“普罗意识”罪名明令查禁。

见武田代女儿写的寄守卫满洲皇军的慰问信稿，信中鼓励日军为“保卫满洲人民”、“占领

满洲”、赶走中国“马贼”而战，并称溥仪为“真命天子”。巴金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儿童，对青年，对正直、善良、勇敢、勤劳的日本人民的欺骗。加上“当时日本的报纸天天骂中国，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我实在气不过，写了一篇短文 题目是《日本的报纸》 回敬了几句”。这篇用事实“证明他们无中生有”的短文，寄到国内，已经排好，却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抽去了。

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中篇小说《电》。

约三月

作散文《小小的经验》，叙述在成都办《半月》、《警群》和《平民之声》杂志时，巧与当局周旋，使刊物既能出版，又能揭露对手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丑行的经过。作此文的目的：“是故意写给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图书杂志审查会的老爷们看的。”

接上海吴朗西来信，获悉吴与郭安仁、伍禅、柳静筹办出版《文化生活丛刊》，表示赞同，并同意出任该丛刊主编。据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回忆：“我写信给在日本的老友巴金，把我们要办书店，出版一套《文化生活丛刊》的计划告诉他，向他索稿，并十分盼望他回国来主持编辑工作，他同意了。

……巴金这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有名作家，他有搞编辑工作的经验，他做事认真、负责。有他来挑这个重担，我对我们的事业前途是更加有信心了。”不久动手翻译柏克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列为《文化生活丛刊》第四种；整理和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列为《文化生活丛刊》第五种。

前往东京郊外千岁村船桥，访问日本作家和社会学者石川三四郎及其养女望月百合子。

作散文《信仰与活动》，载《水星》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后与《小小的经验》合并，易题为《觉醒与活动》，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北大学生周刊》等杂志传播的思潮，引起他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带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并且“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我去走解放的路”，同时热烈而鲜明地叙述了高德曼的文章、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夜未央》对他思想的明显影响：高德曼“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从“《夜未央》里……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



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我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文末重申：“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四月初 在中国留日学生青年会宿舍里，发现几个经常出入的日本“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类。巴金觉得奇怪，于是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

四月五日 清晨，在青年会宿舍里接待匆匆赶来的和福建朋友同住的四川籍女学生，得悉友人叶和袁在半夜被抓，牛达区警察署和“刑事”们蛮横抄家，警觉到这件事有背景。遂想起，四月七日所谓伪满洲国皇帝要到东京访问，这几天“日本报纸开始为这场傀儡戏的上演大肆宣传，制造舆论，首先大骂中国人”。感到一场政治上的“大扫除”要开始了。于是整理信件、书籍，烧去了袁寄来的信，“把我在日本编造的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好好理一下，……我也回忆了梁宗岱夫妇的事和卞之琳到东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们问起我全可以老实地讲出来，用不着害怕”。上午到银行取了钱，饭后仍和平时一样，逛西文旧书店。吃晚饭时看见两个“刑事”在楼梯上徘徊，估计晚上要出

事。晚十点多钟，再次清理了一些东西后，上床睡觉。

四月六日 凌晨，五个穿西装的人破门而入，蛮横搜查，巴金因愤怒而变得有些麻木，被带到了神田区警察署。从被审讯中了解到梁宗岱家也被搜查过了。警方找不到巴金的破绽，“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的拘留所去”。在拘留所的囚室里已有七个“犯人”，巴金的代号是“七十八号”。一生中从没像此刻感到自由的可贵；同时，心里充满了愤怒、绝望和寂寞。下午四点左右，被释放。但在“东京住下去的兴趣也不大了。我总感到人权没有保障”。

四月十日 作书信《关于翻译——答王了一》，署名余一。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云：到法国学习法文仅两三月就翻译左拉小说的王了一之译作错误“不知道有多少”，希望他自己收回全部译作，“请人仔细校改一次”。

四月十二日 被关押一周的福建朋友叶放了出来。始知叶、袁在晋江结识的经过，这次分别被警事厅审问记录过，幸好两人都说是一位姓陈的朋友介绍，才免去了不少麻烦。

四月十六日 发表译作《地牢里生长的爱的花》，美柏克曼

作，载《译文》第二卷第二期。

四月十八日 译《片断的回忆》，美柏克曼作，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又作《片断的回忆 译后记》，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云：“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假若有机会我倒想译出十部自传来”，除克鲁泡特金和柏克曼自传已译出外，“还想译沙文考夫路卜询、高德曼即爱玛、妃格念尔、梅晓若、盖尔书尼、加乔夫斯加亚、勒弗郎塞、格拉佛八个人的自传或狱中记”。

四月约十九日 获悉被关押半月的福建朋友袁获释，袁要求马上回国，引起日本当局怀疑，终被“驱逐出境”。

四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活》第八期发表杂感《图书馆》。从北平图书馆对读者的“官僚”态度，以及宁可花巨款珍藏《金瓶梅》，而不重视保存完整的《新青年》、《新潮》的事实，指出北平图书馆“只是一个点缀文化城的古董”，因为“它忘记了读者大众”。

四月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散文集《点滴》。

译《告青年》，俄克鲁泡特金作，系克氏《一个反抗者的话》之一章。该书列为社会问题小丛书第一种，一九三七年十月

美国旧金山司塔克顿街平社出版部出版。译者认为：“这是每一个青年应该宝爱的小书。不知道有若干人为它流下了感激之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从它那里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里面没有一点……欺骗。这样的一本小书曾经震动过全欧美的良心。”又说：“我们捧着这一册《告青年》，怀着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同情的眼泪，大步向着现实生活走去。”

作《献给读者》，载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一九三七年十月版《告青年》。

写信把六日发生的事告诉武田博。不久收到回信，欢迎巴金回到他家去。巴金感谢主人友情，但没有再去武田家。

作杂感《东京狱中一日记》，即短篇小说《人》的前身，记载在东京被搜查和拘留的全过程，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愤懑之情。写成后寄上海《文学》。

五月初 作杂感《文人》。文末云“文人的一管笔”能歪曲事实，“所以权力阶级豢养文人来做工具，给他们歌功颂德”；现在，“还有一些青年真正相信文人如何高尚，还伸起脖子老等着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来救拔我们这个快沉落在深渊里的民族呢”。

约五月初 观看由杜宣、吴

天排演的在东京首场演出的话剧《雷雨》。剧场内部分观众哄笑，巴金很气愤。幕休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自命为话剧专家的中国学生说：“这剧本简直不合戏剧原理。”巴金回答道：“作者从事话剧运动也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我知道他写这剧本就花了三年以上的功夫。”对方嘲讽地说“以前没有听说过曹禺这个名字”，并轻蔑地称剧作者“是一个演文明戏的戏子”时，巴金气愤之极：“我这时候真想给他一记耳光！我不再理他了。我和他说话是我的一种耻辱。”

五月十六日 在《译文》第二卷第三期上发表译作《性的渴望》，美柏克曼作。柏克曼记叙自己在狱中由大墙外少女甜美的歌声，唤起“灵魂深处”的回忆，表现了强烈的性的渴望即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以及精神上的痛苦。

五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活》第九期上发表《雷雨 在东京》，署名余一。记录了在东京观看《雷雨》首演时的感受，表示了对一些无知者愤懑的心情。

五月

译散文诗《门槛》，俄屠格涅夫作，载《中学生》第五十六号。译者附介绍：“这是屠格涅夫晚年的散文诗中的一首”，颂扬了当时为数不少的苏菲亚·柏

洛夫斯加亚型的俄罗斯女性的革命精神。几年前收入美国出版的《革命诗选》中，译题为《革命者》。“该诗在一八八三年圣彼得堡秘密发行，是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民意社的刊物上发表的”。

作散文《在门槛上·回忆录之一》，后易题为《“在门槛上”》，载《水星》第二卷第三期。简述为俄罗斯女杰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等作传和阅读克鲁泡特金、斯特普尼克、高德曼、屠格涅夫等关于俄罗斯女人的著作的感受，深为“点起了解放运动圣火”的“俄罗斯女性”的献身精神所感动，赞那些关于俄罗斯女性的传记等，“不是古董”，而是“用活人的血写成的”，自云“喜欢它们”，有“爱读别人不读的书”的“怪脾气”。

获悉《东京狱中一日记》因《新生》事件被编辑部抽回，遂稍加修改，添上一点伪装，改名《一日记》，准备在北平《水星》月刊上发表。

所谓“《新生》事件”是指：《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刊有易水即艾寒松作《闲话皇帝》一文，内容涉及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迫使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干预，查封《新生》周刊，逮捕主编杜重远，撤换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六月十六日 发表书信《再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答王了一先生的“附记”。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再答王了一先生》之末，署名余一。针对王了一的辩解文章，作文明确指出王了一译述中的失误处，认为译书要不错是不容易的事，但错误不该多。而错就是错，不错就是不错。倘使错了不认错，反而请几个外国人来替自己辩护，这种态度就是坏的。表示我们并不是不应该引用外国人的话，“但我们至少也得彻底明了，这个外国人的话究竟说得不错……我是一个中国青年，我敢说，即使先生请了法国总统或英国皇帝来，我也不能够承认”。又在《译文》第二卷第四期，发表译作《记忆的客人》和《独房》，均为美柏克曼作。

六月二十日 在《漫画生活》第十期发表杂文《再说雷雨》，署名余一。针对中国驻日本大使以“男女学生合演”为理由，干涉《雷雨》的公演，对“道学先生们”进行讥讽。

六月 从日本报纸上了解了《新生》事件的全过程，以自己正在译的《俄罗斯语言》为例说：“国内的‘恐日症’把我的勇气和希望摧毁了，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我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从屠格涅夫对俄罗斯语言的赞美，“想到了我们的语言”，“勇气恢复了，信心加强了”，对自己

“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坚定的信念。

七月十六日 在《译文》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译作《绝望的思想》，美柏克曼作。柏氏自述在狱中因孤独、寂寞企图自杀，后因“忠心的朋友”的鼓励，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七月

作《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前记》，载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云整理七年前九章旧稿，新写第九章，“编成第一卷”；“是读一百本书，写一本小书”，不是“宣传”，“只是一本研究底书”。

作史话《拉甫洛夫与伦理的社会主义》，系《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第九章，载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认为拉甫洛夫与巴枯宁虽然感情、气质等不同，但都是“七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底双璧”；介绍拉甫洛夫的生平、著作、思想和革命活动简况，其学说的要点，是否认“一切束缚个人自由的强权，甚至……国家”；他“不赞成用暴力”。赞颂“他底完美的人格……像一颗金星挂在黄昏的天际……他底伦理的社会主义，更给那般怀着献身的利他渴望的青年们燃起了圣火”。

重译《生活底故事》，意大

利巴尔托罗美·凡宰特作，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为纪念萨珂和凡宰特遇害八周年而作。此文原译名为《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后易题为《我的生活故事》。

作《生活底故事 译后记》，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云，为了纪念萨·凡被害后的“第八个纪念日”，译了这篇自传，因为“这篇短文比我写的一切纪念文章都有力，它本身是很朴质而又很雄辩的”。文中还附了“七年前”译的萨珂给儿女的两封信。

约七月 听和福建朋友同住的一位四川籍女学生讲自己的身世。她对巴金谈起她自己出川求学的经过，她怎样跟她父亲进行斗争。她自杀未遂，逃亡又被找回家，最后她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又得到哥哥的帮助，顺利地离开了家乡。她的话非常生动，而且有感情。巴金表示要把她的事写成长篇小说，她并不反对。这个女青年，就是长篇小说《春》中女主人公淑英的生活原型，她的经历成为《春》的原创构思。

八月初 回国前，前往东京郊外千岁村桥探望石川三四郎和望月百合子，受到热忱的款待。石川三四郎“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可爱的田园里勾留些时候”，并且“还坚持地要出去为

我退船票”，“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我不忍离开这些敬爱的友人”。

八日上旬

离开东京到横滨，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回国。到上海后寄寓虹口麦加里二十一号。由于“那时候在上海的人正患着恐日病。……我不能说我想说的话”，遂每晚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小的地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就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

与吴朗西、丽尼、柳静等人合作筹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后来伍禅、陆圣泉、杨挹清、俞福祚也参加，文化生活出版社便成立了。

处于草创时期的文生社，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巴金说：“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是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以后的发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巴金首先主编了“文化生活丛刊”。该丛刊自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共出版了近五十种，除翻译作品外，尚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这些作品既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也宣传了民主主义思想，还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八月十六日 在《译文》第

二卷第六期上发表译作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乞丐》和《工人和白手人》，均为俄屠格涅夫作。

八月

与从北方旅行归来的朋友“耶稣”即叶非英见面，“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病”，但叶非英依旧坚决地与一班学生一起徒步旅行。“我佩服他”，但不赞成他“吃苦拼命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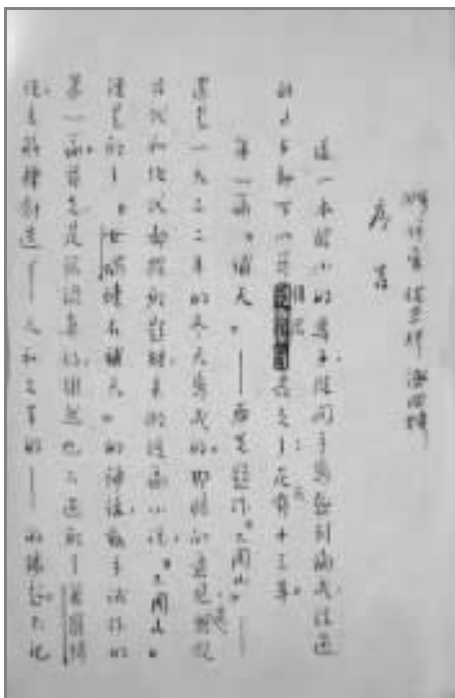
接待自京赴沪的李健吾，他是应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郑振铎之邀，前去“暨大”任教的。替李健吾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物色到一间房子。

看了第一出版社出版的《巴金自传》，颇不满意：“因为错

字多，售价贵以外，它还比我的原稿少了一章，那是被审查会删去了的。”被删去的一章即《信仰与活动》。

九月一日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狱中记》，美柏克曼作。书内附译者搜集的插图五幅：柏克曼的像、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西惩役所、牢狱的花、南部的监房、钟时和觉真木刻的爱玛·高德曼像。《狱中记 后记》认为该书是“人类心灵之记录”，几年前就想全部译出，但“因为种种的原因，不得不采取‘节制’的办法”；又借高德曼的几段话，称该书是“伟大的作品”，并叙述了原作者的生平。

九月十五日 晚，与黄源和



鲁迅《故事新编》手稿之一页。



《无政府共产月刊》。

吴朗西一起在南京饭店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等，另有傅东华、胡风 and 许广平、海婴。商谈把原来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译文丛刊》转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答应把译著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列为丛书的第一本。茅盾答应把所译外国短篇小说集《桃园》和苏联铁霍洛夫的自传《战争》，也列入丛书出版计划。席间巴金还与鲁迅、茅盾商谈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的计划，请鲁迅编一个集子给他，鲁迅慨然允诺。几天后鲁迅让黄源通知巴金，云现有内容篇幅较少，拟在一二个月内将原在构思中的有关内容创作完篇，即可编成一集交付出版。集子的名称和内容，即鲁迅一生中最后一个小说集《故

事新编》。席间，茅盾除答应把中篇小说《路》列为《文学丛刊》第一集改版重印外，后来还把散文集《印象·感想·回忆》交该社列为《文学丛刊》之一出版。

九月二十一日 在《申报》发表《刊行 文化生活丛刊 的缘起》，未署名。公开声明出版《文化生活丛刊》的宗旨：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为知识而奋斗的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它的利益”。

九月二十五日 托黄源把

《狱中记》、《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赠鲁迅。

九月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俄国社会运动史话》。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广告栏中编译发表广告四则。

《狱中记》广告，未署名。译介了七条引文：云柏克曼“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的”、“是一个抒情的诗人”。“他叙述故事的手腕和杜思退益夫斯基以及其他的俄国的写实主义者相似”；“这是一个成熟的心灵的成熟的怪物”；“读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张，但却不能放过本书的深邃的心理学的洞察和优美的文学的内容”；“柏克曼的《狱中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自传”；

“在这本描写他的生活经验的书里，柏克曼给了我们一个恐怖的记载”；“本书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和“他的作品必有一种惊人的魔力，同时还有一个社会价值”。

《回忆录》广告，未署名。云所译 V. 妃格念尔《回忆录》“是一本神奇的圣书，一本伟大的自传”，“这本比《狱中记》更伟大的圣书……每个字会像火焰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一个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它会使你流泪，它会唤起你的渴望”。《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广告，未署名。云“用小说笔调写成的社会运动史，这是第一部”，用“如火如荼的笔所写出的先驱者们的英雄事迹，是会震撼每个读者的心灵的”。《草原故事》广告，未署名。认为作者“高尔基便是现今的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草原故事》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

约九月 到北平看《一日记》清样。书店因经济出了问题，《水星》不能出版。遂与卞之琳一起料理停刊事务。另因《文学季刊》编委李长之等借故巴金等改其论文，发生争执，退出编辑部；随即巴金与靳以也决定脱离该刊，同往上海，并团结曹禺、何其芳、萧乾、丽尼等一起重新创立《文季月刊》社。

十月一日 把《一日记》改写成短篇小说《人——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编入《神·鬼·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据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作的散文《东京狱中一日记》改写。曾几经周折，仍无处发表，遂改写了一下，在那个偷书的囚人身上添了几笔，最后加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人！”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这个集子里面。“那个时期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有权处理自己的稿子，……而且通篇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

十月八日 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改写《雾》。谈到新中国书局出版的《雾》，巴金说：“我的确不喜欢。里面有几个地方我自己读了脸红，读了肉麻。最近我完全改作了一次，至少是把那些地方取消了。”拟将改定本的《雾》与《总序》合成一册，在良友出版。

十月二十七日 作完《爱情的三部曲 总序》，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雾》。在将近三万字的长序中，巴金第一次打开了灵魂的一隅：为什么要写那三本书；怎样写成它们；“为什么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们”。这是研究巴金创作思想和文艺观的重要文章。云在自己二

十几部文学作品里，“我的确喜欢……《爱情的三部曲》”；作品中有“个人的经历”“血和泪”，为的是“更近于真实”，但“没有把自己写进……作品”，“每个人物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们一起“悲痛”、“快乐”、“兴奋”、“流泪”，为了“描写出几个典型”，就“把别人做过的事加在我的朋友们的身上”，因而“他仍是独立的存在”；“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写……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而“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又云写作《电》时，字句“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带动起来，……跟活人一样”，“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最喜欢”《电》。最后自剖道：“我自己这个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我隐藏了那么强烈的火焰。别人只看见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要把我的内部烧尽了。”

十月



作《神·鬼·人 序》，载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神·鬼·人》。用象征和富有寓意的手法，勾勒了思想演变的过程：生活使他冲出了“敬神怕鬼”的环境，经过“烈火锻炼”，“火烧毁了神，火烧死了鬼”，使自己成了“人”，迈开“坚定的脚步，走向人的新天地去”。

作《写作生活的回顾》，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开明书店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在将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电椅》中一部分作品稍作改动并为开明书店编成《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时，又将旧作《写作的生活》“增加了新的材料”改写为《写作生活的回顾》。回顾自《灭亡》至《神·鬼·人》的创作历程，云“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跟一切斗争”，宣称：“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没有作过妥协。”

作《草原故事 重印后记》，载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草原故事》。称自己为“不识时务的傻子，但我就喜欢自己的这种傻气”；又针对当时小报诬他译文不通云：“这次付印时

我把译文修改了一番。但这并不是说把‘不通’的地方改‘通’，‘硬译’的地方改‘顺’。正好相反，我却把‘通’的地方改成‘不通’，把‘顺’的地方也率性改为‘硬译’了。……这小书不是消遣的小说，不预备给人躺在床上看，‘硬’一点也无妨。”

《草原故事》清样出来后，发现有错字，亲自到华文印刷所，找到年轻的排字工人。那工人正要下班与女友约会，很不耐烦。巴金再三坚持，说了不少好话，错字才得以改正。

十一月初 作完《神·鬼·人 后记》。云：这本小书是一年中写成的“三个类似连续的短篇”。

十一月七日 致信《青年界》杂志编者赵景深，告知不能应约撰稿的原因是近来“心乱得很”，加上“应征的文章”“不容易写”，将朱梅君的稿子推荐给《青年界》。

十一月十日 译屠格涅夫散文诗四首，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白菜汤》、《富豪》两首，均用对比手法嘲讽女地主和富豪的虚伪、丑恶，歌颂贫苦农人纯洁的心灵。《“蔷薇花，多么美，多么新鲜……”》一首用象征手法写现实的黑暗和憧憬光明。《我们要继续奋斗下去》一首，用勇敢、活泼的小麻

雀在兀鹰下的无畏和“充满着自信”来鼓舞斗志。在译后记中云：明年将把屠氏的“五十一首全译出来，印成一本小书”；又云“原诗自然好，我的译文自然不行”，“似乎有人骂过我前次的译文不通。我应该感谢他”，嘲讽一些批评家“自己识字不多”。

十一月上旬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神·鬼·人》。卷首有司丁纳、费尔巴赫、布鲁诺、色尔、巴枯宁语录五则。在附页上发表《“文学丛刊”广告》：广而告之“文学丛刊”向“读者担保”“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在定价方面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丛刊的特色是“编选严谨，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十一月二十二日 作创作谈《爱情的三部曲 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生》，载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艺》。此为对批评家刘西渭的答辩。自述《爱情的三部曲》中的人物追求的是“众人的幸福”，这些“真正的革命者”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恨”，他们“充满着爱”，勇于“贡献一切”；“但热情并不能够完成一切”，“信仰”能“加强”、“指导”它，由《雾》到《雨》到《电》，就是信仰带着热情舒畅地流入大

海；认为刘西渭的批评文章像“拳头打到了空处”；自述在《雾》里“信仰”“下了种”，在《雨》里“信仰”“发了芽”，在《电》里，“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我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写爱情”；自云“我的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 这是什么，我不说出来”它“使我‘认识公道’……‘知所爱恶’”；重申“永生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信仰”；又自述“自己是完全反对恐怖主义的”，“我就用信仰”“把死征服了”；申明“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最后嘲讽刘西渭“在匆忙的一瞥中你就看见了你所要看见的一切，看不见你所不要看见的一切”。

十一月约中旬 由上海到北平小住三周。其间与靳以料理《文学季刊》休刊事；与立达书店经理商量，由文生社支付三百元，将曹禺、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等人的书稿取回；与朋友们相聚，为“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人类的一部分快要陷于奴隶的境地”而感到“痛苦”和“悲愤”，“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的会面给我留下一个这么痛苦的印象”。去沈从文家，见到沈从文夫妇，他们十分热情。应沈从文约请，为《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撰稿。在三

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寂静。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来。在车上“回忆使我苦恼，现实使我悲愤；未来使我耽心”，他想借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对朋友们说几句话。中途下车，在天津南开中学三哥李尧林处住了两天，适逢何其芳、毕矣午也在这里，晤面后谈论时局，为大城市陷于敌人马蹄下而悲愤。

十二月四日 由天津返沪。



巴金在北平和天津常见面的友人毕矣午 后左一、萧乾 后中、章靳以 后右、何其芳 前左、曹禺 前右以及三哥李尧林 前中。

十二月一日 下午三点，搭平沪通车回南方，其时满天大雪，沈从文、张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沈从文微笑着握着巴金的手问：“你还来吗？”巴金张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他们，他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再

十二月九日 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散文《别》，后经修改易题为《我离了北平》。此为离天津前夜所作。倾吐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表达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命运，我决不会失掉信仰。那么我也决不会忘记你们，



我说甚至在乌云满天的时候，我还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一起看见黎明的将来。记住：所有的黑暗都是假相。”

十二月约十一日 微雪。因病住院开刀，借助于尼采的一本书来排遣病中的“寂寞”、“单调”和手术后的痛苦。

十二月十六日

发表随笔《告别的话》，未署名。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为该刊停刊而告读者，云“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在深渊的边沿”，痛斥“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钻入古籍的‘腐儒’”、“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高呼编辑者和青年不能将精力和生命“消耗在文字上面”，而应“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坚信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余力重提起笔管”，这个刊物“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此文原系巴金受正在“发烧”的章靳以委托，深夜执笔完篇，经章靳以签字发排。俟清样出来后，巴金曾亲自校对并签字付印。但刊物出版后，发现“与北平排好的不同了”，第二节中的一段全被删去。巴金认为这恰恰是“全文章里最重要”的文字，也是告诉读者该刊“停刊的原因”：“文坛操纵在商人手里，在商店的周围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

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蛙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

在《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发表随笔和回忆录。随笔《一阵春风》，署名余七。嘲讽“热心整理旧籍，翻印古书”的圣信徒的教授学者，因为现实“逼近深渊”，国民贫困，歌颂和迅速翻印大批古书是“麻醉青年”，痛感三百年满清统治给国民造成的奴隶性，呼喊“救救青年”。回忆录《小小的经验》。回忆少年时代与朋友一起创办半月刊、月刊和周刊的愉快、困难及斗争，表达向往进步、革命的激情，揭露当局压制新闻自由，禁锢青年思想的丑行。

十二月约十八日 在病房中作书信《病》，载三十日天津《大公报·文艺》记叙住院开刀的经过和痛苦，然而“对于明天的信仰”使他有了忍耐一切的勇气。

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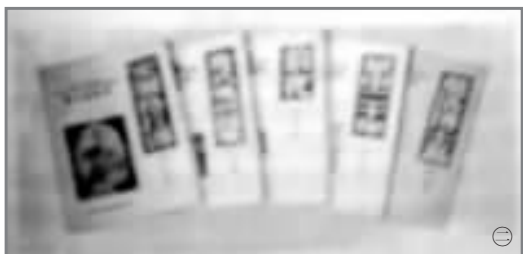
作《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再版题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

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底梦》版权，重新校改后交开明书店改版重印。抽去《从南京回上海》，加《改版题记》，又加一

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女孩’是我舅父的大女儿，名叫陈宗浩，当时不过十八岁，在武昌一所教会女中上学。……她十分善良、老实，而且柔顺听话”，“文革”中患癌症去世。为什么把“中篇小说”改为“童话”呢“因为这一年五月发生了《闲话皇帝》的事件，……我担心小说遭到查禁，又害怕会给出版它的书店老板带来麻烦不能怪他们有顾虑。就给小说戴上一顶‘童话’的帽子，算是化了妆。童话，是莫须有的故事嘛。不让‘友邦外交当局’抓到辫子嘛。”

作《海底梦 改版题记》，载《海底梦》。借用在日本作的散文《海底梦》，倾诉对海的深切感情和对这本在“热情”驱使下写成的小书的“喜欢”，用象征手法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 ⊖ 与巴金合作的装帧艺术家钱君匋。
- ⊖ 巴金翻译的书，封面均由巴金设计。
- ⊖ 巴金为《翻译小文库》设计的封面。

作《巴金短篇小说集 第一集初版后记》，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开明书店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指出编这个集子的原因：虽然“对于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但“又不甘心那些更不成东西的读物老是在读者中间卖来卖去”，“我也高兴让我的作品跟它们抢抢生意”。

主编的大型丛书《文学丛刊》第一集有八本出版。第一本是茅盾中篇小说《路》；其他是沈从文短篇小说集《八骏图》、张天翼短篇小说集《团圆》、鲁彦短篇小说集《雀鼠集》、艾芜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吴组缃短篇小说集《饭余集》、丽尼散文集《黄昏之献》、卞之琳诗集《鱼目集》。这是巴金主持“文生社”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套丛书，一共十集，每集十六本，其中周文的长篇小说《烟苗季》分二册出版，总计出版一百六十一本，广集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

九四九年四月，历时十四年之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出版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茅盾中篇小说《路》最后一页上发表《“文学丛刊”广告》，未署名。宣称：“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又云“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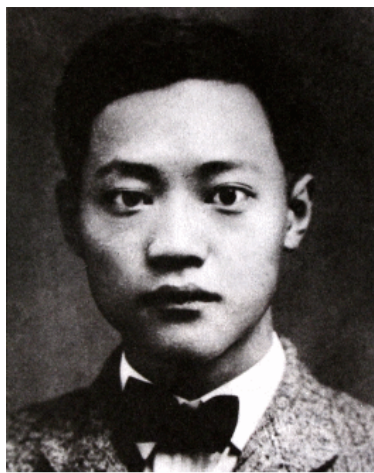
继续主编《文学丛刊》。据萧乾回忆，巴金“从组稿、审稿到校对都要干。……有时他还设计封面，下印刷厂是经常的事。更要提一笔的是，这位包揽过全过程的总编辑是不拿分文薪水的”。巴金自己也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书，大体都是我设计的。我不靠别的，就靠手头保存了一本俄罗斯的模式装饰集。

那书里有很多装饰花纹图案，我从那里挑选一些，然后稍加改变就行了。”

到环龙路访黄源不遇，碰到也来访黄源的胡风。“胡风约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们坐了一阵，一一讲一些文艺界的情况。”

约十二月 上海发生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害事件，日海军陆战队按户搜查一部分虹口区居民的住宅。巴金和索非夫妇住的狄思威路麦加里二十一号也在搜查范围内。索非夫妇发现巴金的朋友参加东北义勇军前寄存的一口箱子内有“义勇军”的公文和证件，一支手枪及一百粒子弹。没有别的办法，巴金立刻冒险果断带着箱子，坐上人力车，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来到当时的“法租界”好友马宗融家。箱子在马家楼上一一直存放到马宗融夫妇动身去广西的时候。

十二月底 委托友人伯峰翻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古田大次郎的《狱中纪实》。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第一次读到鲁迅上述文句后，深为感动。

云幼年有“三位先生”：“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他还给我勇气。”

惊悉鲁迅逝世，深感悲痛并守灵、抬棺，撰文称鲁迅是“普照一切的太阳”、“永不陨落的巨星”，称鲁迅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

在杭州西湖烟霞洞旁祭扫中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墓。

三十三岁

一月月上旬 应开明书店之约，着手编辑《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并“打算把一部分不像样的东西索性删掉”。

一月月中旬 花了半个月时间，把近几年写的短篇小说全部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并逐篇作了修改。

一月二十七日 作《巴金短篇小说集 第二集后记》。云这次编辑的目的是“把我的全个面目显露出来，让人们看得一清二楚”。还谈到对作品进行修改的“理由”是“不改不痛快”，并说：“我到现在才明白写文章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的甘苦连自己有时也不能完全知道。”

一月二十八日 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中鲁迅的《故事新编》出版，交鲁迅精装本、平装本样书各十册。

一月

整理书时，发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 今译《怎么办》 的法文节译本，出于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心，约请罗世弥翻译。

中篇小说《海底梦——给一个女孩的童话》由开明书店初版。

改订本《雾》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

约一月 收到胡风《山灵》译稿，拟编入译文丛书。

二月四日 致信鲁迅，询问出版《死魂灵百图》具体事宜。

二月五日 收到鲁迅写于二月四日的回信和《死魂灵百图》校样。信中就该书出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答复。《死魂灵百图》收俄国阿庚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插图一百〇五幅，梭可罗夫插图二十幅，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

二月八日 致信鲁迅并邮交《死魂灵百图》序目校样。

二月九日 晚出席黄源在宴宾楼为商谈《译文》复刊举行的宴会，席间建议鲁迅再印一本俄国版画家 M. 谢格洛夫等三人合作的《安娜·卡莱尼娜》的插图，鲁迅表示同意，后鲁迅因病情未见好转，插图本未印出。又向鲁迅谈了自己的写作计划，还准备把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深思》全本翻译成中文，目的是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为文字；同时，还向鲁迅约稿，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上有一本鲁迅的集子。几天后，鲁迅托黄源转告巴金，拟编散文集《夜记》，列入《文学丛刊》出版。后因鲁迅病重，仅收集了四篇文章。鲁迅逝世后，《夜记》由许广平编

成。

二月二十五日 作散文《断片的记录》，载四月一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诉说了“痛苦的”“长久的”“内心的激斗”：一方面把昔日的“热情向内贮藏起来”，让“生命浪费在文字上面”，像“折断了翅膀的老鹰”，“不能够再在广阔的天空里飞翔”；另一方面又不屑于做“纯粹的文学家”，用文章做为“骗人”的东西。

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马子华，署名金。曾答应为马子华担任编辑的《文学丛报》撰稿，眼看交稿的限期已到，内心焦急，遂致函告之因“忙着处理文化生活社的杂事”，“心情不好”，“文章写不出”，要求“放过我这一次吧”。

二月

与来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主编该报副刊《文艺》的萧乾晤面。萧乾住在南昌路，离巴金住处不远。以后两人过从甚密，经常在大东茶室与章靳以、马宗融、罗淑、黎烈文、黄源、萧乾、芦焚、索非等聚会，既可畅谈，又可互相交换稿件。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

获悉“左联”解散及周扬、徐懋庸等筹备创办《文学界》。

三月一日 在《中学生》第六十三号发表童话《塔的秘

密》。以“我”为主人公，用梦幻的手法表现了皇帝吃人的凶残、横暴，最后“我”和父亲战胜了皇帝的威逼、利诱，终于完成了毁掉长生塔的使命，表现了“贱民”对皇帝誓不两立的复仇精神。作品中的一些细节“一定是从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和读到的童话书里搬来的”。这是一篇“爱罗先珂式的童话”。

三月约中旬 得《译文》新一卷第一期，读鲁迅《译文复刊词》，文中讽刺了当时文坛“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读后深有所感。

三月十五日 短篇小说《狗》被童丘译成英文发表，载英文版《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本年在上海创刊 第一卷第一期。这是巴金第一篇被译成英文的文学作品。

三月十六日 在《译文》新一卷第一期复刊特大号上发表译作四篇。《回忆两则》、《蔷薇及其它》均为俄赫尔岑著；《记忆的穷人》美柏克曼著，散文诗《蔷薇》、《马霞》为俄屠格涅夫著。

三月

参照英文本《沙皇治下的俄罗斯》修改旧译作《三十九号》，编入译文集《门槛》。



作《三十九号译后记》，收《门槛》。介绍原作者司特普尼亚克生平及著作，云作者“是旧俄虚无主义者中卓绝的人物”。

校阅旧译作《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作《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译后记》，收《门槛》。简介原作者蒲列鲁克尔生平及著作。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短篇小说集《沉落》和散文集《生之忏悔》。

约三月 出席马宗融、罗世弥特意置办的酒宴，接受他们夫妇的调解，与毕修匀恢复了旧交，了结了双方因《革命周报》创刊引起的不和，并答应为毕修

匀正在筹办创刊的《进化》月刊撰稿。

四月四日 作短篇小说《雨》，载《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叙述了清末烈士的女儿“华”，因为“不承认现在存在的一切”，“不甘愿跟着别人一道沉落”，“敢于说自己想说的话”，被反动派杀害的故事。小说细致地描绘了“煌”由对华强烈的“思念”到振作精神而追随“华”的道路前进的心理过程，描绘了华母忍受丈夫和爱女两代人的牺牲带来的痛苦，刻画了她坚强的性格。

四月十五日 在《作家》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杂感《大度与宽容》。表达了对“藏在宽大的刀斧”的愤懑和不

满。

四月二十六日 托黄源将《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第二集赠鲁迅。

四月三十日 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爱情的三部曲》。

四月

校阅罗淑的《何为》节译稿，为她“流畅的译笔”感到欣喜。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何为》上发表《何为后记》，后易题《关于何为》，简述了罗淑翻译此书的经过。

与靳以和赵家璧共同筹备《文季月刊》创刊事务。

参照法文原本八年前在法国的旧译作《薇娜》，作《薇娜译后记》，载五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门槛》。

编完译作《门槛》，五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五月三日 应邀前往东兴楼饭店，出席上海杂志公司为《译文》复刊举办的宴会。与会者有鲁迅、茅盾、黎烈文、王鲁彦、萧红、萧军等约三十人。经巴金介绍，萧乾结识鲁迅。巴金经鲁迅介绍，结识萧红，并表示文化生活出版社愿为她出版作品。后来，先后出版的萧红《商市街》等就是鲁迅介绍的。



萧军和萧红。

五月四日 作《 门槛 译后记》，载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门槛》。

五月八日 在《进化》月刊第一期上发表《法国大革命略论》。叙述了法国革命的过程，认为这场大革命是一出“壮剧”，是“英雄行为的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比尔；这个英雄是民众”；虽然“法国大革命的结束是民众把有产阶级抬上了权力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匍匐在新阶级的权力之下”，然而，革命并未“完全失败”；它证明了“靠人民的力量”能“打破”“封建制度和王权”。

五月约上旬 读萧乾短篇小说《矮檐》，并提了中肯的意见，启发萧乾“走出童年回忆那个狭窄的主题，写点更有时代感的东西”。

五月约中旬

偕丽尼、陆蠡冒雨到杭州西湖烟霞洞旁扫刘师复墓。临别时巴金在心里祝祷：“你是不会死的，你活在我们心里，而且将来有一天你还会活在我们的行动上吧。”

与陆蠡、丽尼商定译文丛书的出版计划。在杭州“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向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

篇小说的计划”。巴金负责译介《父与子》和《处女地》。数日后由杭州返沪，巴金校阅开明书店改版重排本《灭亡》校样。感到“心里很痛快，这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同时，从“油光纸”的校样中“绝望地求助于回忆”。

五月十五日 在《作家》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发的故事》。通过“金”的叙述，反映了朝鲜革命者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本篇是为纪念一个死友，同时还对几个活着的友人表示感激和敬意而作。

五月二十日 夜作《 灭亡 七版题记》，载《好文章》月刊第七期，为与大哥“不能了解的永远分离”而感到悲愤。

五月

应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赵家璧约请，愿意为良友编辑纯文艺的刊物，遂与章靳以积极筹备《文季月刊》撰稿、组稿和出版工作，编辑室设在北四川路。

决定为《文季月刊》第一期撰写长篇小说《春》。“那个时候，我的小说《萌芽》被禁止发卖，《电》虽然出版，却被国民党的审查老爷删得七零八落，而且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为了我这本小说和几本别人著作的顺利出版，还花过几百元稿费买下某一位审查老爷的一部不能用的大作。我一方面不愿意给新刊物招

来麻烦，另一方面又要认真完成新刊物交给我的任务。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四川姑娘的故事，我也想到了《春》这个题目。接着我又想到了《家》的续篇。……我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把四川姑娘的故事改成了淑英的故事。”

自本月至年底续写《春》，每月写一万多字，共写了十章。

从黄源处看到一张作家协会的内定发起人名单，获悉自己是“被派定的五个最初发起人中的一个”。“黄源把名单给我看过，把别人的意思也转达了。我回答他说：我不想做最初的发起人，因为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团体。”鲁迅本月二十三日给曹靖华信中也表示了对“作家协会”的态度：“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沈，或变化的。”

应开明书店约请，趁《家》五版的机会，修改《家》，把误植的字一一改正，另外还改排了五页，“因为这里面有我自己认为不妥的地方”。

作《 家 五版题记》，载六月开明书店版《家》。谈到重读《家》的感想：“我的确喜欢这本书”，“我禁不住要爱觉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见他，我就想起丹东



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应该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作散文《忆》，载《作家》第一卷第四期。通过在“漆黑的夜里的“梦”表达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虽然有“勇气”，但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掉在泥淖里”的时刻，“使我们青年不能够奋勇前进的，也正是过去的阴影”。

六月一日

与章靳以共同主编的《文季月刊》创刊。

在《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文季月刊复刊词》，署名文学季刊社。宣言在这民族面临“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之际，编者决不“跟在盲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

六月七日 从报上看到“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的宣言，参加者有王统照、艾思奇、朱自清、茅盾、郁达夫、洪深、郑伯奇、郑振铎、赵景深、叶圣陶、谢冰心、丰子恺等一百一十人。虽未签名，但却认为应当发一个宣言，表示对于救亡图存的态度。

六月十四日 与黎烈文分头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



黎烈文。

言》。

六月十五日 与黎烈文见面时，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其时鲁迅在病中，黎烈文带着两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在鲁迅家中把两份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名。

“因此，正式发表的《宣言》很可能经过鲁迅的修改，但鲁迅怎样修改的，我就不清楚了。……宣言经鲁迅签名后，就抄写了几份，以《作家》、《译文》等杂志社的名义分头去征求签名，黄源、胡风也去找他熟悉的人签名。”《宣言》有鲁迅、巴金、曹靖华、曹禺、章靳以、黎烈文、鲁彦、茅盾、孟十还、欧阳山、胡风、张天翼等七十二人联署。

六月十六日

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载《译文》新一卷第四

期，以后分别载于《作家》第一卷第三期、《现实文学》第一期和《文学丛报》第四期。《宣言》中强调指出：“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宣言中保存了巴金草稿中的一些原话，如“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息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等。

在《译文》新一卷第四期发表译作《狱中记》，俄V. 妃格念尔作。

六月中旬 整理、修改完已绝版的旧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易题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

六月十九日 找出西班牙文译本，校阅旧译作《司特普尼亚克传略》。因“西班牙文已经完全还给我的老师”而感到原著竟像“天书”一样难懂。

六月二十日 夜作《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 后记》，载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说明了早在一九二六年曾“被此书的文笔和事实感动到极点”。

六月二十四日 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译作《纪念福列斯加亚夫人》，俄屠格涅夫作，散

文诗。

六月二十八日 作《忆后记》，载《忆》。“声明”因“不满意”第一出版社的《巴金自传》，现已“通知”该社“停版了”。修改、整理旧作，编完散文集《忆》。

六月三十日 看完萧乾为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撰写的《鹏程》后，鼓励萧乾“抓住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具有“战斗性的题材，写个长篇”。自那以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内地，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萧乾写了什么作品都先交给巴金。

六月 在《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六期、第二卷第一期上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春》。

夏季

在开明书店门市部买书，遇见一位青年读者，他告诉巴金很想读廖·抗夫的剧本《前夜》。后来与巴金通信中也提到这本书。“他的热诚感动了我。我便在旧书堆里找出旧译本来，匆匆地读了一遍，交给印局去排印。”

与茅盾、郑振铎、黎烈文等支持赵家璧出版十卷本《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与赵家璧商谈后，介绍鲁彦承担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一些“新兴”国家作品的编辑。最后商定，愿与鲁彦共同编译《新兴国短篇小说集》。

七月一日 发表《我们对于

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与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一百四十人联署，载《文学丛报》第七卷第四期。

七月二日 译散文《春月之死》、《忆春月》，均为日石川三四郎著，并作《译后记》。载八月《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春月之死》记日本近代文学巨匠、诗人生田春月“为叛逆者而固守纯洁”终于自杀的经过。原作者赞扬他在“不义与丑恶充满天下之时”，“正义与善美起而叛逆”之时，是“不肯与世同流合污”的“不得已的”“自己完成”。《忆春月》称颂春月作为诗人和革命家的“伟大丰姿”。《译后记》简介了日本诗人生田春月的生平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日投濑户内海自杀的经过，也表达了对石川三四郎的“崇敬和思念”，认为他“思想之透彻，生活态度之真挚，人性之光美，在日本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

七月

在开明书店版《十年》发表短篇小说《星》，叙述青年作家志良看望永别的友人的故事，赞美友人组织学生和群众与嗜血成性的土匪头子进行斗争的献身精神。小说取材于三十年代泉州之行的见闻，据说小说中的土匪汪国刚就是以当时漳州的大军阀高

为国为原型的。

出版散文集《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与杨振声、朱光潜、朱自清、叶圣陶、章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等被聘为《大公报》文艺奖的裁判委员。

八月约六日 下午从《作家》月刊主编孟十还处获悉鲁迅授意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已付印，遂赶到印刷所看了徐懋庸八月一日致鲁迅的私信和鲁迅亲笔修改的原稿，获悉徐信中对自己和黄源、胡风等人的人身攻击：“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从原稿中看到鲁迅明确表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并就徐懋庸信中攻击巴金、胡风、黄源之处亲笔作了回答：“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看完鲁迅



的文稿后，深为先生的铮铮硬骨和仗义执言的品格所感动。“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在这阴暗的亭子间里我看见了西班牙斗争的全景。……那里没有口号，没有文字，没有创作，有的只是血和力。那里的人是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他们所宝爱的理想，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的。”

“对于西班牙的前途和那斗争的成败，我现在还不能够说一句决定的话。但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在 C. N. T. 的旗帜下团结的一百三十余万工人不是拼着最后的一滴血在各处的前线上战斗吗？在西班牙的斗争中‘安那其’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甚至莫斯科《赤星报》的社论也公然承认的。”虽然“和徐懋庸并无私人的恩怨”，但要“为那在西班牙人民解放战场上牺牲的英勇斗士辩诬，替那少数沉默地工作着的‘中国安那其’伸冤，因为在这‘文坛’让我放肆地把这两个字用一回，上肯出来替那两种人说话的就只有我一个人”。“这在我似乎成了一个义务。我不能不出来说两句话”。决定撰文驳斥徐懋庸。当时因译文丛书和鲁迅、黄源的关系，与胡风熟悉起来，但“很少读他写的那些评论文章。……当时他同周扬同志正在进行笔战，关于典型论，关于国防文学，关于其他。我不认识周扬，两方面的文章我都没有读过



青年徐懋庸。

……只读过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的文章。我们听先生的话，先生赞成什么口号，我们也赞成”。

八月约中旬 作论文《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载《作家》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八月十五日 在《作家》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短简》，后易题为《家》。深夜读朋友的《旅行之书》引起对三年前南国之行的回忆，并把那里比作“家”，抒发了“游子”的“渴慕”之情；文末表达了对“耶稣”即叶非英的“敬爱”和思念，称他是“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的“勇敢”的人。

八月

作散文《我的幼年》、《关于发的故事》，均载《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我的幼年》，回顾幼年生活发展变化的历程：自小过着充满“爱”和“温暖”的幸福生活，由于母

亲和父亲的去世，给生活投下了“阴影”，变成一个“爱思想的孩子”；听了仆人们“绝望的申诉”，唤醒了“反抗的思想”；从《告少年》中获得了“正义感”，从《夜未央》中“找到了我终身的事业”；决定冲出狭的笼，“发散我的活力”。终于在办杂志、散传单、参加集会等频繁的“社会活动中”“埋葬”了“我的幼年”。巴金很喜欢这篇散文作品，“我可以坦白地说，

《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但它不是一篇完全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关于发的故事》，简述了写作《发的故事》的动机和发表后受到“那般想以‘骂’和‘捧’作武器的‘文坛’人的攻击”。坚信“《发的故事》将因了殉道者的血而活下去”。

经萧乾介绍，与刚到上海的女作家、《武汉日报》副刊主编凌叔华晤面。凌返武汉后，曾两次来信约稿。巴金决定把儿时听惯了的四川民间故事“孽龙”改写成《隐身珠》。

作童话《隐身珠》，载九月二十五日《武汉日报》。叙述一个穷孩子在县官的差役搜查教书先生家里的隐身珠时，吞食了隐身珠，变成巨龙，最后发大水淹没坏人、惩恶扬善的故事，表现了“凡是压迫人民的都要灭亡”的主题。

获悉鲁迅病重。拟约友人前去探望。

约八月 在罗世弥的短篇小说“《生人妻》的原稿上替她写了‘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在《文季月刊》上发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女作家的脱颖而出予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罗淑的女儿马小弥《关于母亲的点滴回忆》：“感谢巴金伯伯，是他发现了母亲的创作才能，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她写作，帮助她改稿，使她的创作有了发表的机会。”

九月初 接凌叔华信，获悉《隐身珠》原稿到武汉：“您的文章到了。我该怎样高兴。”

九月月上旬

作散文《我的几个先生》，载《中流》第一卷第二期。这是《我的幼年》的续篇，用充满诚挚感情的文字，倾注了对三位先生的感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他还给我勇气。”“吴”即吴先忧。

为纪念九一八“那悲痛的日子”，“原打算写一篇有力的东西”，但在那“舌头似乎被什么东西钳住”的日子里，只写了些连自己都感到“软弱的句子”。

作短论《我们的纪念》，署名本社，载《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为五年来民族危机的加

重和民族命运的沦亡而“呼号”，但更响亮地歌颂全民族的“救亡运动”。

九月十二日 看《社会日报》，在“文坛漫步”栏内刊有戴敦复的《关于巴金》一文。因有一些不实之词，阅后心中不悦。在待发的《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一文中加上了一段反驳之词，云：“不高兴我的人，尽可以从别的方面来骂我，我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但若专门在小报上发消息来诬陷我，那末除了暴露自己的‘行为更为卑劣’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九月二十日 看《社会日报》上灵犀、徐懋庸、曹聚仁等“攻击”自己的文章，明白对方采取“挑拨离间”、“造谣诬陷”的“惯技”在“信口雌黄”，遂不予理睬和纠缠。

九月月中旬 从《今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上看到徐懋庸的《还答鲁迅先生》及《答巴金之答》两篇文章，对徐文中的攻击和冠以“反对”、“破坏”“文艺家协会”之罪名感到愤怒。自省“从日本回来后一年来的言行”，“知道我并没有做过一件‘破坏’或‘反对’‘文协’的事”。并认为：“我没有加入‘文协’，我还在文艺工作者宣言上面签了名。”关于《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在八月六

日致时玳的信中早已说过：“《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

九月二十三日

收到署名“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子”的信。获悉她感谢巴金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战斗的力量”，并渴望“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故事吧，那么我们中间会了解的”。

在《文季月刊》编辑部校阅《我们的纪念》，“心变得沉重起来。甚至那油墨印出的字迹也在对着我哭泣了。我不能够忍耐”。遂把清样发回排字工人付印。

与从南方乡村来的一位青年大学生在咖啡馆晤面，获悉他想在都市找个出路，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为自己求得更多的学识的理想破灭后，对生活产生了“怨愤”。遂“怀着痛苦的心情”，对这朋友说了不少安慰和鼓励的话，使对方“渐渐地兴奋起来”。

傍晚在饭店与朋友晤面，得缪崇群从南京寄来的快信，获悉缪妻张祖英已于八月二十五日病逝，信中流露出缪对亡妻的绵绵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哀思。“我反复地读着信，我几乎要当着几个朋友的面把流泪流出来，但我终于用绝大的努力来忍住了。我甚至开始大声说着笑话。我似乎完全忘掉了这事情。然而在我的眼前还不时晃动着那个有着红红脸颊的面庞，和那张苍白的削瘦的脸。”从饭馆出来后，坐黄包车回寓所途中，“看见街上飞驰的兵车和惊慌的行人，才知道一个重大的‘事件’突然发生了”。当时发生了“海宁路事件”，一日本兵在海宁路被枪击，日军即借口越界布哨。后靠了车夫的帮助，从“枪刺”中绕了不少圈子才回家。

深夜，作散文《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载《中流》第一卷第三期。叙述在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一个不宁静的深夜，读一个“不曾谋面”“北方青年”的来信后引起的感想。针对来信中担心巴金“搅入无谓的笔战”，借

题发挥，阐明自己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态度，并说明了不参加“文协”的事实真相，驳斥了徐懋庸的攻击和诬蔑。认为：“我自己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文艺论争，但我得说一句公平话，这决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论争对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大的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经过几次的论战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倘使没有过去的论争，我们的新文学还能够发展到目前的这个阶段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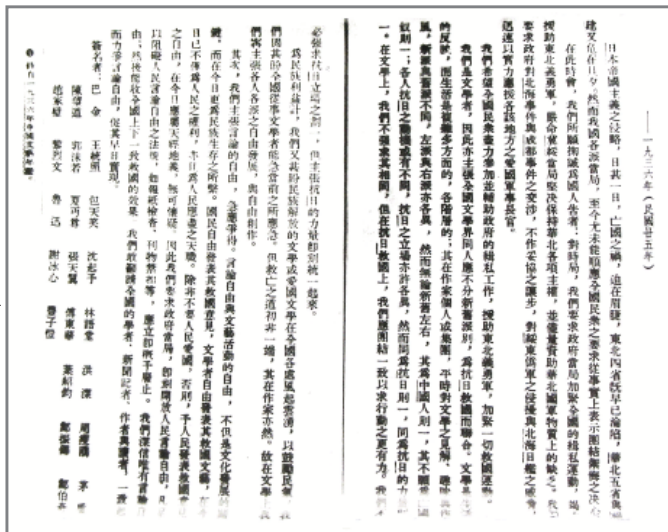
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散文《一篇真实的小说》。云看了提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在一封私人的通信里对“我”的“攻击”后，对“他们所提倡的统一战线起了疑惑，而且感到可怕了”。

九月二十七日 作《秋天里的春天 三版题记》，载《秋天里的春天》。

九月二十九日 和一个南方的友人晤面，获悉灵犀撰文“写了‘正告’我的文章 按：指《正告巴金》，载《社会日报》九月三十日，说我‘自贬人格’‘造谣诬蔑了某某人 按：指曹聚仁’”，联想到近日来在《社会日报》戴敦复、胡涂和戴苍谷等人撰写的文章，感到对方又在“嚼舌头”，“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头上”。于是在《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的原稿后面又加上一段，表明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我这人的言行素来是光明磊落的。像写‘私信’背后攻击人的事，我就从没有做过。我的言论自有我署名的文章来负责。”

九月

应《作家》主编孟十还之约，因住在狄思威路麦加里朋友索非家的亭子间里，于是根据亭子间的见闻构思《窗下》。



巴金等二十一人
联名签署的《文艺界
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
论自由宣言》。

作短篇小说《窗下》，载《作家》第二卷第一号。用书信体形式叙述了女佣玲子迫于生计，与东家一起迁往国外，和热恋中的爱国青年小学教员分手的故事。

作书信《给一个中学青年二》。与一九三一年九月作《给一个中学青年一》合篇后初收《短简》。抒发为中华民族“往一个深渊里沉落”的“沦亡的命运”而悲愤的感情，但并没有“失掉我们的自信力”。坚信“真正的战士便就在就义的时候也还谈笑自若”。

十月一日

在《文学》第七卷第四期、《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第四十期、《新知识》半月刊第二号上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洪深、张天翼等二十一人联署，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指出：“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当局，即刻放开人民言论自由”。

发表散文《我们的纪念》，署名本社。载《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以愤激、热烈的笔触，抒写自己一九三一年日寇侵略我国东北三省五年来的见闻和

感情，云我们的民族“依旧没有失掉……自信力”，并以“笑声”和努力的工作来鼓舞在铁蹄下从事“伟大的斗争”的同胞，纪念“把鲜血洒在那土地上的兄弟”。

十月五日 看《社会日报》白雪发表的《巴金先生的悲哀》，被指责为“永远在‘暗中摸索，找不到一线光明’”的人。阅后认为这“爱说漂亮话信口乱谈别人的悲哀的人”会“把黑暗当作光明”，将“窄巷”当作“康庄大道”。坚信自己“看见的倒是一线光明，而不是无边的黑暗”，对付这种人和文章的办法是：“不去管他们。”

十月八日 获悉鲁迅抱病前往八仙桥青年会，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木刻家座谈、合影。深为鲁迅热情鼓励木刻青年艺术的精神所感动，同时又为鲁迅的健康担忧。

十月十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散文《我的故事》。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叙述了一天忙碌而“平凡”的“生活情形”，并“感谢”她“给了我勇气”。不久得署名“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子”的来信。获悉她读了《我的故事》后的感想，阅后颇为感动。拟回信，叙述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信仰。

作书信《我的路》，载《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驳斥了白雪等人批评自己的作品充满“悲哀”和“绝望”、没有“光明”只有“黑暗”的论点。云“在我的全部作品里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我的路”，而“我的路”恰是“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趋向自由的路”；又认为“求自由的人常常是得不到自由的”。

十月十八日 与鲁迅联系后，通知曹禺，重病中的鲁迅同意在寓所会见他们。

十月十九日 与曹禺上午八时到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邨九号鲁迅寓所访问时，惊悉鲁迅已于清晨五时二十五分逝世。遂强忍悲痛，与靳以、黄源、萧军、黎烈文等人组成治丧办事处，由胡风传达治丧委员会的决定和安排。并陪送鲁迅遗体前往万国殡仪馆。在守灵时，望着鲁迅先生的遗容：“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像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陨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



十月二十日 在万国殡仪馆守灵，从《大公报》左下角发现一篇《悼鲁迅先生》的短评。该文借悼念为名，行攻击之实，引起了文艺界公愤。萧乾记得巴金气得跳了起来，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当萧乾找《大公报》老板质问，并提出辞职时，巴金自然也十分气愤，他支持萧乾，说：“辞职不会叫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

十月二十一日 早晨，看见“一个剃和尚头的短身材的老人远远地对着遗像，暗暗揩拭眼

泪”。巴金知道此人就是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完造，联想到这几天，内山为鲁迅的丧事奔走，十



⊖ 蔡元培。
⊖ 内山完造。



分感动。使巴金更感动的是一个盲人，在鲁迅灵前端端正正地立着，严肃而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



巴金 左前一等青年作家在抬运鲁迅灵柩。

躬，默默地离开；巴金还看到不少人像孩子似地哭了。晚，仍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守灵，望着鲁迅的遗像，轻轻地诉说：活着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机会来表示我的感激，现在我把感激埋在心里。

获悉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有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茅盾、内山完造等九人。

十月二十二日 早晨七点半和靳以赶到万国殡仪馆。下午二时，鲁迅灵柩出殡。临出发前，鉴于敌人戒备森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胡风叮嘱巴金要注意维持秩序，不要让人乱发传单。与胡风、张天翼、姚克、黄源等青年作家，抬着灵柩，前往万国公墓。葬礼进行时，巴金站在胡风对面，看见有人向胡风要钱，胡风掏出来一包钞票，然后又放回衣袋里去。他四周都是人，“有点替他担心”。仪式完毕后，看见胡风着急地在寻找什么东西，他那包钞票果然给人扒去了。

“他并没有向我提借钱的话。我知道情况以后就对当时也在场的吴朗西说：‘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支持他。’吴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钱给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的稿费。”此事在胡风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这件事我不能告诉许广平，也不能告诉冯雪峰。只有巴金知道，因为我无法，只好

向他求救了。……我向巴金借这笔钱，算是预支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那里出的两本书的版税。”晚，作散文《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后易题《永远不能忘却的事情》，载《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记叙了关于鲁迅的“最后的事情”，这些将成为对这位“敬爱的导师”的“一点不能忘却的回忆”。

十月下旬 前往八仙桥青年会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召开的总结会。当胡子婴在会上指责胡风在灵车出发前对巴金说的话是“不相信群众”时，心中深为不满。但因为“人到得不少，也轮不到我讲话。胡风也没有替自己辩护”，巴金也就没有发言。但通过这一次与胡风共事，看到了胡风“任劳任怨，顾大局”的性格。

十月

为《文季月刊》增设《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组稿、撰文、校对事奔忙。作散文《卷头语》，后易题为《悼鲁迅先生》，载《文季月刊》第一卷第六期。文中倾注了强烈的感情，抒发了对鲁迅深切的哀悼，认为鲁迅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鲁迅将“活在全中国人民

的心里”，人们要“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与伍禅资助患肺病的朝鲜朋友沈茹秋的胞弟沈克秋，前往河南开封师范寻找柳絮。在鲁彦介绍下，结识冯雪峰。

十一月四日 作杂感《片断的感想》，载《作家》第二卷第二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目录误植为《片断的回忆》。

十一月十九日 与章靳以、黎烈文、黄源、孟十还等人商谈后联合致傅作义电：“本社和中流社作家社译文社联合打了个电报给绥远省政府傅作义主席和前线全体将士，说：我们谨以万分热诚希望诸君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独立抗战到底。”

十一月二十日

与章靳以商量后决定以文季社名义捐款并致函《大公报》主笔：“本社送了国币五十元到《大公报》庶务处托他们转汇到绥远前线去。并附了一封信，给《大公报》主笔。”原信内容如下：“兹奉上大洋五十，这是我们从《文季月刊》编辑费项下撙节下来的，请转寄绥远前线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的将士。此致《大公报》馆。文季月刊社敬启。”

因马宗融携眷前往广西大学任教，遂迁入上海拉都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二楼为马家看守住宅，开始创作《能言树》。“我发了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狂似地奋笔写了两个晚上，每晚都写到两点钟。屋子里升着火，我心里燃烧着火，头上冒着汗，一边念，一边写，我在控诉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摧残青年的罪行。我写到‘为什么那些同情别人、帮助别人、爱别人的年轻孩子就该戴镣铐、挨皮鞭、坐地牢、给夺去眼睛、给摧残到死？’我丢下笔在屋子里走了好几转。我感到窒息，真想大叫几声，我快要给憋死了。”

十一月

童话《能言树》载《新少年》第八卷第一期。童话中的“哥哥”因不相信现在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安排而获罪，成了盲人，但还是要“帮助人、同情人、爱别人”。“能言树”在“妹妹”一片至诚的泪水滋润下终于开了口，鼓励“妹妹”伴着“哥哥”去“帮助”、“同情”和“爱”，于是兄妹俩勇敢地站起来“向着大路走了”。

作散文《给一个孩子》，载《中流》第一卷第十期。越过“环境”和“年龄”的“鸿沟”，给一个被“希望引诱着”的小孩提出了“警告”：“应该留着这生命和精力来贡献给更大的事业”，“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托付给一时的热情冲动”，要学会“忍耐”，因为“忍耐并不是指长久的屈服”，要有“冷静的头脑”，“坚强的信仰”，采

用“更有效，更有把握的方法”。

作《关于春》，载《青年界》第十一卷第一号。告诉读者写《春》的动机：一些“不该牺牲，不必牺牲，而终于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青年，“那许多被我爱过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了深的迹印”，“为了这些年青的生命，我应该写一部小说，以后我就把他们完全掩埋了”。

致信赵景深。应《青年界》每半年刊登一次“征文汇录”之约，将最近给一个朋友的信抄下一段寄赵；要求退还原稿，“因为抄得太乱，留着不好”。

公开出版中篇小说《雪》。

十二月初《文季月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再也“不能忍受”“令人厌烦的生活”，拟到南方去过一些时候的漂游生活，我想多看，多体验，多学习。

十二月八日发表《发的故事 前记》，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发的故事》，曾想用《晨星》做这个短篇小说集的名字。云这四个“仓卒写成”的短篇，虽然“下笔时已经绕了许多圈子”，然而“依旧是热情的产物”。在这些“回忆”里“常有星光闪耀”，因此“很爱它们”，并坚信“终有一天会看见晨星的”。

十二月十七日出席中华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的成立大

会。与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柯灵、唐弢、姚蓬子、夏丏尊、夏衍、于伶、顾仲彝、赵景深、张骏祥、叶以群、葛一虹等十五人被选为理事。

十二月

应萧乾约请，参加《大公报·文艺》为曹禺的《日出》举行的集体讨论，并观看话剧《日出》。

作剧评《雄伟的景象》，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及《日出》演出的说明书《戏剧工作社第一次演出特刊》。充分肯定了《日出》的思想意义，认为它触动了我们这社会的各方面，它不仅“暴露了这社会的黑暗面……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认为结尾是一幅“雄伟的景象”，剧作家使我们“看到了一片新天地”。

冬季收到一个姓王的姑娘从杭州寄来的求援长信，在朋友太太怂恿下携带刚得到的稿费，约鲁彦、章靳以同往杭州。三人约姑娘同游西湖，获悉她受后母逼迫，离家出走。失恋后带发修行，又遭和尚欺侮的经历。巴金和鲁、章商量后，第二天由巴金冒充她的舅父，还为她花了八十多元饭钱，赠予火车票使她脱离虎口。返沪后，巴金偕章靳以从火车站接送她到虹口舅父家。不久，她的亲舅父到良友图书印刷

公司编辑部面谢巴金。以后她又被安排到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社工作。

一九三六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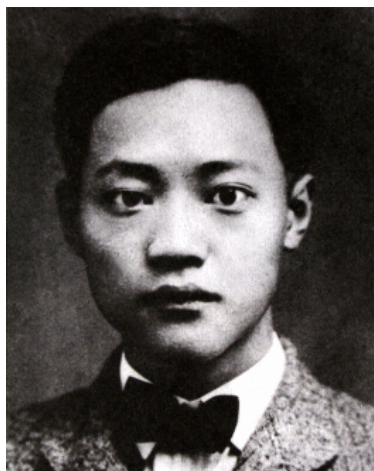
据《芝加哥的惨剧》增订的《自由血 五一殉道者五十周年》，署名芾甘，由自由社出版。

与到上海探望胞妹的武田博晤面，并约请他在永安公司大东茶室便饭，畅叙别后。后又到其胞妹处看望，未遇武田，留下礼物就走了。不久，武田回国后，曾给巴金写信。

从胡风处获悉青年作者彭柏山被捕后，化名陈友生，曾托内山书店转给鲁迅一封信。遂答应将胡风代彭柏山编辑的短篇小说集《崖边》列入“文学丛刊”第二集出版。

接到爱国女中学生陈蕴珍信，约请在新雅饭店晤面，有事商谈。担心巴金不认识自己，心细的陈蕴珍还随信附上近照一张。陈蕴珍即后来的巴金夫人萧珊。“她曾经和她的好同学陶肃琼一道去请过巴金和章靳以到学校演讲，两个人因此结识了巴金和章靳以，陶肃琼后来终于和章靳以结合了。”巴金应邀到爱国女中作报告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四川人。”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毫无架子、亲切和蔼的讲态赢得了学生的热烈掌声。

收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十七岁的学生杨静如的来信。获悉她为生活在酷似《家》的环境中，却有不能像觉慧一样地冲出“狭的笼”而产生的苦闷。还接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学生嘉蓁 林宁 信。得悉嘉蓁有“‘觉慧’式的热情与苦闷”。巴金后来给这位不相识的读者杨静如复信，并不时地鼓励她，要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



认为长篇小说《家》是“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是“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与茅盾、郑振铎等联合署名《反对 新地 辱华片宣言》。

三十四岁

一月初 作《 夜未央 后记》，载文化生活出版社三月版《夜未央》。简述重译《夜未央》的经过，说明这次是全译本。

一月上旬 作《 长生塔 序》，载《长生塔》。称自己的童话为“梦话”，因为“梦境常常是很美丽的”，“现实的生活常常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手上、脚上都戴着无形的镣铐。然而在梦里我却有充分的自由”。

一月下旬 作《 家 》，后易题《关于 家 ——十版代序》，原是写给香表哥的信。全文谈创作《家》的动机、人物形象和生活及与作家本人的关系、对笔下人物的分析等，是研究巴金世界观、文艺观和《家》的重要文章。重申尽管《家》取材于作者熟悉的人和事，“那些事情都争先恐后地要在我的笔下出现”，甚至“觉慧的性格也许和我的差不多”，但《家》不是“自传”，觉慧也不是“我”，而《家》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我的大哥，即使如此，小说中“觉新的遭遇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我主要地在采取那性格，并不一定要取那些事实”。三个女性梅、琴、鸣凤，“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三个不同的结局”；进一步阐述创作《家》的动机是“我”对旧家庭的“愤怒和留恋”、“认识和信念”，“我”看见旧家庭“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

境决定了的”“一天天往崩溃的路上走”的“必然的趋势”，于是，我“有勇气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 J' accuse 我控诉”，来写“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写它走向“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写“倾轧、斗争和悲剧”，写可爱的青年“受苦、挣扎……灭亡”，“写一个叛徒，……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以此“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

一月

与友人吴朗西商量，同意友人郑绍文、毕修勺和吴克刚的建议，将郑译邵可倡《人与地》及吴译《战时经济丛书》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因耗资过大，遂与郑、吴工作的世界社的主持人李石曾商量，由李出面介绍，取得上海信托公司八千元透支额。这笔钱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资金周转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文季月刊》被查禁停刊，又和章靳以重整旗鼓，准备创办《文丛》月刊，并广集名作家之文稿，拟出《文化生活丛刊》。

二月二十日 在《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发表《答一个“陌生的孩子”》。这是给一个不肯署名和没留下地址的十六岁孩子的回信。云：“黑暗，寒冷只是一时的现象”，“以后便是光明和暖热”，“不久春天就会来的”，劝导他“应该把时间用

来体验生活和钻研学问”，将来可以此为武器“攻击敌人，防卫自己”。

二月二十八日 夜，作《短筒序》，云：《短筒》“纵然不能给那些纯白的青年灵魂的安慰和鼓舞”，也要“给青年的心添一点温暖”。

三月十日 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短筒》。

三月十五日 与章靳以合作主编的《文丛》月刊创刊。

三月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童话集《长生塔》。

四月一日 作《西班牙的斗争前记》，载十月平社出版部版《西班牙的斗争》。

四月上旬 编完陆蠡的散文集《竹刀》，列为“文学丛刊”第五集。后因八一三战祸，拖至次年三月出版。

四月十五日 在《文丛》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散文《死》。叙述种种关于“死”的话，文末仍“坦白地承认”：“我还想活”，因为“我爱阳光、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青春，以及自然母亲所给我们的和平与欢乐”。《死》刊出后不久，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读后，很奇怪巴金为什么会想到关于死的话。她寄了两张海上海日出的照片来鼓舞和安慰巴金。“我接到那张照片，很感谢她的好意。”

四月二十日 发表杂文《向



青年朱光潜。

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载《中流》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针对朱光潜的《眼泪文学》一文，云“流泪”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不是可耻的事”；认为“叫人流泪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但是‘第一等文学’也无妨叫人流泪”；另外，又在指出朱光潜《眼泪文学》及美学论著中的某些错误后，提出“忠告”，“希望他把他的全部著作收回，请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学生仔细修改后再来问世”。

四月下旬 周作人、叶绍钧、冰心及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北新书局经理李志云，拟约巴金一起请律师，对仿古书店经理张蓝霄翻印“《巴金短篇小说集》、《海行杂记》……等混售于市场提出诉讼”。后因冰心在



国外，巴金又是张蓝霄的朋友，表示预先个人并未起诉。遂休庭作罢。

四月

作散文《梦》，载《文丛》月刊第一卷第二号。通过写梦景来剖析、袒露自己的内心，进而诅咒社会的黑暗。表示只有在梦里才得到片刻的安宁，梦中“我”有“一条简单的路，……一个单纯的信仰”，“这信仰还像太白星那样地放射光芒”；但有时也做“噩梦”，梦到自己“被判决死刑”将“登断头

台”，后又跟着“她”“走出监牢”；自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决心以“弱者”之身在重重的矛盾中苦斗，也许某一天能“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梦中的我和真实的我……合而为一”。

作《死之忏悔 后记》即《关于 死之忏悔》，载文化生活出版社八月版《死之忏悔》。《死之忏悔》为日本古田大次郎作，伯峰译。该书是古田被宣告死刑后写的日记。云“是血和泪的结晶”，是“以清晰的

笔墨、真挚的感情”写出的“一本不朽的书”，“已成了日本的圣经”。

接到许广平替鲁迅编成的《夜记》，文化生活出版社立即发排。

五月九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杂感《我只有苦笑》。本文系为萧乾主办的《作家们怎样评书评》专栏而作，揭露一些作者与书评家之间的矛盾。

五月

作散文《醉》，载《文丛》



一九三七年五月，读写之余，巴金与萧珊在苏州青阳港荡舟。

月刊第一卷第四号。是研究巴金早期思想、创作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作品。白云“将个人的感情消融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这醉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希望，使我一个幼稚的孩子可以站起来向旧礼教挑战，使我坚决地相信光明，相信未来”。

受赵家璧之邀，与鲁彦一起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选《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第二本。

六月二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杂感《几句多余的话》。认为朱光潜关于《最后的晚餐》是“油画”的说法不对。曾“去翻 Larousse 大辞典”查明《最后的晚餐》“不是油画”。最后说“犯错误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可耻的却在犯了错误而不肯应承”；同时承认自己说达·芬奇只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发明家也“不大对”。

六月二十日

在《中流》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号上发表书信《给朱光潜先生》。

在《中流》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随笔《答广州××先生》。云见过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被摧残以致临到那悲惨的结局”，因此“希望每一个有志气的年青人都离开那狭的笼去找寻自己的路——新的路”，自然要

有“计划”和“准备”，善于“忍耐”，要有“理想”和“勇气”，开始失败了，还应“用坚定的脚步走我们自己的路”。

六月二十七日 与文艺界人士茅盾、郑振铎、周扬、夏衍、以群、立波、林淡秋、任白戈、光未然、景宋等一百四十余人，联合署名发表《反对 新地 辱华片宣言》，载上海《大晚报》。揭露日德法西斯合拍的影片《新土》（又译《新地》）的阴谋，指出该片内容是鼓吹日本侵略东北，把中国说成是“大和民族”的“新土”，要日本人民向这块“新土”进发，寻求“新生活”的谎言；认为它的公映“是对中国人民的示威和侮辱”，并要求制造《新土》的电影公司和上映《新土》的电影馆，“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声明歉意，保证今后绝对不会有同样的事件”发生；同时提出：“中国政府应即日给民众爱国的机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一切爱国犯，以与日本帝国主义底文化的进攻相抗，直到中国四省的收复”。

六月

修订《家》新五号字本，这是开明书店未问世的第十版《家》。巴金又把小说修改了一遍，删去了四十个小标题，文字上作了不少改动，欧化句子也减少了。

在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室，经黄鼎书引荐，与刚从日本返沪的杜宣晤面。当即答应出版杜宣根据茅盾《子夜》改编的话剧剧本。

作散文《路》，载《文丛》月刊第一卷第五号。紧扣“路”阐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驳斥对他的中伤和误解，“我对自己的路始终没有怀疑过。……那是许多人已走过而且正走着的路”；“我从没有怀疑过‘抗×’即‘抗日’的路。我早就相信这是我们目前的出路。我所看见的大众的路里就包含着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此外我再没有个人的路”。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雷》。

约六月

与从广西大学回沪的马宗融夫妇相会。

收到在南洋读书的陌生女青年张弘信。来信诉说她的彷徨和痛苦以及渴望自由、呼吸“新鲜空气”，要摆脱殖民地生活、回归祖国到上海去的真挚而强烈的愿望。

巴金给张弘回信，并寄去当时“上海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的招生简章，热情地鼓励她勇敢地到上海来求学，表示愿意像照顾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照顾她。

七月上旬 接待从南洋赴上



海“寻找出路”的陌生女青年张弘，并委托好友、张弘的同乡伍禅夫妇照顾。后来在巴金和伍禅的关怀下，张弘进入暨南大学，以后又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加入了陈毅率领的新四军。

七月二十日 作杂感《只有抗战这一条路》，载《中流》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号。指出卢沟桥的炮声把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又说“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又“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认为“我们目前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可走”。

七月三十日 从号外上获悉北平、天津沦陷，日军从山海关外源源不断向华北增兵。平津沦陷后，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川越动身来沪的时候，巴金觉得“上海的天空布满了大片的乌云。好像被一只魔手扼住了喉咙似的，每个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勇气、信心、热情都被关于和平的谣言渐渐地洗磨干净了。接着来的是失望、疑惑与不安”。

七月下旬 作诗《自由在黑暗中哭泣》，与散文合题为《自由快乐地笑了》，载《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期合刊。诗中控诉日军“铁蹄

踏遍古城”，“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歌颂“高举反抗的旗帜高呼‘前进’”的人民，赞美“勇士把热血洒在北方的原野”的战斗精神。

七月 因罗淑返沪，遂从拉都路迁往霞飞路 今淮海中路 霞飞坊 今淮海坊 五十九号，仍与索非一家同住。

八月六日 作诗《给死者》，讴歌为自由而献身的抗日将士，以“我们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的誓言，表示前仆后继的决心。

八月七日 作杂感《站在十字街头》，载《国闻周报》第十

四卷“战时特刊”创刊号。指出中国“又站在十字街头了”，“忍辱屈服”的“路”不能走，决不能“跪倒在屠杀者的面前”；只要我们走“抗战到底”的路，就能获得最后胜利。

八月十三日

日军进攻上海，企图迅速占领，然后直捣南京。淞沪战争爆发。那一天，巴金曾经隔河望过对岸的火景，像在看燃烧的罗马城。房屋成了灰烬，生命遭受摧残，土地遭着蹂躏。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燃烧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难的人是我的同胞，我的兄弟，被摧残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一个民族的

《中流》杂志。





- ⊖ 与巴金合办抗日期刊的茅盾。
- ⊖⊖ 巴金、茅盾合办的《呐喊》和《烽火》。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理想正受着熬煎。……我觉得有一把刀割着我的心，我想起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这样的几分钟会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复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昂着头回到这地方来。我们要在火场上辟出美丽的花园。”

下午，会见茅盾和冯雪峰，商量创办一个适应抗战需要、能传导作家们呐喊声音的小型刊物。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现象：抗战开始，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在一片空白。

“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三人商议后，刊物初定名《呐喊》，由茅盾写发刊词。事后作了分工，茅盾负责找黎烈文、王统照商量，巴金负责找章靳以、黄源协商。

获悉美成印刷所毁于日军炮火，“小字本《家》永远失去了同读者见面的机会，幸而我手边还留了一份清样”。这份清样被订成两册，历经战乱和十年浩劫，现已送交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成为孤本。

八月十四日 清晨，被炮声惊醒，中国军队已开始对日军进行反击。上午前往四马路文生社，登上屋顶，目睹中国飞机炸沉日本军舰，为中国空军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第一次反击取得

胜利而激动。下午亲眼看见难民、伤员在马路上奔走、呻吟、流血的悲惨情景。

八月十五日

下午，打电话告诉茅盾，章靳以和黄源均赞成他们的方案，并提议十六日开一次同人会。后来约胡风、萧乾为《呐喊》撰稿，言明没有稿酬。胡、萧欣然同意。

在《文丛》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散文《生》。说明“侵略”违反了“生的法则”，因此“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是一个民族生存战争”。

八月十六日

与茅盾同约章靳以、黄源、黎烈文、王统照开会，讨论了编辑方针、纸张和印刷等问题，最后确定以《呐喊》为刊名。定于十九日交稿。第一期稿子由他们六人包下来。

作杂感《一点感想》，载《呐喊》周刊创刊号。用血的事实控诉了日军几天来的罪行，感到应该“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也决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坚信“我们用这个精神和这个信念跟敌人搏斗，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八月约中旬

应郑振铎约，到新雅酒楼参加座谈会，筹办上海文化界的抗战组织。中途，国民党党棍和特务扰乱了会场。

喜得胡风《“做正经事的机会”》和萧乾《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两稿，均编入《呐喊》周刊创刊号。

八月二十一日 作杂感《应该认清敌人》，署名余一。载《呐喊》周刊第二期。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也不过是替少数军阀政客浪人寻求升官发财的捷径”，日本人民只能“负担加重、生活困苦甚至生命毁灭”；呼吁“日本的民众，应该认清敌人，你们的确不该打中国的兄弟，只应去打国内的仇敌”。

八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自由快乐地笑了》，第一节为诗，题名为《自由在黑暗中哭泣》，载《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期合刊。诗表达了为反击侵略者的炮火而欢呼的激情。

八月二十五日 与茅盾等人自筹资金创办的《呐喊》周刊问世。署名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合编。该刊启事指出：“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八月二十九日 《救亡日报》、《呐喊》、《抗战》等报刊被工部局扣留，报童被打。遂与茅盾等人到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

八月

上海信托公司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八千元透支额到期，巴金向开明书店预支了一笔版税借给“文生社”偿还。吴朗西到四川筹办“文生社”内迁事务，巴金继续主持上海“文生社”的工作。

获悉罗淑接马宗融信，决意携女赴桂林。遂与章靳以等好友，尽力帮助罗积极作离沪前的准备。

《大公报》遣散人员，遂送萧乾赴内地，临别时，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许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

为工部局禁止《呐喊》、《抗战》和《救亡日报》发行之事，与茅盾、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联名电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邵力子，提出抗议。

九月三日 从茅盾处获悉邵力子的回电与回信，决定到工部局补办《呐喊》登记手续，并更名《烽火》。

九月五日

《呐喊》周刊出版两期后，得到内政部中宣会批文，改名

《烽火》。是日，《烽火》周刊创刊号出版，仍署名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合编，并确定编辑人为茅盾、发行人为巴金。

在《烽火》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杂文《所谓日本空军的威力》。声讨日本飞机对准候车离沪的难民连掷八枚巨型炸弹造成死伤六七百人的罪行，指出：死难者们的“血会染在日本历史上，写成日本史的最可耻的一页”，日军是“一群没有理性的渴血的生物”。

九月八日

与兄弟李采臣前往西站送罗淑母女登程，答应今年也离开上海到桂林找她们。收下罗淑留下的短篇小说《井工》，希望她到内地后将几个未发表的短篇修改一下寄来。

作《摩娜·里莎》，载《烽火》周刊第二期。叙述一位年轻美丽的法国妇女支持丈夫（中国空军上尉）“为着同胞”而抗战杀敌的故事，赞美这位妇女“爱自由，爱正义”、不在“强权下面低头”并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牺牲自己个人幸福的精神。

九月约上旬 偕师陀、章靳以前往李健吾家，看望在李家小住的诗人卞之琳。不巧，卞已完成《紫罗兰姑娘》（或《浪子回家》）的翻译，于日前离沪。遂在李健吾的书房里，与友人一起

“坐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杜工部和元明戏曲中间”，谈写作和抗战，认为“为抗战做点事情”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九月十九日 作《给山川均先生》，载《烽火》周刊第四至第五期。从日本报纸上读到山川均写的《华北事变的感想》，对该文恶毒咒骂“支那军之鬼畜性”，攻击中国军队的“残虐性”，深感气愤，予以揭露和回击。愤怒控诉日军在华的暴行，大义凛然地指出：中国人民是流了够多的血后才来发动抗日的运动的，这是自发的民众运动，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也没有力量可以抗拒它，“现在是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约九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业务停顿，清理时发现《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见没人管，决定出面抓这件事。眼看鲁迅一周年纪念要到了，手边没一分钱。找冯雪峰商量后，由鲁迅夫人许景宋借两百元，由科学印刷所先印行出版，余款后付。又与黄源一起为该书尽快出版奔走。

代为保存去内地的青年作家叶紫的中篇小说《菱》第一章手稿。

十月初 因茅盾于五日离沪，送子女到长沙，遂独自编辑、发行《烽火》。在接替茅盾的工作中，发现茅盾看过采用的



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自云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矛盾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

十月十七日 在《烽火》第七期上发表散文《纪念鲁迅先生》，署名同人。云值此抗战的时代，怀着沉重的心情纪念鲁迅，因为鲁迅是“最能爱护”中国青年的“友人”，文艺界“伟大的导师”，民族解放运动中“热烈的战士”，人类解放运动中“勇敢的先驱”；“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全中国的儿女像“磐石”、“铁流”，是摧毁“横暴的侵略者”的力量，“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实现”便是对鲁迅先生最好的纪念。

十月十九日

在《救亡日报》“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上发表随笔《深的怀念》，后易题《感激的泪》。“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想到不能再领受鲁迅先生的“仁爱”和“教诲”而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前往浦东大厦，出席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并携带十册刚装订完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与会。会上决定成立上海文艺界抗日协会。与郭沫若、陈望道、胡

愈之、汪馥泉、欧阳予倩、田汉等十一人一起被推选为临时执行委员。

十月二十三日 出席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临时执委会会议，宣布该协会正式成立。

十月二十八日 深夜，作《给日本友人（一）》，载《烽火》周刊第十期。本文系给日本友人武田博的信，控诉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血腥暴行。

十月 以“美国旧金山司塔克顿街平社出版部”名义出版译作两种：《告青年》，俄克鲁泡特金著；《西班牙的斗争》，德若克尔作。后者介绍和论述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以“全国劳工联盟”和“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为中坚力量的反抗法西斯蒂专制独裁的几次大斗争，揭露西班牙专制政治勾结宗教和意、德等侵略势力多次残酷镇压人民的阴谋和罪行，歌颂西班牙工农阶级与知识分子从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的压制下面抢救祖国的英勇斗争。论述“全国劳工联盟”和“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同，前者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前锋”，旨在反对专制独裁和“威胁着自由与文明之基础的敌人”，并与“一切人性的仇敌战斗”。这样，“西班牙境内发生的对法西斯主义的大斗争……就有了国际的意义”。

十一月约一日 接到在旅馆里做茶房的读者蔡仪亭的来信和来稿《一个苦力的日记》。该文记载了中国军队三百多人开赴前线的情景。阅后决定刊出，并在附记中指出：“我们应该感谢他，他使我们也看见了那三百多忠勇的壮士。”

十一月十三日 获悉大世界对面广告架上有一青年人跳楼自杀。此人是工人杨剑萍，见日军经过大世界前，为抗议日寇侵华罪行，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口号，纵身跳下。

十一月十五日 作《给日本友人二》，载《烽火》周刊第十二期。本文系给武田博的另一封信。用中国无数的“忠厚与诚实”的人民在日军侵略战火中无家可归的事实，唤醒武田等日本友人们的良知，让他们劝告自己的同胞“不要做征服中国的痴梦了”。希望他和他的同胞们“反省”，“和我们共同努力，毁灭那个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十一月中旬 与刚从湖南、汉口、杭州辗转返沪的茅盾晤面并约稿。茅盾答应把这次内地“旅行”的见闻陆续写出来。但写好了头两节，才登了一节，即《非常时代一》，《烽火》就停刊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为《烽火》本年最后一期即第十二期出版奔走。其时正值中国军队退出

淞沪战场，上海成为孤岛，该刊发行处上海城内西仓桥街五号化为灰烬，又因敌人的“禁止和封锁，断绝了我们和许多作者读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中立区域里自由地扬起我们的呼声”，《烽火》被迫暂停。

十一月 由上海烽火社出版散文集《控诉》。在《控诉 前记》中指出：集子中收的“短东西”，“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于危害主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

十二月月上旬

接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杨静如从天津寄来的信。获悉她因华北沦陷、日寇滥炸上海，东北大火“而担心巴金的安全”；并劝慰巴金“Wait and hope”。阅后“竟然淌了眼泪”，也“感激她的关怀”。

接到一个青年朋友的来信。获悉对方感到“孤独彷徨”，发问：“谁来领导我们呢？”阅后主张在青年们“失望”、“苦闷”时，应给予“安慰”、“鼓舞”和“温暖”。

十二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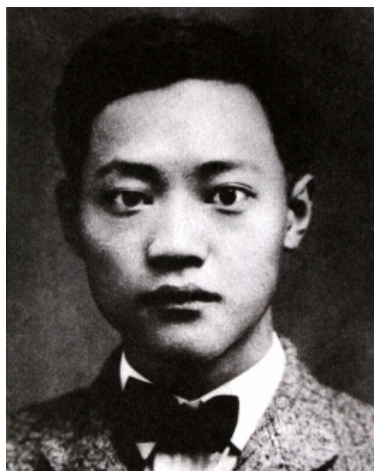
作杂感《一个感想》，后易题《感想 一 ——在“孤岛”》，载《文摘》“战地旬刊”第八号。对沦陷后的上海几百万中国的儿女，不在“敌人势力下低头”表示敬佩。

致信三哥李尧林，希望他能帮助在天津中西女子中学读书的杨静如继续用功读书。同时，致杨静如信，介绍她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的三哥相识。

十二月底

上海开明书店重排《家》，遂把手边一份新五号字的清样，作为修订稿交书店。在霞飞路 今淮海中路 霞飞坊 今淮海坊 五十九号索非家的三楼，一边校对《家》，一边开始续写《春》。

写信给朋友苏夫，告之近况，并说有一个时期真想把笔放下来，“然而神圣的战争来了”，看见了一些人嘴里嚷着抗战，实际却做着出卖祖国的勾当；也看见一些人慷慨地为祖国捐出了生命。“我要写，我要把他们写出来。”



作完长篇小说《春》。

陈蕴珍的母亲为女儿终身大事多方了解、考察巴金，同意并赞许女儿自己的选择，并对巴金说：“把女儿托付给你我放心。”

日军轰炸，民不聊生。巴金辗转于广州、武汉、柳州、梧州、桂林等地，历经战火忧患，坚信抗战必胜。

撰文称克鲁泡特金“思想超伦”，博古通今，他的著述是“人类进步的南针”。

三十五岁

二月二十八日 作《春 序》，载上海开明书店四月版《春》。抒发了当时在“孤岛”上“郁闷”的心情，以及“坐了一点钟还写不出一个字”的烦躁情绪，云：“还有眼泪，还有愤怒，还有希望，还有信仰。……我还能够跟这里的三百万人同样地感受一切。我在阴郁沉闷的空气中做过不少噩梦。这小说里也有那些噩梦的影子。我说过我在写历史。时代的确前进了。但年轻儿女的挣扎还是存在的。我为那些儿女青年写下这部小说，并希望“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看到尾声里面的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二月

长篇小说《春》在《文季月刊》上连载结束。交开明书店出版。早在一九三五年，巴金在日本听一四川女学生讲她“为出川求学”，决心冲破家庭束缚，“自杀未遂”，继续与保守、专制的父亲斗争并终于如愿的经过。当时曾计划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后因事未能动笔。

一九三六年与章靳以一起主编的《文季月刊》在上海创刊。创刊号计划连载三部长篇作品：曹禺《日出》、王鲁彦《野火》，第三部章靳以“派定”巴金“担任”。想起

四川女学生及很多在封建专制下挣扎的青年男女，拟题为《春》，并想把它作为《家》的续篇，“将四川姑娘的故事改成了淑英的故事”。不料“深闺小姐”的故事并没有“骗过”“审查老爷”的眼睛，小说刊发至第十章，刊物被禁。以后时写时辍，历时两年完成。《春》的故事从一九二二年春开始，至一九二三年春结束。作品中的淑英性格软弱，后在觉民和琴的影响和帮助下，终于冲脱家庭羁绊而出走。觉新所爱的蕙表妹因无力抗争父亲周伯涛的迫嫁，抑郁而死。通过淑英和蕙在“家”中的不同遭遇，揭露和控诉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现新一代冲破旧势力的束缚走向新生、对自由和春天的追求。

二月 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译作《叛逆者之歌》。

三月二十七日 被选为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被选为桂林分会筹备成员之一。其时巴金不在汉口。

三月

写信给在昆明的友人萧乾，促其写完长篇小说《梦之谷》，并告已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嘱“不可半途而废”。萧乾终于五月交稿。

看过《春》的校样后，与章

靳以一道离沪经香港赴广州筹办《烽火》旬刊。住惠新东街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时仍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并协助章靳以恢复出版大型文学刊物《文丛》。

在广州得知友人、女作家罗淑在成都病逝的消息。立即致信马宗融，希望友人勇敢些，抑制悲痛，不要让精神破碎，也希望友人“去做一切她喜欢的事，而不去做她反对的事”。

四月十二日 作《西班牙的血 序》。载上海平明书店初版《西班牙的血》。云：西班牙兄弟与法西斯的德意侵略者的苦战，正如我们目前抵抗侵略以争取我们的独立与生存一样，“我们和西班牙的兄弟……应该以同样的勇气向着伟大的目标迈步”。

四月二十日 译苏 H. E. 加闵斯基《一个英雄的葬仪》并作《译者附言》。载《文丛》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四月

作散文《纪念友人世弥》即《纪念一个友人》，载《文丛》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回顾了女作家罗淑即罗世弥温厚、热诚和常给人以无私帮助的品格。“她写过文章，有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又“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她“活在我们心里，活在



一九二五年的罗淑。

我们理想里”。

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编著的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加斯特拉绘。

发表译作《西班牙的血 献辞》，未署译者名。载《西班牙的血》。

发表译作《给散布在全世界的加里西亚人》，西班牙加斯特拉作，未署译者名。载《西班牙的血》。云“这些速写”在“悲痛中创造出来”，献给“永远宝爱着自由”、“能够帮助我们来重建……残破了的家园”的人们。

在《西班牙的血》中发表题画词十则，未署名。《祷告》题画词云：“诚实的妇人”“跪着”祷告主张“爱”的基督，谴责借基督名义“杀人、放火、抢劫、奸淫”的人。《法西斯蒂的上帝》题画词云：“法西斯蒂……用火、用剑、用炸弹、用大炮”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毁灭一切和平的城市”，建立他们的“座”。《“胆小的！杀人的凶手！”》题画词云：法西斯蒂的“刽子手”伤害妇女、抢劫财产；少妇称之为“胆小的杀人的凶手”。《屠杀》题画词云：“每一个新的理想都浸透了无数殉道者的血”，“尸体像山一样地堆积着”，站在一边冷笑的教士认为“千万的人”“不该有理想”。《埋葬》题画词云：“为理想牺牲”的人的“死”“都是种子”，“等到春天再来时它们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血债》题画词云：“母亲悲痛地抚着垂死的儿子”；“眼泪是没有用的。血的债应该用血来偿还”。《教师的最后一课》题画词云：“老教师……不肯把谎话教给他的学生”，他用死实践了他的诺言，孩子们含泪聆听“教师的最后一课”。《战士的遗言》题画词云：战士们“将勇敢地死去”，但战士的“理想会征服一切”。《残留者》题画词云：在“风暴”过后的“废墟”上，孩子们应该“拿起斧子去重建那残破了的家园”。《起来，世界上贫苦的人》题画词云：“信仰是不会消灭的”，呼吁“贫苦的人”“起来”！

获悉原黎明中学教师朋友陈瑜清与毕德孟女士结婚，并由卫惠林夫妇主婚，遂从广州寄去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扉页题

词云：“作为一个长兄的祝福。”

作《生人妻 后记》即《关于 生人妻》，载广州《众生》第六号。作者其时在广州，云世弥即罗淑生前曾答应自己编好《生人妻》付印，早逝使她无法实现诺言。飞机和炸弹又使“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在书店负责人数次来信催索下，就从速将《生人妻》编成了。

五月一日

经全力筹备，《烽火》在广州复刊，并增加篇幅，改为旬刊。因茅盾去了香港，该刊由巴金一人负责编辑，发行人为茅盾。“当时办理杂志登记时，需要一个发行人，我就找茅盾要了一张照片，由他当发行人，我当

主编。我编刊物还是跟茅盾学的，因为他有经验，版式也画得很工整。”

在《烽火》旬刊第十三期卷首发表《复刊献词》，未署名。云：“诚挚地希望”“《烽火》永远燃烧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日子”。

在《烽火》第十三期上发表《烽火 第一册合订本再版出书》广告，未署名，云：编者决定把《烽火》第一至十期与《呐喊》二期合册出版，因为在编者看来“那不是文字，是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

发表广告《我们的血》，未署名，载《烽火》第十三期。云：章靳以著《我们的血》一书，“这不是文字，这是短刀。收在这集子里的每一首长诗，每



巴金编的画册。

一篇短文都像尖利的刀锋，正对着敌人的心胸刺去。再没有比这更有力的，更坚实的，更容易致敌人死命的，更鼓舞起年青的中国的抗战情绪的；作者不再用情感来打动我们的心，他用血来呼唤我们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发表译作《一个西班牙战士的死》，西班牙 H. Rudiger 作。载《烽火》第十三至第十四期。文中记载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士布埃那文士拉·杜鲁底的生平，并赞他为“值得追从，值得信赖的人”，“他相信着工人只能够靠着他们的组织和直接的经济行动得到解放”，“他是以他的伟大、坚强、无比的博爱精神来领导人的”。

五月上旬 收到作家、翻译家朱雯从广西良丰寄来的小说《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五月十日 将旧译作《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的故事》交出版社重印。

五月十一日 在《烽火》第十四期上发表序跋《战士杜鲁底》。云杜鲁底是“另一个争自由的国度里最伟大的战士”，“西班牙民众爱戴的英雄”，并希望他的形象能透过“暗雾”“现露在我的同胞的眼前”。

五月约中旬 与刚从“孤岛”上海赴广州的林憾庐晤面，

畅谈别后，并约稿，要求能报告一点“孤岛”的近况。不久，得林短文《上海的一些现状》，编入《烽火》第十五期。

五月二十日

编选完画册《西班牙在前进中》。

作《西班牙在前进中序》，载《西班牙在前进中》。云：“这里有的不只是血的战斗与紧张的前线，还有和平的后方与革命的新建设。……这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

五月二十一日 发表译作《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A. Milling A. 米林 作，连载于《烽火》第十五至第二十期 未完。一九三九年四月平明书店出版。记叙一个国际志愿兵在西班牙前线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法西斯蒂飞机残酷的轰炸”，但“工人阶级企图从渴血的法西斯蒂压迫者的统治下谋解放的意志是很普遍的”，随处可见“女志愿兵持着旗帜到前线去”，“视死如归的青年战士”，还有“安那其主义的歌曲《老百姓》的歌声”，他们“为被压迫的人群谋解放自由”而“勇猛战斗”。

五月下旬 接缪崇群从桂林寄来的信。获悉他“身体比以前健康”，对未来充满了自信。

五月

开始作《火》第一部前三

章，后因日机连续轰炸而辍笔。

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译作《万人的安乐》，俄克鲁泡特金作。

编印传记《战士杜鲁底》，俄高德曼等作。平明出版社八月版。记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布埃那文士拉·杜鲁底的一生。曾云：编译此书是出于对杜鲁底的“感激”和“敬爱”，“同时也愿意让我的同胞在这一艰苦奋斗的抗战时期中略略知道另一个国度所经历的苦难，和伟大的西班牙的前途怎样在这些苦难中逐渐成长”。

约五月 偕章靳以前往汉口。在旅社会见担任改组后的《扫荡报》的主笔兼总编毕修勺。毕修勺也曾告诉巴金，陈诚已知道巴金在武汉的事。陈要毕转达巴金，陈诚将命令政治部和《扫荡报》给巴金一个名义，请他到前线去采访战况，写些文章。听了毕修勺的话，巴金摇头拒绝。并且不久就离开武汉到桂林去了。在武汉时，与先到武汉的好友卫惠林、吴克刚等晤面。

六月五日 作散文《给一个敬爱的友人》，载《烽火》旬刊第十六至第十八期，又载上海《文艺新潮》第一卷第一期。系致遭受法西斯迫害的日本友人社会学者石川三四郎的公开信。说：“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曙光。”



并进而认为：“东亚两大民族的解放，应该是我们和你们的共同目标。”

六月六日 上午日机第二次轰炸广州，与几个朋友躲在一幢四层洋楼的底层。空袭过后，惊闻友人雨田住处附近落下三枚炸弹，所幸她已带孩子脱险。同时，见到一个被炸弹炸成重伤的难民，“那染着血的白纸一样的脸不断地折磨着”巴金的心。又获悉承印《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的故事》的印局遭轰炸。

六月十三日 广州又遭轰炸，走过广州几条大街，“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几乎连一个小饭店也找不到”。

六月二十二日 作《在广州》，后易题《梦与醉 前记》，载《见闻》半月刊第一期“轰炸特大号”。回忆了三个月前火炬游行的盛大场面，描述了眼前日机狂轰下的广州，说：“这个城市还是一样地坚定沉着，好像没有一种威胁能够改变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似的。”

六月二十三日 夜，离广州往上海校改《爱情的三部曲》。

六月 开始作长篇小说《秋》。

七月一日 在《烽火》第十七期封二上发表广告两则，未署名：《万人的安乐 广告》，认为该书“雄辩的论据，精密的

论理，热烈的文笔，挟着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是“革命文学中的古典名著”；《告青年广告》云“这是每一个青年应该宝爱的小书”很多人从中“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全书“没有一点欺骗”，曾“震动过全欧美的良心”。

七月初 与章靳以自广州赴上海，住在辣斐德路 复兴中路一家旅馆里，大约两个星期，为开明书店修改重排本《爱情的三部曲》，公寓里很热，夜晚也不退凉。巴金“常常捧着《爱情的三部曲》工作到两三点钟，有时就在躺椅上迷糊地睡着了。直到……疲倦的眼睛无法看清楚书上

萧珊一九三六年冬留影。



萧珊送给巴金的第一张照片和题词。



的字迹时，……才关了电灯上床睡去”。

七月九日 校改《爱情的三部曲》，并作《爱情的三部曲 前记》。载十一月上海开明书店版《爱情的三部曲》。云作品是“没有一种暴力可以毁灭”的。“我永不能忘记的是这样的两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现在‘电光一闪’‘应该是信仰开花’的时候了。”

七月上旬

接受陈蕴珍母亲的邀请，到饭店吃饭。陈蕴珍的母亲也是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但是，这次是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去考察巴金的，所以，刚进入中年的她，穿戴得十分正式，“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气，装成老丈母娘的样子”，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言谈中获悉，在广州被日军轰炸期间，陈蕴珍的母亲陪着女儿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打听巴金的下落。巴金听了十分感动。让巴金更感动的是，这位善良的母亲当面把爱女托付给巴金，她说：“把女儿托付给你我放心。”

这是巴金和陈蕴珍母亲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见面。

七月十六日 作杂文《做一个战士》，载《少年读物》半月刊创刊特大号。认为“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并表示要用这些话“激励那些在彷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同日由上

海乘太古轮赴广州。

七月十九日 晨，船到汕头。将写给陆圣泉的信发往上海后，下船各处看了一下，在汕头小公园坐半天，后回船。作杂文《“重进罗马”的精神》，载《少年读物》半月刊第二号。以耶稣的门徒彼得在耶稣的感召下重进罗马城被尼罗王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为例，激励“住在‘孤岛’上的人，尤其是青年，应当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兴奋、振作，不要再陷入苦闷的泥淖中去”。晚，在太古海轮上，作完通讯《香港行》。载《少年读物》半月刊第二号。记述了在汕头及上船后的见闻。

七月二十日 下午，船到香港，把《香港行》寄给留在上海编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半月刊《少年读物》的陆圣泉 即陆蠡。与章靳以同宿于香港马卡奥。

七月二十二日 到达广州，住惠新东街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负责出版事务。

七月下旬 与高中毕业后也来到广州的陈蕴珍即萧珊晤面。

七月

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编著《西班牙的黎明》即《西班牙的曙光》 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作，未署名。《西班牙的黎明 献辞》称颂画册意义在于：将西班牙

革命这一“伟大的时代介绍给全世界”。

作《我的生活的故事 前记》，载一九四〇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我的生活故事》。

在《西班牙的黎明》上发表题画词，均未署名。《凯旋的进军》题画词云：“民众的军队”“确信”“胜利”，“凯旋地前进”，直到“敌人完全溃败”。

《钢铁》题画词云：“来福枪捏在手里”，向“杀害他的弟兄的凶手”战斗，“摧毁敌人的营垒”。《冲锋》题画词云：“向前冲锋。前面的人倒了，后面的仍旧继续着向前进”。《铁路工人》题画词云：“枪声一响”，铁路工人“放下铲子拿起步枪去防卫自由”。《战壕里》题画词云：打退了敌人，战士们欢呼：“我们一定要胜利！”《最后的拥抱》题画词云：平时一起过着“快乐的日子”，战时朋友牺牲了，他“紧握着那朋友的手”。

《她知道怎样去死》题画词云：“十六岁的……女子……去参加战争。……勇敢地向前进。……”

《一少女》题画词云：“抛弃了针线和少女的游戏”，她“成了一个英勇的斗士”。《休息》题画词云：战后休息，“将以新的精力来争取新的胜利”。《“不给他们通过！”》题画词云：她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争取同胞的幸福和自由”，举起武器，



“不给他们通过，决不！”。

《一个英雄》题画词云：“这是西班牙革命战士的典型”，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勇敢、智慧、毅力的表现”。《出发》题画词云：“战士们……微笑”，离别亲人“到前线去”。《流亡》题画词云：敌人烧毁村庄，“但是我不久要回来。……保护我们祖先的血汗所灌溉的土地”。《激战中》题画词云：战场上“志愿兵和看护热心地奔走”，“准备牺牲性命来救护受伤待毙的战士”。

《受伤的战士》题画词云：“受伤的战士”昏迷中嚷着“要回到战场上去”，看护给予“姊妹一般的爱护”。《觉醒》题画词云：战士恢复了“青春”和健康，他与看护“同时微笑”，“一种更崇高、更善良的新的生活在他们两人中间开始了”。《英勇的志愿兵》题画词云：志愿兵“眼里放射出信仰的光辉，他相信他的理想终于会得到胜利”。《收获》题画词云：是“劳动者”，也是“革命之……防卫者”，“镰刀同时是武器和工具 就是新社会的象征”。

八月二日 日机轰炸广州后，去正南路看灾区。

八月八日 下午准备给陆圣泉即陆蠡写信时，一从东战场归来的年轻朋友来访，突遇敌机三次轰炸。友人告辞后，林憾庐来访，约林去喝茶谈大半个钟头。

返出版社，印刷局送来校样。后，又与林同去看“灾区”。

八月九日 晨八时，尚在睡梦中，日机又来轰炸，下午三时方解除警报。夜，沿长堤散步，返寓所作完通讯《在广州》，载《少年读物》半月刊第三号。记述初到广州的见闻：敌机连续两次空袭，“街道”、“大洋房”、“礼拜堂”等被炸毁，死伤很多。但“警报解除”后，街市依旧，“说明这里居民的倔强”。

八月月上旬 编完《烽火》第十八期，并作《卷头语》云：“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黎明的曙光。”

八月十三日 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通讯《在轰炸中过的日子》。记述广州轰炸中作者的所见所闻。怀着“一个信念”和对敌机的“愤怒和憎恨”，编刊物、写稿、打包、邮寄“一直到十一点钟”指二十三点。不久“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城市”“是炸不死的”。傍晚和一朋友走出书店至汉民分局前，见一乞丐将讨来的钱献给“献金台”支持抗日，很受感动：“我的目光跟随着这个平凡的黑衣人，当他消失在人群中时，我还在各处找寻他。他的面貌对我显得更亲切了。”

八月十五日 作通讯《广州在轰炸中》，载《旅途通讯》。

记述从遭遇轰炸的广州人民中所受到的“教训”，“称赞他们‘结实’”；敌机的威胁对他们完全无用，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我会获得不少有益的教训”。夜，偕两位年长友人至哥伦布咖啡店二楼吃饭，窗下对面是献金台，见服务人员在演说，女学生在台上唱救亡歌曲，……颇受感动。

八月十六日 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杂感《一点感想》，后易题为《感想 二——在广州》。云“军事当局”开始炮击侵略者，表明他们“要洗尽从前不抵抗的耻辱”；歌颂人民“愿意为这神圣的抗战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坚信“东方的法西斯国家”、“穷兵黩武的帝国”“屈膝”、“崩溃”的日子不远了。

八月十九日 致信柯灵，告之“《烽火》仍续出”，只是不能按期出版；虽然“这里常遭轰炸，人心却很稳定，我还好”，目前不去内地，只是日内要到汉口看看。

八月月中旬 到武汉，住汉口扬子江饭店，与年轻的朋友晤面，谈抗日救国，表示愿与“国土民众共存亡”。

八月

作杂文《第一次听见那炮声》，载《感想》。认为八一三

“‘神圣的’炮声”把全中国人团结在一起了，“抗战中未来新中国的基石……被奠定了”。

作杂文《失败主义者》，载《见闻》半月刊第二期。指出主张“屈辱的和平”的悲观论者将“被全民族唾弃”；认为“抗日是一道门”，“要生存要自由”，只有“跨进这道门”，坚持抗战到底。

作杂文《国家主义者》，原题《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载《见闻》半月刊第三期。驳斥“征服”“杀尽日本人”、“征服世界”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的谬论；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为正义而战”，谋求“生存”和“独立”，因此，发动战争的“日本统治者”是敌人，被压迫的日本劳动者是中国人民的兄弟。指出“极端国家主义者和侵略者中间的差别很小”。

与茅盾交往颇频。茅盾常从香港来广州，住爱群旅社。巴金前往看望多次，交谈时局，商量《烽火》事宜，并曾一起就餐、访友。

所编画刊《西班牙在前进中》由平明书店出版。

九月一日 注释插画《残留者》，西班牙加斯特拉作，插画，载《少年读物》创刊特大号。发表通讯《别广州》，载《少年读物》创刊特大号。

九月上旬

准备去武汉，逢粤汉铁路被炸断。云：“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要把个人的情感融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同行者有萧珊及林憾庐。

第一天上午坐船出发，晚至三水，次日晨到清远。上午在新亚旅馆门前租得一小船，下午四时许划船过江，五时半乘汽车出发，傍晚到银盏坳。在车站等候去武汉的火车，夜两点无车，改乘汽车返清远。夜三时宿清江旅社二十五号房间，第三日中午起床。傍晚复乘汽车至银盏坳，夜上火车，第四日晨过江口，上午到英德，晚九时至乐昌，宿一小旅馆二楼。第五日由乐昌经广东坪石，晚上到衡阳。第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将到长沙时下车躲避日机轰炸，到一农人家喝茶。下午三时到长沙。第七日上午九时到武昌。

出席《自由中国》社同人举行的招待会。

九月二十八日 译《西班牙》，德 A. 苏席作，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平明书店版《西班牙》。作杂文《最后胜利主义者》，原题《杂感：三、胜利主义者》，载《见闻》半月刊第五期。对只空泛议论而缺乏行动的

“最后胜利主义者”进行批评。

认为“抗战的力量”在“中国广大的后方”，“民众动员”是抗战最后胜利的切实工作。

九月二十九日 译《西班牙进入一九三八年》，德 A. 苏席作，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平明书店版《西班牙》。

九月下旬

从武汉返回广州。此时广州已处在危急之中，到处同声喊着“保卫大广州”的豪言壮语。这时，章靳以已去四川，《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稿子收齐后，巴金单独担负了编定、校对等工作，同时继续编辑《烽火》。并撰写《火》第一部第四章。

作通讯《汉口短简》，载《旅途通讯》。住汉口扬子江饭店。其时敌军正“向武汉三镇逼近”，但“保卫大武汉”的歌声响彻江两岸。

作通讯《广武道上》，载《少年读物》半月刊第七号。记述从广州到武昌列车上的见闻。从坪石到衡阳再到长沙直至到武昌，一路数次空袭警报。战争带来灾难，但民众抗战热情高涨。

作通讯《从广州到乐昌》，载《少年读物》半月刊第四、第五号。记述离开广州后走了四天，脚迹还是在广东境内的旅途见闻，坐船、搭包车、挤大汽车、乘客车、上邮政车……一路往返，轰炸、警报声不断。坚信



铁轨会炸断，房屋会成为灰烬，民众的“工作精神是不会消灭的”，这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九月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散文、译文集《梦与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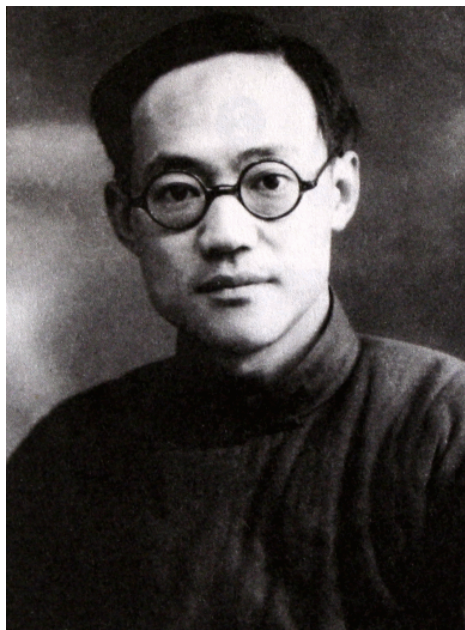
译《西班牙》，德 A. 苏席作，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胡兰畦。胡曾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称胡兰畦等女性“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并说：“要是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火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

在《惊蛰》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短论《纪念杜鲁底同志》。云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以及反法西斯蒂的各党派”，“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应觉得现在是神圣的联合的时刻”。

十月一日

发表卷头语《给读者》，署名编者，载《烽火》第十九期。为《烽火》脱期向读者致歉。

空袭后尚未解除警报，因和印刷局约定时间已到，匆匆拿当期刊物校样坐黄包车到印刷局，



一九三八年十月
巴金摄于桂林。

路遇空袭。

发表《西班牙在前进中画刊广告》，未署名。载《烽火》第十九期。云该画册“展开了西班牙斗争的全景”，有“前线的”“血的战斗”，有后方的“革命的新建设”，从照片还可看到“西班牙的未来”。

十月十一日 《烽火》出至第二十期，在日机轰炸下难以正常出版，被迫拟停刊。

十月十三日 获悉日军在大鹏湾登陆，仍决定留在广州，仍为继续出版《烽火》四处奔走。

十月十六日 形势紧迫，广州危急的消息从多处传来，遂与林憾庐等商量，决定撤出广州。因考虑到今后出版刊物方便和交通便利等条件，拟向桂林转移。

十月十七日 下午四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室会见林憾庐，获悉广州沦陷迫在眉睫，遂决定有船即走。稍顷，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来说，广州危急的消息不准确。遂与林等到哥伦比亚餐室喝咖啡，其时大有都德作小说《最后一课》的气氛。当晚，见八万壮丁在河南宣誓后列队向汉民路行进，到处都唱着“保卫大广东”的歌曲。夜十时返出版社校稿至夜十二时。

十月中旬 敌机时常空袭广州。有时巴金就到香港避难。

十月十八日 替友人去银行汇款，因上海银行迁香港，交通银行停汇，未果。作通讯《最后的消息》，后改题《广州在包围中》，载《少年读物》半月刊

第十六号。记述了广州人民抗战的悲壮场面：八万名壮丁的宣誓、游行队伍的口号、到处都在唱“保卫大广东”的歌曲等，“我在这里不过做一点摇旗呐喊的工作”。

十月十九日 下午，获悉警方通知，敌机明日要大轰炸。傍晚，去印刷局取到《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纸型，是时敌骑已越过增城。夜，在出版社四层楼露台眺望“广州的最后一晚”。夜两时许，作通讯《广州的最后一晚——十月十九日夜》。对当局的逃跑政策感到失望和愤怒。

十月二十日 广州陷落前十小时即十八时左右，由一将要参加抗日游击队广东石龙籍的友人相送，偕同萧珊、兄弟李采臣等一行五人与林憾庐等会合后，从码头乘小木船离广州，后又乘开往梧州的大货船。除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纸型。

十月二十一日 晨，船到容奇遇敌机轰炸，拖轮开往他处躲避飞机。上午，上岸到蔗林散步，回船看另两位朋友从镇上买来的《星岛日报》。傍晚开船。广州在轰炸中大火熊熊。已排竣的《烽火》第二十一期，因未制成纸型，随同出版社化为灰烬。

十月二十二日 船到马口。上岸沿蔗林到马口街饮茶不得，买几个沙田柚回船。敌机飞过并

撒传单。听传说，敌军已到广州郊外石碑。

十月二十三日 船到禄步，上岸三次，遇空袭到江边树下逃避，后回船休息。

十月二十四日 船到都城停开。上岸打听开往梧州的船期。回船休息至次日晨四时许。

十月二十五日 晨，乘小艇登上开往梧州的拖渡。因乘客已满，以一元半法币买得三个铺位，然后上岸吃早点。饭后，遇空袭，到江边山坡上一庙门前躲避。警报解除，上船休息后到一家大茶楼吃午饭。下午五时半开船，夜十一时许到梧州。因等候检查人员，深夜两点方上岸。

十月二十六日 晨三时宿一“破旧的小客栈”。八时，到一家广东茶楼吃早点。路见梧州公安局二十三日布告，方知广州已于二十一日失陷。后与萧珊去看住在另一家旅店的林憾庐，会面后同至一家咖啡店喝咖啡。遇空袭，随人流至城外山洞中躲避，后仍返茶楼。午，返旅馆，搬至楼上两小房间。听三个江苏布客谈从广州逃难经过，慨叹：“是这样平凡的三个小商人，他们对广州市的莫名其妙的失陷以及当局的昏聩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对抗战的信心却不曾因个人的受苦而有丝毫的动摇。”

十月二十七日 晨，又到山上一般人不大注意的小洞躲避空

袭。回城吃午饭后，下午，去看林憾庐。林决定提早去桂林编印刊物，巴金因受了转运公司的欺骗，从广州运梧州的书籍不曾运来，也有同样的计划。晚，在旅馆遇同从广州逃出来的朋友，一起喝了友人从广州带出来的酒，并决定第二天买去柳州的船票。

十月二十八日 奔波一日，未买到船票。后遇广州来的做新闻记者的老友介绍去托一位张老板。张要巴金次日晨七时到南华酒店听回音。

十月二十九日 晨七时到南华酒店，由做新闻记者的老友陪同到洞天茶室找张老板，返回时遇空袭，到骑楼下躲避，后回旅馆。下午到中国旅行社、梧州最大的新式旅馆西亚酒店买船票不得。晚，搬至西亚酒店。

十月三十日 晨六时起床，九时由旅店账房相陪到码头买票不得，十二时去南华旅馆找张老板。傍晚，到洞天饮茶半小时，独自到福安筏码头，意外地买到开往石龙的民富轮船公司的船票。夜九时上船，十二时离梧州。同行十人。

十月

译《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德A.苏席作，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平明书店版《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

为《见闻》半月刊作杂文《公式主义者》，载《宇宙风》



乙刊创刊号。批评写“不相信自己的话”又“叫人相信的话”的“公式文章”的人为“公式主义者”，他们顾念的只是自己切身的利益。认为必须“改革”“产生贪污腐败的政治机构”，“终止”“剥削民众的设施”。

十一月初 在开往石龙的拖渡船上，有时躺在铺上，听飞机声，有时看书，有时坐在捆缆绳的木桩上看小火轮、水手等。

十一月一日 译完传记《加米洛·柏尔奈利》，德A.苏席作。载四月平明书店版《西班牙》。

十一月二日 晨，船停桂平。与两友人坐小划子上岸，“走过两三条街”，又坐小划子返回。途中遇老友陈声树夫妇，他们坐小划子上拖渡船与巴金长谈后分手。傍晚，船停泊一沙滩边，上岸散步。

十一月三日 黄昏，船到石龙，与朋友上岸宿一民家办的临时客栈。深夜，堂弟李采臣枕头被蚊香烧着，巴金将着火的鸭绒枕头扔到街上，避免了一场火灾。

十一月四日 晨，到石龙车站打听开车情况；中午又去，终于弄到几张去柳州的车票。因林憾庐患病，又没有弄到车票，遂先行上路，并答应到柳州后，再托熟人为林憾庐等买票。傍晚到柳州，宿一家“伙铺”内，第二

天搬到旅馆内，打算休息两天。

十一月五日 嘱堂弟李采臣打长途电话到石龙，询问林憾庐何时启程赴柳州。获悉林病稍有好转，并已购到车票。傍晚，遂到车站迎接林憾庐等一行。

十一月六日 午后，去柳江河北游中山公园，在茶棚里饮茶时与林憾庐谈论抗战前途及半月见闻。又看到刚刚在外面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的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学生化装宣传队。

十一月七日 在柳州住了三天后，购得去桂林的车票。午后，搭渡船过柳江到河北在新柳江饭店二楼饮茶。晚，应林憾庐之约到柳江河北江边一家广东酒楼吃饭。

十一月八日 晨，与分赴重庆的兄弟李采臣和另两个朋友告别，偕萧珊乘汽车至桂林。受到林憾庐热情的款待，住位于漓江东岸福隆街林家。对住所感到满意：木板小房间，镂花的糊纸窗房，生满青苔的天井，后面可作马厩的院子，院后菜园及屏障似的七星岩。

十一月九日 在一家北方饭馆遇缪崇群。后缪陪巴金玩了不少的地方。缪离广西前，为等候便车曾搬到巴金寓所一同“过了好几天愉快的日子”。

十一月上旬 在桂林，续写《旅途通讯》，追记由广州至桂

林的逃难经过。

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杂感《写给读者一》，载《文丛》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云“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因为广大的、肥沃的土地上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十一月下旬 作通讯《从广州出来》，载十二月十三至十四日香港《大公报·文艺》。追记从广州出来到梧州的途中情况、在桂林的所见所闻，同时引朋友信转述广州沦陷时的真实情况。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与陶行知、胡愈之、鹿地亘夫妇等出席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为来桂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的招待会。

十一月三十日 与从广州、汉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几十名文艺工作者一起，汇聚于月牙山倚虹楼，决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并与夏衍等同被推选为分会理事。开会时，已闻敌机轰炸声。会后，归途浮桥被炸毁。丽尼家已化为灰烬。与友人同至月牙山躲避。

十一月底 作通讯《梧州五日》，原题《在梧州——旅途杂记之一》，载《民族公论》第二卷第二期。追记在梧州停留五日的行止和见闻：如挤在过道上过夜、躲进防空洞、广西大学理化

馆被炸、青年唱《义勇军进行曲》、争购船票等。

十一月

与萧珊热情接待原香港《立报》编辑、诗人、翻译家金克木。与友人林憾庐、朱雯商谈在桂林恢复出刊《文丛》和《烽火》，并拟当夜写信给丰子恺，约他星期六到桂林来。

在平明书店出版《克鲁泡特金略传》，卷首发表随笔《克鲁泡特金小丛书缘起》，未署名。指出：“俄国大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兼长文、哲、史、地、博物、经济、社会诸学。思想超伦，立论警辟。每著一书，文明各国无不争相翻译，以先读为快，因他能顺应人性，倡导自由；堪称平民解放的洪钟，人类进步的南针。克氏出身贵族，敝屣尊荣；不顾幽囚放逐，矢志为人群开辟进化的大道，终身作反抗暴戾者的先锋。这样的人格，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学识思想与行为，那有不令全世界心地清白，有志求进的青年不景仰感奋而效法呢”

广州失陷后，传说巴金“失踪”了。香港的朋友们都着了急，在报纸上刊出了“寻找朋友巴金”的广告，有的在写《回忆巴金先生》的文章，甚至准备开追悼会了。然而又有消息传来了，说巴金平安到了梧州，由梧州到了桂林。“随身带着的是

《文丛》第二卷第三期排好了的纸版”。

在桂林与艾芜、丽尼等相遇。是月，敌占区的许多文化界人士也纷纷逃难到桂林，桂林成了全国进步文化界活动中心之一。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在桂林展开工作，巴金并应邀到广西大学讲演。据陪同前往的萧珊回忆：“他一走上讲台，就窘得不得了。他想好了要讲的话，没讲多少就讲不下去了。他窘得面红耳赤，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后来实在讲不下去了，只好退下讲台。”

作杂感《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载《感想》。云现在“民众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受人尊重，在生活里却受人践踏”。坚信离了民众便不能完成任何伟业。抗战也不能是例外。

偕萧珊与鲁彦、罗洪等游象鼻山、七星岩。大家随着向导者的火把，在漆黑的岩洞里踉踉地前行。有时迎面出现一个瑰丽的钟乳，或者当头漏下一阵阴森的冷风，都会让人发出高兴但又惊悚的笑。最高兴的要数年轻的陈蕴珍、萧珊了。

十二月初 作通讯《民富渡上》，载《文艺新潮》第一卷第六期。在桂林追记十月三十日十二点离梧州乘民富拖渡赴广西石龙的见闻。

十二月上旬

作通讯《石龙——柳州》，载《鲁迅风》周刊第十期。记录了乘船到石龙及乘车赴柳州的见闻。

作通讯《在柳州》，载《文艺新潮》第一卷第七期。在桂林追记柳州三日的见闻和感想：“现实的黑暗面投掷了阴影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的不时发痛。但是光明永远在我们的眼前闪耀。我们始终不曾失去对未来的信仰。”

十二月十九日 中午与宋云彬、鲁彦、杨朔、张铁弦、丽尼在“桂林酒家”会餐，商讨出版文艺综合半月刊《一九三九》。

十二月二十日 在《文丛》半月刊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译作《佩德拉司兵营——西班牙日记之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 桂林受到日军第四次大轰炸，市区大火燃至深夜。在混乱中随人流到月牙山七星岩躲避空袭。

十二月下旬 译《西班牙日记的片断》，西班牙加罗·罗塞利作，载《文丛》半月刊第二卷第五、第六号合刊。

十二月

续写《火》第一部的第五、第六章，现为第九、第十章。

获悉好友章靳以抵重庆，已回母校复旦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并决定自明年一月起兼任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的



主编。遂答应为《文群》撰稿。

初识陈同生，结下终生友谊。陈系四川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与萧珊躲警报后回来，见缪崇群已在屋中坐等。几天后，送缪崇群一件萧珊亲手编织的毛背心。缪“说不出的感激，……抚摩着这件轻柔温暖的短衣”，称萧珊是“一个好心的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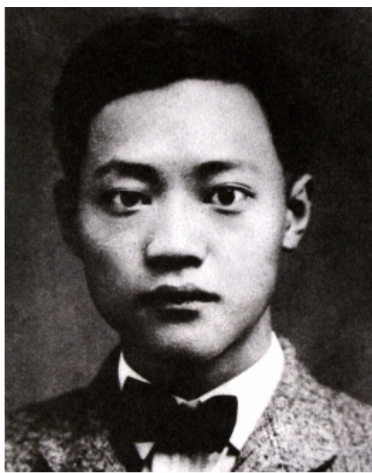
约十二月

连续收到杨静如的两封来信。获悉她已抵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与其他一些平津流亡学生一样，过着艰苦的大学生活。

得嘉蓁 林宁 信，获悉她已辗转赴延安，遂回信，“赞许她选择的道路”。

冬季 在桂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听到电影演员金焰的妹妹演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十分感动。在朝鲜朋友柳子明的帮助下，将歌词写进了《火》第一部，并将歌谱印在这一章的《文丛》月刊上。

约冬季 结识文学青年田一文。鼓励他随金山、王莹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去南洋；还告诉田拟回上海写《秋》和料理一些事务；并相约以后到重庆筹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临别时赠田西装上衣一件御寒。



一九三九年

表明“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声言“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

写于广州、武汉、桂林战火中的散文，“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

痛斥汪精卫之流是“认贼作父的汉奸”。

与好友对话，认为谈恋爱时应该“任感情自然发展，同时用点理智去引导它”，“不要做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

与从天津来的三哥李尧林在上海欢聚了十个月。

三十六岁

一月五日 作《写给读者 二》，未署名。载《文丛》半月刊第二卷第五、第六号合刊，坚信：“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刊物停刊”，“也不能使……抗战信念消灭”。

一月十二日 致信杨静如 署名德瑞。告之近况，“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

一月十五日 作《西班牙 后记》，载四月上海平明书店版《西班牙》。

一月二十五日 晚与宋云彬、夏衍等出席《国民公论》宴请。

一月中旬 作通讯《桂林的受难》，载《旅途通讯》。云桂林和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一样，“在他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

一月三十日 作通讯《桂林的微雨》，载三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描述敌机轰炸给桂林人民带来的苦难。云“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复仇的日子呢……什么时候轮到我們升到天空去将那些刽子手打下来呢”

一月 多次外出躲警报，感到是强迫性地“游山”，胆子变得大起来。并且，在轰炸的日子里续写《火》第一部部分章节。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约一月 拟主编《文学小丛刊》，并与李健吾、沈从文、艾芜、朱雯等作家取得联系。又为亡友罗淑整理遗作《地上的一角》。

二月十一日 晚与鲁彦赴宋云彬寓所与宋等谈至十点，在座者有傅彬然。

二月十三日 拟去上海，让宋云彬写介绍信给“伯涛”。作《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 前记》，载四月上海开明书店版《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

二月十四日 作《旅途通讯 前记》，载《旅途通讯》。表达自己“宝爱友情”的心情。云：“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它救了我。”

二月 由桂林经金华、温州到上海。经温州时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事迹印象颇深，由此联想到自己，云：“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至上海后，住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索非家，在巨籁达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工作。

三月十一日 夜，作《旅途随笔 重排题记》，载《旅途随笔》，云：即使“在阴云蔽天的时候，我还看见未来的晴天的亮光。现在我还是和从前一样，

能够站起来做人，我始终相信我们民族的新生的力量”。

三月二十日 发表杂文《我的饶舌》，载《民族公论》第二卷第二期。

三月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旅途通讯》。实录一九三八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在广州、武汉、桂林一带旅途中的见闻，是抗战初期华南一带的社会缩影。作品在《少年读物》半月刊连载六期，被法租界当局禁止，遂设法改为《少年读物小丛刊》出版。自云这些文章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

春季

应上海《文汇报》副刊编辑柯灵的约请，拟撰文“帮忙”。适逢当时鼓浪屿被铁骑践踏，并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

作散文《南国的梦》。文章回忆三次到泉州的“愉快”的旅行，以及与有着“在废墟上重建宝塔”和富有“献身精神”的“耶稣”即叶非英结下的深厚友情。

作散文《黑土》，载《宇宙风》半月刊第八十期。抒发了对“黑土”、“红土”的深切的爱，表达了对友人的怀念和对抗

日斗士的歌颂之情，“在那灿烂的红土上开始出现了敌人铁骑的影子了。那许多年轻人会牺牲一切，保卫他们的可爱的土地。我想象着那如火如荼的斗争。有一天我也会响应他们的呼唤，再到那里去”。

作散文《卢骚与罗伯斯庇尔》，载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副题“回忆之一”。文章抒发了对卢骚和罗伯斯庇尔的崇敬之情，云：“在那座寂寞的像前……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但是我更轻视我自己。我的痛苦太渺小了。在个人的琐碎的悲欢里苦苦地挣扎着的我有什么权力来向那个‘日内瓦的公民’申诉我的痛苦呢”

作散文《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副题“回忆之一”，载《宇宙风》半月刊第八十四期。回忆十二年前参观巴黎蜡像陈列馆的心情，歌颂马拉有“伟大的心灵”，“充满牺牲的精神”。记述刺杀马拉的少女夏洛蒂·哥代和为哥代而死的亚当·鲁克斯的悲剧，又一次表达了对卢骚的崇拜，云：“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作散文《在广州》，记叙去年日机轰炸的罪行：废墟、尸体和恐怖，又赞颂宁愿自己“嚼草根”、“讨钱”捐赠给抗日团体

的爱国民众、以及不怕“炸死”坚持抗日宣传的女学生；追记自己在敌机轰炸中的悲愤心情和看校样的情况。

获悉好友黎烈文在福建永安主编的《改进》半月刊即将创刊，拟撰稿以示支持。

四月一日 作《西班牙的斗争 前记》，载上海平明书店版《西班牙的斗争》。

四月十七日

在上海《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杂文《巴金启事》。云：“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并未得我同意。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并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伸出头颈让人宰割。”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旅途通讯》。

四月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译作《西班牙》，德 A. 苏席作。

作《逃荒 后记》，载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艾芜作《逃荒》。云这些“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的文章，它“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由上海平明书店出版译作《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瑞士柯柏尔·米宁作。

作《西班牙的日记 前

记》，载《西班牙的日记》。

由上海平明书店改订五版出版译作《西班牙的日记》，西班牙 C. 罗塞利作。

作《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 前记》，载平明书店版《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与夏衍、盛成等人同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推定为“文协”桂林分会筹备员。

出版译作《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德 A. 苏席作。

又作杂文《和平主义者——杂感之六》，载《宇宙风》第七十八期。痛斥汪精卫之流“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这是对侵略者“投降”，是“认贼作父的汉奸”，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出版译作《一个家庭的戏剧》，俄赫尔岑作，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文学集林》第四辑。

五月二十五日 作《谢绝写序书》，载汉口《东南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因“素来不赞成替别人写序的办法”，婉言谢绝为别人写序。

五月

作《我底自传 新版前记》，载开明书店初版《我底自传》，俄克鲁泡特金著。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我底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又云“我自己比任何人

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底纪录”。

作《感想 前记》，载重庆烽火社出版的《感想》。云收在《感想》中的文章“全是真话”；“自己十分喜欢那一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写最后一段时敌机就在我头顶上投弹”。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译作《我底自传》，俄克鲁泡特金作。

六月十八日 作《互助论 序言》，载十二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互助论》《克鲁泡特金全集》第六卷，朱洗译，克翁学社编。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学术的著作”。

六月二十日 发表《写在罗淑遗著的前面》，后改题《地上的一角 后记》，载《鲁迅风》半月刊第十六期。云在桂林时在飞机的轰炸中仔细地读完了罗淑的小说。

六月

译《互助论 英文普及本序》，俄克鲁泡特金作，载上海平明书店版《互助论》。

作《雨夕 后记》，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雨夕》。云八一三以后没得过毕矣午的信，原来准备出版这本书的书店停业了，“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这样腐烂下去，便拿出来编在《文季丛书》内交给出版社付排”。

赴香港，到萧乾处取衣箱。衣箱原来寄放萨空了处，萨空了离港后，转寄萧乾处。“我去香港取回我在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前存放在香港友人处的衣箱。六月去港，住了不到一月。”在港期间曾写信给李尧林，约他同返上海。

七月十九日 致信孙陵，载桂林《笔部队》创刊号。云近来身体不好，打算休养一下，同时在翻译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

七月

作杂文《关于爱国者》，载《鲁迅风》半月刊第十七期，文末有作者《附记》云：“我不明白赛珍珠女士的《爱国者》为什么会这样地被中国上海作家和出版家注意。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人’抛开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抢着翻译这一本‘虚伪的书’。”认为《爱国者》“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有的只是捏在外国人手里的灯影”，“到处都是对我们这次抗战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同时反驳了林语堂关于“白克夫人是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的说法。在《附记》中还说明：朱雯说巴金“劝过他翻译这书”是“他记忆错误”。

由重庆烽火社出版散文、杂

文集《感想》。这些文章鲜明表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驳斥了失败主义、公式主义、和平主义的谬论。

在港迎接途经香港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的萧珊，并应邀一同参加萧乾的宴请，同席者尚有田一文等人。不久，在送别萧乾赴英国、送别萧珊前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读书后返沪。

约七月 获悉三哥李尧林将应朋友之约，拟前往四川某大学任教。为了不让“生活的担子过分压了他，让他换换空气”，遂去信，建议他到上海来做点翻译工作。

八月十二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德瑞。云“不要过分讨厌或害怕恋爱”，应该“任感情自然发展，同时用点理智去引导它 就是说不要糊涂”，“只要不要做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便行了”，希望趁年轻时“多读点书”。

八月十三日 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散文《“八一三”》。

八月

作《三月天 后记》，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〇年十月版屈曲夫作《三月天》。回忆与屈曲夫的交往，说“对他和散处在各地的友人”“不觉起了深的怀念”，“百感交集”，“不能成眠”，因此“花了一些功夫”，编成此书。

作《黑土 前记》，载《黑土》。说：这次写的和从前所写的不同；写别人，更多写自己；不但写了那个充满着耶稣精神的朋友，写了献金的乞丐和被炸垂死的平民，还写了卢骚、马拉、罗伯斯庇尔等等；“这些人在我一生中多少有过一点影响”。

在上海开始《秋》的创作。每天除了去巨籁达路即今巨鹿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处理一些日常编务工作外，几乎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创作上。每晚从九点左右开始写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天亮，几乎没有间断过，白天写书稿，或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这种隐士式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次年五月一口气写完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秋》。

作《荒 后记》，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〇年六月版田涛作《荒》。一九三六年田涛从北平寄《荒》原稿给巴金，要他找一个出版的地方。巴金虽没见过作者，但仍把它介绍给某大书店。但稿子送出去后没有下落，后巴金代为编就出版。

九月上旬 获悉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九月二十七日 中秋节下午，意外地与从水灾中的天津至上海的三哥李尧林欢聚。“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自此，“我同

他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兄弟俩同住在霞飞坊朋友索非的家里，巴金住三楼，李尧林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写《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李尧林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小说《悬崖》。所根据的英、法译文本都是巴金拿给他的。一个星期里兄弟俩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而且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

九月

修改旧译作《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作。一九四〇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获悉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并偕女友王育常同住老西门内文林街女生宿舍。

十月三十一日 致信孙陵。此信与七月十九日致孙陵信合题为《寄自上海》，载一九四〇年桂林《笔部队》创刊号。云：“近来身体不好”，感到“寂

寞”，但仍坚持“读外国文”，“预备短期内”译完克鲁泡特金的《狱中记》，并告之打算去昆明过暑假，然后去桂林。

十月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黑土》。

发表译作《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俄亚历山大·赫尔岑作，载上海《文学集体》第一辑《山程》。

冬季

作《叛逆者之歌 前记》，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叛逆者之歌》。云书中“十二首革命者的和关于革命者的诗歌”是“血和泪的结晶”，“自己被他们感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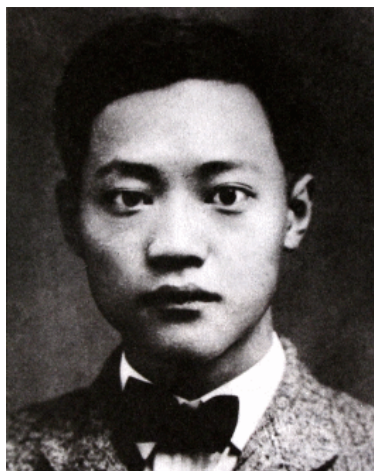
译《忆古田大次郎》，日中滨铁作，载《叛逆者之歌》。作者抒发与古田大次郎之间是“‘信’的兄弟”“‘爱’的同伴”，认为“每个革命家的一生中都有着立誓献身的崇高的一瞬”，而“真实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产生”，坚信“枯草”“在来春又有新芽发生”，立誓“向

着永久的黎明迈步前进”。

作《忆古田大次郎》译后记，附于译诗后，载《叛逆者之歌》。云：《忆古田大次郎》系作者在“大阪监狱中作的忆他的同志古田大次郎的长诗”，现在只摘译出一部分；同时介绍诗作者中滨铁的生平。他与古田大次郎因“同是所谓‘大阪事件’的主要人物”而先后“被判处死刑”。古田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上绞刑台，中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受绞刑。

获悉萧珊偕女友王育常从女生宿舍迁往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宿舍大院的二楼居住。

从报上剪辑萧乾发表的散文、通讯，代其编成散文集《见闻》，交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月下旬，自一九二三年离故乡后巴金第一次回故乡四川。

十二月上旬，在一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周恩来。

桂林出现“研究巴金热”。

认为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描绘的“保证万人的面包与自由的未来信念”，就是“向着真理的路进行”的目标。

在抗战离乱中作完长篇小说《秋》。

抱着“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的想法，写完《火》第一部。

到昆明、重庆与萧珊、曹禺等人欢聚。

三十七岁

一月

发表译作《一个家庭的戏剧 二》，俄亚历山大·赫尔岑作，载上海《文学集林》第二辑《望》。

见三哥李尧林生病，劝其静养和暂停译述。

二月二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德瑞。告知每天连休息时间也没有，因为要完成给自己拟定的写作任务。

三月十五日 下午六点半在霞飞路绿野新邨二号房间为即将赴港的许广平饯行，陪客为李健吾、王统照、赵家璧、唐弢、陆蠡等。

三月二十五日 作《面包与自由 前记》，载八月上海平明书店版《面包与自由》。云这“是一首真理的诗”；我们的目标“是向着真理的路进行的”，这个目标即克鲁泡特金在书中所描绘的“保证万人的面包与自由的未来的社会”。

三月

作《面包与自由 后记》，载《面包与自由》。说明各种译本的来源。

改译完《面包与自由》，俄克鲁泡特金作，邵可侣为法文本作序，八月上海平明书

店版。

春季

译《一个家庭的戏剧》三、四，俄亚历山大·赫尔岑作，载上海《文学集林》第四辑《译文特辑》、第五辑《殖荒者》。

作《利娜 序》即《利娜 前记》，载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利娜》。云：“《利娜》“是根据六十年前一个俄国少女写给她的女友的信改写的，里面所述大半是当时的实事”。

作《关于作者和这本小书》，载《一个家庭的戏剧》。

五月

开明书店一再催交长篇小说《秋》，因前半部原稿已送至印刷所排版，于是“每日每夜地写下去”，“已经写到四十万字，离预定的结局还远得很”。是时，在欧洲，德军铁蹄向邻国大举践踏；日本侵略者气焰也更为嚣张，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 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朋友又来信催巴金到内地去，于是，遂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像现在这样地结束了《秋》的创作”。

《秋》四月上海开明书店发排，七月出版。《秋》是巴金抗战中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春》

的续篇，是《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从一九二三年春开始写到当年秋天高家的彻底解体。自云《秋》里面写的就是“高家的飘落的路”。“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得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高家这棵树在落光叶子以后就会逐渐枯死。”《秋》展现了这样一幅图画：高克明和高觉新力图维持“家”的种种努力和企图终于失败，高克明死后留下的觉英、觉群等又是纨绔子弟，克安、克定瓜分遗产后更一步步走向腐化堕

落，五太太沈氏为争夺陈姨太的继承权和四太太王氏闹翻，惟一的女儿淑贞又被逼跳井自杀。作者“本来给《秋》安排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朋友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这小说的阴郁的颜色”，写成觉新搬出了公馆，得了个贤淑的妻子翠环，过着宁静的小地主的生活，而觉民和琴等已挣脱封建专制的精神锁链，更热烈地追求新的生活，并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代表新生力量的觉民、琴、淑华、芸等终于成长起来，形成了“激流”。

作《秋 序》，载《秋》。本篇写作日期原署一九四〇年二月，现从《巴金文集》。云自己“激动地对着八百



巴金《激流三部曲》初版书影。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多页原稿纸微笑，又对着他们流泪”；这几个月是自己“心情最坏的时期，《秋》的写作也不是愉快的事”；自己是在“掘发人心”，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但鼓舞着自己的，一是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二是“温暖的友情”。

“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是那些朋友的面影使我隐约地听见快乐的笑声。我应该特别提出来四个人：远在成都的WL，在石屏的CT，在昆明的LP和我的哥哥。”巴金所说的友人分别指一九二七年一月同去法国的朋友卫惠林、散文家缪崇群、未婚妻萧珊和三哥李尧林。云：“没有他们，我的《秋》不会有这样的结尾，我不会让觉新继续活下去，也不会让觉民和琴订婚、结婚。……我请他们记住琴的话：‘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现在我已经嗅到春天的最初的气息了。”

六月十五日 作论文《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平明书店初版《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修改后的论文计八节。认为“美满的幸福生活是不能够由损人利己的道路达到的”，它“不但不束缚个人的自由”，相反，而是去“鼓舞人为着真理与正义奋斗，创造理想社会”，并在其中“发

挥所有他身体的、精神的和情操的力量”。克鲁泡特金的“一切著作将永久是我们在正义之恶斗中的指导原理”。

六月十八日 作《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 后记》，署名译者。载一九四一年六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本书系据英、法、日、德、世界语、西班牙六种译本重译，“相信……所负的责任，是在忠实地解释我们的大师的思想”。

六月二十四日 作《伦理学中译本前记》，载《中国与世界》第六期。称克鲁泡特金是“伟大的科学家和革命者”，称蒲鲁东是“另一个伟大的安那其主义者”，巴枯宁“在某一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蒲鲁东的继承者”。

六月下旬 写完长篇小说《秋》，思念在昆明上了一年大学的萧珊；又因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侵略势力猖獗，估计“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决定暂停《火》第一部的写作，托中国旅行社代办护照，作好离沪准备，并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切社务委托陆蠡负责。觉得陆是位“难得的好人”，又托他照顾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三哥李尧林。

约六月 整理书籍，找到一册《罪案》，系李健吾父亲的好

友景梅九撰写，内容是关于山西辛亥革命的传记。将书借给李健吾。李回忆说，该书“老早就绝版了，很少有人有这本书，尤其在上海。……巴金借给我……再三嘱咐。我为他好好保存，因为他不久就去了辽远的内地”。

七月一日 发表译作《居友的伦理学》，俄克鲁泡特金作。载《中国与世界》第一期。

七月初 作离沪前准备。“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

七月上旬 带着自己加印、开明书店用辞典纸印内文、用织锦作封面的精装本《秋》和刚写的《火》第一部十一章，告别前来送行的三哥和陆蠡，登上英国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怡生轮离开上海。船中途因遇风在福州湾停泊一天半。到越南海防后住一家华侨旅店。后由海防到河内，又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河口住进客栈。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站登记时“遇到点麻烦”。护照上写着：“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因随身没带有关证明，遂回客栈找到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又带了精装本《秋》以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检查官杨不再留难，并于下午偕

两位同事到客栈拜访巴金，当晚又到客栈邀巴金及两位同行者同到越南老街一家华侨酒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将巴金等送回客栈，握手告别。次日晨，离河口。后回忆说，在老街过的这两个钟头“今天想起来还觉愉快”。

七月

抵昆明，见到前来迎接的萧珊等人，百感交集：“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

在昆明旅馆居数日，到开明书店分店去取款，得到书店负责人卢芷芬帮忙，搬到武成路一间相当宽敞的房子里居住，四周花树繁密。在这里住近三月，得卢先生夫妇照料，写完了《火》第一部、散文《静寂的园子》和《狗》等。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编著画册《西班牙的苦难》，西班牙加斯特拉绘。

在上海平明书店初版《西班牙的苦难》中发表译作《西班牙的苦难 序》，西班牙加斯特拉作。未署译者名。云：“殉道者常常创造出英雄不能够了解的世界。在我的国土里，殉道者的志愿会成为事实。”

在上海平明书店初版《西班牙

的苦难》中发表题画词，均未署名。《看以后谁还敢举起拳头》题画词云：愤怒谴责侵略者砍去自己战士拳头和脚的罪行。原注：“举拳头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敬礼式。”《法西斯蒂的天堂》题画词云：在法西斯建立的国家里，“没有爱和笑，没有花和光”，只有“死亡和凄凉”。

《轻的刑罚》题画词云：被压迫者“忍受”着鞭打，发誓“有一天”“会站起来”，“索取这笔小小的债”。《冤沉海底》题画词云：揭露外国侵略者和反动统治者将人们残害在海底的罪行；虽然“冤沉海底”，但“死并不是完结”。《未来的圣人》题画词云：“用自己的血灌溉了理想”，“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他们杀死了她的儿子》题画词云：敌人杀死了她的儿子，她抱着“木头”，“哭着，笑着”，“低声唤他的名字”。

《他们也有来迟了的时候》题画词云：“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忍受痛苦和侮辱”；敌人来时“除了血，他们再也找不到什么了”。《为了祖国宗教和家庭》题画词云：揭露敌人残酷、虚伪的真面目，他们杀人、奸淫、毁灭了祖国，败坏了宗教，摧残了家庭，却“偏偏说：这都是为了祖国，为了宗教，为了家庭”。

《宁死在被辱之前》题画词云：敌人带着“色情的笑声”在追赶

“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少女”，少女为自己的清白跳河，宁愿让干净的水“保护她”。

和萧珊乘火车到呈贡见到了沈从文、张兆和及其孩子们。他们一起游西山龙门，一起躲过警报。此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的薪水也难使一家人温饱，但是他不叫苦，这使巴金很感动。巴金看到沈从文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有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同时，也理解他有点寂寞的心境。因为，在昆明常有对沈从文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巴金极赞成沈从文埋头做事的主张，要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

八月十日

由青年作家卢福庠即卢静陪同，出席西南联大文学青年座谈会。巴金应座谈会要求，谈了自己的创作：“我不懂文艺，只知道写我熟悉的东西。现在写得不好；几十年后，生活比较丰富，也许可以写得比较好些。要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作家。外国作家就喜欢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很好，他最懂得世故人情。”

发表《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载《中国与世界》第二期。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作《一个家庭的戏剧》，俄亚历山大·赫尔岑作。



八月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修改后的中篇小说《利娜》。

九月十日 在《中国与世界》第三期发表译作《蒲鲁东的道德学说》，俄克鲁泡特金作。至《中国与世界》第四期全文刊完。

九月二十二日 作《火第一部后记》，载十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火》。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热情”，“宣泄”“悲愤”，还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并且又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总之，“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但写完后，“觉得”“失败了”，“也许缺少充足的时间”、“经验”和“材料”；感到欣慰的，是在作品中“对我的几个异国朋友表示了敬意。我想努力绘出他们的面影，但是我知道我把他们的主要的精神去掉了”；以后的写作计划是《火》的第二部将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第三部将写冯文淑和朱素贞在内地的遭遇；第四部将写朝鲜光复的事情。

九月

作完长篇小说《火第一部》，十二月重庆开明书店初版。反映八一三以后上海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冯文淑、朱素贞、刘波、周欣等人本着“在

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信念，积极参加护理伤兵、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大多还很幼稚，缺少生活经验，但都真诚地、忘我地工作着。当上海的战斗行将结束时，有的告别温暖的家庭、热恋中的爱人，奔赴新的前线；有的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上海坚持斗争。朝鲜抗日志士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也构成小说的一条线索。主人公冯文淑的模特儿就是萧珊。萧珊时为高中学生，曾到伤兵医院当护士，并用笔名“慧珠”在茅盾主编的《烽火》周刊上发表报告文学《在伤兵医院中》。巴金据此文写了《火第一部》的第二章。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作《叛逆者之歌》，俄普式庚等作。

获悉萧珊在西南联大改读历史系。

十月一日 昆明遭二十七架日机轰炸。夜到金碧路灾区用手电筒照路，只看见砖瓦、木片、灰尘。

十月三日 昆明又遭日机轰炸。又到金碧路灾区，见三具被挖出的无名尸体，默默地揭下了帽子，流下眼泪。夜，作杂文《先死者》，载十一月十六日重庆《国民公报》。叙述遭日机轰炸后昆明的惨状，仿佛“每一块碎砖”都在呼叫“复仇”；认为

“先死者的血”“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十月七日 晨七时开始作散文《无题》，十一时半作完，到郊外防空袭时，我的头上“看见二十五架敌机飞过”；下午一时在田野上补记《无题》。载十四日香港《大公报》。记述法国官员欺压中国学生的事情，感到“自己被书本欺骗了”，以前曾说“我爱法国”，现在感到“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希望法国人民像他们的前辈卢梭、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那样以“无畏精神”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同时重申了自己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永不会停止抗战”。

十月十一日 作散文《静寂的园子》，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二期，总题为《轰炸中及其它》。以优美、细腻、抒情的笔调描述“空袭警报”间歇一天的写作生活，赞美中国飞机“声音多么雄壮”，表示“要放下笔到庭院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负着金色阳光在蓝天里闪耀的灰色大蜻蜓”。遇空袭，中断《静寂的园子》的写作，“在城门口经过一阵可怕的拥挤后”，在郊外“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还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返回继

续写《静寂的园子》。

十月十三日 二十七架日机又轰炸昆明，到郊外防空袭。返城后获悉一位朋友所在的学校惨遭敌机轰炸，遂作散文《轰炸中》，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二期，总题为《轰炸中及其它》。记述十日敌机轰炸时的所见所闻；一个朋友说，“日本人欠中国人的这笔债不晓得要到哪天才还得清！”上午，作散文《大黄狗》，载十一月十四日重庆《国民公报》。记叙自己住处附近的一条大黄狗渴求“自由”，进而写到“自由是一个生物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当到郊外躲空袭下午五点返回时，那条狗已被炸死。以此揭露侵略者的罪行。

十月十七日 二十六架日机又袭昆明，与卢芷芬夫妇、萧珊同到郊外防空袭。“我摊开带在身边的那张油布，躺在树下小河边一块斜坡上”，看“大片金黄色的稻田”，和天空二十六架敌机，以及市区上空的浓烟。

十月约中旬 深夜灯下喜读曹禺新剧作《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亮光。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十月二十一日 作散文《十月十七日》，载《无题》。记述十月十七日到郊外防空袭的情

况，听见一个声音：“把昆明炸光了，老子也还是要抗战！”

十月底 经沈从文介绍，托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买到飞机票。上飞机前一两天，恰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曾对卢芷芬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安抵重庆后，住沙坪坝友人吴朗西夫妇办的互生书店里。这是巴金一九二三年离故乡后第一次回四川。

十月
开始翻译俄屠格涅夫作《处女地》。

作《不久就可出来》，载《自由中国》月刊新一卷第一期“作家书简”栏。

约十一月初 前往北碚么店子山上复旦大学新盖的楼中访章靳以、梁宗岱等好友，又偕章靳以访住在石子山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胡风。

十一月八日 与章靳以欲搭船渡江到重庆，等船时，遇胡风，谈了一些文坛上的情况。

十一月九日 早晨，在章靳以家会见前来相约过江的胡风，获悉当日下午将召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简况。

十一月约中旬
自重庆坐船到江安县戏剧专科学校访曹禺。途经泸县，获悉船要停泊一瞬，遂上岸观光。“这是我第三次踏上泸县的土地，第一次还是在十七年前。……现在

我重睹这可爱的土地，我的心上已盖满了人世的创伤”，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两手并不曾染过一滴别人的血”。在街上，看见小孩在掷“糖罗汉”，“忽然觉得自己回到小孩的时代……感到一种幼稚的喜悦”。

在泸县两次施舍一儿童乞丐，八个月后，据此作散文《伤害》。

到江安，在曹禺家住六天。时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旧友重逢，异常高兴，一天下午，与曹禺一起到茶馆喝茶，谈论文学创作：“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其时每天早晨“从东市散步到西门，总要来回好几趟”。

到江安后，当地中学师生来信邀请去讲演，回信说不善于讲话，也不知道讲什么好，感谢学生对他的信任，认为青年是中国的希望，“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自己这小说家算得了什么”自谦无资格做青年的老师，但愿做他们的朋友。“当青年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自己就很满意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了。”学生把信在学校张贴出来。两三天后，省里督察下来视察说这信是“诱惑青年”，是“瞎捧”，下令撕掉。

十一月十八日 在沙坪坝用几天时间“把大堆信件打发走”后，是日同一朋友到南温泉洗澡，宿青年会楼上二号房间。

十一月十九日 晨，同友人游南温泉花溪、看瀑布，回房间后作《关于雷雨——给一个上海友人》，系写给上海剧艺社《雷雨》导演吴天的信，载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龙·虎·狗》。谈及江安之行，并回忆了第一次读《雷雨》时在东京看《雷雨》上演时的情况。说：“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并且为它掉了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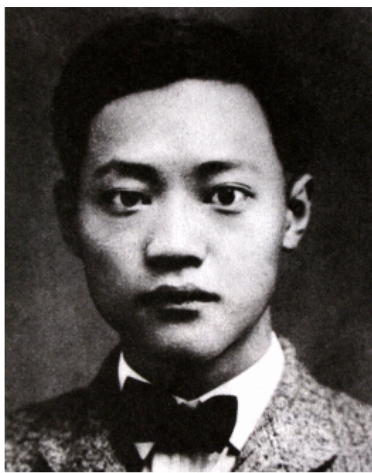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七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的“欢迎来渝作家茶会”。同时出席的还有茅盾、冰心、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等七十余人。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茶会，并讲了话。这是巴金首次见到周恩来。

十二月十六日 作《蜕变 后记》，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曹禺《蜕变》。云：“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雷雨》……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里程碑”。认为“把《蜕变》介绍给读者”，就是“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十二月二十四日 作散文《在泸县》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回忆十一月中旬在泸县的见闻及感想，云“一个中国的城市在废墟中活起来了，它不断地生长、发达，任何野蛮的力量都不能毁灭它。我怀着这个信念回到了船上”。

十二月下旬 桂林出现“研究巴金”热。“接连出现了不少的响应文章。……我像一个候判的罪囚等待着研究的结果。然而我却只看见一些吱吱喳喳的‘名文’。有的在小说里发现了‘安那其’，……说我只用中学生常用的字眼写小说……”

十二月 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长篇小说《火》第一部。



一九四一年

离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成都老家过春节。此后遂靠自己稿费承担起养活继母、弟弟和大嫂一家九口的生活重担。

与萧珊等好友聚餐时，巴金烧的红烧肉和辣椒炒肉丝是地道的四川风味。

携萧珊乘木船沿漓江游阳朔。

自述《火 第二部》也是一本“宣传”抗战的书。

针对一些批评，白云：“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

三十八岁

一月上旬 常和同住的田一文一起散步或坐茶馆，听他谈战地服务团工作的一些情况，渐渐熟悉了他谈的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构思《火》的第二部时就只写这件事情，故原拟题为《冯文淑》。

一月约上旬 与章靳以等几位友人商谈筹建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之事，并确定亲自主编《曹禺戏剧集》，让章靳以主编《烽火文丛》。

一月三十一日 在重庆《剧艺》第十八期上发表创作谈《关于 家 》。云：“我要出来为这代青年复仇，为他们不必要的牺牲叫冤。……写完《秋》，我完成了《家》的三部曲，居然把压了我十八年的心的重担摔碎了。我把我过去的一切全埋在一个更深的坟墓里，我觉得我真的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这只是一群年青人的挣扎的记录，这所谓挣扎其实也是一场决死的苦斗，因为这苦斗的结果，给那些青年发见一条路，带来一线光明。”

一月

在成都老家，与亲友团聚，欢度春节，“花费了不少的眼泪和欢笑”。获悉五叔沦



巴金一九四一年春在成都与家人合影。



为小偷病死狱中和三姐李尧彩惨死的经过。读到祖父的遗嘱：盼望后人守住旧宅和书画。

寻找旧居，但老屋易主，变成了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藜阁”。“我走过我离开了十八年的故居。街道的面貌有了改变，房屋的面貌也有了改变，但是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见到旧雨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锯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水的长方形大石缸。”“旧时的伴侣不知道全消失在什么地方。……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

在成都，作创作谈《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给抗战文艺的编者》即《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第三期合刊。云：“以前读了不少的小说 特别是翻译的，受了一点影响，所以在寂寞痛苦，心受煎熬的时候，拿起笔写起东西”，“先写了一些事情，后来便有一些人物”，又到生活里找寻，“把他们拼凑起来”，“放进一点自己的想象”，这样，“人的面目和性格明显地露了出来”，如杜大心、李冷；至于两个三部曲中的人物，“不是从我想象中出来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面影长留在我的心上”，有时使我热情似火，又取熟人的性

格，“借重自己的想象”，描写时“保持着性格描写的一致”，其实“是他们自己在生活。许多事实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时也自然发生了”，而有时预先“安排的事情反而无法写在书里”，这样，“那些人在我的小说里活起来了”，我与他们一起“活动、受苦、哭、笑”。

作《冰心著作集 后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又重作，载一九四三年七、八、九月的重庆开明书店版《冰心著作集》的散文集、小说集、诗集。说明替冰心编书的经过、感情和目的：“十几年前我是冰心作品的爱读者，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

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同时，“希望曾经温慰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今朝生活在“寂寞的梦中”的青少年“送些许温暖”。

多次与故友施居甫、吴先忧等见面，回忆十八年前在成都编辑《半月》时，“那值得人怀念”的往事，畅谈十八年间的工作与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也为虽被“生活的担子”压倒的施居甫仍把那么多的友爱来慷慨地分给朋友的“美丽精神”而深受“鼓舞”，并和两三个朋友曾商量好一个帮助他养病的计划，使这个愿意为社会牺牲自己的人，活得长一点。

访马宗融并祭扫女作家罗淑墓。但见“一抔黄土，一块石碑，一丛矮树编的短篱”。在“悲痛的回亿包围中”，为这里埋葬了“年青有为的生命”和“友情，尊敬和许多朋友的期望”而惋惜。拟收集罗淑“遗留下来的全部稿件”，整理出版罗淑的第三本散文、小说集《鱼儿坳》。

二月 在成都获悉挚友陈范予病逝于武夷山，为十二年来“关切、鼓励、期望、扶助”自己的好友的死，感到“寂寞”和“巨大的损失”。

二月上旬 告别成都老家“家”，赴重庆。家人送到门口，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行。“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度过了五十个傍晚。……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的确充满了留恋……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乘上经过球溪河、内江的公路车赴重庆后，仍住沙坪坝互生书店二楼。

二月 从成都回来后 得陈范予“生前寄出的告别信”，不忍卒读：“我读了开头的几句：‘无论属于公的或属于私的，我有千言万语需要对你说，但我无从说起。’我只有伏在书桌上淌眼泪，范兄，我不是在为你流泪，我是在哭我自己。”陈在病中受到的折磨以后成了创作《寒夜》时描绘主人公汪文宣的素材。

约二月 返重庆后，遇主持抗战文协工作的老舍。谈话间，老舍叮嘱巴金：“你出去，要告诉我呵，胡风走的时候来找我长谈过。”

三月十五日 经“文协”用通信方式进行改选后，与郭沫若、茅盾、冰心、老舍、胡风等二十五人当选为理事。

三月二十二日

晚在“窗外细雨如丝的春三月寒夜”，编完罗淑遗稿《鱼儿

坳》，从“那些颇为潦草的字迹”，仿佛看到“一个善良仁爱的女性的心的跳动”，遂提笔作序后交文化生活出版社。

作《鱼儿坳 后记》，载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罗淑《鱼儿坳》。云：罗淑的“死并没有毁掉一切”，坚信“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死亡，而且也永不会死亡”。

三月下旬 因去年底某些人热中于“研究巴金”“嘁嘁喳喳”的不符合实际的“评论”，遂安排新的创作计划。“为了给那些‘研究者’添加点麻烦，为了给他们找出一架镜子来照出他们的尊容，我还要继续写我的小说，而且要永远地写下去”。

三月二十九日 开始创作中篇小说《火》第二部。仍住互生书店楼上，却在互生书店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潜心创作。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巴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写作时还找朋友问一些生活细节，从三月底到五月下旬写完。按最初的构思，准备写一部宣传抗日的书。

三月

作《无题 前记》，载《自由中国》新一卷第三期。云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文章“全和抗战有关”，才“集起来付印”；“过去作文……只是信笔直书，……没有依照文章的作法”，“这次用‘无题’作书名，无非说实话”。

作散文《爱尔克的灯光》载四月十九日《新蜀报》副刊《蜀道》。记述上月回成都“家”中的思想，着重回忆三姐，抒发对旧的专制家庭的憎恨。“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青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

四月 继续创作《火 第二部》，每天约写两千五百字。

五月约中旬 《火 第二部》初稿写成，将原稿给萧珊和田一文看，并听取修改意见。

五月二十三日

作完中篇小说《火 第二部》，又名《冯文淑》，一九四二年一月重庆开明书店出版。叙述冯文淑等青年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深入战地作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工作的情形，着重描写冯文淑的成长和变化，反映了抗战初期的时代和社会风貌。

作《火 第二部后记》，载《自由中国》新一卷第五、第六期合刊。说明《火 第二部》的创作动机及写作经过。云：“这是一本宣传的书，但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为了宣传，我不敢掩饰自己的浅陋，就索性

让它出版，去接受严正的指责。”针对一九四〇年底在桂林有人说在他的“小说里发现了‘安那其’”的批评，又云：“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样东西。”如《火》“便不是‘安那其’的书”。“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

六月十三日 在重庆沙坪坝，夜雨绵绵，屋子漏水。“整夜发着高热，不能闭上眼睛”。想起了“善良仁厚的亡友”陈范予，“我的心燃烧着，我的身体燃烧着，但我的头脑却是清醒的”。

六月十四日 勉力作《忆范兄》，寄托对亡友的悼念，但因发热而中断。数日后热方退尽。

六月十七日 作完散文《忆范兄》，载《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第五期合刊；又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第四卷第二期，题为《死——纪念范予兄》。追忆“善良仁厚的亡友”陈范予。

六月 由桂林烽火社出版散文集《无题》。

七月初 致信萧珊，云将由重庆到昆明。萧珊接信后，虽取消了与王育常、刘北汜、王文

煮、萧荻徒步绕滇池旅行的计划，但仍热心地从昆明金马书店的西班牙文翻译家、巴金的老友庄重处借一匹大红马，帮助王育常等人驮行李，并在昆明金鸡巷等巴金。

七月七日 与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景宋、许地山等联署《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

七月约上旬 从重庆到昆明与萧珊会面，在金鸡巷四号，住在萧珊同班男同学刘北汜、萧荻等人的屋里。刘、萧等外出旅行，并为巴金搭好了铺位。说是铺，其实既无床板也无凳子，而是用六个盛汽油铁桶的旧木箱子拼凑起来的。刚来就患病，由萧珊照顾，不几日病愈，潜心于散文创作。“上午或傍晚，或夜间，除了到附近茶铺去泡开水外，我不常到外面去。我总是坐在窗前书桌旁边，有时看书，有时写信，有时也写短文。这些时候好像心里装了很多东西似的，我只想把它倾吐。拿起笔就想写文章。这样我每天总要写满两三张稿纸。”

七月九日 作散文《风》，题为《风——呓语之三》，载八月七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叙述梦中“腋下生出双翼”，“御风而行”和儿时在大风中玩游戏、“跟风斗争”的乐趣，以及后来在海上遇

到飓风和炎热的日子里，“窒息得快要闭气”的情景，而这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起一阵大风，或者下一阵大雨”。

七月十日 作散文《云》，题为《云——呓语之一》，载二十四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云“想乘云飞往太空”，幻想“摆脱一切的羁绊”，但“为了帮助人”而“留恋人间”。

七月约中旬

偕萧珊上街购买炊具，自行开伙。与萧珊亲自动手做菜，与旅行归来的王育常等聚餐。巴金烧的红烧肉和辣椒炒肉丝是道地的四川风味，备受欢迎。饭后，听王育常等叙述旅途见闻及访问沈从文的情况。

与萧珊一起热情接待缪崇群介绍来的女学生刘女士。请萧珊陪刘上街购物、看电影。

七月十六日

作散文《雷》，题为《雷——呓语之二》，载八月五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记叙从小“怕听雷声”；随年龄增长，“看穿了神和鬼的谜”，“不再畏惧”；更后，听见雷声，感到无比的畅快，春雷一声，……地面上便布满了生命。

得“南洋朋友”胡愈之来信，获悉该地易群书店出售署名巴金的短篇小说集《驴》和《父子》。因这些书系翻版偷印，遂

打算致函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让读者知道那些‘书商’的欺骗行为，免得……上当”。

七月十七日 作《致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者》，公开声明：新加坡出现的短篇小说集《驴》“不是我的作品，我没有写过叫做《驴》的小说。……我并没有出版过一本叫《父子》的书”，这些书均系“别人翻版偷印”、“冒名牟利”；要求将这信在《文艺》上发表，以期保护作者和读者的利益。

七月二十日

作散文《雨》，题为《雨——呓语之四》，载八月十六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从一个意大利亡命者发布里“为着自由贡献了一生的精力”的故事，写我“热爱阳光”，有时“也酷爱阴雨”。云：“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了浇熄这心火，我常常光着头走入雨湿的街道，让冰凉的雨洗我的烧脸。”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告之“不日离昆去桂林”。

七月二十一日 作散文《日》，载《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梦痕 三则》。云：

“为着追光和热”，“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七月二十二日

作散文《月》，载《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梦痕 三则》。“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写月光的“冷”和“寒”，并抒发思友之情。

作散文《星》，载《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梦痕 三则》。云：“嵌在天幕上的”“美丽的星星”，永远给“人世间的 不幸者”以“无上的安慰”。认为“在我的天空里星星是不会坠落的”。

七月二十四日 作散文《狗》，载《龙·虎·狗》。叙述“看见狗，我总是逃”，后“觉得怕狗是可耻的事情”，乃至敢“拾起”一块石子，对狗打过去。通过这种变化，用象征手法赞美敢于抗争的精神。

七月二十五日 作散文《猪》，载《龙·虎·狗》。描绘了生活在污秽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的猪，被人养着，又被人吃掉，最后仍然吃着，睡着，养肥自己，准备给人们饱餐一顿的愚蠢。用象征手法，表达作者对庸庸碌碌人生观的嘲讽。

七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



《虎》。通过叙述深山和尚与虎为友和猎户送虎皮给父亲这两个故事，表明“在兽类中我最爱虎的”原因，是虎“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的确是值得我们热爱的”。

七月二十八日 作散文《龙》，载《龙·虎·狗》。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梦中出现了“新绿”、“花朵”和鳞甲乌壳的“龙影”。

七月三十日 作散文《死去》，载《自由中国》新一卷第四期。用荒诞的手法、冷嘲热讽的辛辣笔调写一群“吱吱喳喳”的文人对一位作家“生前”和“死后”围着入土的棺材进行的口诛笔伐，作者嘲笑那些批判作家作品“浅薄、落后、不通、错误”的“原稿纸”，“仿佛是一些未烧过的纸钱”。

七月

接待由湖南大学来昆明的金克木，获悉金将转道缅甸去印度加尔各答中文《印度日报》当编辑，并攻读梵文。

接待诗人赵瑞蕤及其夫人杨静如。杨静如即杨苡，萧珊和王育常的好友，因与赵瑞蕤结婚后怀孕而辍学。赵其时在昆明东北郊岗头村南菁中学任教。

偕萧珊前往四十里外呈贡龙街沈从文家小住数日，与冰心、卞之琳等欢晤，畅谈别后。

获悉章靳以被解聘，拟离开重庆，前往福建南平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及主编《现代文艺》月刊。

八月一日 作散文《伤害》，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月刊第四卷第一期。描写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顽强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表现了“我”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八月二日 作散文《祝福》，载《龙·虎·狗》。记述接到一个十五岁的北方孩子表示祝福的信时的激动心情，说“不信神”、“不信鬼”，“不想进天堂”、“不怕入地狱”，但那孩子的“赤子之心”却“振奋了我的精神”。又作散文《醉》，副题《给一个朋友》，载二十日重庆《新蜀报·蜀道》。歌颂“一个朋友”酒醉后“更坦白”、“更真诚”、“更清楚”的“优美的性格”和昂扬的精神。

八月三日 作散文《生》，载成都《战时文艺》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歌颂“一个畏友”真正了解生的意义：“把‘利’践

踏了”，“把‘名’埋葬了”；“抛弃”“安乐和荣誉”，为集体“贡献”“全部时间和精力”；“追求光明”，“想把它带给亿万的同类”；“追求自由”，“想把它还给受苦的人群”；帮助年轻人“获取幸福”，“争取自由”，“而且将他们引上光明灿烂的前途”。又作散文《梦》，载《自由中国》新一卷第五、第六期合刊。写梦中父亲的慈祥、孩童时代的欢乐，以及梦醒后四周的孤寂，抒发怀念父亲的深情。

八月四日 作散文《死》，副题“纪念范予兄”，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全文歌颂没有停止过撒播生命种子的笔，蘸着自己赤热的血写字的友人，“永远活在我们中间”。又作散文《撇弃》，载上海《萧萧》半月刊第一期，又以《撇弃——呓语之七》为题载二十六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这篇作品通过“我”和自己的“影子”的对话，抒发了作者愿为光明献身的精神：“我若得到光明，就把它分给众人，让光辉普照世界。若得不着光明，我愿意一个人寂寞地死在中途。”

八月五日 作《龙·虎·狗序》即《龙·虎·狗题记》，载二十二日《新蜀报·蜀道》。云：到昆明一个月“差不

多天天落雨”，“叫人心烦”，于是写些“随便谈谈”的文章，“书名《龙·虎·狗》并无深意”。上午，编成散文集《龙·虎·狗》：“今天我把写过的稿纸检点一下，一共是十九篇短文，连以前存放在上海友人处的四篇较长的文章，也可以编成一本小书了。便花了半个上午的功夫，将集子编好。”后将稿子寄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蠡。

八月十四日 凌晨，被警报声惊醒。与萧荻、刘北汜、王文煮等急忙起床，会齐住在女宿舍的萧珊及王育常等前往郊外躲警报。刚出“联大”新校舍北墙豁口，几十架飞机就已到了昆明东郊机场上空，等他们来到“联大”校园半里地外的北山坡下，敌机已经开始投弹，机场一带立刻卷起浓烟。敌机越过昆明上空，又在他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投了弹。那天警报解除很迟，中午饭是在也出来躲警报的小摊上买了点小吃，胡乱充饥。警报解除后，回到金鸡巷住所，巴金发现“楼上三间屋子里满地碎砖断瓦，倘使我躲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多嘴了”。

八月十五日 中午，走过被敌机轰炸后的废园，见三具用草席盖着的尸首，“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看后，“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

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

八月十六日 晚饭后，散步时又来到废园边。遇雨，折回宿舍。昨日所见情景，历历在目，遂构思散文。当晚，作散文《废园外》，载十月九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描写敌机轰炸之后，一座精致的楼房毁成废墟，一个长期幽居在这个园子里度过寂寞的青春的少女被炸得只剩下“一只带泥的腿”。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充满了愤怒，也为这个少女曾经被窒息的青春而悲戚。

八月十七日 作《白甲骑兵 后记》，载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罗淑译《白甲骑兵》，说明整理出版罗淑的第二个翻译小说集的任务是自己和陆蠡两人一起完成的；认为在战乱的日子里，随时都可能死亡，但仍要“抓紧”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九月八日 偕萧珊及其同学王文煮乘汽车由昆明经过贵阳到桂林，途中顺便在河池停留。到桂林后与王文煮筹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并安排王在办事处任职。

九月约中旬 住在一幢木制的小楼里，与王鲁彦住处相邻。巴金坐在用板搭成的楼房里，在用竹子编成的小书桌前埋头写作。

“晚上点起一盏植物油灯……写到油干灯尽，我那颗燃烧的心得到宁静，我才丢开笔倒在床上。”

九月二十日 下午，应邀前往乐群社，参加文协桂林分会举行的欢迎茶会。与会者尚有刚抵桂林的田汉、何家槐等。

九月二十二日 偕萧珊坐木船沿漓江游阳朔，晚坐木船返回桂林。作散文《火》，载十一月十三日桂林《大公报·文艺》。抒发自己对抗战必胜的“火”一样的激情。

约九月 与艾芜、张天翼、鲁彦等商量，拟在桂林筹办宣传团结抗日的刊物《文艺杂志》。据王鲁彦夫人覃英回忆：“巴金同志看到鲁彦有病在身，又拖着一堆孩子，实在是贫困交加。……主张由鲁彦编辑刊物，由我以三户书店的名义出面作发行人，大家共同支持。”

九月下旬 与从重庆到桂林的章靳以欢晤，并前往观音山艾芜住所出席家宴，欢送应黎烈文邀请赴福建南平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和接编《现代文艺》的挚友章靳以。席间初识现代作家王西彦。送别萧珊回昆明读书。

十月八日 下午六时，应司马文森之约，前往美丽川菜馆，出席《文艺生活》编辑部举行的招待会，欢迎最近抵桂林的文艺界人士。同席有田汉、章靳以、



钟敬文、陈占元等人。

十月十九日 下午三时，前往三明戏院出席“文协”桂林分会举行的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

十一月

作《关于 蜕变》，此文系为上海公演曹禺的话剧《蜕变》作的说明书，简介《蜕变》剧情，认为该剧“使人感动”，是“剧坛上的成功之作”。

作散文《寻梦》，载《自由中国》新二卷第一、第二期合刊。通过一个梦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一些彷徨的矛盾心情。

应王鲁彦约请，拟为他主编的《文艺杂志》创刊号撰写中篇小说。构思了《还魂草》的民间故事，决定描写两个友好的小女孩，并以鲁彦的女儿王莉莎和重庆互生书店吴朗西的女儿作为书中莉莎的模特儿。

约十一月 动手创作小说《还魂草》，记载了在重庆沙坪坝的一段生活经历。因为“写的都是我真实的见闻”，是“写自己的感情，写我的周围，写我熟悉的人和事，写我追求了一生的友谊”，因而感到“写得很顺利”；另外在构思时，考虑到这几年炸死的人“太多”、“太惨”，“不愿意用鲜血淋漓的景象折磨读者”，因而“用两个女孩子的友谊来揭露侵略战争的罪行”。

十一月二十五日 由于鲁彦时常提起，才记得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清晨，从枕头底下发现鲁彦的女儿莉莎悄悄送来的捷克制毛织围巾，颇为感动；上午，到茶楼看书；中午，鲁彦夫人覃英掌厨，炒了几个菜，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生日面。

十一月二十八日 患病，发烧、打摆子。

十二月四日 作完中篇小说《还魂草》，载桂林《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描写两个女孩袁莉莎和秦家风之间的友谊以及日本侵略者对这种友谊的摧残。白云“颇喜欢《还魂草》”，并说写作时经历了“我又一次和我的人物一起哭笑”的感情。

十二月七日 下午，前往广西剧场，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第二届年会，与艾芜、王鲁彦、田汉等十五人当选为理事。

十二月上旬 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在上海的三哥李尧林和朋友中断联系。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三届一次理事会。商定组织“文协”受难同志救济委员会、要求提高稿费等事。

十二月十五日 部分作品手稿由桂林汉民中学在该校图书馆举办的文艺写作展览中展出。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短篇小说《某夫妇》，载桂林《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男主人公在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爱妻、稚子前往甘肃，想“做出一些事情，结果理想破灭”，又不幸死于日寇枪弹，女主人公明方忍辱负重，决心强捺悲痛，努力工作并抚养儿子。通过这一悲剧故事，控诉了日寇的侵华罪行，表达了对这对夫妇一样正直、热诚、坚强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敬仰。

十二月下旬

从报上获悉香港于二十五日沦陷，感到“好像从外面吹进一股寒风，连屋内空气也变冷了”。并思念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音信的好友林憾庐，不知是否安全离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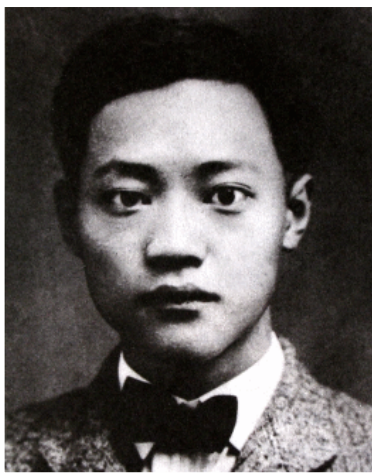
又患疟疾，好几天不能多用思想，不能做事情。辍笔养病。

十二月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龙·虎·狗》。

约十二月

作散文《长夜》，载桂林《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写深夜读书，“一堆一堆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压着我压下来”，坚信“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尽头了”。

得桂林新中国剧社杜宣来信，获悉对方为了维持剧社，要找票房价值高的剧目，决定将《家》改编为话剧。遂复函表示同意。



一九四二年

针对某几位批评家“创作应该受着理论的指导”的观点，云“我没有读过一本文艺理论的书”，“我还在继续写小说”。

三月由桂林出发，开始了历时七个月的辗转旅行。第二次回故乡成都，住五个月。

认为写小说是“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需要的人。

《家》被曹禺改成话剧、被周贻白摄成电影。

三十九岁

一月四日 作《某书的题记》，后易题为《巴金短篇小说集 第三集后记》，载《自由中国》新二卷第一、第二期合刊。云“据说‘创作应该受着理论的指导’”，自认“我没有读过一本文艺理论的书。但是我写过一些小说而且还在继续写小说”。

一月十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告之“近来常常生病”、“邮信不通”等情况。

一月上中旬 自去年底起患病已三周，打过一次摆子，好些天不能多用思想，不能做事情，“我又白白地浪费了三个礼拜的光阴”。

一月十七日 晚上续写三段因病中断的散文《怀念》。

一月十八日 作完散文《怀念》，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表达了对在广州逃难中共过患难、陷入被日寇占领下的香港朋友们的深切怀念之情，希望友人“早日安全归来和我们一起呼吸自由的空气”。

一月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获悉卢剑波与陈国凤陷入情网，遂劝告卢不要自私，以免害了一个无辜而又满有前途的筱若即陈国凤；又婉言劝告陈，及早抽身，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不久卢与陈终在同年二月二日上午晤面后分手。

编完中短篇小说集《还魂草》，作《还魂草序》。自云“见闻”、“经历”、“腥血”和“苦难”像“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一天一天地炙我的骨，熏我的肉”，于是拿起笔来，写了长篇小说《火》，也写了《还魂草》和其他两个短篇。

二月下旬 与安全抵桂林的林憾庐欢晤、畅谈，并结下深厚的情谊。这位“和非宗教者做了朋友”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后来成了《火》第三部主人公田惠世的原型。

二月

作散文《灯》，载桂林《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本文托物言志，借“家里的灯”、“路灯”、“灯塔”、“油灯”以及“火炬”等给人“指路”、“温暖”、“勇气”，进而表达了追求光明的坚定信念。

在零下四度的低温天气，编完《废园外》，并作《废园外后记》，载《废园外》。云：“我愿意在侵略者下面低头么，不，这不可能。我的心始终在反抗。因此它燃烧起来了。”

约二月

前往正阳路一酒家，出席鲁彦以《文艺杂志》社名义举行的酒宴，并欢迎从香港脱险赴桂林的茅盾等人。同席尚有艾芜、王西彦等作家。

会见从沦陷的香港平安脱险到桂林的胡风一家。当时因为桂林书商偷印作家著作非常普遍，尤其是偷印鲁迅著作。巴金、茅盾、胡风和当地的一些作家发起作家的维权活动，他们分头查门市部出售的书，还查出版社和印刷厂。幸亏巴金熟悉情况，和当地的出版、印刷单位打过交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为鲁迅追回不少版税。

三月十四日 夜，告别桂林。在车站，八位朋友在春寒料峭中送别。由此，巴金开始了历时七个月的辗转旅行。

三月十五日 下午，两时半左右到金城江，临时改变主意，拿了朋友介绍信，到长途汽车站找办事人，弄到一张车票，坐在司机台上转道前往河池。

三月十五至十八日 到河池是十五日夜。为了等车，在河池小住四天。除每天散步、吃饭、睡觉、写信、看书外，就坐在旅馆窗前翻译童话《自私的巨人》。

三月十八日

在河池。傍晚去看了“丹池公路殉职工友纪念塔”，感触颇

深：“这不是什么伟大的雕刻，然而它抓住了我的心，它是伟大的牺牲精神的象征。”揩着眼泪低声说：“明天我就要踏着你们的汗迹、血印往前走了。可是我有什么报答你们呢”

译完《自私的巨人》，英王尔德作，载桂林《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在河池，作散文《别桂林及其它》，题为《随笔三篇——旅途通讯续篇》，载《宇宙风》半月刊第一二七期。记述夜别桂林时与八个友人惜别的心情以及经过金城江、河池时的见闻。

三月十九日 上午九时，搭坐邮政汽车离河池县境；中午，在六寨吃午饭；下午，车子抵达贵州境内的独山邮政局。在当街的太和旅社找了一间房，外出打听明天开车时间，路上听一山东汉子边说边唱包文拯时代的英雄故事，被他吸引，也捐助了一块钱。

三月二十日 晨五时许，前往邮政局候车。六时，坐邮政车离独山；下午至贵阳，住“社会公寓”。

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六日 在贵阳小住，等候去重庆的车，“不管这有限的旅费是否会在长期的等候中耗尽，我每天仍旧在明亮的窗前读书”，在阳光和星夜里的小河边散步。

三月二十二日 作散文《邮政车中》，载《宇宙风》半月刊第一二八期。记叙了自己“吃力”地把两只皮箱和一个皮包拿到邮局汽车站，和坐邮政车去贵州旅途上在邮政车中以及在独山的见闻。

三月二十五日 作散文《贵阳短简》，即《贵阳短简及其它——旅途通讯 续篇》，载《宇宙风》半月刊第一二九期。记述了滞留贵阳六天见闻和找车的烦恼。

三月二十七日 晨四时，起床去贵阳汽车站，七时离贵阳。上午，车过乌江；正午，车停壩水镇，下车吃饭；下午，车过娄山关；傍晚，到桐梓。晚上，在桐梓街头散步后，借宿邮政车站附近一户人家中。

三月二十八日 晨，仍乘原邮车离桐梓，经花秋坪、綦江，下午五时半到重庆海棠溪。

三月三十日 作散文《筑渝道上》，载《宇宙风》半月刊第一二九期，总题《贵阳短简及其它——旅途通讯 续篇》。记述由贵阳至重庆的旅途见闻。云汽车在山坡的公路上行驶，“一片土，一棵树木，一块田……使我的心灵舒展。我爱这春回大地的景象，我爱一切从土里来的东西，因为我是从土里来，也要回到地里去”。

三月 译完《快乐王子》，

英王尔德作，载桂林《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四月上旬 看朋友、办杂事占用了全部时间。与曹禺常见面，发现对方心境极苦，劝亦无用。极想为朋友尽力，却苦于帮不上忙。

四月十六日 致信沈从文。署名芾甘，告之近况，谈到曹禺和萧乾的心境时，有感而发：“人总是这样，抛了现实为自己造梦，更用梦来束缚自己。芦焚常笑我是个用梦来安慰自己的人，我却不曾用梦来束缚自己。”希望沈从文能把生活安排好，多写几个长篇出来；认为写小说“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从这世界中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认为纵使不能点一盏灯给那些迷路者指点前途，却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让那班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脚，饮口凉水，再往前走。“文学是团结人群的，是一件使人头脑清醒的工作，而且是需要着理性和智慧来完成的”。赞沈从文“极聪明”，“而且有大的才能”，“极适宜于做这种工作”。

五月一日 赴成都治牙。乘汽车离重庆，到青木关下车休息片刻，一路经过璧山、来凤驿、永川、荣昌、隆昌。下午三时许车子过了裨木镇驶上渡船。四时

到内江。安排旅舍就绪，写两封信后，出门逛街并在小馆子吃晚饭。饭后上街，听一个老头儿讲一段丈夫虐待贤慧妻子的故事，想起儿时立在街中听“劝善奖孝的故事”，曾被感动得流泪。晚九时休息。次日晨，乘汽车离内江，在球溪河吃中饭并休息。下午到资阳，在车站遇一位十年前在上海闸北宝山路鸿兴坊世界语学会相识的老友。三时许，到达成都。这第二次返成都，住在陕西街二十九号中国工合协会成都办事处和亲戚家，又在成都北门莹华寺街的大哥遗孀一家租来的屋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共住了五个月，十月返桂林。

五月二日 在成都，作散文《成渝路上》，载《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一、第二期合刊。记述由重庆到成都的旅途见闻。

五月底 作短篇小说《猪与鸡》，载《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描写小市民冯太太在天井里养猪喂鸡受到房东太太干涉而被迫搬家的故事。

五月

在成都治牙，拔去四颗，流血颇多，饮食不方便，体力和精神都受到影响。

译《夜莺与蔷薇》，英王尔德作，载桂林《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号。一只夜莺为了一个青年学生求爱需要的红蔷薇，献出了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自己的生命，但当不知内情的青年学生把这“心血浇灌的花”献给他所爱的少女时，少女却喜爱上了国王侄子的“上等珠宝”，青年气得把蔷薇花扔在路上。

获悉朱楠秋编辑的散文、小说选集《巴金短篇文选》由奉天东方书店出版，同意收作品二十四篇。

约五月 见侄儿顽皮，给大嫂和家人添了不少麻烦，温和地批评道：“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每天晚上玩了一天的侄儿酣然入梦，巴金在灯下写文章。有时想起自己的童年，有时想起早逝的大哥，他多么希望失去父爱的侄儿、侄女们能早点懂事成才。他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引导侄儿集邮，把心静下来。后来，还满足了“李国飞”的要求，在纪念册上为他题词：“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侄儿看了，似乎有点悟性，让母亲送去裱成一尺半的小单条，挂在墙上。巴金见了，微笑着温和地抚摩着侄儿的脑袋。

六月四日 致信沈从文，署名芾甘。告之张兆和的《湖畔》和沈从文的《昆明冬景》的再版情况，愿在桂林为沈从文出版《长河》，很高兴为几个熟朋友印书，也希望因此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表示：“对战局我

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

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讲什么。”有感于目前“说好话的人太多，而做好事的人太少”，赞赏沈从文“埋头做事”的主张。

六月七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告知在这里医牙，生活还好，只是少有提笔的机会；又劝慰她：“女人过了二十五岁，并不见得就算完结。其实在别一方面说，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人不应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也是美丽的”；“我赞成人制造梦，可以用梦来安慰自己，却不要用梦来欺骗自己。有梦的人是幸福的，因此你很可以和瑞蕪过得幸福，也可以制造热情的梦”。

六月

由重庆烽火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废园外》。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

获悉老友曹禺在重庆唐家沱把《家》改为话剧。

七月四日 在重庆沙坪坝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叶圣陶晤面，倾心交谈抗战和文艺，并共进午餐。吴朗西等在座。

七月下旬 获悉萧珊辍学后自昆明赴桂林度暑假，留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帮忙，并自学英语。

八月 作短篇小说《兄与弟》载福建永安《现代文艺》月刊第六卷第一期。用写实手法描写一对生活在山城里的兄弟之间无聊、悲惨而又麻木的生活。兄弟俩都是资本家压榨下的工人，为了争赌账打起架来。不几日弟弟劳动时被砸死，哥哥悲痛一阵后便静静地睡去。

九月

作短篇小说《夫与妻》，载一九四三年四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小人小事》。以写实手法描写“深夜不归”的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两人闹到街上后又遭到警察一顿抢白的故事，反映了小人物在庸俗、困苦的生活中，还得不到人们的同情。

看曹禺改编的话剧剧本《家》，欣然肯定。不久，同意将《春》、《秋》分别交付陈西禾和李健吾改编。

十月十四日 由成都返桂林，仍住东江路隆街文化生活出版社，与挚友林憾庐为邻，至此结束了从三月十四日开始的历时七个月的辗转旅行。

十月 获悉曹禺改编的话剧《家》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章泯任导演，金山饰觉新，张瑞芳

饰瑞珏，凌琯如饰梅表姐。

十一月十五日 作书信《给日本友人》，载《短简》。希望日本友人和他的同胞们“起来和我们共同阻止那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十一月 作《 小人小事 后记》，载《小人小事》。叙述辗转七个月期间写作《小人小事》的设想和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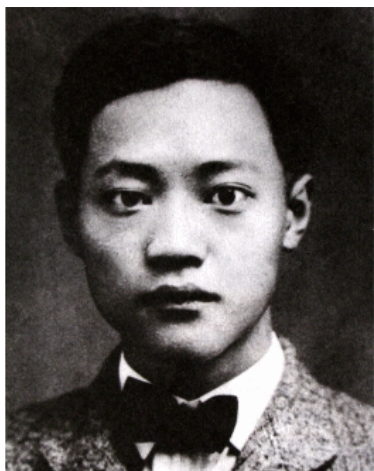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三日 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与柳亚子、田汉、王鲁彦、邵荃麟、杨刚、艾芜等十九人被选为第四届桂林分会理事。

十二月

修改旧稿《 冰心著作集 后记》。

获悉周贻白据小说改编的《家》被上海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摄成电影 上、下两集 。影片由卜万苍、杨小仲、李萍倩、吴永刚等人组成的导演团导演，胡蝶、刘琼等主演。

约十二月 应胡风之约，与茅盾等商定处置偷印鲁迅著作的办法，决定要对方具结算清版税，交出纸型。



西北风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仍“坐到深夜”写作、译书。

译完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

与一神甫的宗教道德观展开论争。

作完长篇小说《火 第三部》。又云“这本小书不是成功的作品”。至此，《火 三部曲》全部完成。

针对一位著名剧作家迫于生计应允为银行创作话剧事，表示“一个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灵魂”。

四十岁

一月一日 与茅盾、夏衍、叶圣陶、田汉、司马文森等被桂林科学书店聘为“特约选述”。

二月初 为挚友林憾庐治病事情奔走，听一“名医”一口断定林的病在一星期内包好，稍安心。

二月三日 惊悉林憾庐病逝，想到那卖出“几十颗高价特效药”的庸医，对他的“轻率的诊断”表示愤慨，“不能够宽恕他的疏忽和愚蠢”。含着悲痛协助林夫人料理后事。

二月四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代三哥感谢杨的“好意与关心”，“我和我哥哥自然把你当作妹妹看待”。又云：“一个人应该有幻想，幻想不但鼓舞人上进，还可以安慰人的心灵。可是单靠幻想生活，那会发生种种悲观思想，因为现实与幻想差得太远，永远无法叫人满足。”下午，参加林憾庐葬礼。是日系旧年除夕，与几个朋友，在林客厅里默默地对着一盆火守夜，并回忆起与林憾庐之间长达十三年的交往，感到这种由“苦难巩固它，欢乐装饰它”的“友情”的可贵，“在寒冷中我感到它的温暖，在暗夜里我见到它的光辉”。

约二月 作说明书《柔蜜欧与幽丽叶》，无署名。《柔蜜欧与幽丽叶》是曹禺应导演张骏祥约请改译的舞台本，曾在四川的一个剧团里演出。说明书云曹禺改译的此话剧“是一部伟大的典型的爱的悲剧，也是青年莎士比亚的抒情诗”。

三月三十日 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三月

旧作散文集《龙·虎·狗》，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二版时，受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封底还印着审查证图字第二〇三〇号字样”。此版被删去了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寂寞的园子》和《狗》。

作散文《纪念憾翁》，原题为《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署名芾甘。载《宇宙风》半月刊第一三一期“纪念林憾庐先生特辑”之一。认为这位带着“温和的微笑”，具有“镇定”、“乐观”、“豪侠”、“谦和”性格的“理想家”、“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个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

译完俄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并作《父与子后记》。云：该书除柏林版原文外，还参照了英译本三种、法译本一种、世界语本一种、日译本

一种以及陈西滢的中译本后译成的。

四月初 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 第三部》。《火 第二部》写完就离开重庆，后来听朋友说“敌机全天往来不停”轰炸重庆，后在“昆明过雨季”时，故乡成都又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后来回成都，知道了详情，“印象太深了”，于是，“……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 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 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四月八日 经曹禺改编的话剧《家》，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于重庆银社，导演章泯，主要演员为金山、张瑞芳、舒强等。

四月

开始翻译俄屠格涅夫长篇小说《处女地》。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散文、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

五月 继续创作《火 第三部》。让冯文淑来到昆明 写到昆明的翠湖、大观楼等，写到当时昆明的一些古怪现象，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做鸦片、大米生意发国难财的暴发户等，还写到冯文淑的好友朱素贞，写她是个普通人，是参照了生活中一位朋友的妻子和萧珊的同乡以及“给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轻女人”进行创

作的。

六月初 获悉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银社继续公演曹禺改编的话剧《家》 由叶露茜、黄宗江等参加演出。

六月 因为琐事的干扰，《火 第三部》时写时辍，有时写不出一个字，就继续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七月

继续创作《火 第三部》。

间或续译《处女地》。

获悉广西艺术馆实验剧团在桂林广西剧场上演曹禺改编的话剧《家》，由欧阳予倩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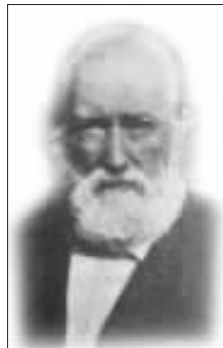
八月

发表译作法 Dan Tirinara 创作的诗歌《印度》，载《文艺创作》创刊号。

继续创作《火 第三部》。自云与人物一起生活，写作非常顺利。

九月

译德斯托姆短篇小说《迟开的蔷薇》、《马尔特和她的



的作者
斯托姆。
《迟开的蔷薇》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钟》、《蜂湖》均载十一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迟开的蔷薇》。

作《迟开的蔷薇后记》，载《迟开的蔷薇》。云“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喜欢他的文笔”，一九四一年在上海曾买过一部《斯托姆全集》，“非常宝贵它”，“有空就拿出它来翻读”。认为这些作品有“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

致信上海《万象》月刊主编柯灵。云现正赶写《火第三部》，至于《激流》第四部《群》，“将俟生活安定后再写”。

作完长篇小说《火第三部》，一名《田惠世》。继《火第二部》，写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冯文淑由前方回到昆明，住在同学朱素贞

处，对后方的腐败、黑暗、荒淫、庸俗非常愤慨，遂与为办一份鼓动抗战的杂志《北辰》而全力奔走的爱国的基督徒田惠世一家建立了友谊，描写充满基督精神的田惠世一家的和睦和美满，描写侵略者的炸弹使这个“幸福的乐园”家破人亡 结尾原是写朱素贞为给未婚夫报仇从事暗杀活动失败后被害，冯文淑只身离开内地。一九六〇年作了修改，“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前方”即当时“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就是说延安”。并认为“改得合情合理。当时人们惟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自云“这本小书不是成功的作品”。

约九月

接待从上海来的朋友，获悉三哥李尧林近况尚好，仍译书和

给别人补课，稍安心。

十月二十日 下午一时，出席由《广西日报》副刊《漓水》读书俱乐部、“自学杂志社”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座谈茅盾新作《霜叶红似二月花》。与艾芜、田汉、孟超、端木蕻良、黄药眠等人共认茅盾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并于会后联合致电茅盾，表示祝贺。

十月二十三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告之近来多病。

十月

作《爱情的三部曲 新版题记》，载上海开明书店版《爱情的三部曲》。

作《火第三部后记》，载一九四五年七月上海开明书店版《火第三部》。云“许多琐碎的事使我的心乱得没有办法”，常常对着稿纸发愣，写不出一个字，但即使时间搁长了，“原稿”“布满了灰尘”，“我还没有忘记书中的人物。他们早

巴金的
《火》三部曲
书影。



已变成我的友人了。……我便渐渐地沉浸在他们的生活里，我的笔又跟随着他们的生活发展下去”。

十一月初 致信赵瑞蕪。

十一月四日 致信杨静如。勉励她在西南联合大学“好好读书”，“好好翻译一本你喜欢的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告之自己译书、写书的近况：“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还坐到深夜，这点勇气我是有的。”

十一月

译完俄屠格涅夫长篇小说《处女地》，一九四四年六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作《处女地 前记》，载一九四四年六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处女地》。云《处女地》“是屠格涅夫的最后部长篇小说，……这是他留给俄国青年的遗著”。

约夏秋 在桂林接到一旧日朋友的信。这朋友是《火 第三部》中的洪大文的模特儿。巴金写洪大文“借用”他的“外形和他在连云港对日军作战负伤的事实”。此人年轻时进过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当过军官，被派到苏联留过学。一九二六年回国经过上海时与巴金见面相识。信上说他到桂林治病并定居，要巴

金去看他。见面后，见他拄着双木拐，并知他后来曾当税警团长，在连云港抗日战斗中负伤；还借给巴金一册他们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斗史》。《火 第三部》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谈话有些地方就是从这册“战史”中摘抄的。

约十一月 在漓江东岸中北路一里六号的木屋子里接待《自由中国》主编孙陵和友人魏岑。木屋前有巴金亲手栽的树和种的花。与友人一起“吃牛肉和面”，饭后请客人饮红茶。席间获悉北大毕业生因失业而改行卖汤圆之事，不胜感慨。当谈到戏剧作家洪深迫于生计，替银行创作话剧《黄白丹青》剧本时，对洪深的穷愁潦倒深表同情，并说：“《黄白丹青》戏我没有看，剧本是看过的，这好像不是他写的东西，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灵魂，而这个戏里的人物性格，却写得不够显明，稳定金融的办法也太抽象，如果仅仅给银行里的职员看，倒是很好的，可就不像是洪深凭自己的思想所写的。”

十二月

每逢周末经常去听赖治恩神甫举办的唱片音乐会，那些世界名曲、名乐章能使自己得到放松和休息。

作论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载十七至十八日《广西日

报·滴水》。对赖治恩神甫关于抽象的道德的说教提出疑问。赖治恩神甫系英国人，其时在桂林，常写有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文章刊《广西日报》副刊《滴水》上。一次，他著文大谈道德问题，用宗教的观点将道德行为与社会关系孤立起来。巴金为文驳他，阐明生活和道德的不可分割：“生活不好，就很难要求事事合乎道德标准。”两人便你来我往在副刊上展开辩论，一时成为当时文化中心的桂林大家谈论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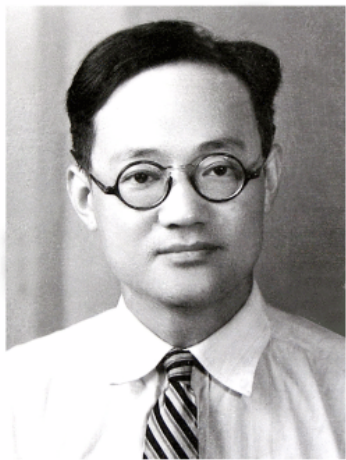
作论文《什么是较好的世界——质赖治恩神甫》，载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广西日报·滴水》。继续就中国人的道德和生活问题与赖治恩神甫展开争论，认为“生活决定道德”，“只有改善生活条件，才能提高道德水准”。

约十二月

译德斯托姆短篇小说《在厅子里》，载桂林《当代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收到杨静如信，获悉她已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并正着手翻译海明威的小说《春天的激流》。

约秋冬 获悉自己的《春》、《秋》由上海中联影片公司改编成电影公映。《春》由周曼华主演，《秋》由李丽华主演。



继续与英国神甫进行关于“道德”与“生活”问题的争论。认为“没有平等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便没有道德”。

与萧珊在贵阳郊外“花溪小憩”结婚。

自述“人不是嚼着钞票活下去的”，“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理想和信仰”。

“用随身带的一锭墨和毛笔”续写完中篇小说《憩园》。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从我的笔端喷出来”，“越写越感觉痛快”。

战火将巴金在桂林的住房和一些著译稿、历年存书、书信烧毁了。

四十一岁

一月六日 发表《关于“道德”与“生活”问题的一封信》，载《广西日报·滴水》。继续与赖治恩神甫展开争论。

一月约上旬 到桂林东江路福隆园看望已故友人林憾庐的夫人。在林太太房里遇到刚从美国回来的林语堂，因林摆名人派头，甚为傲慢，只寒暄几句，话不投机，就无话可说了。

一月中旬 接待从福建南平返重庆复旦大学任教的章靳以及其夫人陶肃琼，留住数日，谈抗战局势和日后打算，有时促膝谈至深夜。

一月二十一日 去火车站依依送别章靳以一家赴重庆。在月台上遇到林憾庐的孩子也在送别其叔父林语堂。未与林语堂交谈。

约一月 获悉作家王鲁彦因患晚期肺病，留医衡阳，处于贫病交迫的困境。为使鲁彦能支付医药费和维系一家生活，遂参加桂林文艺界发起的募捐活动。

二月二十二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告之“近来生活忙乱异常，心情也不好”。

二月

托田一文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父与子》、《前夕》、《贵族之家》等寄赠杨静如等朋友。

作论文《读两个标准》，载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广西日报·漓水》。

三月一日 作《田惠世附记》，载福建永安《改进》半月刊第九卷第二期。

三月十九日 下午一时，前往桂林社会服务处，参加文协桂林分会五届会员大会，与柳亚子、田汉、邵荃麟等十九人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四月十日 作《处女地译后记》，载《处女地》。

四月二十二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云三哥李尧林仍住上海霞飞路霞飞坊“闭门译书”，“似乎胆小”，“不大出街，不大找人”。

四月二十五日 在福建永安《改进》半月刊第九卷第二期上发表小说《田惠世》。

五月一日 在《人世间》第二卷第一期“革新号”上发表杂文《怎样做人及其它》。云“不但人，便是动物也是有道德性的”，“一般的动物，并不是生来就有自私心，它们并且能够为群体的利益牺牲个体的愿望”；“原始人更有着很好的伦理与社会，……他们也有着把自己的‘我’跟社会的‘我们’看作一

样的习惯”；进而认为“人是道德的生物。……走的总是这样一条路：把个人的命运，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自然力的征服，中世纪自由的光荣的历史，近代科学与艺术的伟大的成就，……无一不是人类的联合力量与牺牲精神的结果”。认为：“人的自私和贪欲，社会的不安、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它们并非起源于个人的自私心。……人对他的同胞必需互助，离开了合作互助便不能生存。一个最深刻的伦理公式是：‘没有平等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便没有道德。’”此文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人生杂志》第二卷第一期转载时，擅自把标题改为《生活无秘诀》。

五月初 决定与萧珊离开桂林，并嘱兄弟代为印发“旅行结婚”通知。

五月八日 与萧珊在贵阳郊外“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当天晚上在花溪镇上民乐村饭店“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 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面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这样：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

后的生活。……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者中篇小说。在花溪度过了三天虽然‘寂寞’但都感到‘宁静’和‘幸福’的日子”。

五月十一日 告别花溪，偕萧珊返贵阳住两天。与萧珊商定，回桂林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矫正“鼻中隔”。

五月十三日 持舅父介绍信买到邮车车票，送萧珊上邮车赴四川后，当日上午至贵阳中央医院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因无床位，嘱隔天再去，遂到另外一家小旅馆开了一间房间，住了两天。因旅馆条件差，白天“坐茶馆”、“观察人”，晚上开始了中篇小说《憩园》的创作。

五月十五日 写作刚开头，就接到住院通知，遂化名黎德瑞，住进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这是一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大病房。十几天中动两次手术 先治鼻子，后转到外科开水囊肿。虽然没有通知亲友，萧珊也不在身边，但并不感到寂寞，“我躺在病床上观察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病房中结识了一位姓陆的病友，他是浙江农村青年，在器材库工作，因翻车而骨折，后又患斑疹伤寒，转到内科病房后，下落不明；还有某公司烧伤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工人，因无钱买药，在哀号中死去。眼见“烧伤工人的受苦和死亡，我感到极大的愤怒”。还有一位小公务员和他后颈生疮烂得见骨的父亲，……这些真人真事后来成了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的创作素材。

五月

作短篇小说《生与死》。记叙“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一段故事：一家烟纸店老板为他暴死的妻子办丧事，丈夫向众人报告“医生看错病把人害了”的经过和宣布“一年以后才结婚”，围观者看热闹，发议论。通过日常生活琐事反映小市民平庸、麻木的生活和心态。

从贵阳一家报纸上获悉有人宣传他已弃文经商。对这样的谣言只能苦笑，仍续写《憩园》，不予理睬。“这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惟一的原因是不爱钱。钱并不会给我增加什么。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理想。并且钱就跟冬天的雪一样，积起来慢，化起来快。”

六月约中旬 出院，住贵阳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上散步休息。三顿饭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

夜深也没人打扰。《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头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时，就丢开《憩园》中那两个家庭，“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决定“下一本小说”就写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

六月约下旬 两次接萧珊来信叫回四川，遂决定改变回桂林计划，准备动身去重庆。离开贵阳前，重返“花溪小憩”，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昔日和萧珊留下的足迹，并用随身带的一锭墨和小字笔，将一叠西式信纸当稿纸，在小碟子或茶碗盖上磨墨，用毛笔在信笺上写字 继续写《憩园》。

六月 两天后自花溪返贵阳，带着未写完的《憩园》原稿乘上到重庆海棠溪的邮车，离开贵阳。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仍用毛笔续写《憩园》。

七月上旬 抵重庆，与萧珊晤面。任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住民国路二十一号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的一间黑暗、潮湿的小屋，仅七八个平方米。获悉书店经理田一文坚持要把自己住的一间楼房让出来做新房，书店又拟为他们置办家具时，均婉言谢绝。萧珊只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在只能放一

张双人床的小屋里组织家庭。原来“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到重庆的当天，在小屋内续写《憩园》。

七月约下旬 惊悉桂林十五日由于湘桂战争引起大火“大火烧毁了巴金的住处，两个竹书架上的书也化作灰烬了”。连同《自私的巨人》等著译稿和历年来收集的一大堆缪崇群书信与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存书全部毁于战火。文生社元气大伤，巴金三年的心血亦付诸东流。只得留在重庆，住在书店，等萧珊从成都回来后再作安排。

七月 《憩园》初稿完成后，给萧珊、田一文看后稍作修改，交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受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结果，“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只好根据这个稿本排印。

《憩园》的背景在成都，系据作者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回成都的真实见闻和作者的真情实感创作的。杨老三的原型是作者的叔父，他一九四一年“在监牢里死去”。作品中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花光了家产和妻子的嫁妆，后来被妻儿赶出来，靠偷盗乞讨过日子，……小老婆离开他另外嫁给军阀，后来送钱给他”等，“李老头也是真人”；

但作家虚构、创造了“一个早熟的、沉溺在病态的个人感情里面的‘杨家小孩’”，为的是形象地揭示“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小说以说故事人黎德瑞 巴金赴日时的化名 回到久别的家乡的见闻和感受贯穿全篇，以一个十三岁孩子每天溜进一座名为“憩园”的花园里摘一枝花送给破庙里一个贫病交困的老人为引子，然后以两条交织、映衬的情节线索，展示两幅画面：一是描述“憩园”旧主人杨梦痴一无所能，花光遗产，嫖、赌、骗、偷，渐趋灭亡；二是描述“憩园”新主人姚诵诗虽良田千顷、家财万贯，但也一无所能 又娇纵赌钱撒谎、挥金如土的儿子。通过“憩园”新旧主人这两条线索、两幅画面的描述，揭示了旧生活、旧传统、旧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反映了靠金钱财富“长宜子孙”的世俗观念的荒谬 预示新一代、新的生活的精神支柱是“理想同信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作家谈到《憩园》时说：“这差不多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今天还是比较喜欢它。它是真实的”；“书中的‘黎先生’身上有我的影子”，“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出叹息甚至惋惜的调子”。

约七月 获悉黄裳曾两次到桂林找他未遇，后黄已去印度。

八月二十日 作《憩园 后记》，载《憩园》。针对写《憩园》时贵阳一家报纸宣传他“弃文从商”一事，严肃地说明“人不是嚼着钞票活下去的”，“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理想同信仰”；重申自己的创作思想是：“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八月下旬 惊悉友人王鲁彦因肺病于二十一日歿于桂林 想到“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的情景，听到他临死前，不能发音，“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的情况，引起对老友深沉强烈的思念。

约八月 作《憩园 内容说明》，见《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后记》。云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

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写出封建地主家庭的必然的没落。在这书里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旧主人杨家垮了”，“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公馆里那善良的“好心女人”的惟一出路就是要“有勇气冲出来”。

十月十九日 在重庆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会场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附近，宋庆龄到会，中苏文协的负责人张西曼也来了，冯雪峰、胡风都在。当宋庆龄因事早退后，会场秩序就乱了，国民党特务开始围攻胡风，还有人诬蔑在上海的许广平。“雪峰出来替许先生辩护，准备捣乱的人就吵起来。我们发了一些牢骚；雪峰很生气，胡风好像严肃地在想什么。我劝他小心，看样子，特务可能有什么阴谋。”



巴金著《憩园》书影。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十月 在民国路小楼房里，接待从沦陷后的桂林逃出来的赵家璧。获悉他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后，表示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也答应给他一部小说，帮助他重建出版社。谈话时，外面人声嘈杂，发生火灾。因萧珊已去成都，遂独自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巴金惟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不一会儿，火被扑灭了。

《憩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分赠好友。不久友人缪崇群来信“客气地指出了《憩园》中不为别人注意到的一些小毛病”。阅后颇为感动，称缪是一位“精细的读者”。

约十月 让萧珊回成都探望亲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寒夜》。但因战乱，不久即中断写作。

十一月十六日 收到友人缪崇群信，获悉他认为彼此的希望

“如同一坛酒，让它愈埋藏愈醇郁吧”。

十一月二十九日 又收缪崇群信，获悉他“不久就要进城‘就业’。”

十一月 警报解除后的一二个小时，独自一人在小屋中开始写《寒夜》。但只写了几页稿纸，就让湘桂大撤退引起的骚动“打岔了”。此时萧珊仍在成都老家探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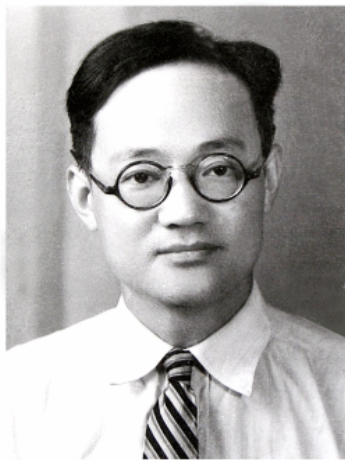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四日 致信沈从文，署名芾甘。告之近况，两个月来忙于看大叠熟朋友的译文校样，“疙里疙瘩的译文”，苦不堪言。又云：“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并希望沈从文“不要放下你那管笔”。尽管桂林文生社毁于大火，巴金在信中表示：“文生社桂林办事处结束，你们有点版税，现在寄上，请收下。”

十二月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办的座谈会，并聆听周恩来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他的态度恳切，话语明确，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他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了。我们感觉到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巨大力量，在危难的时刻他可以领导我们前进。我们不再像先前那样彷徨无主了，大家坚守各自的岗位，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投降、逃跑阴谋作斗争。”

一九四四年内

收到黄裳从印度寄来的第一个散文集《锦帆集》和信，要求找一个出版机会，阅后很快复信，告黄裳已将他的散文编入一个丛刊。

在重庆寓所接待从延安来的诗人何其芳。“我仿佛见到一个新人。他陪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去，他向我介绍延安的一些情况，他给我送来解放区生产的小米和红枣，……”



一九四五年

参加沈钧儒、柳亚子、徐悲鸿、老舍等联署的签名活动，《宣言》指出，当局“政治的腐败”是国家“落伍”的“根本原因”。

痛斥一些“作家”“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为“色情读物”。

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与友人奔走相告。同时又为时局动乱担忧。

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晤叙。

三哥李尧林不幸病逝。

长女在重庆出生，取名小林，又名国烦。

四十二岁

一月十五日

在《时与潮文艺》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译作《马尔蔑那多夫的故事》，俄陀斯妥也夫斯基作。描写一个沙俄时代的小文官马尔蔑那多夫一家贫困潦倒的生活经历。

发表《马尔蔑那多夫的故事 后记》，载《时与潮文艺》第四卷第五期。认为“作者掘发人性，深刻到极点，所以他能够在‘娼妓’、‘小偷’、‘酒鬼’等等被人践踏的所谓‘下等人’中间找出优美的人性，就像他在湿漉漉的抹布缝里看到发光的灵魂一样”。

一月十八日 晨，从报上获知友人缪崇群于本月十五日凌晨病逝于北碚江苏医院。下午，又接左胥之快信，获悉缪已于十七日入土，急至北碚吊唁。至北碚，仅见“一个筑在斜坡上的新坟”。又从左胥之等友人处获悉，缪孤零零地死在医院，他从不肯麻烦人，躺在病床上，连口水也喝不到。巴金在墓前和几位朋友读到刊行缪崇群的遗著和编印全集的计划。并希望左胥之负起整理遗著的责任。此时此际已故的陈范予、王鲁彦、缪崇群等知识分子的遭遇赫然在目，萌发了为他们呐喊和控诉的创作冲动。

一月二十九日 致信三哥李尧林的学生黄裳，署名芾甘。告之托他带来的衣服“最



近或可寄到”，并表示感谢等。

约一月间接得到三哥消息，知他生活“过得还好”后，稍放心。

二月十七日致信黄裳，署名芾甘。告之自己被中华书局邀作编辑委员，为书局编印一套文学丛刊，为黄裳的集子出版提供了“机会”；又云“文生社桂林资产全部损失，我算是白费了三年的心血”等。

二月二十二日与沈钧儒、柳亚子、徐悲鸿、马寅初、侯外庐、傅抱石、郭沫若、茅盾、老舍、力扬、陶行知、谢冰心、顾颉刚等三百一十二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署《文化界时局进言》四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易题《重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载重庆《新华日报》。宣言指出：“政治的腐败，是导致我们无力阻止敌寇的进犯，而在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我们却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的根本原因。”发表后山城震动，“蒋介石看了暴跳如雷”。

三月

巴金为纪念文化生活出版社建社十周年，拟用“三周”时间，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改译完俄屠格涅夫《纪念U. P. 伏列夫斯基加亚女士》，载四月三十日《贵州日报·新垒》。此系屠氏为纪念自愿到俄国战争前线作慈善看护妇的亡友

而作。深情歌颂她坚持“信仰”为他人服务的“牺牲精神”。

译俄屠格涅夫《访问》，载五月四日《贵州日报·新垒》。

译俄屠格涅夫《海上》，载六月二十二日《贵州日报·新垒》。以猴子在船上与“我”相依为伴，象征人生旅途的孤寂。

译俄屠格涅夫《田野》，载六月二十五日《贵州日报·新垒》。

译俄屠格涅夫《两节诗》，载六月二十六日《贵州日报·新垒》。

译俄屠格涅夫《“绞死他”》，载七月二日《贵州日报·新垒》。揭露俄军某部总指挥官不问青红皂白下令“绞死”无辜的战士的专制暴行。

译完俄屠格涅夫《对话》、《老妇》、《狗》、《我的敌人》、《愚人的裁判》、《同意的人》、《处世的方法》、《世界的末日》、《愚人》、《一个东方的传说》、《麻雀》、《骨头》、《最后的会晤命运——力——自由》、《施舍》、《虫》、《蔚蓝的国》、《老人》、《访问》、《两兄弟》、《利己主义者》、《大神的宴会》、《斯芬克司》、《仙女》、《友与敌》、《基督》、《岩石》、《鸽》、《明天！明天》、《自然》、《我要想什么呢》、《某某》、《留住》、《高僧》、《祷辞》，载《散文诗》。

作《散文诗译后记》，载《散文诗》。回顾文化生活出



巴金译著
《散文诗》等
书影。



巴金部分
散文集子。

版社艰难的十年历程，云其间“国土遭受到敌骑的蹂躏”，文化生活出版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为了庆祝它这十岁的生日”，遂译屠氏散文诗，并云“要继续奋斗”。

初春 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待黄裳，并帮助黄裳解决写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将黄裳的几篇游记交给《旅行杂志》发表，托沙坪坝开寄售行的朋友帮黄裳卖掉一件大衣，又接受了黄的《锦帆集》，准备找个地方出版。

春季

谢绝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总编辑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邀请。后在原请定担任诗集编选的闻一多因教务繁忙来信辞去时，又帮赵邀约李广田接任编务。

获悉挚友萧乾从伦敦奔赴欧洲战场采访。

四月 作散文《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后曾易题《一个善

良的友人——纪念终一兄》，载《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为悼念一月去世的现代散文家缪崇群而作。云：“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了。”

五月四日 下午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化会堂举行的该会成立七周年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郭沫若、胡风、老舍、邵力子、王平陵等百余人到会。

五月上旬 获悉希特勒自杀后一周，德国法西斯则宣告投降。与朋友们论及时局的发展变化，颇为乐观。

五月

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作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开始作《第四病室》。其时与萧珊住吴朗西家中，买了两刀记账用的纸，只能用毛笔写。住的房间是泥土地，“楼下一大

间，空荡荡的”；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但写得很顺，因为“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我想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素、真实。

六月六日 从《新华日报》上获悉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积极筹备庆祝茅盾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

六月二十四日 下午前往重庆白象街十五号附一号西南实业大厦出席为茅盾五十诞辰举行的茶话会，并会见了许多好朋友和文艺界人士。

七月七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蒂甘。自云：“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我的一部小说因此至今不能交卷”，鼓励她译完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



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

七月月上旬 萧珊自沙坪坝进城，因重庆太热，拟前往成都过暑假。

七月

因重庆霍乱流行，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儿子也染病在身。见谭嫂只知求神拜佛，怕耽误病人，遂劝她把十五六岁的儿子送往小龙坎时疫医院，不几天，孩子还是死了。这时重庆市卫生局局长竟然公开声明没有发现霍乱。“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遂在《第四病室 小引》中对这位局长“间接地帮助多数平民升回天国”的“德政”进行针砭和鞭挞，为“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气。

作《第四病室 小引》载《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云作品“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明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消耗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是积阴德了”。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火 第三部》。

八月约十日 获悉美国在日

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又对日宣战，知道离抗战胜利为时不远了。

八月十四日 正式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与好友奔走相告，欣喜异常。立即打电话到上海与三哥李尧林联系返沪事。当夜，作随笔《一点感想》，载《抗战文艺》第十卷第六期。云：想到的并不只是胜利的喜悦，“只觉得压在我头上的一个可怕的梦魇去掉了。一个浓墨的暗夜发白了”，并不无忧无虑地预言说：“单是‘胜利’两个字并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狂欢得太早了。”

八月十七日 致信黄裳，署名芾甘。告之代黄裳编的《锦帆集》已送中华书局。

八月约中旬 得三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 获悉他大病初愈，仍感身体不适，而陆蠡下落不明，并催促巴金早日返沪。因社会混乱，人心惶惶，虽多方奔走，巴金仍苦于找不到交通工具返沪。

八月二十九日 从报上获悉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与全国人民一样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八月

参加文协组织的“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与老舍、夏衍等八人共同负责调查背叛祖国、投靠日伪的汉奸文人的罪行。

萧珊即将分娩，托在中国旅

行社服务的朋友买到一张飞机票，送萧珊回成都，请家乡亲们专门照料。

续写《寒夜》。“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人要 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在民国路二十一号住所，接待即将乘飞机回沪的友人，并将《第四病室》手稿托他带到上海。

打电报问候三哥，得三哥回电，获悉三哥病情时好时坏，并希望巴金早日返沪。

九月一日 看重庆《国讯》等八家杂志发表的联合声明，获悉重庆文化界呼吁当局取消“战时新闻杂志审查制度”，遂向同人提议，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也积极参与行动，决定九月份起与重庆文化出版界统一行动，出版物不再送审。

九月上旬 巴金与老舍、胡风、邵荃麟、傅彬然一起前往上清寺。从延安来重庆的毛泽东下榻在此，会见巴金等。毛泽东说：“巴金先生，听别人说你年轻时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这样吗？”巴金回答：“是嘛。听说你从前也信过……”毛泽东笑着说：“是的，那时我们对什么都有兴趣。”巴金还问毛泽东知不知道匡互生，毛泽东回答，匡互生是教育家。

这次会见，毛泽东的平易近人给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九月三十日 作散文《无题》，载《少年读物》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复刊号。云：上月抗战胜利刚刚带来欢乐，新的现实使人对胜利产生了怀疑；写重庆停电的黑夜、求乞的老太婆、沿街拍卖旧物、回不了故乡的无数难民……认为“胜利只是一个开始”，“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问题”。

九月下旬 观看在山城轰动一时的话剧《清明前后》，该剧由茅盾编剧，由刚从新疆监狱中死里逃生出来的赵丹和朱今明、王为一等担任导演、舞台监督和演员。

九月月下旬 继续为返沪的交通工具奔走，并去信让萧珊返回重庆。“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的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把铺位让给别的朋友。”

十月二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云：“我近大半年来生活很乱 整天为了一些杂事忙着”，“想去上海却无法走”。

十月月上旬 送田一文赴汉口，为文化生活出版社设立新的办事处。

十月二十一日 往张家花

园，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改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而举行的会员联欢晚会。到会的还有周恩来、郭沫若、老舍、叶圣陶、冯雪峰、胡风等。第一次听到周恩来传达的关于延安文艺运动的讲话，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若干年后，巴金回忆说，这些“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给我打开了新的广阔的眼界”。“可是我没有勇气同旧的生活决裂，……又害怕痛苦的磨炼，没有走上新的路。”

十月月下旬 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回国的黄裳见面，告之即将赴沪之事，答应向李尧林转达黄的谢意和问候。

十一月七日 作短篇小说《女孩与猫》，载上海《周报》第十三期。本篇系在重庆和上海两地完稿。描写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春少女黎小姐“在好些人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整日喂猫、玩猫、想猫、找猫、葬猫、哭猫的故事，通过这些“渺小的事”，表现“女孩的寂寞”。

十一月月上旬

因无法乘船返沪，火车票又难买，加上三哥病重，只好安排萧珊在重庆待产，独自赴沪探望病中的三哥。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李尧林的病榻前陪住，始获悉三哥生病日久，治

病又给耽误了，“因为没有钱 不能住进医院，由一个懂医道的朋友给他治疗”。巴金心中十分沉痛，立即托友人帮忙联系住院事。战乱之际，住院事一时未果。

巴金在上海住下后，“过的仍旧是忙乱的生活”，又害怕多说话会使三哥劳神，有意减少与三哥“单独谈话的机会”，另外李尧林每天清晨量过体温后用高兴的声调说着话：“好多了，好多了。”因而产生了疏忽，又不懂医道，“以为三哥的病不要紧，需要的只是休息和营养”，没有注意到三哥的病势在日益加重。

十一月月中旬 经朋友提醒，要尽快设法，及时送李尧林住院。巴金遂劝说李尧林。怎奈三哥不肯接受，巴金又无法强迫三哥住院，只得耐心说服，谈过几次，都没有用。巴金心中焦急，但尊重三哥，不忍强迫三哥做不愿做的事，这样又拖了两天。过了几天，巴金听三哥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急忙联系，三哥终于住院治疗。“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睁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两眼，终于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

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医院电话，获悉三哥李尧林已病逝于上海虹桥疗养院。“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当天下午将三哥送往殡仪馆入殓。

十一月二十五日 料理三哥后事，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三哥生前兼课的智仁勇女子中学的三位女生，在墓前植了两株柏

树。自己抚摩着三哥赠予的遗物——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学习成绩卓著而获奖的金钥匙，悲痛地与善良、清贫、友爱的三哥永别了。

十一月

偕索非前往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家聚餐。

作剧评《夜店》，载上海《周报》第十一期“关于《夜店》”特辑。参与讨论剧本《夜店》高尔基原作，柯灵、师陀改编，说该剧“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由于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夜店里的“戏子”等“全被当作垃圾似地抛弃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了”，而剧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善良的灵魂！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同类，甚至超过我们，他们懂得爱，懂得恨，也能够爱，能够恨，而且他们还

懂得怎样为这爱牺牲”。

在霞飞坊会见开明书店主持编辑事务的夏丏尊，“坐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党都不抱任何希望”。

在沪期间，与挚友李健吾等晤面，获悉他与郑振铎拟筹备主编抗战后上海惟一的大型刊物《文艺复兴》，表示支持，遂将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和散文《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交给李健吾，并应约继续撰稿。

重编《小人小事》，并作《小人小事 后记》，载《小人小事》。对一九四二年三至十一月的七个月写作生活作了小结，“这个期间我只写了三篇类似小说的东西”，这类小文章写的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表示“不想再写下去了”。

十二月初 获悉昆明发生特务和军警分批袭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及师范学院等学校师生对“时局更加忧虑”。

十二月七日 与郭沫若、茅盾、曹靖华等十八人在《新华日报》发表致昆明各校师生的联署电文，“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

十二月约上旬 参加中华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筹备工作。与郑振铎、李健吾、许广平等商谈大会的三大提案：要求政府迅速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巴金后来为三哥编印了译作，署名李林。



开放言论自由，请求保障作家利益，组织特种委员会检举附逆文人等。不久，因萧珊在重庆待产，遂离沪返渝。

十二月十二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云“我已返渝，《淘金记》改定本收到，当托便人带沪，俟渝版销毕即在沪排印，请勿念。”又云：“我本年内走不动，还得在这里住几个月”，并约请沙汀“编一新集子”。

十二月十五日 萧珊看电影《一曲难忘》回来，摔了一跤，动了胎气，巴金赶紧将她送入医院待产。

十二月十六日 巴金在医院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九时许，长女终于在重庆宽仁医院出生，十分可爱。为纪念三哥，给刚诞生的女孩取名小林。照李姓家庭惯例，小林这一辈是“国”字辈，又因得找一个带火旁的字作名，联想到“我们的国事之糟”，故名国烦。

十二月月下旬 获悉在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十七日于上海金城银行七楼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理事。

十二月底 与重庆文艺界人士前往一座古庙去吊唁“四烈士”，他们是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中因争民主、反对独裁而被杀害的，四烈士为南菁中学教师于冉，西南联大学生潘琐、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

十二月

从曹禺处获悉，曹禺明年将与老舍应邀赴美讲学。

获悉短篇小说《某夫妇》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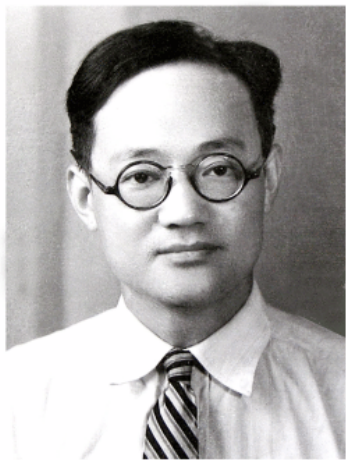
作《旅途杂记 前记》，原题《小礼物——旅途杂记 前记》，载上海《周报》第二十期。说明把一部分时间花在旅途上，是为了看看“各地的朋友，和体验一些人的生活”；自云“靠友情生活”，“没有朋友，便没有我那些拙劣的文章”，又因“朋友的帮忙”，才有“勇气”“经历了抗战八年中的艰苦日子”，而“时间证实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败亡”，并坚定地“等着看火中凤凰的诞生”。

编完散文集《旅途杂记》，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上海万叶书店出版。

冬季

拟主编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遂与田一文等分头与萧乾、老舍、沙汀、萧军等作家联系，并托田一文找老舍约稿。不久得《骆驼祥子》修订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即交书店付排。

自三哥逝世后，经常将部分稿费寄回老家，负担侄儿、侄女的学费。



数次参与文化界、学术界人士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反内战、争自由、求和平的签名活动。

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活动时，撰文认为鲁迅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

作完长篇小说《寒夜》。

四十三岁

一月一日 在《少年读物》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即复刊号上发表随笔《我爱青年》。云应该“热爱青年”，是因为“青年阅世不深”、“心灵纯洁”、“热爱自由”、“用‘心’思想”、“追求‘理想国’”、“倾听先知的言语和行吟诗人的歌唱”。

一月十日 在上海《文艺复兴》月刊上发表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第一部分。

一月十五日 在上海图画杂志《环球》第四至第六期发表长篇小说《寒夜》一至四章。《环球》系吴朗西的亲戚所办，吴回上海替亲戚组稿，要巴金为《环球》写连载小说，巴金即将写好的《寒夜》部分原稿交他。

一月二十日 与茅盾、冯雪峰、老舍、曹靖华、骆宾基、徐迟、艾芜、葛琴、宋之的、陈白尘、白薇、田涛、冯乃超、阳翰笙、邵荃麟、王冶秋、碧野、柳倩、



老舍一九四五年在重庆。

臧克家、力扬等二十人联署《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载《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二期。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呼吁“废止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

一月

应出版公司要求写《第四病室》的“内容提要”。云：“第四病室，一个阴暗的角落，人们在受苦、挣扎、死亡”，这“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出版社害怕招来“麻烦”，没有采用。

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长篇小说《第四病室》。小说据一九四四年在贵阳中央医院治病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中的人物和事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作品记下了一间病室在十多天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医院的“病态”：花柳病、梅毒患者之类的传染病人与一般病人同住一室，贫困的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臭气和哀号充斥病房，金钱决定着生和死。作者又以富有象征意义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医生杨木华，这个带有理想成分的形象，是作家心灵世界的折光。

发表译作《饥饿》，德若克尔作，散文，载上海自由书店版《自由世界》。

译《少年国王》，英王尔德作，载《少年读物》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描写公主和一个穷人结婚生下的少年被老国王接回宫中当了“少年国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后少年梦见织王袍、捞珠宝的奴隶的悲惨生活，拒绝再穿王袍的故事。

发表《重版和续行编辑 文学丛刊 的书目广告》，未署名。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版黎烈文著《崇高的母性》书后。说明在“大地重光，战事已胜利结束”之际，决定将抗战期间“遭敌寇全部查抄”的《文学丛刊》各书“陆续重刊”，并“续行编辑”《文学丛刊》第八辑等。

二月中旬 因“较场口事件”引起公愤，遂参加重庆文化界百余人的签名运动，联署发表《为较场口血案告国人书》，声讨国民党政府镇压群众的罪行。

二月

译《忠实的朋友》，英王尔德作，载《少年读物》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描写小伙子汉斯真诚帮助磨面师，而磨面师却盘剥汉斯，直至将他折磨至死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伪君子”式的剥削者，也对“善良人”指出了教训。

获悉挚友黎烈文辞去福建改进出版社社长职务，前往台北主编《新生报》。

三月约十一日 致信索非，署名芾甘。告之近况，拟于三月搭船离渝，在汉口小住两周。

三月十五日

发表《关于 春 》的部分手迹，载《文艺春秋》第二卷第四期。

三月

译《星孩》，英王尔德作，童话，载《少年读物》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初收《快乐王子集》。叙述樵夫把从森林里拣到



巴金著《寒夜》和《第四病室》的书影。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的小孩养大成人后，孩子因“骄傲”、“残酷而自私”和不认生母而变得像“蟾蜍”般丑，之后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亲生父母。原来是国王和王后，终于恢复了美貌，当上了国王的故事。

把远隔重洋的挚友萧乾发表的报告文学，从报上剪辑后编成《南德的暮秋》，列入《文学丛刊》第八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四月十八日 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茅盾等七十五人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载《新华日报》。表示赞同该委员会关于和平的主张，并吁请注意当前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徒增中国人民之负担与灾难”。

四月二十九日 致信黎丁，署名芾甘。云最近又要去上海，“听说你爱打牌，每赌必输，大可戒赌”。

四月下旬 获悉夏丏尊于二十三日在上海去世，深感痛惜。认为夏丏尊是当时读者最多的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朗。后来写文章表示，夏丏尊“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对我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

约四月 获悉沙汀看了刚出版的《淘金记》后，因错字多，对田一文的校对不满意，在报上发表《校正记》并提出批评。此

事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声誉颇有影响，见田一文压力较大，遂安慰田“以后校对要细心”，未作过多责备。

五月初 安排萧珊携女儿离渝返沪。

五月五日 出席全国文协在张家花园召开的庆祝文艺大会，听取周恩来讲话。散会后陪周恩来边走边谈。周恩来说他明天将去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巴金说：“斗争很艰巨，希望多多保重。”周恩来说：“只要坚持斗争，人民一定胜利。”短短的谈话，深深地鼓舞了巴金，他感到周恩来“完全没有私心”，对未来“充满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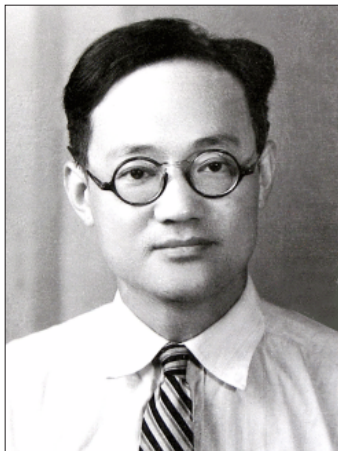
五月十一日 出席文联社即《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社发起的文艺座谈会。

五月二十一日 乘飞机抵沪，仍住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三哥生前住过的房间。除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义务总编兼

校对外，为《文艺复兴》月刊续撰长篇小说《寒夜》、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并拟作短期休养。霞飞路的房子面积不大，三楼临窗放着一张书桌，靠墙放着一张铁床，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门的书架占去。书架放得曲曲折折，中间仅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过道，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二楼有一间是吃饭、会客的地方。

五月二十八日 访开明书店叶圣陶，并应邀前往永兴昌聚餐。下午约四时许，在开明书店与刚从广州抵沪的茅盾晤面，共话别后，并谈写作、出版打算。次日，应邀参加李健吾等欢迎茅盾的宴会。

五月三十一日 深夜作散文《纪念我的哥哥》，载《文艺复兴》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回忆三哥李尧林和自己从故乡投入茫茫人海后的手足之情，表达了对三



一九四六年约
夏秋间巴金摄于上海。

哥深切的怀念。说：“我再想到在这短短的聚合中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么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永远离开我去了。”

六月一日 在《少年读物》月刊第一卷第五、第六期合刊上发表译作《西班牙公主的生日》，英王尔德作。描写西班牙公主过生日时拿一个买来的穷孩子小矮人取乐，穷孩子以为公主喜欢他；当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丑陋形象时，才知公主对他是戏谑取乐，遂在“心碎”中死去。表现贫富悬殊的悲剧。

六月二日 下午二时，至玉佛寺，参加夏丐尊追悼会，并瞻仰死者遗物、遗稿及手迹。

六月四日 晚六时，至金城餐厅，参加文协聚餐会。今为诗人节，同时也是夏历端午节。与会者还有郭沫若、茅盾、胡风、冯雪峰、马思聪、许广平等文艺、戏剧、音乐、绘画、新闻各界百余人。晚九时散。

六月上旬 宴请来自重庆的靳以夫妇和来自英国的萧乾及其未婚妻。

六月十四日 偕萧珊同往上海金城餐厅赴宴，这是开明书店为欢迎著名作家和为柳亚子夫妇祝寿的宴会，与会者有茅盾夫妇、陈望道夫妇、郭沫若夫妇及田汉、靳以、吕叔湘、王鞠侯、

翦伯赞等人，谈饮甚欢，于晚九时散。

六月二十三日 致信索非，署名芾甘。关心索非到台湾后的生活和工作，告之文生社近况：

“采臣来沪担任文生总处会计”，“我与朗西意见相差甚远，但他总是弄两个月又跑开，过几个月又回来。所以我们的事

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

作散文《月夜鬼哭》，原题《月夜梦鬼哭》，载二十五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用荒诞和写实结合的手法，借死于抗战的



《文艺复兴》
杂志封面。

情永远弄不好。这次我得与他想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六月

与李健吾晤面，答应为李主编的《文艺复兴》续写《寒夜》：“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就这样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寒夜》在《文艺

鬼魂“回到上海旧居”的见闻，表达对抗战胜利后的失望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官僚发财，投机家得利，接受人员作威作福，欺压良民……洋房、金条、女人，应有尽有”，多数人缺乏一切，仍然是“饥饿、痛苦与贫困”，“鬼魂”愤怒地呼喊：“我们粉身碎骨，肝脑涂地所换来的新秩序决不是这样！”



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反对内战。

七月一日 在《文汇报》上发表《记剑波和他的小书 心字》。

七月初 与田汉、周信芳等二百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七月上旬 获悉挚友沈从文十二日将自昆明飞抵上海，稍事逗留后，仍将往北平，在北大任教。与萧珊甚感高兴。

七月中旬 获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遂与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叶圣陶等友人联系发电抗议。

七月十六日 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人士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七月十七日 傍晚，应叶圣陶约请，前往开明书店赴宴，同席有沈从文、程受百、方光焘等人，谈叙至晚八时半始散。

七月二十八日 作散文《忆施居甫》，原题《忆居甫》，载《文艺知识连丛》月刊第一集之一。系为悼念四年前因肺结核而去世的朋友施居甫而写。

七月 与李健吾联袂向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推荐文学青年毕矣午，后毕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

八月七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云：“上海天热，我长了一身痱子，苦不可言，什么事都做不了，还得咬紧牙关写文章。”告《淘金记》已出版，有“六个地方，已照你的意思改正 重排了”。

致信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处理出版等事宜，并嘱将本期版税寄交沙汀等作家。

八月约中旬 手腕生热疮。

八月十四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通知对方版税已寄出，嘱将《还乡记》稿子“早日补全寄下”。

在上海《周报》第四十九、第五十期合刊“我们控诉”栏发表杂感《“封”和“禁”》。云“‘封’和‘禁’都是很旧很旧的办法。我们的祖先们用过它，却从来没有得着预期的效果。现在自然更不会”；又联系二十六年前自己办刊物被迫出“停刊号”，认为“中国……进步太慢”。上海《周报》由唐弢、柯灵主编，至本期后遭国民党政府刁难，被迫停刊。与巴金同时著文抗议的有马叙伦、柳亚子、顾均正、茅盾、刘西渭、周予同、王伯祥、楼适夷、叶圣陶、郭绍虞、景宋、郭沫若、徐调孚、吴祖光等。

八月底 挚友索非自台湾返沪，仍同住霞飞坊五十九号，欢宴畅谈。

八月 与上月来沪的诗人臧

克家晤面。因臧新任《侨声报》副刊主编，遂应约为该刊撰稿，以示支持。

约八月

欢迎与复旦大学师生一起返回上海的靳以，并支持靳以筹备创办《文群》杂志。后因当局一再刁难，未能如愿。

获悉萧乾回国后仍为上海《大公报》撰写国际问题社评，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接黎烈文台北来信，获悉他赴台北后任《新生报》副社长兼总主笔，但处处受制于当局，加上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社主任委员夏涛声从中作梗，不能坚持“言论自由”的方针，遂辞去《新生报》的一切事务。前往训练团和台湾大学执教。巴金感到“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是黎烈文“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

九月一日 在《少年读物》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译作《了不起的火箭》，英王尔德作。

九月二十二日 致信夏景凡，署名芾甘。告之转寄的尚莫宗木刻画稿已发表，自己近来写文章不多，长篇至今未写完，“蕴珍及孩子都好”等。

九月二十五日 午后三时，偕冯雪峰、郑振铎、胡风前往叶圣陶家。共商文协之杂志《中国

作家》出版事。议定出双月刊，明年一月出版。“目前各出拉稿，务期有较具斤两之东西。”四时半散。

九月二十九日 致信索非，署名芾甘。告之遵嘱托陈占元、顾均正等四处打听索非太太的事，并劝慰索非“静下心来”，“不要灰心”，“人活着并不容易，不要为那一件事就把生活的意义看轻”。劝索非收下开明书店送的退职金。

十月四日 上午九时，前往天蟾舞台，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目睹郭沫若、邓颖超等慷慨陈词，代表民主派与当局进行的斗争。

十月七日 前往开明书店参加宴会，与叶圣陶、郑振铎、顾颉刚等人同席。谈笑甚欢。酒后各写字一张，以为纪念。

十月十日 与沈钧儒、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九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

十月十五日 乘电车因为人多拥挤导致胸部损伤。虽无大碍，但对写作不免有影响。

十月十七日 致信索非，署名芾甘。告之已收到索非寄到文生社的存款，答应按月付息，请索非不必客气等。

十月十九日 下午二时至辣斐戏院，参加“文协”上海分会联合音乐、美术、电影等十二个

文化团体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并观看鲁迅葬礼的新闻片。与会者有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风等四千余人。

十月二十日

与文化教育界人士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前往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

从晚报上获悉周恩来飞抵南京，准备与蒋介石会谈；蒋在周到后两小时，即飞抵台湾。为时局担忧。

约十月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俄普式庚作、孟十还译《杜勃洛夫斯基》上发表为《杜勃洛夫斯基 译序》作的《补正》。说明这篇小说隔了一百〇八年“才得刊行”。

十一月一日 在《少年读物》月刊第三卷第四、第五期合刊上发表杂感《鲁迅先生十年祭》。云：“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但不必‘称他做巨星，比他做太阳’”，因为“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来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又说，鲁迅不单是“中国文艺界的珍宝”，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伟大的战士，人类解放运动中……勇敢的先驱”，“而他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在先生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民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先生所追求的并未到来，

而所憎恨的并未消去”，所以“先生的呼声仍然是极其响亮的”。

十一月三日 前往复旦大学，应邀出席陈望道、马宗融、章靳以、萧乾等教授举办的宴会。餐毕到教室参加座谈会，因学生太多，临时改到大礼堂。与会者尚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李健吾、卞之琳、王辛笛等。听茅盾讲了目前文化界情况和叶圣陶《关于语言和文字》的讲演。未发言。

十一月十一日 作《第四病室 后记》，载良友、晨光出版的《第四病室》。叙述该书写作、出版过程。

十一月中旬 获悉茅盾夫妇将赴苏访问。

十一月 作散文《怀陆圣泉》，原题《怀蠡兄》，后易题，载二十二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纪念陆蠡特刊二”。说认识不少人，但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的不多”。

十一月 与萧珊携小林扫三哥墓。事前用三哥译作《悬崖》、《战争》的稿费修了墓，“请钱君一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



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

十二月十五日 致信法国神父、学者明兴礼。表示希望多知道法国现在的情形，离开法国已经十八年，非常怀念当年留法时所住过的地方和所遇到的人。希望过两三年再去巴黎住些时日。“我喜欢法国”。

十二月三十一日 深夜，作完耗时两年的长篇小说《寒夜》，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小说背景在重庆，一九四四年初冬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因日军侵入贵州威胁重庆，在“湘桂大撤退”时辍笔；辗转后，一九四五年初冬，又在重庆那幢三层“大楼”的二楼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后又时写时辍，小说的“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脱稿的。描写两个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妻子和媳妇、儿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生老病死的悲剧。写作时“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因患肺结核“声音全部哑失”死在武夷山的作家陈范予，患肺结核“寂

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的作家鲁彦，患肺结核“痛苦不堪”地死去的表弟。创作的两年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 缪崇群 和一个哥哥 李尧林，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曾树生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小说的人物参照了生活中的几个原型，“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都十分真实”，不是摄影和报道，但“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冷酒馆……咖啡店……‘半官半商’……”，“我不论到哪里，……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我熟悉他们”，“写得很顺利”，“好像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替他们伸冤”；“写到汪文宣断气，……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写到汪母和孩子‘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三个人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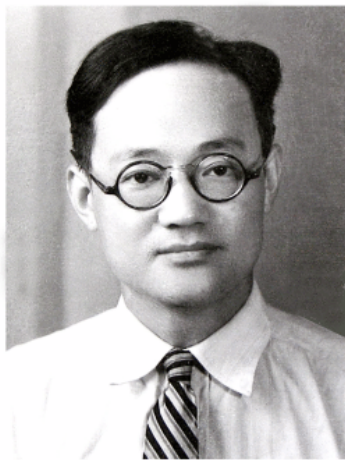
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这便是反动统治下无数“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我喜欢这本小说，……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的消散正是为了迎接黎明！

约十二月 获悉冰心因丈夫吴文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携全家赴日。

一九四六年内

在寓所会见穿着神父服的法国学者明兴礼，热情真诚地回答许多创作上的问题。在谈到童年生活和家族族的崩溃时，明兴礼从巴金四十多岁的面孔上，发现了一位青年的巴金。他感到巴金与青年人一般，有的是朝气和热血。事后巴金曾亲自翻阅了明兴礼用法文撰写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书的初稿。

获悉长篇小说《春》、《秋》分别由林柯 陈西禾 和李健吾改编成话剧。



一九四七年

认为仅仅“在小说的结尾……加一句‘哎哟，黎明！’”，是违背艺术描写规律的。

乘船到台湾旅行、访友。

白云小说《第四病室》是“发掘人性”、“《寒夜》是控诉”。

受爱罗先珂著的《幸福的船》等影响很大。

四十四岁

一月上旬 与从武汉来沪的田一文晤面，并帮助他处理、解决一些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矛盾。

一月十一日

在上海《大公报·游艺》“《女人与和平》公演特刊”上发表书信《给健吾》。说这个戏“气魄”“雄伟”“震撼……心灵”，并“佩服”李“运用自如的笔”，希望作者把“那些牛鬼蛇神一齐传上舞台”，并使“他们在你那照妖镜下面一一现出原形。让我们这些闷得要死的人痛快地吐一口气”。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云：“我比别人多记得你的好处，也能原谅你的一些缺点”，“同时我也以友人的资格劝你在做人方面也更进步”；希望田“能终身参加这个文化事业”。

一月二十二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云“元旦整日大雨，过得相当凄凉。不过我们都好”；又云“除朗西外，我们对你期望甚殷，而且相信我们能够为一件事长期合作”。

一月下旬 读批评家耿庸谈《寒夜》的文章《从生活的洞口……》，载《联合晚报



巴金

的一个世纪

· 夕拾》。

一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寒夜题记》，后易题《寒夜后记》。记述《寒夜》创作起因和过程，并针对一批评家的批评说：“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想写史诗”；没有在小说的结尾“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是因为“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又云“我还要奉上我这本新作《寒夜》”，“恭候着莫名奇、耿庸之流来处我以绞刑”；认为“读到自己所不喜欢的文章就想把作者‘捉来吊死’，这样的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自己的老古董秦始皇就玩过‘坑儒’的把戏，他所坑的‘儒’自然是那些和他不同道的、不拥护他的人”，但“秦始皇的霸业也仅能传至二世”。

二月五日 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与刚来沪的吴朗西发生争执。就关于把文化生活出版社改组股份公司事达成协议，着手准备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

二月七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云：“知道你近来极努力，我很高兴。”并告之为“文生社”发展的事情与吴朗西发生了争执；近日为校稿和发排新书非常忙碌。

二月十日 参加上海八个文化团体在光华大戏院联合举行的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

二月中旬 忙于校《娜娜》、《上尉的女儿》等书稿，签字发排《吾土吾民》、《人生采访》、《山水》、《窄门》等书稿。

二月十七日 偕赴美讲学归来的曹禺，观看周信芳、李玉茹同台演出的《坐楼杀惜》。剧终随曹禺到后台看望周信芳和李玉

茹。

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表示为今年“文生”可出几本好书而高兴。

三月上旬 文生社改组后事情做得好，大家都高兴，订了“出书多，售价低”两条原则。仍忙于看校样及签字发排等事务。

三月十二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询问刊行克鲁泡特金全部译著的捐款之事。

三月十三日 与柳亚子等出席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年纪念会。

三月十四日晚，至杏花楼与郭沫若、叶圣陶、曹禺等欢宴。

三月二十一日 致信夏景凡，署名芾甘。告之近况：生活非常忙乱，文章一时无法写。

三月 译《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俄克鲁泡特金作，载五至六月《世界月刊》第一卷第



巴金《寒夜》
初版书影。



巴金一家在上海复旦大学教工宿舍。

九、第十期，本文是一九一九年底克鲁泡特金为所作《一个反抗者的话》所写的跋。

四月一日 致信沙汀，署名蒂甘。告之《还乡记》审读情况。

四月五日 清明节，按惯例偕家人扫三哥墓。为了“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

四月

编完散文集《怀念》，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作《怀念 前记》，载

《怀念》。云出版《怀念》是想介绍读者“去接近几个平凡的人”，他们“能闪出一股纯洁的心灵的光，那是一般大人物所少有的。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予’而不求‘取得’”。

五月约中旬 收到法国明兴礼神父从巴黎寄来的 Malvidade Meysenbug 的作品。

五月二十四日 致信明兴礼。此信和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均非作者原文，录自王继文翻译的法国学者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告之喜欢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并受

其“英雄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罗曼·罗兰“爱真，爱美，爱生命”的思想。

五月下旬 获悉萧乾六月初去重庆，返沪时要到汉口逗留数日，遂托他找田一文谈谈。

五月二十七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蒂甘。告知书店这半个月营业差，淡月来了，时局又不好，人心不安定，买书人也减少了。

六月五日 校阅完毕修匀的旧译作《一个反抗者的话》，俄克鲁泡特金作，并作《一个反抗者的话 前记》即《一个反抗者的话 跋》，载一九四八年六月平明书店初版《一个反抗者的话》。

六月七日 作《雪 日译本序》，载一九四九年东京大雅堂版岛静子译《雪》。说明由《萌芽》改为《雪》的原因，又借书中年轻太太引用的话表现作品的主旨和作家的政治观：“‘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周围的人得到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因此我相信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并无真正的仇恨。这两国人民的命运可以连在一起，而且也应当连在一起。”

六月中旬 生病，休息了好几天，接吴克刚等人信，准备去台湾旅行。

六月十八日 致信田一文。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告知后天要去台湾。大约两周后回来。“许多话等我回来后再谈”。

六月二十日

作《卢剑波和他的心字》，载七月一日《文汇报》，后易题为《心字后记》。云卢“有着极强的精神力量”，“有着爱的心”，虽然他“是一个没无闻的中学教师”，可是“以能够代他编辑这一本集子为我的光荣”。

乘船赴台湾省旅行、访友。

发表译作《人之子，悲多汶》，法A·多洋作，载《人间

世》复刊号即第一卷第四期。

七月上旬 前往台北金华街二四五号与黎烈文欢晤。“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在台湾大学教书，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们闲谈半天。黎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同时与黎商谈，准备在台北开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店，房子已看好。

七月二十二日 自台北基隆坐船返沪，并安排弟弟李济生前往台北筹办开设分店的事务，安排陈晖去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学习独当一面的做事方法。

七月二十五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告之近况并洽谈书稿。

七月下旬 因天热，又忙于看校样，手腕上生了小疮。

七月

作散文《静夜的悲剧》，载《中日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作《月球旅行后记》，载十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李林选译《月球旅行》。云在战乱年代和贫病交迫中翻译一些科学趣味短文的李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受着大的压迫”，为纪念他，遂将这些“值得一读”的译文编集成册。

约七月 获悉挚友马宗融因公开反对当局逮捕学生 终被复旦大学解聘，遂登门安慰；不久，马宗融携带全家赴台北时，又为之饯行。

八月初 接李济生自台北来信，获悉自己在台北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李济生拟另外再找。

八月上旬 天气持续炎热，伏案写作时间过长，腕疮日趋严重，就医和护理后日渐好转。得田一文信。获悉田下月结婚。

八月十一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告之近况及安排李济生去台北、陈晖去重庆之事。

八月十四日 致信沙汀，告



巴金旅行
台湾时摄。

之沙汀《淘金记》的出版情况，嘱沙汀将《还乡记》稿子“补全”后寄来。

八月十九日 晚六时许，应郑振铎邀请，与郭沫若、茅盾、钱锺书等参加《文艺复兴》举办的聚餐会，表示：当前物价飞涨，有的刊物停刊，为支持《文艺复兴》办下去，即使不付稿费，也愿继续写稿。

八月

接待自台北返沪度暑假及探亲的挚友黎烈文。三星期中“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

接待好友叶非英即“耶稣”留住家中两夜。不久接叶非英从泉州来信说他“是小事业主义者……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

九月一日

作《巴金文集 前记》，载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春明书店版《巴金文集》。云“自己编选”“无非想保存我的文章的真面目”。又说：“我从没有写过一篇可以称为‘杰作’的东西。不过我的文章中没有骗人的谎话，至少不会使读它的人受毒害。”

译《渔人和他的灵魂》，英王尔德作，初收《快乐王子集》。

九月上旬 编完译作《快乐王子集》，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

版。

九月月上旬 与文生社同人商议后决定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印大批书。

九月十六日 托启程去汉口的索非的儿子鞠躬带一本新著给田一文，并附信告之，拟将田的散文集《跫音》列入《文化生活丛刊》第十集，交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付排。

九月十七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云：“鞠躬过汉盼招待他，并送他上车。如需用一点零星款子，请你付给他 要他打个收条就行了。”

九月 编就自选集《巴金文集》，交上海春明书店。一九四八年一月出版。

约九月 收黎烈文返台北后来信，获悉他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

十月十一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认为近来“出版界情形不好，印书渐渐变成了奢侈的事情”，仍鼓励友人“安心译下去”。

十月十六日 接待曹禺 闲谈中获悉他五年来一直想买床鸭绒被，遂答应托田一文代买。

十月十七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嘱其为曹禺买鸭绒被，并答应田欲调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要求。

十月

作《大姊 后记》，载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大姊》。记述郑定文《大姊》书稿的由来，表示喜欢那些平凡的故事、那些琐碎的情节、那种朴实的文笔、那种自然的抒写。

译《散文诗四篇》，英王尔德作，载十一月一日《世界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整理旧译作 列入主编的翻译小文库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有《过客之花》、《叛逆者之歌》、《我的生活故事》等。

约十月 致信苏夫。云：“《第四病室》不算怎么忧郁，我想发掘人性 《寒夜》是控诉真实情形还要惨 再版时我还想改动。”

十一月中旬 为扩大文化生活出版社增加资金事奔走忙碌，经常看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好的几部稿子的二校样到深夜 还要忙于翻译。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云“更忙”，如田来沪与采臣合作，“书店的前途有望”；“文生登记执照已领得，现正计划增资，俟增资手续办好，即可印股票，宣布为有限公司”；并告“自己以后得离开，只要有采臣和你支持这事业，我只在外面帮帮忙就成了”。

十一月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为纪念三哥李尧林去世二周年，整理、编辑他的译作，编成集子《伊达》，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作《伊达 后记》，后易题《纪念》，载《世界月刊》第二卷第五期。对“真诚、朴实、善良认真而又那么富于人情味”的译者的译著生涯作了简介。又想借这个小册子，让“爱他敬他”、“得过他的益处”的年轻人永远保留对这个“‘没没无闻’的清贫的读书人”的纪念。

作《快乐王子集 译后记》，载《快乐王子集》。记述一九四二年三月以来翻译王尔德童话的过程，赞原作有“美丽完整的文体”，“富于音乐性的调子”，“丰丽的辞藻”，自谦“词汇……贫弱”，“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

参加编辑文协主办的《中国作家》杂志。

约十一月

为译作《木星的人神》作《译者小言》，载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六月版《笑》。简

介原作者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曾从日本被放逐到中国的经历。这篇童话原名《木星之人间神》。

作《加斯多尔的死 译者小言》，初收《笑》。云原作者勃拉特斯古·伏奈斯梯是罗马利亚的小说家，著作颇多，一九二五年得了罗马利亚文学院的奖金；本篇系从世界语译本译出。

十二月十一日 在上海《大公报·出版界》“作家及其作品特辑”总题《巴金回忆 面包略取 冯至怀念 昨日之歌》下发表《答 大公报 副刊 出版界 编者问》。云：“我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略取》”，“原著者是克鲁泡特金，中译本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我自己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灭亡》”并谈《灭亡》发表的经过，《灭亡》和《新生》的“续篇”是《黎明》，“我想在这部小说里描写我的理想社会，或者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二〇〇〇年去”。

十二月二十日 在家接待曹禺，把田一文托人捎来的鸭绒被交他。

十二月 致信田一文，署名蒂甘。嘱田一文明年二月来沪。

十二月

整理完旧译作，结集为译文集《笑》。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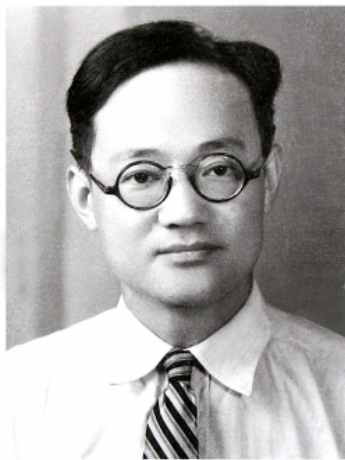
作《笑 前记》，载《笑》。云喜欢爱罗先珂著的《幸福的船》等，“它们给我还有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一九四七年内

获悉黄裳因报馆被封而失业，遂将三哥没有译完的威尔斯著《莫洛博士岛》交他接着往下译，并答应为其出版。

得马宗融几封信，获悉他赴台北后“生活安定，功课不多，但是他不习惯那种沉闷的空气”。

译《裁判所》和《智慧的教师，讲故事的人》，英王尔德作，散文诗，初收《快乐王子集》。



一九四八年

翻译俄国民意社老将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云“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的献身的热望”。

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

四十五岁

一月四日 至王辛笛家晚餐，与赵家璧、靳以等为郑振铎补贺生日。

一月十九日 在《文艺春秋》月刊第六卷第一期上发表所译俄库普林《白痴》及《译者小言》。通过一个白痴儿童对人的同情，表明了“白痴们并不缺少人的本能”，只不过“隐在兽性下面”而已。

一月下旬 作《寒夜 再版后记》，载四月晨光出版公司版《寒夜》。针对一些批评家的流言云：“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书销去五千册……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一月 获悉梅林主编的《巴金文集》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

约一月

遇胡风，得《胡风文集》第一卷。谈到近来香港一些作家对胡风在抗战期间某些观点的“批判”时，问：“为什么别人对你有意见”胡风说：“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

在家设宴招待靳以夫妇和田一文夫妇。是时田一文合家来沪，巴金安排他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襄理兼管编辑工作。



二月十五日

在《文讯》第八卷第二期上发表译作《笑》，保加利亚奈米洛夫作。通过一个年老的马戏班丑角的回忆，叙述了他对年轻、美丽而早逝的女艺人伊采林娜真挚、凄婉的爱情故事。在《译者小言》中说明原作者奈米洛夫是保加利亚的小说家，作品甚多，本篇是从 I. H. Krestanov 编选的世界语本《保加利亚文选》中译出。

开始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

三月二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告之已写成“新作”《寒夜》，“写一个读书人怎样活着，怎样死去”，又云这部作品也许“沉闷，恐怕不受人欢迎”。

三月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快乐王子集》，英王尔德作童话、诗文合集。

患病，在家休养。



王尔德。

四月十八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译作《我开始接触生活》，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四月二十九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云：《还乡记》出版期约在七月中旬，因害怕真正巡官们见到书名发生误会，遂将《巡官》改了个名字《堪察加小景》。稿已早寄重庆排，五月内就可寄出纸型。

四月 为书店看校样操劳过度而患病，仍在家休养。

约四月 在观看了柯灵根据高尔基《底层》改编的电影《夜店》后，觉得“牢牢抓住我的心，读改编本，人物、性格、气氛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了”，希望柯灵将《夜店》的文学剧本整理出来，决定将其列入《文学丛刊》，由文生社出版。柯灵很高兴，觉得这是巴金对电影艺术的支持。可惜，后来因为柯灵流亡香港，生活颠沛流离，《夜店》未能出版。

五月五日 致信沙汀。告之对方，病渐好。这两天已出过门了。这次病了两个多月，一事未做。过些天得加紧工作了。但直到现在身体尚未复原。

五月十四日 上午十时半，参加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艳阳天》首映式。观毕，与叶圣陶等应该片编剧曹禺之邀到新雅饭店聚餐。

五月二十三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译作《纸》，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五月二十六日 与叶圣陶、景宋、郑振铎、陈望道、臧克家向观众推荐新片《艳阳天》。

五月三十一日 致信明兴礼。谈自己从十一岁起，读“中国旧小说”，到后来“读了很多的欧美翻译的小说”和“读用英文写的外国小说”的过程，又说“在起初我很喜欢迭更司的作品”，对“俄国小说”“很感兴趣”，后来读过左拉的二十几部作品，另外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和她的《近代戏剧论》，“对我影响很大”，“柏克曼的《狱中记》，很感动我”；也“喜欢读高尔基早期的作品，受罗曼·罗兰和雨果的影响”，还读过俄、法一些“革命家的传记”，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注意到《新约》，我喜欢读《四福音书》，我也常引证它”。

六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六卷第六期上发表译作俄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惩戒室——狱中记之一章》。

六月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翻译的保加利亚 D. 奈米洛夫等作的短篇小说集《笑》。

致信明兴礼，云：“我读着

你给我写的教会的社会思想，好似我们的意见很相近，这是我从来未曾想到的。我同德神父谈话时，也发见他同我有一样的见地，但我怕这不是教会中大多数的意见吧。”

七月三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兄弟般的，李蒂甘”。系通过在美国“平社”工作的刘钟时 Ray Jones 的介绍与她通信的。这封信表示已收到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的来信，并愿意“继续为拉巴迪收藏会在美密歇根大学综合图书馆内寄书”；简介自己“以写作谋生”，在中国已出版十余部小说；希望对方代为复印他在国外世界语和德语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东京烈士》和一篇关于萨珂和凡宰特的短文。

七月十四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译作《“帕龙德拉”》，系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七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七卷第一期上发表《母亲的祝福——狱中记之一》，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七月下旬 在酷暑中，校阅缪崇群的散文集，并题名为《碑下随笔》。因为一是“缪已作古”，是“碑下人”；二是缪的“这些短文”是在“‘碑下’写

成的”。“碑下”指的是作者创作时居住的金刚碑，地处北碚与北泉之间，山顶上有一块天然矗立的石头，如同一座高大的碑，但碑上无字，人称金刚碑。缪的宿舍就在山顶上这座石碑之下。校阅时引起对亡友的强烈思念，永远忘不了他的声音，也感到“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

七月二十五日

作《碑下随笔 后记》，载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缪崇群《碑下随笔》。记述收集缪崇群信札得而复失的遭遇，并有感而发：“在这个年头要不让一件东西毁灭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又说：“对于我他的友情是不曾死的。我们靠着它活下去。”

作《静夜的悲剧 后记》，载《静夜的悲剧》。云“一部法国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自由的历史”。

致信范泉，署名蒂甘。要求《文艺春秋》主编、作家范泉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

七月

与茅盾等编辑的《小说》月刊在香港创刊。

作《还乡杂记 后记》，未署名。载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何其芳著《还乡杂记》。说明删去、编定并改

回书名的经过和缘由。

夏季 与萧珊在寓所接待杨静如，获悉她此行是陪姐夫罗沛霖赴沪办出国留学手续。当时在座的尚有章靳以、曹禺、王辛笛等人。

八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译作《格拉切夫斯基——狱中记之一章》，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八月二十八日晚，应开明书店叶圣陶邀请，与端木蕻良等赴宴。

八月

据一九三八年版《西班牙的黎明》改订《西班牙的曙光》，西班牙幸门绘画，改编者巴金作诗，诗画册于九月在上海平明书店出版改订本。

作《西班牙的曙光 前记》，载《西班牙的曙光》。

约九月初 送好友马宗融赴台湾大学任教。

九月十二日 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发表译作《前夜》，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九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七卷第三期上发表译作《通信——狱中记之一章》，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九月

作《西班牙的血 前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记》，载改订本《西班牙的血》。

译完《狱中二十年》。这本书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作《狱中二十年 译后记》，载《狱中二十年》。云一九二七年译者曾发愿把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全部译成中文，那时他曾说过：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他的崇高的感情；他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又说，该书是作者二十二年监狱中“生活的记录”，她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老将”，因参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被捕判刑的。又引用作者友人N.米海罗夫斯基的话赞美道，妃格念尔能“放射出”“吸引着她周围的人们的魔力”，“她整个身心是十分谐和，……一言一动都表现着她的整个自我”。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静夜的悲剧》。

十月十九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真诚的，李芾甘”。称收信者的图书馆“收藏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文学作品”，故寄去自己译的克鲁泡

特金的《自传》，“关于中国旧式家庭生活的小说《家》”。表示还将寄“更多的书去”。

十月二十一日 在香港《文汇报·文艺》上发表译作《铁丝网——狱中记 之一章》，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十月二十四日 接沙汀信，前往书店会计科，嘱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汇出。

十月二十六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告之书店同意预支版税二十五万元，并告马宗融在台湾大学的近况。

十月二十八日 晚上，与叶圣陶、郑振铎、黄裳等欢宴于锦江饭店。

十一月二日 致信杨静如，署名芾甘。为“客人多”对友人“没有好好招待”而致歉，并云文化生活出版社稿多积压，近期“无力接受新稿”。

十一月八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真诚的，李芾甘”。告知“已经撰写出版了一个有关芝加哥烈士的小册子，题为“自由血”。

十一月 忙于校阅文化生活出版社之书稿，又整理译作，并开始译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小说《六人》。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致信范泉，署名芾甘。告之因忙着看校样，不能为《文艺春秋》开辟的“新春随笔”专栏撰稿，但是将

未发表过的译作《同盟绝食》寄上。这是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中的一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致信沙汀，署名芾甘。告之沙汀的《还乡记》“稿费已寄出”，并告已代看校样，“大错绝不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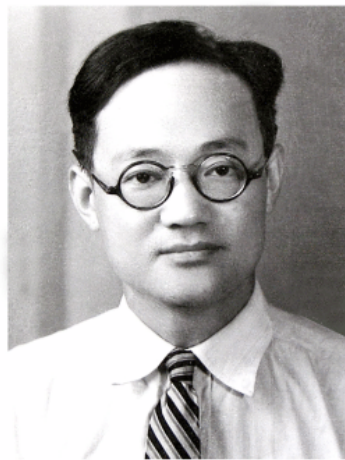
发表写给友人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手迹，载上海《大公报·大公园》“作家手迹”栏，署名芾甘。手迹内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

十二月月下旬 获悉田一文因与别人有意见，欲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襄理职务，遂约田到家中恳谈，劝田勿意气用事。但田仍固执己见，遂嘱其办理好移交手续后才能离职。

约十二月底

获悉田一文离开上海，并扔下正在进行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校对工作，仍由家中赶到出版社为田送行。未遇，遂代田校完书稿。

应邀前往郑振铎家赴宴，欢聚者尚有郭沫若、茅盾、曹禺、钱锺书、章靳以、艾芜、杨绛、王辛笛、李健吾等，谈时局及文艺界现状。



一九四九年

赞《狱中二十年》“每个字像火一般点燃你的血”。
喜迎上海解放，“感觉到新的光辉时代开始了”。
应邀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百感交集，也感受到“友爱的温暖”。
在京参加盛会期间，几次登门看望被新文坛“冷落”的沈从文。
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观礼。著文热烈歌颂新时代。
至万国公墓献花，作文赞鲁迅是“有着伟大心灵的巨人”。

四十六岁

一月上旬 会见好友黄裳，因为黄裳从叶圣陶来信中获悉，外界误传巴金已经到台湾去了，叶为此事颇着急。巴金很感谢叶圣陶对自己的关心。当时确实有好多人劝巴金离开大陆，但是他看到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他想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不能离开人民，决定留下来。并且表示要改造自己，要从头学起。

一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译作《同盟绝食——狱中记 之一章》，是俄薇娜·妃格念尔作的回忆录。

约一月下旬 接待自台北到上海度寒假的黎烈文，并劝其留在上海。其间曾偕黎烈文、马国亮等人欢宴于赵家璧家。

二月六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真诚的，李芾甘”。告之收到对方寄来的克鲁泡特金的有关信件，表示打算翻译这些信件。

二月月上旬 因政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物价暴涨，终留不住黎烈文，遂送他返台北。

二月十四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李芾甘。收信人问巴金的小说《星》中年轻人的命运“后来怎么样了”。告之“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对未来失去了信仰”，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其中更多的人“比先前愈加坚强与成熟”。表示“今后将为贵收藏会寄去更多的材料”。

二月二十五日 在泉州自由社出版的《自由丛刊》第七期上发表传记《巴枯宁二三事——巴枯宁的第一个片断》，署名黑浪。

二月下旬 在霞飞路寓所会见朱洗和毕修勺。获悉毕修勺因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扫荡报》主编、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简派参事和中央训练团指导员，现因解放军横渡长江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想与吴稚晖一起飞往台北。遂与朱洗一起，劝毕修勺留下，认为“共产党不会算旧账”，“即使算”，毕“也无大罪恶”，并表示，如有事，也愿与朱洗一起为毕说话。最后，毕修勺还是采纳了与之同住的朱洗的建议，取消了第二天与吴稚晖乘“美龄号”飞台的计划，留在上海。

二月

开始翻译屠格涅夫《蒲宁与巴布林》和高尔基的回忆录《回忆契诃夫》等文。

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狱中二十年》上发表广告三则，均未署名。

《狱中二十年》广告，赞扬该书的作者妃格念尔：“曾被法国文豪法朗士称为‘俄国革命的贞德’。她的书不仅是每个字像



鲁多夫·洛克尔。

火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个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她会使你流泪，她会唤起你的渴望。”《六人》广告，云该书作者鲁多夫·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六个人物”“解答”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快乐王子集》广告，云“王尔德的童话并非普通的儿童文学，却是童话体的小说”，作者“保持着—他丰丽的词藻和精练的机智”。

约二月 得挚友马宗融信，获悉他因鲁迅挚友许寿裳于十八日被暗杀而陷于“苦闷”与“悲愤”之中，且“酒越喝越多，身体越来越差”，终于病倒；遂去信劝马留在台湾治病。

三月九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真诚的，李芾甘”。告之寄去《俄国革命史》和小说《春天里的秋天》等。告知“自孩提时就见过很多暴行”，“现在亦是”。见过“众多残忍的行为”，是自己的

同胞相互“残忍”，“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并将这些见闻“交织”在小说里。

约三月上旬 前往北京路回民联络站看望刚从台北返沪又贫病交迫的挚友马宗融。见“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肿”，“他伸出大手来抓我的手”，为看到老友而高兴。巴金含泪安慰他。之后，巴金常和萧珊去看他，但感到“火在逐渐熄灭”。

三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八卷第二期上发表德鲁多夫·洛克尔作的小说译作《浮士德的路》。

三月二十一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诚挚的，李芾甘”。告之寄去小说《春》、《秋》、《灭亡》、《新生》、《巴金自传》等。并告之“病了一阵子”，现已康复。

约四月初 因政局混乱、物价暴涨，法币贬值，巴金一向靠稿费维持的家庭生活也陷于不安定状态：“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里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四月上旬 获悉挚友、原复旦大学教授、法国文学翻译家马

宗融病逝，立即赶到回民联络站，向遗体告别，并安抚马氏遗孤。说服他们将马遗体安葬在徐家汇回民公墓。参加筹备并出席公葬仪式后，将马氏从台北带回的书捐赠图书馆。因死者“身边毫无积蓄”，又是“最好的一位朋友”，遂将马氏遗孤长女马小弥、幼子马少弥收养家中，教育他们“健康地成长”。因家庭人口陡增，开支大，见萧珊家务日重，于心不安。幸好与开明书店编辑、科幻和儿童文学作家顾均正为邻，“均正夫妇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国华嫂在家务上经常给萧珊出点主意帮点忙”，才能勉强打发动乱的日子。

四月十五日 在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八卷第三期发表德鲁多夫·洛克尔作的小说译作《董·缓的路》。

五月初 解放军横渡长江 解放南京以后，上海形势更紧张。稿费的来源断绝，没有收入，又没有储蓄，和萧珊正为此发愁，顾均正夫妇来，告诉说，开明书店发给他们“应变费”十天一次十块银元，他打算代巴金向书店交涉“借支版税”。“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大洋十元，说是借支办法和他们一样。我感谢他，我的困难终于解决了。我大概借支了两次‘版税’上海就解放了，我们都有活路了。”

五月七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诚挚的，李芾甘”。云已了解尼娜·范·扎特这个人。赞她“真诚”、“热情”，“她的奉献和她温柔的心灵”。又告之“这里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战争逼近上海”，“我不知道前途如何”，只好“等待与希望”。信末“附言”云，一书中写墨索里尼的盖世太保将十五岁的孩子杀死，责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流血”、“眼泪”、“酷刑”坚信世界上“同样有英雄主义和爱”。

五月二十七日 听了一夜枪炮声，天刚亮，报馆工作的朋友来电告诉上海解放的消息。急忙转告友人，“感觉到一个新的光辉的时代开始了”。下午与黄裳同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察看，然后到南京路看人民解放军入城。

约五月下旬 接何其芳从北平来信，问及近况，并表示关心。阅信后，感到亲切和温暖。

六月初 上海军管会文艺处负责人黄源来访，相互祝贺胜利会面。

约六月上旬 接周恩来来自北平发来的电报，拟应邀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六月十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芾甘。云：“过两天要到北平走一趟。许多话等回来再谈”，

并为田一文离开书店事“颇觉难过”，答应“将来书店如有发展的机会，可以约你在别方面负责”。晚，为译作《六人》定稿。并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你最诚挚的，李芾甘”。云“在战争中”“遭受了很多痛苦”。告之将会被“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所‘解放’。情况日渐好转。”

六月下旬 与吴朗西等人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争执。去北平前几天吴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来跟巴金吵，要巴金交出文生社。巴金无意纠缠，答应回沪后办交接手续。

六月二十七日 作为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上海代表团成员，和靳以、王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璧等随团乘火车到达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扬、阿英等到北平火车站迎接。

六月三十日 上午，在怀仁堂参加文代会预备会；下午，参加文代会主席团常委会。见到从各地来的许多熟人和分别多年的老朋友，也见到更多的解放区来的文艺战士。但是没有看到沈从文。

七月一日 晚，应邀往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大会。

七月二日 九时，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



幕式，下午一时结束。午饭后，继续参加主席团常委会。与会期间，遇叶圣陶等老友，十分激动和高兴，“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多高兴”。

七月三日 继续出席文代会。听郭沫若作总报告，会间听柯仲平朗诵新诗作，等等，十二时散会。午后，继续参加主席团常委会。

七月四日 上午，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文代会，听取茅盾关于国统区文艺情况的报告。午后继续参加主席团常委会。

七月五日 八时，出席文代会，听取周扬报告。下午七时半到怀仁堂，听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七月六日 下午二时，出席文代会，继续听取周恩来报告，晚七时许，毛泽东到会，全场鼓掌达半小时之久。

七月七日 文代会休会。参加北平二十余万人冒雨举行的大集会，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会。

七月八日 上午九时，出席文代会。

七月九日 出席文代会，听取丁玲报告及阳翰笙、柯仲平发言。

七月十日 出席文代会，听取自由发言。

七月十一日 出席文代会，听取自由发言。晚饭后，到国民大戏院，看华大三院演出《红旗歌》。

七月十二日 出席文代会。

七月十三日 休会。与叶圣陶、章靳以、王辛笛晤谈。

七月十四日 出席文代会，参与通过章程及选举规则。

七月十五日 在上海代表团，参与讨论初选候选人。

七月十六日 出席文代会，参与讨论提案。

七月十七日 作发言稿《我是来学习的——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载二十日北京《人民日报》“全国文代会代表对大会的感想”栏。云“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还是第一次”，“得到了不少的东西”：“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却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

巴金 右二 与出席首届文代会的唐弢、曹禺、章靳以、李健吾等合影。



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他们教育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年青的灵魂。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

七月十九日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七月二十日

在《人民日报》“全国文代会代表对大会的感想”栏。发表《对大会的感想》。同时刊登感想的还有冯雪峰、白杨、梅兰芳、周信芳、骆宾基、古元等。

出席中共中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为参加文代会演出的各文艺工作团举行的招待会。

七月二十一日 下午五时，出席中共中央为文代会代表举行的盛大宴会。朱德出席。

七月二十三日 出席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文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朋友们在会上叫出巴金的名字，要巴金在会上讲几句话，巴金躲开了。后来忆及当时的心情说：“我不会讲话，站在讲台上我讲不出一个字。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不愿拿我的缺点再去折磨别人。”

七月 会议期间不止一次前往沈从文家，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沈从文和张兆和。文艺界似乎把

沈从文忘了，他被冷落、被排斥的寂寞使巴金不安，表面上看不出沈从文有什么情绪，仍然关心每一个熟悉的人，关心文艺界的情况。

八月二日 上午十时十分，偕同冯雪峰、潘子展、赵家璧等乘火车返上海。

八月约中旬 参加文化生活出版社改组，康嗣群任总经理、朱洗任董事长。巴金除担任总编辑外，又与靳以、吴朗西、朱洗、毕修勺等同任常务董事。

八月二十九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蒂甘。告之六月下旬去北平前与吴朗西夫妇的争执。并云“我无权请你回来了”。“过两年文生业务发展时，我当向康介绍，劝他把你请回来。我对书店兴趣差得多了，我实在羞与

朗西夫妇为伍”。

八月

译完《楔子》、《哈姆雷特的路》、《董·吉珂德的路》、《麦达都斯的路》、《冯·阿夫特尔丁根的路》以及德鲁多夫·洛克尔短篇小说《觉醒》，初收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六人》。

作《六人 译后记》，载《六人》。简介原作者洛克尔的身世，并引用《六人》英译者的话：“我觉得《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

九月一日 把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交康嗣群，并作赴北平前准备。

九月八日

与胡风等知名人士同乘火车抵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巴金一九四九年九月摄于北平华文学校。



巴金 前坐者左二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与文艺界同行合影。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下榻华文学校会议招待所，与胡风住室毗邻。

访汝及人即翻译家汝龙，可惜汝及人已去无锡。后来去找郑振铎和曹禺，将张骏祥托带的香烟交曹禺。共进晚餐。

九月九日

吃早饭时遇见杨刚和一些熟人。十时参加分组会。

致信萧珊，署名芾甘。告之抵京后访郑振铎、曹禺的情况及住宿条件、气候等。

九月十三日 下午，与夏衍、冯雪峰、陈荒煤、刘白羽、任白戈、梅兰芳、周信芳、袁雪

芬等六十余人，出席全国文联正副主席郭沫若、茅盾、周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各地抵京文艺工作者举行的招待会，听取夏衍、邵荃麟、陈荒煤、刘白羽分别作的关于上海、香港、武汉及部队文艺工作情况的报告。

九月十八日 晚六时，出席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个单位为政协代表举行的宴会，董必武、聂荣臻致欢迎词，郭沫若代表政协致答词。

九月二十日 得萧珊信。即复萧珊，署名芾甘。云：“文生社的薪水我始终说不要，小康如了解我，似不应当送来。你退回

去很好。”表示以后对文生社也无法尽力，不好白拿钱。出版社如不“预支”版税，以后也就不会拉到好稿子。现在别的地方都“预支”版税。认为“写文章的人特别感到钱的需要，谁还愿意白白为文生社写稿、译稿？十本书的版税小康不主张补发，我已去信表示不坚持，只要他们能负起这责任就好。对文生社的前途我颇悲观。我也预备放弃了。本来在这时候我们应有新的计划，出点新的书……实在可惜。”告之托俞福祚带去一条给小林的狗、为萧珊刻了图章、为马少弥买了宝剑等。

九月二十一日 晚七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听取政协筹备会主任毛泽东致的开幕词，刘少奇、宋庆龄等十二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讲。

九月二十二日 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德鲁多夫·洛克尔作的短篇小说集译作《六人》。

九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华文学校与胡风、马思聪、史东山、艾青等摄影留念。

九月三十日 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式。会后与胡风、曹靖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艾青、史东山、马思聪等合影留念。

九月 几次看望沈从文，理解了沈从文的“委屈”，但是无能为力。后来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说：“交谈的机会比较多，我才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北平解放前后当地报纸上刊载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还是在香港报上发表过的，十分尖锐。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很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虽然，巴金感到“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

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

约九月 会见震旦大学王继文，获悉他将翻译法国明兴礼博士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书，遂陆续借给王不少书，供翻译时参考。

十月一日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三点起，接连六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我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桌，第一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我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向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融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表示“我要写”，“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

十月十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文协主办的邀请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谈文艺的座谈会。

十月十一日

应文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请，拟撰写纪念鲁迅的文章，遂前往北京图书馆参观“鲁迅先生作品及生活展览

会”。又一次目睹鲁迅的手稿、信札和遗照，引起强烈的缅怀和悼念：“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会，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容纳下一个巨大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晚，作散文《忆鲁迅先生》，载二十五日《人民文学》创刊号。说“这些年来”在“困苦”、“绝望”、“疲乏的时候”，常常想起“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巨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用尽了他的心血”。

十月十九日 上午九时，与刘长胜、李伯钊、萧三、夏衍、叶以群同至万国公墓向鲁迅陵墓献花。旋即参加上海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大会，并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十月二十九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李芾甘。告之“我一切都好，已经能够逐渐继续我的文字工作”。但进展“十分缓慢”。

约十月 与萧珊一起为马小弥整顿行装，送她参军北上。

十一月三日 晚八时，前往文艺处参加上海文协常委会，会上决定各部门负责人选。主席冯雪峰，巴金任副主席、创作部长



和文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会上还决定出版会刊，又与冯雪峰等九人为编辑委员。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晚七时，出席上海文协在文艺处举行的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夏衍、周而复、冯雪峰等十余人，商讨和决定发动会员到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等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

译完俄屠格涅夫作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十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

作《蒲宁与巴布林 译后记》，署译者。载十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版《蒲宁与巴布林》。

十二月十六日

偕萧珊及三周岁的孩子李小林前往照相馆摄影留念。不久又将此照片寄赠好友杨苡即杨静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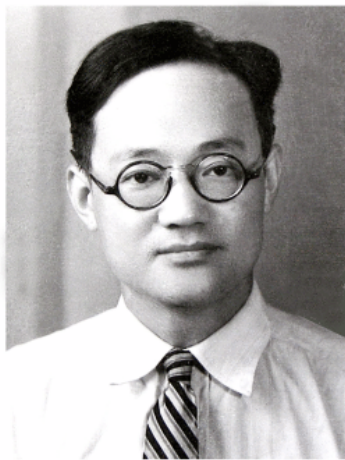
译完苏联高尔基作的回忆录《回忆契诃夫》，后改题为《安东·契诃夫》，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

十二月 作《回忆契诃夫 译后记》，署译者。载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海平明出版社版《回忆契诃夫》。

十二月三十一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李芾甘。告之自己近况“很好”，仅自己的小说“发行量大大下降了”，还能“靠翻译世界名著谋生”。又云近来“太忙了”。

巴金部分
译著的书影。





一九五〇年

鉴于“文化生活出版社”内部人事纠纷复杂，辞去总编辑职务。

向列宁墓献挽词：“献给人类的伟大导师列宁”。

在上海、北京、华沙、莫斯科先后参加文学和保卫和平大会。

四十七岁

一月初 获悉成都已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亲友安好。

一月四日 出席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讨论柳青《种谷记》的座谈会。

一月二十日 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在上海市政府礼堂参加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成立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及委员会委员。

一月 作《一封未寄的信》，载五月五日上海《文汇报》。赞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们“把文艺带到了广大的地方，让无数的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出版译作《回忆契诃夫》，苏高尔基作，回忆录，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又获悉好友丽尼到汉口中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兼武汉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企望他有个安定的环境，写出优秀的散文。

二月六日 正在写作，闻敌机偷袭轰炸上海，短暂回避后继续写作。又作完《何为新版前记》，载三月平明出版社版罗淑译《何为》。云这小说“是一件不坏的艺术品”，译者罗淑已病故，“这本小书就作为供在她灵前的祭品”。

二月十三日 致信田一文。告之最近应“文生社”同事们约请，出面与吴朗西“谈过两次”，“提了一些意见，但朗西一点也不接受”；“我也很关心文生，但一个人没



有力量使它往正当的路走”，并表示“对付不了”吴朗西，认为“他没有权利一直把书店抓在一个人手里，这是我们大家的心血”。

二月十六日 在上海《解放日报·解放副刊》发表散文《愤怒的哭声》。说从台湾飞来十二架飞机，给欢乐的城市带来了死亡。联想到一九三九年日本飞机在桂林的狂炸，表示“愤怒”，并发出“控诉”。又致信田一文，谈到“上海被匪机狂炸……停电一周”，又云文生社因内部纠纷，导致“出书甚少，已在大吃存货”；“我还是校稿译书”，“已不管文生社四个多月了”。

二月

赴京参加全国文联第四次扩大常委会。参加议定提补老舍、艾芜、沙汀等五人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及作品评奖等事宜。休会的日子，看望沈从文。发现沈从文已经“平静”和“安定”下来。

作《回忆托尔斯泰 译后记》。云“从这回忆里，可了解托尔斯泰夫妇间的悲剧”。

三月三日 因患小肠气住院开刀。

三月中旬 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批准，与另外五十七人一起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三月二十二日 出院 在家休

养。不久李济生来 搭了一张帆布床同住二楼。约月底始能下床走动。

三月 因病，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躺在床上看书。病中获悉“文生社”经理康嗣群已被吴朗西排挤走 吴组成社务委员会 自任主任委员。虽然担心“文生社”前途 但终不愿与吴等朗西周旋。

四月十一日 致信沙汀。告之“文生社”因“内部人事纠纷闹了半年还没有解决 我的兄弟采臣也离开文生了”，最近吴朗西把书店抓到手里，却也拿不出一个办法，情形更差”。最后说：“您的小说中土话较多，外省人常说不懂，因此在北方销路较少”，“但我们四川人或西南人读起来却觉得生动、真实、亲切”。

四月十五至二十三日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参加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四月二十四日 正式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职务。

四月二十六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李芾甘。告之病了六周，动了手术，现已复原。并希望寄“一张相片”，“我想永久保存”。

四月三十日 晚七时，去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出席上海市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成

立大会，被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理事。下午二时，去文艺处出席文协上海分会临时会员大会，选举参加上海文代会代表，并听取华东军政委员会灾区慰问视察团团员魏金枝报告皖北、山东及苏北灾情，听取何公超报告南通区情况。被选为上海文代会代表。

四月 致田一文信两封，署名芾甘。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事感到“可惜”；身体仍未复原，两个月没有做事了。谈到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看法，云：“问题在朗西一人”，“老毕 即毕修勺、朱洗、吴金堤四个人”“保留着若干封建观点，而且不敢睁大眼睛看外面世界，又不肯努力学习”，“我很为文生的前途担心 我曾犯过一些错误，我没有把他们团结好”。又云“他们用社的名义”把有些责任“推到陆蠡身上”，“这样做只会损害文生社的信用。想到我们过去的心血，真有点难过”。告之病未愈，觉得吃力，精神也很差；云“因受不了吴朗西夫妇的纠缠和吵闹，文生社事我无法管，也不管了。现在除了慢慢看校样外，我与文生社可说没有关系”，“这半年来文生虽然受了很大损失，但我个人却清静多了”。

五月二十九日 晚，与潘汉年、夏衍、金仲华、于伶、冯雪峰、白杨、舒绣文、胡风、章靳

以、叶以群等人，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为欢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传团团长萧三及艾青、赵仲池、黄振声等举行的宴会。之后，观看影片《保卫世界和平》。

五月

从冯雪峰处获悉，中国出版总署署长、老友胡愈之“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

按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

作《巴金选集 自序》，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开明书店版《巴金选集》。回忆一九二七年在巴黎的写作生活，自谦“作品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但是“有光明的追求与呼号”。

译完《回忆布罗克》，苏高尔基作，回忆录，并作《回忆布罗克 译后记》。载七月平明书店版《回忆布罗克》。称颂高尔基回忆文章的艺术性和文化史料价值。

六月六日 致信田一文，告之“文生社”近况：薪水发不出，书排好印不出，存稿在百万字以上，“朗西天天在说没有稿子，此外一事不做。真可惜”；并告之萧珊下个月也要生第二个

孩子。女儿小林“一个人太孤单，能添个妹妹也好，但以后则不能再生了，我们的生活也不怎么宽裕”。

六月七日 赴京参加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六月十日 应邀出席毛泽东为即将召开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邀人士举行的宴会。同时被邀请的还有郭沫若、叶圣陶、冰心、老舍等。

六月十六日 致信沙汀。告之催“文生社”再版《还乡记》和《淘金记》的经过；并云：“你那两本长篇实在写得不错，尤其是《还乡记》，我认为是近年来少有的杰作。要是找缺点，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在叙述描写的句子里也有些太僻的土话。”

六月十九日 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参与讨论和通过了“国徽图案”等。

约六月 与开明书店编辑、老友徐调孚晤面，应约译小说，并答应代为组稿。事后与翻译家汝龙商量，共同为开明编译了六本高尔基的短篇集，《草原集》是其中一本。

七月中旬 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等。虽患肠胃病 除开会外 尚忙于翻译。

七月十六日 出席上海文联筹委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出席上海市文代会正式代

表。

七月二十二日 致信田一文。对田来信中提到“文生社”及吴朗西事作了答复。云：已让步并跟他合作，负责看稿校稿，出版与收稿则由吴朗西决定“现在排好打好纸型的稿子有几部 他不肯印 我也无发言权”表示不愿“再跟他吵架”。但“文生社”“越弄越坏”，同事们无事可做。自责过去“没有把你和采臣、陈晖三个人团结好”。

七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 参加上海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海市文联成立，夏衍为主席，巴金与冯雪峰等被选为副主席。二十四日在《文汇报》发表散文《“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云“‘会’是……一个甜蜜的家”，“加强了友爱的空气”。

七月二十八日 儿子李小棠生于上海。

八月八日 作《回忆屠格涅夫 后记》，载平明出版社版《回忆屠格涅夫》。云：“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

八月十三日 致信田一文。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前途担心。责吴朗西“整天关在里面睡觉”，“霸占了文生”，摆“老板的架子”。

八月二十五日 鉴于文化生活出版社内部人事纠纷复杂，为腾出时间写作，毅然辞去总编辑



职务。

八月 出版译作《回忆屠格涅夫》，俄巴甫罗夫斯基作，回忆录。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

九月十五日 作《草原集 译后记》，载十一月开明书店版《草原集》。

九月中旬 阅完《草原集》校样，送往开明书店福州路的留守处 遇到在那儿主持工作的周予同教授。

九月十八日 致信阿格里斯·英格里斯，署名李芾甘。云工作繁忙，会议多。并寄去“我与我妻子的照片”。又附言云，将有机会看到“土地改革的实施”，“对穷苦的农民进行土地的再分配”，表示“这将彻底摧毁中国的封建主义”，赞“这是一件伟大的事”。

十月一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为一年来的伟大胜利而欢呼》。云旧中国“撕裂人心的痛史”“都过去了”。

十月八日 作《红花 译后》，署中译者。载十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红花》，简介“旧俄”青年作家迦尔洵的生平。

十月十六至二十四日 作为上海文学界代表，出席上海二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十月十九日 晨七时四十分，与饶漱石、舒同、魏文伯、黄源、周而复、许广平等一起至鲁迅墓献花圈。九时至文联礼堂出席纪念茶会，听取陈毅讲话后，又至鲁迅墓前献花致敬，并参观鲁迅在上海的大陆新村故居。

十月二十五日 与袁雪芬、黄宗英、任德耀、刘良模、马寅初、盛丕华、金仲华等前往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下午，乘火车赴京。

十月二十七日 晨八时一刻，至北京站，筹委会成员及田汉到车站迎接，至东方饭店下榻。晚上，听取代表团团长郭沫若报告筹备经过。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参加首都各界为欢送即将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举行的盛大集会。

十月三十日 在沈阳寄家书一封。访在邮电部国际关系处工作的四舅陈林夫妇，吃了饺子，并由四舅送回旅馆。晚八点三刻致信萧珊，告之要动身了，“以后越去越远。我们在梦里见面



《回忆屠格涅夫》
书影。



巴金摄于哈尔滨火车站。

吧。路上也许没有写信的机会了”。嘱萧珊将儿子小棠的照片寄赠四舅母等。晚十时，随代表团启程前往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北京各界在车站举行盛大欢送会，彭真致欢送词，郭沫若致答词。

十月下旬 深夜，前往中南海，参加周恩来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大会，聆听总理关于抗美援朝的讲话。“那一夜我坐在后面，总理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我，还拿着名单问我来了没有，见到我又问起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心里“感到十分暖和，好像看见了几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凌晨回到旅馆，马上动手写《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

十月 继母邓景蘊携巴金同

父异母妹李瑞珏来沪同往霞飞坊，协助萧珊料理家务。

十一月一日 在至满洲里的列车上致信萧珊。告之旅途见闻和“想念你们，想念一切朋友。问候母亲和瑞珏。想小林”。

十一月二日 从沈阳乘铁道部安排的专列到哈尔滨和满洲里，一路上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想起了高尔基小说中描绘的情景。车抵站后，在车站留影。获悉明日出境，车上只供应清茶，于是，找出萧珊在家中准备好的沱茶，在清醇的茶香中，感到温馨，也增添了对萧珊和孩子们的思念。

十一月三至八日 在西伯利亚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改写《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载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上海《大公

报》，声称“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愿意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呼吁“爱和平爱人类的”“有良心的作家”，“撇开思想、宗教、语言、肤色的差异”“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十一月九日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即上海时间晚上十点）抵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西蒙诺夫等前来迎接。随代表团下榻莫斯科饭店，等行李时，致信萧珊。告之莫斯科印象：街道都很宽，旅馆旁便是歌剧院、小剧院，正在演契诃夫的《结婚》等。当晚参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的鸡尾酒会，场面相当大，跟在电影里看到的差不多。晚上



十一点半回来，续完致萧珊信。

十一月十日 参观列宁博物馆，瞻仰列宁陵墓并献花圈和敬书挽词“献给人类的伟大导师列宁”。次日随代表团乘火车离莫斯科赴捷克，再赴波兰华沙。代表团受到波兰人民的热情欢迎。出席在华沙“波兰语出版社大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幕式。七十余国代表团出席大会。

十一月十七日 参加大会。上午听取大会主持人约里奥·居里和波兰代表费尔德、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嘉格罗、法国代表戈登夫人、巴西代表卡西尼等人的发言。下午，听取意大利代表南尼、苏联代表捷耶夫等人的发言。

十一月十八日 上午，参加大会，讨论约里奥·居里的报告；下午，听取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发言。晚上，出席华沙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阿尔布列齐特举行的招待会。

十一月十八日 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华东总分会筹委。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在华沙国会旅馆前散步，应小学生要求签名留念。

十一月二十二日 参加“和大”会议。投票赞成“和大”政治委员会主席南尼代表该委员会

向大会宣读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和致联合国组织的呼吁书，投票通过智利代表聂鲁达所提关于声援受迫害的和平战士的提案。下午，参加赠予和平奖金典礼。夜，登上华沙胜利广场临时检阅台，与华沙人民共同庆祝二届“和大”胜利闭幕。

十一月二十三日 参观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四五百万犹太人集体被毁灭的惨剧遗迹，又从奥斯威辛坐火车抵波兰古城克拉科。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晨，和代表团一位气象学家到圣玛丽亚教堂附近散步，游览了广场，观赏克拉科第二十二次交响乐演奏会。休息时受到听众热情包围，签名留念。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至克拉科市场散步，上午，参观 Nova Huta 的钢铁厂和工人宿舍 返回时参观了几百年前建筑的波兰王宫。午夜一点返旅馆，搭原车回华沙。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晚，抵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受到苏联作家苏合作等人的欢迎。

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八日 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由苏合作等五人陪同先后乘车访问游览了莫斯科红场、列宁格勒冬宫、列宁墓、蒲加乔夫受刑台、彼得大帝铜像、列宁故居、

高尔基艺术剧院、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等，还观看了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普希金的舞剧《青铜骑士》等，并欣赏了苏联演员米海罗夫等的独唱和乌兰诺娃等的舞蹈。

十一月 作杂感《我愿献出我的一切——在和大的准备发言》，载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译作《红花》，俄迦尔洵作，短篇小说，载十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红花》。写青年狂人“用尽力气作了超人的努力去拿一朵罂粟花，他以为这朵花是用人类牺牲的赤血染红了的。他想，要是这朵花被毁掉了，人类也就会得救了”。作品揭示了沙皇统治下人民的痛苦和反抗。发表译作《信号》，俄迦尔洵作，短篇小说，载十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红花》。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草原集》，苏高尔基作，短篇小说集。

十二月十七至十八日 夜，与丁玲及从莫斯科起一直送行的苏合作等五位苏联作家彻夜长谈。晨三时，国际列车停苏联阿特波尔站。与苏合作等人告辞。

十二月十九日 作散文《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载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九时，随代表团抵沈阳。前往车站欢迎代表团的有各界代表三千余人。

接受献花后，随即参加盛大的欢迎会。十时三十分，登车离沈返京。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抵北京，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李立三等前往前门车站欢迎，由陈叔通致欢迎词，郭沫若致答词。

得萧珊信，获悉萧珊“很寂寞”，“非常非常的想你”以及儿子“肚子不好，依然胖”，小林会写很多字，常常得到五角星的奖励，会说“抗美援朝，不买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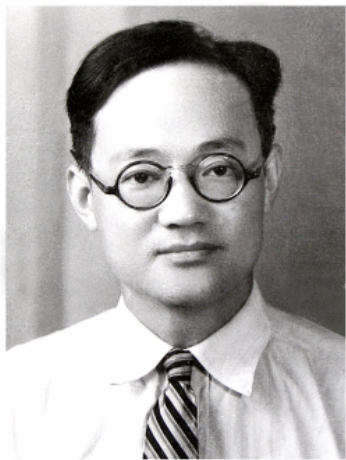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席北京各界庆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胜利和欢迎“和大”代表团回国大会。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等出席。

十二月三十日 晨八时，与上海出席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马寅初、盛丕华、陆瑾、金仲华、黄宗英等一同到达上海车站，受到华东暨上海领导及各界代表曾山、舒同、潘汉年、刘长胜、夏衍、吴有训、周而复等二千余人的欢迎。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一点印象》，云在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受到了欢迎，因为我们是主持和平与正义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伟大的收获》。

十二月 返上海后，接受《文汇报》记者静远访问，谈出席“和大”感想。

约十二月 观看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演《武训传》。认为赵丹的“演技到了家”，对“老泪纵横受尽侮辱”、仍然“讨饭办学”的武训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作文控诉法西斯纳粹在奥斯威辛屠杀四百万和平人民的罪行。

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除了熬夜什么事都无法做”。

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座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翻译迦尔洵的短篇小说。

四十八岁

一九五一年一个假日，巴金、萧珊携儿子李小棠、女儿李小林摄于上海复兴公园。



一月三日 下午出席华东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两千人在市政府大礼堂为从北京返沪的我国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部分代表而举行的欢迎大会，与马寅初等分别传达了第二届“和大”精神、决议及会议进行情况。

一月二十三日 在《劳动报》发表杂感《谈第二届和平大会》。

一月二十七日 作散文《给苏合作先生》，载《苏联知识》第一卷第十二期，易题为《给苏合作同志》。回忆在苏联三周访问的见闻及苏合作等作家对中国代表团的深厚友情。

一月二十八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古城克拉科》。

一月三十日 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散文《灰阑记》，云在波兰克拉科看了一出中国戏《灰阑记》，该剧已连演七十场，还要演下去，它体现了中波人民的友谊。

二月一日 在《文艺新地》上发表散文《华沙城的节日》。

二月四日 作《两封慰问信：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致朝鲜人民军》，载《群众文艺》第五卷第四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敬仰之情。

二月十一日 作《华沙城的节日 后记》，载三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题为《序 华

沙城的节日》。

二月十二日 作《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 前记》，载三月平明出版社版《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云这个册子里的二十二张图片，是德国纳粹匪徒的证据。“纳粹匪徒曾在奥斯威辛屠杀了四五百万和平的人民，并且拿他们的头发织成床毯”、“身体火化成灰”、“脂肪制造肥皂”，指出：“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告。在法西斯不曾完全消灭之前，这种罪行还是会发生。”

二月十四日 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散文《欢乐的节日》，署名“和大”代表巴金。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下午二时，在上海文联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殉难二十周年而举行的筹备会上，被选为负责纪念会的“筹委”，“筹委”还有潘汉年、夏衍、冯雪峰等四十二人。

二月二十三日 作散文《他们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心里》，载五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悼念“左联”五烈士。云：他们死得“壮烈”，将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心里。

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在兰心大剧院参加上海文艺界举行的“左联”五烈士殉难二十周年纪念会，并被选入由四十一人组成的主席团。

二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 作为文艺界代表出席上海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大会，并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二月 在《小说月报》发表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叙述在华沙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时触目惊心的见闻，愤怒控诉了法西斯纳粹惨无人道地杀害革命志士和妇女儿童的滔天罪行。又编完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编译完图文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编完诗画集《西班牙的苦难》与《西班牙的血》之合集《西班牙的血》，三月均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作散文《关于奥斯威辛和布惹秦加》，载三月平明出版社版《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揭露和控诉法西斯屠杀人民的暴行。

三月 参加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CEL 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并读波兰瓦里学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看到一段关于迦尔洵的文字，想起译作《红花》出版后，朋友建议应为该书写一点文字说明的事，决定译出迦尔洵的《红花》及苏联、英国作家评介《红花》的有关章节。又译完《一件意外事》与《军官和勤务兵》，俄迦尔洵作，短篇小说，并作《一件意外事 后记》，载六月上海出版公司版《一件意外事》。小说叙述“贫



穷而清白”的伊凡·伊凡诺维奇，爱上了出身在有教养的家庭、后来堕入风尘的妓女娜兹塔·尼可拉也夫娜，终因无力使女方脱离苦海而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

四月四日 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举行的全体委员会议，听取夏衍关于目前形势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及吴耀宗关于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报告。

四月十一日 下午，作为文学界代表参加上海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该会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议题。下午二时出席会议，听取潘汉年副市长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报告、盛丕华副市长关于一九五〇年市财政决算及一九五一年市预算的报告、上海市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杨帆局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

四月十三至十七日 参加市代表会议的分组讨论会并听取代表发言。

四月十八日 参加大会，参与通过会议决议，讨论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结果，改选市协商委员会。

四月二十三日 下午二时，出席上海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巴金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逸园出席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会上公审反革命分子九名。听取潘汉年、杨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

五月二十日 晚七时，出席华东暨上海各界人民为欢迎英国人民访问团而举行的集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五月二十四日 抵京参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下榻永安饭店。致信萧珊。

五月 在《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随笔《一点感想》。

六月十六日 下午，到逸园参加华东暨上海各界人民为欢迎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而举行的盛大集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六月二十一日 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华东总分会筹备委员会在沪委员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代表及华东各省、市抗美援朝代表联席会议，被选为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委员。

六月二十八日 作《慰问信及其他 后记》，载七月平明出版社版《慰问信及其他》。说把这本小书“献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感谢那些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只为了使同胞们活得更好的战士”。

七月一日 晚七时，出席华东暨上海各界人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为主席团成员。

七月六日 致信杨静如。云“事太多，收到的信也多”，“除了熬夜什么事都无法做”。

七月八至十四日 参加华东与上海各界一万余人为欢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在逸园举行的盛大集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七月十日 下午，出席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暨主要工作人员首次会议。

七月十二日 下午，出席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七月十三日 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分组讨论 文协小组决定发动会员加强创作，以稿费、版税捐献，务必达到一亿元目标。

七月十四日 下午，出席上海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闭幕会。

七月二十五日 任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与靳以、方令孺等同行，访问沂蒙山区，后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始与方令孺熟悉起来，“我们一起活动不到两个月，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这以后我也习惯像靳以那样用‘九姑’称呼她了。”

七月 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慰问信及其他》。

八月初 随北方老根据地华东访问团沂蒙山区分团到山东潍坊市，遇雨住潍坊。到市区参观古迹并作记录。

八月五日 由潍坊出发到沂水，途中在安邱境内的马耳山前遇大雷雨。汽车重载，恐陷淤泥，巴金带头首先下车，其余相随而下。中午到莒县，县长亲到车站迎接。住莒县小学。

八月上旬 在莒县访问数日后，徒步到沂水专署，参加数次烈士家属和荣誉军人家属座谈会。

八月底 随访问团返扬州。出席扬州市人民政府为访问团举行的晚会，观扬州实验剧团演出的《红娘》，赞饰红娘的演员“性格刻划得好，演得认真”。游瘦西湖和平山堂，被一批游玩的中学生包围，一再要求讲话，仍婉言谢绝。

九月九日 作《 丹东之死 译后记》，载十月开明书店版《丹东之死》。

九月二十五日 上午，至火车站欢迎来访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苏联著名作家、著

名新闻工作者爱伦堡及其夫人，智利作家、诗人聂鲁达及其夫人。下午，与金仲华、夏衍、恽逸群即以群、王芸生、陈虞孙等联袂访问爱伦堡与聂鲁达。晚，出席上海各团体招待爱伦堡与聂鲁达的宴会。

九月三十一日 下午，应邀参加陈毅等上海党政领导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酒会。

十月 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参加学习，座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等问题。又获悉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国家文物局已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修缮完毕。

十一月十九至二十四日 列席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华东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总会理事。出席华东文学艺术联合会筹备会议，当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十一月二十七日 出席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第五次会议。

十一月 译完《癞虾蟆和玫瑰花》、《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与《并没有的事》，俄迦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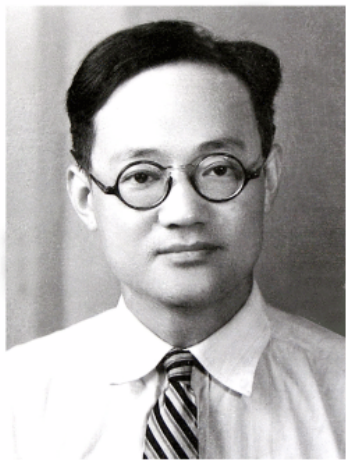
洵短篇小说，载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一月版《癞虾蟆和玫瑰花》。并为改题作《 癞虾蟆和玫瑰花 译后记》。摘译盖尔奈的短文介绍迦尔洵生平和西蒙斯的《托尔斯泰传》中关于年轻的半疯状态的迦尔洵拜见托尔斯泰的情景，又云“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四个短篇却是迦尔洵的另一类的作品”，“迦尔洵是屠格涅夫的朋友”，屠格涅夫曾劝托尔斯泰读迦尔洵的小说。

十二月八日 出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在沪委员及华东各地文化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座谈会，被选为华东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十至十五日 出席上海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十二月二十一日 晚，出席上海中苏友好协会两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一次代表会议开幕式，为主席团成员。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下午，参加闭幕大会，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任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团长，赴朝鲜战地七个月，并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见面。

作文赞颂志愿军“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崇高精神。

四十九岁

一月约中旬 读何其芳九日来信，获悉对方希望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意何修改并重印诗集《预言》。

一月 出版译作《癞虾蟆与玫瑰花》，俄迦尔洵作，短篇小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同时译《木木》，俄屠格涅夫作，中篇小说，平明出版社五月初版，并为该书作《木木 译后记》。云所译《木木》是屠氏在监牢中的“一个月里面写成”的，以自己的母亲和看门人哑子为模特儿，“是一篇真实的故事”，引高尔斯华绥的话说：“在艺术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又引赫尔岑的话说，读后“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

二月 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任团长。该团有文学、音乐美术工作者葛洛、艾芜、古元等十八人。

二月十二日 天才刚刚亮，抵北京车站。由文联的同志来接站，后来曹禺也来了。获悉丁玲主张曹禺去工厂，曹禺也动员巴金去工厂，但是，巴金还是想去朝鲜。住北官房二十号文学研究所宿舍，九点以后见到丁玲，获悉当天没有安排，遂访汝及人，途中投寄家书。与汝及人外出就餐，为李小林购玩具，托汝及人带去。后又访病中的顾均

正，获悉开明书店很穷，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版税要实行新办法等。

二月十三日 买法文版《契诃夫戏剧集》、玩具等，托汝及人带到上海赠陈西禾及萧珊和孩子们。晚上，与曹禺到东来顺吃涮羊肉。

二月十六日 晚，应曹禺约请看京剧。

二月十七日 在宿舍会见四舅，并去他家。在汝及人家呆了一天，谈平明出版社的事等。

二月十八日 上午、下午都

有会。中午，曹禺夫妇来宿舍休息。看萧珊十五日信，获悉家中近况以及她盼信的心情：“我真的很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巴金理解萧珊的心情，立即回信告之近况。

二月十九日 与丁玲共进午餐，丁玲赞成巴金去朝鲜。听了她谈的一些意见，心安定多了。

二月 致萧珊信十二封。告之抵京情况，表示对萧珊、孩子们和家人的想念；希望萧珊监

督、鼓励、提醒女儿学好钢琴，鼓励萧珊努力念俄文；表示去朝鲜锻炼一下，对自我改造也有帮助，也是对自己的温情主义作斗争，也流露出只有热情和决心，对前面的工作全无把握、无经验、无工作能力和方法的担忧等。

三月一日 防止在朝鲜遇到细菌战，打了鼠疫和伤寒、霍乱、痢疾防疫针。看望曹葆华、顾均正、茅盾等。晚上发烧。

三月七日 启程离北京。同行有葛洛、古元、白朗、王希



一九五二年
三月巴金在朝鲜
战地。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坚、逯斐、艾芜夫妇等人，中途在沈阳小住。

三月十日 文化部请吃饭，因为是团长，得敬酒喝酒，竟然喝了十几小杯黄酒和一杯白酒。

三月十五日 抵辽宁安东，与副参谋长罗文、作家宋之的下榻高干招待所。夜七点多遇空袭警报。

三月十六日 下午二时十二分过鸭绿江，沿途目睹美军暴行，公路旁边的民宅几乎片瓦不存，敌机在天空盘旋。坐车十四小时，宿朝鲜香枫山麓，被冷醒。

三月十七日 晚饭后，坚持在室外念一小时俄文。

三月二十日 到达朝鲜前线。下午，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派人将创作组十八人的行李全搬至半山坑道内。晚，参加志愿军政治部的欢迎晚会；十一时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吉普车返回。在黑暗中上山，几乎摔倒，幸亏被通讯员拉住，扶上山，安全回到宿舍。第二天，自己洗手帕，坐在石头上念俄文。

三月二十一日 晚上，被细菌战调查团找去看材料，准备写抗议细菌战宣言。

三月二十二日 正午前，坐卡车至山下大洞，在“三反”办公室等一刻钟；十一时三刻，彭德怀来。彭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

兰，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巴金等答：“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彭德怀说：“不，还是跨过的。”接着，彭德怀作了三小时讲话，宋时轮副司令员和甘泗淇主任也讲了话。会后，与彭德怀等共进午餐；下午五时半，在洞中共看影片《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离会场时又见彭德怀，握手告别。夜九时五十分左右回山洞休息。

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创作组全体开会讨论彭德怀讲话。应全体同志要求，同意执笔撰写会见记。

三月二十四日 致信李小林，署名金。告之想念女儿和家人等。

三月二十五日 晚八时，开始动手写《彭德怀会见记》，十一时写完初稿。又译《在保卫和平斗争中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艺术家》，巴西乔治·亚马多作，随笔，载《文艺报》第六期。

三月二十六日 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彭德怀一个半小时讲话。晚上回山洞宿舍。又据再听彭总讲话的印象重写《彭德怀会见记》，十一点写完，定题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三月二十七日 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交创作组其他同志传看。经提意见后，增添

了几句，如“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很渺小”等。然后将改定的文章交北京新华社，载四月九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往国内发电讯稿时，删去了彭德怀戒烟的小故事等一些内容和句子。赞彭为“伟大的和平战士”，在他面前，“我们”“显得很渺小”，他“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憎恨”侵略者，“热爱”人民。又说自己受到了教育，愿“交出个人的一切”。

三月二十八日 接彭德怀短信。获悉彭德怀对《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提出了修改意见。信云：“‘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巴金阅后，更增添了对彭德怀的敬重。此信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被上海作协的造反派抄走，下落不明。一九七九年上海市文化局一工作人员在乱纸堆中找到，同年十月送归巴金。后来，巴金将此信送交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三月三十一日 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赴朝创作组从朝鲜前线抵平壤，下榻国际饭店，受到朝鲜政府、各界人民和中国驻朝大使馆的热烈欢迎，见到金日成将军。

三月 致萧珊信十一封。告之出国前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表示在工作中想到萧珊和孩子们就会增加勇气，“咬紧牙关”，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在这次结婚以来最长的离别中，“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等。

四月一日 作散文《我们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揭露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杀害朝鲜无辜人民的罪行。

四月一至四日 在平壤参观地下商场、地下食堂、中央博物馆等处；到牡丹峰地下剧场观赏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访问人民军某军团部，听了军团长和战斗英雄们的报告；出席朝鲜文化宣传省组织的文艺座谈会，感触很深：“朝鲜的文艺工作者不仅用笔，而且用血写成了伟大的诗篇。面对着这种英雄气概，我感到一种严肃的心情。”前往开城前线采访。

四月四日 与访问团其他成员一起拜见金日成。金日成用流利的汉语与中国作家谈了一小时。

四月五日 参加欢送会，喝了几杯苏联香槟，醉了。吐后才觉得舒服，遂与廖承志交谈。

四月十二日 作散文《平壤》，载《人民文学》六月号，后易题为《平壤，英雄的城市》。云：“看到了朝鲜男男女

女保家卫国的行动，深知朝鲜人民一定会胜利。”

四月十四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六十五军座谈会，“听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晚，与边章五将军畅谈。

四月十五日 收到入朝后的第一封家书，获悉爱女小林为爸爸称她“李小林同志”而自豪的情景，高兴极了。

四月十九日 作通讯《在开城中立区》，载五月六日《人民日报》。说“和平是靠人民的力量争取来的”。

四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在朝鲜的社会、写作情况，表示对萧珊、孩子们和母亲的思念。

五月四日 在朝鲜开城前线，作通讯《朝鲜战地的春夜》，载《人民文学》八月号。赞春夜唱歌的志愿军战士，有“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崇高精神，“他们的共同名字：最可爱的人”。

五月十八日 离开志愿军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等送行。

五月二十日 托回国的同志带照片和信回家。

五月 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译作《木木》，俄屠格涅夫作。又致萧珊信三封，告之收到家书的欣喜心情，把李小林给志愿军的信转交给文工团；已经习惯了部队的生活等。

六月六日 作通讯《一个模

范的通讯连》，载《新观察》第十三期，题为《在志愿军的连队里——朝鲜通讯》。赞通讯连“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六月二十五日 参加一八七师庆功会和朝鲜政府授勋典礼。与贺副司令员一起喝啤酒、绍兴酒、白兰地等。

六月 与刘白羽、黄谷柳等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在前线等地举行的历时九天的文艺节目汇演大会。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佛国山英雄第九连阵地俱乐部参观战士们办的墙报、自制的乐器，同行的有作家黄谷柳、音乐家王莘。

七月五日 接萧珊信，获悉女儿小林把自己的照片珍藏在盒子里，高兴地笑了。

七月十六日 作通讯报告《起雷英雄的故事》，初收一九五三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七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黄谷柳的日记本上题词：“我等着读您的歌颂平壤的诗篇。”

七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近况：已领到抗美援朝纪念章；和作家魏巍同在前沿阵地采访，住在防空洞里写稿；嘱萧珊代为保存已发文章的简报，购藏七月一日发行的敦煌纪念邮票等。

八月七至八日 作通讯报告《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载《人民文学》十月号。记述“独



巴金在朝鲜战地坑道内写作。左为黄谷柳。

“独胆英雄”陈三、“特功八连”英雄连长郭恩志、指导员苏文禄、班长苏文俊、“打坦克英雄”王永章、“起雷英雄”姚显儒、“坚强战士”张渭良等十位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

八月十六日 军政治部请归国人员吃饭。餐毕回去后，点洋蜡烛念俄文、念朝文，至蜡烛燃尽方就寝。

八月二十五日 在朝鲜前线坑道内。傍晚，天雨。水流入洞内，洞口的土不断往下塌，在志愿军连队干部战士的照料下休息。“我醒在床上想阵地的生活，听见土落下的声音，……更想到住在旁边几个洞子里的战士们。”

八月二十六日 晨三时前醒，洞里已灌满水，无法下地，又入睡。五时半，被副连长叫醒，要马上搬到村子里老百姓家去。后常与他一起去看望生病的同志。副连长照料病人的饮食，说服发脾气的病员，深夜带病视察工事掉在水塘里……这一切，巴金多年不忘。

八月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最近三十天，天天受敌机威胁，在洞子里写文章、相当累等。

九月六日 在朝鲜开城，作通讯报告《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载《人民文学》十一月号。记述在敌机轰炸后埋在洞子里长达四十四个小时的志愿军战士赵杰仁的英雄事迹。

九月八日 致信萧珊。告之

在军政部开庆功会，九月底赶回北京，与萧珊约定在北京见面。

九月十五日 作散文《保卫和平，保护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初收《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约九月 到朝鲜前线，在某师政委李真安排下，冒着炮火硝烟下连队一周，了解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并作写作辅导讲座。一周后在轰炸声中离开前线，李真希望更多地写出朝鲜战场的英雄。巴金回答：“我们真该多写，我们共同来写吧！你们用子弹，用刺刀，用大炮‘写’，我用笔写，加速这个最凶恶野兽的灭亡！”又出席志愿军功臣代表大会，听取志愿军功臣们所作的报告。

十月一日 在开城，在一座大楼的废墟上和志愿军一百多位政治工作干部一起欢度国庆节。

十月十至十一日 作散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载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北京日报》。这是巴金第一次赴朝留在朝鲜的最后一天。说“思想自由地奔跑着”，想到了很多志愿军战斗英雄和他们的英雄事迹。

十月十二日 离朝返国。抵京后住在好友顾均正家，与携女来京的萧珊久别后欢聚。

十月中旬 刚从朝鲜归来，在京获悉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家》。

十月十二至二十四日 期间曾携女儿李小林与在北京学俄语的青少年时代好友卢剑波晤面，并欢宴于北京某川菜馆。

十月二十四日 晚七时半，出席华东暨上海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为主席团成员。

十月二十七日 晚，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华东总分会在沪理事暨上海分会理事为庆祝“十月革

命”三十五周年举行的扩大联席会议，为筹委会委员、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理事。

十月 在朝鲜，作《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后记》，载《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云在朝鲜住了七个月，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更理解了‘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愿献给他们“一颗燃烧着爱的心”，表示：“我爱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也爱朝鲜，爱朝鲜人民！”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午，到上海火车站欢迎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

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欢迎吉洪诺夫》。下午，出席上海文学艺术界与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并在会上致词。夏衍代表上海文艺工作者赠送吉洪诺夫一部精装《鲁迅日记》。晚，出席华东中苏友好协会，上海中苏友好协会为欢迎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团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而举行的盛大酒会。

十一月二十八日 作短篇小说《坚强战士》，载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文艺月报》创刊号。描写志愿军英雄张渭良身负重伤，坚持爬行十天九夜，终于胜利归队的故事。同日下午二时，至机场欢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赴南京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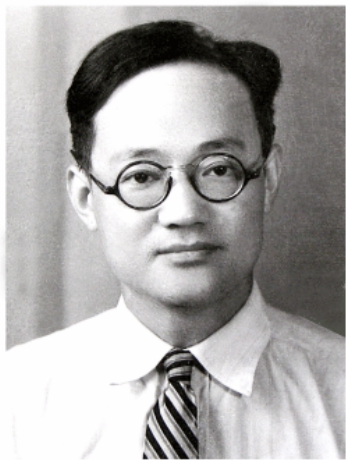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晚十时，出席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招待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联红旗歌舞团和以费道罗夫为首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而举行的盛大宴会。

十一月三十日 下午七时，至上海文化广场观看苏联红旗歌舞团、苏联电影艺术工作团的表演。

十一月 读何其芳二十二日来信。遵嘱删去《刻意集》“再版序中最后一段”。

十二月十九日 中午，至上海火车站欢迎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第四分团。

十二月 重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自己觉得这次的重译本比以前旧译本要好得多。



平明出版社分期出版巴金《家》等数百万字旧作，巴金愿为现在“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新中国”“献出我的渺小的心……”

吊唁斯大林逝世，作文赞斯大林是“巨人”。

第二次赴朝，作文歌颂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英雄精神。

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

五十岁

一月一日 参加华东话剧工作者新年联欢会。

一月二日 作短篇小说《一个侦察员的故事》，初收《英雄的故事》。叙述侦察员黄山抓“舌头”打敌人、保护朝鲜人民的英雄故事。

一月十五日 华东地区的大型刊物《文艺月报》创刊，被聘为该刊主编，但不负责具体工作。

一月十八日 上午，前往华东、上海文联，出席由黄源代表《文艺月报》编辑部主持的座谈会，向各界人士征求对该刊第一期的意见。又从罗洛和欧阳文彬发言中，获悉他们对《坚强战士》有意见，“觉得繁琐，英雄人物的形象和高贵品质，不能很好地突出”。

一月三十日 致信田一文，告之近况。

一月 任主编的《文艺月报》在上海创刊。在《文艺月报》一月号发表短篇小说《坚强战士》。

二月十三日 致信田一文。谈朱洗、毕修勺、黄裳等编刊物出小丛书等。认为文生社“是我们大家的心血”，批评吴朗西“没有权利一直把书店抓在一个人的手里”。

二月二十一日 致信杨静如。

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日 出席上海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陈毅市长的政治报告和潘汉年副市长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三年工作任务的报告。章靳以等二十七人发了言，陈毅市长致闭幕词。

二月 出版通讯报告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月四日 作《家》新版后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六月版《家》。说“在我所攻击的不合理制度已经消灭了的今天”，重读这本小说，“还是激动得厉害”，说明“书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认为作品缺点很多，“今天看起来缺点更多而且更明显”，希望读者“不能拿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衡量它”，认为“《家》已经尽了它底历史任务了”，新版时仍“保留着它底本来的面目”，只改动了“一些累赘的字句”。表示：“自己喜欢它，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三月六日 至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吊唁斯大林逝世。

三月八日 在《新民报·晚刊》发表散文《悲痛给广大人民

以更大的力量》。

三月九日 下午五时，参加华东和上海市各界人民沉痛悼念斯大林大会。

三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三月号发表散文《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赞斯大林是“巨人”，“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忠实的朋友，他帮助被压迫的民族争得自由”。

三月二十三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援救卢森堡夫妇》，初收《大欢乐的日子》。因美国联邦法院判处卢森堡夫妇死刑，遂指出：“一八八七年伊利诺斯州因为绞死五个劳工运动的领袖得到‘谋杀者’的称号，一九二七年马萨诸塞州因为杀害了两个意大利工人让全世界人民称为‘凶手’。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横暴地拒绝过全世界人民正义的要求和抗议的。”

三月二十四日 与茅盾、周扬、柯仲平、老舍等二十一人同被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为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三月 作散文《寄朝鲜某地——给志愿军某部政治部李希庚同志》，载《文艺月报》六月号。又作《前记》，载平明出版社五月版《新生》。三月、五月、六月平明出版社分期出版了

巴金旧作《还魂草》、《新生》、《灭亡》、《海的梦》、《雾·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第四病室》、《旅途随笔》、《长生塔》等均用此《前记》；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新文艺出版社重版《雾·雨·电》等旧作时亦用此《前记》。追忆一九二七年春在巴黎开始写作的环境、生活、感情后，云“曾经写过多少次，嚷过多少次，说我要抛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可是我始终没有办到”，“写了二十五年”，“写作生活是痛苦的”；自认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有忧郁性，……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现在“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感到自己的作品“多么地软弱，失色”，甚至“想把它们藏起来”；这次重版，表明自己“对工作并未失去信心”，因为自信“从没有睁开眼睛说谎话”，从前作品的思想都是一贯的，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旧制度、旧的传统观念和一切摧残人性、摧残爱的丑恶势力的攻击；表示愿为现在“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新中国”“献出我的渺小的心，我的无力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

五月二十八至三十日 参加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被选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巴金全家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合影。

入十三人组成的华东作协筹委会。

五月 出版重译本《父与子》，俄屠格涅夫作，长篇小说，平明出版社版。

六月一至十日 参加华东作协筹委会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习会。

六月二十二日 作特写《黄文元同志》，载《人民文学》第七、第八期合刊号。叙述志愿军战士黄文元宁让烈火烧身、至死不暴露目标的英雄事迹。

六月二十七日 作短篇小说《爱的故事》。叙述志愿军干部王敬和被敌机炸断双腿的朝鲜少年李光玉在日常交往中的情谊。又作《英雄的故事 后记》。

七月二十五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病了将近两个月”。

七月二十七日 下午八点五十四分抵京，下榻文协。准备第二次赴朝。

七月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萧珊母女在上海站送别时，小林的哭声让自己难过得流泪，以及抵京情况等。

八月初 因事先与胡风约好同行访朝，又获悉他要修改为《人民文学》撰写的报告文学《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不知胡是否能动身，遂前往地安门太平街甲二十号访胡风：“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

八月上旬 参加代表团，第二次赴朝。

八月十五日 在朝鲜沙里院市参加黄海道五万四千人的群众大会，纪念朝鲜解放八周年。十六日，夜失眠，半夜起来捉小虫，把眼镜架子弄坏了，折腾到凌晨二时方入睡。

八月二十日 参加会餐，见到不少熟人，喝得大醉。看京戏时，出去大吐四次，才慢慢清醒过来。

八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入朝散记》，载《文艺月报》十月、十一月号合刊。

八月

亲临前沿阵地体验生活，并与战士谈话。

作《衷心的祝贺——保卫和平的人们 代序》，载十一月一日《文艺报》十月、十一月号合刊。说“想念志愿军”“就像

想念自己家里人一样”，在坑道里、前沿阵地、山路上、交通沟、灌木林中、老乡家里与战士们谈心，一起生活，听他们说“真心话”，“自己的感情也逐渐在改变”，表示要写他们的“伟大的面貌”。

致萧珊信十封。告之“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请萧珊代购歌剧《奥涅金》唱片和请李济生代购《青年近卫军》、《金星英雄》等苏联战争题材的小说；叙述入朝后的生活以及思念萧珊和孩子们等。

九月二日 在朝鲜开城，作报告文学《忘不了的仇恨》，载《人民文学》第十一月号。

九月二十二日 早上，念俄文，看《人民日报》，抄总结，念朝文，看战士跳舞和影片《两个世界》。获悉今日是中秋节，想念家人。半夜，查哨的副指导员送来了棉大衣，十分感动。

九月 出版小说散文集《英雄的故事》，平明出版社版。

十月一日 在朝鲜西线前沿阵地上，与五百多名志愿军战士一起欢度国庆，并听取营教导员作的关于国内建设的报告。

十月六日 下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闭幕，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与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

十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时，到达朝鲜黄海道平泉郡杜峰山，凭吊为抢救朝鲜人民而光荣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吕玉火、张明禄二烈士墓。

十月二十九日 上午，由被吕玉火、张明禄二烈士抢救出来的朝鲜少女李贞淑陪同登上金刚山，了解抢救具体情况。后离金刚山去稼洞里村子，了解由被抢救的八名朝鲜妇女组织的“吕玉火、张明禄生产突击队”的生产情况。

十月三十日 致信杨静如。

十月 在朝鲜大德山，作报告文学《魏连长和他的英雄连队》，载《文艺月报》十二月号，后易题为《魏连长和他的连队》。追记志愿军连长魏国钧和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为“认识了这么多的英雄人物”而骄傲。又致萧珊信三封。告之“我的生活过得有意义，但常常想念你们”，嘱购好词典、《静静的顿河》和全套歌剧《奥涅金》的唱片；告之“在太阳下看到蛇伸起头在路上跑”的奇特景象；告之志愿军、读者对《黄文元》的不同反应等。

十一月三日 作报告文学《志愿军战士吕玉火和张明禄的故事》，载《新观察》第二十四

期，后易题为《金刚山上发生的事情》。记述了志愿军战士吕玉火、张明禄，奋不顾身从烈火中救出八名朝鲜妇女的英雄事迹，以及朝鲜人民为纪念两位烈士而组织的“吕玉火、张明禄生产突击队”以优良生产成绩来纪念烈士的感人事迹。

十一月六至八日 华东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虽因在朝鲜未出席会议，仍被选为华东作协理事。

十一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十月、十一月号合刊上发表报告文学《一个军械上士的遭遇》。

十二月 致萧珊信四封。评价萧珊的译笔“清新气息。但易犯生硬晦涩的毛病”，建议多读点白居易的诗、赵树理的文章、李季的诗；告之目前想多了解生活，不急着写小说，回上海后要仔细地读战争小说；寄给萧珊一片朝鲜的紅葉等。

十二月九日 在朝鲜某地作《一个连队的生活》，载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解放军文艺》二月号。

十二月十五日 致信萧珊。告之回家后为萧珊补过生日，还要抽出时间作创作准备等。

十二月十七日 被吸收进华东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分在小说散文组。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与华东作



巴金

的 一 个 世 纪

协创作委员会其他十五名委员一起，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

十二月下旬 离朝回国。

一九五三年内 接好友顾均正信，获悉开明书店已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遂回信，要回旧作纸型。“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获悉旧作《家》已被香港“中联”电影正业有限公司拍成粤语片。这是巴金著作第一次在港摄制成电影。由吴回编导，吴楚帆、梅绮主演。该片“是粤语片的杰作之一，是‘中联’影片公司的创业作，是它奠定了‘中联’的根基，同时兴起了把巴金的著作改编成电影的潮流”，“该片票房收入高达二十八万港币”。



飞抵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应邀参加陈毅市长外交活动举行的宴会。

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热情歌颂”新时代，也要“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等。

一月上旬，领取一月五签发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卫国部通行证》。

五十一岁

一月十一日 抵达北京。

一月十三日 上海举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职工总会文艺分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副主任。

一月十四日 在北京，参加文联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文联一九五四年工作计划。

一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报告文学《范国金与何全德》第一、第二部分。

一月二十五日 上海市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文学界支会宣告成立，被选为主任，并带头认购公债。

约一月 接顾均正来信催稿，遂把《长生塔》稿子寄去。不久被退回，又接顾信，说难懂，连他的小儿子也说不懂。“我自己重读了一遍，却觉得童话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品那样难懂。我猜想这是他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推荐我的童话，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碰了钉子，就把责任放在自己肩上。”于是致信“感谢他”，“觉得不印也好”。又致萧珊信三封。告之回国后决定要写一部像样的七八万字的中篇小说，以后还要写长篇小

一九五四年



说，返沪时希望萧珊带孩子来接站等。

二月二十四日 参加华东作家协会举行的座谈会，欢迎苏联作家、《旗》杂志主编瓦·科热夫尼科夫同志。获悉苏联党自一九〇五年以来，与资产阶级文艺作斗争的经过。

二月 获悉特写《黄文元同志》被译为英文，载二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

三月五日 下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四月九日 致信田一文，署名蒂甘。自责在“文生社”的问题上，“没有把他们团结好”，想到过去为“文生社”花去的“心血”，“真有点难过”。

五月十二日 以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身份随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及各界人士三千人，前往上海火车站欢迎以金应基团长为首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和随代表团同行的艺术团。晚七时半，参加欢迎宴会。

五月十三日 晚七时半，前往上海文化广场参加华东和上海各界为欢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而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五月十九日 晚七时半，出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为欢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而举行的酒会。

五月 作《给小朋友们的祝

贺信》，载六月一日《儿童时代》第十一期。祝贺小朋友们“节日愉快”“生活幸福”。

六月十五日 被推选为上海市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委员。

六月十六日 发表与王西彦合作的随笔《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新民报·晚刊》。

六月二十三日 致信田一文。将田的投稿“退还”，因为“空话太多”、“写自己也多”，作者自己感动的东西“不能通过人物、通过具体事件，来感动读者”。

六月 出版译作《家庭的戏剧》，俄赫尔岑作，回忆录。这是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回忆录的一部分，记录了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六月起义及其失败后阴惨的日子，欧洲亡命者的生活和作者家庭的悲剧。

七月六日 抵京，做赴莫斯科出席“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准备。在北京车站，与曹禺夫妇、陈白尘等见面，下榻北京饭店。同日，在北京，作《保卫和平的人们 后记》。云这是“第二次入朝的一点小收获”，集子反映了“保卫和平人们的心”。又作特写《记栗学福同志》，载《解放军文艺》八月号。

七月七日 在《人民文学》发表随笔《纪念契诃夫的话》，

后易题《我们需要契诃夫——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认为契诃夫的名字“今天还放射着万丈光芒”，因为他尤其擅长写知识分子、中层阶级、没落地主和小职员。“他笔下出现的人物也常常在我们中国社会出现”，他“不断地跟社会的一切疾病作斗争”，反抗和嘲笑“庸俗”、“不合理的制度”，“他那颗仁爱的心在纸上跳动”。

七月十三日 应邀抵苏联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七月十四日 与法国小说家勃赖德尔、罗马尼亚诗人别纽克同车前去参加契诃夫纪念馆开幕典礼。听取了苏联文化部长亚历山德洛夫、契诃夫夫人苏联人民演员克妮碧尔·契诃娃等四人的讲话。之后，参观契诃夫纪念馆，见到苏联作家、契诃夫纪念筹备工作委员会主席费定。

七月十五日 上午十一时，与勃赖德尔、别纽克、保加利亚作家斯托扬诺夫夫妇同至“新圣母修道院”扫墓。在契诃夫墓前经翻译沙夏介绍与诗人马尔夏克见面。十二时仪式开始，向契诃夫墓献花圈。然后，向契诃夫墓告别，并与契诃夫夫人克妮碧尔亲切交谈，说契诃夫的中国读者都知道她，都爱她，还向她赠送了礼物，并合影留念。晚七时半，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

出席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听取《契诃夫传》和《契诃夫剧作》的作者符·叶尔米洛夫作的关于契诃夫的生平与创作的报告。

七月十六日 晚，至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万尼亚舅舅》第三幕。随身带有焦菊隐的中译本，以便了解全部台词。说：“契诃夫的作品……不仅揭露了在当时社会中占上风的‘庸俗’丑恶面貌”，还能“加强人们对于未来、对于人类美好前途的信心”。

七月十七日 晚饭后，冒雨至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公园露天剧院参加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晚会。在剧场后台见到费定和《好医生》的作者楚科夫斯基，后者用英语和巴金交谈。

七月十八至二十三日 十八日晚，至莫斯科瓦赫坦诃夫剧院观看《海鸥》演出，随身带中译本《契诃夫戏剧集》。云“走出戏院以后一直不能把它忘记”。二十一日夜，乘国际列车离莫斯科到雅尔达等地参观访问。同行者有别纽克、苏联工作人员齐娜和沙夏。二十三日下午，访问雅尔达列瓦塔亚宫总工会休养所。晚，与翻译沙夏同在雅尔达海滨散步并瞻仰了契诃夫铜像。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时，由苏联作家协会克里米亚分会秘书长禾海洛夫陪同，与别纽克同

至契诃夫别墅访问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向契诃娃赠送了从中国带来的书报、剧照和木刻像，参观了别墅并与契诃娃座谈。说“全世界善良人民”都爱契诃夫，都感激“为这个伟大作家的纪念所作的一切的人”。接受契诃娃一张签名照片。

七月二十五日 上午，参观阿尔述克儿童夏令营，观看苏联少年表演的舞蹈节目，应“红领巾”的邀请共进午餐。下午，返回住地后，又同翻译沙夏至契诃夫纪念馆作最后告别。

七月二十六日 乘飞机至罗士托夫参观访问。

七月二十七日 上午八时，与别纽克、齐娜、沙夏从罗士托夫乘汽车至大冈罗格，由大冈罗格市政府工作人员陪同参观了契诃夫剧院、契诃夫图书馆、契诃夫文学博物馆、契诃夫中学、契诃夫中学附设的契诃夫纪念馆、契诃夫诞生的故居。

七月下旬 访问大冈罗格后，与陪同翻译沙夏至列宁大运河上乘船游玩，谈论契诃夫的戏。不同意叶尔米洛夫“《海鸥》中的主题是事业。只有有事业心的人才能在艺术中取得胜利”的说法，认为《海鸥》的主题是：青春，被庸俗势力摧残、毁灭了的青春。谈到《万尼亚舅舅》，也不同意叶尔米洛夫“叶

林娜是个猛兽，一切美的、伟大的、富有人性的东西只要被她碰到都要被她毁灭掉”的说法，认为《万尼亚舅舅》的主题应是：庸俗势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了人生的美。参观访问斯大林格勒一天。参观了有名的战场“巴甫洛夫楼”、“马马耶夫岗”等地。夜十一时，由苏联友人洛巴切夫陪同散步。洛巴切夫在巴金回国后赠寄给他自己描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走父亲们的路》。

七月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抵京情况，这次是单独出国，没有配备翻译，要靠“洋筋俄文”了；嘱萧珊购法、英文杂志以便保存契诃夫纪念文章等。

八月二日 由齐娜、沙夏陪同参观刚刚开幕的全苏农业展览会。

八月三日 闭馆前十分钟，至契诃夫纪念馆作最后告别，说：“站在那么多的照片和绘画前面，我才感到我对契诃夫的认识是多么浅薄，我才知道我多么爱他。”又在莫斯科银行遇费定，谈及到大冈罗格的访问，又对费定说：“穷苦的生活更容易培养人的同情心，也更容易增强人对不公平的愤恨。”

八月四日 夜，在微雨中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国。

八月二十六日 下午二时，作为文化艺术界人士随潘汉年副



市长等至机场欢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艾德礼等八人。晚八时，至上海国际大饭店出席上海市市长陈毅为欢迎英国工党代表团而举行的宴会。

九月三日 抵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榻北京饭店，同周信芳同住一室。被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

九月四日 在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九月八日 在北京，作散文《跟志愿军一起欢度国庆节》，载《人民文学》十月号。

九月十五至二十九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认为作家应更好地反映光辉灿烂的时代，但如果只想到“四平八稳人人满意”，作品就“不生动”“无力量”。主张揭露和批评“社会中的一些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奋斗，这是人生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与会期间和胡风“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

九月二十六日 作随笔《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载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云在我们国家里，每一颗心都充满着爱，每盏灯都发光，每块炭都发热，“哪

一处听不见笑声、歌声 哪一天看不到新人新事？”文学作品要“热情歌颂”；同时认为，也要“揭露和批评”“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如“官僚主义”等。

九月三十日 在《文艺报》上发表散文《谁没有这样幸福的感觉呢》。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的幸福感觉，说“在普遍的快乐中间找到了个人的快乐”，“心跟着六万万中国人的心在跳动”。

九月 迎接九妹李琼如来沪定居。后李琼如与巴金家人一直住在一起，孩子们称“九姑”。作《巴金短篇小说选集 自序》。致萧珊信六封。谈购俄文字典事；告之毛主席当选的消息以及北京“万众欢腾”等。

十月五至七日 在北京出席全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言。会议对我国近一年来文学艺术领导和批评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号召开展作品竞赛和自由讨论。

十月十七日 至上海车站欢迎前来我国参加国庆节观礼的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法学博士安·依·杰尼索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晚，出席华东暨上海中苏友协为苏联文化代表团举办的盛大欢迎晚会。

十月十八日 上午，偕许杰、柯灵等华东作家，与出席华东工业青年先进生产者会议的四

十九名代表进行座谈。

十月二十七日 下午，至上海机场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晚，出席了由潘汉年副市长主持的招待会。

十月三十日 出席华东作协召开的关于对俞平伯《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讨论会，未作系统发言。

十一月七日 作《巴金散文选 前记》，载一九五五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巴金散文选》。又在苏联《新世界》十一月号上发表随笔《苏联文学在外国·中国》（文内有关中国部分系巴金执笔）。

十二月五日 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散文《印象·感想·回忆——赴苏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琐记》。追述在苏联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期间参观、访问、游览等丰富的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特写、报告文学集《保卫和平的人们》。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出席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出席会议的还有夏衍、于伶、许杰、靳以、方令孺等十六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 出席上海各界为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而举行的盛大集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一九五五年

写了数篇文章批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主持过几次批判会”。

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和授勋的盛大典礼。

从淮海路霞飞坊迁入武康路居住，并在寓所接待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等。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谈契诃夫——纪念契诃夫诞生九十五周年》。认为“要了解契诃夫，最好多读他的作品”。赞契诃夫“爱憎分明”。

一月 得《文艺报》印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阅后，“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

二月一日 抵京，出席中国作协主席团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下榻崇外旅馆，住单间。致信萧珊。告之抵京情况，嘱萧珊在锦江饭店为岳父做生日等。

二月三日 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报告。休息时见到胡风。胡风问巴金何时到京，并说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请“提意见”。巴金后来回忆道：“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那种器量狭小、骄傲自大的‘胡老爷’了”，他“垂头丧气”，“声音特别小”，“眼里包着泪”。巴金劝他认真检查。胡风摇头叹息说“我的错误太严重了”。巴金又说：“这是思想的问题。你既然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就好了。丢掉旧的，接受新的，丢掉假的，接受真的。这是光明的道路。”

二月八日 在《新民报晚刊》上发表随笔《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

二月十三日 上午，出席上海市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成立大



会，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并在“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名。

二月十六日 上午，出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扩大会议，听取传达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基本内容和决议的报告。会议由靳以主持，吴强作传达报告，传达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决定等。

二月 经作协上海分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与唐弢、靳以、魏金枝、王若望、王元化、以群、孔罗荪等八人组成新的《文艺月报》编委会。巴金挂名任主编，具体编务由副主编唐弢、魏金枝、王若望负责。

三月十一日 在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被选为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三月十六日 致信沙汀。云“想趁这时间写一篇谈路翎《洼地‘战役’》的文章，现在来不

及了”。

三月中旬 作《谈契诃夫前记》，载《谈契诃夫》，现收《序跋集》。云“喜欢契诃夫”，但“不曾作过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只能写一些个人的印象、感想和回忆”。又作随笔《安东·契诃夫的生平——读书笔记》。用编年体形式记录了契诃夫的生平及文学活动。

三月十九日 赴京，作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准备。

三月二十日 抵京，下榻新侨饭店，和黄佐临同住一室。

三月二十六日 坐车赴广州。

三月二十七日 上午，抵汉口，逛了市区，游了黄鹤楼。

三月二十八日 抵广州，下榻十七年前与萧珊住过的爱群旅社，与黄佐临同住一室。次日同游黄花岗和越秀山等。在广州逗

留期间，虽然知道好友叶非英和陈洪有在广州教书，也想念在三十年代南国旅行时结下的友情，但终因种种原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打听他们的消息。

三月三十日 赴香港。

三月三十一日 乘机飞印度新德里。

三月

作《雾·雨·电新记》。说明《雾》、《雨》、《电》单行本写作、删改、出版简况。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抵京、抵粤情况。叙述了在粤汉车上重睹十七年前与萧珊经过的旧路，感到“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印”。另外，读到路翎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发表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也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

四月二日 随中国作家代表团飞抵印度新德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受到热烈欢迎，并戴上了花环，下榻郊外旧德里的 Maiden 旅馆。

四月五至十日 出席印度文化界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致词。六日，出席大会开幕式。十



契诃夫。

日，出席大会闭幕式。

四月十一日 获悉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包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因蒋帮特务破坏，于是日在飞越印尼海面上空时爆炸坠海。中国作家代表团接周总理命令，原地待命，改道返国。

四月二十三日 为了安全，最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晚上九点半从新德里乘机，安抵昆明，下榻翠湖饭店。然后飞重庆，从重庆乘船到汉口，再返沪。

四月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旅途情况。

五月上旬 惊悉全国要开展“反胡风运动”，“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进步作家，至少比我进步”。

五月十三日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知道“胡风问题”已经“升级”了。以后“被迫参加斗争”，“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

五月十九日 下午，主持上海市文联举行的座谈会，讨论对“胡风集团”进一步斗争的问题。会上发言的人有张春桥、陈望道、刘思慕、沈志远、卢于道、吴强、姚文元、罗稷南、熊佛西、胡曲园、周谷城、方令孺、陈烟桥、苏堃、吕蒙等人。

五月中旬 拟撰文表态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吧。”

五月二十六日 晚，主持上海文联、作协分会、音协分会、美协分会、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上海戏改协会等六个单位理事会联席会议，讨论“胡风集团”的问题。会议决议拥护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决议。又在上海《新闻日报》发表杂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云“在揭露了胡风集团‘罪恶’后”“这个集团应向党和人民投降”，“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这是他们惟一的向人民赎罪的路”。

五月底 作书评《谈 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载《人民文学》八月号 易题为《谈别有用心的 洼地上的“战役”》。云“我在志愿军战士中间就没有见到一个像路翎所描写的那种人”，“路翎不仅没有写出‘真实’，而且……写出了一大堆完全虚假的东西。……那些人虽然穿上志愿军衣服，但思想感情却是路翎的思想感情”。晚年巴金在《怀念胡风》一文中，对这篇文章的写作作了如下说明 由于是“被迫参加斗争，实

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上的‘战役’》，作为枪靶，批判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后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了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

五月 校读并修改旧译作《快乐王子集》删去旧版中翻译的散文诗部分 作《快乐王子集 再记》，一并交平明出版社重排出版。又出版自编的《巴金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随笔集《谈契诃夫》，平明出版社出版。

六月十日

在上海作协开会，讨论批判胡风的问题和接待《人民日报》来组稿的记者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上海文联副主席“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按即《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过去了”。

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有编者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知道胡风问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题又“升级”了。作为《文艺月报》主编，“为了第二次过关”，但又“拿不出一点证据”，只得借用关于胡风的两件真实事情，按“歪理”作了“解释”，拟撰写《关于胡风的两件事》。

六月十二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云：“读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感到“愤怒”和“吃惊”；为“过去的麻痹大意”而“忍不住责备自己”。

约六月 收到南通女子师范幼师科一百八十二位首届毕业生来信，获悉她们愿做“一块坚强的小石子”，遂为青年人“不可动摇的意志”感到高兴。获悉《文艺月报》编辑部因胡风问题“升级”，又收到十五件读者的批评信件及文章，决定公开发表贺绿汀的公开检讨，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负主要责任”。对“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颇不以为然，也“想不通”，但“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

七月一日 抵京，下榻北京饭店，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

七月七日 致信李小林。为女儿考试成绩不坏感到高兴，希望她做个好队员等。

七月月上旬 获悉陈山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就《文艺月报》六月号不转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一事，提出批评，指责该刊存在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七月十五日 在北京，聆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七月十六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散文《“数字的诗”，幸福的保证》，认为李富春同志的报告是“数字的诗”，我们确认它是“幸福的保证”。

七月十七日 作散文《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载三十日《文艺报》第十四号。云大家都感觉：“社会主义离我们很近，它是可以摸到的实在的东西了。”

七月

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杂文《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说：“大约一九三四年九十月中间我去日本之前，有一回在南京饭店和几位常常在《文学》杂志上写稿的作家聚餐，鲁迅先生也在座，他讲起有人说胡风是特务。理由是：那个人被捕的时候，特

务问起许多左翼作家的名字，单单没有提到胡风。鲁迅先生认为理由不充足，所以他不相信。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有一个时期听说鲁迅先生心境不大愉快，后来一个常去鲁迅先生家的朋友对我谈起鲁迅先生的近况，他抱怨说，胡风常常在鲁迅先生面前讲让鲁迅先生生气的事情，而且在外面乱打鲁迅先生的招牌，给这个老人引起许多麻烦，把事情愈弄愈复杂。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挑拨离间’上面，我们只是在暗中批评胡风器量狭小，重视个人恩怨，不顾大局，也不爱护鲁迅先生。过几个月鲁迅先生逝世，在万国殡仪馆开吊的时期中，我每天看到胡风那种哀痛的表情，后来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上我也几次听见胡风慷慨激昂或沉痛哀悼的演说。我总觉得在胡风身上有一种不自然、不真实的东西，但也没法详细地说出来。”巴金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在《怀念胡风》中写道：“我写的两种事都是真的。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后来又批评胡风‘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在北京修改《坚强的战士》。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多次与李劫人交谈有关创作的问

题。同时获悉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胡风与他已被逮捕入狱。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公布的时候，收到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来信。信中说，他们要“勇于克服困难，攻克科学堡垒”。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抵京后情况，托萧珊用俄文代为校对《草原集》；建议暂时不搬家，准备找弄堂房子或小洋房，因为“我希望靠土地。公寓房子漂亮而不合我的要求”。

得萧珊信，获悉李小林算术成绩得了九十一分，以及要开扁桃腺等。

八月一日 出席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扩大会议。会上，介绍了上海文艺界“反胡风斗争”的情况。郭沫若、茅盾、周扬、刘白羽等也发了言。

八月三日 致信萧珊。告之四日离京，六日抵沪，嘱“不必通知作协派车接我”等。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至上海美琪电影院出席上海各界人民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并讲了话。

八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斗争》，载《文艺月报》九月号。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圣人出，黄河清》，说：

“今天的圣人”是党，是政府，是毛主席，是人民，我们才能“把一条不可制服的吃人的泥龙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驯服的清流”。

看到《文艺月报》编辑部在八月号的《本刊启事》中，公开表示接受陈山同志的批评，承认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决定全面检查工作，整顿内部，纠正错误，“改进”刊物编辑工作。

九月一日 在《江南文艺》上发表散文《迎接我们的祖国的明天》。

九月四日 与靳以同至上海火车站欢迎由田汉陪同来沪的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

九月八日 在《新民报晚刊》发表散文《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此文又载九日《解放日报》，题为《让每个人的青春都放射夺目的光芒——祝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表达了对战斗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的青年的敬意。又在同日发行的《人民文学》九月号上发表杂文《“学问”与“才华”》，云：有人说“胡风集团”有“学问与才华”，其实“胡风反革命集团本来面目跟别的反革命没有差别”，他们只有反革命的“学问”与“才华”。

九月十日 晨，到机场欢送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上午十

时，与靳以同至火车站欢迎由周巍峙陪同来沪的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

九月十二日 在《新民报晚刊》发表随笔《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九月十五日 下午，与靳以同至火车站欢送南斯拉夫民间歌舞团离沪赴杭。

九月二十五日 中午，与靳以同至火车站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离沪赴杭。

九月二十七日 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和授勋典礼，典礼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以元帅军衔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的人员授予各级勋章。“我激动得厉害，我的眼睛里也有了泪水”。晚，出席周恩来同志为庆祝授衔授勋举行的酒会和文艺晚会。

九月 从霞飞坊迁入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定居至今。这座地处上海西区的花园洋房，原系法国人的房产，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是时由巴金承租。在搬家的时候，萧珊和九姑等忙里忙外整顿行装，萧珊原想把小书桌送人，巴金说“留着吧”，于是，这张小小的书桌在武康路“定居下来”。巴金说过：“那张书桌是我用过很久的东西。对它很有感情。所以搬家的时候，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总舍不得把它丢掉。”

九月底 作散文《充满敬意的祝贺》，载十月一日《文汇报》。说在第六个国庆节的前夕充满感激地怀念那些“给过我温暖，帮助过我的智力发展的教师”。

十月一日 作散文《大欢乐的日子》载《文艺月报》十月号。云“在这个大欢乐的日子里，……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声音都在为我们的成就欢呼”。

十月九日 与孔罗荪、唐弢等欢迎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和德·波伏瓦来上海访问，并在寓所接待。“当时我很谨慎，很拘束 讲话吞吞吐吐，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类的问题。”对萨特等说，屠格涅夫和鲁迅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是因为“知道得太多”，“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自己知道得有限。我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更方便”。

十月十六日 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持接待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阿·苏尔科夫。苏尔科夫和上海的二十几位中国作家举行了座谈。

十月 在寓所楼下客厅，接待应约来画像的年轻画家俞云阶。“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他花了四个半天”，“油画完成了”。但“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

十一月六日 出席上海市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大会，为主席团成员。

十二月二日 在上海纪念《草叶集》、《堂·吉珂德》出版纪念会上作《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的讲演，载四日《解放日报》。又出席上海市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和《堂·吉珂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

约十二月初 出席《文艺月报》编辑部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云“在文化战线的思想斗争更趋尖锐，更趋剧烈”的情况下，《文艺月报》“犯了不少违反党性的错误”，因而在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告读者》中，“怀着痛切和负疚的心情来检查这一年中的错误和缺点”。

十二月八日 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散文《友谊》。

十二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出席上海市人代会第三次会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乘机飞抵北京，做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届作家大会的准备。陈白尘来接，同车前往新侨饭店。吃饭时，服务员要粮票，这才想起忘了带。

十二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抵京情况，与靳以天天见面，嘱萧珊译《李耳王》；问候母亲和大家及孩子们等。又至上海机场欢送一德国政论作家，在候机室作简短谈话。德国政论作家的说，你们像这样接送客人，恐怕没有时间写文章吧。巴金应付说，“我也不常接送客人”。但心里想，“事实上当时火车站、飞机场已经成了几位作家、音乐家的会客室了，一天跑两次也是常事”。

一九五五年内 获悉《雾》、《雨》、《电》由香港电懋影片公司改编为《爱情的三部曲》，并摄制成粤语片，由江扬和何愉即左儿编剧，左儿导演，吴楚帆、白燕等主演。该片被列为一九五五年香港十大名片之一。



一九五六年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

撰文祝《萌芽》创刊，并想将《萌芽》培养成大树。

创作多篇杂文，认为文学作品把人分成“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动摇人物”是把“人物简单化了”，要人们当心那种“连脸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

与茅盾、周扬等一起将鲁迅灵柩安葬于虹口公园，称“鲁迅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人”。

解放后，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第一次回故乡成都视察，并到儿时老屋留影，感慨不已。

五十三岁

一月一日

在《文汇报》上发表散文《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抒发自己充满幸福欢乐的感情。

作随笔《新年祝词》，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广播》播出。说：“中国人民变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他想望了多年的东西一旦到手，他会一心一意地爱它，保护它”，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的心情”。

一月五日 早晨九点三十五分，与周立波随东德驻华大使同行，由北京启程前往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届作家大会。

一月七日 下午四点抵柏林，由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来接，后由东德作家协会安排，下榻 Newa 旅馆，顺路观看柏林漂亮的夜景。致信萧珊。告之“长途飞行实在是一件苦事。希望今年不再有这样的差事”等。

一月九日 下午出席在东德剧院举行的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式。东德总统皮克出席了开幕式，文化部长约·贝歇尔作了题为《论我们文学的伟大》的报告，见到作家来翁哈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德·弗兰克。巴金说，二十五年
前读过他的小说《卡尔和安娜》
的中文译本，看过据此小说摄制
的电影。

一月十日 出席大会，听取
小说家安诺德·次外格的报告和
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克劳狄乌
斯宣读威廉·皮克总统的祝贺
信，或出席大会，或参加小组讨
论会。

一月中旬 出席大会，听取
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乌布利希的报告。晚，出
席东德文化部长贝歇尔举行的宴
会。午夜告辞，贝歇尔对他谈到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对东德作家的影响。

一月十五日 与周立波同行
前往莱比锡访问，下榻国际饭

店。由原北京大学东德留学生韩
义波担任翻译。下午六点多，高
兴地见到了在莱比锡大学教书的
赵瑞蕪，也就是老朋友杨静如的
丈夫。晚饭后，应赵瑞蕪之邀，
前往季米特洛夫大街三十号莱
比锡大学外宾教授招待所三楼，
两人欢聚畅谈，品尝茉莉花茶和
东德点心。

一月十六日 晨，与海默夫
妇同桌用饭。剧作家海默一再请
巴金等回国后，代他问候刘少奇
委员长，并说《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一书对他的启发和帮助很
大。上午，参观莱比锡纪念馆、
图书馆、席勒故居。下午由赵瑞
蕪陪同去了莱比锡最大的“梅林
书店”。巴金高兴地买了二十卷
的《托马斯·曼全集》，并托请

赵瑞蕪寄到上海。最后，与周立
波、赵瑞蕪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
严寒，在席勒塑像前合影留念。

一月 在《儿童时代》一月
号上发表散文《向小朋友贺
年》。

二月三日 在回国的飞机
上，作特写《柏林一星期——记
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载十五
日《文艺报》第三号。记述在柏
林一星期的活动和见闻。同日，
飞机在苏联维尔诺机场降落，休
息一个多小时，又继续向东飞往
莫斯科。之后回国。在飞机上重
读第四届东德作家大会的决议，
并译出中文记在笔记本上。抵京
后，得萧珊二十三日信，获悉上
海全市公私合营、狂欢通宵等。

二月十日 与孔罗荪、峻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
普希金去世二十八周年
时，巴金 右一、孔罗荪
右二、峻青 中、唐弢
左二、靳以 左一 在上
海普希金纪念碑前献花
圈。

青、唐弢、靳以前往上海普希金纪念碑献花圈。这一天，是普希金去世纪念日。

二月约中旬 在寓所同萧珊一起会见部队青年作家白桦。他受《文艺报》委托前来走访巴金。巴金回答了白桦提出的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并指出，现在要克服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等缺点；又对白桦说：“大家都说你很多产，但比起我年轻时候就不能算多产了，我们那时候一年要写几部长篇。当然，我们年轻时候比你容易些，没这么多框框条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得很快……”

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与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等十四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发言。

三月一日 在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小组讨论会上谈“个人的感想”时，云“第一次拿起笔写小说”，是因为“有感情没法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

三月二日 作《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载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云“作家是个光荣称号”，应有“责任感”，“必须拿出好作品来，……免得辜负这个任何人不能不热爱的时代”。下午，出席会议。与其他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

三月三至六日 上午，出席大会，听取陈毅报告。陈毅谈了发展文艺创作的问题。与其他代表一起参观了北京国棉丝织二厂和北京西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继续听取大会发言。听取并通过了《中国作协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

五月一日 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为主席团成员。

五月六日 与周而复等陪郑振铎游览嘉兴。

五月八日 在《人民文学》第六期发表短篇小说《活命草》。叙述志愿军干部给朝鲜儿童金明珠和朴玉姬讲的中国少年忠于友情的故事。

五月十六日 作短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载《文艺月报》六月号。

五月十六至二十日 出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一届二次会议。十六日上午，向大会作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报告。下午，选举了新的理事会，修改了会章，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出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第二届理事会并被选为分会主席。周而复、于伶、靳以、许杰被选为副主席。会议就组织创作、培养新生力量

等工作交换了意见。

五月 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在上海市视察工作。作随笔《燃烧的心——我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所得到的》，载六月十五日《文艺报》第十一号，初收《大欢乐的日子》。赞高尔基有一颗“燃烧的心”，“发射正义的光芒”。认为高尔基的心“跟读者的心贴得非常近”，作品中有“作者的人格”，“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高尔基“就像他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鼓舞人们为“人类解放的事业”作出贡献。

六月十一日 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抵京，下榻北京饭店。与靳以出城访卞之琳。与靳以同在北京开会，其间校改《寒夜》横排本校样，受到靳以批评，巴金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

六月十二日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工程师周启章》。介绍工程师周启章责任心强与刻苦钻研的事迹。

六月十五至三十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六月 作书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介绍志愿军一日》，载《解放军文艺》第九期。评介志愿军战士创作的《志愿军一日》一书。认为这本书表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巴金萧珊夫妇 左一、左二 与靳以陶肃琼夫妇 右二、右一 摄于“人大”会议期间。

现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致萧珊信四封。告之抵京后情况，并为萧珊喜欢武康路的新居而高兴，云：“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回来葡萄一定结得很多很大了。”

七月一日 在《萌芽》创刊号发表随笔《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 创刊致词》。说：“任何美丽的花朵，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由萌芽长成的。而且任何萌芽只要得到阳光和雨露的滋养，就会展开它那‘欣欣向荣’的前途。”祝编辑将“萌芽”培养成大树。

七月四日 晚上九时抵沪。

七月十三日 作散文《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载八月

一日《中国青年报》。抒发了对鲁迅深切怀念之情。自述只是鲁迅的“读者和学生”，“很早就爱读他的小说”，“可是只有在他的最后三四年中间我才有机会跟他见面，而且我只有在他逝世的那天到过他的家”。“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当时“还有茅盾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几位”。认为先生的“光辉的人格”，能“照透你的心”，“你不能不爱他的思想”，“你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而感到幸福”。

七月二十四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鸣”起来吧》，署名余一。

七月二十八日 在《人民日

报》发表杂文《独立思考》，署名余一。

八月一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说忙》，署名余一。驳余今的文章《“忙”》。云：“听见人说‘忙’或者叫‘负担过重’，立刻就想到‘个人主义’，想到‘小资产阶级’，觉得非给以闷棍不可。希望余今同志不是后一种人。”

八月二日 上午，出席上海文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联合在美琪电影院举办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萧伯纳诞辰一百周年、易卜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致开幕词说：“萧伯纳和易卜生都是中国人民很熟悉、很



巴金《大欢乐的日子》等散文文集书影。

热爱的伟大剧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学都起过影响。许多中国观众从他们的作品中受到鼓舞，获得了追求进步的勇气。”

八月六日 出席上海文艺工作者会议。听取陈毅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扼要阐述。

八月七日 作《明珠与玉姬 后记》，载《明珠与玉姬》。说这两篇小说是为怀念在朝鲜认识的小朋友而作，但“并不是真人真事”。

八月八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署名余一。

八月十五日 出席上海市各界人民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万人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并讲话说：“现在埃及人

民终于站起来了，把运河收归国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八月二十日 作杂文《一件万分愉快的事》，载二十三日上海《新闻日报》。

八月二十四日 作《大欢乐的日子 后记》，载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表示愿意“做读者的知己朋友”，和读者“谈心”，交流自己的“感情”。

八月 在《文艺月报》八月号上发表杂文《观众的声音》，署名余一。认为在“戏剧界‘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应忘记“观众”、“艺人”和“过去那许多优美的剧目”。

约八月 接待杨静如和她的三个孩子，并祝贺她将去民主德

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

九月十日 作杂文《秋夜杂谈》，署名余一，载十月三日《文汇报》。说“百家争鸣”提出来几月，“鸣”的人不少，但缺少“独立思考”。

九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九月号发表杂文《笔下留情》，署名余一。针对一些编辑删改作者的文章“只会增加文章的文彩”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许多成熟的大作家的名作并未经过编辑给它们在文字上添过光彩”，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并非站在作者的头上拿起笔来，自我称雄，高声叫道：‘我有笔如刀。’……我们的确应当向今



天的某些编辑同志要求：‘笔下留情。’”

九月十七日 任上海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任。唐弢、陈虞孙任副主任，金仲华等九人任委员。同日主持筹委会第一次会议。

九月二十日 在《解放日报·雨夜杂谈》发表杂文《“恰到好处”》，署名余一。对姚文元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认为要当心那种“连脸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读《戏剧报》，获悉川剧名演员廖静秋的舞台艺术纪录片《杜十娘》即将在京开拍，为这位身患癌症的表演艺术家能在银幕上留下美好的艺术形象，感到高兴。

九月二十一日 致信沙汀。告之因筹备《文汇报》复刊事，该报“编委黄裳去四川拉稿，介绍他去省文联找你，希望你多多给他帮助”。

九月二十五日 获悉《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易题为《鲁迅》在苏联《文学报》上转载。

九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载十月十六日《萌芽》第八期。认为“先生使敌人害怕的是他那管锋利如刀的笔”，但却是青年“亲切、善良的朋友，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爱护青年的导师”。又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

会全体委员会议，被选为分会副主席。

九月二十七日 在《解放日报·雨夜杂谈》发表杂文《论“有啥吃啥”》，署名余一。批评某些商业部门只求完成推销任务、不顾人民需要的不良倾向，并对宣传工作中助长这种倾向的“有啥吃啥”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十月四日 在《解放日报·雨夜杂谈》发表杂文《描写人》，署名余一。指出“有人把人分成三类，一是正面人物；二是反面人物；三是动摇人物。正面人物永远正确，如像从出生起就没有犯过错误；反面人物仿佛一生下来就面带凶相，或者獐头鼠目；动摇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动摇”。这样，人就被简单化了。因为“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认为“要了解一个人单听他的高谈阔论是不够的”。

十月十四日 作《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载十五日《解放日报》。晨七时五十分，与茅盾、周扬、许广平、金仲华、靳以、唐弢、陈虞孙、孔罗荪等赴万国公墓移运鲁迅先生灵柩，并与金仲华一起敬献鲜花，把复制的“民族魂”旗帜献盖在灵柩上。九时，至虹口公园，安葬灵柩入新墓，并致词。认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鲁迅先生说过“忘记我”，“可是没有人能够忘记先生”，“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永远活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心里”。

十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散文《秋夜》。以新颖的构思、深厚的感情和浓郁的抒情笔调，抒发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之情，赞颂先生为探求真理而坚持不懈的“永远燃烧的心”，表达继承先生这种精神的坚定意志。

十月十六日 作散文《一个秋天的早晨》，载十八日《解放日报》。记叙迁墓情况并以桂花、广玉兰和一串红等赞美鲁迅先生的芳香、高洁、鲜红，面对红花绿茵中的鲁迅雕像，深感“从这里射出的光芒牵引着千千万万人的心”，“有成千成万的青年来陪伴先生”。又在《解放日报·雨夜杂谈》发表杂文《“艰苦”和“浪费”》，署名余一。认为“抹煞了人们的各个不同的嗜好”，强迫人们“必须毫无选择地接受供应部门供给他们的东西”，这是为“次货推广销路”。

十月十九日 作散文《纪念鲁迅先生》，载十月二十日《文汇报》。云：鲁迅先生“为祖国和人民树立了不朽的功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生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
十四日，巴金在上海
虹口公园鲁迅迁葬仪
式上。





名字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上午，至上海大光明戏院出席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并致开幕词，云：鲁迅的创作道路跟他的生活道路是一致的，先生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追求。

十月二十二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向葛量洪先生进一个忠告》。

十月二十七日 作杂文《挨自己人的耳光》，署名余一。载十月三十日《解放日报》。讽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替在九龙搞暴乱的国民党特务辩护的行为。

十月三十日 在《新闻日报》发表杂文《“救救孩子”》，署名余一。

十月

为北京外文出版社将《家》的中文底本进行删节。“删节全由我自己动笔”，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家》的责任编辑的意见，要把“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自尊心也似乎得到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

为英译本《家》作《后记》，载一九五八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版《家》，后经修改，易题为《和读者谈谈家》，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一期。自述“有多少‘觉悟’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才能”。说觉新不仅是书中人物，也是“我的大哥”，“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主”，“是我的祖父”，“他并不知道他的金钱只会促使儿子的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自述对《家》“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都是“熟悉”的，很多青年男女的青春葬送在封建专制的家庭中，因此，《家》“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而是“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

除常写一些杂文外，计划写一个中篇，内容以上海生活作题材。

十一月上旬 在寓所会见香港电影《春》、《秋》的导演左儿和主要演员白燕、红线女等。获悉香港名导演左儿把《火》改编并摄制成粤语片，由张瑛、红线女主演。香港电懋影片公司计划把旧译《秋天里的春天》改编后摄制粤语片，由吴楚帆、红线女主演，后又因生产计划改变，改编遂中途夭折。

十一月九日 作《给青年读

者们的信——略谈电影春和秋》，载《中国电影》十二月号。阐明原著的创作意图，分析影片与原著的不同之处，充分肯定编导及演员“发挥了各人的创造性”。

十一月十八日 偕丰子恺等文化界人士到龙华机场迎接从北京抵沪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宾主欢晤，获悉了内山完造这次专程赴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晨七时许，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与宋云彬由上海乘飞机赴成都视察图书发行出版工作。过南京、汉口、宜昌皆作短暂停留，在南京机场与汝龙和波兰作家邂逅。下午三时五十分抵重庆机场，受到重庆市有关方面人员的迎接，住重庆第一招待所。致信萧珊，告之到重庆的情况。

十一月三十日 游北碚，自重庆乘火车赴成都，与大嫂、侄女等亲属欢聚。

十一月 两次修改《家》，并写信致《文艺报》编辑部说：“我常说‘我一直在学习写作’，所以我的书每一次重版，我只要能看到稿样，我就要动笔修改，因为一方面我至今还不能驾驭文字，另一方面也可见我在运用文字上还不断地有一点进步。”

十二月一日 上午七时十七

分到成都站，成都市统战部长在车站迎接，住永兴巷招待所。这是解放后第一次返老家。稍事休息，八时五十分到灌县看都江堰。听都江堰管理处介绍，并在索桥 安澜桥 上走了两个来回，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怕。还站在这座高架于岷江上的长一里、用竹索编制的、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桥上，仔细看了鱼嘴似的石头，听友人讲述了索桥的来历。午餐时品尝到家乡菜，吃了赖汤圆和龙抄手等。晚上看川剧，遇见李西舫，几乎认不出来了。

十二月二日 与吴先忧晤面，畅谈别后，并游览当年经常活动的商业场。又偕吴至宋云彬处，在成都三洞桥一家小饭馆“带江草堂”吃午饭。饭后前往草堂看字画。

十二月五日 下午，与宋云彬参观四川省图书馆，受到伍非百馆长和穆济波的接待。至藏书库看善本书、顾亭林著《肇域志》抄本、《野草》月刊等。

十二月八日 与宋云彬分别，宋赴重庆，巴金仍留成都。

十二月九日 在永兴巷招待所又与同办过《半月》与《平民之声》的老朋友吴先忧会见，并会见来访的《四川日报》记者何伦武、王潮清等。时值香港摄制的影片《春》、《秋》在成都演出，轰动一时。巴金认为：这两部片子一般是好的，饰觉新的演

员演得还成功，但把五老爷克定演成瘪三则不合情理。同时认为：上影摄制的《家》还是不错的，较准确地表达了反封建的主题，饰觉新的孙道临对人物性格掌握得好。在视察图书出版发行时，说：“目前工具书特别是教学工具书很缺乏，已影响到教学工作。”建议：“目前一些配合政治运动的宣传材料，可由报纸刊登。”赴四川大学参观，以“不会讲话”为由婉言谢绝为学生作报告。四川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彭迪先设宴欢迎。赴宴作陪的有友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工会主席卢剑波等。

十二月十日 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并作有关创作经验的讲话，着重讲了写《灭亡》、《家》的经过，并讲两点看法：“一、普通人也可以写出一部东西来，只要他真正有生活，认真地写；二、写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创作需要创造性，特别需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与新华社记者交谈三个小时。下午由成都市市长李宗林陪同前往正通顺街老家，发现“还是‘藜阁’那样的门面，大门内有彩色玻璃门，‘长宜子孙’的照壁不见了，整个花园没有了。二门还在，大厅还在，中门还在，堂屋还在，上房还在，我大哥的住房

还在，后面桂堂还在，还有两棵桂树和一棵香椿，桂堂后面的竹林仿佛还是我离家时那样”。见到了三十三年前住过的屋子：“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几岁时住过的小屋，……李宗林同志让同来的人给我拍摄了一些照片：我站在玻璃小屋的窗前；我从堂屋出来；我在祖父房间的窗下……天色暗淡起来，我没有在门房里停留，也不曾找到我少年时期常去的马房，我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把梦和真、过去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老家，我想，以后我还会再来。说实话，对这个地方我不能没有留恋，对我来说，它是多么大的一座记忆的坟墓！我要好好地挖开它！”从老家出来，到城外看工地，晚上看川剧。

十二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十二月号发表杂文《辞“帽子”》，署名余一。十一月号《文艺月报》发表吴丈蜀、翟永湖的《我们需要的是公开的批评——笔下留情 读后感》，认为余一同志这篇文章影响“作者和编辑的团结”，“对整个创作界都是不利的”。巴金作文说：“我的着重点在于：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益处。……吴、翟两同志的着重点却在于：别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益处”，认为吴、翟是“乱扣帽子”。

十二月中旬 在成都，作散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文《索桥的故事》，载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儿童时代》第一期。记叙参观都江堰“安澜桥”的经过。返上海，因旅途劳累，感染风寒。在会见《文汇报》记者徐开垒时说：“我总觉得掬了一个作家的头衔，而交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愧对人民的。”还说，打算在以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工作；如果上海不允许他有较多的写作时间，那他就决心回成都去。

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与茅盾、周扬、老舍等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

十二月 致萧珊信四封。告之在四川视察及在老家的见闻和感想，嘱萧珊购小手风琴作为给

爱女李小林的生日礼物等。

一九五六年内

应老友陈西禾约请，多次前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看《家》摄制组“排戏”和“看样片”，并在寓所多次接见陈西禾和剧组人员。曾“非常热情的孜孜不倦的”分析角色：“觉慧和觉新的不同点，就在于他较年轻、幼稚，受旧的影响不深；觉新的悲剧就在于他对旧的还存有幻想，没有勇气反抗和认识到这一点。家庭对觉慧不像对觉新那样严……他从小就受到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影响，因此当他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平和长辈们的一些卑鄙的行为时，就有很多愤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过着少

爷的优越生活。”

在上海会见法国作家西蒙·德·瓦尔，谈到创作经验时，说“用强加的风格写英雄是困难的”。

致信田一文，云“各处要文章”，“简直应付不了”；并告“去年‘肃反’运动中还有人来调查过你的材料”；自云“生活相当好，只是没有写作时间”。

约同年 致信文放。对文放的三篇小说习作《金姬儿》、《贞淑》、《顺女》提出较具体的修改意见。文放曾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一名宣传员，在战场上见过巴金。后从事文学创作，任《新港》月刊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残。



一九五七年

在北京创作规划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在座谈“双百”方针后撰文，主张“文艺应交给人民”。

感觉政治气候在变化，撰文表态，云“右派分子”是“妄想书生造反”。批判冯雪峰、丁玲、艾青等，参加京沪“反右”活动，“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

受到周恩来接见，随团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观礼活动。

五十四岁

一月初 在靳以家与周而复、孔罗荪等相聚。为了体现“双百”方针，商谈在上海创办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发表中篇和长篇小说、长诗、多幕剧以及长篇论文。靳以想试一试，但巴金被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消耗光了精力，盼着有时间休息和创作，只答应做一个编委，起“顾问”作用而已。结果与靳以被推为主编，并当即拟定编委名单，报请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复。这个大型刊物就是后来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收获》。

一月上旬 在上海，会见一位文学青年，认为二十岁做作家是不幸的，自己做作家做得太早了。如果“思想各方面更成熟些，那么会把封建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充分、清楚地写在《家》、《春》、《秋》里”。

一月十八日 致信彼得罗夫。感谢《家》的俄文译者彼得罗夫为翻译《家》花了功夫；告之影片《家》即将上映，自己已不担任《文艺月报》主编，只是上海作协主席等。

一月 在寓所接待曹禺。获悉他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在上海视察，搜集创作材料，准备写一个以私营工商业改造为题材的剧本。

三月四日 赴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十五日作协召开的创作规划会议。与赵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写文章都是以理服人，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是以势压人。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接见青年作者阎纲、周明等人。谈到自己的创作计划，准备写《群》，“写觉悟出来以后的事”，还谈到对青年作家的培养：要“给些书，给些资料，帮助下去生活”等。参加创作规划会后离京前一天，与靳以、孔罗荪访问丁玲，并约丁玲给《收获》写稿。

三月 致信萧珊。告之在京情况，嘱萧珊订第二季度的《戏剧报》、《剧本》、《电影艺术》等杂志。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传记《坚强战士》。

四月二十七日 应邀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召集的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发言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作家们私下谈得很多，可是到了开会的时候却都不谈了。“我觉得领导上对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是不重视、不讲究”；又说自己写了《“有啥吃啥”》好几篇杂文，有位同志含沙射影地批评说“杂文要写主流”，自云很不服：“难道批评官僚主义就不是主流？”还对出版、稿费、电

影等提了意见。同时发言的有靳以、傅雷、陈山、罗稷南、许杰等。

四月二十八日 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杂感《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同日下午，会见《文汇报》记者，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重视话剧。

约四月 在寓所会见靳以，同意一起编《收获》，并谈编稿计划。

五月一日 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由《人民日报》摘要发表：对《家》改成电影的意见；对领导“不大同作家研究”，“出版工作的许多章程制度太死太板，不符合实际情况”等。

五月七日 上午，应中共上海市委邀请出席关于在文学创作上应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座谈会，发言说上次会上谈到的一些尖锐问题被记者“磨平了”。认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不能分开来看的，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起政治作用。

五月八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对文艺和出版工作的意见》。主张重视对缺点、对官僚主义的批评，目的是“扫除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

五月十一至二十日 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认为：该把文艺送到群众中去受考验，不能由少数领导根据自己的

好恶干涉上映或出版；艺术方面，作协最好让作家们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

五月十七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文艺应该交给人民》。

五月二十七日 下午，出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团会议，参与讨论改组书记处问题。与靳以、许杰、唐弢、魏金枝、傅雷、刘大杰、以群、孔罗荪、峻青等同被选为书记处成员。

五月 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动手编辑《巴金文集》，并作《巴金文集 前记》。云：“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这二十年中间写成的”，解放前“我的写作生活是痛苦的”，现在“看见人民的敌人的灭亡，看见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的成长”，愿意为“这伟大的新时代”作出贡献。

六月八日 作《雪》序。说明中篇小说《萌芽》到《煤》到《雪》的变动情况和原因。

六月十四日 与萧珊一起在寓所会见法国学者艾坚尔伯，谈话两个小时，认为影片《家》中一些弄虚作假的手法使他大失所望，虽然解放后“时间都被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吞没”，仍准备把“早就构思好”、“刚刚开了个头”的《激流三部曲》的第四部于“明年……写出来”。

六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江苏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巴金 右
与曹禺 左 摄于北京前门饭店。

“有希望的青年作者”陆文夫及方之，获悉他们拟组织“探求者”文学社，委婉地进行劝止，“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又替他们担心，又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可惜“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六月十七日 抵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下榻前门饭店，与沙汀同住一室。见到曹禺、郑振铎。“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在下榻处接待前来约稿的《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对方“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

自己。……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夜，作随笔《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载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云“反右派斗争，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六月二十一日 在《文汇报》发表随笔《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云“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得明白”、“讲得深”、“讲得全面”。

六月二十三日 拜访沈从文。

六月二十五日 与黄佐临去看《同甘共苦》。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六日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

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

六月 致萧珊信六封。告之在京情况，感到今年开会比往年忙，生活忙乱，思想不集中，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表示不为《绿叶》社题词，因为“现在情况复杂，学生青年中间，有些人也有问题，尤其是要办刊物的，所以我以后也得当心”；表示不能为女儿考初中和音乐学院附中出力而抱歉。接萧珊两封信。

约六月 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接到靳以从上海寄来的《收获》的《发刊词》，要征求编委的意见。当时“《收获》本来没有《发刊词》，第一期已经编好，纸型由上海寄到北京……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七月一日 读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感到反右运动的压力，同时对一些问题不理解。其时与靳以一起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双月刊创刊。

七月十日 前往紫光阁，出席周恩来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遇已在《人民日报》上被点了名的萧乾。坚持与萧乾坐在一起，并鼓励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一会儿，周恩来总理到会，请巴金坐到前排去。巴金一面向总理点头致意，一面弯下腰来再一次小声对萧说：“要虚心，要冷静。”

七月十四日 出席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邀集的座谈会。座谈会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陆定一、周扬等出席并讲话，张际春、沈雁冰、钱俊瑞及全国人大代表、在京文艺界人士等二百余人出席。周恩来在讲话中鼓励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反右斗争。

七月中旬 返沪前一天，访冯雪峰。一点也感觉不出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事后与冯雪峰夫妇前

往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聚餐。后来才知道，冯雪峰此时即将大祸临头了。

七月二十四日 在《文汇报》发表随笔《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云右派分子“是书生妄想造反”，“与右派分子的斗争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

七月三十一日 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方殷，告之《灭亡》初版是五十开的小册子。

七月 在京观看廖静秋主演的川剧舞台《杜十娘》的毛片，“杜十娘的欢乐和痛苦吸引着我的心”，“我不相信她是一个垂死的人所扮演的，在这个肉体已经死了一半的女人身上充满的是生命，不是死亡”。又致萧珊信两封。告之在京会议多，“肉体和精神都相当疲劳”；很关心女儿考学校的事，但是只能干着急；请萧珊转告靳以这几天北京作协反右派斗争很紧张，他还是缓期赴京为好。

八月八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随笔《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署名巴金、靳以。此文原系靳以作。当时“双百”方针已发表，刊物尚未印出，“反右”斗争已经开始，靳以为《收获》第二期撰写了这篇“表态”文章，又将此文拿给巴金看。阅后“了解他保护刊物的苦心，我自己也想多找机会表态，不加思

考便在原稿上署了名”。

八月十四日 致信方殷。告之《家》、《春》、《秋》的手稿都在北京图书馆。

八月十六日 出席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以反右派为中心。会上与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作联合书面发言《彻底揭露右派骨干分子、“诗人”、“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的丑恶真相》。

八月十七日 作杂文《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载《文艺报》第二十一期。云“听说丁玲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到群众中去落户’”，认为是“党对她的宽大”，“她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八月中旬 在京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与靳以联合发言，批判冯雪峰、丁玲、艾青。

八月二十五日 主持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第十次和右派说理辩论会。会上，孔罗荪、姚文元、蔡尚思、唐弢、以群、王道乾、靳以、郭绍虞、唐克新等发了言。

八月二十七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署名余一。说反右派斗争“震动了知识界”，“这一小撮人的确是我们的反面

的教师”。

八月二十八日 作杂文《国士论——过关谈之二》，署名余一。载九月二日《解放日报》。

八月三十日 作创作谈《关于 坚强战士》，载九月二日《文汇报》。此文即《谈我的散文》。

八月 获悉陆文夫等终因“探求者”事件，被划为右派。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人代大会上，与周而复、柯灵、唐弢、靳以、郭绍虞、赵家璧、严独鹤、罗稷南等联合作了题为《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的发言，内容有：文学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作家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作斗争等。

九月十二日 抵京出席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下榻和平饭店，与靳以同住一屋。

九月十六至十七日 在北京首都剧场参加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冯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虽然“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只好和靳以作了题为《永远跟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联合发言。“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

义’、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最后说作家一旦“离开了党……就割断了同人民的联系”。

九月二十五日 离京返沪。

九月二十七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戴帽子——过关谈之三》，署名余一。云“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放松改造”。致信彼得罗夫。回答了“巴金”笔名的由来等问题，寄赠十六本作品等。

九月

致萧珊信两封。告之在京中情况，见到在城外疗养的曹禺等。

得郭沫若赠《沫若文集》第一卷，扉页题辞“巴金先生：集子，我是不大喜欢送人的，谨如嘱奉赠，请您有暇时指正。郭沫若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北京”。

十月四至五日 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会议，听取宣传部副部长周而复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听取作协上海分会党组负责人峻青、孔罗荪介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对他们斗争的情况，并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批判“丁、陈”“右派言论”。

十月六日 作散文《几件纪念品——回忆一九五四年的一次旅行》，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收获》第三期。回忆一九五四年访苏时在斯大林格勒与苏联友人的交往。

十月八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狠狠地打击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署名巴金、章靳以。云反右斗争是“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斗争”，作家应“长期地无条件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表示要和工农兵紧密结合。

十月十四日 作随笔《伟大的革命，伟大的文学》，载《人民文学》十一月号。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称赞苏联人民和文学。

十月二十四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随笔《鲁迅和苏联文学》。赞颂鲁迅翻译、介绍苏俄文学的伟大功绩。

十月二十六日 在《大众电影》第二十期发表书信《谈影片的家——给观众们的一封信》。

十月二十七日 被选为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团长刘宁一，副团长钱俊瑞、许广平、老舍、梅兰芳、钱三强，团员有田间等三十人。

十月二十九日 作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雪 日译本序》。

十月三十一日 在北京，将随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晚上看川剧《情探》，遇重庆市川剧院的李文杰，李要求题字，推不掉，经商议，自己写稿，再由李济生书写。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全体进步人类的节日》。同日在苏联《文学报》发表随笔《我们为什么热爱苏联文学》。说苏联有丰富的文学传统，苏联人民和作家与我们有相似的生活命运和道路。

十月

与一百三十二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抗议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把所谓“匈牙利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

访苏前夕，给杜宣寄去一份二十三年前杜宣等在东京上演《雷雨》的说明书和舞台照。杜宣撰文表示感激：“这张说明书和舞台照，经过了二十多年”，

在烽火流亡中，巴金“保存到现在”，“真是吉光片羽，弥足珍重”。

在寓所接待丽尼及夫人许岩，他们从武汉中南出版社调往北京电影出版社工作，途经上海。老友晤面，谈到反右斗争中一些熟人的遭遇，不胜感慨。

反右斗争高潮已过，思想发生明显变化：庆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发违心之论。没有人找他谈过话，或者要他如何表态，但一直胆战心惊，“我总算平稳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爱人萧珊谈起，我还带苦笑地说自己是一个‘福将’”。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

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杂念。……‘文革’前的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作《热烈的、衷心的祝贺——友谊集 代序》。祝贺苏联人民在进步，祝愿中苏人民友情牢不可破。致彼得罗夫信两封。嘱彼得罗夫将来寄一本俄译本《爱情的三部曲》来；相约在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时见面。

十一月三日 周恩来总理找去谈话，获悉这次出国“意义重大，事情不多”。

十一月六至七日 下午三点半，抵莫斯科，至最高苏维埃会场。七日，清晨，前往红场，足足站了四个小时，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观礼活动。

十一月十一日 晚上九点半乘车到列宁格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巴金 右三 与马思聪、田汉、老舍、王昆、阳翰笙、俞宜萱、梅兰芳以及苏联友人摄于苏联莫斯科。





萧珊与儿子李小棠 右一、女儿李小林 右三、侄女李国燦 左一 合影。

勒，见到彼得罗夫并畅谈。

十一月十九日 抵基辅，晚上出席乌克兰对外文协招待会。

十一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散文《友谊》，云中苏人民的友谊“永远光辉灿烂，万古长青”。

十一月二十三日 返回莫斯科，前往莫斯科音乐剧院，听歌剧《战争与和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晚上，抵京。

十一月 致萧珊信六封。告之赴京及赴苏见闻及感想。嘱萧珊将自己拟稿、由李济生代写的题字，盖章后寄川剧院李文杰；嘱萧珊给儿子吃宝塔糖驱虫；因向往南俄风物，决定应邀去乌克兰访问等。

十二月三日 晚上离京抵沪。

十二月四日 致信彼得罗

夫。

十二月七日 上午，在上海作协召集的全体会员大会上，传达周恩来不久前在北京对下乡、下厂的作家所作的报告。靳以、峻青等十七人发言表态。下午举行小组座谈。报名下乡的作协会员达八十余人。

十二月十五日 作散文《难忘的回忆》，载一九五八年《收获》第一期，易题为《难忘的日子》。回忆十一月访苏时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上、在作家波列伏依家做客、参观全苏农业展览等情景。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上海作协举行的大会上，代表主席团宣布第一批深入生活的作家名单，并致贺词。

一九五七年内
作《快乐王子集 再记》。

获悉由魏博编剧，程步高导演，鲍方、石慧等主演的影片《鸣凤》在香港上映。这是由巴金作品拍摄的第一部国语片。

获悉由香港改编并摄制的粤语片《春》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奖状。

在寓所接见由著名电影演员金焰带来的客人、香港“影帝”吴楚帆。谈得很融洽、愉快。还与萧珊应吴楚帆邀请，特地观看他带来的粤语片《寒夜》香港华联影片公司摄制，吴楚帆主演。

《寒夜》这部电影曾放映给巴金夫妇观看，巴金看完后，激动地握着吴楚帆的手说：“这部影片拍好了，它比我原来写的还好。”认为扮演汪文宣的演员演得好，扮演曾树生的演员虽跟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但并不同意影片中安排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云：“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样是自私的女人。”



响应“大跃进”号召，订个人创作规划。撰写“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文章。

因《法斯特的悲剧》等文章，在《文艺报》发表两篇自我检讨的文章，“决心彻底改造自己”。

认为“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

五十五岁

一月一日 在《文汇报》发表散文《一九五八年“新年试笔”》。说“满怀信心地大步向前，迎接一九五八年的灿烂的朝阳”。

一月十八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介绍 苏中友好 周刊》。说莫斯科创刊的中文《苏中友好》杂志，是苏联人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的表现。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收到《家》改订本清样后即寄上。

一月二十三日 抵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下榻前门饭店，与沙汀同住一室。四川代表都来了，乡音不绝于耳，好像回四川一样。

一月二十五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

一月二十六日 因人大会议延期两天开幕，将《春》的改订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并抓紧时间，把《谈 春 》的文章写好。

一月二十七日 作毕创作谈《谈 春 》，载《收获》第二期。云：“一直把我的笔当作攻击旧社会、旧制度的武器来使用”，如果“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里生活过”，“不曾目睹人吃人的惨剧”，“对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并无热爱”，“我绝不会写

《家》、《春》、《秋》”。

一月 致信萧珊。告之在京中情况，买了几部旧书，钱不够，欠了债等。

二月四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空前的春天》。赞春天“带来了温和的风，明媚的阳光 同一片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象”，“春天把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灌注在我们身上”；“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一定能把这个春天装饰得无比美丽和无限光明”。

二月一至十一日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以四川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为主席团成员。听取了李先念、彭真分别作的国家预算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会上，就作家深入群众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作了发言。十一日下午，出席人大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会议批准本年度国家预算、经济计划和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调整国务院机构等决议。

二月上旬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会议忙，拉稿的人多，来访的熟人多等。

二月十六日 晚上返沪。

二月二十四日 致信沙汀。感谢沙汀寄赠的茶叶，又说“《金蔷薇》……等印出后寄给您”，“我的文集最近出了两

本，前两天给您寄上了”。

二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廖静秋同志》，载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叙述川剧女艺人廖静秋“身患癌症，……仍然顽强地忍受着剧痛，……坚持拍摄《杜十娘》舞台纪录片”的感人事迹，赞她为“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决心死在台上”的献身精神。

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的创作座谈会。响应“跃进”号召，订个人创作规划：两年内，准备写中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各一部，创作谈十万字以上；同时编辑、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六至十四卷。译完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约十四万字，已译二万字；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陆蠡散文选》一卷；还要校改《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一卷 与萧珊合译。

三月五日 在《文汇报》的《作家们，大家都来写书评》的标题下，发表讲话：“书评要注意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判断能力。它应该鼓励和推进创作，批评家有时可以看出作家自己所没有看出的东西，给作家以启示。”

三月七日 与靳以、魏金枝、孔罗荪、罗稷南、峻青等三十多个作家到上海机床厂访问。工人们敲锣打鼓表示热烈欢迎，有人希望巴金讲话，托辞婉言谢

绝。

三月十三日 作杂文《法斯特的悲剧》，载四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八期。美国作家霍华特·法斯特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在《纽约时报》登载脱离共产党声明，继后在美国《主流》杂志发表《我的决定》。就此对法斯特由一个“诚实的作家”堕落成“反共十字军的一个英勇的骑士”表示“惋惜”和愤慨，认为法斯特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溶化在群众的感情里面，在集体的解放中去追求个人的自由”因而“不知不觉”掉进了反共势力的“圈套”里，希望法斯特“回头是岸”。

三月十八日 上海作家、教师争购公债。巴金认购二万元，比去年增加两倍多。又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的理事扩大会议，讨论作家深入生活、劳动锻炼的问题。市委书记陈丕显到会讲话。

三月二十日 参加上海市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为主席团成员。观看上海知识界万余人集会和游行，向中共上海市委献上决心书，表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海枯石烂志不渝。夜，作《谈 灭亡》，载《文艺月报》四月号。谈《灭亡》的写作经过，云：“每一个作家走向文学，都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有他自己的道路。”“我打算在巴黎研究经济学。结果什么也没有学，连法文也不曾念好，只是毫无系统地读了一大堆书，写了一本《灭亡》”；又云《灭亡》中的“忧郁性”是思想中“解决不了的矛盾”的反映，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

三月二十二日 与音乐家贺绿汀等百余人同造船工人大联欢，和工人一起唱歌。深受当时的热烈气氛所感染。

三月 《巴金文集》第一卷、第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四月一日 作创作谈《谈秋》，载《收获》第三期。云“《秋》里面写高家的飘落的路”，高家好比秋天落叶的树，从枯黄到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和树身”，“高家垮了，克明和觉新想挽救它也没有办法”；“我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书上，跟书中人物一同受苦，一起受考验，一块儿奋斗”；“我的本意是：通过人来鞭挞制度。一切作恶的人都是依靠制度作恶的”。下午，主持召开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成立会议。研究室由郭绍虞与以群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参加研究室成立大会的有文艺理论专家和青年研究者三十多

人。

四月五日 在《劳动报》发表随笔《写给青年突击手们》。

四月七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寄赠《家》连环画和照片及《谈灭亡》的剪报等。

四月

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散文《欢迎最可爱的人》。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回国，并希望“跟祖国人民一起把祖国建设成无限美丽的花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三卷。

五月一日 在《萌芽》第九期上发表《谈我的散文》，云“三十年来，我一共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认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还要“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要“动听”、“明白”、“让人家相信”、“有一点感情”；自云“写‘散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作品”：《古文观止》中的两百多篇古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的文章和鲁迅、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的散文，又从欧美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中“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又云“我的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都是作者自己”，但“不知道节制”、“毫无含蓄”。

五月十九日 复《文艺报》编辑部信，载六月十一日《文艺

报》第十一期，题为《巴金同志来信》。作自我检讨，认为从读者对《法斯特的悲剧》的意见中“受到一次教育”，“我只着眼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重大事件”，“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五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四卷。

六月二日 在《文汇报》发表杂文《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说“旧日知识分子要经过认真的改造，丢掉个人主义包袱，才能够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才能够找到光明的前途”。

六月八日 在《人民文学》六月号上发表《谈我的短篇小说》。叙述创作短篇小说的情况、经验和目的等。自云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攻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没有明白地给读者指路”；“后期的短篇，……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请读者自己作结论”；在这方面鲁迅、屠格涅夫，还有欧美的、日本的短篇小说“都是我的老师”；认为创作没有窍门，中国“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中国的文学“传统深厚”，是“取之不尽的宝山”。

六月九日 复《文汇报》编辑部的信，载六月十四日《文汇

报》，题为《巴金同志给本报编辑部的信》。作自我检讨，说：“解放以来，我写过不少文章，也说过不少错误的话。”主要因为“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几十年”，“家庭的影响”，“始终钻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必须彻底改造”。“形势逼人，……我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文后附余定《巴金同志提出一个错误的口号》。余文说巴金同志在去年大鸣大放时高喊的口号“‘把文艺还给人民’”是“错误的”，似乎“巴金同志是代表人民在说话的”，“巴金同志认为现在的文艺是不为人民所有的”。

六月十二日 在上海《街头文艺》第三期发表随笔《宣传总路线》。说“每张嘴都在为总路线动，每颗心都在为总路线跳”。

六月十四日 在上海《街头文艺》第四期发表小小说《小妹编歌》。写一个十二岁的小妹为宣传总路线深夜编歌的故事。

六月十九日 在北京《语文学学习》第六期上发表随笔《主要的是思想内容》。认为“文章的好坏主要在于它的思想内容”，“说真话，才能够说得恳切”。

六月二十五日 作报告文学《创造奇迹的时代》，署名巴金、任干、胡万春、靳以、魏金枝，载七月二十四日《收获》第

四期。叙述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工人邱财康的动人事迹。

六月二十八日 参加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戏剧家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大会。

七月一日 在香港《文艺世纪》第七期发表译作《白痴》，俄库普林作，小说。

七月三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散文《变化万千的今天》。

七月九日 作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载《人民文学》八月号。叙述上海广慈医院医护人员抢救严重烧伤的钢铁工人邱财康的事迹。

七月十四日 致信吴海发。云：“我不赞成您组织《家》的读书报告会。我并非不愿意人读《家》，不过我觉得倘使要组织报告会，推荐书的话，还是挑选一种反映新的现实的小说还好些。”又云“用我签名的书来做奖品，有自我宣传的嫌疑”，因此不送书了，并声明“我并非吝啬，也不是自大”。当巴金信邮到吴手中时，吴组织的中学生《家》读书报告会已经开过了。

七月十五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书评《广阔、光明的道路——介绍文艺月报“上海工人创作专号”》。认为“到现在为止，像这样的工人创作专号在全国刊物中还是第一本”。

七月二十三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收到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等。

八月四日 在《文汇报》发表随笔《为振奋人心的消息而欢呼》，欢呼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表示“热烈拥护”。

八月五日 去医院看望因公烧伤的工人邱财康。

八月七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吸血鬼”的末路》。

八月八日 作《创造奇迹的时代 后记》，载作家出版社十月版《创造奇迹的时代》。

八月十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收到英译本《契诃夫》，寄赠关于鲁迅的六种书等。

八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五卷。

九月八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我们的决心丝毫不会动摇》。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庄严声明”。又在《文汇报》发表杂文《六亿人民一定要斗争到底》，署名巴金、靳以。认为“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

九月九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署名巴金、靳以。表示中国人民决心把反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

九月十一日 在《文汇报》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发表杂文《美帝确是纸老虎》，云“‘纸老虎’不滚回去”，就“捉住它，把它戳穿，把它打烂”。

九月二十二日 在《文汇报》发表随笔《欢送 萌芽 编辑部下乡》。认为“文艺刊物都必须打破过去窄小的圈子，……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扎根”。

九月二十三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杜勒斯的豺狼面目》。云中国人民“为着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不惜献出最后一滴血”。

九月二十五日 上午四点五十一分抵京，下榻和平宾馆，将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九月二十六日

获悉将与冰心、刘白羽、许广平等第一批赴苏联，参加成立会。

在致萧珊的信中，附致李小林、李小棠信，署名爸爸。告之“姊弟间要和气，要团结。爸爸在外边常常想到你们。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地念书、弹琴、劳动。多吃东西，注意身体”等。

九月二十九日 应茅盾邀请，陪韩雪野吃饭。席间茅盾问及萧珊曾做什么菜招待过尹世重，巴金知道尹世重极口称赞萧珊做的菜，其实是让大三元菜馆送来的，因有外宾在场，遂含糊

其词。晚上将此事告之曹禺，两人大笑。

九月三十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随笔《写在亚非作家会议开幕之前》。

九月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京中见闻，如北京西单要试办人民公社等。并请萧珊代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新合同上，将稿酬千字十元改为千字八元；在《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的合同上代为注明“作者声明放弃稿酬，只接受赠书十册”；在作家出版社的合同上代为注明“本文稿酬请交上钢三厂工会转邱财康”等。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收到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插图本和美丽的苏联邮票，表示感谢；正在搜集彼得罗夫要的书。

十月一日 乘机飞往莫斯科，吉席科夫来接，告之靳以事，并托吉席科夫找药。下榻北京饭店。

十月四日 飞抵塔什干，遇到曾经到上海家中做过客的印度作家班纳吉。

十月六日 晚上十二时，发生结肠过敏，又吐又泻。

十月七日 下午，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开幕式。亚非作家会议号召全世界各国作家反对殖民统治，同时要加强文学与人民的联系并促进各国文化交流。

十月中旬 出席亚非作家会议闭幕式以后，住在塔什干郊外杜尔叨别墅。下午，到斯大林集体农庄参观。后又从塔什干郊外搬进城里，住在塔什干旅馆。与部分中国同志乘飞机去撒马尔汗访问，并参加乌兹别克作家代表大会。从塔什干乘飞机到费尔刚纳、安集延等地访问，当晚住在费尔刚纳。

十月十七日 早晨，从费尔刚纳坐汽车到安集延。

十月十八日 正午，坐小客机回到塔什干。

十月十九日 早晨，乘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到莫斯科。

十月二十日 在莫斯科从诗人萧三处获悉，郑振铎十七日乘图一〇四班机时遇难。一时无语，十分悲痛，以往的友谊涌上心头。

十月下旬 自莫斯科返京。曹葆华“几次来旅舍看我”。

十月二十五日 安抵北京，立刻给萧珊写信。

十月三十日 前往首都剧场参加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追悼大会。与夏衍、叶圣陶、赵朴初、何其芳、胡愈之、俞平伯等撰文悼念。

十月三十一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悼郑振铎同志》。云“认识他将近三十年”，他“正直、热情，喜欢帮助年轻人，鼓励人走新的前进的道路”，“对

人坦白，有话直说”，又是一个“多面手”，“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六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革命故事小丛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

致萧珊信八封。告之旅途见闻及听到郑振铎遇难后的悲痛心情。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最近《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师范大学学生集体写的批评自己的文章，认为相当尖锐，基本上写得好的，会对彼得罗夫的工作有帮助等。

十一月十九至二十日 与靳以、周信芳、袁雪芬、丰子恺等人到车站迎接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演出队一行四十一人下午到达上海。二十日晚，前往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大厅，与上海市委领导及文艺界知名人士会见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的全体同志，听他们谈话，看他们表演，并摄影留念。紧紧地捏住双手烧伤很厉害的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张家琛同志不能伸直的手。

十一月二十一日 作散文《一生也忘不了的教育》，载二

十三日《新闻日报》。赞扬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是世界上“第一个特殊的演出队”，有“没有两只手却能够弹琴”的人，有“双目失明”、“下肢瘫痪”“却会跳舞、唱歌”的人。

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准备从批判的角度，写一篇谈自己的思想和作品的长文。

十二月三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欢迎金日成首相》。

十二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崛田善卫率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

十二月十九日 致信沙汀。告之近况，并托代购竹编工艺品作为今后赠送国际友人的礼品。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郭绍虞、魏金枝、姜彬、赵景深、傅东华等三十余人，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为组织上海的诗歌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讨论“诗风”问题而召开的座谈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把高尔基的《文学写照》翻译完了；承认自己的作品在当时就有毛病，在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作品时，应该顾及作品和作者当时的实际情况等；

又云“我的作品中常常写个人奋斗，在旧社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就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等。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作散文《新年试笔》，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后易题为《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云“一九五八年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全国人民“手挽手，肩并肩”“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前进。

一九五八年内

致信杨静如，告之其译作《咆啸山庄》“将来由平明转给新文艺审阅”，“这些事汝龙不能决定，我也不能决定”，“接受与否由新文艺决定”。信末日子为“卅日”。“新文艺”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

致信苏联托尔斯泰博物馆，信载一九七一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版《列夫·托尔斯泰在东方》

A. N. 石夫曼作。赞托尔斯泰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成就和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与访问团一起参观上海和江西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公社等，撰文云“整个国家”“连每秒钟、每分钟都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次到杭州。

为以前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篇作品作自我检讨。

五十六岁

一月初 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编完自选的《巴金选集》。又因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他写一篇表态的前言或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只得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

一月五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让我们大声欢呼》。欢呼“苏联发射的巨型宇宙火箭已经飞越月球”。

一月上旬 作《巴金选集 后记》。回顾思想演变的过程，青年时接受了“扬名显亲的大道理”、“无政府主义”，“也喜欢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俄国青年‘到民间去’”为榜样，“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到法国和回国后，终因“没有决心，没有勇气”，“不能突围出去”，却“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安于“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是我坚定的信仰”，但也仅仅“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作品中“有忧郁悲哀的调子”。“解放带给我力量和勇气。我要跟过去告别，跟我那个小天地告别”。

一月约上旬 在寓所接待曹禺。谈到《巴金选集 后记》的写作，并出示底稿。

曹禺看得出“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

一月约中旬 接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获悉邵也认为《巴金选集 后记》写得不太妥当。谈了一个多小时，终被说服，同意抽去，改为《出版说明》。“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

一月二十五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随笔《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

一月二十六日 以作协上海分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上海市八万多人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声援古巴、刚果人民正义斗争的集会，并发了言。用事实揭露帝国主义者打着“人道主义”的招牌和用“自由”等为幌子掩盖其侵略的实质。

一月二十八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中国人民为苏联宇宙火箭上天的胜利而欢呼，托购《契诃夫全集》和《屠格涅夫全集》等。

一月 右肩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连脱衣服都感到困难，经过几十次电疗，并未见好。继续作针灸治疗。

二月十四日 在苏联《文学报》发表《一条心》。赞“中苏人民一条心”。

二月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

三月四日 发表《给波列伏依的信》，载《收获》第二期。



巴金等在鲁迅墓前敬献的花圈。

谈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作家之间友谊的可贵。

三月十一日 被选为四川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三月二十四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正在写苏联游记等。

三月底 到上海市郊人民公社参观访问。

四月五日 与魏金枝、吴强、孔罗荪等到虹口公园祭扫鲁迅先生墓并献花圈。在墓前默然良久，看着宽敞的墓地，越发思念鲁迅先生。

四月六日 到车站欢迎到上海访问的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他的夫人歇莉·格雷姆。

四月十日 杜波伊斯博士与夫人歇莉专门会见了巴金。巴金将漆器茶具与软木雕刻品等物赠送客人。歇莉风趣地问巴金有人讲《家》里的觉慧是你自己。巴

金说：“有些相像，但也不完全像我。”告别时，巴金祝杜波伊斯长寿，并祝他为黑人解放事业、为保卫和平再作贡献。

四月十一日 发表散文《无比光辉的榜样——祝全苏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云苏联作家“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又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身份，出席上海各界人士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帝斗争的集会，并讲了话。

四月十二日 作《新声集 序》，载《新声集》。云“书名‘新声’”，即“是新的声音”，决心参加“新的队伍”，“拿出全力跟着大队前进”。

四月十五日 与靳以等抵京，下榻前门饭店，仍与沙汀同住一室。准备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四月十七至二十九日 以四川省代表身份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四月十八日 下午，去怀仁堂，听取周恩来总理等作的报告。

四月二十九日 出席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闭幕式。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四月

致萧珊信四封。请萧珊在老太太生日时，代敬一杯酒，并告之接受邵荃麟介绍的中医，用针灸治疗关节炎，以及托曹禺通过作协买电视机等。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英译本《家》被出版社编辑部删去觉慧做梦和许倩如剪发的部分，而自己在编文集修改《家》时又恢复了等。

五月二至三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委员扩大会议 与会还有茅盾、老舍、田汉、曹禺等二百多人。交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问题。二日致信彼得罗夫。

五月十五日 在《文艺月报》“上海解放十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散文《“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从新旧上海的对比，赞“一轮红日上升在

这个新生的城市的上空”。

五月二十日 作散文《塔什干的节日》，初收九月作家出版社版《友谊集》。

五月二十四日 编完散文集《友谊集》。又作《友谊集后记》。云这本写中苏人民友谊的集子“并非可以传世的佳作”，而是“一本友谊的书”。

五月

出版译作《回忆录选》，苏高尔基作，署名巴金、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十月重印，改题为《文学写照》。

将年初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选集》写就的《后记》找出来，“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摘出的一部分，向读者展示了自己“‘五四’以后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查了作品中那些忧郁、悲哀的调子”产生的思想根源。

六月五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关节炎在京治疗后好了大半，愿意为彼得罗夫购所需的书。

六月六日 为纪念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诞生一百六十周年，下午，与柯灵等到汾阳路向普希金纪念像献花。晚上，在中苏友谊馆举行纪念会。

六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与周扬等人参加首都诗人座谈会。又致信沙汀。代萧珊催问沙汀“答应《文艺月报》的文章是否已经动笔”。

六月

偕同萧珊去浙江省新安江水利工地，在紫金沙招待所住了四天。访问了金华、双龙等几个人民公社，“在那些地方我看到了满足与丰富”，看到了“社员们那种冲天的干劲与乐观的信心”；在工地“听见过工人们的豪言壮语”；还参观了朱家埠托儿所，“羡慕他们的幸福生活”。

解放后第一次去杭州，与浙江省文联主席方令孺欢聚，“真像见到亲人一样”，交谈中发现她很“寂寞”。在杭州参观了西湖公社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七卷和第八卷及《巴金选集》系作者自选。

七月二十七日 作散文《从新安江回来》，载八月二日《浙江日报》。

七月下旬 作《短简一后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一九六一年十月《巴金文集》第十卷。

七月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新安江之行的感受，并云“马琴”是自己的笔名，即日语“巴金”的谐音；《巴金文选》

是一九三六年盗版巴金作品中最坏的一种等。

八月二十七日 下午，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并讲话。云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去年的成就”，决心“赶上去，拿出更多的东西来”。

八月二十九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对敌人咒骂的回答》。批驳“‘自由世界’的高等绅士们”对我国出现“新事物”的咒语。

八月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邀请彼得罗夫来上海时到家中做客等。

九月一日 致信彼得罗夫。

九月六日 与靳以和茹志鹃去宝山县彭浦公社体验生活。

九月七日 作《上海十年文学创作选集 总序》，载一九六〇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上海十年文学选集》之《短篇小说选》、《电影剧本选》、《曲艺选》、《散文杂文选》、《论文选》。云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九月十日 作散文《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载《收获》第五期。云郊区村里有了楼房，鸡、鸭房，幼儿园、缝纫机、厨房食堂，“一派新景象”，“整个国家都在跟时间赛跑，连每秒种，每分钟都取得了胜利”。

九月十三日 作散文《我们伟大的祖国》，载《萌芽》第十九期，题为《我们的祖国》。欢呼建国十周年的成就，表示：“让自己的心紧紧地贴在祖国身上，永远地跟着她，……同她一起驾起大跃进的祥云，奔赴无比庄严的人间极乐世界！”

九月十七至十八日 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报》印尼文发表散文《一个作家的无限欢乐》。

九月二十二日 为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委会成员之一。

九月二十六日 在《文汇报》发表散文《无上的光荣》。

九月三十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最大的幸福》。云在“十年”大庆期间，“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在上海《新闻日报》发表散文《星光灿烂的新安江》。又作散文《迎接新的光明》，载《上海文学》十月号。云十年来“每一项成就都像一行发光的珠宝”。

九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作《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署名萧珊、巴金译。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友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文、小说、特写集《新声集》。

十月一日 在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俄文发表散文《为了子孙万代》。又在苏联《文学报》发表散文《我的祖国》。

十月六日 出席上海市文化

局等单位举行的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

十月七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散文《“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叙赞中德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的《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的纪录片。说“为了要在地上建立天堂，中国工人忘我地劳动”。本篇系为柏林《新德意志》杂志写的文章。

致信沙汀。代《上海文学》向他组稿，并告一直忙：“人民日报要我写关于人民公社的文章，我也没法动笔。”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塔什干精神”万岁——纪念亚非作家会议一周年》。

十月八日 至车站欢迎亚非团结理事会代表团部分团员。

十月十日 至机场迎接由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率领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晚上在中苏友谊馆举行欢迎会，与会致欢迎词；次日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去北京。

十月十七日

晚上，观看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在文化广场演出的《天鹅湖》。演出结束后，与曹荻秋、金仲华、袁雪芬、贺绿汀等上台祝贺艺术家演出成功。

致信杨静如 署名芾甘。告之“蕴珍已和一位女医生同去福建”。



十月二十日 致信萧珊。告之去福建参观访问的萧珊“家中一切如常”等。

十月二十一日 随同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访问全市群英大会的先进生产者。

十月三十日 在《展望》第四十四期发表散文《英雄赞》。

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九卷。又发表《沉默集二序·注释①》，载《巴金文集》第九卷第六页。云“我现在重读这三篇旧作，自责旧作《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和《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三篇小说，觉得自己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看法存在着许多缺点 第一，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解释法国大革命，因此对我所写的三个人物也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 第二，我杂乱地读过一些书，也没有能把材料整理、分析一下，对许多互相冲突的记载也没有能判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伪的或错误的；第三，我常常不能从阶级的观点看问题。此外，自然还有别的缺点”；并说明“这是我二十五年前信笔写成的小说，读者若想知道真正的历史事实，不妨读索布尔著的《法国革命》，那里有比较正确的叙述”；最后指出附录的《卢骚与罗伯斯庇尔》、《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静夜的悲

剧》“三篇‘散文’也是同样性质的作品”，“缺点”与三篇小说“相同”。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老家情况。

十一月四日 黄昏时分，去医院探望病中的靳以。谈起这一期《收获》的内容。告诉他一位苏联朋友在最近一期《旗》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介绍《收获》的文章。还互相谈到今后的创作计划。“当时根本没有料到，这是与靳以的最后一次晤面。”

十一月六日 晚上，出席上海各界人士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集会。出席庆祝会的还有陈丕显、魏文伯以及陈望道、周谷城、苏步青等。

十一月七至十日 七日半夜，惊悉挚友靳以因心脏病猝死，急忙赶到医院。“我永远忘不了医院里的两三个钟头：天明以前的寒冷的夜，阴暗的大厅，轻微的人声，难堪的等待”以及“妻女呼唤”的“哀哭声”；“我到过太平间”，“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绞痛了我的心”。为靳以组成治丧委员会，料理后事。十日下午，参加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的公祭靳以仪式，并致悼词。魏文伯主祭，中国作协主席茅盾 陈白尘代、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陪祭。孔罗荪报告靳以的生平事略。夜 作《安息吧，靳以同志》，载十一月十

一日《解放日报》。云“章靳以同志是优秀的作家”、“编辑”、“文艺战线上英勇的战士”和“受人尊敬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正直诚恳，爱憎分明”“从向往光明出发 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灯塔 找到了党。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中间”。

十一月十四日 作散文《他明明还活着》，载《收获》第六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 到机场欢迎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

十一月 送靳以下葬。“我看见他的遗容被棺盖遮没，我扶他的灵柩上了柩车，我看见墓穴被石灰填满，我也在石灰上面盖了一铲土，我又向堆满花圈的坟头行礼告别。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又作散文《哭靳以》，载《人民文学》十二月号。

十二月六日 至车站迎接访问列宁格勒回国的上海代表团。

十二月十八日 与师陀、吴强、茹志鹃等到苏北、江西老根据地及本市郊区农村作短期访问。

十二月二十日 在《文汇报》发表随笔《舞剧 蝶恋花 鼓舞我们前进》。说看了舞剧《蝶恋花》后，“仿佛生了一双翅膀 我的心不仅跟着烈士们飞上九重天 而且跟着烈士们‘泪雨’飞回到天安门前”。夜，作

《赞歌集 后记》，载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四月版《赞歌集》。说这个集子是作者“饱蘸心血写下的‘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被选为上海市中苏友协副会长。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热情的赞歌 序》，载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五月版《热情的赞歌》与靳以合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 致信彼得罗夫。

十二月 发表俄文版《巴金文集 序》，载莫斯科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两卷本《巴金文集》第一卷。

一九五九年内

为新版的《巴金文集》第十卷、第十一卷写了多篇“注释”，原无标题。

作《觉醒与活动 注释

①》载《巴金文集》第十卷第八十页。云 文中“谈到的对付审查员的经验的文章，原题为《小小的经验》，一九三五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写成，是故意写给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图书杂志审查会的老爷们看的”。

又作《忆·后记 注释①》、《梦与醉·序 注释①》、《控诉·前记 注释①》、《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补注》、《旅途杂记·前记 注释①》、《我的故事 注释①》。

获悉电影界成立《鲁迅传》摄制组，与夏衍、茅盾、许广平、周建人、杨之华、周扬、阳翰笙、邵荃麟、陈荒煤被聘为顾问团成员。以群、陈白尘、柯灵、杜宣为剧作组成员；陈鲤庭任导演；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

广平、于是之饰范爱农、蓝马饰李大钊、孙道临饰瞿秋白、卫禹平饰陈源、白穆饰段祺瑞、石羽饰胡适，加上韩非、谢添等组成摄制组。后该片因故夭折。

获悉《憩园》被香港改编成电影《人伦》，由李兆龙编剧，李晨风导演，吴楚帆、白燕等主演。此片曾列入第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回顾展。

接受全家迁往北京的朋友赠送的一条日本种小狗，“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好”，“我的儿子也很高兴”，“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



一九五九年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俄文版《春》、《秋》和《巴金小说集》等。



自责写《憩园》和《第四病室》时
“不能以阶级的观点看问题和分析新生活”。

赞“北京是永远不落山的红日”、赴
朝是“在仙泉里洗了个澡”。

被选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
副主席。

回故乡成都住四个月，探亲访故居，
静心创作了多篇小说。

五十七岁

一月一日 作《让我们笔尖上开放出友谊的花朵——给波列伏依的回信》，载《峨眉》二月号。歌颂中苏人民友谊。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散文《愿和你们分享快乐》。

一月二十五日 作散文《春光无限好》，载二十八日《文汇报》。

二月十一日 作随笔《谈 上海英雄交响曲》，载《大众电影》第三期。云大型纪录片《上海英雄交响曲》“从头到尾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最吸引人的还是那几十个英雄人物”。

二月十二日 任上海市教育与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二月十三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以及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政协上海市委主席陈丕显和苏联驻沪总领事叶里沙维金先后讲话。

二月十四日 发表随笔《中苏友谊，万古长青》。晚，出席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庆祝会。

二月十七日 任上海市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筹备会副主任委员。到车站迎接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为团长率领的苏中友好代表团，晚出席宴会。

二月二十日 与石西民等到机场欢送苏中友好代表团赴京。

二月二十五日 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的在沪会员大会，并致开幕词。学习和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精神。

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彼得罗夫。

二月二十九日 作《巴金文集 第十三卷后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版《巴金文集》第十三卷。自责写《憩园》与《第四病室》时“不能从阶级的观点看问题和分析生活”。

三月一日

在《上海文学》三月号上发表报告文学《王林鹤同志》。叙述沪光科学仪器厂二十九岁青年工人王林鹤经过三百七十一试验，终于制成一万伏高压电桥的先进事迹。

与萧珊接待在南京《雨花》上受批判的杨静如，并在二楼大书房里备着熊熊的炉火，谈到半夜。仔细询问杨被批判的全过程，并给她以安慰和勉励。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有需要托办的事，请不客气地提出来

等。

三月六日 致信方殷。

三月九至十五日

九日离沪，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去云南昆明、个旧锡矿等处视察，途中游览了石林；在个旧金湖宾馆住了六天；“下过井”，“找寻同我在小说中描写的类似的遗迹”，参观“矿工今昔展览室”，还和“五位矿工”“同去京剧院看《杨八姐游春》，看到皇帝出洋相和杨八姐骂昏君的时候，大家笑得多高兴”。出席矿上召开的座谈会，认真作笔记。听完李鑫烈士的事迹介绍后，请负责接待的李汉柱代买一束鲜花，献给烈士。后获悉烈士墓尚未修筑，遂作罢。

在昆明和个旧致萧珊信二封。告之“这里到处都有你的足迹”，希望下次有机会一起来看看这里的大变化等。

三月二十日 抵沪。

三月二十四日 散文《个旧的春天》载《收获》第二期。云个旧的工人们把“春天装饰得更加美丽”。

三月二十七日 离沪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

三月二十九至三十日 在京出席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预备会，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三十日，在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被选为大会执行主

席之一。

三月 在京致萧珊信二封。告之北京火车站雄伟而漂亮，人民大会堂的确富丽堂皇；为李小林买了大花兔、为李小棠买了大红兔等。

四月四至十日 出席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会和闭幕式。

四月十一日 出席全国文联第四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今年五月召开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四月十二日 自京返沪。在京致萧珊信二封。告之因记不清阳历和阴历的换算，给老太太打祝贺生日的电报时，发现已错过日期；感受到城市人民公社的高潮来了等。

四月十三日 主持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的会议，并致开幕词。以群和孔罗荪分别就当前文艺理论工作和文艺思想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四月二十三日 致信方殷。

四月二十七日 作散文《为北京歌唱》，载五月一日《北京日报》。云“北京是永远不落山的红日”，是“力量的泉源”、“幸福的泉源”。

四月二十九日 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上海市各界四十万人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支援南朝鲜人民爱国正



义斗争的大会。

四月 参观上海吴淞区张庙一条街。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赞歌集》。

五月八日 抵杭州，下榻华侨宾馆，上午游湖游山，下午读书写文章。写一篇发言稿，准备在两个月后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言。在杭州西湖“虽然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坐在书桌前写文章，但“写不上十个字就涂掉，好像自来水笔有千斤重”，动不了它。

五月十一日 作散文《忆个旧》载《上海文学》六月号。

五月十四日 出席上海市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

成员。

五月二十五日 致信沙汀。告之从北京回来一直在开会，一个月中除了发言稿外，“什么文章也没有写”，“相当疲乏”；并告吴先忧“已有信来”。

五月二十八日 致信彼得罗夫。

五月 在杭州致萧珊信四封，告之在杭州情况，邀萧珊和孩子们来杭州玩等。

六月初 从杭州返沪。

六月十九日 在《文汇报》发表杂文《对美帝国主义的警告》。认为艾森豪威尔“一贯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手段”，“是头号战犯”。

六月二十二日 主持上海各界一千多人举行的盛大集会，热

烈欢迎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苏步青、贺绿汀、以群、孔罗荪以及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出席了会议。

六月二十三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把绞索拉得紧些，再紧些！》。云艾森豪威尔的菲律宾、日本、台湾海峡之行，受到当地“群众的包围”，绞索“拉得更紧了”。

六月三十日 致信方殷。告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笔写《群》。

六月下旬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杭州之行，云西湖是个大公园，在那里休养是难得的幸福等。

六月 当靳以逝世大半年、《收获》出满三年时，“中国作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三日巴金右二主持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会议后，与孔罗荪左二等合影。





巴金 右 与毛
泽东 左 握手，中
为周信芳。

协派人来商量停刊的事，说是纸张缺乏，我感到意外，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也无话可说。……这一次又轮着我来结束他按指靳以创办的刊物。想想，我有些难过。不过我觉得少挂一个名，肩上的负担也轻一些。张春桥他经常是我们的‘顶头上司’的阴影就像一只黑蜘蛛在我四周织成了一个大网”。

七月十三日 作散文《朝鲜的梦》，载《人民文学》八月号，把朝鲜战场比做“仙泉”，几次赴朝是“在仙泉里洗了澡，即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可以洗掉一些思想中肮脏的东西”。

七月十五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收获》停刊等。

七月十七日 抵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下榻西郊西苑大旅社。

七月二十二日 到京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出席了大会。陆定一代表党和政府致祝词，郭沫若致开幕词，周扬作《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茅盾作《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晚上遇刘白羽，获悉沙汀“身体不好，又因写不出文章着急”，遂致沙汀信。云“我劝你不要着急，创作不是一时的事。先把身体养好再说。有空改改《困兽记》和短

篇，这也是一件工作。你计划中的长篇一定会写出来，而且一定会写得好，你应当有勇气，也有信心”。

七月二十三日 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全体代表。晚上，参加了周总理为参加文代会代表举行的联欢晚会。

七月二十六日 发表杂感《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载《文艺报》第十三、第十四期合刊。认为作家要把大批涌现的先进事物迅速反映到作品里来；又以自己为例，说明作家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否则，分不清现象和本质。

七月 致萧珊信四封。告之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想念你们；与孔罗荪、沙汀游西山八大处等。

八月十三日 下午，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郭沫若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巴金与茅盾、周扬、老舍等被选为副主席；茅盾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与周扬、老舍等被选为副主席。

八月十五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万古长青的友谊》。云“在朝鲜过的日子”是“我的一段最幸福的生活”。

八月二十六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会议结束后，携萧珊及孩子们到北戴河休养。

八月

在美国《主流》杂志八月号“中国专号”发表散文《致美国人民》。参加完第三次文代会，携全家去北戴河游憩数日后返回上海。

致萧珊信三封，嘱萧珊鼓励靳以的女儿南南要保持乐观的精神和坚持锻炼，并在北京托曹禺等为南南多方联系治疗的事等。

九月五日 作短篇小说《副指导员》，载《上海文学》十月、十一月号合刊。歌颂“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牺牲或继续工作的战士的崇高精神。

九月二十日 致信沙汀。告之因出席会议，入川日期推迟。“我决定十月四日离沪，经过西安，可能耽搁一两天”；“下月

上旬到成都时，有一位文联的干部到车站接我就行了”；又云“先忧兄要的《毛选》第三卷二册和打火石都已买到，由我带去，请勿念”。

九月二十二日 前往华东医院进行体检，身体很好。

九月二十五日 出席上海统战部召开的会议。

十月二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去四川可以安静地写写小说等。

十月四至七日 从上海到西安，住人民大厦。六日、七日两天由柯仲平夫妇和胡采陪同参观了华清寺、捉蒋亭、碑林、半坡遗址、大雁塔等名胜古迹，听了秦腔。

十月八日 入川，看到了秦岭的景致，想起了唐诗中的“云横秦岭家何在”的佳句。

十月九日 抵成都，由成都市市长李宗林安排在学道街招待所住四个月，安排得不错，天天吃家乡菜和成都的小吃。住的地方非常安静，读书作文都适宜。这期间，与吴先忧、沙汀等老朋友及川剧院的编导、演员中的熟人来往颇多。修改《寒夜》等小说，还看望了八十多岁的姑母李道源，与刚刚辞职回家的表哥濮季云一同到公园喝茶。当表哥生病时，让侄女骑车送去挂面，后来从一位堂兄弟处获悉“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

有追悼会”。“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感激和歉意啊！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表哥死后，不敢去看姑母，因为“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

十月十一日 致信李小林、李小棠。告之要“爱劳动，能吃苦，对人客气，什么事都自己动手”、“要听妈妈的话，要尊敬婆婆”等。

十月十五日 在成都，作短篇小说《回家》，载《解放军文艺》十一月号。描写志愿军战士李明与汪永身负重伤还抓了一个“舌头”回到“家”里的事迹，表现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十月十八日 步行去永兴巷访问著名画家傅抱石，与江苏的国画家们到草堂寺、武侯祠、望江楼玩了一天。

十月十九日 下午，沙汀来，同去芙蓉餐厅吃晚饭，李劫人请客。晚上，与张秀熟同去人民剧场看川剧。

十月二十七日 由沙汀转来三封电报，获悉继母胃病久治不愈，转患肝癌，已于二十六日病逝，心里很难过，因为一直在想让她回成都看看的愿望，竟成了空话。立刻打加急电报给萧珊，云“电悉，极哀痛，殡葬事请与弟妹等商量，妥为办理，详情望速函告”。后知兄弟李济生和萧

珊等已将继母遗体安葬于万国公墓。

十月

再去正通顺街，连残留的“藜阁”也找不到了。老家旧址经翻建成了战旗文工团的宿舍。

致萧珊信十一封，告之离沪后，到西安及入川后的创作、生活、友情，表示“小说每天在写，写得不多，但渐渐上了轨道。……关于《群》我也常常在考虑，我只要身体不坏，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表达了对继母病逝的哀痛等。在十一日给萧珊的信中附信致李小林、李小棠。告之“很想念你们”，希望去掉娇气和骄气，在新中国做个好学生，好公民。嘱李小林不要在马桶间和梳妆台前浪费时间、李小棠做作业不要粗枝大叶等。

十一月五日 得萧珊信，获悉她和李济生、李采臣、李瑞珏、李琼如等商量办理老太太后事的详情。由李宗林安排，迁到学道街七十六号，离张秀熟住处近。

十一月十八日 作短篇小说《军长的心》，载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文学》第一、第二期合刊。描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朝鲜战场上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

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军长的心 附记》，载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文学》第一、

第二期合刊。云一位少将同志的一段谈话令人难忘。他曾对作家说，“你们作家用笔写，我们用子弹、用手雷、用大炮写，你们口诛笔伐，我们夺取山头”，这些话促成作者写成了这篇小说。

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收到你的信很高兴”，“笔要常用才行”等，并为不能参加李小林的生日聚会而感可惜。

十一月 致萧珊信九封。告之多种刊物约稿、催稿事和家事。如：粮票已解决，老太太的事情你们安排得很好，完全放心；嘱萧珊多劝慰瑞珏，让她节哀；建议以后家里可以少种花草，种点菜；为办理父母等六位亲人迁葬事，嘱萧珊寄四百元钱来；为李小林、李小棠刻了图章等。

十二月二日 作短篇小说《李大海》，载一九六一年《上海文学》一月号。描绘一位志愿军英雄“只手生擒六十三个敌人”的惊人事迹。

十二月六日 在学道街住处，请炊事员下挂面请大嫂和侄女们，服务员设法买到麻婆豆腐、粉蒸牛肉和肺片等川菜，吃得很过瘾，也算是与亲属一起补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十二月七日 在张秀熟家吃晚饭，与李劫人、沙汀、李宗林畅谈畅饮，回来后，还写了两个

小时。

十二月十日 作短篇小说《再见》，载一九六一年《四川文学》第四期。叙述一个双目失明、身残志坚的普通人的动人形象。

十二月

校改《第四病室》等小说。在成都，曾致信沙汀，托沙汀“麻烦文联的同志”代购八张四川歌舞团的票，请人看《刘三姐》，谢绝赠送照顾，云“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又创作中篇小说《三同志》，写了五万字光景，未完篇。

致萧珊信七封。告之在成都创作及生活情况。希望明年全家来成都，顺便游览青城山和峨眉山；嘱萧珊购书、寄书和订杂志；原想为老太太立较大的墓碑，后来觉得老一套的看法应该丢掉，必须彻底抛弃，才能有真正的进步；给李小棠寄上香烟壳三张等。致李小林信二封。告之回沪后补送她和弟弟生日礼物。回忆十五年前李小林出生时的情景，表示“过去爸爸多喜欢你，现在爸爸仍然很喜欢你”，并寄语女儿：多想到大家、集体和“公”，少想到自己、个人和“私”，做个好学生和共青团员等。



一九三五年离开东京后第一次重访东京，并游览上野、镰仓等，结识井上靖、中岛健藏等日本文化名人，结下了终生友情。

与萧珊等家人在黄山小憩和游览。

写了数篇“创作谈”，剖析自己几十年来的矛盾心理：“追求光明”，却又为“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痛苦等等。

五十八岁

一月二十九日 与大嫂、侄女国莹等到磨盘山，开棺后见到去世四十七年的母亲脸色如生。父亲脸色黑红，睁眼露牙。但是，不觉得可怕，晚上也没有做噩梦。当天遗体火化，三十一日在公墓安葬。事后对提供帮助的李宗林和市人委表示感谢，但是觉得政府对自己的照顾太多，感到不安和受之有愧。

一月

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继续校改《寒夜》。

致萧珊信八封。告之创作中篇的进展情况，写了八万字左右，只是搭了一个架子，还要添些血肉；写内在的东西多，而情节写得少，要花功夫修改；觉得改《寒夜》花了功夫，虽然小说有不少缺点，但是颇喜欢它。修改时，想使曾树生的矛盾的感情和心境写得明白些；希望回家时看到萧珊和孩子们的好身体，不是看到留给自己的好饮食等。

二月四日 致信萧珊。告之参观盐都和内江的感受：“看得越多，跑得越远，越觉得我们国家了不起，越觉得总路线、大跃进了不起。”

二月初 把《寒夜》的校样自成都寄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月七日 找侄女们来吃中饭，晚上到文联辞行。八日晚，由李宗林送至成都火车



一九六一年
二月 巴金 左
在成都与李致
右 合影。

站，乘车到郑州，逗留二日，十三日上午返沪。由于在郑州受寒，返沪后又拔了牙，发烧病倒。

二月二十二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卢蒙巴总理的血决不会白流》。说“他的血洒在非洲肥沃的土地上，使非洲的自由火炬燃得更亮，举得更高”。

三月一日 致信彼得罗夫。从帮助自己搜集托尔斯泰九十卷的全集，感到彼得罗夫友情的可贵。

三月六日 致信任干。

三月八日 下午三点抵京，下榻王府井大街华侨大厦。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开会、写发

言稿。作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前的准备。

三月十八日 晚，坐京粤直达车到广州。二十二日到香港。二十四日，下午飞抵东京羽田机场上空，机场上数不清有多少面五星红旗在迎风招展。“我的心突然跳得厉害了，我大声说：‘我们的国旗！’同志们一齐把眼睛掉向窗口。我觉得自己的身上凭空添了一股力量。我真想跑到红旗跟前，一一地亲着它们。”着陆后，受到日本友人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这是一九三五年离开东京后第一次的访问，感到“东京变了”，“人也变了”。

三月二十七至三十日 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在开幕式上发表讲演《在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上致词》。云亚非人民“有一个最美好的理想 那就是从世界上消除一切压迫、剥削、罪恶、灾难，使整个世界充满自由、和平、友爱、幸福”，而“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读者们的指路明灯”，希望“世界上一切有良心有正义的作家携起手来，共同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诗篇”。在东京出席会议期间，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积雪未化，曾前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后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长、国际笔会副会长的井上靖寓所访问，在楼上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并接受了井上的赠书。“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二十多年“友谊的开始”。此外，会议期间，还初识日本著名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日中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中岛健藏先生，并一同游览上野公园和东京郊外的青山公墓等。从此，两人也结下了终生友谊。

三月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在京见闻，如曹禺在修改《卧薪

尝胆》，《王昭君》已想好大半；嘱萧珊将四月份的粮、油、肉等票领出来，待自己回国时上缴；邮票四张给李小林、李小棠等。

四月上旬至下旬 由龟井胜一郎及旅日华侨小韩翻译等陪同，坐观光车在富士山游览了一天。“富士山对我是十分亲近的，我仿佛很早就认识它”。访镰仓，下榻和光旅馆，结识日本当代年轻作家有吉佐和子，听她讲述了许多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带来悲剧的故事。“我真想站起来，跑出客厅，冲到雨里，奔

到街上，高高举起拳头，高声大叫：‘制止使用原子弹的罪行！’”时至中旬，游上野，参观犀牛馆，与当地华侨结下深厚友情；临别得华侨馈赠的精致点心。又高兴地参观日本文化古城金泽市，与龟井等在兼六公园樱花树下漫步交谈。二十一日，由日本著名作家木下顺二陪同，重游东京上野公园。直至下旬，出席华侨举行的大型送别宴会和日本朋友们的送别酒会，回国途中，经香港，住三天，始获悉在香港有人擅自翻印自己的旧作。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日巴金在亚非作家会
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上讲话。



四月二十五日 从香港抵广州。致信萧珊，告之已回国，次日抵从化作小结等。

五月四日 由广州抵沪。旅途劳累，眼睛又发炎，暂停写作。

五月十一日 接由中国作家协会转来的一封寄自香港的信，阅后获悉信的作者系香港汉华中学和中业专科学校教员、香港南国出版社和侨光出版社语文丛书主编余思牧。余曾著有《巴金杰作论析》等专著，畅销海外。现应南国出版社负责人林永铭、郑应彬之约，拟撰写《作家巴金》一书，更全面地论述巴金的生平及创作。余来函恳请支持和帮助。又从信中获悉，自一九五二年起，南国出版社一直通过三联书店，租用前开明书店战前版的巴金文集、小说集的纸型来印行旧作。

五月二十四日 抵杭州休养、写作。方令孺、任干等来接，住花港招待所，见到草明和杨西光等。住处到处都是鸟叫声，窗外满眼绿色，续写《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五月二十六日 作完散文《我们永远站在一起》，载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云访日一个月，与日本朋友建立了“永远、永远切不断的”“真挚的情谊”。

五月二十七日 致信余思

牧。表示“放弃版权”，但希望能照改定的文集本的内容翻印，《第四病室》、《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点滴》等书希望暂时不要重印，又希望将重印的旧作各寄一册来，“想留着做个纪念”；对余信中提出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一、您记错了，我并没有在茅盾先生主办的文艺讲座上讲过课，我从来就不会讲课”；“二、您为南洋读者写”，“只要没有故意的歪曲，我不会介意”；三、对书名我无意见”，“我出生年月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父亲叫李道河，母亲姓陈，她的名字我也弄不清楚。”

五月

拟往黄山休息一段时间，但获悉日本作家访华代表团于六月抵沪，只得取消旅行的打算。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抵杭州情况，嘱萧珊带孩子们来杭时住杭州饭店，嘱萧珊在文化俱乐部买一条烟带来等。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访日结束后，仍想去杭州写作；将查到的《文丛》寄上等。

六月上旬 在杭州，作短篇小说《团圆》，未完篇。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写作期间，每天晚饭后散步，有一次路过京剧名演员盖叫天的生圻前，遇见盖老坐在刻着红字的墓碑前，读着牌坊上的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

作惊天十字坡。”印象深刻，肃然起敬，遂互相握手问好。

六月十五日 在杭州，作散文《从镰仓带回的照片》，载《上海文学》七月号。通过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作家“诉述日本原子病患者的苦难”，愤怒控诉原子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强烈呼吁“制止使用原子弹”。

六月中旬 在杭州作《飞吧，英雄的小嘎斯！》，未完篇。

六月二十一日 致信沙汀。告之在杭州创作情况；因龟井胜一郎这个月底要来，请沙汀“写篇散文”表示欢迎；并告已“读了谢、叶二公的文章”即谢冰心的《日本归来》和叶圣陶的《樱花精神》。

六月二十二日 下午，由杭州返沪。

六月二十三日 上午，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全体委员会。金仲华主持，改选了“和大”分会的委员和领导机构。金仲华被选为主席，巴金与周谷城等七人被选为副主席。

六月二十四日 致信余思牧。托余“转告南国出版社，以后千万不要再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版我的任何一本旧作”。

六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小说写了两千字，答应刘白羽陪日本代表团走几个地方，打算提前返沪等。



七月三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寄上托人抄来的《家》和《春天里的秋天》在《时报》连载的时间。

七月四日 出席上海市市长为欢迎以江口涣为首的日本作家访华团、以河崎夏为首的日中友好访华妇女代表团以及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副主席小笠原贞子举行的酒会。出席作陪的还有金仲华、吴强等各界知名人士。

七月十日 到机场欢送以江口涣为首的日本作家访华团离沪赴广州。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吴强、杜宣等。

七月上旬 收到余思牧来信及香港出版的旧作若干。

七月十一日 出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上海市分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晚间举行的宴会，欢迎以龟井胜一郎为首的日本文学代表团，并在宴会上讲了话，祝愿中日文化界的交往日益密切。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吴强、孔罗荪、以群、魏金枝、杜宣等。

七月十二日 在寓所会见龟井胜一郎及井上靖，畅叙别后。

七月十三日 到机场欢送以龟井胜一郎为首的日本文学代表团。夜，致信余思牧。云：“印刷装帧都不错，我不希望用旧纸型重版我的旧作。我特别不喜欢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的那几本”，“因为那些纸型错字多，不妥当的字句也多”，“《家》、

《春》、《秋》中改动也很大。有些缺点我自己已改正了，港版还一直替我宣传，我心里总不大痛快”。又云：“谢谢您送给我那许多大作，您写作上的努力的确值得钦佩”。

七月二十日 作完中篇小说《团圆》，载《上海文学》八月号。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东和他的女儿、文工团员王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离散、在抗美援朝前线重逢的故事，描写主人公在处理骨肉亲人关系时的动人情景，热情歌颂“最可爱的人”纯洁高尚的品德。一九六三年该小说被毛峰、武兆堤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一九六四年摄制成电影，改名为《英雄儿女》。

七月二十七日 与金仲华、杜宣、任干等到达黄山休养。四人同路上山，穿棉大衣过了几天冬季的日子。后来下山，住在半山腰的紫云楼里，各自搞创作。

七月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抵黄山后，有脱离人世的感觉，觉得没有意思等。

八月上旬 在黄山休养时与著名电影演员金焰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

八月十五日 应诗人远千里之约，在黄山作完短篇小说《飞吧，英雄的小嘎斯！》，载《河北文学》十月号。以第一人称“我”的见闻，叙述一位英雄司

机舍己为人的事迹，表现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八月中旬 在黄山应作家出版社约请，编完短篇小说集《李大海》。

八月十九日 在黄山紫云楼，作《李大海 后记》，载十二月作家出版社版《李大海》。云集子中“都是怀念我所敬爱的英雄朋友的文章”。

八月约二十日 在黄山与萧珊及孩子们欢聚，获悉方令孺住紫云楼下面的黄山宾馆，几乎每天都到她那儿去探望、恳谈。

八月约二十七日 见孩子们很高兴，特别是儿子李小棠很感兴趣，遂送萧珊和孩子们登山游览。

八月二十九日 致信沙汀。告之近况，云“黄山的确不错，我们在这里也过得好”。

八月三十日 下午，听下山回来的萧珊及孩子们讲述登山的趣闻。

八月 致萧珊信二封，建议坐船到黄山等。接萧珊信，获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组稿事，以及邵可侣来信要求巴金帮他找回五十二年前丢在中国的女儿，说服他女儿与他恢复父女关系等。

九月上旬 携萧珊及孩子们从黄山回上海。并在寓所接见孔罗荪和上海文化局博物馆的同志，答应将一些原稿赠博物馆保

存。

九月十一日 致信沙汀。云“目前在家补写中篇的‘尾声’，希望在一个月内搞完这个拖久了的工作”。“中篇”即《三同志》。

九月二十五日 出席并主持上海市文学艺术界和其他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友谊电影院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大会，并作《鲁迅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讲话，载二十七日《解放日报》。颂扬鲁迅先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及先生完美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会后与石西民等人到虹口公园瞻仰了鲁迅墓。

九月二十七日 任上海市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备会主任为陈望道。

九月三十日 至机场迎接由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格·华·罗曼诺夫率领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市委书记陈丕显、中苏友协会长石西民等亦到机场迎接。

九月底 作完中篇小说《三同志》的《尾声》，约两万余字。因嫌过于粗糙，也因无时间修改，该小说长期未发表。

约九月 在上海国泰电影院附近遇到刚摘去“右派”帽子的黄裳，鼓励他说：“今后一切都会和过去一样的。”

十月三日 出席为列宁格勒代表团全体团员举行的宴会。陈丕显、罗曼诺夫分别代表双方讲

了话。

十月五日 应邀出席苏联驻沪总领事柯立朝为列宁格勒市代表团访问上海举行的宴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了宴会。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以及上海市中苏友协会长石西民、副会长陈望道等亦应邀出席。

十月十四日 致信余思牧。云：“您这次寄来的竟成书局出版的我的一些旧作，很糟，完全是翻版书的面目，不负责任地乱编一通，拿我的名字欺骗读者。我翻了一下，很不愉快。”

十月十六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在上海与克里夫佐夫见面的愉快情景，准备寄上从成都带回来的祖父的诗集《秋棠山馆诗抄》、亲祖母写的诗词《晚香楼集》、继祖母写的诗词《意眉阁集》、小姑妈写的《绮霞楼诗存稿》等。

十月十九日 上午，前往虹口公园鲁迅墓前谒墓和献花，以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前往谒墓与献花的约六千多人。

十月二十五日 作《谈第四病室》。叙述写作《第四病室》的经过，认为“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旧社会的缩影”，人物有的有模特儿，有的是虚构。写作目的是“为了控诉”。

十月 与刘白羽晤面，获悉他身体不好，拟往扬州进行推拿

针灸治疗。在寓所接待日本友人三岛一先生，并在家设便宴。宾主开怀畅谈。临别时，三岛一被巴金夫妇的热情款待感动得要哭了。

十一月一日 致信沙汀。云“这两天患感冒”，并告之《三同志》有关情况：“中篇的尾巴共写下两万多字，九月底就写完了。我觉得你的意见很对，我打算搁一些时候再修改。主要的缺点是干巴巴，一般化。必须认真修改一遍。”

十一月七日 出席上海市各界人民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纪念会。晚，出席苏联驻沪总领事柯立朝举行的招待会。

十一月十二日 作《谈憩园》。着重讲《憩园》里人物的来历，杨老三以作者五叔为模特儿，小说中叙述者“黎先生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黎先生的朋友姚诵诗夫妇都是虚构的”，“杨家小孩也是虚构的”。

十一月十三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很喜欢彼得罗夫寄来的《屠格涅夫全集》四卷，尤其喜欢书信集，对研究有帮助等。

十一月十四日 参加在美琪电影院举行的上海市“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周”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周信芳、贺绿汀、丰子恺、黄佐临、白杨、赵丹等。会后，观赏梅兰芳主演的昆曲影片《游园惊梦》。



十一月二十日 作《谈寒夜》，载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作品》新一卷第五、第六期合刊。叙述创作《寒夜》的经过和题材来源。云男主人公汪文宣“不是真实的人”，但仿佛是“极熟的朋友”，过去“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又云“《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同情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也批评了他们每个人”。

十一月二十七日 作《谈新生及其他》。云《新生》“写了两遍”。第一稿“毁于战火”；第二稿写完了，原计划还要写《黎明》与《春梦》，但终未写成；又剖析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我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声嚷着要前进，过去的阴影却死死地把我拖住……”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谈自己的创作 小序》。云“这十篇‘漫谈’就像是这样流出来的十摊水”，“有人拿坛坛罐罐一类的东西放到龙头下面接住水，也许可以派一点点用场”。

十一月三十日 作《巴金文集 后记》。云“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写的作品全收在十四册书里面了”；“《文

集》虽然到第十四卷结束，可是我的笔绝不会放下”，“为了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

十一月 《巴金文集》第十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十一日 致信余思牧。云十篇创作谈“可以作为《文集》注解看”。“香港印的那些盗版书的确使原作者看见生气”，建议“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

十二月十二日 参加中国剧协上海分会举行的关于曹禺的话剧《胆剑篇》座谈会。

十二月十九日 致信沙汀。云最近“接待了崛田善卫的代表团”，是诗人“李季陪他们从重庆飞来”的，三岛一“这位老人特别热情”，“在我家吃过一顿晚饭”，又托沙汀代买几样礼品，准备赠送来我国访问的日本作家。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作散文《青野季吉先生》。叙述身患不治之症的日本作家青野季吉，当中国代表团拜访他时，他兴致勃

勃地介绍了从自己和别人生活道路中总结出来的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结合的经验，还抱病到机场欢送代表团。

十二月 中短篇小说集《李大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十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收到《俄罗斯人民生活》画册，表示感谢；表示以后要多写，希望能常有新书寄上等。

一九六一年内

获悉萧乾已摘去“右派”帽子，自劳动改造的唐山国营农场调往人民文学出版社搞翻译，遂致函萧乾嘱他好好接受教训，恢复工作后也决不可以放松改造。

与夏衍晤面，获悉他为香港进步电影公司改编《憩园》。同意他“力求忠实于原著，但……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作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如把原著中的男小孩寒儿改为女孩子；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场的黎先生，也删掉”的意见。



《李大海》
巴金短篇小说集等书影。



到海南岛看海瑞墓。

主持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致词，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云，自己的创作思想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

任赴日参加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 与方令孺等全国人大代表去广东视察。到广州，下榻羊城宾馆，参观了农民讲习所、红花岗烈士陵园，晚上看舞剧等。

一月十五日 去花县参观人民公社，在公社品尝木瓜、香蕉、荔枝干和龙眼干等，体会到广东农村欣欣向荣的好景象。

一月十六日 到海南岛，与方令孺等坐旅游车绕岛一周，在椰树林里散步。看过海瑞墓后，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 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夜，致信余思牧。

一月中旬 在海口等了两天飞湛江的飞机，大家心里不耐烦，晚饭闲谈时，听方令孺讲述自己抛弃富家生活“追求知识，自食其力”的身世。又到湛江参观访问。

二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在广州、海口、湛江、海南岛的见闻，希望萧珊带孩子们到广州过春节；嘱萧珊带粮票和一套制服，因为“我穿的那一套领子已经破了”等。

二月一日 从湛江市返广州，与昨天到广州的萧珊和孩子们欢晤。全家在广州欢度

一九六二年



春节。除夕之夜与不久将出国访问的冰心、杜宣、叶君健等人谈到深夜。

二月上旬 意外地接待了三十年代广东新会的朋友陈洪有，获悉老友叶非英被错划为右派，“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为此感到愤懑和不平：“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的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

二月约十日 率全家偕方令孺前往从化和新会住了几天。

二月十二日 致信沙汀。告之为欢送茅盾、夏衍出国，在广州过春节，以及与冰心等晤面之事。

二月十三日 从广州坐火车返沪。妹妹们说，巴金等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小狗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主人出来，又看到它向萧珊、孩子们“摇头摆尾”、“高兴、亲热的样子”，十分感动。

二月中旬 从广州回上海后，翻看三十年代《南国的梦》、《月夜》等旧作，联想到叶非英的死，为旧作中一些“漂亮的空话感到苦恼，……为了减

轻我的精神上的负担，我考虑写几篇回忆和怀念”。返上海后，在家阅余思牧寄来的《作家巴金》原稿。

二月十七日 将《巴金文集》第十二、第十三卷及短篇集《李大海》寄余思牧。

二月十九日 致信余思牧。云《作家巴金》原稿匆匆看完，很难提意见，只是在某些弄错事实或年代错误的地方加了简单的注解，又云手中没有照片；同意出版散文和小说选集。“只是我不大了解海外读者的需要”，请余提出一个初选目录，以作参考。“序言我可以写，但是至多



一九六二年巴金在上海寓所他的书房中。

不会过两千字。”

二月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告之与萧珊和孩子们在广州过春节的欢乐情景，并云愿与他分享等。

三月一日 在上海，作随笔《喜悦和感激》，载十三日广州《羊城晚报》。以抒情的笔调叙述在广州住一月的见闻。

三月九日 致信余思牧。“请转告社方负责人，我愿意免酬编选我的集子。请不要付版税或稿费，将来送我几本书就行了。我现在有的钱自己已经花不了，钱对我毫无意义。我只希望把工作做好。”

三月约中旬 会见《文汇报》记者，告之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完成的一部十多万字的新作《谈自己的创作》，是“为答复读者的来信而写的”。赴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三月二十至二十九日 二十日抵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和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下榻前门饭店，仍和沙汀同住。二十四日应夏衍邀请，陪阿尔及利亚作家吃饭，饭后访沈从文和顾均正。二十七日听取周恩来报告。二十九日听茅盾的报告。期间与冰心、沈从文、柯

灵、孔罗荪、赵丹、李初梨、严文井、叶君健、刘白羽等，或互访晤谈，或饮白兰地，或应李劫人之邀到全聚德欢宴、应严文井之邀到新侨饭店聚餐，或租车到百货公司，或去翠明庄看电影等。

三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在京开会等情况。

四月十六日 下午，出席人大第二届第三次会议闭幕式。会议通过了周总理所作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四月十七日 晚，出席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伟大的诗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各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也参加了大会。纪念会由郭沫若主持，冯至作题为《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的报告。会后放映纪录影片《诗人杜甫》，出席大会的还有陈毅、茅盾、赵朴初、何其芳等。

四月二十三日 致信余思牧。云：认为对《李大海》评语过分夸奖，只有《李大海》和《团圆》两篇“勉强可读”。“好久不写小说了，拿起笔总觉得它不听指挥”。

四月二十五日 致信余思牧。又作《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序》。自谦“我的小说都不是可以传世的佳作”，当年写作时“见识浅，了解生活不深”，但小说中“有我真挚的感情和鲜

明的爱憎”。

四月约二十六日 作《巴金散文选集序》。自云过去“幼稚，浅薄，粗心任性”，然而自认为“从未说过假话，……文章里也没有虚假的感情”，因为“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今天我仍然是这样”。

四月二十七日 致信余思牧。托余在港寻觅谈《家》、《春》、《秋》三篇文章的单行本。又致信方殷。

四月

在京期间，聆听了周恩来、陈毅关于当前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与周扬讨论目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及翻译等问题；与代表们相互访晤；并到冰心、沈从文家欢聚。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李宗林约请全家去四川小住，并游峨眉山，但是取决于李小林和李小棠的成绩好坏；会议一再因故延期，约十八日或十九日返沪等。

五月八日 主持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云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给文学艺术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五月九日 作杂感《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载《上海文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学》五月号。谈学习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一年和陈毅一九六二年三次关于文艺问题讲话的体会。云写作必须有“勇气和责任心”，但“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提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总是居高临下”，

“许多人（我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又云，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看到了广阔的大路”；表示“仍渴望创作中、长篇小

杰、吴强、郭绍虞、魏金枝为副主席，孔罗荪为秘书长，任干、芦芒为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到会讲话。大会结束时，巴金致词，云：上海文学队伍是一支兵多将广的大军，党对我们有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拿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争取文学创作上的大丰收。

五月十六日 主持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被选为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有于伶、赵丹、郭绍虞等十七人，委员二百一十二人。

五月十七日 出席上海市文化界在上海艺术剧场举行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俄国政论家、作家赫尔岑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大会，并致开幕词，称赫尔岑是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士，他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解放前，自己书桌的窗前曾经是一片黑暗，曾与书中的主人公一起度过苦难的日子；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者向我伸出手来”，我要“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奔向它们，与他们一起建设祖国大厦”。

五月十九日 将《巴金文集》第十一卷及新版《家》挂号寄给香港南国出版社余思牧。

五月二十日 致信余思牧。云：《家》、《春》、《秋》将来



巴金 左二 在上海寓所与儿子李小棠
右二 下棋，妻子萧珊 左一 和女儿李小
林 右一 观看。

“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这种人“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但是你“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谁不怕挨整呢”

说”。后来巴金说，当时“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没多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

五月十四日 出席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第三次会员大会，被选为主席，于伶、以群、刘大

如重排，希望能依照《巴金文集》本，排版格式喜欢排直行。

五月二十三日 主持上海文艺界举行的近百人座谈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并云毛主席的《讲话》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非常明确、深刻地帮助我们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五月二十九日 主持上海市文化界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并致开幕词。说“要继承和发扬我国文艺的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在会上作了题为《杜甫的生平与艺术》的报告，会后放映纪录影片《诗人杜甫》，出席纪念会的有金仲华、郭绍虞、魏金枝、俞振飞、孔罗荪等七百多人。

五月 致方殷信二封。希望《靳以文集》能早发稿，托购《叶尔绍夫兄弟》和《大波》等。

六月二日 出席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小说、散文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作家魏金枝、师陀、哈华、茹志鹃、陈伯吹、包蕾、任溶溶、任大星等十余人。当晚，出席上海市电影界举行的祝贺“百

花奖”获奖联欢会，并讲话表示祝贺。会议由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主持。会后观看了电影《魔术师的奇遇》。

六月四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准备编一本日本旅行的小册子，中篇小说则没有时间修改；女儿李小林想去四川看川剧、儿子想爬峨眉山、萧珊想看成都，于是打算暑假去成都等。

六月十四至二十一日 参加作协上海分会诗歌组连续举行的讨论会。与出席会议的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刘大杰和诗人周煦良、闻捷、芦芒等晤谈。讨论时，云自己“不是诗人”，却喜欢读诗，“希望能看到反映英雄时代的诗篇”。

六月十五日 接到从东京寄来的龟井先生的信。获悉龟井已写完十三万字的中国见闻记。晚，与袁雪芬、应云卫、孔罗荪、以群、刘厚生等观看了江西省赣剧院一团来沪演出的《西厢记》。

六月十六日 作散文《富士山和樱花》，载《上海文学》七月号。记叙日本人民在反帝斗争中昂扬的精神面貌 抒写了中日两国人民像富士山和樱花那样永久的友情。

六月二十四日 致信余思牧。

六月底 作散文《向着祖国的心》，载《上海文学》八月

号。从看日本拍的照片写起，叙述在日的华侨“心向着祖国”。

约六月 下午两点，在上海文艺会堂大厅热情接待天津青年作家文放，云“要写你最熟悉的东西”，“写你心中非说不可的那些话”，希望文放将“朝鲜战争题材……与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写”。谈话至五点多钟，送别客人 到华东医院看病。

七月四日 在香港《文汇报》发表随笔《优美的艺术享受》。

七月十四至十八日 被提名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与周信芳、曹荻秋等九人为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会议。

七月十九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寄上《近代文学史稿》等。

七月二十一日 抵京，将率中国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下榻北京饭店。

七月二十二日

与曹禺一家逛中山公园，谈起欧洲人现在不要孩子，担心有了孩子就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觉得这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



的想法，他和曹禺却觉得带孩子们一起出去过暑假是一种幸福。

致信沙汀。

七月二十五日 任赴日参加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香港乘飞机前往东京。获悉被列为生物学家朱洗治丧委员会委员，郭沫若为主任。

七月二十八日 在香港飞抵东京前，致信余思牧。

七月二十九日 飞东京。

七月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抵京后见到曹禺等朋友的情况。

八月一至七日 在东京举行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预备会议上讲话，指出核战争的威胁来自帝国

主义，代表中国人民，对站在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最前线的日本人民致最崇高的敬意。四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正式会议。会议期间，原想到广岛看看，因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只好托前往广岛的杨朔“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当做珍品收藏着”。十年浩劫中抄家时，那一扎明信片也被抄走了。六日，参加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日本宗教者和平协议会在东京举行的原子弹、受害者追悼会，并讲了话。下午，出席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闭幕式。晚，在闭幕式前通过了《东京宣言》。

八月八日 下午，偕杨朔同访龟井胜一郎家，得龟井新著《中国之旅》一册。晚，由龟井陪同，前往“食道横町”的“秋田家”，与中岛健藏和白土吾夫等日本友人相聚“将近三个钟头，不仅酒足饭饱，而且无所不谈，既融洽，又畅快，热烈友好的气氛使人陶醉”，“我因为这个美丽的夜晚”而“感谢中岛和龟井两位敬爱的友人”。

八月九日 与杨朔一起前往一家中国饭店，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举行的宴会。与龟井胜一郎、中原虚彦、千田是也、藏原维人等日本文学界人士欢聚。

八月十日 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康永和等应邀出席日中友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上，巴金发表讲演。



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中午举行的宴会。与康永和等人应邀出席了东京华侨总会举行的欢迎会。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致词表示衷心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

八月十一日 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告别会，并作告别演说，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愿中日友好永远发展下去。

八月十二日 率中国出席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乘机回国，日本各界著名人士及华侨代表一百多人到机场送行。

八月十二日 率团飞抵香港。从香港新华社罗明林经理处得到余思牧的信和书。

八月十四日 自香港返广州住爱群大厦，致信余思牧。云因在香港“错过见面的机会，颇觉歉然。不过我相信以后一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畅谈”。

八月十五日 因要赶写访日总结，及作大会发言，自广州坐火车赴京。

八月十六日 晚，率中国代表团到达北京。

八月十八日 致信沙汀。告之访日期间近况 在东京住了半个月，每天从早晨忙到晚上，生活相当紧张，“斗争十分尖锐，但是也有胜利的喜悦”。

八月二十七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热烈庆贺最近在东京举



秋田雨雀。

行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胜利而举行的集会，并讲话。

八月二十八日 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散文《“不死鸟”的雄壮歌声》。叙述与《骷髅的跳舞》的作者秋田雨雀的友谊，赞颂秋田“完美的人格”和他“歌颂生命和光明的‘不死鸟’的战斗精神”。

八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文集》第十四卷。

九月一日 在日本《日中文化交流》第六十三号发表杂文《中国人民发言了》。

九月十二日 作散文《藤森先生的笑容》，载《人民文学》十月号。

九月十七日 出席上海市各界二千五百人在市委大礼堂的集会，热烈庆祝我军击落U₂型飞机的重大胜利。在会上致词说这一胜利，“显示了我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伟大力量”。

九月约十八日 致信沙汀。云“《十万个为什么》……是我们送给你的孩子的”。

九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倾吐不尽的感情》，载十月一日上海《文汇报》。叙述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闭幕式上，一百名日本代表团团结一致，粉碎右派打手破坏会议阴谋的经过。

十月一日 致信方殷。

十月三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巴金文集》出齐，做完了一件事，下月准备修改中篇小说《三同志》等。

十月四至六日 出席上海市各界欢迎中越友好代表团大会。与金仲华一起到机场迎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六日晚，与金仲华出席上海市和委会举行的宴会。

十月七日 接到余思牧自香港寄来的信及《灭亡》、《火》、《怀念》各三册。



十月八日 致信余思牧。云中篇小说《三同志》去年年底以前就写好了，一直没有时间修改它。

十月九日 与金仲华等欢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十月十二至十五日 与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等各界人士到车站迎接由朝鲜内阁保健相崔昌锡率领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晚，出席曹荻秋举行的欢迎宴会。周谷城、孟波等也出席作陪。十三日晚，与孟波等出席上海各界热烈欢迎朝鲜贵宾的会议。十五日，与孟波等到机场欢送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离沪返京。

十月十四日 作散文《“愤怒的内滩”》，载《上海文学》十一月号。

十月十八日 作《看了“松川事件”以后》，未完篇。

十月十九日 作完散文《看了“松川事件”以后》，载一九六三年《上海电影》一月号。夜，致信余思牧。托余在港代买一册“上海书局”出版的《郁达夫诗词钞》。

十月二十日 作散文《致芹泽光治良先生——倾吐不尽的感情 代序》，载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香港《文汇报》，题为《谈友情——致芹泽光治良先生》。叙述与芹泽光治良的友情。说友人一年前的一句话“人

民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作家的喜怒哀乐”，对自己有很大的“鼓舞力量”。又作杂感《古巴必胜》，载《上海文学》十一月号。

十月二十五日 应邀出席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代理馆务金寿钟副领事晚上举行的招待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十二周年。曹荻秋、胡厥文、陈望道等也应邀出席。

十一月四日 获悉吴先忧丧葬情况。

十一月六日 到报社递交了支持古巴人民坚决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保卫祖国独立和主权斗争的声援信。递交声援信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还有周信芳、熊佛西、贺绿汀、丰子恺等。

十一月七日 与陈望道等出席上海各界在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举行的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纪念会。又靳以逝世三周年，与孔罗荪、任干、萧珊前往万国公墓扫墓。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与萧珊乘沪广通车赴杭，方令孺带小铃子和交际处的人接站。

十一月三十日 与方令孺去九溪十八涧饮茶晒太阳，方令孺请吃午饭。后与萧珊游湖去三潭印月。与方令孺共进晚餐。饭后，同去东坡剧院观看梅葆玖主演的《凤还巢》。

十二月一日 与萧珊同去平湖秋月喝茶，十一点去湖心亭小坐，然后去岳坟参观菊展，又步行回杭州饭店。

十二月二日 与方令孺在杭州车站作别，互相感到依恋不舍。抵家，李小林十分高兴。

十二月七日 与萧珊到永安公司购贺年卡，然后到文化俱乐部吃午饭。下午，乘作协小车，与吴强、以群前往锦江小礼堂陪郭沫若看金彩凤主演的越剧《碧玉簪》和木偶片《红云岩》。观后觉得金彩凤演技甚佳，扮相漂亮，但是戏的封建味道太重。男主角太恶劣，实在可恨。

十二月十二日 去外文书店和上海旧书店购书。寄日本友人贺年卡六份。与萧珊去景华新村朱雯和罗洪家吃晚饭。其间，师陀来电话，谈及与魏金枝为晒台引起的纠纷。回家后，读《三同志》，认为只有最后几页可读，决定读完第二遍后再考虑修改意见。

十二月十三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正在校改旧译作《处女地》，并借此念俄文等。

十二月十五日 上午，收听《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晚上陪萧珊和孩子们去文艺会堂，家人去看电影，巴金与陈鲤庭等在茶室聊天。回家后，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

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觉得“文章写得真好，说出了我们想说却无法说得清楚明确的话。一读再读，教人精神振奋，意气昂扬。……高举革命和团结的大旗前进，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十二月十八日 致信余思牧。告之《作家巴金》的校样已看完第一部分，曾根据《巴金文集》第十、第十一卷改动了一些引用文字，“我还改了少数排错的字。请您看看是否妥当”。

十二月二十五日 早晨八点，得成都统战部电话，惊悉著名作家李劫人病逝。同意参加治丧委员会，并发唁电：“惊悉劫人同志逝世，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遂拍去唁电以示哀悼。深为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想到这位热血侠肠的好人，这位绘声绘影的小说家，成都的历史

学家，带着他未完成的杰作《大波》“走”了，巴金感到心情沉重，深感痛惜。

十二月二十六日 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方殷托孔罗荪转来的信，获悉方殷认为《还魂草》不宜收入“文学小丛书”，要求另选。巴金告之干脆不选自己的作品，或由方殷代选。虽然自己颇喜欢《还魂草》，但是同意抽出。心中不快的是，方殷强调的是“爱护您的声誉”。针对所谓“爱护”巴金的“声誉”而认为《还魂草》收在《文学小丛书》内“不太适合”的意见，云：“自己颇喜欢《还魂草》，但是抽它我也同意，绝无怨言。只是为什么一再对作家提到声誉二字呢 真正的作家并不常常想到自己，他重视自己对人民、对读者的责任。我并不在乎所谓的‘声誉’，我也不是为‘声誉’而写

作的。我倒是真心想为人民服务。”夜致信余思牧。对余在《作家巴金》中有关鸣凤的性格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要说鸣凤自杀有拯救觉慧的作用，其实是美化封建社会。”在信中还说：“觉慧同鸣凤并未‘发生关系’。其实即使‘有了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吃亏的还是鸣凤。”

十二月 作散文《走下的路——致一位友人》载《人民中国》第六期。

一九六二年内 致信日本芹泽光治良，云自己的创作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并向对方推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斥盗版书商“可恨”。

出席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及上海市副市长及文化界名流和要人的宴会。

在上海或东京，与日本文化界名流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欢晤。

六十岁

一月一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散文《迎接一九六三年》。云“一九六三年像一个通体光明的巨人站在窗外敲着玻璃，要我打开门去迎接它”。又与孔罗荪去国际饭店十五楼赴石西民的便宴，与刘白羽、夏征农、夏梦以及阳翰笙夫妇、石凌鹤夫妇等欢聚畅饮。晚上与萧珊至金仲华家吃饭。

一月四日 与熊佛西、于伶、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十、林风眠、白杨、上官云珠、以群、吴强、峻青、张乐平等文艺界人士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延安西路文艺会堂举行的上海文艺界一九六三年元旦联欢会。

一月五日 致信沙汀。云李劫人的死是文艺界的一个损失，“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热情的好朋友”。

上旬 接余思牧香港来信。获悉余按香港南国出版社要求，拟从十四卷《巴金文集》中选编《巴金散文选集》和《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因巴金寄赠的均为精装本，舍不得拆散。特来函索取《巴金文集》前九卷的平装本。

一月十二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目前在校改旧译《处女地》和修改《三同志》，

并寄上《现代中国文学史》等。

一月十四日 致信余思牧。告之《巴金文集》前九卷的平装本早已没有全套，书店里也找不到，只好等将来设法买齐了寄去。

二月二日 在家看电视，觉得复旦话剧团公开演出的《红岩》，有几场改编得不错，两个主角还可以，不比青岛话剧团差。

二月上旬 将《巴金文集》平装本一至四卷寄赠余思牧。不几天，收到余思牧征求意见的信。获悉为使作品顺利进入东南亚国家，南国出版社让余思牧编辑时，把作品中一些“刺目的字眼”加以改动。如“解放前”改为“一九四九年以前”、“阶级”改为“等级”或“阶层”、“斗争”改为“奋斗”或“拼搏”等。

二月七日 致信彼得罗夫。告之春节过得格外愉快，寄上《文艺评论选集》等。

二月十一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我们的心一直留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

二月十五日 致信余思牧。云在海外出版，对作品作一些改动，并换上一些不刺目的字眼，表示“很了解”，希望如有改动，请加注说明一下，或者不作文字上的改动，删去一些刺目的字眼也行。

二月二十六日 晚上听《人民日报》二十七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觉得文章写得理直气壮，逻辑性强，尖锐而能说服人。真是一篇好文章，越听越兴奋，到凌晨两点方入睡。

二月二十八日 为农历正月初四。下午，前往泰兴路文化俱乐部参加周恩来召开的座谈会，与邓颖超等共进晚餐并亲切交谈。

三月一日 与萧珊在客厅听《红旗》杂志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三月六日 重读《红旗》杂志社论全文，觉得：“这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气势雄壮、振奋人心的历史文件！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今天的行动纲领！”

三月八日 上午，重听《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觉得文章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对修正主义者的造谣污蔑和无理挑衅给了极其严正的答复。

三月十二日 致信余思牧。声明《怯弱的人》两书都不是我的作品，严斥“书商”“可恨”；并告最近在修改中篇《三同志》；又托余买《郁达夫与王映霞》和《郁达夫日记九种》，并请余“带个口信”给阮朗即香港作家唐人，著有《金陵春梦》等，要一本《血肉长城》。

三月三十一日 参加作协上海分会为时九天的小说、散文创作座谈会。

三月 致彼得罗夫信二封。请彼得罗夫搜集乌兹别克文本、波兰文本、德文本《家》，寄上《李清照集》、《古今集》等书；高兴地告之“我女儿夏天要进大学了”。

四月四日 读刘澍德的长篇小说《归家》。

四月五日 清明节，上午与魏金枝、以群等人分别前往鲁迅墓和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五烈士墓以及靳以墓敬献花圈。下午继续改《处女地》，与李济生夫妇一起吃晚饭。晚上看完《归家》。为刘澍德的才能感到高兴，但是感到小说本身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做作和卖弄技巧，把人物写得那么别扭。再读刘金写的推荐文章，觉得可笑。

四月七日 作随笔《为红色宣传员欢呼》。载《大众电影》第四期。赞朝鲜影片《红色宣传员》。

四月九日 致信彼得罗夫。

四月十一日 下午，带李小棠去集邮公司买纪念邮票。午后与萧珊去东湖招待所看望刘白羽夫妇。

四月十二日 陪郭小川去看金仲华，后去华东医院补装假牙。



四月十三日 晚，与白杨、于伶、贺绿汀乘火车且同一车厢赴京。

四月十四日 晚六点十分，抵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次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曹禺、沙汀、孔罗荪来接站。应曹禺邀请，与沙汀一起到“康乐”吃饭，叙谈甚欢。饭后，又去听《王昭君》第一幕的录音。晚，下榻民族饭店。

四月十六日 张春桥、杨仁声、孟波、孔罗荪、黄佐临、方令孺来，九点到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参加文联主席团会议。

四月十八日 参加作协主席团会议后与周扬、老舍等聚餐晤谈。应曹禺约请，与沙汀、李健吾等前往北海吃饭，都是老朋友，谈得相当畅快。

四月二十二日 是日起，连开七天会至四月二十九日。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文艺战斗作用的问题。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许广平、田汉、夏衍等和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地特邀代表三百八十多人出席了会议。听了周恩来《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晚上还有节目，生活相当紧张。加上熟人多，觉得疲劳。

四月二十八日 到冰心家送《上海文学》，谈了一阵；应周而复邀请，与阳翰笙、孔罗荪及其儿子等去四川饭店吃晚饭。晚

上与曹禺等在孔罗荪房里谈了两个小时，十点去民族宫餐厅参加联欢会，见到周扬、郭沫若和周恩来。得郭沫若当场写的字一幅。

四月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在京生活琐事，云“想念你们，分别五天，好像别了好久似的”，沈从文身体不好，在家休息；嘱李小林、李小棠好好温习功课，考学堂才有把握；关心川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建议《白蛇传》可以多演几场等。

五月一日 中午抵沪。吴强、萧珊、李济生等来接。

五月二日 列名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

五月四日 与萧珊、刘白羽、沙汀等赴杭州，方令孺等来接，下榻杭州饭店。

五月七日 与沙汀到孤山散步，访苏曼殊墓。参观岳坟、民族英雄纪念馆和西泠印社、吴昌硕纪念馆等，去虎跑饮茶，去花港观鱼，游完玉泉后回杭州饭店。

五月八日 偕萧珊陪沙汀夜游杭州苏堤和风雨亭。

五月九日 返沪。晚上到中苏友谊电影院出席上海市第四届二次人代主席团会议。会议期间，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文艺一定要为工农兵服务，更好地反映伟大时代的风貌。十一日

大会闭幕。晚上，与李济生、李琼如、李小棠去大众剧场看川剧。

五月十三日 中午，与萧珊在衡山饭店十三楼宴请十多位川剧团同志。十四日打电话给方令孺，感谢她的热情招待，并希望川剧团在杭州演出期间，能给予支持和帮助。

五月十七日 上午，看书，续写开幕词。下午，与萧珊去大众剧场看川剧。晚上与萧珊、李琼如在“洁而精”吃晚饭，品尝地地道道的川菜。晚上，独自到大众剧场看川剧《白蛇传》。

五月十八日 晚上，与萧珊去看川剧《红岩》。

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 以上海市文联主席身份出席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于伶、丰子恺、以群、周信芳、赵超构、郭绍虞、袁雪芬、贺绿汀、熊佛西以及其他委员和各方面的代表一千八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表示拥护周恩来在全国文联的讲话。

六月三日 与刘白羽、沙汀、以群、孔罗荪、艾明之等同行赴京。四日，抵京，下榻华侨大厦。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越南。

六月五日 上午去中国作协谈话，下午，去对外文委谈话，还要看不少文件。感到这次出访，不是普通的参观访问，并不

会清闲。

六月八日 上午，应越南驻京大使约请喝茶，下午去对外文委谈话。晚上与沙汀、刘白羽到隔壁大同酒家喝啤酒，谈得很融洽；与怕他寂寞、天天来访的曹禺见面。告之刘白羽知道曹禺身体不好，准备安排曹禺去大连休养。曹禺看到桌上的一大堆文件，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六月十日 任访问越南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下午四点零五分乘飞机到达河内。越南同志招待热情，起居饮食都不错，吃的是广东饭，水果很多。代表团将在越南访问五个星期。

六月十八日 到兴安省住了两天。二十日回河内，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酒会。

六月十九日 与束为应越南朋友的要求，介绍了中国作协培养工农作家的一些经验，还讲到政治挂帅和思想改造的重要等。

六月二十二日 动身去十七度线的永灵。这期间最紧张，又是大热天，而自己生性怕热，有时只得打赤膊写信。

六月二十九日 参观胡志明故居，看到胡志明艰苦朴素的作风，并题词。

六月

发表散文《祝贺 人民中国 日文版创刊十周年》，载《人民中国》日文版六月号。赞扬《人民中国》日文版对日文化

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这次访问越南不是普通的参观访问，但是去一次是对自己的锻炼；简叙行程和旅途见闻；关心李小林的高考，嘱李小林认真复习，注意劳逸结合，不必“强记”，“要看几篇文艺理论的文章，……要理解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要懂得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嘱李小棠不要贪玩，不要多看小说，要复习迎考；为李小林考期近了，自己不能尽一点力而干着急；嘱萧珊购买飞利浦或索尼半导体收音机，便于听短波，以及购买广玉兰树等。

七月五日 从越南海防到达世界第八奇景的下龙湾，乘汽艇在群山中间绕来绕去，穿越山中湖，汽艇在湖中疾驶一周。出洞后，山中湖消失得无影无踪，仍然是山连着山。住五天，返回河内，又访义南市、贤良江等地，在紧靠十七度线的永灵住三天。

七月六日 作散文《贤良桥畔》，载《人民文学》九月号，题为《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

七月十七日 结束访越，回国，下榻北京新侨饭店。得萧珊十日信并通电话。获悉李小林考上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李小棠考试成绩也不坏，感到欣慰。对萧珊在孩子们升学考试的“战斗”中的孤军作战表示感谢和歉疚。

七月二十日 与曹禺参观曹雪芹展览会，与曹禺午饭后访老舍，晚上访汝龙等。

七月二十二日 抵沪，萧珊等在机场迎接。

七月三十日 与周谷城、苏步青等出席上海各界两千多人在市人委大礼堂的集会，热烈庆祝朝鲜解放战争胜利十周年。

八月八日 零点，收听新闻，听到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感到很激动。

八月十三日 李小棠接到五一中学录取通知。

八月十九日 与萧珊去和平饭店，约冰心同访沈尹默老人，冰心请沈尹默为《儿童文学》题字，巴金请沈尹默写扇面。与萧珊、冰心各得一幅单条。

八月二十一日 与萧珊在华侨饭店八楼请冰心吃饭。下午，与茹志鹃、施燕平同去第六人民医院。听院长介绍治疗断手工人的经过。

八月二十二日 听莫斯科华语广播，对其中一些诬蔑中国社会的言论感到愤慨。

八月二十九日 去南京西路集邮门市部购集邮簿。晚上收听毛主席支持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的重要声明。认为这又是一篇不朽的文件，且是光辉的历史文件。

八月 作报告文学《手》，署名巴金、茹志鹃、张煦棠、燕



平、魏金枝。载《上海文学》九月号。叙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为一位工人断手再植的动人事迹。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九月一日 早晨，听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觉得是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像照妖镜，照出了赫鲁晓夫的原形：看你往哪里逃！

九月二日 致信沙汀。祝贺沙汀的女儿刚红“考进了外语学校”，云“多念几年书会更有好处”；又述李小林、李小棠上学及上海“奇热”、“满身痱子”等情况。

九月十日 作散文《越南人民庄严的答复》，载《上海文学》九月号。

九月十二日 听《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二篇文章，是专门谈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觉得“透彻之至！这是对赫鲁晓夫毁灭性的打击”。下午，剪下一朵昙花作标本。又在报上读到“松川事件”全体被告宣判无罪的消息，非常高兴。觉得这是日本人民的又一伟大胜利。

九月十九日 听广播，听法国诗朗诵唱片。十一点，与卞之琳去万国公墓扫墓。

九月二十五日 早晨，听法、德、世界语唱片。与孟波、白杨等人到机场欢迎朝中友好代

表团，见到了《红色宣传员》的女主角。晚，与白杨、沈柔坚、袁雪芬去和平饭店，参加了曹荻秋副市长举行的欢迎朝中友好代表团的宴会。

九月二十六日 又听《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觉得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力强，战斗力也强。听德、法语唱片，继续校改《处女地》。

十月一日 前往人民广场，参加国庆庆典。晚上去国际饭店看放礼花。

十月七日 早晨，听法语、西班牙语唱片。晚，前往建国西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出席副领事鲍尔举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招待会。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宋日昌等也应邀出席。夜，致信沙汀，希望沙汀养好身体。

十月十四日 中午，与卞之琳、辛笛前往洁而精餐馆，赵家璧请吃饭。午后，到锦江饭店十一楼，出席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晚间举行的宴会，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

十月十六日 前往机场迎接来我国参加国庆活动的著名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及其夫人梅贝尔。

十月十七日 晚，同苏步青等一起出席为欢迎罗伯特·威廉夫妇举行的宴会。又致信李存光，希望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李

存光“不要研究我的作品”等。

十月十八日 主持上海各界一千多人为欢迎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举行的大会。金仲华在会上讲了话。

十月二十一日 前往车站欢送罗伯特·威廉夫妇赴杭。

十月二十六日 与萧珊前往万国公墓扫老太太墓，今天是老太太逝世三周年。

十月二十八日 乘飞机赴京，下榻新侨饭店。下午四点和严文井、冰心、马烽、许觉民等同去中南海，听廖承志谈话。六点，应冰心约请，到东来顺吃涮羊肉，邂逅何其芳夫妇，一起成了冰心的客人。晚上八点，与曹禺到新侨饭店六楼喝咖啡。

十月三十日 抵广州，三十一日去香港。

十一月五日 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东京访问，下榻新日本旅馆。

十一月六日 与中岛健藏见面，听他介绍日本文学界的情况，讲话明确，尖锐而风趣。晚上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宴会。与井上靖等见面。访问期间前往参观奈良、京都、大阪、热海、箱根等地。

十一月十六日 率团到川端康成家访问。

十一月二十二日 前往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府上拜访，“我们愉快地谈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

⊖ 巴金 右二 与井上靖 左 在宴会上。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间巴金 右 在日本京都兴福寺。



事”。

十二月三日 离开东京。离开东京前夕，出席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的联欢会，深感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经香港到广州。在京得萧珊信和电话，获悉萧珊在家和孩子们为他过生日，点了洁而精餐馆的川菜；李小林已从农村胜利归来，李小棠喜欢打球、看小说，又好强、又自尊等。巴金心中暖洋洋

的，多日来的劳碌奔波，化为乌有，巴不得立即回到萧珊和孩子们身边；北京的风雪严寒，也在萧珊的字里行间融化成春水清泉……

十二月十二日 在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发表散文《人生最美的事》。

十二月十四日 抵沪。

十二月十六日 致信沙汀。云与谢冰心、严文井、马烽到日本访问了一个月，都感到非常愉

快；并告已收到寄来的《川剧汇编》。

十二月十七日 辛笛宴请朱梅，应邀与萧珊前往红房子西菜社作陪。晚上，到锦江饭店十四楼，出席对外文协欢送日中友协

十二月二十八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访问越南的书，因为去日本一打岔，目前写不出来；感谢他对萧珊在京组稿时的帮助等。又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觉得实在写得坏。苏联文艺界那样捧它，只能说明修正主义者的堕落。

十二月 阅毛烽、武兆堤在《电影文学》十二期上发表的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团圆》，并获悉该剧本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电影。

一九六三年内 与萧珊热情接待从北京出差到上海的沈从文。偕沈看望刚摘去“右派帽子”的施蛰存。





参加上海二十万人的示威游行，
并作文《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
凶恶的敌人》以示声讨。

认为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是
“激动人心的好戏”。

应山西省文联之邀，参观“大
寨”、五台山佛地、大同云冈石窟
等，并谈创作与生活、与感情等问
题。

六十一岁

一月七日 接连收到沙汀的信和电报，获悉其夫人肝胆生癌住院，急需日本药丝裂霉素。在和平饭店出席日本友人的告别宴会时，遂托宫石治林设法弄药。九日，告之沙汀，宫石将让人将药从东京寄出。

一月十三日 接日本工业展览会秘书押川托中国翻译打来的电话，获悉为沙汀夫人治病的药已从日本寄出。

一月十四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声音》，歌颂巴拿马人民为收回运河而开展的爱国正义斗争。

致信沙汀。告之托人在日本买药之事，劝慰沙汀“不要过分焦急”，并劝沙汀夫人黄玉颀“安心养病”。

一月十五日 参加上海二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并代表文艺界发言：上海文艺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文艺界著名人士熊佛西、贺绿汀、郭绍虞、孔罗荪、袁雪芬、魏金枝、杜宣、周小燕、秦怡、张乐平等也参加了游行。

一月十七日 在《新民晚报》发表杂文《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一月二十二日 致信方殷。

一月二十四日 致信沙汀。告之所需的药八日已由日本寄出，但至今“尚无消息”，劝慰对方保重。

二月十一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我的心一直留在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

二月中旬 患流行性感冒，几乎不能工作。

二月十七日 感冒加重，下午，去锦江饭店小礼堂出席统战部召开的春节座谈会，听柯庆施讲话三个多小时。

二月二十三日 与萧珊一起为李小林整顿行装，她明天将随学院师生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二月二十七日 作散文《携手前进——写给一位越南作家》，载《收获》第二期。

三月一日 致信沙汀。探问沙汀夫人黄玉颀服药后的病情，并告“女儿下乡”、“萧珊忙着听报告、开会”。

三月六日 作散文《忆越南》，载《萌芽》第四期。

三月中旬 为日本友人松冈泽子赶写一篇文章。

三月二十一日 接待龟井胜一郎率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并邀请龟井等到家做客。

三月二十四日 前往机场欢送龟井胜一郎等回国。

三月二十五日 致信沙汀。告之从李济生处获悉沙汀夫人黄玉颀病逝，但从沙汀来信中得知她“病情好转”，故将信将疑，“倘使消息不确，请你原谅。倘使消息是真，我也非常难过。但是请您务必保重身体，坚强起来”。

三月 支持萧珊到工厂参加“四清”工作。

四月五日 扫鲁迅、左联五烈士、靳以、三哥和老太太等墓。

四月九日 与萧珊、杜宣、孔罗荪等六人赴杭州，方令孺来接。

四月十一日 与萧珊偕罗荪、杜宣、姜彬等到新安江住了三天，在桐庐住了一天。

四月十六日 返沪。来回都坐我国最新设计制造的双层火车，作了一次“愉快的访问和旅行”。

四月二十二日 与周谷城等人出席上海各界举行的两千人集会，坚决支援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强烈抗议巴西政变当局对中国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的政治迫害。在上海访问的朝鲜、越南、日本、马里、莫三鼻给、北罗得亚西等亚非朋友也出席了大会。

四月二十二日

致信沙汀。希望沙汀能安稳地度过这个痛苦的时期，把对夫人黄玉颀同志的感情化为力量，做出许多她期望你做到的事情，写出许多读者们等着你写的文章；建议沙汀各地走走，看看最近的“新气象”。

在《儿童时代》四月号发表特写《大寨英雄——“老石匠”贾进才》。赞扬贾进才艰苦奋斗的“愚公移山”精神。

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现代戏《红灯记》。

五月初 与金仲华、陈同生等到上海郊区参观访问三天。

五月七日 明天是和萧珊结婚二十周年，陪萧珊去永安公司买了一架日本产的小照相机。

五月八日 致信沙汀。云去杭州探视了跌伤左臂的方令孺；又云现在开始修改中篇《三同志》，倘使没有别的事情，七八月份就可以把稿子交出去了。

五月上旬 托因公返川的兄弟李济生探望沙汀等人，并捎去一些礼品。

五月十七日 致信沙汀。云萧珊到工厂搞“四清”将近两个月，情绪很高，最近在看学习文件。好文章不少，得认真地读。

五月二十七日 复作协办公室信，同意茅盾关于取消蔡其矫会籍的建议。

五月 作散文《珍贵的礼物——致越南诗人春生同志》，载



六月五日《文汇报》。

六月上旬 从刚自乡下回来的女儿李小林处，获悉农村搞“四清”的情况。又观看为招待日本话剧团演出的三场戏，并接见日本友人。

六月十日 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散文《致江南同志——

贤良桥畔 代序》，即《这样的一天——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欢送日本话剧团的朋友离沪。夜，致信沙汀。云胞弟李济生仍要下乡搞“四清”，女儿李小林休假结束后还要去太仓搞“四清”，“年青人在斗争中锻炼，进步很快，这的确是可喜的事”，自己想安静下来修改中篇，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告之华东京剧现代戏演出情况：好些戏都可以看，不过“还没有像《红灯记》那样激动人心的好戏”。

六月 在上海，作《贤良桥畔 后记》。云去年到越南访问，这几篇文章记录了我的“真实的感受和见闻”。

七月六日 作散文《越南人》，载《收获》第四期。

七月十三日 在廊下听完“九评”后上楼。认为这篇文章不仅揭露了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还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取得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经验，对世界革命人民有极大的帮助。

七月十七日 与苏步青等人出席上海各界二千余人的集会，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去虹桥机场，欢迎金仲华，送外宾。晚上，与萧珊请李小棠到衡山饭店吃西餐，祝贺他十四岁生日。

七月二十九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金仲华举行的宴会，欢迎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当晚，到车站欢送代表团离沪赴杭州。

七月三十日 晚饭后，与李济生夫妇等听中共中央复苏共中央的信。听了一小时。认为理直气壮，逻辑性强，生动有力。苏共是不会悬崖勒马的，赫鲁晓夫应早日进入坟墓。

七月三十一日 应山西省文联主席束为约请，携萧珊及李小棠前往山西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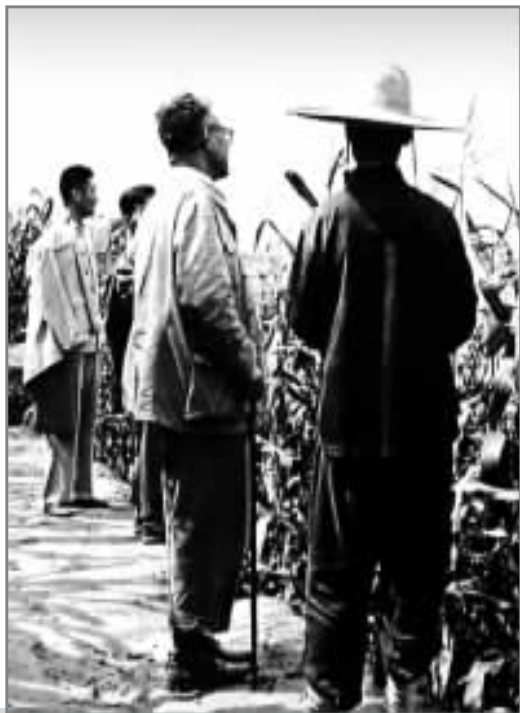
八月二日 抵太原。

八月六日 去山西省文联，见到束为、马烽，聚谈甚欢，酒醉饭饱。

八月八日 在《山西日报》上发表散文《永远同越南人民在一起》。

八月十四日 作散文《新中国人》，载《收获》第五期。用很多事例说明新中国人的幸福、自豪和光荣，表示要把“自己的每一滴心血、每一颗汗珠都溶化在……伟大祖国的千变万化中间”。

八月十五至二十五日 继续在山西访问。由作家西戎陪同，



一九六四年八月巴金（右二）在大寨参观。

参观“大寨”、杏花村汾酒厂、五台山佛地、大同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等。应杏花村酒厂主人之请，在留言簿上题字：“酒好人好工作好，参观一回忘不了。”并在烟雨中拍了相片。在五台山参观一周，应和尚、居士之请一起吃斋饭，并签名留念；在忻县地区，观看地区北路梆子知名演员贾桂林演出的《王宝钏》和名老艺人演出的二人台《走西口》，赞剧目十分逼真，真挚动人；在第二天座谈会上讲创作方面37的问题；在太原期间，在作协组织的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讲了创作与生活、与感情等问题。此外，在山西期间，还参观了晋祠、刘胡兰纪念馆等。每到一处，都叮嘱主人不需特殊招待。山西文艺界称赞巴金：“实在是个好老头！”巴金觉得歉然的是，没有见到陈永贵这个重要人物。

八月二十六日 从太原赴北京，曹禺来接，下榻华侨大厦。小住两天，访沈从文、冰心、汝龙、顾均正等。

八月二十九日 自京返沪。

八月三十一日 沙金来征求对党中央信件的意见。

九月六日 致信余思牧。云到山西农村、工厂、矿井、五台山去过，“收获很大”。

九月十二日 列名于上海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名单。代表共九

百名。

九月十六日 下午，参加上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曹荻秋等五十五人组成。

九月十八至二十六日 出席上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九月二十六日 又被市人代会选为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上海市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一百四十人，其中有宋庆龄、陈云、陈毅、谭震林、曹荻秋、苏步青、陈望道等。

九月二十九日 致信沙汀。云在山西和北京时，见到刘白羽、严文井、林默涵、张僖等。

九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贤良桥畔》。

十月一日 登人民公园检阅台，检阅游行队伍。

十月上旬 得余思牧从香港寄来的《作家巴金》十册和信，获悉他准备编撰《巴金年谱》。

十月十日 将《新声集》、《英雄的故事》、《贤良桥畔》各一册寄香港余思牧。

十月十二日 致信余思牧。对余赠书表示感谢，并云去年初将中篇《三同志》改了一万多字，后来赴京开会又放下了。又云：“关于我自己解放后的活动，我看编‘年谱’用不着多写

如出什么书，参加什么国际活动，每年只记一两件大事，您将来写成，让我对一对就行了。”

十月十六日 沙金来征求对于赫鲁晓夫下台这个消息的看法。十点才从广播新闻中听到塔斯社报道全文的转播。认为赫鲁晓夫下台，对世界人民总是有利的。十一点听广播，知道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万分高兴。认为我国政府的声明，辞严义正，光照世界。

十月二十日 李小林离家，明日随学校师生去太仓，巴金送她到门口，望了许久，李小林频频回头。巴金摇手致意，他很喜欢李小林，希望她在这次运动中有好的表现。

十月二十一日 获悉柯仲平逝世，很难过，发了唁电。

十月二十四日 晚，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金仲华举行的宴会，欢迎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

十月二十五日 到车站欢送罗伯特·威廉及其夫人梅贝尔离沪赴南昌。送行的还有金仲华等。

十月二十六日 出席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举行的宴会，欢迎越南代表团。又作报告文学《大寨行》，载一九六五年《收获》第一期。介绍大寨巨大的变化，描写社员忘我劳动的事迹和艰苦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巴金 正面左
四 与农民在一
起。



奋斗的精神。

十一月三日 沙金来征求对主张写“中间人物”和苏共中央公布赫鲁晓夫二十九条罪状的传说的看法。

十一月七日 晚，出席上海各界人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大会。陈丕显、曹荻秋、胡厥文、周谷城、李国豪等出席了会议。

十一月十三日 到车站迎接以苏共中央委员、交通部部长鲍·巴·别谢夫为首的苏中友好代表团。

十一月十四日 出席石西民为欢迎苏中友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十一月十六日 到车站欢送苏中友好代表团离沪赴杭州。送行的还有曹荻秋等人。

十一月十七日 去市政协，出席关于“中间人物”的座谈会。会后同意政协的安排，参加到奉贤参观社教工作的小组。

十一月十八日 与萧珊去购下乡穿的棉衣，到文化俱乐部，见到辛笛，一起喝黄酒，吃螃蟹。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致信李小林。想念女儿并鼓励她努力工作。

十一月二十三日 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农村社教运动参观小组，前往奉贤萧塘公社。十点半，在天井里吃带来的面包，配上公社食堂的盐萝卜和素菜汤，甚可口。晚上，旁听斗争会，对象是一个富农和一个反革命分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 旁听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有五个干部作检讨。

十一月二十九日 听到毛主席支持刚果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明，非常兴奋。为了听声明的全文，巴金拿着饭盒跑到食堂，被门槛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

十一月三十日 旁听贫下中

农对大队干部的揭露和批评，见三个干部被群众喝令跪在地上。

十二月二日 分组访贫问苦。

十二月三日 得萧珊信，获悉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要求见面；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萧珊和孩子们在家吃面，祝贺巴金“在战斗中度过这一天”，“你的生日比任何一天过得有意义”等。旁听斗争大会，参观漏划地主的住宅。

十二月六日 回上海。

十二月十日 与萧珊到上海大厦集合，到海通有色合金厂，旁听斗争不法资本家董仁德父子大会。在这里又看到一个“和平演变”的典型，真令人心惊。

十二月十三日 列名上海出席全国人大代表名单。

十二月十八日 抵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下榻前门饭店，与方令孺住处近。将萧珊托交的东西给曹

禺。次日下午参加小组会，晚上看《东方红》。会议紧凑。又致信李小林。云女儿下乡两个月，进步很大。

十二月二十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并肩前进——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深信“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并肩前进”。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等出席了会议。

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继续听周恩来总理报告，参加上海组讨论。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郭沫若、茅盾、许广平、严文井、曹靖华、张光年、叶君健、李季等

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与亚非作家常驻局访问亚洲代表团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双方签字后，参加了中国作协与中国联络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天休会。看望顾均正夫妇后，又去看望李宗林，对方身体不好，一脸病容，倍加关心。中午与曹禺、沙汀在外面吃中饭。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迎着寒风，跑步上车，摔了一跤。起来后左臂又麻又痛，就医后，确诊左肩关节脱臼。到积水坛医院就医，左膀用绷带吊着。晚上看马连良等主演的《杜鹃山》。陈宗浩 巴金舅父的大女儿 同妹妹一起来访并在前门饭店附近一家湖北饭馆吃饭。

十二月三十一日 出席第三

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全体会议。

十二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京中见闻，看了《东方红》、《红灯记》；会见夏衍，在酒会上看到茅盾，能吃能谈，兴致很好；何其芳在写批判文章、周而复到陕西搞四清以及到赵超构、金仲华、陈同生、黄佐临房中叙谈等。得萧珊信二封。获悉李小林在农村开过小型说理斗争会，战前练兵，十分兴奋；萧珊已听说北京的革命气氛很浓等。

一九六四年内 获悉旧作《憩园》由香港凤凰影片公司改编后，摄制成国语片《故园春梦》，由朱石麟编导，鲍方、夏梦主演，列为第七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参加回顾映出。



赴越南作为期一百一十天的访问，受到胡志明主席的宴请。

批判电影《不夜城》“美化资产阶级”，同时登门向其编剧柯灵道歉。

参加上海市作协关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学习”，遂对一九六二年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作自我检讨。

六十二岁

一月一日 应刘白羽邀请前往四川饭店就餐，同席还有严文井、沙汀、田间、欧阳山、张光年、周扬、林默涵等。周扬谈了好一阵儿。

一月三日 早上，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大会讨论。下午，出席全体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先后选出刘少奇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彭真等十八位副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并与金仲华、赵超构一起喝酒，庆祝选出了国家领导人的大喜事。致信萧珊。告之六日将与方令孺同车离京。

一月四日 下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闭幕式。

一月六日 离京。

一月七日 下午，抵沪。

一月十日 参加上海市人民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的强大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各界人士还有周谷城、谈家桢、李国豪、以群、袁雪芬、俞振飞等。又在《文汇报》发表散文《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

一月十五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

一月十九日 读《矛盾论》，抄改《三同志》。

二月八日 听广播，获悉美国飞机连续两天侵犯越南领空，感到愤慨之至。又听到五十万人游行抗议，心也飞到北京。

二月九日 上午，与萧珊、李小棠去中苏友好大厦参观福建工艺美术展览。中午，接徐开堃电话，为《文汇报》“笔会”专栏写一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

二月二十七日 沙金来征求对《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出版者说明的意见。

三月二日 第二次看完电影《雷锋》，仍然很感动。

三月十二日 去市政协出席学习小组长会，决定与金仲华、赵超构再去奉贤萧塘公社住两个星期。

三月十三日 致信沙汀。云左肩仍然酸痛。

三月十五日 与金仲华和赵超构到奉贤萧塘公社，了解农村“四清”运动进展情况。三人在一处住了两个星期 这次是去看中共中央颁发的二十三条执行情况和大“四清”，参加大小小对敌斗争动员会和敲砖头等轻微劳动。

三月约中旬 接余思牧信。获悉他拟撰写《作家冰心》，欲了解冰心的生平，希望得到帮助。

三月 致萧珊信二封。告之住在养路工住的新房子里，旁边有医疗队，健康有保障；嘱萧珊

转告冰心，关于余思牧的情况返沪后亲自作复；左臂常常发痛等。

四月二日 由郊区回家，接待赴京开会的方令孺。因患感冒，没精神多谈。相约等方令孺从北京回来时，同她到杭州去住两天。李小林回家，住四天，仍要回太仓集训。

四月六日 致信沙汀。云在乡下住了十八天，手膀还常常发痛，乡下冷，因此手膀痛得厉害些。又告之请沈尹默代沙汀写的字已送来。

四月九日 偕萧珊随方令孺同赴杭州小住数日。

四月十日 与萧珊苏堤散步、花港观鱼、游三潭印月等。

四月十一日 游植物园，去海棠园参观。十二日返沪。

四月十八日 作散文《三千万越南人民大踏步前进》，载五月十日《文艺报》第四期。

四月二十日 致信余思牧。云：和冰心相当熟 可是对她的生平知道得也很有限，已把几个问题转寄给她了，估计她不愿回答，“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不想对人谈个人的事”。

四月二十七日 听联播节目，关于《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五集出版者说明》，觉得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分析全面、深刻、尖锐，辞严义

正，万分痛快。

四月三十日 参加上海市总工会等九团体举行的盛大的五一招待会。

五月八日 致信沙汀。云最近又到郊区去参观；四月份又看了一次京剧《红灯记》，“真是好！希望能够看到这样好的川剧现代戏”。

五月十五日 参加上海市各界四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支持多米尼加人民抗美卫国的斗争。

六月一日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参加市政协小组会。

六月三至十日 陪同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金仲华等观看日本话剧团在上海举行的《日本幽灵》的演出，并会见话剧团成员，祝贺演出成功。七日晚，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大年夜》。九日，参加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为欢送日本话剧团举行的宴会。十日，同金仲华、杜宣、张瑞芳等到车站欢送日本话剧团。

六月十二日 以群送来《不夜城》导演剧本，组织巴金和孔罗荪写批判文章。代表作协宴请罗马尼亚作家。

六月十五日 夜，偕同萧珊看望病中老友柯灵，说明发表批判柯灵编剧的电影《不夜城》的文章，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得到理解和原谅。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六月十八日 再去市政协看
为学习小组放映的影片《不夜
城》和《林家铺子》。晚上，看
《不夜城》剧本。

六月二十八日 致信沙汀。
云：刘白羽来电话“要我去越南
走走看看，写点文章”。

六月二十九日 与杜宣一起
搭班机抵京，下榻新侨饭店。与
杜宣、茹志鹃、菡子等天天在一
起学习。与晚上常来的曹禺谈
天。

七月一日 晚上，访问顾均
正夫妇。

七月二日 晚上，访问沈从
文夫妇。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牙
痛，躺在床上，遂与沈从文坐在
院子里乘凉。感觉到头上的达摩
克利斯剑，正在缓缓地往下坠
落，和沈从文在院子里坐了一
会，不知怎的，两人讲话都没有

- ⊖ 巴金 左二 与胡志
明 右 在一起。
- ⊖ 巴金 左四 等人在
越南河内受到胡志
明的接见。



劲头。旅馆离沈从文家不远，巴金慢慢地走回去。想起年轻时和沈从文的争论，想起沈从文很早以前就劝过他不要浪费时间，想起这些年来，自己外表忙忙碌碌，内心十分紧张的心境……北京的夜，炎热难当，巴金的心，也处于焦虑不安的煎熬中：“我的脚步很沉重，仿佛前面张开一个大网，我不知道会不会投进网里。但无论如何一个可怕的、摧毁一切的大的运动就要来了，我怎么能够躲开它”于是，筋疲力尽地回到旅馆。

七月五日 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谎话一定要给戳穿》。认为《不夜城》“是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

七月七日 去老舍处，与曹禺在老舍处吃中饭。晚上，看话剧《刚果风雷》。

七月九日 与魏巍第一批走，再访越南，预计走访三个半月。下午五点四十分抵河内，下榻统一宾馆。在河内住七至十天，听报告，看材料，出席座谈会，为重访永灵作准备。看了潮剧和新书《像他那样活着》，觉得很感动人。

七月二十日 在河内，受到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接见，并应邀赴宴。

七月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在京生活、学习情况，以及与曹禺、沈从文、老舍的访谈；初抵

河内能吃能睡，买了抗战鞋，准备带一个菠萝弹壳回来等。嘱萧珊向在沪的金仲华、陈同生、以群、孔罗荪、柯灵、萧荀、辛笛等问好。

八月 在越南，继续参观访问。天天同美国飞机打交道，有一次，车前车后有四颗照明弹，被叫醒，下车在野菠萝下面躲了几分钟，还听到飞机声，心里有点紧张。车常常半夜行军，在越南老百姓家投宿，还看到带队的越南人被毒蛇缠身和美国飞机被当场击落，越南民兵捉拿美军跳伞飞贼。只拣到一颗菠萝弹壳和一些飞机残骸碎片等。

八月十七日 出席送别宴，听战斗故事，喝醉了，出冷汗，不停地喝茶抽烟。

八月 散文集《大寨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月十日 返回河内。受到热情接待，吃月饼，赏月，特别高兴的是收到大使馆转来的萧珊的两封信。

九月十八日 在河内，作散文《美国飞贼们的下场——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一》，载《人民文学》十月号。

九月十九日 去奠边府，继续在越南访问。

九月 致萧珊信三封。告之五十多天来身心都健康及去前线的经历；感到这次是走马观花，看得多，但是看不深，认为不到

越南来，不和敌机打交道，就不会了解越南人民的斗争；告之李小林要的尖斗笠大概能买到，还想给靳以的女儿南南也买一顶等。

十月十日 在河内，致信萧珊。告之前天从奠边府回来，十九日回国，身体很好等。

十月十九日 搭班机回国，结束为期一百一十天的访越活动。在北京小住，与自沪抵京的萧珊欢晤。萧珊送衣服到北京。

“我们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国华嫂用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

十一月十二日 至车站迎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邀请前来我国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的苏中友好代表团。

十一月十五日 参加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中苏友协副会长张承宗举行的招待苏中友好代表团的宴会。

十一月二十日 看笔记，准备向统战部和外办谈访越情况。晚上，与金仲华、陈同生在文化俱乐部吃晚饭，吃了两只螃蟹和小笼汤包等点心。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政协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筹委会委员名单。主任陈丕显，副主任巴金等四十一人，委员一百二十二人。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十一月二十九日 出席上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被选入五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夜，偕萧珊宴请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夫妇，畅叙友情，“没有想到”中岛健藏“会喝醉”。

约十一月 又感到风声渐紧，不久，通知参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习会。每个星期六下午去文艺会堂学习一次，出席的人多，有人先发言。过了两三个星期，“网越收越小、越紧”，终于在会上主动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

十二月十日 翻看《文汇报》上有关海瑞的资料和姚文元的文章。

十二月十一日 去文艺会堂，出席作协召开的海瑞问题座谈会，柯灵、王元化等都来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越南青年女民兵——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

十二月三十日 晚上，读方求的《海瑞罢官 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和吴晗的《自我批判》。

十二月三十一日 早上，去文艺会堂参加《海瑞罢官》讨论会。又作散文《炸不断的桥——再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载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香港《文汇报》。

十二月 致沙汀信二封。告之在越南住了一百一十天，收获很大，但拿起笔写文章，又觉住得太短。



学习会上，见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别人“畅所欲言”，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暴雨”将临。

获悉郭沫若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遂也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

作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文革”前送走最后一批亚非作家，由京返沪时，立即听到“打倒巴金”的口号。

惊悉老友以群、老舍等先后“自杀”。忍痛烧毁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写的一百几十封来信。

九月十日“造反派”第一次到巴金家“抄家”，以后被拉到大大小小批斗会上挨斗。

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但心中与萧珊用一句话互勉：“坚持就是胜利。”

一个从北京来的十四五岁的干部子弟，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

六十三岁



一九六六年一月
巴金 左三、萧珊 左
五 夫妇等人与日本作
家中岛健藏 左四 及
其夫人 右四 摄于上
海火车站。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一月四日 致信杨静如。

一月十五日 看《海瑞罢官》的讨论文章，下午，去作协参加讨论《海瑞罢官》的小组会。结束后，到淮海中路购咖啡和雪茄烟。

一月二十日 与柯灵、孔罗荪去衡山电影院，参加新春报告会，市委书记张春桥作报告。

一月二十九日 致信余思牧。云在写访越文章。余的稿子目前无法拜读。

一月三十一日 作散文《重访十七度线——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载《人民文学》三月号。

一月 迎接中岛健藏及其夫人中岛京子，并与萧珊等陪他们去杭州。每周六仍坚持前往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 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

二月一日 看《人民日报》批评田汉《谢瑶环》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

二月四日 读《毛主席著作选读 甲种本》。

二月五日 读《新民主主义论》和《矛盾论》。看了两篇关于“清官”的文章。

二月十日 与陈望道、周谷城等人出席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上海分会举

行的第十次会议，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

二月十九日 作散文《一块头巾——访越散记》，载《新建设》第三期。

约二月 在家接待方令孺，祝贺她七十寿辰，并一同到上海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 发现她情绪有点紧张。

三月二日 与文艺界人士杜宣、周小燕、司徒汉等三百人去车站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国歌舞艺术团。副市长宋日昌等亦前往车站迎接。晚上，出席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举行的欢迎越南歌舞艺术团的酒会。

三月三日 观看越南歌舞艺术团的演出。

三月六日 与宋日昌、孟波、杜宣、周小燕等三百多人到车站欢送越南歌舞艺术团离沪赴长沙。

三月十四日 在《文汇报》发表散文《雄壮的声音 战斗的友情》。

三月二十二日 送萧珊去工厂参加“四清”，读《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

三月二十三日 听《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觉得话不多，但是意思明确，有力量。

三月二十四日 与萧珊看《智取威虎山》，觉得改得不错，唱词也好。

三月二十六日 读《矛盾论》等，去文艺会堂出席《海瑞罢官》讨论会。

四月二日 致信沙汀。

四月底 获悉郭沫若在人大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说他“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烧掉”，十分震惊，也“感到害怕”，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五月十七日 致信沙汀。云最近在看学习文件。“好文章不少 得认真地读”。

五月十八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李济生到四川组稿等。

五月 在家接待从北京开会经过上海的方令孺，两三天后又亲自前往车站送别，这是与方令孺的最后一次晤别。当时感到政治上的“倾盆大雨”即将来临。获悉郭沫若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遂听一位写诗的朋友的劝告，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

六月二日 抵京，作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准备。到机场迎接的一个同志小心嘱咐巴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于是，在招待所看文件，很少出去。此时心情处于矛盾状态：“我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过关，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我在这种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个多月，我的确‘没出去找任何熟人’，无论是沈从



“文革”中红卫兵批斗“走资派”的场面。

文、李健吾或者冰心。”

六月三日 出席在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成立，担任副团长，曹禺、雷加、杨沫等均在册。听了报告，听到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认为是毛主席思想的一个新胜利，很兴奋。

六月四日 曹禺来访，一起吃了一顿饭。获悉曹禺一日三班地忙：既参加“文化大革命”，又在讨论剧本。五日起要把全部时间用在大会上。遇到严文井，获悉作协“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大字报很多。

六月五日 搬到京西宾馆，开始学习。

六月五日 致信沙汀，云最近“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学习”，现正在京作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准备；又云“萧珊还在铜厂搞‘四清’，李小林正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写批判文章 参加座谈会”。

六月九日 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晚 出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举行的宴会，欢迎来北京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的各国代表。出席宴会的各方面负责人有楚图南、刘白羽、杨朔、朱子奇、严文井、杜宣、胡万春等。

六月十六日 得萧珊十三日信。获悉她在激动中过日子，回家就筋疲力尽，但是睡不着；信中告之：“作协大字报的重点是王西彦、叶以群，



其次是孔罗荪和魏老。自然涉及你我的也有（我们身上难免不带有旧世界的种种痕迹），但是我们一定能在斗争中改造我们的世界观……家璧是这次的大重点，棠棠要我警告你，叫你站稳立场。这一点倒是我十分想不到的事……”

六月十九日 到首都机场迎接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国代表团。同去的有曹禺、金敬迈等。

六月二十一日 接刘白羽电话，要求就苏修策动指挥在开罗召开分裂会议这一事实发表谈话，配合战斗。于是写了简短的谈话稿，给新华社记者。

六月二十二日 被任命为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郭沫若，另两名副团长为许广平、刘白羽。同日，又去机场迎接又一批亚非作家抵京。与中岛健藏夫妇等老朋友相会 非常高兴。到了旅馆 闲谈起来 京子夫人说看见巴金，他们就放心了。

六月二十四日 学习《红旗》杂志社论，听金敬迈朗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六月二十七日 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幕式。会议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到会讲话。参加会议的有亚非四十七个国家与地区、三个国际组织的一百五十二位作家与观察员。

六月二十八日 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全体会议。

六月

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经常与陈毅会晤并亲切交谈。

致萧珊信五封。告之准备好学习，参加这次国际斗争，提及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热火朝天；身心都好，能吃能睡。什么地方都没去，什么人也沒有找；感谢棠棠的“警告”，觉得“孩子们都走在我们前头了”，是可喜的，要迎头赶上；告之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一切都很顺利等。

七月二日 观看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们作的专场演出。

七月九日 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闭幕式。下午，与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们一起，在新疆厅参加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活动。晚，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招待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宾的宴会，遇到主持招待会的周恩来总理，握手并亲切交谈。

七月十日 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会上最后一次看见周恩来。会上，与老舍、中岛健藏等参加了主席团。看见老舍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在谈话，“感到意外”和“万分高

兴”，因为到京出席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人提到老舍。此时听老舍说的“请告诉同志们，我没有问题”时，终于放心。会前在休息厅又看到挚友顾均正，大家都很高兴，会前坐在一起闲聊。因陪外宾活动多，婉谢了到顾均正新居幸福村小聚的邀请。此后与顾均正一别就是十二年，与老舍却是最后一面。

七月十二日 在民族宫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感动得热泪盈眶。

七月十六日 与郭沫若、许广平、刘白羽在武昌陪外国朋友看五千人横渡长江。晚上，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很感动。

七月十七日 在武汉，参加毛泽东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与观察员的盛大活动。

七月中旬 在武昌机场送别中岛健藏及其夫人，告别时对着民航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与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

七月二十日 下午，与萧珊去作协，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听工人、教师、《收获》编辑和文学研究所同志揭发以群。

七月二十三日 去作协，参加作协内部全体大会，批判以群和孔罗荪。

七月下旬 为筹备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在杭州举行的“湖上大联欢”，带领一些工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宾离沪回国，又欢送郭沫若回北京，关切地询问郭沫若手指的伤情。这是巴金最后一次见到郭沫若。

八月四日 去锦江饭店陪外宾到市人委礼堂出席音乐舞蹈晚会，台上台下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散场后，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

八月六日 偕芦芒、孟波等到机场欢送部分亚非作家离沪回国，又与北京来的作家曹禺等在机场告别，“他们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外表上我还是相当镇静，可是内心却非常空虚。”

八月七日 送走亚非作家后，回上海作协参加运动。被编在创作组里学习。创作组组长是工人作家胡万春。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毒汁四溅”，绝大多数是针对以群、孔罗荪两人的。也有几张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晚上，与杜宣、哈华等到文化广场，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李雪峰、江青等对北京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员工讲话的录音。

八月十日 下午一时半，同

萧珊乘三轮车到上海作协。两点钟在大厅参加“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发言人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巴金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

“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四点半休息后开小会，到五点半散会。会后惊悉以群已于八月二日跳楼“自杀”。

八月上旬 与老友陈同生晤面。接受了陈赠送的一个雕有“喜鹊闹梅”的陶瓷灯架，这时陈同生已经靠边，而巴金也快要失去自由。送他走出大门时，颇觉得依依不舍。不久，惊悉陈同生“伏在煤气灶上”“自尽身亡”。想起陈不久前“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决不自杀”和“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等事，知道陈死得冤枉，遂感到今后的日子难过。

八月十三日 写北京要的关于阳翰笙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活动的材料，下午，看到学生游行队伍。晚上，看影片《特快列车》，很感动，深叹这个时代的伟大和毛主席思想的光辉。

八月十四日 去作协，和全体同志游行到市委递交决心书，表示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八月十六日 去作协，看到几张关于自己的大字报，遂找小组长峻青谈话，说明对大字报的

态度，愿意听党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改造自己。饭后，睡不着，起来读“老三篇”。

八月十七日 去作协，看到第一张揭发萧珊的大字报。下午，写信给作协表示态度。

八月十八日 听广播，听到北京百万人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实况转播。下午，读“老三篇”。晚上读《人民日报》转载的一些揭露周扬污蔑鲁迅的大字报，看到鲁迅手写的一段关于答徐懋庸的原稿。

八月十九日 去作协，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大字报中有自己的名字，心里不好受。晚上，看电视节目上海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和游行。李小林回家，谈到学校的运动，为孩子的革命热情感动。

八月二十日 去作协，看见柯灵等在打扫卫生，于是也去倒痰盂、洗烟缸。

八月二十二日 去作协，黄宗英、唐克新、费礼文对巴金提意见，并要求交代和孔罗荪的关系。

八月二十四日 红卫兵来往不绝，宣传毛泽东思想，又看到一张向自己猛烈开火的大字报。中午，写了愿意接受批评的信，连夜抄好，服眠尔通入睡。

八月二十五日 红卫兵到隔壁抄家，感到可怕。深夜与萧珊商量，决定让大妹妹琼如把小狗

包弟送给上电医院，供科研人员做实验用。事后为“不能保护一条小狗”而“感到耻辱”和“瞧不起自己”，家门前经常有小孩叫喊“打倒”的口号，或把石子等杂物扔进围墙内的草地。

八月底

继续学习《为人民服务》，感动。

夜深人静时，忍痛与萧珊、九妹等一起把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巴金大哥的来信全部烧掉，共一百几十封，已装订成三册，系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所写，还有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也付之一炬。烧毁古典小说《金瓶梅》。听说红卫兵来了，什么都抄。不想叫他们读这部书。

接“造反派”通知，脱离“创作组”，与柯灵、白危“到作协资料室二楼自学”，“写点交待检查”。不久柯灵被电影厂造反派揪走，黄宗英被“揪”回电影厂，魏金枝被“揪”回师范学院，感到“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

收到读者来信 说巴金的笔名要不得，是四旧，是崇洋媚外，应当“砸烂”。巴金胆战心惊 立刻回信，表示同意 说今后绝不再用。这时已经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只有“罪孽深重”四个大字。

九月初 有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巴金 说“态度不老实 革命

群众要采取行动”。

九月十日 被“造反派”押解回家，目睹他们“保护性的抄家”。这是第一次的抄家，从上午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也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将巴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在带走的几口袋东西中，有近几年的日记。造反派临走时，还在门廊的入口处，贴了一张揭发巴金罪行的大字报。“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听见捶门声就得浑身发抖”。但仍抱着“希望”——“对我会从宽吧”。巴金从此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九月中旬 被拉到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挨斗的同时，也举手高呼“打倒巴金”。“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 好像我就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 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 让人们剥夺我的‘人权’。”

十月上旬 与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接受批斗。在厨房劳动时，见一个中学生“红卫兵”正用鞭子逐一抽打所谓“牛鬼蛇神”，只好立即四处逃奔。巴金后来回忆说，当

时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这时，正好作协造反派前来“提审”，巴金被押至大厅，接受串连学生的批斗，终于幸免一场鞭打。

十月二十一日 下午，与上海作协分会被打成“牛鬼”的作家们在草地上拔杂草，偶然发现身边有两个“红卫兵”也在默默地拔着，并不时投来善意的眼光。在这把人变成兽的年月，在“造反有理”的时代，心中掠过一丝暖意。

十月 “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 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别人彻底打倒，以便……重新做人”；每次批斗之后，按“造反派”指令“写‘思想汇报’”，“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造反派’是我的救星”。在作协召开的各种名目的批斗巴金的会上，萧珊开始“陪斗”。批斗后常与萧珊用一句话互相鼓舞：“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十一月上旬 看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后回家的萧珊说：看来问题不大，电影还出现“巴金”两字。但两三天后，又听说上海作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协“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拿着大字报，气势汹汹地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去造反了，心又一阵发凉。

十一月中旬 获悉《英雄儿女》作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国上演。共放五部，据说是周总理挑选的。

十一月 眼看李小林在家里呆不下去，遂允许她与同学外出串连。并嘱她经过杭州时去探望方令孺。后获悉当时方虽然靠边，却未受到隔离审查，还留李小林在白乐桥家中住了一晚，并借给一些零用钱。

十二月中旬 被“押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接受“造反派”批斗，被迫在台上跪了两小时，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周予同、朱东润等“陪斗”。

十二月

多次被“抄家”。

有一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闹了几小时，最后将巴金和萧珊、巴金的两个妹妹、李小林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东西；以后几天，学生又来乱翻乱拿。

巴金后来回忆说：“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门口，起初翻墙入内，后来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最可笑的是，有个短时期我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

遭“造反派”带有威胁性的训斥，从他们含糊其词的“小道新闻”中，猜测到老舍已横遭不幸。



在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和小园子里，通阴沟、打扫厕所、写交代，随时接受批斗。见到园子里鲁迅塑像，“才有勇气活下去”。

全市召开对巴金的电视批斗大会，被迫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毒草”。

六十四岁

一月 与魏金枝、王西彦等被赶出因存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报刊而被姚文元称为“上海的黑书库”的巨鹿路作协“资料室”，关在楼上一处不到五平方米煤气灶间的“小牛棚”，一日三次“请罪”之外，就打扫厕所、洗菜、扫地或锄草等。

二月

某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红卫兵”闯进室内。眼看他们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打碎，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

仍在作协“小牛棚”里“学习”。除了干活，便是背语录、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看到两条大幅标语：“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彻底批判邪书十四卷——《巴金文集》”。

三月

在“牛棚”的那一段时间里，每天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

“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巴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

四月 天津作家方纪来探望两次，劝说要早日“亮相”，“态度很重要”可避免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不必要的批斗。

五月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期间，首都演出了以《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八个“样板戏”，《人民日报》又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于是作协分会的“造反派”也组织被称为“牛鬼”的人学习“样板戏”。巴金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拿着当天的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在这些日子里巴金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文艺，其余全是废品。“我彻底否定了自己。我丧失了是非观念。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唯唯诺诺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低着头，躲着人，最怕听见人提到我的名

字，讲起我写过的小说”。“那时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

像前四五个月一样，经常在做协分会的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

上海作协园子里的草地上有一座鲁迅先生的塑像 巴金回忆说：“还是那一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使他想起鲁迅的教诲和为人，回忆当年“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玻璃棺盖下面“先生的慈祥的面颜”，在残酷的“牛棚”中“我才有勇气活下去”。

七月 继续在上海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劳动，继续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并开始写《劳动日记》，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另外在一本练习本上写日记，记录当天发生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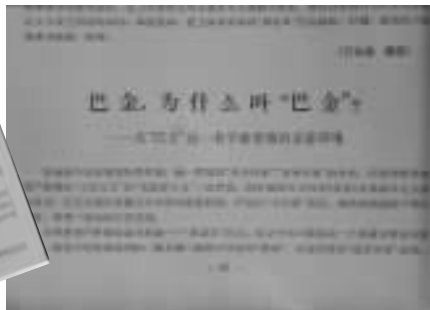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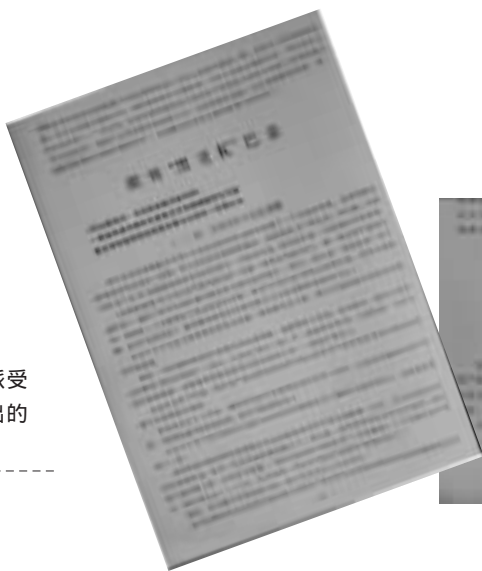
事。同时，因为“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写至八月底被迫中断。

八月十六日 读《人民日报》摘要发表的一九五九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不久又读到报上批判所谓“彭德怀与巴金反革命勾结”的文章，担心自己的问题又要“升级”了。

八月底 接受参加“巴金专案组”的复旦大学红卫兵的勒令，被迫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持续两个星期。在批斗会上巴金低头认罪，承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会后到“牛棚”写“认罪书”或思想汇报，承认“用软刀子杀人”以期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庆幸又过了一关。

九月十八日 被复旦大学中

“文革”中造反派受“四人帮”唆使而写出的“批判”巴金的文章。



文系部分“红卫兵”揪到学校，在学生宿舍六号楼里住了约一个月。

九月二十四日 晚饭后，在六号楼前散步，从一姓李的学生处获悉，最近赵丹也被批斗，但赵丹毫不在乎。

九月二十六日 上午，被揪到复旦大学大礼堂批斗。

十月

“造反派”在上海作协旧址批斗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巴金被拉去陪斗 弯腰低头两个多小时，汗水湿透全身。

在杂技场等处挨批斗——名为全市电视批判大会实况。其时批判会前照例要高奏《东方红》乐曲。巴金后来回忆说：“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时候我听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我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低头弯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斗了三四年”。

某雨夜，在楼下小屋一张黑色椭圆形桌子边上接待上身穿军服的天津青年文放。当文放告知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巴金沉默良久后表示：“要活下去，不能走那条路。”

十二月 继续接受批斗。被勒令“交待”“从事无政府主义反动宣传”和“写反革命文章”的“罪行”，“交待”与索非、毛一波、卢剑波等的“反动关系”。

一九六七年内

获悉姚文元在一次报告中点了巴金的名，说巴金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仿佛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切无政府状态，连他们搞的在内，都要我来负责。”

“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東西丟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



收有“批判”巴金文章的“文革”印刷品。



读到《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文章，像是“当头一棒”，萧珊也时常哭泣。

接受造反派和“工宣队”的“勒令”：罚站、下跪、将头发剪成“平头”、下乡干活等。

文化系统召开批判巴金电视大会。

女儿李小林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儿子李小棠到安徽插队落户。

六十五岁

一月上中旬 被迫接受上海市作协“造反派”的“勒令”，全家搬到武康路住房的楼下去，楼上的房间全部被封起来。大学生中的红卫兵造反派“进驻”作协。与王西彦、吴强、师陀、孔罗荪等一同被传讯审问，又与大家一起跪在大厅里，“有人给打掉了牙齿”。

一月下旬

一天审问结束，被一个造反派头头叫到草坪上去训话，备受侮辱，又挨谩骂，没有人敢哼一声，巴金也只好任人摆布，想“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也随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在全市召开批斗陈丕显、石西民的大会时，与吴强、赵丹等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被揪到上海杂技场参加陪斗，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都低着头，有时被点到名喝斥叫回答问题，只好说“是”或“有”。会场内外是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一片“砸烂狗头”的怒吼声。

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每天在“牛棚”写一段日记。“我的用意已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了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

德’。”不到两个月，这本日记被造反派从“牛棚”的抽屉中抄走。

二月二十六日 读报，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胡万春等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儿子李小棠刚从农村回来，立刻将报纸藏起来。晚饭后，萧珊找到了报纸。巴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

三月 上海作协造反派和“监督组”搜查“牛棚”。巴金被迫打开抽屉。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待”、“思想汇报”的底稿等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从此没有再写日记。

六月二十日 被押到上海人

民杂技扬，在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电视大会“接受”批斗。被罚站、按头、反剪双手，汗水湿透衣衫，还要随时准备回答“批判者”提出的问题。批斗会还没开始，先是一片“打倒”声，接着是“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开始还听着，待“造反派”不顾事实，胡说一通，巴金就悄悄地观察他们，对那些受了蒙蔽的“政治工具”更加蔑视。被批斗约两个多小时。

六月

这些日子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跟鬼怪战斗”，“鬼怪三头六臂……张牙舞爪向我奔来”；一次深夜，一个人睡在小房间内，梦中“挥舞双手”，打碎了床头台灯

的灯泡。

长女李小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九月 随作协上海分会从巨鹿路迁移石门路一座大楼里，住进了“大牛棚”，每天仍是“站队”、背诵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呼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整天“劳动改造”即打扫厕所、掏阴沟等。

十月上旬 学习《人民日报》刊登的柳河干校经验及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的指示，作好下乡劳动准备。到上海郊区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戴一顶小草帽，走路一跛一跛的，尽干



报上刊登的
“揭露”巴金的文章。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重活，吃“造反派”剩饭，也吃“忆苦饭”。在田头挨过几次批斗，有一位曾被当做“中国的希望”的“年轻诗人”，“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编造了“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的假话。又因出身地主家庭，挨斗的次数多，有时造反派还把当地地主拉来“陪斗”。此时已冷漠，有了些“批斗经验”，更加蔑视，只是随口应诺。这样的“生活”过了近一个月。下旬，从上海近郊的松江县辰山公社回到市区石门路“大牛棚”。正值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接受”“工宣队”批斗，写交代检查和思想汇报。有时被拉去参加“宽严大会”。

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牛棚”中劳动、学习时，聆听了刚

发表的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后，为不足二十岁的儿子李小棠将远离父母、家庭去农村插队落户而担心。

一九六八年内

获悉老友卢剑波患冠心病，心绞痛时常发作。遂嘱胞弟李济生和胞妹李瑞珏设法寄冠心苏合丸给家住成都的卢剑波。

从《文汇报》上一篇文章获悉，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里一女青年专心读《家》，有人说这是“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又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巴金回忆说，读了这篇文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

儒”。又与作协分会十几个“牛鬼”集中在一起，接受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的“训话”，挨了一通骂后，被勒令“改剪平头”。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虽然“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但以后每次去理发店，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在“工宣队”监督下，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接受“革命群众”的考查，被押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考卷中有默写毛主席诗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结果“成绩不好，闹了笑话”。其时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她一紧张，“交了白卷”，气得连中饭也不吃。



偕萧珊送爱子李小棠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

受“造反派”各种无休止的愚弄、侮辱和折磨，想“自杀”，因萧珊的深情等故决心“活下去”。

勒令谈学习“样板戏”的体会：捧一通戏，捧一通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再骂一通自己。最后是“革命左派”把巴金又骂一通。

已看透了“革命左派”用美丽词藻装饰的谎言；意外地获得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默诵但丁诗句，获得了勇气。

六十六岁

一月二日 偕萧珊送爱子李小棠到公共汽车站，然后由亲戚将他送至北站，奔赴安徽嘉山县明光村插队落户。

二月上旬 随作协从石门路迁回巨鹿路旧址。不久，被允许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春节不放假，“参加”各种名目的“训话”和批斗会。

五月二十三日 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上作“思想汇报”，“班组头头大加表扬”。头头把写好的“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伏罪”的“诚意”。

五月下旬 与萧珊谈“头头表扬”事，萧珊盼颁布大赦令。但突然又被揪出批斗，罪名是“假意认罪，骗取同情”。从此明白了自己虽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仍不免要“受骗”，由别人愚弄，终于感到“空虚”、“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

六月初 又去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夏”劳动。在小学校教室里的泥土地上铺上薄薄一层稻草，与王西彦等就睡在“稻草铺”上。照例被当做各种各样需要的“活靶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子”。一天上午，又在田头与地主一起挨斗，一同低头“认罪”。

八月 按“造反派”“指令”，在“牛鬼组”里学习“样板戏”，读报上“样板”剧本，仍然是“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表示决心“改造自己”，“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

九月下旬 “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后因林彪“一号通令”下达，留在辰山公社继续劳动。

十月下旬 由一位“青年诗人”、“革命左派”主持，回家前去学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联系戏中的英雄人物和唱词，“骂自己，歌颂‘革命旗手’，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想讲几句“应付过去”，“主持者”“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埋头不看

他，心想他是“大骗子”，但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为了明天能“顺利返家”，忍气“挨了诗人不少训斥”，回到房间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吐了一口气，“心上隐隐发痛”。

十一月 辰山公社劳动期间，在一次班组学习会上，造反派硬把旧作《给一个中学青年》中“腹地”理解为“心腹之患的地方”，因而被揭发批判，强迫交代在一九三一年就“鼓励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的“罪行”，因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再三“替自己辩护”，但没有用，仍受到“围攻”。不久，被“揪”到全连学习会上批斗。“会前两位‘革命左派’找我谈话，要我老实交代，承认罪行，并对我进行威胁”，我已经看透了那些用美丽辞藻装饰的谎言，……坚持‘腹地’只有一个解释：内地”，后来因“厌倦”造反派的胡搅蛮缠，终于“放弃了斗争”。然而

却觉得“脑子”“清醒”了，批斗会“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剥下了“骗子”的“面具”。距前近一周，见《文汇报》、《人民日报》上刊出的一条国际消息中有“腹地”一词，过两三天又出现了另一条类似的消息，均作“内地”解释，遂“把两条消息抄录在笔记本上，心里想以后也许用得着它们”。

十二月 获悉将转移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和参加所谓“斗、批、改”。不久，回家休假，作长期下乡准备。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 G. Campi 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默诵但丁的诗句，认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喂猪、抬粪水等，还不时被押到各处挨批斗。

遭“军宣队”训斥，心里更加蔑视他们。

六十七岁

一月上旬 被“勒令”到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长期参加“劳动”，与“牛鬼”们同居一室，被安排住双人床的上铺，每晚爬上爬下，二月初，换到下铺。晚上常从噩梦中惊醒，有一次还从床上跌下来，幸亏在下铺，不曾受伤。白天，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有一次曾摔进沟里，连眼镜也丢掉了，只好赤着脚去摸。在干校劳动两年半时间，曾被多次“揪”到郊县和市区批斗。不断地写“检查”。

十月中旬 获悉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二十周年，影片《英雄儿女》等在全国上映。一共开放了五部电影，据说是周恩来挑选的。当时巴金在干校，有人找他谈话，问他感想，巴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小说无关，小说还是毒草。不久因有人打小报告，以“翘尾巴”之罪，遭军宣队代表训斥：“你不要以为电影又上演了，它就没有缺点，我看它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恭顺了。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随便你怎样说吧，反正权在你手里，你有理。”



“工宣队”认为巴金“罪行”十分严重，判“十个死刑也不多”。

六十八岁

整年在上海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四连“劳动”。九月底曾获准回上海度假。
“工宣队”老师傅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



因萧珊是“巴金老婆”，医院拒绝为她治病，开后门托人找关系才得以进医院检查，又误诊。最后才知道萧珊患了不治之症。

灾难中，竟先后收到老友沈从文和穆旦的来信，倍感友情贵重。

萧珊病故，在白布裹着的遗体边最后一次与爱妻合影，“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六十九岁



巴金《怀念萧珊》：“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月十日 清晨，从“五七”干校广播中获悉陈毅追悼会的实况。当时“怎么也不相信生龙活虎的陈毅同志会离开我们”；报纸来后，看见毛泽东佩带黑纱面色忧伤地站在灵前，周恩来悲痛地念悼词，遂回忆与陈毅的多次晤面。

二至三月 从干校回家休假，见萧珊发烧，时常卧床，曾去就医，医院均因“是巴金老婆”而拒绝诊治。遂一再托人，终于“开后门”在一家医院照了直肠镜，这次没有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发现癌变，后来才知道，癌变部位在结肠结处。几天后，又别萧珊返“五七”干校。

五月 继续在“五七”干校“劳动”学习，常从噩梦中惊醒。白天，常常有被“揪”回上海接受批斗的可能。有一天，被“揪”回上海，被迫接受触及灵魂的批斗后，第二天到巨鹿路作协学习。刚在指定的屋子坐下，就进来一个在“干校”见过的年轻的姑娘，对方自我介绍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又是沈从文的亲戚。巴金偶然获悉沈从文一家平安，觉得是好消息；当姑娘说沈从文要自己的地址时，只简单地说了句：“我仍住在原处。”

六月上中旬 在“干校”，巴金又遇见了上次见过的音乐学院的年轻姑娘。“她说沈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连’，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遵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巴金在若干年后，还为此感到惭愧，曾几何时，他的信念是：“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而现在却变得“如此缺乏勇气”了！

六月中旬 从奉贤县“五七”干校回家度假，见萧珊病情加重，已不能起床。经恳求获准两次假，在家照看她。一天四次

为萧珊量体温。当体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时，忙与家人送她看急诊，配点药或“吊盐水”，终因不能住院检查，仍不能确诊，耽误了病情。其间，巴金给文化系统直属四连的工宣队“头头”打了报告，陈述了萧珊病况日重，摄氏三十九度高烧不退。急诊、看中医、服中药、拍片子、进一步检查、治疗需要药费，开支相当困难。要求从被冻结的存款中另发医药费等。

七月十六日 找作协工宣队头头续假，照料萧珊。看见萧珊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要求延长假期；女儿、女婿……跑到巨鹿路向“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巴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以“留在家里对他按指巴金改造不利”为借口“逼着我第二天回干校去”。晚，收拾简单行装，准备回干校。当夜，与萧珊均辗转不能入眠。又接到沈从文长达五页的来信，信中说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沈从文还是像三十年代那样关心巴金，希望他回信。见萧珊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心中产生了对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的感激之情。

七月十七日 清晨，意外地发现在安徽插队的儿子李小棠回

家了，只见李小棠疲惫不堪。是昨天半夜到的。他得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遂把他母亲交给他，巴金就回干校了。

七月二十二日 因惦念萧珊的病，感到度日如年。晚，得“指令”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

七月二十三日 上午，到家，获悉由朋友千方百计帮忙，萧珊明日可住进中山医院作病体检查。见萧珊病更加重，在床边侍候，相对无言。又接待双目失明、前来与女儿告别的岳父。下午，由工宣队“押送”，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回家后，“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听到萧珊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时，心头默然，“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着重病的妻子和生病的儿子，“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

七月二十四日 送萧珊住进中山医院，“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工宣队头头通知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从他的谈话中揣摩到萧珊已患了不治之症。以后，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照料她，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萧珊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

八月八日 中午，从医生处获悉萧珊病情恶化：她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又无奈，又悲痛，巴金作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萧珊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病重的萧珊看着巴金和儿子李小棠，又断断续续地说：“以后谁来照顾你呢？……还有他。”“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嘶哑了。”几小时过去了，医护人员说，手术良好。见萧珊由儿子推回病房，才松了口气。

八月十日 发现儿子李小棠患肝炎，经护士长帮忙才住进隔离病室。

八月中旬 白天守在萧珊病床前，默默地看着萧珊吊盐水、输血、接氧气，“她非常安静”，“始终睁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八月十三日 上午，因儿子

是肝炎病人，在家配合卫生防疫站进行消毒工作。中午，接电话，获悉萧珊病危。与女儿李小林、女婿祝鸿生等赶到中山医院，见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赶忙去太平间，发现萧珊“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八月十六日 在龙华火葬场中厅为萧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巴金穿着不整洁的白衬衫，伫立在萧珊遗体前，让“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巴金和萧珊的这些记录着生离死别、血和泪的照片，事后均由巴金的九妹李琼如收藏在住室的箱子里。

八月下旬 由女儿、女婿陪同，前往火葬场领取萧珊骨灰盒。本来要将骨灰盒放在家里，孩子们怕影响大家的情绪，遂同意办理寄存三年的手续，安放在龙华火葬场二楼六室八排四一七号四格。料理完萧珊的后事，“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

一句话。……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萧珊逝世后，接好友、翻译家查良铮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名诗人、《九叶集》作者之一穆旦的信。对查的劝慰和鼓励，深为感激。

九月 得悉工宣队头头“通知”，结束在“五七”干校两年半的“劳动”生活，仍回巨鹿路上海作协分会旧址劳动、学习。被认为是“死老虎”，批斗减少。但有时在小组学习时，还遭到“围攻”。

十月二十七日 致信查良铮。告之“脑子里仿佛一团乱麻”以及萧珊的骨灰寄存处，对查良铮的关心，表示感谢等。

十一月四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文革”中自己“靠边”、萧珊病故和儿子李小棠插队、患病以及住处“楼上加了封”等情况，并云“别的话将来再谈”。又致信侄儿李致，署名尧棠。告之一直不给李致写信，是怕给他找麻烦；自己仍在靠边，云：“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继续在巨鹿路上海作协分会旧址劳动、学习。



获悉其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等决定对巴金“不戴反革命帽子”，可以“做点翻译工作”。

老友杨苡即杨静如和评论家陈丹晨来访。

发誓“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

七十岁

一至二月 继续在“文化系统四连”即巨鹿路上海作协“劳动”、“学习”，写检查。

三月 在上海作协写读书笔记和“思想汇报”。

四月底 接到萧珊生前挚友杨苡即杨静如信 获悉杨将从南京悄悄来沪看望巴金一家。

五月初 嘱李瑞珏和李小林前往北站迎接杨静如 并亲自去菜场购买老母鸡 摘自己在庭园中种的蚕豆。晤面时都强忍着几次想溢的泪水，专门谈些在农场或干校劳动时如何苦中作乐的话题。杨静如有时摘下眼镜 擦着眼角溢出的泪水 说是眼睛不好。巴金从杨静如处获悉，当年老舍惨遭“造反派”毒打。一直在楼前厅里聊天，其时楼上的房间还贴着封条。谈话时，仿佛彼此达成默契，谁也不提萧珊。

六月二日 致信儿子李小棠。告之大家想念他。

七月上旬 一天上午，被叫到上海作协楼下东厅，听“文化系统四连”党支部书记口头宣布，由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人作出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

费’”。所谓“发给生活费”，也仅仅是经工宣队研究决定，获准到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巴金自己的存款。每月取三百元，其中包括房租一百五十元。当时，“没有抗议”，后又被获准“做点翻译工作”。以后每天上班，学习时仍遭到一通“围攻”。此后巴金有空便躲在楼上小屋里重译《处女地》，直至译完全书。

七月十二日 致信李小棠。担心本人不在他会出问题，建议李小棠等考试录取通知书发出后再回沪。

七月十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近况，从下周起，到机关去三个半天，并请转告大嫂和几个侄女。

七月十七日 开始每星期二、六上午挤公共汽车到巨鹿路上海作协分会“上班”，学习马

列著作等，但不能听内部先传达的“中央文件”，有时还要继续写检查。一有空余时间，就继续翻译《处女地》。

七月约中旬 晚上，在寓所与九妹一起接待专程来访的陈丹晨 深为陈的关心所感动，遂据实告之近况。

八月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没有什么变动。表示会安心等待。

八月 获悉日本九十多岁的友好人士土岐善磨先生来中国，要求见巴金，头头请示后不让接见。暗下决心：“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不敢写日记，怕连累别人；不想搞创作，遂搞翻译。

九月一日 致信李小棠。告

之进不进大学是小事，虽然希望落空感到不快，但是别急坏身体。

十月二十八日 接到卢剑波的信，其夫人想借《约翰·克利斯朵夫》。又致信李致。将找到的四册《约翰·克利斯朵夫》寄赠李致，并告之，可与卢剑波联系等。

十一月三日 致信李健吾。告之除看书搞翻译外，还做家务，失去萧珊，感到束手无策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信李致。告之眼力不行，按李致寄来的单方服用李采臣寄来的枸杞和核桃；寄赠《稼轩长短句》等五册书给李致等。



老友沈从文到寓所来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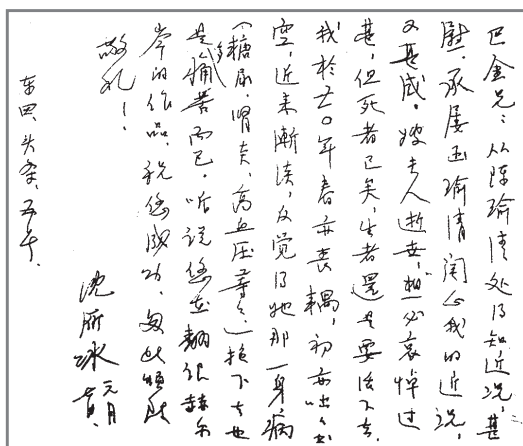
继续翻译《往事与随想》，“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七十一岁

一月六日 致信李致。告之生活安定、安静，开始翻译赫尔岑；李小棠将从乡下回来过春节等。

约一月 接茅盾元月七日信，劝巴金“死者已矣，生者还是要活下去”，并云：“听说您在翻译赫尔岑的作品，祝您成功。”

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茅盾致巴金信手迹。



二月中旬 获悉北京掀起旨在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批黑画”运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他们召开的大会小会上随意点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的艺术家会突然地被揪出来作“靶子”。巴金后来回忆说，它使我看出“谁有权势谁就有理”；我又明白“那些以批斗别人为乐的人是踏着别人的尸首青云直上的”，我还“想起了给捣毁了的杭州的岳飞庙和跪在岳坟前的四个铁像”。

四月二十六日 致信李致。告之李小林六月中要做母亲了。

五月 嘱咐在杭州工作的女婿，前往白乐桥探望七十八岁的方令孺，并告以自己已能“翻译”的近况。不久，接方令孺来信，获悉她晚景很“寂寞”。但终因自己“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不便经常给她去信”。

六月二十五日 欣见外孙女端端即祝云立出世，十分钟爱，内心又萌生出一丝新的希望。

六月下旬 在寓所会见抵沪

探亲访友的沈从文。获悉沈从文患心脏病，眼睛也不好。正值非常时期，挚友来访，说不尽的欣慰和感激。

七月十四日 致信李健吾。感谢李健吾和汝龙夫妇带来的“厚意”等。

八月二十八日 接卢剑波信。获悉大嫂身体好、侄女国炜生病等。

八月二十九日 致信李致。告之要的书有的锁在书房里、有的没有等。

八月 作《处女地 新版译后记》，载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人民日报》。简介“关心祖国命运”的屠格涅夫的生平和思想，并借此表达“要改变……当时存在的一切”的心情，抒发了对自己“伟大的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人在失去了说话的权利后，不能不用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强烈的愤懑之意”。

九月 抄完《处女地》重译稿，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

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三十年代初曾与鲁迅谈及此事，并已在鲁迅编辑的刊物上发表过片断译文，“现在，明确知道，自己写的每一个字、一片纸根本没有哪个出版社敢于出版”但仍蛰居自己家原汽车房的小顶楼上，冒着酷暑，借小窗透进来的一线光亮，开始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边翻译，边“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除一周两次上午到巨鹿路上海作协学习外，继续在家中原汽车房小顶楼上翻译《往事与随想》。

十二月十一日 致信李致。嘱侄儿正在壮年，要注意保护眼睛。

十二月十三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已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十多万字”及自己一家的近况。



正值萧珊去世三周年祭，巴金将
骨灰领回，安放在他的寝室里。

单位党支部头头宣布巴金到上海
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报到。

七十二岁

一月 全年继续翻译《往事与随想》。因资料和工具书缺乏 又感“身体虚弱” 翻译进度不快 每天数百字。

一月十九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近况：看点书，搞点翻译，生活倒很安定；儿子李小棠还在农村“锻炼”；以及作家沈从文来上海到过寓所一次，沈后去南京，再去黄山等简况。

二月初 收到杨静如和赵瑞蕤信及寄来的《鲁迅选集》和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资料等。

二月五至六日 五日晚，儿子李小棠从安徽嘉山县明光村返沪过年。六日，女婿祝鸿生从杭州返沪。家中开始热闹起来，外孙女小端端一天天大起来，大家都喜欢她。致信杨静如。告之“记忆力衰退” 仍决心译完赫尔岑的一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认为“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请杨静如寻找和寄赠南京大学出版的《红楼梦 研究中各种错误观点辑录》和《红楼梦 人名索引》；并云南京大学出版的另一本《红楼梦 研究资料书目索引》自己已有一册。

二月七日 致信李致。告之每天少有空闲的时候：除了到机关学习、散步外，在家

听广播讲座念日语，搞翻译，译赫尔岑的《回忆录》，还读点别的外国文和世界语等。

二月十一日 春节，与家人团聚。

三月三日 致信李致。告之愿花不到十年的时问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并不想出版，“将来留下一部誊正的手稿，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点用处”。

四月 身体不适，停数日后继续翻译《往事与随想》。二十三日，致信李舒。告之侄孙李舒寄赠他《辞海》一套，并云翻译赫尔岑等于做读书笔记帮助自己学习等。

五月四日 致信李致。告之因为读写较多，眼睛还是不好等。

五月十七日 致信李舒。为李舒到青川开始工作感到高兴。

六月一日 致信李致。告之将来会将一些翻译书寄赠李致等。

八月中旬 值萧珊去世三周年祭，按期将骨灰盒接回家中，安放在楼下寝室的五斗橱上。

“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决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

结局连在一起。”在巨鹿路“文化系统四连”即原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楼下东厅“四连”党支部书记“口头宣布”，巴金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第二天上午到出版社组织处报到，被分到“编译室”。回家后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又去出版社“编译室”报到时，强调有病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于是“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单位参加学习”。第一次参加“编译室”的学习，在路上遇到该室的翻译家满涛，由于满涛的热情和欢迎态度而感到“温暖”。学习时，气氛不太紧张听大家“开无轨电车”，“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我也会鼓起勇气讲几句话，或者照抄报上言论，或者骂骂自己”，但为这样耗费时间感到可悲。

九月十三日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自己将到编译室工作参加学习，李小林将去杭州工作，准备调李小棠回上海等。

九月十七日 致信李舒。告之自己的“业务关系”已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去了。

九月 嘱在杭州工作的女儿李小林，抽空多去看看八十高龄的方令孺，给她孤寂的生活中“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获悉著名画家丰子恺病逝于医院急诊室，有关单位将为他开追悼会。巴金因不曾得到解放，不能参加，但心中为受冤屈、遭迫害的

友人不平，认为“与其在死后怀念他，不如在生前爱护他”。

十月 继续翻译《往事与随想》。十二日，致信李舒。告之“金圣叹是个极端反动的文人，他连宋江的投降主义也不喜欢”等。

十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以前大嫂寄来的胡椒面、花椒面不错，嘱李致再寄点来等；又云：从去年开始，由琼如、瑞珏、济生等提议自己生日那天“吃一顿，‘热闹’一下，我也就随俗了”。又从现代作家韩侍桁接到的冯雪峰致韩的信中获悉，友人冯雪峰“癌细胞转移”，“喉哑不能说话”，且因气管炎和肺气肿，夜晚也不能好好睡觉；又获悉冯对巴金每次给某同志信中都问及他病情的事“非常感激”，以及冯“想到南方一次，看看巴兄和其他朋友”。

十一月五日 致信查良铮。感谢查良铮托人带来萧珊生前爱吃的咖啡糖等。

十二月七日 致信查良铮。

十二月二十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眼疾诊断结果为泪管堵塞，常到医院去通通就好。



惊悉周恩来总理逝世。赞“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与茅盾一起，被英国有关人士推荐竞选诺贝尔文学奖。

编者用“一个读者”为名，发表了十年浩劫中巴金唯一公开的一封信，指出某刊关于鲁迅与内山完造谈话的史料有误。

惊悉毛泽东主席病逝；不久又欣闻“四人帮”被粉碎。“感到自己年轻了”。

七十三岁

一月九日 凌晨，刚刚打开收音机，意外地听到了哀乐，又听同住一室的儿子李小棠惊呼“总理”，始惊悉总理逝世，顿感“我的希望破灭了”，心中充满了对陷害、迫害周总理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我想到这位大公无私连骨灰也献给祖国大地的伟大人物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怒火燃烧着我的心”。

一月中旬 获悉传闻，周恩来逝世，“有人不许我们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让送花圈”。

一月十五日 寒夜，在寓所观看北京举行的周恩来追悼大会电视实况转播。心中对“在荧光屏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摇去，又不脱帽，表现得最奇特的江青无比愤恨”。转播结束后，仍在黑暗中木然呆坐良久。

一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总理逝世，感到悲痛，“我忘记不了他”；希望李致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等。

二月八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自己的情况与王西彦、柯灵、罗荪“相近”，“并无大变化”；并云“总理逝世，……比丧失亲人还难过”，赞“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又向友人“讨一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教资料简报》编辑部编印的

《红楼梦 研究新编书录》，还托友人“另弄一册”《红楼梦 诗词注释》。

三月五日 致信李致。寄赠《鲁迅日记》，告之怕李小棠他们找到和翻看《金瓶梅》，在运动初期就烧掉了，“这部书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三月 致李小林信二封。告之，小祝已回来，端端很乖，“生龙活虎”等。

四月中旬 在寓所接待一位为总理戴黑纱超过了三个月的朋友，“替她担心”，并“为自己的怯懦感到惭愧”。

四月二十日 致信李致。告之将一九四二年从成都带走的《九三年》寄回。认为书上有大哥李尧枚的图章，还是由李致保存更好。

四月 致李小林信三封。告之李小棠事还拖着，嘱为端端买奶粉和喜欢玩的杭州菜篮等。

五月六日 致信李致。告之李小棠调令已发出，过几天回安徽嘉山县明光大队办手续等。

五月二十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女儿、女婿：李小棠的事大概无大问题，端端很好等。

六月下旬 在通阴沟后，又抱小端端撒尿，不慎扭伤了腰，拔火罐，贴膏药，折腾了两三周，不能久坐。

六月 致李小林信五封。告之女儿、女婿，李小棠七日开始

到街道办帮忙，每月工资二十元，情绪很好；托朋友带去赤豆、红枣；端端常发烧，九姑妈没有经验，希望女儿、女婿能请假回来出出主意等。又致杨静如信二封。告之自己生活如常；托杨静如购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出版的《红楼梦 版本论丛》等。曾在寓所会见现代诗人、《九叶集》作者之一、萧珊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杜运燮。获悉对方从北京调到山西下放劳动多年，近期已调往山西师范学院工作。

七月 前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参加学习时，惊悉二十多年来“工作积极”的翻译家满涛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心中为满涛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感到不平。“我当时正在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书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四人帮’干的是沙皇干惯的事情，但因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

七月十四日

致信《文教资料简报》，原署名巴金，编者为蒙“四人帮”及其爪牙耳目，改署“一个读者”，保留写作时间和地点，原信照登。这是“文革”十年中巴金惟一公开发表的一封信。十年一简，是“文革”期间文化专制

主义的历史见证。该信指出，《文教资料简报》第四十六期第六十八页上一篇文章中提到鲁迅对内山完造两段谈话的出处有误，并写明“两段话的原文”最初发表的期刊、时间和所收集子的书名。

爱子李小棠正式从安徽农村上调回沪，不久被安到上海益民食品厂当工人。

七月二十三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端端跳跳蹦蹦，很有劲等。

七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现在防震要紧；李小棠在街道团委青少年教育组工作；托买内部发行的《水浒传》等。

八月十一日 致信查良铮。希望查良铮在地震频发期间，合家平安。

八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李小棠到益民食品厂做装卸工；很关心成都地震情况等。致李小林信二封。告之为端端买奶粉等。致信李健吾，云佩服李健吾现在还能写出关于巴尔扎克和斯汤达这样的大文章，并将文章转给辛笛、黄佐临等看。又在寓所接待画家、挚友钱君匋以及他带来的一位客人。听客人讲曾读过《家》后，忙说：“大毒草，大毒草，应该批判。”又在寓所接待一位避震南下的北京朋友，获悉朋友“瞻仰过总理遗容，总理瘦多了”，更憎恨“万恶的‘四



人帮’”。

九月六日 致信李致。希望早日解除地震警报。

九月中旬 前往出版社大礼堂参加集体吊唁毛泽东主席的活动。

九月十五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九姑妈要继续给端端吃奶粉等。

九月十八日 夜，在寓所观看北京举行的毛泽东追悼会电视转播实况。参加所谓批判满涛“翻案”的小型批判会。明知这是工宣队的无中生有和“荒唐的逻辑”、“奇怪的法律”，“但是我仍然一声不响，埋着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暗暗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唯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烧身”。

九月下旬 在寓所会见沈从文，发现他身体比前两年好了。沈从文九月下旬到上海，“见到他三次”。从回上海过国庆的女儿、女婿处获悉方令孺病重入院。

九月三十日 获悉方令孺今日病逝于杭州。

十月八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儿子李小棠现在是食品厂的工人，在罐头车间劳动。

十月上旬 接女儿李小林从杭州来信，并附有方令孺追悼会的剪报，为老友的病逝而哀痛，但“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

欣闻“四人帮”被粉碎，去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看大字报。在挤满了欢乐人群的淮海路上，站在襄阳公园转角处，正仰头看一张高高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忽被友人黄裳拍后背，两人会心地微笑。都觉得自己年轻了，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十月十四日 看到交通大学学生在淮海路游行，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次日经过康平路、淮海路、外滩，看到炮轰徐景贤、王洪文的大字报，在编译室听中央文件传达，会后还游行。

十月二十八日 致信李采臣。托他来上海时代购一套《红楼梦》，告之“四人帮”的爪牙

可以肃清。

十月 致李小林信二封。寄去抄写的赵朴初的《三哭》，告之上海粉碎“四人帮”后的情况，云消除四害是今年的大喜事等。

十一月 致李致信四封。告之“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四人帮’垮台，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

“‘四人帮’就像基督山伯爵那样报仇，我得罪过张姚，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自己目前心情舒畅，精神振奋，鼓励李致贡献自己的力量。又致杨静如信三封。云为“‘四人帮’揪出来，中国前途光明”而“高兴”；认为赵朴初的《反听曲》、《三宠三哭》“都不错，比郭老的打油诗好些”。把可恼又可笑的《红楼梦》曲词新编》抄好，寄给杨静如；云“四人帮”垮台，感觉到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去掉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 致信李健吾。告之“四人帮”倒了，“我还很好，我已经满意了”。



认为“四人帮”“把一切都搞乱”了，对他们及其“爪牙”定要“除恶务尽”。

被迫搁笔十年后，第一次发表散文《一封信》，海内外反响热烈。自云发表《一封信》等文章，并非为了“亮相”“更不是作检查”，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冲击“四人帮”“帮八股”的文风。

应邀到复旦大学座谈，表示自己的创作受外国文学影响，也受鲁迅等影响。

法国学者动议拟提名巴金为应属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七十四岁

一月九日 致信杨静如。认为“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多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请杨静如代购鲁迅先生文言文译注的《坟》。

一月十三日 致信女婿祝鸿生。告之，纪念总理的影片已看过，想起赵朴初的《金缕曲》，哭了。

一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目前没有刊物来约稿，自己不必急着发表文章；托购内部发行的《油断》等。

从上海青年音乐家谢天吉处得到萧乾妻子文洁若来信，写回信托谢转交萧乾夫妇。说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底萧乾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那时他才二十四岁，现在已六十八岁了，想不到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又说：“十年只是一瞬间。为自己，毫无所谓。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

在寓所接待画家张乐平及上海电视台摄影记者祁鸣。同意拍摄《访老作家巴金》的电视新闻片。祁鸣萌发了替巴金摄影的念头，经反复要求，巴金才同意：“你要拍可以，但我活着的时候不准用！”以后祁鸣摄下了巴金生活、写作、接待友人、节日活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动、外事来往、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等珍贵的镜头。

又恢复了逛旧书店习惯，买到了商务印书馆四册一套的《说部丛书》，勾起了他青年时代看这部书的回忆。以后，“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二月一日 致信卢剑波。认为“四人帮”倒了，“但‘是非’观念要搞清楚，还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四人帮”把一切都搞乱了，“他们的爪牙还不少，还在散布他们的观点”；同时表示，相信运动会搞彻底的，“否则后患无穷”。

二月七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四人帮”把人们的脑子搞得乱糟糟的，现在运动进展慢，“四人帮”真是“罪该万死”等。

二月十五日 致信李致。

二月 在寓所接待前来拍电视新闻片的祁鸣等。

三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新华社对外部记者章挺权陪同前来的刘四年。获悉刘是奉命率领中央记者组来上海工作的，巴金如实向他们反映了自己的现状和处境。此时的巴金身穿一件破旧的中山装，白发苍苍，戴着深度的

近视眼镜，说话有点口吃。他让来人进入楼下阴暗的卧室，到处放着书，书桌上放着萧珊的遗像。巴金说大女儿在浙江，小儿子在上海当工人。他身体没有病，还结实。原有的二十九万稿费存款全被冻结，至今没有归还。巴金从未领取过国家工资，每月凭证明到银行从冻结款中领取三百三十元生活费。一百五十元付房租，给岳父五十元，剩下的一百三十元，要维持一家五口的开支。巴金带他们到二楼和三楼的书房，所有的十几万册书还被封存着，书架上还贴着一九六七年盖有“上海文教系统抄家查封小组封”的红色大印封条。十年来，没敢打开过。在三楼的仅有三平方米的小阁楼即所谓“工作间”，巴金告诉来访者，目前他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尽快将他的问题搞清楚，分清是非。后来，刘四年等毫不犹豫地就巴金的处境写了内参，使巴金的复出和解放提到有关方面的议事日程上。

三月二十八日 致信杨静如。云在“文革”期间，有个想法，“一定要活下去”，看到“四人帮”的垮台，认为“四人帮”毒害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空气，“不是一两年就能肃清的”；对于儿子的婚姻问题，主张由儿子自己“全权处理”。

三月 致李小林信二封。告之自己的问题越拖，讲话的人越多，因为政策摆在那里；等自己的事解决后，可以联系译作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出版等。又致李致信三封。告之统战部谈话经过，表示既然有人讲了，我更用不着出声；现在杂事多起来了等。致信李健吾。觉得“四人帮”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搞成这样，真是罪该万死！另外，获悉翻译家查良铮因心肌梗塞去世，想起他生前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以及数十年的友情，甚感难过。以后数年内，遂尽力托人出版、发表他的译诗《唐璜》和一些遗诗。

四月二十日 晚上，在家中接待周晔陪同前来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党委书记洪泽和马飞海，获悉市委同志对自己问题的关心，“四人帮”下的结论不算数，现在另外搞，不久就可办好。文化局已同意打开房子。致信杨静如。告之自己被“四人帮”诬陷的“结论”将“可以全都解决”。

四月二十一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自己问题下个月内可以彻底解决等。

四月二十二日 有人送来两大麻袋的信、稿，看到它们，就想起“十年浩劫”中挨过的几十次批斗和屈辱，那些为了不“连累”妻子、儿女，“挖空心思编

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似一股股阴风冷气袭来，不寒而栗。用退还的钥匙，打开封了十年的卧室和书房，巴金的心又经历了一次撕裂的剧痛。卧室门打开的一刹那，睹物思人，共同度过漫长岁月的妻子萧珊，现在在哪儿？！巴金眼前出现了在医院看到的用白布裹着的人形，出现了那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的大眼睛，出现了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的脸颊，出现了几十年前头戴白色草帽，身着白衫黑裙，纯洁美丽的少女……怒火再一次在心中升腾！他默默地呼唤着，用滴血的心、用颤抖的手、用炽热的爱，轻轻地将萧珊的骨灰盒搬入卧室。在他的生命中，萧珊永远活着，“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封了十年的书房终于打开，他拭去尘垢，又看到了他心爱的书籍，就像迎接从长期囚禁中释放归来的朋友和亲人。酸甜苦辣在心中涌

动，勇气和力量在胸中撞击。其实，但丁、托尔斯泰、鲁迅、克鲁泡特金、赫尔岑、卢梭……早就从“囚禁”中“突围”而出，和他一起度过了十年炼狱生活，一起关注着中国的命运，一起战胜黑暗，迎接光明！

四月二十四日 致信李健吾。又致信卢剑波。均告之“我的问题终于解决”。

四月二十九日 致信臧克家。代在杭州《浙江文艺》当编辑的女儿李小林请臧克家为刊物“写一两首小诗”。并云诗人辛笛常来寓所叙谈。

四月 译完《往事与随想》第一册，俄赫尔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又致李致信二封。告之重读毛主席“雄文”感到十分亲切；估计下个月问题能解决等。

五月七日 致信杨静如。云最近“要做的事”“多起来了”。

五月中旬 应上海《文汇报》文艺编辑一再要求 决定结束十年的沉默，拟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写篇文章。

五月十八日 作散文《一封信》，载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这是经历十年磨难后用作品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云当年《讲话》“给我指明了金光大道”，“震撼了我的灵魂”，现在“《讲话》就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武器”；同时控诉了“文革”中“四人帮”的罪行，表示粉碎“四人帮”后“心情振奋”，愿为“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贡献自己的一切”。

五月二十三日 前往友谊电影院参加上海文艺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会期一周的座谈会，控诉“四人帮”罪行。在电影院门口与画家俞云阶欢晤，高兴地握着俞的手说：“你二十二年前给



巴金的《一封信》在《文汇报》刊出。



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损坏。”并欣然同意俞再来画一次像的要求。得《一封信》校样。

五月二十五日 得徐开垒交给的《文汇报》，《一封信》已刊出。开了一整天会回家，接待读了《一封信》后来访的一位陌生读者。互相“像弟兄一样倾吐”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最深的感情”。

五月二十七日 作散文《第二次解放》载六月十一日《文汇报》。回顾从事文学工作“两次解放”的经历：第一次是“光辉的《讲话》把我从旧思想的泥泞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是“打倒‘四人帮’”，又得到了解放。表示要“拿起笔”，“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又致信杨静如。云写文章“讲出了心里的话”；最近两周我常常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点，而且“做事不习惯找助手”。

五月

致李健吾信二封。云“四人帮”的爪牙终归要清除，告之辛笛、柯灵、黄佐临、陈西禾等常来等。在《一封信》发表后，接老友胡愈之来信赞巴金《一封信》的文字“清新刚健”。阅信后，欣喜异常：感谢五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师和“责任编辑”。

收到何其芳托报社转来的二

十日写的一封信。何信希望早日与巴金晤面，并谈译诗计划。读后为友人的成绩“感到高兴”。

六月二日 致信臧克家。告之现在身心都好，还可以“向‘四人帮’开炮”。

六月三日 上午，接文化局电话，告之林林在上海，应邀去锦江饭店。因为是“一般人”而被服务员阻拦，不让上楼，林林下来接巴金上楼，又被服务员阻挠。感到这明明是“四人帮”的流毒作怪。

六月四日 身着蓝布上衣，胡子也没刮，如约到画家俞云阶家。仅一个半小时，一幅巴金油画像完成了。致信李致。告之《人民日报》约请写散文，因事杂，无法执笔。

六月七日 致信田一文。告之近况很好。儿子从安徽农村回来后，在食品厂当工人。女儿在《浙江文艺》编辑部，女婿在《杭州文艺》工作等。

六月约十一日 在寓所接待亲自送画像的俞云阶夫妇，并与家人把画像挂在工作室里。虽然朋友们说画像的脸太长，不像本人，但巴金却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我在控诉，我愤怒。”

六月十四日 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六月十五日 作《往事与随想 译者说明》，载十二月十

五日《世界文学》第二期。云这是赫尔岑以十五年的时间用爱与恨写成的，爱是作者对他的同学、对俄罗斯青年的爱，恨是对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沙皇君主制度的恨。

六月十七日 去文化俱乐部，参加统战系统的揭批“四人帮”大会。继谈家桢后，第二个发言。各人有各人的体会。感到“四人帮”的罪恶数不清，令人发指。

六月三十日 应邀前往复旦大学与西欧留学生座谈。说自己不会讲话，几十年的创作生活是痛苦的摸索道路；“十四卷《巴金文集》都是写的‘病’，而这‘病’也写得不深”；“我的写作，受外国文学影响深。中国的小说中，鲁迅的《呐喊》给我很大影响”，“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除了鲁迅外，茅盾的影响最大，在三十年代仅次于鲁迅”。

六月约下旬 遵何其芳二十日函嘱，托人到上海旧书店代购五卷本的《Weerth 全集》，寄赠何其芳。

六月 致李小林信二封。告之复出后发表文章并非为了“亮相”，“更不是作检查，惟一的目的是冲一下‘四人帮’的文风”等。又应上海文艺出版社《鲁迅回忆录 一集》编辑组之约，修改一九五六年的旧作《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寓



左起：巴金、
中岛健藏、京子夫
人、秦怡、孟波、
赵丹。

所亲切接待特地自川来沪的沙汀。

七月一日 晚上去青年宫参加赛诗会。

七月五日 致信茅盾。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说“‘四人帮’垮台，我头上那块大石头也搬走，关了十年的房间和书橱也启封了”；并请茅盾“写几行字作为纪念，让我经常看见您的手迹，好像就在您身边听您谈话一样”；信末还代李小林所在《浙江文艺》向茅盾约稿。

七月六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后，读者接连写信来，“只能慢慢地回信”。

七月九日 致信卢剑波。

七月十日 作散文《望着总理的遗像》，载《人民文学》第八期。回忆解放前后多次与周恩

来会晤和亲切谈话的情景。愿“总理的……光辉形象将与山河共存、日月同辉，子孙万代将牢记他的英名”。

七月二十二日 上午，《解放日报》吴芝麟来，约写拥护三中全会公报的文章，因实在来不及，推辞了。晚上，听中央电视台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觉得这是大好消息。

七月下旬 二十四日获悉何其芳逝世的消息，“想写一篇短文倾吐我的感情”，但文章没有写成，“我没有时间把几十年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又怕“写不好，对不起亡友”。二十六日，托黎丁返京后代送花圈；二十七日，与孔罗荪联名发唁电。

七月 致李小林信三封。告之近况。又致李健吾信二封。告

之事情客人都多了，难以安静下来写书，没有时间考虑写长篇等。

八月九日 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同意重印《家》，并作《家 重印后记》，载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说《家》“也许可以帮助人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情况”，这“是一部写实小说”；但又说，“今天，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

八月十日 致信李致。告之近来实在忙，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

八月十二日 致信杨静如。云“很忙”，除“治牙”外，身体很好。

八月中旬 作随笔《坚决的



拥护，热烈的致敬》，载二十三日《文汇报》。

八月二十三日 晚上，去文化广场看庆祝十一大的文艺演出。读华国锋报告。

八月二十七日 作短篇小说《杨林同志》，载《上海文学》第一期。叙述志愿军小通讯员杨林，几次舍身掩护指导员和其他同志，最后壮烈牺牲的英雄故事。巴金原来没有创作《杨林同志》的计划，因为上海作协恢复，《上海文学》准备创刊，接受孔罗荪建议，从未发表的旧作《三同志》中抽出几章来发表。《上海文学》催着发稿，看完《三同志》后，下决心丢开这个“废品”，才根据杨林的事迹，创作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八月三十一日 与杜宣前往虹桥机场欢迎中岛健藏一行，在宴会上喝了茅台酒。

九月一日 前往上海衡山宾馆，与赵丹等会见日本朋友，并得到中岛健藏和井上靖的赠书。翻看井上先生的《桃李记》中的《壶》，里面记载了老舍和日本作家广津和郎的事。并从中岛健藏先生口中，“第一次正式听到老舍同志的死讯”，为老舍“极其悲惨的结局”而悲愤。梦中遇老舍，晚上辗转难眠。

九月二日 在虹桥机场，与赵丹等送别离沪返国的日本朋友中岛健藏夫妇和井上靖等人。对井上说：“我们知道老舍先生死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写文章纪念，而井上先生却写出了

关于老舍先生的文章，比中国作家还早，我读了非常感动。”

九月五日 参加欢迎铁托总统的宴会。

九月六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最近忙，写完《杨林同志》感到很累。

九月九日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言。

九月中旬 在上海接见法国米·露阿夫人，答应她的请求，愿为法译本《家》作序。

九月二十六日 作《家》法文译本序》，载十二月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法国读者不会熟悉我的小说中发生的那些事情。不过他们会了解我们所走过的那条漫长的道路。”

十月一日 致信田一文。云

巴金《家》的外文译本书影。



将赴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

十月四日 随上海干部、群众赴京代表团到北京，下榻西苑旅社，第二天前往毛泽东纪念馆，瞻仰毛泽东遗容；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下午离京。

十月十五日 致信杨静如。云很忙，熬夜，感到极度疲乏。

十月十六日 致信茅盾。云“很喜欢您给我写的这一幅字，词好，字也好”；又告之李小林月内赴京，希望在不妨碍茅盾休息的情况下，予以接待。

十月二十一日 致信李致。云：我写觉慧，并不掩饰他的缺点，觉得这倒是真实的。

十月三十日 前往龙华火葬场向陈望道遗体告别。

约十一月初 得叶圣陶信和寄来的诗，欣喜异常。

十一月五日 致信姜德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家》的《重印后记》。

十一月七日 致信叶圣陶。云看到叶给自己写的诗和字，“想起五十年中得到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表示不会辜负叶的期望，“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十一月八日

致信朱雯。云最近身体又开始垮下来，“无法写文章”。

家人从堆杂物的屋子里，找

出一大坛绍兴酒，巴金记得还是五十年代朋友送的，因其和杂物堆在一起，竟然躲过了“十年浩劫”，没有被“砸烂”和“扫地出门”。酒坛打开后醇香扑鼻，正好沙汀来访，李济生夫妇、孔罗荪夫妇作陪，巴金以这坛陈年佳酿招待，看见嗜酒的沙汀大饱口福，开心地笑了。事后，还分装成若干小瓶，赠诸友好，并不曾忘怀留下一瓶，日后赠千里迢迢之外的叶圣陶。又从失而复得的故纸堆中，发现了三十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保存的旧稿和从未发表过的底稿，遂还给沈从文。

十一月上旬 收到臧克家手书的条幅。

十一月十六日 拔了一颗病牙，身体违和。

十一月十七日 致信臧克家。感谢他对李小林的照顾。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致信李小林夫妇，告之文化局来人谈过，等抄家物资款项等弄清楚后，就退还存款等。

十一月 怀着第二次解放的愉悦心情赴杭州。下榻长生路浙江省委招待所。与杭州的文艺界朋友们晤面。在杭州逗留期间，探望了住在环城西路单身宿舍中的女儿、女婿；也曾到葛岭探访尚未平反的黄源。

十二月初 巴金接张弘信，就目前有人说《家》的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已经“过时”，张弘要

求巴金出来讲话，指出现实生活中还有新包装的高老太爷和冯乐山。

十二月八日 致信张弘。云：“许多话过一两年再谈，也许更清楚一些。”

十二月十日 作杂文《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载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实质是“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而认为“对‘四人帮’的余党、爪牙、帮派体系”“一定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十二月十五日 作散文《最后的时刻》，载一九七八年《上海文学》第一期。赞周总理的“精神”将“长留人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接待由张乐平作陪来访的电视台摄影记者祁鸣，商谈拍电视片的事情。

十二月底 接郭安仁 丽尼夫人许岩信，获悉郭已于一九六八年夏天被迫害死于广州暨南大学。

十二月

收到《文汇报》转来的一百五十多封读者来信。致李小林信四封。告之近况、想念女儿并祝其生日快乐等。

致邓天骞、卢剑波信二封。云：已收到邓天骞和卢剑波托人带来的绿豆和辣椒面；告慰友



一九七七年约
年底，巴金 左二
在寓所与师陀 左
一、孔罗荪 左
三、张乐平 右
三、王西彦 右
二、柯灵 右一
欢聚。

人，“我的问题，政治方面完全落实了政策，经济方面却没有落实，主要的是‘四人帮’的爪牙还未完全消除，还在作怪”，有关方面已“退还钥匙，把我的书房打开了，下个星期可以取回抄去的东西”。

发表《一封信》、《第二次的解放》后，老友相约来访，欢聚于上海锦江饭店。当巴金在宴会厅出现时，大家蜂拥而上，对他表示亲切的问候。席终离饭店时，居住在锦江饭店的许多不相识的旅客闻讯赶来，在楼梯两旁站立静候，巴金异常感动，与两旁站立的人一一握手致谢。

约十二月 在寓所与柯灵、王西彦、师陀、孔罗荪、张乐平欢聚，各人谈到了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更多的是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在谈到彼此熟识的一些老朋友时，巴金讲到了李健吾在“文革”中对他的友谊，当听到不善言辞的柯灵，用绍兴官话，向大家讲述了李健吾三十年代的趣闻时，开怀大笑。巴金的客厅里弥漫着从“十年浩劫”中重获自由的欢乐。将重印的《家》分赠亲友和读者。

一九七七年内 获悉被法国学者拟提名为应届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人选，后听说因考虑到中国当时的政策有关方面未必同意接受这一荣誉，终于搁下。



希望复刊的《文艺报》不要“看风色，看行情”，要有“战斗”性。

希望文艺创作主管部门“不要管得太死”，不要设“禁区”，不要“什么都由少数人说了算”。

认为现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还必须大反封建”。

《寒夜》法译本出版后，法国出现“巴金热”。

七十五岁

一月一日 在寓所接待《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收到他们带来的四封读者来信。

一月三日

致信李小林。告之大会结束后留京访友，嘱李小林赴京。

获悉李小棠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九日前去体检，感到高兴。

一月十日 祁鸣来布置灯光和环境，两点半开始拍照。晚上，与李济生一起晚餐。

一月十六日 致信杨静如。认为“‘四人帮’虽已粉碎，但人们头脑的枷锁还在，要印拜伦、济慈等人的诗选，有些人似乎想不通”。

二月五日 孔罗荪来，获悉柯灵、黄佐临、赵丹等人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感到高兴。

二月二十四日 抵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榻虎坊路前门饭店。

二月二十五日 去人大大会堂，出席预备会，见到一别十二年的曹禺。又见到叶圣陶，并紧紧握手，很感谢他。还见到伍禅、胡愈之、赵朴初等。致信李健吾。告之会议规定不外出，不会客，故暂时不能见面等。



三月初 打电报到杭州，嘱女儿李小林赴京。

三月五日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后，留京访友。在李小林陪同下，到幸福村访问阔别十二年的老友顾均正及其夫人。交谈时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伤痕，他们失去一个女儿，巴金失去了萧珊。后由李小林陪同，前往曹葆华家。见曹乐观、愉快，倾心交谈一个多小时。

三月十日 去叶圣陶家，带去保存了二十年的花雕，摄影留念。

三月十三日 与李小林前往东罗圈胡同看李健吾，两人紧紧握手，见李健吾老泪纵横，十分感动。接着，又去看了曹葆华等。

三月十四日 同刘白羽、周扬亲切谈话，后见到朱梅夫妇，又去茅盾家，谈了一个小时。

三月十五日 上午，小雪。在前门饭店住所会见姜德明，谈到“文革”期间遭遇。中午，由姜陪同，偕李小林前往晋阳饭店午餐，途中谈到曹禺《雷雨》和罗淑创作的情况。还提到他还有几封保存了多年的罗淑的信。觉得“应该有个什么单位来搜集这些东西，还有别位作家的，都放在一起，好让人们来研究”，“只要有人管起来就好”。

三月十九日 返沪，李济生、祝鸿生等来接。感冒病倒。

三月二十三日 致信李致。告之家中情况如常，李小林今日返杭等。

三月二十六日 被冻结的存款全部退还，至此，总算政策完全落实。

三月三十日 李济生来，遂要他代为起草调回李小林夫妇的报告。

三月 致李健吾信二封。告之在京见面，既高兴又像做了场大梦等。

返沪后，在家接待萧珊昔日好友杨静如。获悉她应英文《中国文学》之约，前来采访并撰写访问记，遂留住一周，倾心恳谈。

四月七至十二日 每天下午，在楼上工作室接待画家俞云阶，俞为其画像。该油画像完成后，送往华东肖像展览会展出。李小棠得到复旦大学入学通知，提前回家。

四月十五日 致信李健吾。告之李济生去了武汉、准备打报告调回李小林夫妇、李小棠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李健吾的剧本已经交陈西禾、杨绛的书收到等。

四月二十八日 致信田一文。告之生活仍极忙乱，事情做不完；已译好《往事与随想》的“前两卷”，只有全书的“五分之一”。

四月二十九日 接待陈子善等，审定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访问记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起草经过及其它》。

四月 致李小林信二封。告之双双调沪的报告市委已批下来。

五月三日 作《憩园 法译本序》，载法译本《憩园》，法译者为尼古拉·沙博斯、罗加·达罗伯。云《憩园》译成法文，“让《家》的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地主家庭怎样地走向没落和灭亡”，重申小说的主题“是替垂死的旧社会唱挽歌”。

五月五日 与李小林夫妇赴杭，黄源来接站。

五月九日 返沪，李瑞珏接站。在杭期间去平湖秋月、灵隐寺、六和塔、虎跑泉等处旧地重游，自然而然想起萧珊。

五月上旬 与自成都赴上海的侄儿李致欢聚。又接谭兴国信，获悉他要求解答一些自己青年时代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遂托返川的李致婉言谢绝，并托李致带新版本《家》和明兴礼著、王继文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等书赠谭。

五月十一日 作随笔《个人的想法》，载七月《外国文艺》第一期。认为办刊要彻底肃清“文革”中“洋为帮用”的流毒。

五月十三日 致信谭兴国。
对谭的信任表示“感激”，希望先去研究艾芜和沙汀。认为法国明兴礼写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不用说是借对我的评论宣传天主教，但里面可能有一点可供参考的材料”。

五月十八日 致信姜德明。
告之想写关于朱洗的文章，表示“我一直在为时间奋斗”。

五月二十七日 赴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五月二十八日 作短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十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一期。表达了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一切的决心，控诉了“四人帮”一伙在文艺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对清除创作“模式化”、“虚假”“两大公害”，提倡“题材多样化”、坚持“创作要上去，作家就要下去”、改变文艺界“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五月月下旬 在京从朋友处获悉挚友、著名作家黎烈文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病逝于台北，其妻雨田 许萼华 带着孩子艰苦地过着日子，却表现得十分坚强。

六月一日 到北京饭店探望日本作家水上勉和井上靖等，老朋友又得重逢，格外高兴，过了

一个愉快的夜晚。

六月二日 应邀与周扬出席日本作家访华团举行的告别宴会。

六月三日 参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老舍夫人胡‘清表示亲切慰问。

六月五日 作《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闭幕词》，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版《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坚信“一个崭新的文化高潮就要到来”。

六月六日 下午，回上海前夕，偕孔罗荪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周而复，由周而复找于立群联系探访郭沫若事。于立群因怕细菌感染郭老，婉言谢绝探视。打电话给曹葆华，因行期匆忙，约好下次来北京再去看望他。这是与曹葆华的最后一次通话。

六月七日 从北京返沪。

六月九日 作随笔《我的希望》。希望复刊的《文艺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不要“看风色、看行情”。

六月十二日 接北京长途电话，获悉郭沫若逝世。但仍认为“不能把死亡同郭老连在一起。在我的脑子里，郭老永远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永远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会见黄裳，同意将他给邓小平的信先寄给齐燕铭看看。

六月十四至十五日 作散文《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载《文艺报》第一期。赞郭老“真诚”、“有一颗赤子之心”，虽然去世，“战士、诗人、雄辩家的雄姿”“更鲜明”，要“永远向他学习”。

六月十五日 与邓小平、宋庆龄、沈雁冰、周扬等列名于由七十五人组成的“郭沫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六月十八日 赴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郭沫若追悼大会。

六月二十二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对郭沫若的逝世有“茫然”的感觉，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又没有从容的时间，不能应命作文。

六月 住北京京西宾馆，“半夜里又梦见同鬼怪相斗”，摔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幸而未伤筋骨。致李致信七封。告之：同意将发言稿收入《巴金近作》；将悼念郭沫若的稿子寄上，为出版社提供罗淑的作品和信件；坚持《巴金近作》在《文艺报》复刊后付印等。

七月上旬 某晚，会见两位瑞典文化界朋友，获瑞典文译作《春天里的秋天》和上面载有《长生塔》译文和插图的《人民写实报》夏季特大号一本。“这是出乎我意外的。这本小书出版于一九七二年，那个时候我还在‘靠边’，给剥夺了公民的



权利”，“真没有想到北欧还有人记得我一九三四年写的那篇童话”。当晚，找出旧作《春天里的秋天》，翻看到深夜。

七月十四日 作《谈 春天里的秋天》，载九月五日香港《文汇报》创刊三十周年增刊。是应香港《文汇报》之约，为庆祝该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而撰写的一组创作回忆录的首篇。文中回忆了一九三二年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创作本书的经过，表达了对亡友郭安仁即丽尼深刻的悼念之情。

七月十六日 致信谭兴国。云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帮忙；“我能拿笔的时间没有几年了，还是用来写点、译点东西吧，解释、研究之类留到八十以后再做。……对我自己来说还是要写点新作品，不是争什么地位。即使对我的过去来个彻底否定，我也不在乎，‘四人帮’不是做过了吗 倘使要认真解释、回答问题等等，那么以后我就再也搞不出

新的东西，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同意谭与已调到《上海文学》工作的女儿李小林联系。

七月中旬 接上海作协转来的日本岛田恭子信。获悉她自一九七六年起“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看完了《巴金文集》十四卷，感谢这些作品使她“获得力量”。

七月十九日 致信岛田恭子。云热爱祖国和人民，对日本人民也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表示“‘四人帮’的迫害并不能摧毁我的精神”，虽年过七十，还要奋笔写作，写到八十、九十。

七月

在寓所接待上海《语文学学习丛刊》前来组稿的编辑，就该刊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评《家》文章的某些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发了几句牢骚：那篇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这“消极作用”在何处“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出要做封

建家庭的卫道士……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

又含泪读何其芳诗作《北中国在燃烧》中的一些诗句，越发思念老友。遂作散文《衷心感谢他——怀念何其芳同志》，载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称何“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

另致李致信五封。告之《巴金近作》八月付印、出版，内容不必再改；《巴金近作》都是发表过的文章，不用发稿酬，只要赠书三十册；《巴金近作》出版，请李致代为分送卢剑波夫妇等老友和侄女们，其他各地的朋友不想送等。

又致张挺信二封。对青岛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张挺表示：“否定自己越彻底，越有利于从头做起。”并回答了几个问题。

约七月 在寓所会见艾青。

八月十二日 前往龙华革命公墓参加金仲华骨灰安放和送灵



巴金 左 与艾青 右 在一起，中为李小林。

仪式，下午参加郑君里骨灰安放仪式筹备小组会议。

八月十三日 为萧珊逝世六周年祭，没有做任何事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忘不了她，记得她经历的痛苦。始作《怀念萧珊》，悲痛难抑，未完辍笔。

八月十六日 前往上海龙华公墓，参加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代表上海市文联致悼词，称周是“杰出的人民艺术家”。晚上飞抵北京，下榻京西宾馆。

八月十七日 见到曹禺等。

八月十八日 致信柯灵。称赞柯灵在病中所作《李健吾戏剧集序》是一篇值得羡慕的好文章，并希望柯灵注意身体等。

八月二十日 在《文汇报》上发表散文《怀念金仲华同志》。为“善良”、“正直”、“乐观”、“热爱祖国”的金仲华被“四人帮”迫害感到愤懑。

八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谈到中日友好时，对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

八月约二十一日 接北京电报，惊悉曹葆华逝世，十分难过。想到分别十几年，只在三月中见过，竟成永别，为没有机会报答曹葆华的关心和友情感到痛苦。

八月二十五日 获悉周而复癌细胞扩散，整天不痛快。托文联电话吊唁曹葆华，并送花圈。

八月

会见日本世界语者德田六郎等十余位旅游者。其中一位女作家问起对爱罗先珂的看法，巴金说喜欢他的童话，受过他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是从他那里来的”。

又致李健吾信二封。告之“常常想起你对我的关心，很感动”，以及李小林夫妇已调回上海，在《上海文学》工作，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

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月三日 获悉影片《阿诗玛》重映的消息，又看了《人民日报》上的《阿诗玛，你在哪里》陈荒煤作，为影片《阿诗玛》的饰演者杨丽坤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而“燃起一团火”；为“她的艺术得到广大群众的赞赏”而庆贺。

九月七日 作《巴金选集后记》，载一九七九年五月《读书》第二期。

九月八日 作《关于父子》，载一九七九年八月《百花洲》第一期。云被小说中新旧两代的斗争强烈地打动了；认为“旧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

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

九月十七日 作《往事与随想译后记一》，载一九七九年九月《长春》一月号。称《往事与随想》及其作者是“我的老师”，叙述该书对自己创作《灭亡》和其他作品时产生的影响。

九月约中旬 获悉挚友、散文家丽尼即郭安仁的冤案已得昭雪，广州暨南大学于十四日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拟作文纪念。

九月二十四日 作《关于长生塔》，载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收获》第一期。叙述《长生塔》等四篇童话创作的经过。说它们“是用‘童话’的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

九月下旬

接曹葆华子女信，获悉曹临死前一周，仍连夜整理、校订《普列汉诺夫哲学通信》第五集译稿，死前一小时还坚持写作。

会见上海越剧院编剧周水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系巴金长女李小林校友，获悉她已接受把《家》改编为越剧的任务，表示支持，赠她单行本《家》和《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并签名。

致李致信三封。告之一百册书收到；同意从《新声集》中选赴朝文章；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写《创作回忆录》等。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十月上旬 曹禺来沪，住上海大厦，常与巴金晤面。老友劫后重逢，以多写作品共勉。

十月十日 作散文《等着，盼着——怀念陈同生同志》，载十二月八日《解放日报》。悼念“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陈同生同志。

十月十二日 作随笔《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载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五期。认为文艺界必须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文艺创作的主管部门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死”，“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这里设‘禁区’，那里下‘禁令’，什么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不见得很妥当”。

十月十七日 在寓所接见法国巴黎第二电视台摄影队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关人员，同意拍摄工作和生活的镜头，并与法台领队帕特里科·克莱芒在书房就自由和民主等问题作了亲切交谈，表示“对整个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同意的，但也不是一切都同意，所以现在还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问题”，就对方提出的中国会不会再出现极左的大转弯这一问题时，表示：“我想不会，因为人民不同意。自由和民主是相对的，现在民主是在扩大，不是在

缩小。”

十月二十日 致信李健吾。告之读了茅盾的《一点感受》，觉得“我们太不重视个人的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改变现状，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认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快人心。

十月二十五日 致信臧克家。感谢李小林赴京时臧对她的照顾。

十月二十六日 作《更爱我们的时代——爝火集序》，载十二月十日《光明日报》。修正去年八月在《家》的重印《后记》中说“这部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的观点，认为“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封建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到处都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反封建”。

十月二十九日 获悉久居法国的李治华先生翻译的《家》最近已经排校完毕，明年春天就要问世的消息，重新翻看了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为法译本《家》写的《序》，作了补充和修改，认为我们现在还“必须大反封建”。

约十月 黄裳陪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的潘际‘来组稿，就建议开辟《随想录》专栏，潘际‘立即答应。巴金一写就是八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编完《爝火集》。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为《爝火集》作《序》。刚准备把书稿交出去，获悉彭德怀已恢复名誉，于是决定把二十六年前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放在卷首。

十二月一日 作《随想录总序》，后易题为《谈望乡》，载十七日香港《大公报》。自云年迈，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写一本小书：《随想录》”，“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认为当时颇有争议的日本影片《望乡》“是一部好电影”，对禁演《望乡》的主张和“进行手术后”再映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要相信青年一代的觉悟。

十二月十五日 作散文《一颗红心——悼念曹葆华同志》，载一九七九年北京人民日报《战地增刊》第一期。为在“文革”中“被撕毁”了“健康”，现在又带着“外伤和内伤”而被“拉向死亡”的挚友感到痛惜。

十二月十七日 致信潘际‘。告之《随想录》还想写下去，以后新写的就寄给《大公报》“大公园”专栏。

十二月十八日 致信姜德明，提及散文《海上的日出》作

巴金在冰天雪地中。



为中学教材时被改去六十几处的事。

十二月十九日 致信余思牧。这是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今，相距十二年后给余的第一封信。云余的两封信都已收到，自己“衰老多了”；但还想多做点事，所以“现在忙”，介绍日本新出的两本书即池田武雄的《巴金回忆录》、立间祥介译的《寒夜》，两书均附有巴金年表，云“不一定都准确”，供余参考。

十二月中旬 由女儿李小林和女婿祝鸿生代编的《爝火集》完稿。

十二月二十日 作《 爝火集 后记》。

十二月月下旬 到上海龙华公墓参加翻译家、编辑满涛同志追悼会。默哀时为满涛遭遇不幸的时候，“没有支持他，没有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而“感到惭愧”。

十二月三十日 主持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在龙华公墓为著名诗人闻捷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十二月下旬 在寓所接待来访的曹禺，获悉《望乡》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拍摄影片时都“非常严肃认真”以及《望乡》在中国放映前被两次剪掉一些镜头的情况。

十二月

致李致信三封。建议将关于

彭德怀的文章收入《英雄的故事》，因为邓副主席已经称彭德怀为“同志”；今天的《人民日报》已经为彭德怀平反了等。

在寓所接待拍电视片的法国巴黎第二电视台记者克莱芒等，并进行电视对话，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

获悉法国出现“巴金热”：《寒夜》法译本出版后，巴黎所有书店都贴满了“巴金——《寒夜》，《寒夜》——巴金”的广告。



欣悉萧乾等数位好友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悲痛地参加以群等多位好友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艰难地创作“随想录”。

嘲讽“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的“封建破烂货”。

文艺创作要反对“长官意志”，要“独立思考”。

五十余年后，重访法国，轰动一时，被称为是“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保卫者”。

坚信会有中国人闯进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禁区”的。

作《怀念萧珊》，并为写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作准备；认为需要像“一团火、一把剑这样的作品”。

七十六岁

一月二日

作随笔《再谈 望乡》，载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赞美扮演阿崎婆的演员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的“忠于艺术”的精神，指出影片中记者“深入生活”、访问时“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的行动“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

又作随笔《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载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指出“四人帮”的“焚书坑儒”是“愚民政策”，今天为了“赶上别人”，必须先“了解别人”；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在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的同时，“书的冤案”也应“得到昭雪”。

一月初

婉言谢绝上海文联和上海作协拟为萧珊举行

萧珊的译著。



追悼会的安排。

又获悉萧乾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致信祝贺：“正义终于伸张了。”希望友人在有限时光中“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虽然“我们都得走向火葬场”，但“不要紧”。

一月三日 参加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以群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在这个仪式上，见到了以群夫人刘素明和她的五个孩子，为刘素明十三年中，吃尽辛苦，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而

感动，称她是“英雄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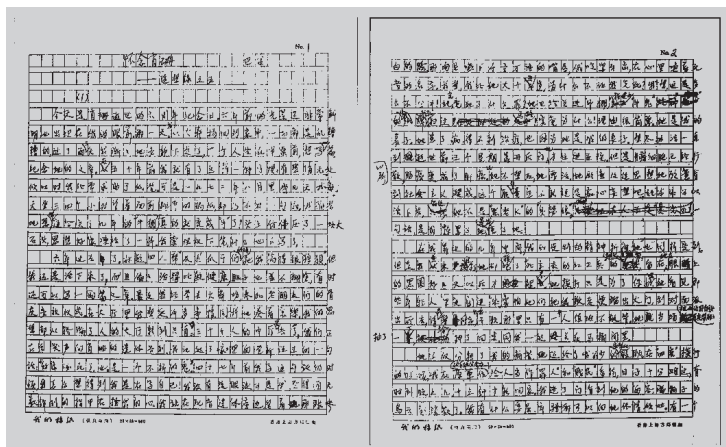
一月七日 接待两批客人和看一封读者来信，发现他们均从正面或侧面企图证实自己与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元旦结婚之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眼看这种谣言越传越广，甚至“传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拟作文辟谣。遂作随笔《“结婚”》，载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

花费时间来传播谣言，同时表示“把谣言看作对我的警告和鞭策”，用作品同读者见面，这种“稀奇古怪”的“社会新闻”就会没有“市场”。

一月九日 去凤城三村看望岳父，告之因赴京开会，不能参加老人家的生日宴会，并赠送礼物。晚上，看电视京剧《海瑞罢官》，感慨万千。

一月十六日 作完散文《怀念萧珊》，连载于二月二至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以平实、自然、深沉、悲愤的语调叙



①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下旬巴金与萧珊摄于山西云冈石窟。
② 巴金《怀念萧珊》手迹。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述萧珊“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和因巴金而受迫害致病直至去世的悲惨命运，同时介绍萧珊的生平和译作，又真切感人地表达了夫妇两人“三十多年”真挚而纯洁、深厚而崇高的爱情，在朴实的叙述中强烈地控诉“四人帮”在“文革”十年中推行的法西斯专政迫害人民的罪行；表示“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永远闭上眼睛”时，“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一月十九日 致信杨静如。告之“蕴珍不需要开追悼会，有人问过我，要我决定，我不同意开。我不主张形式主义”。又云已写《怀念萧珊》，以此“替她平反”。

一月二十日 致信田一文。云“忙，身体不好”。认为现在“也应当为你改正错误了”。

一月约中旬

读完曹禺的剧作《王昭君》，认为头两场写得好，写得深。遂致信曹禺，希望好友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多年来想写的东西。劝曹“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创作，把“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翻阅中国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史 看到一大批中外“好作家”的“光辉的名字”和“好作品”，联系“四人帮”发明的

“三突出”、“三陪衬”、“三结合”等荒谬的创作方法，拟作文进行批判。又在寓所会见几位法国法学家。获悉一位年轻的客人了解自己即将着手写的长篇小说是什么主义的作品时说，“我写小说连提纲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倾吐我真挚的感情。至于我的小说属于什么主义……应当由读者和批评家来讲话”。

一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毒草病”》，载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由曹禺的《王昭君》和未完篇的剧本《桥》，引起种种联想，称曹是“有才华”的“好的艺术家”认为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呼吁作家千万不要患“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出一个字”的“毒草病”。

一月二十四日 作随笔《“遵命文学”》，载二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以创作实践证明“读者”是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评判员”，作家不应只“听别人的话”、“按照别人的意思执笔”写文章。

一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长官意志”》，载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联系自己和中外作家的创作实

践，批判“四人帮”时期妄图用“长官意志”，使作家成为“驯服工具”，从而形成文坛“‘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的罪行。

一月二十七日 作随笔《文学的作用》，载三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只有长期接触才能对人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作品里往往有“作者自己”，但“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建议作家“自己选择生活基地”，反对行政“指定”和“安排”。

一月

作随笔《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载《上海文学》二月号。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和陈毅关于文艺的报告谈起，认为“文艺工作者要代表人民说话”，“要讲勇气”，同时要“依法办事”，“不仅那些真正属于反党的人应该受法律的惩处；而且，那些任意用‘反党’帽子来诬陷别人的人，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今年上半年可能去法国访问；又告之“北京作协派人来商量，要我参加四月的文代会，延期访法”等。

二月一日 在寓所会见黄裳，把写好的《随想录》两节给他看，并说：“我要继续写下

去。我把它当做我的遗嘱来写。……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

二月三日 作随笔《把心交给读者》，连载于三月六至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表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对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对同时代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对自己的祖国应尽的一份责任；关于“写作的秘诀”，回答是“把心交给读者”，同时表示与法国卢骚、伏尔泰、雨果、左拉和法国读者一样，也“主张干预生活”。

二月五日 作《家 罗马尼亚文译本序》，载 C. 鲁贝亚努译，一九七九年布加勒斯特出版罗马尼亚文译本《家》。简介《家》的主题并重申其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二月九日 致信李健吾。云“隔了五十多年，我也想再去巴黎看看”。出国前要在京参加文代会，“当设法找你畅谈”。

二月初 携李小林前往绿杨村饭店，出席辛笛为孔罗荪担任《文艺报》主编举行的饯行宴会。同席有黄裳、唐琼夫妇等。

二月上旬 老友王若望与羊子结婚，赠厚礼一份以示祝贺。

二月十二日 作随笔《一颗核桃的喜剧》，载三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写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六位太太真假不分地以得到皇太子吃剩的

核桃为荣的肉麻故事，嘲讽十多年来流行过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等“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封建社会的破烂货”，指出“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二月中旬 赴京开会，下榻京西宾馆。

二月十七日 致信张挺。感谢张送来的花生米，嘱以后千万不要再送东西来。

二月十八日 致信李健吾。云开会忙，不能去看望，“衰老了，身心都不及以前”，并告“写上五小本”《随想录》就搁笔。

二月 致李致信二封。建议出版北京语言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告之抵京开会等。又致李健吾信二封。告之现在很想写文章，已写了十篇随想录；最近还针对“到处流传我结婚的谣言”，发表了“辟谣”的文章《“结婚”》；把《随想录》当做自己的“遗嘱”。

三月五日 在锦江饭店宴请从广州、海南又到上海的“全国诗歌作者学习访问团”。团员有艾青、邹荻帆、蔡其矫、吕剑、雁翼、孙静轩、周良沛等三十多人。

三月六日 致信《家》法译者李治华。云：“我的下一个长篇刚刚开头，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四害’横行时期的遭遇，

名字是《一双美丽的眼睛》。”

三月九日 作随笔《关于丽尼同志》，连载于二十九日、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记叙友人丽尼的生平和创作，及两人的友谊。

三月十日 致信岛田恭子。回答她在“巴金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我在成都学过世界语，一个叫高自性的朝鲜人教过我。我和日本世界语者长谷川没有来往”及“是吴朗西介绍我认识”武田博等。

三月十二至十三日 参加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座谈会。期间应诗人田间之约，作随笔《“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四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文革”十年中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受到“愚弄”，于是感到“空虚”，一度想“走上自杀的道路”，但终于悟到“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要“用自己的脑筋思考”；“直到今天，……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指出“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像“五四”英雄那样，“追求……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

三月十六日 收中岛健藏



三月五日巴金
中与艾青 左、
雁翼 右 在座谈会
上。徐靖摄

信，信中回忆一九六一年与巴金一起游览富士五湖等处、为“友谊干杯”的友情。

三月十七日 作随笔《三次画像》，载四月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画家俞云阶三次为自己画像的情况。又云今天鼓舞自己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身上的内伤。“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三月十九日 致信杨静如。表示杨拟写的《坚强的人——访问巴金》，“我看不看，无所谓。是你写的，用不着照顾我”。

三月二十一日 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想起了旧作《第四病室》，找出来翻看三十五年前写的中篇小说仍然“鼓舞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前进”。又致信李健吾。告之，拟将刊发《怀念萧

珊》的刊物《作品》“分送关心我的朋友”，让朋友们知道自己“靠边”时的情况。

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六日 作《关于 第四病室 ——创作回忆录之三》，载四月八日香港《文汇报·文艺》。主要叙述创作《第四病室》的经过，使读者通过这些“真人真事”“小人小事”看到“旧社会一天天走向毁灭”；小说中只有杨木华医生“是我的创作”，目的是使“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一线亮光”；一九六〇年校改时又改动了原来她爆炸身亡的结局，增加了一段暗示她到四川改名“再生”的结尾。

三月二十二日 参加《人民日报》文艺部在沪召开的座谈会。

三月二十六日 与李小林、端端到衡山宾馆，接沈从文夫妇

到红房子西菜馆吃饭，辛笛早到了。

三月二十七日 致信法籍华人学者、《家》法文本译者李治华。告之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大约明年年底以前写完，你要翻译，我当然同意。这小说不一定写得好，不过我要用全力写”。

三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小人、大人、长官》，载五月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用辛辣愤怒的笔调指出多少年来的精神枷锁是“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又说几个“包青天”、“海青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 自己一点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 那太危险了”。

三月二十九日 前往全国诗

歌作者学习访问团住处与艾青、雁翼等诗人见面。并当即致信王西彦，云“我约艾青他们今晚六时在静安宾馆吃饭，请您参加”，信由李小棠送达。

三月三十一日 致信谭兴国。云“文章你怎么写都行 我无意见”并告之访法日期。致信杨静如。同意杨和《雨花》副主编袁卓尔的意见，同意《雨花》转载“《随想第九》”。希望编者同意把标题改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同时指出该文剪报“第二栏二行倒数第二个字下面漏掉一个逗点”，托杨静如“代补上”。

三月下旬 收到日本中岛健藏三月十六日寄来的信，邀请巴金访日，重温旧谊。

约三月

接在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工作的翻译家杨宪益信，获悉对方正在翻译《春天里的秋天》，信中询问了一些译述中的具体问题。

接到杨静如信，获悉她撰写的《坚强的人——访问巴金》，目前正着手译成英文。

在北京茅盾寓所看望茅盾，倾心交谈一小时。

致李致信四封。谈编务等。

春季

在寓所接见香港《开卷》记者董秀玉，谈到有关赫尔岑作品的述译、长篇小说的创作，以及

对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提供了《家》初版时的手稿照片。

接《家》法译者李治华信，获悉瑞士艾贝尔 Eibel 出版社和弗拉马利永 Flammarion 出版社联合出版法译本《家》，并代表出版社出面邀请巴金访法。

四月二日 致信杨静如。

四月上旬

致信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编辑部副主任彦火即潘耀明，对彦火来信中探询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作了回答：“诺贝尔奖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谣传或者是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愿望，好像他们都为之努力。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认为在东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奖金，也会有中国人闯进这个‘禁区’的。”

得上海译文出版社送来的《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的校样。

四月十日 偕李小林赴京，下榻金鱼胡同和平宾馆。看材料，作访法前准备。

四月十二日 中午，在和平宾馆会见姜德明等，并应邀偕李小林前往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途中回忆起昔日与靳以、老舍夫妇多次来东来顺欢宴的情景。席间谈到当年经鲁迅介绍，为萧红出版《商市街》和茅盾编《烽火》的一些往事。

四月十三至十六日

由孔罗荪陪同，前往丰富胡同十九号看望老舍夫人、画家胡“青”，见她正在整理老舍遗作，很想知道老舍死的真相，但又不敢问她，“怕她伤心”。稍顷，向她讨画，准备赠给法国朋友。“她为我们绘了三幅”。

在和平宾馆接待冯雪峰的女儿，获悉五月初召开冯雪峰追悼会 后因故改在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举行，为其冤案平反昭雪。表示没法赶回来参加，但“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

在访法前，由李小林陪同到北京医院探望患癌症住院的老友顾均正。“他对我微笑，我却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默默地望着那熟习的脸，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退出了病房。”

四月十七日 接待法国《世界报》记者皮埃尔·让·雷米，就一九二七年赴法时的生活、学习、思想、如何创作《灭亡》和走上创作道路以及五十余年后第一次重访法国的心情等作了答问。谈话内容经雷米记录整理载于六月十七日香港《文汇报·文艺》，题为《巴金访问记》，乔子译，又经黎海宁重译载七月一至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题为《答法国 世界报记者问》。译文均未经巴金过目。

四月二十三日 出席法国使



馆阿尔诺大使举行的饯行宴会。翌日，率领中国作协访法代表团乘机离开北京。

四月二十五日 抵巴黎戴高乐机场，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家》的法文本译者李治华等到机场迎接。住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四楼。下午，访问了二十年代周恩来旅居巴黎的旧址。在巴黎，瞻仰了战后修建的卢骚石像，原来那尊铜像毁于德国纳粹党徒手中。面对石像，想起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五六年了，不能让脑子里形成的作品成为泡影。“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怎样向下一代人交

代。”前往巴黎第四区政府大厅，出席国际笔会法国分会举行的招待会。法国笔会名誉主席乔治·爱马纽埃尔·克郎西埃在欢迎词中高度评价了巴金的著作和精神，称巴金是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保卫者。巴金在所致答词中云：这次访法，个人有个心愿，“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参加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代表团举办的欢迎会，观看中国电影《家》。“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

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十分激动。”此外，还出席了巴黎第七、第八大学中文系师生为巴金访法举行的招待会。又应巴黎第二电视台记者克莱芒约请，从巴黎香榭里大街附近的旅馆被接到电视台，两人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两人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因电视对话将对全世界播出，“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说了真话”。前往法国作家维尔高尔乡间寓所，出席法国作家同人公会举行的招待会。与这位第二次世

巴金 左一、
李小林 左二、徐
迟 左三、孔罗荪
右二 等在法国巴
黎公社墙前。



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的著名作家亲切晤谈，了解法国文学界各种流派发展的情况。前往设于布洛涅森林内的大瀑布饭店出席法国外交部文化科技联络总司司长窝尔举行的酒会。经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巴黎凤凰书店负责人贝热隆邀请，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全体成员到书店与读者见面。凤凰书店是法国惟一经销中国出版物的书店。巴黎的读者把小小的店面围得水泄不通，许多读者手持巴金的法译本《家》、《寒夜》等，请巴金签名，“热闹的局面使这条街也轰动起来”。

四月三十日 上午十一时左右，在微雨中乘车到达沙多·第埃里市。拉·封丹中学校长戴莱斯夫人在校门口迎接。参观校舍，找到了五十二年前住过的小屋，想起当年写小说像寒夜点燃的篝火，燃烧到天明的情景；仿佛听到“哲学家”詹剑峰在隔壁房间朗读陆游的诗；想起了带着看门人古然夫人的祝福回国的往事，打听古然夫人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的墓地，想去献一束花；在校园中摄影留念，翻阅发了黄的拉·封丹中学外国学生登记名册，“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但“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 李尧棠”。中午，前往市政府，出席法国前外贸部长现任市长罗西先生主持的酒会。从市长和副市长

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又接受了沙城荣誉公民的纪念章。致辞时，回忆了当初在这儿与法国人民结下的友谊，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晚，率代表团成员出席华侨俱乐部在巴黎新安江饭店举行的招待会。聚会长达三个多小时，感到“心情舒畅”，对与会的年轻侨胞说：“看见你们我仿佛看见一颗颗向着祖国的心。……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吧。祝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寿无疆。”

四月月下旬 在巴黎欣喜地

会见了专程由美国赴法前来晤面的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

四月 致李致信二封。介绍翻译家巫宁坤的右派错划已改正，译文不会差，建议出版巫的译作《巴姆修道院》等。

五月二日 下午，前往马萨旅馆，与法国文学家工会领导成员晤谈。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黎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及夫人，结识了《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收下了他们赠送的有关赫尔岑的资料及书籍。后应邀前往香榭里榭大街上的中国饭店福禄居晚餐。晚八时四十分，由石上流陪同，率领中国作家访法代



巴金 右 与赫尔岑的一位后辈安·昂孚大夫在赫尔岑墓前合影。



- ⊖ 巴金与孔罗荪 右 在巴尔扎克墓前。
- ⊖ 巴金在赫尔岑墓前。

代表团其他成员，抵巴黎最高楼宇即有五十六层的蒙巴纳斯大厦附近的 Fnac 弗纳克 书店会议室，出席书店举行的“自由辩论”会。在《家》的法译者李治华介绍巴金生平后，说“参加今天这样的集会还是第一次，心情很紧张”，又回答读者的问题，说“一九四九年以后，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团圆》……还有一九七八年发表的《杨林同志》”等。会议在十时一刻结束。又为读者的《寒夜》法文本签名。

五月九日 会见诺·利斯特和他的兄弟莱翁纳尔。晚，出席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主持的集会并发言，表示到巴黎后就进入了友谊的海洋，现在“游行了这海洋的中心”。上旬，因“健康情况不允许”，婉言谢绝意中友协的朋友关于顺访意大利的邀请。

五月上旬 由贝热隆主席和李治华陪同，率代表团乘飞机前往尼斯，在法中友协尼斯分会主席比爱雅夫人家住五天。扫赫尔岑墓。接见赫尔岑的一位后辈安·昂孚大夫时说：“我带来一颗心，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致敬！”又埋头抄下了墓上的碑文。在比爱雅家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了从瑞士赶来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由法中友协贝热隆主席陪同，乘火车赴马赛。法中友协瑞罗先生和加士东夫人等到车站迎接。在马赛住一天，找到了一九二八年十月住过的美景旅馆，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收下法国朋友赠送的收有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古马赛图》；乘船渡海游

伊夫堡；参观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在古堡一侧的大石块上照相，同时看到石上“‘祖国万岁’几个红色的法国字”，“想起了我的祖国”。由法中友协贝热隆主席陪同，乘飞机到达里昂，友协的一位女士带女儿和中国留学生杜伟凤前来迎接，下榻沙瓦旅馆。在里昂呆了不到一天，参观了中法大学旧址、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古罗马剧场的废墟、丝织博物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和现代化的图书馆；在接待两家报纸记者的采访后，参加了在万福楼举行的招待会。第二天，与法国朋友欢聚在法国大饭店。晚七时许乘飞机前往巴黎。会见当代法国著名画家让·埃利翁先生，谈得十分融洽。

五月十一日 下午，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接待了巴黎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和赫尔岑的外曾孙诺·利斯特等友人。得诺·利斯特赠书《浪漫的亡命者》，扉页上有赠书者诺·利斯特题词：“这本书对我的先人讲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但是书中有很多《回忆录》所没有的资料。”收下赠书后说“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

五月十二日 中午，收下诺

·利斯特在旅馆门口赠送的一张赫尔岑画像的照片，油画像是赫尔岑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照片系诺·利斯特所摄。交给李治华一张自己抱着外孙女端端的近照和一本法译本《家》，请代为转寄给两位读者，“照片寄给比利时一位夫人和她残废的儿子，……书寄给法国某小城的一位读者，因为法译本当时在外省还买不到”。巴金在扉页上题“送给一位素不相识的法国读者”。下午，参加法中友协的干部会。傍晚，应邀到著名画家、华侨赵无极家参加晚宴。深夜，坐“友协”干部拉斯吉叶的轿车回地拉旅馆。

五月十三日 凌晨一点，整理完行李，不能入睡。“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巴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观望“巴黎的天空”。临别巴黎，感到“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遂坐车往戴高乐机场登机返国。这次访法近三周，法国的朋友高兴地告诉随访的成员：当时，在巴黎出现了“巴金热”。同日，抵京，下榻国务院

第一招待所。致信李健吾。告之将他的文章删改后交李小林，在《收获》上刊发。在京逗留一周，拜访了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李健吾等挚友。

五月中旬 参加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举行的小型宴会，闲谈中认为：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说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

五月二十日 返沪。

五月二十二日 在上海，作随笔《再访巴黎》，载六月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抒写访法和五十二年后重新瞻仰卢骚铜像的感想，白云“我从《忏悔录》……学到了说真话”第二次从法国回来，“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也得写出两三部中篇小说……”，誓言“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人间消失”。

五月三十日 用诺·利斯特赠送的资料校改完《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册，并作《往事与随想 译后记 二》，载一九八〇年上海《书林》第一期。叙述与赫尔岑的外曾孙诺·利斯特会见时的情况和译完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决心”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信心”。

五月下旬 将家中所藏的《巴金文集》十三本 缺第七卷 寄赠法籍华人学者李治华。收到日本岛田恭子信，获悉她想到上海和成都，进一步开展巴金研究工作。接待来访的作家王西彦，畅谈访法观感，赠《作品》第四期，该刊载有《怀念萧珊》和杨嘉撰写的《杲日南天莫丽尼》，杨文记录了丽尼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六月二日 作随笔《诺·利斯特先生》，载六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访法时见赫尔岑外曾孙诺·利斯特的场景，同时赞赫尔岑只活了五十八岁，却留下三十卷文集，这些文章“至今还像火一样燃烧”，“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六月三日 致信岛田恭子。云不便以个人名义向她发出邀请的信函，个人写信没有用；但“关于我的事您写信来问我，也会得到明确的答复”；在成都故居“估计不会留下什么了”。

六月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侄女李国炯由栋臣陪同到上海看病等。

六月中旬 致访华后将于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的水上勉“一封道歉的信”，云将赴北京开会，不能接待水上勉一行，并将致中岛健藏的信请他代转。

六月十六日 作《关于 海的梦》，载七月八日、十五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叙述《海的梦》创作和修改过程，以及作品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寓意和人物的生活原型等。

六月十七日 作随笔《在尼斯》，载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在小说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因为“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又说“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拼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在“五十二年重访法国之后”，内心痛苦和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笔。……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六月十八日 在北京参加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和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下榻北京北蜂窝铁道部招待所。

六月十九日 致信李济生。云“法国报上的文章我有不少，不过那是法国人的看法。克朗西埃的欢迎词是写好了稿子念的，念完他就把稿子送给我。我们却没有这个习惯”。

六月二十四日 阅完罗洪回忆萧珊的初稿后，致信罗洪。云“只改了两三个字”，并告“下月初回上海”。

六月下旬 惊悉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逝世，托全国文联发去一个唁电。

六月 看了李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的文艺短论《“歌德”与“缺德”》，颇有所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的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

约六月 看《重放的鲜花》，收入的全是一九五七年被定为“毒草”的作品。联想到一些作家的遭遇，感到：这种对部分作家的不合理、不公道的惩罚，“我们都是点头默认过、或者举手赞成过的”，“作为正直的作家，是于心有愧的”，深感“历史的悲剧决不允许重演”。观看重新公映的据老舍名著《茶馆》拍摄的影片后，总是不忘剧中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深感“老舍是伟大的爱国者”。

七月初 从北京返沪。

七月六日 作随笔《重来马赛》，载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访法时“重来马赛”和“初去伊夫堡”的见闻。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写小说”和“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观伊夫古堡的囚室，想到当年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为他的英雄挑选的这样一个监

牢，想到法国朋友今天仍“对外国人开放”，指出吸取“历史的教训，免得悲剧重演”是何等重要。

七月八日 复信无锡市教师进修学院语文学科组，告之影印手稿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上海《语文学习》第四期。

七月九日 作随笔《里昂》，载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在里昂的见闻和友谊。并解释说，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写长篇小说，是因为“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过去写的散文，自责“有时候把白脸看成红脸”，说“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

七月十二日 作随笔《沙多—吉里》，连载于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留法时在沙多—吉里小城“一年零两个月”中创作“第一部小说”、发现“头上的第一根白发”、切面包刀“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以及“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当年“玛伦河桥头花店里金发小姑娘”等动人的往事，着重回忆看门人古然夫人对自己“慈母”般的感情，为寻找不到他们夫妇的墓而遗憾。表示“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

过”。

七月十六日 作随笔《“友谊的海洋”》，载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怀念访法时的友谊以及与巴黎第二电视台记者克莱芒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见面时关于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和“五七干校”等的“对话”，一些看法不同，但加深了友谊。

七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中国人》，载八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访法与侨胞几次亲切、热烈的会见，深感游子的心牵系祖国母亲，同时感到，无论在什么地方，“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虽然“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

七月二十四日 作随笔《人民友谊的事业》，载八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访法时与“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秘书长马纪樵夫人以及赵无极等朋友的友谊，说“我尊敬一切为人民友谊鞠躬尽瘁的人”。

七月二十九日 到虹桥机场送别日本作家井上靖。

七月三十日 作随笔《中岛健藏先生》，连载于八月十六至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与中岛健藏真挚深厚的友谊并赞中岛长期来为中日友好进行的艰苦卓著的斗争，为中

岛因患肺癌“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而悲哀，坚信友谊的“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

七月

开始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即《一双美丽的眼睛》。

某日上午十点，在北京铁道部招待所卧室会见专程从天津赴京的作家文放。见文放在“文革”中双腿被打成了瘫痪，遂回忆五十年代文放来访后自己和妹妹被批斗和隔离审问的情况，云“‘四人帮’那一套一去不复返了，咱们向前看”，表示“要写一部长篇”，继续翻译赫尔岑的书。当问起六十年代已写好的一部反映志愿军生活的中篇“为什么至今不拿出来”时，云“写得不好，不能拿出来，那是失败的作品”，表示“作家要对读者负责任”，认为写出作品“要多看几遍，放一放再改，不要急于拿出去发表”，认为写东西要有真实的感情，要说实话，说心里话，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表示“别人给我出题目做文章，我常常是做不好的”；又听文放谈他自己写的一部反映文艺界与“四人帮”斗争的小说第二十二章的部分段落，鼓励他“快写完”，并嘱“把腿治好”。

夏季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致信萧乾。说萧赴美一趟很好，嘱其“谦虚”，“不要多表现自己”，并望萧“八十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认为应将“名利、地位等等”“看穿”，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后世留下一点东西”。

在寓所接见上海越剧院编剧周水荷和导演朱铿，鼓励其放手地按照越剧的特点和要求改编自己的作品，又云：“我觉得剧本编得还可以。改编的同志对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曹禺的话剧《家》就是根据他的思想感情改编的。”

获悉周立波在北京因病住院，托赴京的女儿李小林到北京三〇一医院探视。

八月二日 作随笔《观察人》，载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在自己小说中“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五十年来”，“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的。……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认为“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又致信杨静如。云需要安静，不要打岔，因“还要写几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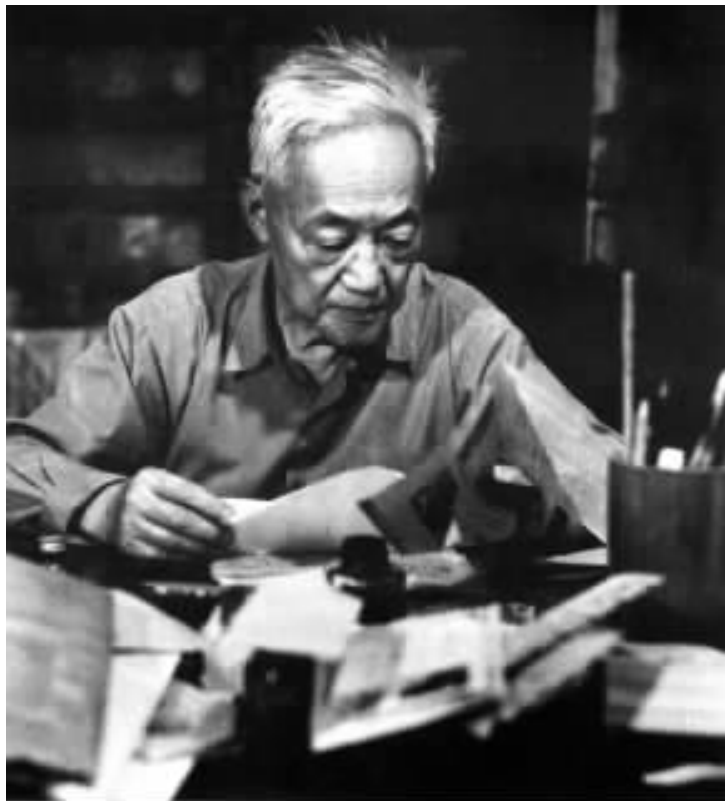
八月五日 作随笔《要不要制定“文艺法”》，载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文



冯雪峰。

艺界的“棍子”，有的公开地发表文章，有的在角落里“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后放暗箭伤人，有的打小报告告状，对付这种人，单靠“制定‘文艺法’”是不行的“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必须经过斗争”。

八月六日 作随笔《绝不会



一九七九年八月巴金摄于寓所书房。

忘记》，载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少年时代“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后来“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我们应当向前看，但不应“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八月八日 作随笔《纪念雪峰》，连载于九月四至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记叙与冯雪峰的交往和深厚友谊。为冯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和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而鸣不平；又自剖曾与靳以联合发言上台批判冯等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想保全自己”。

八月十一日 作随笔《靳以逝世二十周年》，载九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记叙深挚的友谊和靳以写作、编辑的成绩，为其“文革”中“他的坟给烧掉”而悲愤。又作《随想录 第一集后记》，载《随想录》第一集，自云过去“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自感已“接近死亡”，这本书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愿意为它们负责”。

八月十三日 萧珊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又“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仍然感到心痛”。

八月二十八日 作《关于神·鬼·人》连载于十月十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一书的作者谭兴国。

四至二十一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回忆创作小说《神·鬼·人》的经过等，并望“文革”那样的“噩梦”不要再做了。

八月 致李致信二封。接四川作家刘盛亚遗孀信后，嘱李致：“盛亚的事，你能为他讲话时，就讲几句吧。”

九月初 看嘱女儿和女婿编选的《爝火集》清样。当时人们正谈论因大寨假典型而飞黄腾达的陈永贵的盛衰，巴金曾考虑抽去已收入集中的《大寨行》。后来决定不动它。“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但也删去一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

九月十二日 作随笔《“豪言壮语”——随想录三一》，载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过去也是一个‘歌

德派’”，“感情是真挚的”。

九月十六至二十六日 选译完《往事与随想》第三卷第十九、二十两章，并作《译后记》，载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五日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第一期。

九月下旬 在寓所会见上海越剧院院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以及越剧《家》的改编者周水荷、导演朱铨和扮演觉新、觉慧、瑞珏、鸣凤和梅的男女演员。指出越剧《家》的演出“多少还有点现实意义”。

九月二十八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一书的作者谭兴国，并对该书初稿提了一些意见，对生平和创作中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病中作随笔《“小骗子”——随想录三十二》，载十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针对当时社会上传闻的“骗子”事件和“骗子戏”《假如我是真的》，指出“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是“为了私利”；认为禁止演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不能很好地消除产生骗子的气候、铲除产生骗子的土壤，进而指出，“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这样下去，……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

九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



同意李致编《怀念集》，但不同意他编《谈创作》，因为已编入《巴金选集》等。

约九月 接江苏作家方之打来的电报，获悉对方为即将创刊的《青春》约稿。曾看过他错划右派改正后的新作《阁楼上》，现在又要创办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说明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至今还在‘探索’”，但终因生病写不出文章，遂回了一封短信，“请他原谅”。

十月上旬 任上海《儿童时代》社举办的建国三十周年短篇小说征文评委，审阅了六十多篇应征入选的作品。年迈，加之多年劳累，肺气肿等病日益加重，

遂住华东医院疗养数日。

十月十四日 下午，在寓所接见旅美女作家李黎。

十月十七日 下午，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作家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赠送花圈。

十月月下旬 在寓所会见山西青年作家杨茂林，回忆一九六四年携萧珊、李小棠同游五台山的情景。

十月二十五日 主持上海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代表团成立大会，被选为第二团长。陈沂任第一团长。

十月二十七日 偕上海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代表三百余人乘飞机

赴京。市委书记王一平等到机场欢送。

十月下旬 抵京后下榻友谊宾馆。由李小林陪同，与徐迟前去看望阳翰笙。阳翰笙高兴地拿出刚接到的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份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的中央文件，让李小林读。徐迟听后大声欢叫：“啊！普罗米修斯解放了！”巴金频频点头，发出舒心的微笑。

十月三十日 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十月 从文化局工作的朋友处重新获得彭德怀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给自己的亲笔信。后作文说，因“文革”时“没有



巴金左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中旬在北京与周扬
右交谈。

存放在不易发现的地方，它给抄走”了，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像过去那样地敬爱这个朴实、真诚、刚直、勇敢的将军——革命者——人，而且更加强烈地敬爱这个没有半点虚假的战士。我把失而复得的彭总的手迹捐赠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十一月上旬 会议期间，就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不要算旧账，但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这个搞不清楚，今后还是会跟风向走。这样，文艺怎么能繁荣。”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与茅盾亲切交谈，著名画家高莽为两人画了一幅合像。

十一月十一日 在北京，作《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载十二月十二日《文艺报》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后经节录，易题为《巴金谈文艺形势》，载十二月十六日香港《文汇报·文艺》。认为判断今后会不会再出现像“四人帮”那样的人物的关键，是“我们的民主和法制”是不是健全。自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是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

十一月十四日 到西苑，出席鲁迅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后向周扬、李季提出为沈从文解决房子问题。

十一月十六日 下午，被选

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参加闭幕式。在新疆厅，同胡耀邦谈了“骗子”的事。

十一月十七日 上午，参加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的冯雪峰追悼会。

十一月十八日 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主持周立波追悼会。

十一月上中旬 在京开会期间，先后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冰心、曹禺、李健吾等挚友欢聚。同时，曾向领导提出要求，让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演下去，认为这部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

十一月中旬 获悉著名画家韩美林的坎坷经历，深为其中画家与狗的一段轶闻感动，联想到“文革”中失去的小狗包弟。

十一月月下旬 得悉台湾七位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友人写的祝寿诗：“中岁临江海，相期老钓纶。家山长道阻，风雨一舟来。菊饮今延寿，梅开早报春。悼亡存正气，共止泪沾巾。”

十一月三十日 傍晚抵沪，感身体不适。

十二月四日 作随笔《方之同志——随想录三三》，载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为

青年时代的方之因“有抱负”、“太单纯”被“打成右派”而惋惜气愤；认为“现在需要”像“一团火、一把剑这样的作品”，自愿把笔当做火、当做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

十二月七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唐金海和张晓云，回答了唐和张关于巴金作品、文艺思想、早年政治信仰等问题，还同意录音，并明确表示：“别人不管怎么写法都可以，我并不想让别人按照我的意思去写我；只要是我写的作品，都可以评论；如有与事实出入的，我可以帮助改正。”

十二月十五日 作随笔《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四》，连载于二十五至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赞老舍是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是“伟大的爱国者”；为老舍“文革”中被迫害惨死而痛苦、愤怒；坚信老舍“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作随笔《我读 红楼梦》，载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版《我读 红楼梦》。云：“十几岁时翻看过《红楼梦》，最后一次读《红楼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往马赛的法



轮船上；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有着作者自传的成分”，书中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悉的，或他珍爱过、所恨过的”；那些场面也是作者“见闻或亲身经历”过的，“是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的”。

十二月十六日 上午，在寓所与老友晤谈时，《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来取稿；晚，致信彭新琪，云客人走后，才想起来，“我把‘六年’写成了‘五年’明年是陈毅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请代改正”。

十二月二十一日 翻阅日本新潮社原版、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出版《近代思想》上册第六章，找到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自约翰·卢梭以来 沸腾世界之良心，莫如托氏者，他实苦人类之所苦者也。”遂致信《巴金创作论》作者张慧珠。将托尔斯泰的这句原话抄寄给她，并云“这句话在二三十年代对我有很大影响”。

十二月二十三日 作随笔《大镜子——随想录三五》，载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照镜子”可

以看到自己“真实的面容”、“镜子对我讲……真话”，谈到镜子可以使人“头脑……清醒”。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寓所会见巴金研究者汪应果，回答若干问题，并谈到人物形象，“作品里的革命者的形象是从他的一些朋友身上综合加工而来，他们‘过去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但作者本人从未参加，因此书中的‘人物全是我熟悉的朋友，而故事却是编造的、想象的，具体背景谈不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 致信田一文，云“我没有翻译过萧洛霍夫的书”，“外国记者……弄错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 作《关于龙·虎·狗》，载一九八〇年一月香港《文汇报·文艺》。谈《龙·虎·狗》等散文创作的情况，自云因“受到长期的批评和十年的批斗”，至今又有“吱吱喳喳”的“议论”，写回忆录“不想抬高自己也不愿贬低自己”，旨在“帮助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誓言“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十二月底 把劫后复得的彭

德怀一九五三年的亲笔信送交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

十二月

致杨静如信二封。云“总有事打岔”，“真想关起门写三五年”；对王西彦、孔罗荪、刘宾雁、邓友梅、刘绍棠等在南京师院作的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报告受到欢迎一事，表示“刘的确讲得不错，……据说他认真在考虑问题，看得较深一些。而且他敢讲，有胆量”。又云：“三十年来我接触到的‘唯唯诺诺’的人太多了”，因此“赞成年轻作家‘狂’一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随想录》第一集。

寄赠第一集《随想录》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剑波。据卢记述，解放后，巴金每出一本书，均寄给卢。卢云，其中很多书已转赠别人。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烟火集》。该书系巴金委托女儿和女婿编选，自己最后审定。

得已故挚友叶非英家人请巴金出面要求为叶非英平反的来信。



自云任何时候都是爱国者，这是打开他“全部作品的钥匙”。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把心交给读者”。

“十分讨厌”“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称其为“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

任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团长。访东京、京都、长崎、广岛等，“到处是友谊的海洋”，盛况空前。

被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主席。依然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本好书”。

四十年代开始思考“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于是“写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

作文进一步阐述和称赞赵丹提出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认为思想复杂的人“思想会长眼睛”，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

念念不忘一件事：“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

创作《随想录》最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

七十七岁

一月四日 作随笔《小狗包弟——随想录三六》，载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写小狗“包弟”的活泼可爱及与家里人的亲热关系；自责在“文革”的白色恐怖中，“为了想保全自己”“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

巴金《小狗包弟》：“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一月十日 致信谭兴国。同意转载《随想录》，云“这也是制造舆论”，“请不要寄稿酬”。

一月十一日 同李小棠、李琼如、李瑞珏、李国平、端端到“红房子西菜馆”，由李小林请客。

一月十九日 致信杨静如。自云“身体……的确开始垮了”，为完成写作计划，表示“要保护自己”。

一月二十五日 作《关于火》，载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回忆创作、修改《火》三部曲的经过。云“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的冯文淑“就是萧珊”，写第三部中的田惠世时，借用了亡友林憾庐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同时又云写了“并不熟悉的生活”、“考虑不深”，所以三部《火》“全是失败之作”，但书中“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是“真实的”；自云“旧作中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差不多占同样的地位”，“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直至今日，“我那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一月

读二十五日《大公报》上白



作为内部刊物印行的巴金《随想录》。

杰明为《大公报》撰写的特约稿《异样也是常态》，特别欣赏文中提到的一句话：“要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触动了写作的灵感。

被《小说月报》聘为名誉顾问之一。致李致信三封。告之将赴京，与李小林同行等。

同意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南京师范中文系资料室将《随想录》辑入“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继而同意该刊据香港三联书店版《随想录》单行本排印出版。这是巴金《随想录》在大陆出版的初版本，深受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欢迎。

二月九日 作随笔《探索——随想录三七》，连载于二十九日、三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自己的生活、创造道路谈到人生要“敢于探索”；当发现“文革”是一场大骗局

时，“我的心死了”；自云“永远做不了机器人”，“还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十五日 作随笔《再谈探索——随想录三八》，载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探索”“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一个好人”，又重申“我并不是文学家”；认为“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

二月二十日 致信李奈西。应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李奈西的要求，寄上简历。

二月二十六日 致信岛田恭子。云四月内访日，为岛田“学习 Esperanto”而高兴。

二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探索之三——随想录三九》连载于三月十二至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说“从来没有思考

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題”，几十年写作生活，探索、追求的是“更明白、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对那些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十分讨厌”，这些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

二月二十九日 作随笔《探索之四——随想录四〇》，载三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我的作品”“不是写给长官看的”，“无法按照……长官的意志”“写作”，只能“讲我自己心里的话”。

二月 接沈从文来信，信中的一段话，让巴金心中十分难过和焦急：“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

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巴金看后，大声疾呼：“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

三月八日 致信张慧珠。谈早期思想：作品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深，“但这‘无政府主义’与今天的‘无政府思潮’不同”，希望不要“在这方面纠缠”。明确表示：“自始至终我是个爱国主义者，这又是和无政府主义相矛盾的。”并赠译作《往事与随想》一册。

三月十三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唐金海、张晓云，回答若干问题并谈“文革”中的遭遇。后唐、张写成《巴金访问荟萃》，经巴金审定。

三月中旬 撰写访日演讲稿《我的文学生活五十年》，载四月七日日本《朝日新闻》晚刊，后易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回顾漫长创作生活。云自己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到巴黎是“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因此一直“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写作和生活”、“作家和人”“二者的一致”、“融合”，就是“把心交给读者”；又云“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想把写黑暗和痛苦的笔改为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自己仍有一颗“燃烧的心”，表示“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三月十九日 与李小林抵京，作访日前准备。

三月二十日 与萧乾会面，欢聚畅谈。

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国作家



巴金 左 与萧乾 右。



协会办公室会见意大利留学生玛尔格丽达·彼雅斯科，就巴金作品、当前巴金研究的状况以及中国新时期文学现状和未来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后玛尔格丽达据此整理成文，载辽宁大学《欣赏与评论》第二期，题为《巴金与意大利留学生玛尔格丽达谈自己的创作》。表示他过去的作品，“重要的是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又云“五四”以前中国就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青年人又很喜欢自由，所以自己“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三月二十四日 作《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载北京外文出版社版世界语译本《春天里的秋天》。云“我的作品译成世界语，这是第一次”，“非常高兴”。傍晚，在西郊招待所会见《北京晚报》特约记者朱述新。谈到不久的访日之行，云一是为学习而去，二是为友谊而去。表示自己的晚年，除了创作和翻译外，就是要献身于各国人民的友谊事业。对记者讲述了创作近况，告之为了争取时间多写作，电影院和书店都难得去了，只保持着集邮的爱好。

三月二十五日 出席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代表评委会给蒋子龙等获奖作者颁发奖金和纪念册，并讲话，讲稿载《人民文学》第四期。为优秀作品的涌现和创作队伍的壮大而欢欣鼓舞，希望永不脱离人民和生活，同时向书本学习，写出更“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三月二十六日 与夏衍在北京看望病中冰心。

三月二十七日 致信李济生。托这位胞弟将书单转汤永宽，并请代抄一份法文书目，送交陈西禾等。致信岛田恭子。谈访日时《朝日新闻》记者将采访及“收到德田六郎先生来信”等事。

三月三十一日 与孔罗荪前往东城区交道口南三条十三号访茅盾。在茅盾旧居书房中畅谈一小



时，茅盾谈他过去的事，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跤后的幻景，谈话内容十分生动。后又听说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在家中晕倒，嘱女儿李小林作为《收获》的编辑，去探望她，“我要她带去我的问候，请她保重身体，并且希望她奋笔多写”。

三月

致李健吾信三封。告之写了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老舍讲了话；又告之访日行程等。

致李致信三封。告之近况，并建议为刘盛亚出一本遗作等。

约三月 接到曾被打成右派、误传已成“亡

灵”的卢芷芬夫人的来信，获悉她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靠三十几元钱的生活费抚养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十年浩劫中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又获悉她在干校认识了新的朋友，后来组织了幸福的家庭。

四月一日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领一行十二人到日本进行为期十六天的访问。冰心、林林任副团长，李小林、吴青也陪同前往。抵东京后，由原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安排，下榻新大谷饭店。稍事休息后，拜访了已故的中岛健藏和松冈洋子的家。面对中岛先生遗像，心情激动。在巴金受迫害与

世隔绝的十年中，中岛先生通过中国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打听巴金的消息，询问他的健康，希望能访问他等，对巴金十分关心。巴金云和中岛先生“很早就认识，一直称他为大哥。我被解放后本想能见上一面，谁知中岛先生却于去年离开了人间……”晚，前往国际文化馆宴会厅，出席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盛大酒会，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表示自己是不善于讲话的人，但不能不讲几句话。因为来到了开满鲜花的国土，就像进入了五彩缤纷的大花园。美丽的友谊鲜花，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朋友们今晚在东京举行宴会酒会，和

大家见面，“我感到很高兴”。朴实、坦率、真诚的讲话，把主持酒会的日本著名女作家三宅艳子感动得哭了。讲话结束后，各国朋友涌来，要求签名、留影和索取名片。宴会时间一直延长到很晚，日本友人清水正夫不得不宣布结束。

四月二日 前往东京千代田町首相官邸，拜会了大平正芳首相。首相曾读过巴金的作品，交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

四月三日 上午九时，经日本电视台安排，与日本著名小说家水上勉在新大谷饭店的庭园里对谈。事后电视台将复制的录像和录音带赠巴金。



- ① 巴金 右、夏衍 中 与冰心
左 在一起。
- ② 巴金 左 与茅盾 右。
- ③ 巴金 右 与谌容 左。
- ④ 巴金 左 与日本首相大平正
芳 右 在一起。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一九八〇年
四月三日巴金 右
一、冰心 中 与
日本作家水上勉
左一 在一起。



四月四日 上午，在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我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话，由亡友江马修的夫人、作家丰田正子女士翻译。讲话四十分钟。听众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讲话结束，在门厅等候车子时，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巴金后来回忆说，他的话是自己没料到的，却使自己头上冒汗。“我彻底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

剖自己，还差得很远。”

四月六日 由《读卖新闻》安排，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三十九层楼上，与日本当代著名戏剧家木下顺二“对谈”了一个上午。谈话内容载日本岩波书店《图书》杂志八月号，译文经巴金审订后载一九八一年五月上海《小说界》创刊号。云中国的“封建的流毒……顽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包括大反封建主义的内容”；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说不出有什么好的一面”，中国人民吃了苦头，“这对于人类，也是一种贡

献”。当木下问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回答说今天尚未“作出结论”，但“我个人认为那个讲话是‘了不起的’”，要求青年人首先要学一学那个讲话，同时又说，一部作品只能按照作家本身思想和观点来写，书籍……只能作为参考。“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创作和生活的完全一致，是作家和人的一致”。

四月七日 曾主动向日方提出访问广岛。是日上午，从羽田机场乘机赴广岛。见事务局的年

轻姑娘哭着向自己告别，“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下午，抵访日的“第一个地方”，看到了在原子弹爆炸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和平公园，把鲜花扎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难者的慰灵碑前，站在那里默哀行礼。……千羽鹤纪念碑下面挂着全国儿童叠好送来的无数的纸鹤，取下一只蓝色硬纸折成的小仙鹤放在袋里带回中国。后又参观了和平纪念资料馆，并用软笔题词：“全世界人民绝不允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世界和平万岁。”夜，写《我与文学》，未完篇。

四月八日 上午，游览后返东洋工业招待所休息。下午，参观广岛汽车工厂。晚上，参加宴会，并致词：“我看到了广岛人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我看见了和平力量和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晚八时，回到十三层楼的房间，稍事休息，遂写至九日凌晨一时，作完《我与文学——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载十六日日本《圣教新闻》。云自己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是为着同敌人战斗”；认为“十年浩劫”“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这段时间自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现在要“奋笔多写”，“五本《随想录》”是“生活中探索

的结果”“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自信“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十日 抵京都。巴金研究者岛田恭子前来迎接；会见刚从四川成都巴金老家访问归来的池田正雄先生。

四月十一日 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作《我与文学》的讲话，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要求签名留念的人有青年、小孩，也有老人和妇女。

四月十五日 到长崎和平公园献花。到国际文化会馆接东京来电话，获悉土岐善磨先生逝世。晚，在长崎县举行的酒会上，县文化课的中川和夫拿出一本已换过封面的旧书——一九五二年日本出版的《寒夜》请巴金签字。为感谢日本朋友的盛情，在扉页上题词：“来到长崎，我实现了四十几年前的心愿。我体会到像花一样美丽的友情。”中川先生当众宣布：“从此这本书不再外借，将作为长崎县的一份财富永远保存。”

四月十六日 游览长崎繁花似锦的名园，浮想联翩：“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

建立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能无动于衷 难道我不是更加想念我在困难中的祖国 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晚，出席当地华侨总会举办的晚宴，与侨胞、留学生和来自祖国的海员等欢聚一堂，深深感到：“仿佛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四月十七日 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笔会中心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主席。下午，从长崎机场乘飞机回上海，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从横滨赶来送行，他“腿关节有毛病，拄着手杖”；又见朋友们流泪依依惜别，巴金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上了飞机”。抵达上海后，在虹桥机场，会见前来迎接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钟望阳、吴强等。邀同机返沪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冰心在家小住，会见一些朋友。夜，看到一位姓杨的女同志来信，获悉萧珊昔日好友王育常《火》中朱素珍的原型，“文革”中遭受折磨，留下后遗症，成了个“活着的死人”，感到无比悲愤。访日归来获悉大嫂张和卿病逝于成都，享年八十一岁，丧事从简，没有开追悼会，巴金心中很难过。

四月二十日

修改创作回忆录《关于火》，发表时易题为《关于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火的回忆》。

在上海《语文学学习》第四期发表《巴金谈 海上的日出》。回答该刊编者关于散文《海上的日出》所提的若干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 作随笔《友谊——随想录四一》，载五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访日时与水上勉、清水正夫、丰田正子等的“友谊”，自云是“感情不外露的东方人”，但“谁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给他”。

四月二十五日 致信李国煜。安慰侄女国煜，说为大嫂张和卿的突然去世感到难过，劝慰侄女们保重身体，热爱生活等。

四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春蚕——随想录四二》，载五月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自己写作时不考虑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认为长官讲话、作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自云“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但“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四月 获悉冰心访日归来离沪返京后跌伤了腿，已住院治疗，致信问候。

春季 致信杨静如。同意《雨花》转载一篇随想。

在寓所会见侨居美国的挚友卫惠林之女卫缙云，于上海国际饭店设宴招待、畅叙别后。卫缙云是卫惠林小女儿，生长在台湾，后赴美任建筑设计师。会见时，卫表示要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回祖国长期工作。巴金表示赞赏，但却以为她仅是“一时的冲动”，不理解她的“毅力和深沉”。

五月六日 第三次读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称小说中陆文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普通人的形象，小说“讲了我心里的话，给我打开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

五月七日 作完《关于 还魂草》，载六月一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回忆中篇小说《还魂草》创作经过，是据熟悉的人和事编出来的故事，写作时与“人物一起哭笑”，主题是“控诉敌机滥炸平民的罪行”；并云“四十年代开始我就在搜索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写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

五月十三日 下午，去静安宾馆九楼，请夏衍吃饭，吴强、李子云在座。

五月十五日 应香港时代图

书公司之约，为自己编的两本选集《巴金小说选集》和《巴金散文选集》作《前记》，载《序跋集》。自云“有一个时期”“中了催眠术”，“我彻底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我所有的作品”，“现在我醒了”，它们“不是废品”“不是毒草”，虽不“完美”，“对读者并非毫无益处”；又云现在“八旬在望”，仍“觉得满身波涛般奔腾的感情等待着倾吐”，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

五月十七日 为刘少奇同志追悼会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

五月二十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巴金研究专集》编者之一唐金海。翻阅该专集中整理的著译目录后说：“只要是我写的，我都可以承认。你们花了那么多功夫，搞得那么全，很不容易。你们这是做学问，为后代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对作家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五月二十一日 上午，在寓所接待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在座。聂华苓夫妇刚从成都访问过巴金的“老家”。宾主就《随想录》、新时期文学等问题进行交流；巴金因身体不佳，婉言谢绝到爱荷华写作的邀请，同时又说：“希望海外的朋友都回来看看，也希望台湾省的朋友也回来看看。”临

别，安格尔朗诵了即席创作的诗句。

五月二十四日 作随笔《怀念黎烈文兄——随想录四三》，载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黎烈文与鲁迅及自己的交往，以及黎在台湾的潦倒生涯，痛斥诬蔑黎为“反动文人”的流言。下午，在寓所接待吴奔星、陈芦荻教授。交谈时表示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有框框，应对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进行研究；并就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及《家》的评价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五月二十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不看中篇小说集正文校样等。

五月二十八日 致信《复仇及其它短篇小说》法译者，载法文版《复仇及其它短篇小说》，

巴黎 MAZ Ari Ne 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版。同意翻译这些短篇小说，并云这些早期的作品，它们保留了“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爱憎”，例如“《罗伯斯庇尔》……，借用一个外国‘古人’来影射蒋介石的独裁”，承认“在我这些作品里还可以找到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物”。

六月五日 作随笔《访问广岛——随想录四四》，连载于十三至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访问广岛的见闻。希望曾遭到巨大痛苦的广岛人民现在幸福，自云这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正义观”；从广岛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点燃起来一直熊熊燃烧的慰灵碑后面的“和平之灯”，联想到自己祖国的“十年的大悲剧”，从任何原子武器，

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人民力量，联想到只要全国人民坚决的努力，我们也“燃起我们的灯”，“要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惨痛的教训”，“使十年的大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六月七日 致信李致。嘱买《何其芳选集》等。

六月十五日 作随笔《灌输和宣传 探索之五——随想录四五》，连载于二十四至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但有人主张“‘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谁的权大势大，谁发号施令”。在“棍子下面低头”，这是“信神的结果”；又说最近“有人说我‘思想复杂’”，这说明“我以后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巴金中在寓所花园会见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左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右。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六月二十一日 致信李健吾。云身体不太好，整个机器衰老不管用了。表示“有十一本书要搞出来”。

六月二十四日 作《意大利文译本序》，载一九八二年三月沈阳《芒种》第三期。云萨珂和凡宰特这两个意大利工人一九二七年被诬陷而上电椅的冤案，五十年后才得到昭雪，后曾据凡宰特的故事写过两个短篇小说《我的眼泪》和《电椅》，自云“走上文学道路”，“是和我的意大利老师分不开的”。

六月二十五日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巴金笔名考析》作者张晓云和唐金海，对他们收录的笔名逐一核对后指出：“赤波、甘宁、壬平不一定是我，要看文章才知道。余一、余三、余五、余七是我的笔名，但有些文章不是我写的。在《文学季刊》上有时为了写补白，我和靳以都随意用过。”

七月二日 下午四点，接待应约前来拍俞云阶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画的巴金油画像的唐金海和马棣麟，云“人头昏，没有力气”。李小林、李小棠和祝鸿生为他量热度，惊呼：“摄氏三十八度八！”巴金无奈地说：“不能陪你们了，你们随意拍照吧。”家人联系，立即送往华东医院就诊，遵医嘱住院。随后吊了两天青霉素、葡萄糖，体温慢

慢下降，“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住医院”。

七月上旬 在医院花园中散步，最后一次与身患癌症、其时“在水池边看花”的赵丹亲切交谈。

七月十一日 在华东医院作随笔《发烧——随想录四六》，载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自己发高烧住院治疗，寓意深长地指出：“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

七月十三日 在华东医院作随笔《“思想复杂”——随想录四七》，载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而“思想复杂”的人，“思想会长眼睛，……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七月十四日 病愈出院。

七月十七日 致信曾敏之。告之曾从香港寄来的书已到齐，并谈了自己的身体近况。

七月二十日 致信李健吾。告之近况，并云，“听说卓吾去世，想起一九二七年他在巴黎几次会见的情景，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七月二十四日 赴京，作出访北欧的准备。

八月初 接待香港昭明出版

社编辑。因行程匆匆，婉言谢绝为《巴金选集》写《序》，但答应访欧归来后写篇《后记》。

八月四日 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瑞典，出席第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抵达斯德哥尔摩后，因患支气管炎，使馆派人诊治和照料。

八月六日 欣闻国际世界语协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接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团体会员的决议。

八月十二日 会见瑞典科学院秘书拉尔斯·居伦斯顿，亲切晤谈并参观图书馆、会议厅。下午，乘飞机回国抵京；晚上，听说井上靖和其他日本友人第二天要离开北京，不顾旅途劳累，连夜赶到饭店会晤。

八月十六日 同夏衍去冰心处吃午饭。

八月十七日 从北京回沪。

八月十九日 作昭明版《巴金选集》后记。驳斥香港黄河文中的一个错误观点：认为作者“通过杜大心得出一条荒谬的逻辑：‘凡是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的一身。’”黄文作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载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统续编》第三卷《小说二集》。巴金指出古往今来具有“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何止千千万万；自云“虽然重视谦虚，也不

愿在棍子下面低头”。

八月二十一日 致信岛田恭子。指出魏绍昌写的《随想录 读后杂写》“有些记忆错误，不太正确”；并感谢在京都访问时岛田的深情厚谊，表示“希望能在上海见面”。

八月二十四日 作随笔《世界语——随想录四八》，连载于九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自学世界语和“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的经过，认为“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八月二十五日 送小中风的妹妹李瑞珏到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八月二十八日 在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八月三十一日 在北京作《胡^ㄣ青画集 前言》，载《探索与回忆》。深情回忆与老舍、胡^ㄣ青夫妇的友谊，赞老舍“正直善良，才华横溢”，是位“伟大作家”。

八月 在《花城》第六期上看到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记巴金在“牛棚”和农村“劳动营”》及高行健《关于巴金的传奇》，“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又回忆起“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牛棚’里的日子”，拟作文，文即十月上旬写的随想录《写真

话》、《“腹地”再记》。《花城》文艺丛刊第六期发表《巴金文学创作目录》，署“巴金手订”。

九月十日 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在京小住。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又参加全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举行的茶话会。

九月十二日 胡乔木来，谈了两个多小时。

九月中旬 在京作随笔《多鼓励，少干涉》，载《文艺报》第六期“《怎样把文艺工作搞活》专栏”。对认为“一部电影”、“一部小说”“可以使青年犯罪，……可以亡党亡国”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现在“知识分子并未得到信任”，“过去空话说得太多”，现在“要多做取信于民的工作”；对文艺“主张多鼓励，少干涉”。翌日，从北京回上海。

九月二十日 作随笔《说真话——随想录四九》，载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有“探索人心的习惯”，“每次运动过后……人的内心更往内缩，……听不到真话”，自责“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多年来自己“相信”和“传播过假话”，“别人‘高举’，我就

‘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

九月二十一日 在寓所会见日本友人、世界语学者德田六郎。

九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人到中年——随想录五〇》，载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赞谌容《人到中年》的主人公陆文婷的“平凡和不自私”、“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

九月二十四日 出席上海市文联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怎样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认为“作家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不能勉强按别人意志转”，领导“管文艺时，不要太具体，不要太死”，还是要信任作家。

九月 侄女李国^ㄣ胞弟李济生之女 从插队落户的边区返沪，暂留居家中，帮助整理大量书籍、资料，后安排到上海市作协资料室工作。另外，同意电视台拍自己的纪录片，但是表示：“资料片等我死后派用场，可以。我活着时用不着宣传。现在需要多写，少浪费时间。”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巴金近作》第二集。致李致信二封。告之《巴金近作》到二为止，《巴金选集》暂时不要搞，认为“到处印旧作，反而不好”；嘱协助电视台到老家拍自己的资料片等。



秋季 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试映间看影片《巴山夜雨》。看完，总导演吴永刚“陪我走了一段路”，获悉该片导演构思和他的坎坷命运，十分感动，并“同情他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费了才华”。在寓所会见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张世珠陪同前来的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李虹和莫贵阳。获悉该社编辑的《普希金小说选》，拟收萧珊的几篇旧译，遂表示同意。

十月二日 作随笔《再论说真话——随想录五一》，连载于十一日、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联系自己的惨痛教训，批评过去有些人，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他们自己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

十月四日 作随笔《写真话——随想录五二》，载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十年浩劫”初期作家王西彦“一直在顶”，而自己却“迷信神”，至今未忘记当时“自己的丑态”；主张应多写“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大灾

难”的“十年”。

十月六日 致信岛田恭子。同意她“把《随想录四八》译成日文”。

十月七日 作随笔《“腹地”——随想录五三》，载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对“文革”中造反派把他一篇短文中“腹地”一词的无限上纲表示极大的愤慨和辛辣的讥嘲。

十月九日 作随笔《再说小骗子——随想录五四》，载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像‘活报剧’”，但它“批判了特权思想”，可以演下去；骗子有大小之分，“那些造神召鬼、制造冤案、虚报产量、逼死人命等等的大骗子”“很多”。又阅读八日《人民日报》所刊赵丹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对文末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感触颇深，它“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搅动了我的心。我反复地想了几天。我觉得现在我更了解他了。……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的心里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

十月十日 傍晚，从电视新闻中获悉著名人民艺术家赵丹在北京病逝。

十月十一至十三日 作随笔《赵丹同志——随想录五五》，载二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赵丹生前的几个“镜

头”：“留了胡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来”准备排演《鲁迅传》而终于不成、“文革”中与他一起“陪斗”，特别是逝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震动文坛上下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等，赞“赵丹毕竟是赵丹”，是位“大艺术家”。

十月十四日 作随笔《“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随想录五六》，载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赵丹的病逝和遗言想到自己来日不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又云逝世前“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同时公开表示：“我同意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十月十五日 作随笔《究竟属于谁——随想录五七》，载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由赵丹逝世前发表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联想到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等就经常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把文艺当做他们的“私产”，把演员和作家当做他们的“奴仆”，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现在张春桥、姚文元式的“青云之路并不曾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因此，必须“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

十月十七日 作随笔《作家——随想录五八》，载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现在“新一代作家”“自信”、“有勇气”、“无等级观念”、“不唯唯诺诺”、“不要求谁来培养”，“我喜欢……欣赏他们”；指出“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绝不比官低一等”，“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

十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作随笔《长崎的梦——随想录五九》，连载于十一月七至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梦中回忆日本长崎青铜人像“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喊“不准再发生广岛、长崎的大悲剧”，以及自己的叫喊：“绝不准再发生‘文革’期间的十年大灾祸！”

十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说梦——随想录六〇》，载十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在梦中斗鬼”，但在梦里“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自己“以忍受为药物，来纯净自己的灵魂”；但现在“我”的“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致信李致。告之“明年准备关门写作。来日无多，不能再浪

费时间了”。

十月二十六日 作《探索集 后记》，载十一月九日广州《羊城晚报》。自云写《随想录》是“给后人的‘遗嘱’”、最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指出“‘四人帮’绝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和“许多人”都有“责任”；同时冷峻地预言：“倘使我们不下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认为写作的最高境界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十月二十九日 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主持悼念人民艺术家赵丹大会。

十一月三日 下午，会见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宾主亲切交谈，并互赠礼品。

十一月十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经常为找书而得不到休息。

十一月月中旬

应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在编十卷本《巴金选集》时，对《家》又作了一次改动。

整理旧书，发现一九三二年排版的、用铜订书钉订好的中篇小说《砂丁》的清样，“它跟我经过了战争，又经过了多次运动，还经过人生难逢的大抄家，竟然没有一点伤痕”。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致信《巴金论》作者汪应果。回答汪提出的若干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祝 萌芽 复刊》，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萌芽》第一期。鼓励青年作家“大步走进‘文坛’”，认为作家“靠作品而存在”，“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

十一月 作《关于 砂丁》，载二十九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回忆创作《砂丁》的经过，自云是“不成功的作品”；又以中篇小说《雪》《萌芽》、《火》第二部为例，说明脱离生活、编造故事……写不出好的作品；认为“存心说谎的作品和无心地传达假话的作品都是一现的昙花”。下旬，患感冒，卧床休息。

秋 几天感冒，医生上门来打针。仍在寓所会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的学生陈思和与李辉。与陈和李谈他们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明确表示“同意”两位同学的观点，并说“文革”时期有关方面“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又表示无政府主义一时“说不清楚”，“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十二月二日 在寓所会见画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家俞云阶，俞告之本月二十六日访日。

十二月初 看靳以的女儿章洁思送来的《靳以文集》下集的重编稿本。

十二月七日 作《靳以文集 后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靳以文集》。

十二月十日 在寓所会见日本女作家、电影《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

十二月十三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访华代表团成员、巴金研究者山口进和岛田恭子等人，并合影留念。

十二月十四日 作《关于激流》，载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回忆《家》、《春》、《秋》的创作经过。云写激流三部曲时，只想对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战斗”，“替一代人伸冤”，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写作时，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让人物自己生活”，“不想控制它们”。白云：“希望我的小说同一切封建主义的流毒早日消亡！彻底消亡！”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关于寒夜》，载一九八一年二月

十四日香港《文汇报·文艺》。回忆《寒夜》创作经过，当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常想到五个人：在贫困、凄凉和肺病的痛苦中死去的老友陈范予、鲁彦、缪崇群，以及也在贫病中死去的三哥李尧林和表弟，因此“一拿起笔”就“进入了《寒夜》里的世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仿佛“在作品中生活”，又云《寒夜》“是一本希望的作品”；白云在汪文宣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自责“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也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总结写十一篇“创作回忆录”，是“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同时希望自己生前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早日建成。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作《创作回忆录 后记》，载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香港《文汇报·文艺》。白云“写文章从来没有计划，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笔有时会像一匹野马，……很难把它拴住”，但这些“回忆”绝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无的放矢。在寓所接待画家俞云阶夫妇，获悉对方将赴日本。鼓励画家“多创作，拿出作品来”，临别，赠《巴金近作》、《巴金中篇小说

选》，并在草坪摄影留念。

十二月 接讣告，获悉好友顾均正病逝于北京。读到他儿子小铨的来信，“十分难过”。致李致信三封。希望李致努力工作，并表示愿意支持；告之不要稿费，只要一些赠书；嘱李致要求出版社按国家规定扣除《巴金中篇小说选》的个人所得税等。

约十二月

应白桦邀请，与旅美女作家李黎一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小放映间观看影片《巴山夜雨》和《天云山传奇》。

与曹禺观看日本翻译影片《吟公主》，认为影片生活气息浓，内容写得深，也演得逼真。

几次接待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即原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吕鸣亚，支持他筹办七十九周年校庆。当吕鸣亚征求巴金对母校的意见时，巴金认为：“怎么教育好下一代，责任重大”，“学校、家庭、社会都要关心青年的成长，要爱护他们”。



一九八一年

自云年老多病，希望“读者忘记我”，“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

倡议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献出十五万元稿费及全部手稿等。此举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又得到叶圣陶、冰心、曹禺等的响应和支持。

被选为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

向出版社推荐并建议“先出”项星耀翻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自己的译本“译得慢”，可以后出。

任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团长，赴法参加世界笔会大会。又应邀赴瑞士访问。此间又出现“巴金热”。

自云“文革”十年中出尽了丑，回想起来“可笑又可悲”。

应约赴中南海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晤谈，认为这几年的文艺，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问及将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表示“对作家最大的荣誉是读者的喜爱”。

自云“不想死后得到安息”，也自知“进不了天堂”，如有“伟大的诗人”能把自己的灵魂“带进‘共产主义社会’，即使走遍‘地狱’”，“我也心甘情愿”。

七十八岁

一月十日 八点三刻，接电话，获悉岳父陈仁官病逝。即携儿子李小棠到凤城三村，向岳父遗体告别。

一月十四日 致信李致。告之旧历年前改完王尔德童话后交四川出版；嘱寄家中需要的花椒面等。

一月约中旬 对姜德明建议编选《序跋集》，并且愿意帮助搜集稿子一事，不曾拒绝，也没有答应。还想慢慢地考虑。另外，观看了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和云南电视台的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希望这样的“剧”和“小品”多播映几次，认为它们会产生“防疫针的作用”。

一月二十五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要大力鼓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所需钱和资料大家捐献。



一月二十九日 病中作随笔《三谈骗子——随想录六一》，载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几次谈骗子，只是为了让大家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进而指出，“有了封建特权”，就会“产生骗子”。

一月三十日 致信李多文。针对某些批评家要求《激流三部曲》等文学作品必须为读者指出“正确道路”的问题，云：“试问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品究竟指出了什么道路 小说并不是教科书。”同时，在关于李多文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陈思和、李辉对他早期世界观的争论中，明确表示“同意上海复二同学看法”。“复”即“复旦大学”之意。

一月

病中校完旧译作《快乐王子集》中最后一篇作品，并作《快乐王子集 再记二》，载《快乐王子集》。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

接到日本作家石上韶准备着手翻译《随想录》第一册的来信，遂复信表示同意。

获悉任《文艺报》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月约十四日 收到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即原东南大学附

属中学吕鸣亚等人来信，获悉该校为庆祝建校七十九周年，欲与历届校友建立联络网。遂复函表示欣然同意。

二月十五日 致信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即原东南大学附中校庆筹备处。云：因从小就未练过字，不懂书法，“最近拿起笔手就发抖”，不能为母校校庆题字。

二月二十三日 作随笔《我和读者——随想录六二》，载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已年老多病，希望“读者忘记我”，“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致信李致。嘱李致要劳逸结合；表示稿费可以用来帮助作者，但是“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二月下旬 接北京朋友刘北汜来信，获悉萧珊昔日好友、《火》中人物朱素贞的原型、革命女干部王育常已离开人间；刘北汜二十七日到八宝山参加她的追悼会时，代巴金在死者灵前献了花圈。

二月底 看《创作回忆录》清样。因患气管炎、结膜炎，暂时不能写作，认真阅读《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没有航标的河流》、《蝴蝶》、《三生石》、《蒲柳人家》、《淡淡的晨雾》等中篇小说。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

灵魂，中国人民的心灵美。“这些作品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约二月

会见上海文艺出版社《丽尼散文选集》责任编辑吴金海等人，向他们推荐陈荒煤为该选集作序。后来陈荒煤没有及时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寄来的信，结果出版社选用了巴金《关于丽尼同志》一文作为该书“序”。

从朋友们来信中知道了一些关于因写《随想录》等引起的谣言，仿佛一场灾祸就在眼前。决定编选《序跋集》，由侄女李国“帮忙抄录、整理。意在“多做出一些事情，多留下一点东西”。

三月初 在寓所会见《巴金评传》作者陈丹晨。认为“这几年文学创作成绩很了不起，出了许多人材，出了许多好作品。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泛，也很深刻，风格也多种多样”；作品写了生活中消极的阴暗的一面，同时也使人感受到鼓舞，觉得“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此外，还谈到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愿意全部捐赠自己的手稿和资料，并负担一部分筹建经费。

三月六日 病中作《创作回忆录 再记》，载《创作回忆录》。为萧珊的好友王育常“文革”十年中挨批斗，一九七五年

“全身瘫痪”后又活活受了“五年多……苦刑”，乃至最后含冤离开人间的命运深感悲愤。

三月七日 致信李健吾。云如果中国现代文学馆办成，希望李捐赠书信和手稿；又说“现在外国人都都在搜集、保存、研究我们文学的资料”“我们自己却视之如粪土，太可惜了”。

三月十二日 读《人民日报》发表《创作回忆录 后记》的“编者后记”，为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受到党中央关怀和老作家响应而欣慰，又欣悉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孔罗荪、曹禺、臧克家等也愿意将自己的全部著作和各种版本及手稿，交“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

三月十八日 致信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庆筹备处。云字写得太不好，请不要采用“手迹”。目前写字不便，“校友登记表让我慢慢填好寄上”。致信杨静如。自云“主要毛病是眼泪多，写字吃力，脑子十分清楚，但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表示“活下去只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这样的生命是有光彩的”。

三月二十六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了以靖宇为团长、李欧梵为副团长的美籍华人作家团一行七人，双方就文艺创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关于“文以载

道”的文学观念、关于作家的责任心等问题，有些不同看法，但很多问题看法相似，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的估价、对新的青年作家的才华和勇气，对文学是人学的观念等，都谈得很融洽。畅谈近两个小时，靖宇团长等对巴金的亲切会见深表感谢。巴金也欢迎他们常回来走走。

三月二十七日 接郭信和的长途电话，惊悉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作协主席、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在京逝世。

三月二十九日 作随笔《怀念茅盾同志——随想录六三》，载四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深切怀念与茅盾的友谊，自云“始终把他当做一位老师”，回忆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及文学创作、评论、培养青年的成绩，赞茅盾“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

三月三十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关于茅盾“有许多话可写，但写出来有人看了会不高兴，还是少说为妙”。

三月下旬 在寓所会见赴复旦大学讲授日语的日本专家、巴金研究者山口守。谈曹禺的剧作《王昭君》和当时文艺界形势。云，“已经听到风声，也许要点名批判我了”。

三月约下旬 得曹禺信，获悉他也赞同建立“中国现代文学

馆”，认为这是“为后代留下财富”，保存新老作家的手稿、作品的不同版本等，“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将是祖国的一个荣誉”。

三月 致李致信四封。嘱李致好好疗养，千万不要累垮；告之近况等。

四月一至六日 赴杭州小住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或在阳台上散步，或在廊前眺望白堤。思念从前常同游杭州的妻子萧珊和常在杭州车站上接送的挚友方令孺大姐。四日在杭州作随笔《现代文学资料馆——随想录六四》，载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为十年浩劫中一个时期“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才是文艺，其余全是废品”、“彻底否定了自己”、“丧失是非观念。……唯唯诺诺”以及“烧毁了大哥给我的一百多封信”等而“感到羞耻”；但十年浩劫的“血和火”使“我清醒”了，国外丰富的文学资料馆更加强了我希望建立自己国家的“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决心”，认为“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识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必须建设和开采我们自己文学的“丰富的矿藏”。又与祝鸿生、李小棠、李小林冒雨游龙井、九溪、虎跑，后去黄源家吃



⊖ 巴金 左 与冰心 右 摄于冰心寓所花园旁。

⊖ 巴金 前左一 与冰心 前左二、阳翰笙 前右二、赵清阁 前右一、李小林 后左一、吴青 后中 等在一起。



晚饭。

四月五日 由祝鸿生陪同散步到岳坟。

四月九日 从杭州赴北京，住国务院招待所。

四月十日 前往北京医院，向茅盾遗体告别。

四月十一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参加茅盾追悼会并赠送花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休息时，从丁玲处获悉方令孺三十年代曾主动来找正在“困难”中的丁玲。

四月十三日 出席《收获》

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以主编身份作了即席发言，认为“现在文艺界的成绩已经超过三十年代了”。

四月中旬 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楼访冰心。冰心想把稿费捐献作为建立儿童剧院的基金。

巴金也愿将稿费和保存的资料献给现代文学馆。

四月十五日 在招待所会见《中国青年报》记者舒展、顾志成、潘英等人。表示对于近几年文学繁荣的景象，感到高兴。也为那些忧国忧民、有良心的闯入

文坛的当代青年感到骄傲。谈到创作才能时说：“论才能，我不如曹禺、沈从文……，我就是靠苦干。”最后应约为《中国青年报》三十周年纪念题词：“不是我们带你们走路，是你们推动我们前进。”

四月中旬 在招待所与来访的茅盾的儿子沈韦韬和儿媳陈小曼晤谈。

四月十八日 文化部举行一九八〇年优秀影片颁奖大会。为叶楠编剧、吴永刚总导演的《巴山夜雨》获奖而高兴：“我为这

位重见光明的老导演感到高兴。”

四月十九日 与李小林、孔罗荪去和平门烤鸭店，赴庆祝郑振铎夫人八十寿诞的宴会，见到萨空了夫妇。

四月二十一日 被选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月二十四日 下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被与会代表一致公推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代理主席；并被选为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讨论了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问题，拟献出十五万元作为建馆基金，并捐献全部手稿和历年收藏的报刊及其他资料。

四月二十九日 致信李致。告之正由侄女李国¹¹帮忙抄写《序跋集》等。

四月中下旬

在京期间，会见香港《文汇报》记者，谈文坛形势，希望年轻人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会见胡风夫妇，并为胡风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举行鲁迅葬礼时丢失四百元钱，向文化生活出版社借支稿费一事作注。注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吴朗西同志也在场，我对他讲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稿费四百元给胡风。”胡风妻子梅志为作注一事，对巴金“深为感谢”。

访老舍夫人胡¹²青，得老舍旧作《牛天赐传》。

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作品组副组长、该社副总编张伯海谈出版《巴金文集》十四卷的具体事宜。巴金认为文集中反映当时对苏联的关系、写越南的文章等不好处理。出版社认为，可删除，也可保留，因为这是历史。

在京会见作家刘宾雁、从维熙等。得刘赠《刘宾雁报告文学选》一册。

四月二十五日 由京抵沪。

四月二十七日 下午，在家中接待中央电视台摄制人员，拍摄生活纪录片，与柯灵、黄裳等老友在客厅叙谈的情况被摄制成片；同时会见偕黄裳同来的姜德明，赠以题签本香港昭明出版社版《巴金选集》，为姜德明带来的两张北京青年的巴金木刻像签名。

四月二十八日 致信吕鸣亚。同意对方“派人来照相”和“在书上签名”。致信岛田恭子，回答她在巴金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四月下旬 为了锻炼身体，争取写作时间，接受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建议，开始每天早上和外孙女端端在园子里散步、慢跑。

四月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探索集——随想录第二

集》。被选为“黎明学园”名誉董事长。该学园是由福建晋江原黎明高中、平民中学的朋友倡议成立的。巴金曾于春天复信表示赞成。

五月三日 致信李舒。云收到李舒寄来的图章很高兴。

五月五日 上午，在上海寓所会见以塞尔维亚文学家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伊万·伊瓦尼为首的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十四人。交谈中获悉《家》、《春》、《秋》已经译成塞尔维亚文，将在今年出版；回答了客人提出的关于他的创作计划与创作经验等问题；接受了伊万·伊瓦尼赠送的南斯拉夫民间乐器的模型，并以《上海画册》回赠来宾。

五月七日 晚，在寓所会见作家王蒙。互致问候，并谈及以往的生活，主要就当前文学创作状况及倾向作了率直的交流，均认为近两年的文学创作很丰富，中青年作家比较活跃，思想解放，朝气蓬勃，虽然真实暴露伤痕的内容很重，总的趋势都在控伤痛的同时向前看。都为创作的新气象感到欢欣鼓舞。

五月十五日 作随笔《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六五》，连载于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与作家方令孺的深厚友谊，为她晚年的孤寂和遭到“四人帮”迫害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悲痛。

五月十七日 会见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在谈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时云谯容、张一弓、王蒙等“都是将来很有希望的作家”；在谈到白桦和他的《苦恋》时，表示作品大概有缺点，但是未必“十恶不赦”。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有缺点，可以就此进行讨论、批判，也可以针对批判进行反驳。“作家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白桦是有才华的，但写得太快。应当好好考虑考虑之后再写”；此外，又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作了展望；“对既有才能又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文学发展充满信心”。

五月二十二日 作《序跋集 序——随想录六六》，载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搜集、编印、出版自己五十几年中间所写的前言、后记，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毫不掩饰地让人们看个明白：“走过的曲折道路”、“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五十几年的长期探索、碰壁和追求”……

五月二十五日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作书面发言《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载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赞获奖作品“真实”、“有深度”、“立意创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

的心灵”；认为在中青年作家的成长道路上不应以“粗暴简单的办法”对付他们，而应鼓励他们从人民中间汲取热和光，去温暖、照亮、鼓舞别人的心。

五月二十五日 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的谈话。就中国文学界现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进行对话。认为现在小说“质量高”，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作家“很有希望”；谈到批判胡风时，表示其时自己“也‘人云亦云’”，那时“人人自危”。白云受到鲁迅“很大的影响”；几十年来，“一直是靠稿费生活的，从未领过薪水”；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五月二十九日 夜，获悉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后被列为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委员。

五月三十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副会长、访华代表团团长桑原武夫和代表团团员、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等。宾主就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互赠书籍、礼品，最后合影留念。

五月三十一日 作随笔《怀念丰先生——随想录六七》，连载于六月十一至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深情地回忆“善良、纯朴”的画家丰子恺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片断，为十年

浩劫中丰子恺的遭遇而不平，自剖其时有个短时期曾“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逐渐明白“谁有权有势谁就有理”，“明白那些以批斗别人为乐的人是踏着别人尸首青云直上的”。

五月

致李致信二封。对出版《曹禺全集》表示赞成，希望“错字越少越好”，认为好好工作，读者不会忘记你们；嘱寄九姑妈需要的辣椒面等。

通过上海旧书店，买到《巴金文集》全套十四卷，并在每一册的扉页亲笔题签：“敬祝母校七十九周年。巴金敬赠 八一年五月。”并在寓所接待代表南京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前来取赠书的吕鸣亚等人。表示年岁不饶人，失去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便浪费掉，要坚持写作，为这个伟大时代和英雄人民献出全部的力量，让这一滴水落到奔腾的汪洋大海里去；白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没有“习惯”搞录音让别人整理，必须亲笔写作。交谈中，还愉快地回忆五十七年前就读于东南大学附中的往事。

六月四日 前往上海万国公墓参加宋庆龄安葬典礼。

六月十一日 作《序跋集 再序——随想录六八》，载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

园》。云一九三〇年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一九五七年编辑《巴金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即：“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的宣言道：‘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又云“今天我的眼前还有一个魔影。手拿烙铁的妖怪在我的这本集子里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六月十三日 会见胡风夫人梅志和彭柏山夫人朱微明。

六月中旬 作完随笔《十年一梦——随想录六九》，连载于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责十年浩劫中一段时期“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当“精神奴隶”的言行；

但一九六九年开始“怀疑‘牛棚’就是‘地狱’”，逐渐“看清了自己”。

六月十九日 参加上海市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主任委员。

六月二十二日 致信田一文。劝友人“不要……来上海看我”，因没有地方住，加之“我很忙”、“精神也差”，还要为下月出国作些准备。

六月三十一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日本作家代表团团长、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山本健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事務局次官佐藤纯子，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袁鹰等人。将《巴金选集》分赠日本朋友。山本团长赞扬巴金为日中友谊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祝愿巴金长寿并顺利完成写作计划。

六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

屠格涅夫散文诗全部要亲手校改一遍，“总想改得好一点”；向出版社推荐并建议“先出”项星耀翻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自己的译本“译得慢”，可以后出。

约六月 在寓所会见友人毛一波夫人高依萍，高由马宗融女儿马小弥陪同来访。携全家与客人欢宴于上海衡山饭店。又在寓所会见胡风夫人梅志，与梅志亲切交谈，并请问候胡风。其时胡风因精神病在上海疗养。

七月五日 会见杨振宁，谈了一个小时。

七月上旬 整理著作、手稿等，准备捐赠筹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七月七日 致信吕鸣亚。表示“不赞成设立‘巴金文学奖’”，“晚年只想用全力完成一件事：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同母校的联系将来另有安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巴金 左 在寓所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 右。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排；并云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校庆活动，也不能在家举行“简短的聚会”，希望谅解。

七月十三日 由李国¹陪同，去华东医院和卢湾区人民银行办理划款手续，将赠款十五万元交上海文联托转交中国作协。

七月二十四日 出席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联等举行的座谈会，交流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重要文献的体会。作随笔《学好 决议，肃清“左”的流毒》，载三十日上海《文学报》第十八期。

七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致十月——随想录七〇》，连载于八月八至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近大半年时有感冒发烧、气管炎、写字手颤抖等。认为“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辑的成绩就是“发现新的作家”、“团结好的作家”；深挚地“感激叶圣老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认为叶圣陶不单是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还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七月底 应《收获》编辑部之约，为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作《怀念鲁迅先生——随想录七二》。云“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认为鲁迅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在十年浩劫

中，因常“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决心像鲁迅那样，“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七月 致李致信三封。告之《灭亡》、《怀念》等书一时不要重印，无法清理照片等。

夏季 某夜，在寓所会见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并交换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巴金云：“稍为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明确表示不同意废掉汉字，认为“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

八月四日 致信王西彦。告之即去莫干山，二十日以前返沪；为帮助王西彦编选散文集《炼狱中的圣火》，随信附去黎

烈文遗照。

八月六日 由上海作协徐千等陪同，偕李小林及祝鸿生赴杭州，上莫干山，参加《收获》编辑部主办的笔会。与女作家谌容、温小钰等在山上晤面。

八月十日 在莫干山作《序跋集 跋——随想录七一》，载八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编《序跋集》时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把书献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接受他们的批判”；针对十年浩劫中造反派“说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话，表示“我不想死后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进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能把我的灵魂带进‘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去受批判，即使



①



- ⊖ 巴金部分散文集书影。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巴金 中 在国际笔会第四
十五届大会的开幕式主席
台上。
- ⊖ 巴金《家》的外文印本。

必须走遍‘地狱’和‘炼狱’，
我也心甘情愿”。

八月十二日 致信潘际¹。
告之为《收获》写了一篇《怀念
鲁迅先生》，将来也要在《随想
录》中发表。

八月十四日 自莫干山返杭
州，住大华饭店。由杭州市作协
安排坐船畅游西湖。

八月十六日 自杭州回上
海。

八月十八日 致信吕鸣亚。
云“身体仍不好，写字很吃力”。

八月二十六日 在寓所会见
《巴金论》作者汪应果，谈到与
鲁迅的深挚感情时，云“我认定
了跟鲁迅走。鲁迅的政治态度就
是我的政治态度”，“我跟不少
共产党员都有私人的友谊”。

八月

在寓所会见挚友李健吾的学
生胡承伟。获悉对方正致力于法



国文学的翻译，遂云：“宁可译
得慢些，也要译得信、达、
雅。”谈到目前形势时，则表
示：“只要领导人重视文化，重
视知识分子，我们这个国家就是
问题成了堆，也可慢慢解决。”

同意广东人民出版社从《文
学丛刊》中选印十种中国现代名
作家的作品重新出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近况。

九月五日 致信李健吾。告
友人十日赴京，十五日飞法。

九月十日 赴京，下榻北太
平庄宾馆，作出席国际笔会第四
十五届大会前的准备。

九月十一日 在京出席并主
持了中国笔会中心会员大会。大
会决定派出以巴金为首的中国笔
会中心代表团出席第四十五届国
际笔会大会。

九月约中旬 在下榻的北太
平庄宾馆会见了叶圣陶及其子叶
至善。又应邀前往北京康乐饭
庄，出席唐琼等人特意举行的饯



行酒会。

九月十五日 率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朱子奇、叶君健、毕朔望、杜宣等一行九人赴法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受到法国笔会会长、著名作家塔瓦尼埃的热情欢迎。他说：“伟大东方文明古国的作家代表终于来了。没有使我们失望，特别是尊敬的大作家巴金先生的到来，我们感到安慰和荣幸。”

九月月中旬 与杜宣等一行六人，由法中友协安排，驱车前往巴黎郊区，访问世界著名的法国老作家维尔高。

九月二十日 接受了国际笔会秘书长、著名英国作家艾尔斯托夫交来的致中国北京纪念鲁迅大会的电文，这是他和国际笔会主席魏斯特堡、大会东道主法国笔会主席塔瓦尼埃三人共同签署的贺电。

九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时，出席在里昂会议大厦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的开幕式，被请上主席台，并在大会上发言。认为“‘世界文学’应该是一个各国和各个民族的健康、进步文学所组成的百卉争艳的园地”，“中华民族之乐于和善于同别国的优秀文化艺术进行交流是有悠久传统的”，“国际间的安宁是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繁荣的先决条件”。

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 在

里昂、巴黎会见许多来访者和电视、报刊记者。当《寒夜》、《家》、《憩园》等五本法文译本在会场上出售时，热情地为购者在法译本上签名。会议期间接受了瑞士苏黎世市长的邀请，决定访问瑞士。

九月二十五日 参加在巴黎第四大学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的闭幕式。会后，与法国文化部长握手，感谢并委托部长向他转达问候的总统阁下。

九月下旬 在巴黎，当一位法国学者对“遭逢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的巴金和其他中国作家表示“尊敬”时，巴金回答：“我出尽了丑，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

九月二十五日 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怀念鲁迅先生——随想录七二》。事后发现该文被删去三段，涉及“文化大革命”的词句和内容，甚至连文中引用的鲁迅的名言，把自己比作“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也因为“牛”和“文革”中的“牛棚”有关，而被删除。巴金为此感到十分气愤。

九月二十九日 在巴黎中国城饭店与其他先行回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分别。席间得杜宣在名片上挥就的即兴诗一首：“文章处处说巴金，此度巴黎誉满城。

红酒一杯人万里，秋风飒飒发如银。”巴金阅后认为“写得好”，遂将此诗放入口袋中。

九月三十日 与女儿李小林应邀飞抵瑞士访问。

九月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创作回忆录》。

十月一日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国庆节，参加使馆举行的宴会。

十月初 在苏黎世文学讲台上讲演，谈自己的文学道路、文学的作用和对友谊的珍惜。

十月五日 作为苏黎世大学汉学系客籍讲师哈罗·封·塞恩尔先生的客人，第一次在德语区接受电台的采访。谈到“巴金”笔名的由来，谈自己创作和思想的发展，“青年时我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当然以后逐渐改变了。总的来讲，我的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或两者的结合。”又谈到对他整个一生有影响的座右铭是“斗争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还谈到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应给人努力向上的勇气，并促使人们热爱生活”，认为“把人类团结在一起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此外，还介绍了中国当代作家王蒙、浩然等近况。

十月七日 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回国。

十月十日 由孔罗荪、李小林陪同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延

安大院四号院七号楼探望因旧宅大修临时迁居于此的叶圣陶。又访老舍夫人。

十月十三日 上午，应约乘贺敬之的车前往中南海勤政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晤谈，就当前文艺状况和白桦的《苦恋》等作家作品交换了意见。认为这几年的文艺，尤其是小说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已在国内外产生积极的影响。认为对像白桦这样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应该关心他们，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又有

写作才华，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的希望。有缺点是难免的，也可以批评，但要吸取以前极左的、打棍子的教训。总之，要相信他们，多鼓励少批评。在座的尚有张光年、朱子奇、周巍峙等。晤谈后，应邀共进午餐。据胡乔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致黎虹的信中所述，午餐席上胡耀邦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有落实性的建议。后在北京主持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主席团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会议讨论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听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

馆”筹建工作的汇报；决定恢复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热情欢迎台湾作家回祖国大陆参观访问，并与艾青等在会上表示，随时准备接受台湾文艺界的邀请去台访问。下午，参加中国笔会中心召开的扩大会议，对大会作了关于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出席在法国举行的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的汇报。晚，在下榻的燕京饭店，会见女作家张洁。

十月十五日 在京为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沙尔·波德莱尔作、亚丁译《巴黎的忧郁》题



-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巴金握手，中为张光年。
- ⊖ 巴金与胡耀邦交谈。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词。

十月十六日 又应约会见女作家张洁。

十月二十一日 致信李致。谈及编务，云“编《黑桃皇后及其他》可以把我的《怀念萧珊》收入，作为代序”等。

十月二十四日 与刘宾雁交谈一个半小时。

十月 担任全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得萧乾赠重印的长篇小说《梦之谷》一册，扉页题词云：“蒂甘，如不是你当年的鼓动和督促，此书是‘流产’了。让它作为我们几十年友谊的一座纪念碑吧。”

十一月一日 出席上海市第五届政协第十一次常委会，担任上海市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十一月二日 致信已故作家李劫人之女李眉。建议保留李劫人故居“菱窠”，因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十一月上旬 接李健吾来信，获悉李氏夫妇从四川绕道贵阳，再从渝坐船赴上海。

十一月七日 致信香港《大公报》编辑潘际¹，明确表示：“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

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

十一月中旬 为上海海运学院世界语协会举办的世界语展览会题词，并在展品上签名。赴京出席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十一月下旬 作随笔《“鹰的歌”——随想录七三》。对《怀念鲁迅先生》在香港发表时“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甚至鲁迅关于“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原话也给“勾销”，感到无比愤慨。表示愿像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称赞”的“鹰”，带血受伤“不能再上天空”时，就勇敢地“滚下海去”。潘际¹回忆，他是休假结束回到香港看到巴金十一月七日信的，感到很紧张，如果巴老真的不写了，怎么向读者交代？几天后，社长找潘际¹，告之为此事已受到胡乔木批评。潘际¹了解了删改事件经过后，向巴金作了说明，恳请巴老继续写下去。巴金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把《鹰的歌》登出来作为抗议。潘际¹同意了。结果《鹰的歌》发表时有题无文，变相“开天窗”。

十一月二十七日 抵京出席

人代会，下榻京丰宾馆。

十一月 致李致信六封。告之在巴黎和瑞士都看到四川出版的《黑桃皇后及其他》的书名不如《别尔金小说及其他》好等。

约十二月初 与冰心、曹禺、孔罗荪等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筹备委员会。

十二月六日 在京出席“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会，与胡愈之、楚图南、赵朴初、冰心等十人为该会发起人。

十二月十七至二十二日 作《团结起来，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三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和闭幕词》，载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文艺报》第二期。热情赞扬经十年浩劫严峻考验的有才华有胆识的中青年作家，再次认为他们“已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认为被会议选举为作协主席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但自云“不合适”，除写作外，将努力“促成现代文学馆的早日建成”。

十二月约中下旬 某晚，在下榻的北京华侨饭店又应约会见女作家张洁。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午，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经全体理事一

致通过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主持会议的冯至问到“有弃权的没有”时，巴金遂举起右臂。稍顷，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对大家的信任表示感谢。并云：“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希望作家们团结起来，努力创作，共同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接受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的祝贺。

十二月二十三日 致信潘际¹。告之“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要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对删改者很反感，认为这是对老作家的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

十二月三十日 作《寒夜 挪威文译本序》，载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目的是“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写完《寒夜》“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寒夜》“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作随笔《向中青年作

家致意》，载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云中青年作家和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白天工作，晚上做家务，但他们是“骨干”是“希望”。

十二月下旬

作随笔《新的一年文学创作定将取得新的成绩》，载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上海《文汇报》。

在京会见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马其顿共和国作协主席、剧作家勃朗科·潘道夫斯基和马其顿作协秘书、诗人托多尔·切洛夫斯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认为《家》、《憩园》、《寒夜》三部小说，自己比较满意 认为在文学写作上受到左拉和雨果的影响大些，同时，也非常喜欢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的作品。当问及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回答说 我不认为自己可以获得这项奖金，我认为对作家最大的荣誉是读者的喜爱。

自京返沪，在机舱内与白桦临座，互谈过往历史、日常生活、写作习惯及创作状况等，叙谈甚欢，并对他表示了“爱护”

之情和隐隐的“忧虑”。返沪后，稍事休息，应约为母校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七十九周年校庆专刊刊头题字，用毛笔和钢笔写了几种字样 以供挑选。同时，为母校“文学小组”题词 挥笔写下一竖一横两幅内容相同的字：“青春是美丽的！”

十二月 决定将历年苦心搜集、珍藏的大量外文书刊分批赠给北京图书馆。第一批六百一十九册由上海运抵北京。

一九八一年内

读北京语言学院卢晓逸、杨俊萱、施光亨等改写的《家》的约三万字简写本油印稿，“并作了修改”。

前后四次赠南京师院附中三百八十册书，并逐本签名或盖上“巴金赠书”印章。购助听器，托李致转赠青年时代好友、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剑波。



自己的稿费“不想留给子女”，要用于国家建设和文学事业。

感叹各种“干扰”太多，像旧社会的吹鼓手，常被“拉去吹吹打打”。

写《随想录》是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十年浩劫的悲剧再次上演。

认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偏爱西湖，因为那里有伟大的爱国者岳飞、于谦、秋瑾等。由秦桧倚仗宋高宗而残害忠良，联想思考到“文革”十年“四人帮”兴风作浪的“病根”。

在寓所会见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成员克杰尔·埃斯普马克教授。

谴责日本文部省在历史教科书中将几十年前对中国等的侵略改为“进入”，企图“掩盖‘皇军’杀人夺地的罪行”。

白云在中国作家中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但作品还是“中国的东西”。

整理藏书时跌跤骨折，卧地不起。住院时觉“牵引架”是“邪恶的化身”，“没有发高烧，却说着胡话”。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主张选得“严一点，精一点”。

七十九岁

一月初 感冒。病中会见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谈新年打算，并云“‘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表示格外珍惜时间，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比如把藏书“捐献给国家”，“办文学馆”，“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我要把它用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

一月六日 致信孔罗荪。云近来“患感冒，咳嗽，身体一直不好”，但“关心的还是文学馆的事”，“我要在去世前把这些事一一办好”。

一月上旬 病中，把写的怀念友人往事的文章集一起，编成《怀念集》。在寓所会见友人乔白丁，赠《创作回忆录》，并云：“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一月十三日 作随笔《怀念集 序——随想录七四》，载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大公园》。云“‘四人帮’迫害我不止十年”，又把不少朋友“迫害致死”，这些“怎么能忘记”，愿意“把我晚年的全部爱献给我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勤劳、善良的人民”；《怀念集》就是为“我所敬爱的人和我十分亲近的死者而写的”。又致信潘际¹。认为删改事责任不在潘，但对这种做法很有反感。表示《随想录》还要继续写。

一月二十日 作随笔《小端端——随想录七五》，载二月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由小外孙女的考试联想到自己中学时代的考试，反对“灌输和责骂”，主张“使用‘启发’和‘诱导’”；叫孩子写“检查”——讲“空话大话”解决不了问题，同时，感叹“‘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

一月二十九日 作完随笔《怀念马宗融大哥——随想录七六》，载二月十一至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与作家、教授马宗融的结识、交往并成为挚友的经过，为“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贫病交迫中去世而悲痛；赞他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闪闪发光”，因自己“有个时期”“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奉行‘明哲护身’的古训”而“愧对亡友”。

一月 作随笔《知识分子——随想录九〇》，未完篇，因

“干扰”而辍笔。“‘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几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致李致信三封。告之《怀念鲁迅先生》在《收获》上发表的是全文等。

二月十二日 与家人欢度春节。在寓所接待来访的友人师陀、辛笛等。

二月十五日 获悉与冰心、曹禺、孔罗荪等九人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又作十卷本《巴金选集》后记。谈作家和批评家的“两种分工”和“友好合作”的关系；认为文艺不是为了“装饰自己”，不是借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不是“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不是“往上爬的敲门砖”，而应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二月十八日 作《论创作序》，载九月《延河》第九期。

二月十九日 致信《随想录》日译者石上韶。云因“生病”，“写字困难”，建议“日译本可以不用我的序文”。

二月二十日 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时，想到引起强烈反应的《随想录》，“担心日本读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决定应日本筑摩书房主持人柏原先生和日译者石上韶之约，向日本读者

“掏出自己的心”，为日译本《随想录》作《序》。夜，作随笔《随想录 日译本序——随想录七七》，载二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写《随想录》，是“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又云“在十年的惨痛生活中”，“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它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它在发光，它在沸腾，它在成长”；写作就是在挖掘自己的灵魂，因此，比起文学技巧来，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

二月二十五日 致信吕鸣亚。云一部分鲁迅先生的著作和有关他的图书等一百几十册“赠给母校”。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天下午，在家看电视里播放的故事片《小街》，觉得并非“十全十美”，但却“真实”，感到“难受”和“难忘记”。

二月二十九日 致信石上韶。解答石上韶提出的若干人名、地名、词语等具体问题。

二月下旬 身体不适，近来在家休养，但是工作未停。

二月 致李致信六封。告之寄上编定的《巴金选集》第十卷，《后记》写完，“大功告成”了。并表示“年纪大了，工作做得快，就不免草率”，请李致“核对”。推掉了访日邀请，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巴金荣获的但丁国际奖章的正面为但丁浮雕像，和另一面刻有“巴金”的名字“PA CHIN”。

需要休息和锻炼等。

三月二日 作随笔《小街——随想录七八》，载十一至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看完电影《小街》，认为“揭露伤痕，应当是为了治好它。讳言伤痛，让伤疤在暗中溃烂，只是害了自己”。

三月四日 致信臧克家。云最近一直在家养病，但仍挣扎着每天写三五百字。

三月五日 致信吕鸣亚。告之对母校派人来取书表示欢迎，三月份在家养病，不会离开上海。

三月十一日 看完谌容的中篇小说《真真假假》。读到其中某两三段，一个人哈哈地笑了一阵子，笑过之后，又感到不好受。“在小说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掩卷深思，“不是文学，而是生活”。

三月十二日 作随笔《三论讲真话——随想录七九》，载二

十至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三十多年，尤其是其中十年的浩劫，在学习、批判会上人们表态，说大话、空话、假话，“照报纸抄，照文件抄”，大家讲一样的话，“会场内外，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

三月十五日

在寓所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塔马尼和《新日报》记者弗尔南多·梅泽蒂。塔马尼宣布：“一九八二年‘但丁国际奖’将授予巴金。”接受弗尔南多代表意大利“但丁·亚利基里学会”赠送的四厚册装帧精美的但丁的《神曲》。这是一九六五年为纪念但丁诞生七百周年而印制的诗集。

巴金回赠了题签本《家》、《春》、《秋》、《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等著作。巴金接受所赠送的《神曲》时说：很喜欢但丁的作品，在困难的时

候，“我读了但丁的作品。激励自己克服困难，增加勇气”。

致信李致。告之“今后我的著译的稿酬……一律赠现代文学馆”。

三月十八日 得泉州黎明学园发来的祝贺荣获“但丁国际奖”的电报。

三月约中旬 会见靳以的爱女章洁思，获悉她与家人已编完多卷本《靳以文集》，并恳请作序。因并没有精力卒读全稿，又不愿“信口开河”，曾两次婉谢，但终因他一家人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奋斗了二十多年，“我也不愿意看见这个集子冷冷清清地和读者见面”，遂同意作序。

三月二十二日 作《靳以文集序——随想录八〇》，载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与靳以的深厚的友谊，称赞他是“最好的编辑”，

“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认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给人以高尚的情操，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

三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怀念满涛同志——随想录八一》，载四月八至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翻译家满涛在



翻译家满涛。

“文革”中，因胡风问题的株连，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身心”“受到大的损害”，以后又病逝的坎坷经历，为满涛“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而鸣不平。

约三月 应《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约请，同意担任该丛书名誉主编。又获悉花城

出版社将出版《序跋集》。

四月一日 在《文学报》第五十三期发表《巴金谈文学创作——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四月二日 下午，委托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公使杨清华在佛罗伦萨举行的“但丁国际奖”颁奖仪式上领奖。杨清华接受了评奖委员会主席桑米尼亚特利请她转交的奖章一枚，奖章正面为但丁浮雕像，另一面刻着巴金的名字。作随笔《说真话之四——随想录八二》，载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而假话“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压力”和“压迫”下面不会有真话，指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

四月八日 同意北京图书馆派人专程来寓搬运捐赠的第二批外文书刊，约两千余册。会见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和王子瑾，就荣获“但丁国际奖”一事，云获得“但丁国际奖”是“沾了祖国和人民的光”。

四月九日 在寓所热情接待来自纽约的旅美女作家沉樱，畅谈别后，共同回忆三十年代在日本与沉樱及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欢聚的情景。

四月上旬 在寓所接待代将赠书托运至泉州黎明学园的李秋

叶，收下李呈送的“巴金先生赠书目录清单”一份。致谢后说，又向出版社要了些书，已经送来的有六十七包，待理出后，再请李包装付运。

四月十四日 作随笔《未来说真话之五——随想录八三》，载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从一九五〇到一九六六年，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而写《随想录》就是因为“我有恐惧”，担心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为了下一代，“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必须弄清楚十年浩劫的来龙去脉。

四月十六日 致信李致。告之拒绝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爱情的三部曲》，并表示“该书在四川也不另印单行本”。

四月十八日 致信李奈西、祝明义。

四月十九日 委托冯牧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代读书面发言。因病，由女儿、女婿陪同，赴杭州休养。由杭州市文联张雄接待并安排下榻新新饭店老楼六楼，房间面对西。经常在窗前静坐，也常在阳台上散步或者望湖。叹息已经没有精力“游山玩水”，只好关上房门看山看水，让疲劳的身心得以休息。

四月二十一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随笔《在军事题材文学



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月二十四日 病中在杭州作随笔《解剖自己——随想录八四》，载五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十年浩劫中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和另一次电视大会时自己挨批斗的简况，对“谁发言”等已“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又自剖道，那时如自己得到机会登台批判别人，“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和“坏事”，因为那时“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四月二十六日 由家人陪同参观岳王坟，看到长跪在铁栏杆内的秦太师，在长廊上看到了明代诗人兼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的石碑，看到诗人在词末“笑区区一桧亦何能”的讥嘲，赞四百五十二年前诗人的“胆识”。

四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西湖——随想录八五》，载五月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我偏爱西湖”，是对“我所崇敬的伟大爱国者”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有说不尽的敬爱之情”，觉得“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能由此获得“鼓舞和信心”。

四月下旬 前往杭州北三街葛岭十三号访老友黄源。

四月底 从杭州返沪，右背

上生的皮脂囊肿因感染发炎。

四月

陆续获悉上海、北京和全国各地文艺界人士撰文、致电、致信祝贺获“但丁国际奖”。

获悉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探索与回忆》。

五月二日 致信李采臣。

五月四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成员、著名作家克杰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宾主就促进中瑞文化交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云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我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and 善良、勤劳的人民”。最后，双方互赠纪念品。

五月六日 在家翻看曾祖父李璠遗墨《醉墨山房诗话》，“诗话中并无惊人之处，但我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特别是最后一则，读后感到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巴金曾祖父却对岳飞冤案持独立见解。遂有感而提笔作文。作随笔《思路——随想录八六》，载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讽刺像随风转向的风车样的人；自剖几十年来，“甘心做了风车，随着风转动”；对外宾关于“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样大的‘能量’”

的问题，联想到又一次瞻仰岳王坟后也产生的一个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认为现在的解答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自云这些随笔“是一个老人每天两三百字地用发僵的手拼凑起来的……真话”。

五月约上旬 到医院动手术，排除右背囊肿处脓毒，术后睡眠不好，加上“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造成的“后遗症”，连续三个晚上，人处于“烦躁”、“恐惧”中，甚至“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出现了“危机”。三天后，恢复了平静，又能沉睡了。想起“在脑子存放了好几个月”的随想，拟写新作。

五月十四日 致信胡乔木。云胡乔木函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房子得到解决一事已知，表态“愿意尽全力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还希望继续得到胡乔木的帮助。并云“我获得但丁奖，是沾了祖国和人民的光”。

五月十六日 作随笔《人言可畏——随想录八七》，载六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读女作家的作品和她们先后来访，谈到好作品的标准。从而为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成就”的女作家即《方舟》作者张洁遭到“各种各样的流言”而气愤。

五月约中旬 在寓所会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丁景唐。丁为出

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特来约请写“三五百字鼓励鼓励大家”。交谈中想起该出版社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而成，其中包括“同我有关系”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点坐立不安，决定不再沉默。

五月二十一日 致信福建泉州黎明学园同学会不定期之会刊《信息》编辑部。云：一九三〇年七至九月第一次到泉州，是应吴克刚校长的邀请，和卫惠林一起去的。在黎明中学住了两个月。在那里写短篇小说《父与女》，也翻译普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后半部分。当时交往的友人主要是陈范予、袁国钦、叶非英、沈一叶等。

五月二十七日 作完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随想录八八》，载六月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始终有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指出现在的“某些出版社……好像是衙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认为搞出版工作，依靠的是作者和读者，编辑同作家应“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共同为国家、民族做一点文化积累；“没有过去的文化积累，没有新的文化积累，没有出色的学术著作，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

所谓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话”；同时向“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编辑表示“极大的敬意”。

五月三十一日 作完随笔《三访巴黎——随想录八九》，载六月九至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三次访问巴黎的情景和友谊。又获悉上海文艺出版社举行建社三十周年座谈会，请演员、作家黄宗英代读为出版社写的《对默



巴金 右 与阳友鹤 左 在一起。 车新民提供

默默无闻者的极大敬意——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又会见专程来访的著名诗人艾青和他的夫人高瑛，互致问候，赠书留念。

五月下旬 睡眠不好，半月前的“危机”又重现，心情烦躁，但又不愿被妹妹和子女们知道。当“恐惧”、“烦恼”干扰时，“我在挣扎”。

六月五日 续作随笔《知识分子——随想录九〇》，载十七至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建国前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那些年“知识分子受苦”，认为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又说自己也写过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说。八年抗战，中国知识分子是经受得住这血和火的考验的。

六月八日 重读一年半中写的三十则随想，编定《随想录》第三集，取名《真话集》。遂作《真话集 后记》，载九月《读书》第九期。云不愿自己的文章像落叶“自生自灭”，它的命运由读者评判。表示今后仍要坚持“讲真话”。因病，“放下笔已经精疲力尽了”。

六月九日 在寓所会见著名



巴金

的一个世纪

- ⊖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巴金与曹禺 左 在寓所院内散步。
- ⊖ 巴金与曹禺在一起。谢力行摄，车新民提供



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

六月十一日 在寓所接待来上海的曹禺，交谈之后两人又在寓所院内散步。

六月十七日 致信岛田恭子。表示不主张重印十四卷本《巴金文集》，并寄赠《探索与回忆》一册。

六月十八日 会见黄裳、黄宗江、姜德明等人。谈到当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等轶事，又从“文革”前购买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周作人的《药味集》赠黄裳。黄裳惊讶地发现扉页上有周作人的题词。原

来此书是在黄裳被打成右派后卖掉的，不意今日完璧归赵，众人感慨。临别赠每人一本《探索与回忆》。又会见《光明日报》记者黎丁。黎是解放前在桂林时结识的好友，畅谈别后，并告诉黎丁，自己背部囊肿手术后情况良好，医嘱秋后倘不收口，可以再开刀。

六月二十六日 阅航空版《羊城晚报》，见微音《抢救要果断及时》，获悉当年看到的新会雀墩“小鸟天堂”的胜景，已因遭到环境污染而被破坏。遂对“要及时抢救”“小鸟天堂”的

提议表示赞同。

六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囊肿部位已渐好；曹禺正在上海写作《桥》，嘱李致代为寻找曹禺需要的重庆哥老会的材料等。

会见南斯拉夫作家访华代表团。自云受雨果、左拉、屠格涅夫、赫尔岑的影响，“在法国一年多，学会了两件事：一是写小说，二是看电影”。

约六月 会见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研究中心主任于如柏和陪同姚国强。几年前于曾在巴黎接待过巴金和李小林，

并翻译巴金的小说。巴金云“翻译等于再创造，但是本身要成为文艺作品”，又说当年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就受影响：“我喜欢他……笔锋里带感情。”

七月九日 会见《羊城晚报》特约记者胡星原。对被誉“小鸟天堂”的新会雀墩，因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情况表示关注。希望广东新会以及各方面及时抢救，使“小鸟天堂”变得更加美好。

七月上旬 获悉《春》由李丽英译成泰文，在曼谷出版，遂应约作序。

七月十一日 作《春 泰文译本序》，载《世界文学》第五期。云：小说中的高克明、周伯涛“已经死亡”，但“鬼魂还常出现”，坚信“年轻人是打鬼、捉鬼的能手”。

七月十四日 写完随笔《最少的干扰——随想录九一》，载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后易题为《“干扰”》。感慨晚年受到疾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而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认为对作家不应“扩大级别”，只有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才是发展文学事业的最好的办法。

七月十七至十八日 晚，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鲁迅》。

七月二十三日 会见由丁景

唐陪同前来的纽约著名华人报刊编辑董鼎山及其兄董乐山。告之近日正致力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的创作，但表示不愿边写边发表，要全部写完后，整理一下在一起发表。坦率地告诉对方，拟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但苦于没有房子。会见时，赞扬了当代青年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云：“她们的写作可真大胆。”

七月下旬 右背囊肿开刀后伤口愈合。

七月

致信冰心。云：“写字吃力”，“幸而我还能拿笔”。

致李致信三封。告之《黑桃皇后及其他》不要稿费等。

八月中旬 病中会见来探病的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告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写好，但又为在北京找不到馆址而烦心。

八月十七日 作随笔《再说现代文学馆——随想录九二》，载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赞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点燃心灵的火炬”，它“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思想”，对“新中国的诞生”等都有过“功劳”，进一步呼吁早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八月二十五日 接日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信。获悉准备召开“一九八

四年东京国际笔会”。

八月二十八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日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著名建筑师清水正夫等人。清水祝巴金长寿。并表示对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的做法深感不安，访问回国后要写文章进行揭露。巴金表示：“中日两国人民要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使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发展下去。最后，将精致的大型建筑画册和近作赠送清水正夫。清水回赠了礼品。

约八月 会见北京大学英国留学生芬德利 Lan Frindlay，回答了对方提出来的十四个问题。当问中国人现在有没有“人权”时，回答说“中国人民对于人权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主要兴趣是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当问如何鼓励中国青年作家时，回答说，鼓励他们写作中更勇敢些，别怕种种困难。

八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张乐平同意将《三毛从军记》修订后给四川出版等。

约八月 在寓所会见美籍华人女作家陈若曦，宾主相谈甚欢。

九月二日 病中作《答井上靖先生》，载二十日《人民日报》。叙述友谊和在广岛、长崎的见闻，谴责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将“侵略”改为“进入”的行为。

九月四日 致信李济生。嘱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李济生请李国^①将许严的信带回。

九月五日 寄赠岛田恭子《序跋集》一册。

九月六日

作随笔《修改教科书的事件——随想录九三》，载九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指出“把‘侵略’改成‘进入’”，是企图“掩盖‘皇军’杀人夺地的罪行”，“暴露了重温侵略‘美’梦的野心”；坚信“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劳的优秀人民，少数野心家想走军国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

致信岛田恭子。请将寄去日本的《序跋集》包封上面的中国邮票剪下寄回，“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集邮者”。

九月二十日 致信李致。告之根据今年冬天的健康情况，决定明年是否返川等。

九月约中旬 接《家》世界语译者魏以达信，魏恳请为译本作序。

九月二十四日 作《家》世界语译本序，载译文出版社世界语译本一九八三年版《家》，改题为《一篇序文》。此为全文第一节，第二、第三节系十月四日作。云“对世界语的感情始终不减”；认为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流毒”还在，因此，“《家》今天还是警钟”。又致信石上

韶，解答对方在把《探索集》译成日文过程中的疑难。

九月

与从美国来华访问的挚友卫惠林晤面，并设宴于国际饭店，全家与卫惠林欢聚。

应中国作协成立的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邀请，担任该会主任委员。

在寓所会见花城出版社苏晨和范若丁。当获悉他们刚从北京看望过叶圣陶，遂对叶老健康表示关心，并回忆了当年叶老发表《灭亡》的经过，流露出对叶老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晤谈后在花园摄影留念。

作《致日本的读者》，载北京外文出版社《草原的小路——短篇小说佳作十二篇》。

十月初 让女儿李小林在家中和草坪上拍照，拟寄友人。

十月四日 作完随笔《一篇序文——随想录九四》，载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此系补写的第二、第三节。自叙学习、翻译世界语和编辑世界语杂志以及对“世界语产生的感情”；对在“一切为了宣传”而奉命自己删去一些内容后译成的《家》的英译本不满，自责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后以此作为“护身符”、“猎取名利”是“可耻”的，表示记取教训，今后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会

见谷苇，第一次为谷苇题词：“我的心灵中燃烧着希望之火。”

十月七日 作《写给彦兄 附记》，载一九八三年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一辑。说明因病无法为《鲁彦选集》作序的苦衷，相信作家鲁彦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

十月上旬 右背脊患囊肿，再次赴上海华东医院动手术，术后在家休养。

十月约上旬 接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访问上海后留下的信。获悉她希望巴金能用书面回答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十月十一日 会见香港《大公报》编辑唐琼，获悉香港美术评论家黄蒙田拟约请撰文介绍西班牙画家辛门和加斯特劳。立即寻找当年编辑出版的画册《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曙光》，托唐琼转赠黄蒙田。

十月十二日 宴请唐琼等人。又致信石上韶，云：筑摩书房想出版石上韶所译《探索集》日译本，“当然同意”。

十月十五日 与北京通电话，为次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宣布成立而高兴。

十月十六日 作随笔《一封回信——随想录九五》，载十一月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书面回答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提出的若干问题：承认“文革”

时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但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年来出现了“新作家”、“新作品”，同时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学；还有作家们的“独立思考”；认为现在“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并以自己为例，承认“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但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

十月二十九日 致信田一文。云从寄来的照片，引起对重庆那段生活的回忆。

约十月底 再次会见香港《大公报》副刊“悠然集”主笔唐琼先生。

十月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真话集》。

接花城出版社苏晨来信，获悉该社要给为《序跋集》抄了二十几万字稿纸的李国^①付抄稿费。在征求了侄女李国^①的意见后，遂复信云：“抄稿费不必付了，国^①不要，你们也不要客气，送两本‘花城’新书给她就行了。”

十一月初 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编者信，获悉香港有一位读者，原是李尧林的学生，希望巴金能谈谈他的三哥李尧林的事情。接信后，“一连两夜我都梦见我的哥哥”。

约十一月初 连日白天、晚

上亲自整理藏书，准备先后捐赠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听见歌曲《那就是我》，引起了对童年和故乡的思念。加上近来常常怀念六七十年的往事，遂开始作《化作泥土》。才写了前三段，后因腿骨折而辍笔。

十一月七日 晚，在家中二楼书房整理藏书时跌跤，扭伤股骨，卧地不起。后经华东医院拍片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院治疗。

十一月八日 配合医生，做了胫骨结节骨牵引术。

十一月上旬 入院初期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求助李小林、李小棠和李国^①跟大夫商量，把牵引架搬开。病中特别想起“文革”中因为要在“‘医疗卡’上加批‘反动权威’或‘反共老手’”，必须“到医院群众专政登记处去登记，表示认罪”，因而“不敢到医院看病”的“可怕”的“非人生活”，以致“没有发高烧，却说着胡话”。

十一月十一日 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被选为名誉会长。

十一月二十日 病中，嘱女儿李小林打电话祝贺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郭绍虞执教著述六十周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病中，在华东医院会见以日本笔会会长、著名作家井上靖为团长的日中文

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井上靖祝巴金早日恢复健康并赠送了礼品。

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医院会见《解放日报》记者查志华。谈到摔伤事，笑说这次“被强迫休息”，很不习惯，本来想多做一些事，现在反而不能做事了。

十一月

因病未出席在京举行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被选为主席团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另在住院期间，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死的问题想得最多。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横，想道：只要心不死，我总会留下一些什么。”

陆续“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

“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地流了眼泪”，“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

约十一月 在病房会见诗人周良沛及已故著名电影演员周璇之子周民，并赠《真话集》。

十二月二日

收到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编辑唐琼慰问信，遂托侄女李国^①复函致谢，答应一俟能坐



起来，就替《大公报》续写《随想录》。另外在信上勉力写了几个字：“我不要紧，睡几个月就行了，谢谢您关心。”

会见前来祝贺生日的彭新琪、茹志鹃和李子云等，接受了她们用粮票买来的两盒栗子蛋糕。

十二月十二日 在华东医院病房会见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武兆堤和《寒夜》的改编者之一、导演阂文。获悉他们想征求改编《寒夜》电影剧本的意见，遂表示“电影改编是再创作。改编者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编嘛，我不干涉。……艺术上怎么处理我不管，你们自己搞吧”。在谈到剧中人物时，又说：“这部作品，也可以说是写我。汪文宣就是我。——结局当然不一样呐，我不会去自杀了！”

十二月十三日 获悉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也摔伤住院，住在自己隔壁的病房。听说他因昏迷不醒，病情危急，家属在病房外设探访者签名簿，遂关照女婿，“代我去写上一个名字，对永刚同志表示最后的敬意”。

十二月十五日 请冯牧在北京举行的“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上代读书面发言《祝贺与希望》。

十二月十六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祝贺与希望——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上

的讲话》。云长篇小说评奖，“建国以来还是头一回”，“赞成选得严一点，精一点，因为这是向全国人民郑重地推荐；也是鼓励作家写得好一点”；同时提出“新”和“深”的要求，希望写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好作品”。

十二月十八日 凌晨，被隔壁病房的哭声惊醒。从女婿祝鸿生处获悉吴永刚“过去了”。上午，嘱家属把病房门开着，仰卧在床上，看见电影界的负责人护送吴永刚遗体下楼。“这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触到死亡。永刚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几个人物活在我的心里，甚至在病床上他们还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时，在华东医院病房会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团长、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野间宏。接受野间宏敬献的一束“象牙红”和衷心的祝愿。在接受了野间宏赠送的两支笔后表示，“我要用这支笔多写些文章”。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医院，由儿子李小棠及其女友陈晓明陪同，接待了杭州市文联的薛家柱。

十二月下旬 在华东医院病房，会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同志，接受了出版社赠送的《巴金选集》十卷本样书，并说：没想到出得那么快，深表感谢。临

别，把一张住院期间所摄的近照赠给他们留念。

十二月

致信岛田恭子，谈青年时代与朝鲜人柳子明、柳絮、沈茹秋的交往。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怀念集》。

一九八二年内

接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南斯拉夫留学生娜达的信，获悉她在读了《家》后，把短篇小说《哑了的三角琴》译成塞尔维亚文，遂复信并邀她到家作客。会见时询问了她和她的祖国的情况，并介绍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获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英若诚导演、美国密苏里大学学生在该校表演艺术中心演出的《家》，在美国全国大学戏剧会演中，英若诚荣获导演奖，饰瑞珏和梅的演员获表演奖，该剧又在美国全国电视广播中播出。有的观众说：“《家》的演出使美国人深刻地理解了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后来发生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钥匙。”

会见《抗战文学期刊选辑》主编李基林，同意该刊第一辑影印《呐喊》及《烽火》，并应约题签。



除夕夜，与李济生、李小林、李小棠、祝鸿生、李国士等亲人在病房吃“团年饭”，其乐融融，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又婉拒曹禹以及孔罗荪夫妇在病房陪伴“守岁”的盛情。

忆及“文革”十年存款被冻结时，曾得汝龙和李健吾冒险暗中赠款帮助之事，热泪盈眶。

接受法国密特朗总统以人民的名义授予的国家最高荣誉勋章，赞词称巴金是“中国的伟大作家”、“伟大的思想家”。

病中时做关于“文革”十年中的噩梦，时有恐惧，终于明白，其实“个人盲目崇拜”是病根。

坐轮椅参观鲁迅故居，百感交集，称鲁迅“永远是我的老师”。

在对《随想录》有“非议”的传闻中，面对一位名重位高的“大人物”“突然”来访，并提出“忠告”进行暗示时，表示“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

因手发抖，身体不好，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要搁一搁了”。

八十岁

一月五日 在华东医院三一一病室会见井上靖先生及其夫人。下午，在医院应约会见唐金海。认为《巴金专集》编选的“都是我最早发表的原文，是我最初的思想，现在

的人很难找到”；认为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是为子孙后代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不仅中国的研究者需要，外国的汉学家也会需要的；认为唐金海撰写的论文《巴金与外国文学》“写得可以”，有“作者自己的看法”。

一月八日 治疗进程良好，拆除了牵引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

巴金在上海华东医院拆除牵引后。 李舒摄



架。当天，家人买了蛋糕来庆贺。牵引架拆除后，半年来第一次下床开始学习走路。

二月十二日 除夕。李小林、李小棠等亲人带来了菜肴，在医院病房里围着一张小桌吃“团年饭”。虽然吃得很少，“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晚八时，曹禺及其夫人李玉茹来访。待李小林、李小棠等回家后，又费了不少口舌才婉谢了曹禺夫妇陪伴“守岁”的盛情。刚睡下，孔罗荪夫妇也来病房表示要一起“守岁”，其时曹禺和李玉茹已离去，巴金已睡下，“进入半睡眠状态”，孔罗荪夫妇与巴金胞弟李济生谈了一会儿，也告辞走了。

二月十三日 旧历正月初一清晨，住在隔壁病房的著名戏剧导演黄佐临偕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进病房来拜年，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彼此排遣了病中的冷清和寂寞。在病房观看少年宫歌舞团的一部分小演员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待小演员告辞出去，巴金异常感动，流了眼泪。

二月二十三日 致信花城出版社负责人苏晨。云用稿酬购《序跋集》精、平装各三十册，其余稿酬全部汇给北京沙滩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

二月二十五日 晚，在病房

应约会见唐金海，接受唐金海送来的五本刚出版的《巴金专集二》样书。

二月 李小林、李国¹编的《巴金论创作》出版。

约三月初 接苏晨信，获悉花城出版社将《序跋集》全部稿酬寄交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免费赠送巴金三十册精装本和三十册半精装本。

三月二十五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在全国优秀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获奖作品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对获奖的中青年作者寄予很大希望，并指出“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漫长崎岖，永无止境的”，还得认真学习，汲取营养。病中“写字不便”，嘱李小林代笔复岛田恭子信。重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到日本横滨的经过，“坐的是二等舱，上岸很顺利”。指出望月百合子信中提及当年巴金在横滨遭日本水上警察留难之事，是她“搞错了”。

三月二十八日 口述致信石上韶，祝石上韶译《真话集》“再次成功”；并欢迎对方访华和到家中做客。

三月 得冰心赠《冰心文集》第一卷，扉页题词“巴金老弟正”。

得沈从文赠《沈从文文集》第一卷，扉页题词“巴金老

友”。

得卞之琳赠《沧桑集》一册，扉页题词并托黄裳便中转赠此新出的旧作集，“代表本人探亲”。

四月二日 下午，在医院会见王蒙。

四月七日 看《文学报》，获悉影片《寒夜》在苏州、无锡和兴化等地继续拍摄，男主角汪文宣由许还山担任、女主角曾树生由金鸡奖最佳女演员潘虹扮演。

四月十七日 致信苏晨。告之《序跋集》全部稿费直接汇寄北京沙滩中国作家协会巴金收，注明“供文学馆专用”。

四月二十九日 与冰心、叶圣陶、丁玲等三十四人任在京成立的《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

四月下旬 获悉挚友沈从文突发脑血栓症，左侧瘫痪。遂托人代致问候。

约四月 在病房会见挚友曹禺、会见李健吾的大女儿李维永。“我带着眼泪结结巴巴地讲她父亲‘雪中送炭’的友情”，即“文革”十年巴金存款被冻结，曾得汝龙和李健吾暗中赠款帮助一事。李维永含泪讲述父亲最后的悲惨命运时，巴金很痛苦，又希望知道一切。曹禺怕巴金动了感情，会发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祝鸿生也担心巴金支持



不下去。李维永也怕巴金太伤心，没把话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李健吾的事情。……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朋友看待的。”

五月七日 傍晚，在上海展览馆接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在授勋仪式上，说：“这次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在法国，这种荣誉勋章是国家最高勋章。密特朗总统授勋章时说，为能“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向巴金先生颁发荣誉勋章感到荣幸”，“你不仅是中国的伟大作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你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法国要赞扬的不仅是一个作家，也是表扬一位法国的朋友”。授勋章后，向密特朗赠送了新版自选集十卷本《巴金选集》。

五月十日 在医院拔光了剩余的下牙，只能吃流质，身体很差。

五月十四日 出院回家休养。“瘸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每天注意上下楼梯锻炼，又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仍“食欲不振”，曾“想到死亡”，但“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与外孙女端端同



- ⊖ 巴金 右 与前来授勋的法国总统密特朗 左 在一起。
- ⊖ 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巴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住一房，端端帮助穿袜子、铺床，心中感到“多么暖和”。这段时间，又经常想起英国作家狄更斯《老古玩店》中老外公和小外孙女的形象。每周两次，接受瑞金医院伤科李国衡大夫的推拿治疗，伤情逐渐好转，并遵医嘱打过多种氨基酸针药。

五月中旬 感冒发烧。半夜从噩梦中惊醒，仿佛和侍候在身边的亲人“隔了一个世界”；有时梦见红卫兵翻过墙头，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醒后感到痛苦和疲倦。“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逐渐又能安睡。

五月二十一日 致信黎明学园教师蒋天化。云刚从医院回家，行动困难，常常想念你们，

“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并表示“相信黎明的事业一定会不断发展”；又嘱侄女李国¹代笔告诉三次赴泉州的简况。

五月二十六日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由诗人周良沛陪同来访的丁玲、陈明夫妇。接受丁玲献上的一束菖兰，回赠丁玲等一套新出版的《巴金散文选》。丁玲转达了法国朋友对巴金的问候。

作家吴强也来访。叙谈“‘文革’中受害身亡”的女作家方令孺等。

五月下旬 会见日本著名作家松本清张，接受了他赠送的花篮，遂回赠《巴金散文选》。

六月六日 会见专程来访的《随想录》、《探索集》的日译

者石上韶，解答关于《真话集》翻译中的难题。

六月十七日 在北京举行的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会上，被推选为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六月二十一日 致信李致。告之四川电视台摄制的专题片《奔腾的激流》已看过，认为“只能说是替我‘树碑立传’，我总觉得缺少点血肉。有一个镜头必须取消：毛主席接见的画面，画得不好，那些话也非主席原话”。

六月二十六日 得诗人邹荻帆赠《邹荻帆抒情诗》一册，扉页题词称“巴金良师”并致感激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 续写完随笔



巴金 右二 与
丁玲 前左二 等在一起。



巴金在写作。

《化作泥土——随想录九六》，载七月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童年时在马房度过的生活片断，以及从“下人”老周、老任等那里，学到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抒发了对“人民”、“家乡”、“祖国”的热爱和眷恋之情，愿“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六月约下旬 出院一个半月后，自感写字也是一种锻炼，遂在楼下由走廊改建的太阳间，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开始写作；起初写一个

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写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二三个小时”。

六月 获悉很多作家在浙江义乌纪念冯雪峰八十冥寿。当成立冯雪峰研究学会时，遂与大会通了长途电话，电话内容由陈明记录，即兴吟出一篇赞词。

七月五日 作完随笔《病中一——随想录九七》，载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记叙“病中”辍笔的“寂寞”和从读者来信中获得的“求生的勇气”；又从病中“精神得不到平

静”联想到赵丹、陈西禾的死，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又致信《世界文学》，载《世界文学》第四期。云鉴于“吃够了闭关锁国、耳目失聪的苦”，《世界文学》能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在比较和鉴别中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坚定。

七月九日 作随笔《汉字改革——随想录九八》，载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汉字是我们“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

七月十九日 作随笔《病中二——随想录九九》，载二十八至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为病中未能知道“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忠实朋友看待”的李健吾的逝世而“痛苦”，赞李“那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七月二十三日 作随笔《“掏一把出来”——随想录一〇〇》，载八月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八月三日 作随笔《病中三——随想录一〇一》，载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病中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导致精神上的痛苦，多次“穷根究底”才想通了：一切都来自“盲目崇拜”；认为“今天还有人想做‘看牛人’”，表示



“我绝不再做‘牛’了”。

八月十日 作随笔《我的哥哥李尧林——随想录一〇二》，连载于二十三至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深情回忆三哥李尧林由苦学生到穷教员，清苦、寂寞而又死于贫病交迫的一生，描绘他“乐观”、“忠实”、“善良”等品格。

八月中旬 会见作家袁鹰，谈编《中国新文艺大系 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散文集》的事，认为这几年，“散文有很大发展”，但质量很高、影响很大的优秀之作，“却还不算多”。

八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怀念一位教育家——随想录一〇三》，载九月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匡互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事迹，赞他是为国为民的教育家。

八月二十九日 致信张挺。告之不赞成成立巴金研究会和召开巴金学术讨论会。

八月下旬 致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贺电，鼓励青年文学工作者“为开创文学新局面而努力”。

八月

爱子李小棠与作家、大学同班同学陈晓明结婚。

致信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编辑唐琼，婉言索取腿伤病愈后写的《化作泥土》和《病

中》两篇作品手稿，拟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老家遗址是不是过去英国驻成都领事馆的考证，“不用再提了。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小棠明日结婚，后天去青岛旅行”等。

约九月初 收到萧乾寄赠的译著《培尔·金特》，读后，云喜欢剧中的一句台词：“人——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认为说真话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九月三日 接待从广西赶来的油画家刘宇一。为支持刘完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系列画像，艰难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刘宇一转达了叶圣陶、丁玲的问候。听刘宇一的构思后，说“我是你的素材，怎样画由你安排”。轮廓勾出后，表示满意，最后为画像签名。

九月七日 作随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随想录一〇四》，载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文革”中作为“一个孤零零的‘牛鬼’”，习惯于“寓悲愤于沉默”，但也留下由于“个人崇拜”而“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的“污点”，为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在就要“把心上的伤疤露出来”。

九月九日 致信李致。预祝

李致带川剧进京演出取得成功等。

九月十日 会见日本巴金研究会的负责人木崎翠、堤礼子和她们的顾问芹川维忠等一行人，接受她们赠送的《直木奖优秀作品选》，回赠精装签名本《巴金散文选》，并表示“青年人在推着我前进”。

九月月中旬 收到黎烈文夫人、现代女作家雨田的信，获悉她不同意国内重印黎烈文的作品《舟中》；巴金也觉得这篇作品确实写得“平平常常”。

九月十五日 作随笔《谈版权——随想录一〇五》，载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作家应当享有作品的‘版权’”；自云不会把“版权”“视为私有财产给儿女亲属继承”。

九月十九日 翻看法国作家萨特一九五五年写的《对新中国的观感》，为《谈版权》一文所引萨特的话作了补充。

九月二十四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以水上勉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获悉他们拟专程前往四川成都参观巴金旧居。接受日本作家各自赠送的作品，并回赠《巴金选集》和《巴金散文选》。

九月下旬 会见法籍华人画家赵无极。与家人赴杭州小住半月。天晴时，坐轮椅游览三潭印

月、西山公园和石屋洞；如是阴天，就喜欢在楼下大厅的沙发上闲坐，默默地观察别人。“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老习惯。”

九月 第一次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文学资料二千一百八十一件。

十月九日 在黄源等陪同下，乘轿车至绍兴鲁迅故居。坐轮椅参观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还在寿镜吾先生执教的塾师桌子旁坐了一会儿，再到鲁迅先生少年时代坐的书桌旁坐下，摩挲着鲁迅当年刻在书桌上那个“早”字。接受了该馆负责人、“闰土”的孙子章贵赠送的“金不换”毛笔，并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留言“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

十月上旬 与黄裳等游禹陵，带着腿病一步一捱，稍微休息一会儿再爬，这样步步艰难，终于爬到树有大禹陵的碑亭前面。“这是几年来难得的一段平静舒心的日子”。中旬，返沪。

十月十九日 作随笔《又到西湖——随想录一〇六》，载二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与家人又到西湖，看到越来越美的山水，也看到横遭冤屈的名胜古迹得到昭雪，以及破坏了景物逐渐在恢复，心情十分愉悦。

十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为新文学大系 作序——随想录一〇七》，载十二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新文学“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的

心，让我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又云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是讲真话的文学。

十月二十三日 因患帕金森综合征住华东医院北楼七一七室。脑子一直在活动，回忆过去读过的一些书，如《双城记》、《战争与和平》、《水浒》等，受到鼓励，决心跟疾病作斗争，更加热爱生活。

十月二十九日 上午八时半，会见日本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陈喜儒任翻译。当山崎丰子问中国作家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什么时，回答是“用笔为人民服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全心全意为祖国而写作。把亲笔签名的布面精装的《家》、《春》、《秋》和一只



巴金坐在鲁迅少时读书坐过的书桌旁座位上。



漆制的蚌壳赠山崎丰子，也收下山崎丰子题赠的《两个祖国》等新作。会见情况由上海电视台录像，并于同日列入晚间新闻节目播出。

十月 患帕金森综合征住院不几天，发现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除精神污染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遂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感觉到“大风暴”、“大灾难”又要到来。想得很多，但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于是发出了深沉的诘问：“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十月月下旬 病中接见来访的黄裳，突然“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望巴金病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回答以后，“大人物”突然一脸严肃相，又示关切的样子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地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听到这两句“忠告”，巴金自然想到近两年还受到过别人的“忠告”，都是希望他“安度晚年”的意思。

十月 将第十期载有画家贺德华新作《巴金故居》一幅的《富春江画报》转赠日本学者水上勉。

十一月十四日 在医院会见

去苏州讲学经过上海、前来探望的友人杨静如和赵瑞蕪。

十一月二十日 作随笔《我的“仓库”——随想录一〇八》，载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存有“许多部作品”，它们塑造了“我的心灵”，许多人物的命运加强了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又作随笔《关于复活——随想录一一六》，连载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三至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托尔斯泰的《复活》创作及被审查官删削得不成样子的经过，但《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不朽的名著”。

十一月二十一日 以中国作协主席名义邀请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罗共中央委员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来华访问。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致信李致。告之魏明伦的《巴山秀才》、《易胆大》川剧录像都看过了，觉得不错；在医院“躲生”等。

十一月二十三日 农历十月十九日，在医院里度过了生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随笔《我的名字——随想录一一〇》，连载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至二月一日香港《大公报·

大公园》。云笔名“巴金”淘汰了“本名”；多少年来，“通过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一直到“文革”中，“巴金”被冠以“四旧”、“崇洋媚外”的罪名，被“砸烂”和“打倒”；表示来日无多，应倍加珍惜，“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让后人去议论”。

十一月三十日 下午，在上海华东医院北楼病房会见前来看望的贾植芳、任敏和唐金海、张晓云。其时腿部病痛没有全好，又新增加了神经方面的毛病，两只手都抖，腿也发软发麻。吃一种有毒性的进口药。医生前些时每天加大一点剂量，试到既能起作用又没有副作用为止。巴金笑着说，现在每星期长一斤肉，进来一个月，长了四斤。医生说不能再胖，胖了腿脚负担太重；当问起前些时到绍兴的情况时，云：一直想到鲁迅故乡看看，这次到绍兴，先坐小轿车，下车后就坐手推车到鲁迅故居，看了百草园、三味书屋，照了相。“我很高兴，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鲁迅是我的老师，我多年来就是在鲁迅精神鼓舞下写作和生活的。”当在座的李济生说报上在讨论人道主义，提法与以前不同了，人道主义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提到最近以及报上批判精神污

染的文章。巴金云：“人道主义还是要讲的，同情被压迫、受侮辱的普通劳动人民有什么不好。鲁迅就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我就是个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当问起明年能不能回家乡参加巴金、沙汀、艾芜、阳翰笙“四老”学术讨论会时，笑云“我们都是八十岁，几个人同年岁。看来我不能去了，以后身体好一点，总要回家乡去一次。我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去了，人老了，就特别想到家乡看看”；当谈到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时，云“要搁一搁了，手发抖不好写，身体不好常住院。真想把它写完”。与来访者告别后，又致信杨静如。嘱杨静如将旧信“赠给文学馆”前“复印一份寄给我或小林”，表示自己死后，李小林“可能为我编印书信集”。

十一月约下旬

接岛田恭子信，约写世界语文章；收到日本世界语协会理事、图书部长永漱义胜赠宫本正南编纂的《日语世界语辞典》。

会见应自己邀请于本月二十一日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罗共中央委员、著名小说家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

十二月五日 口述随笔《我与世界语》。因患帕金森综合征，手抖不能写字，此篇短文由

巴金口述、侄女李国¹代笔，载《巴金书简 初编》。云自一九二四年起“认真学习世界语”，一九二八年从法国回来，经友人介绍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SEA，还担任过《绿光》Verdalu-mo杂志的编辑；近几年日本世界语者德田六郎访问上海，回国后给巴金寄来《绿光》全份复印本；自云“对世界语始终有深的感情”；认为“世界语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公认的惟一的辅助语”，“各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语言外，可以用世界语和别的民族友好交往而达到互相了解”；赞“日本是世界语运动发达的国家”，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先生花了十年功夫编撰的《日本世界语辞典》，“对日本世界语运动更大的发展会起促进的作用”。又口述致岛田恭子书信。信由侄女李国¹代笔，请将一篇谈世界语的短文“译成日文”。

十二月六日 上午，会见日本戏剧家代表团团长、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杉村春子，获悉话剧《家》将东渡日本演出。《家》的总导演黄佐临征求对《家》作了一些新的处理有何意见，表示：“我倒主张不必太拘泥于原著，可以搞些新东西。”认为《家》所描写的生活离现在很远，但那种封建思想的流毒至今还存在。就好像书里出现的高老太爷，“虽说写的是我祖父，但

像他这种思想的人，现在还到处都有”。后在花园草坪上三人合影留念。

十二月十四日 作随笔《怀念均正兄——随想录一〇九》，连载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至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解放前后与科普文学作家、西方童话翻译家、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顾均正的友谊。下午三时，在病房会见唐金海、张晓云，解答关于他们主编的《巴金年谱》中的一些难点。对唐、张提出的若干有争议的史料，尤其是有关思想信仰、思想发展变化和对八十年代文艺现状的问题，都坦诚相告，最后希望唐、张再去查核，不必顾虑作家的观点，因为“是你们写的著作，应由你们自己最后决定”，又希望写的书“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后又欣然同意在病房摄影留念。

十二月二十日 作随笔《病中四——随想录一一三》，载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出院后坚持锻炼的艰苦情况和对一位“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病”，建议他到医院打多种氨基酸针药的伤科大夫的感激之情。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医院会见日本著名作家、日本文化交流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井上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靖。获悉井上靖日前寻访成都旧居，感到十分高兴。并向到中国访问了一百次的白土吾夫表示祝贺。当井上靖再三邀请访日时，为了酬答日本朋友的友情，不能一口拒绝，遂表示如果健康情况允许，将应邀出席明年五月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双方互赠自己的著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 应约会见王蒙。互致问候，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及其倾向等交换了意见。王谈了一点自己创作的打算后，又赞誉已出的几本《随想录》是关于历史、人生和思想的“大书”时，巴金云：手发抖，写字困难，有些力不从心了。年轻人写作少顾虑，“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又致信李致。告之已答应井上靖明年五月去东京出席国际笔会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会见日本西南学院教授、巴金研究者山口进等，解答关于巴金生平和创作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十二月下旬 接受香港李汶采访，表示生命并未结束，还要继续前进。“我的心灵中燃烧着希望之火”。

约十二月 读《花城》第六期杨沫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我浑身颤怵，作者好像用榔头把一个字一个字打进我的灵魂。……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卫后代，我看杨沫同志这个头开得好”。



一九八四年

对“文革”十年中三次被“造反派”强行查抄日记无比愤怒，进而思考“人为什么变为兽”和“怎样变为兽”的根本问题。

梦见床前骨灰盒里萧珊的“小声呼唤”和“低声哭泣”，誓言自己将来的骨灰要同萧珊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呼吁人们现在要警惕“戴上革命左派帽子”的“高老太爷”。

认为台湾和大陆都是一家人，统一对大家都有好处。

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并将一百万日元的采访费捐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仅用四万日元为孙女、外孙女各买了一辆最便宜的玩具电动喷火妖怪。

赴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当近几年有人多次对他提到诺贝尔奖的问题时，表示“文学作品是很难有世界标准的”，又表示“关于诺贝尔奖我并无兴趣，我早说过我不是文学家”。

提出“文革”十年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认为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

认为“谈恋爱要负责任”，“讲条件不是爱情”。

八十一岁

一月一日 元旦。会见旅美女作家李黎。几年不见，李黎看到巴金病弱之态，失声痛哭。遂劝慰李黎。

一月二日 作随笔《我的日记——随想录一一一》，载二月八至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文中通过“文革”十年中三次被“造反派”强行查抄日记的遭遇，倾吐了对“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无比愤恨。认为“问题必须搞清楚”，以防“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的局面。

一月初 从探病友人口中获悉著名电影演员金焰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华东医院南楼。甚为吃惊，马上想到了自己“冬天的节气”，心中不免伤感，遂托人在他的灵前献了一个花圈。

一月九日 作随笔《我的噩梦——随想录一一四》，载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



巴金深情凝视
放在他卧室床前萧
珊的骨灰盒。

·大公园》。云“文革”时和“文革”后是一生中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在梦中受罪，醒来也感到痛苦”，遂再三思索“人为什么变为兽”和“怎样变为兽”的。

约一月上旬 会见日本西南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山口进。巴金对他说：不用在成都老家寻访故居，只要把《激流》里的住房和《憩园》里的花园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一月十七日 作随笔《“深刻的教育”——随想录一一五》，载三月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文革”期间，为了“过关”，求得短暂的安宁，不得不一次次地写“认罪书”，“承认自己‘用软刀子杀人’”；但认为作品不是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

算”。

一月二十日

作随笔《病中 五——随想录一一七》，载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记叙一九八三年因患帕金森综合征住院的生活，虽然使用筷子、扣纽扣手发抖，仍然每天写一二百字，一笔一画地写，动作十分迟缓；云“喜欢电视剧”，因为“看电视就是接近各种生活”。

深夜梦见病逝十二年的萧珊，见她哭泣，心中难过，忽而惊醒，见儿子李小棠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痛苦中“用铺盖蒙住脸”。

一月二十一日 作随笔《再忆萧珊——随想录一二〇》，载四月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通过深夜梦见亡妻萧珊后引起的幻觉，倾诉了十二年来对她深切的怀念之情，“每夜每

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表示自己应当振作起来，迈向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一月二十四日 在医院会见前来探望的上海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负责人。

一月

得中国当代作家从维熙的儿子从众铜塑巴金头像一尊，让家人珍爱地置于楼下大厅中。

收到双腿残疾的阜新县文化馆创作员王占君寄赠的长篇小说《白衣侠女》和《东藏魔影》。

二月二日 在医院度春节。欣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曹禺送来的花篮。会见到病房拜年的友人吴强、师陀、辛笛等。

二月六日 作随笔《我的老家——随想录一一八》，载三月

二十六至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自一九二三年五月离开老家后，曾四次回成都寻找幼年时期的脚印。虽然旧物已渐渐消失，“可是我对封建制度的控诉，我对封建主义流毒的揭露，绝不会跟着旧时代的被埋葬以及老家的被拆毁而消亡”。

二月八日 在唐金海撰写并主编的《巴金年谱》中关于若干史实问题的来信上作眉批。

二月九日 作随笔《买卖婚姻——随想录一一九》，载三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通过侄女信中谈到为筹备儿子婚事而产生的苦恼，以及目睹女佣的儿子因婚礼讲排场，贪污而判刑之事，认为“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有的还“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表示“我还是要大反封建”，同时大声疾呼：“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必须终结了。”

二月约上旬 接茅盾的儿子沈韦韬和儿媳陈小曼来信，恳请以茅盾老友身份对《茅盾谈话录》的发表，给予“关注”。

《茅盾谈话录》的作者金韵琴，系茅盾夫人之弟孔令境的夫人。她以茅盾亲属身份，用与茅盾谈话的形式写成 内容连载于《文学报》和《解放日报》，一时成为研究茅盾的第一手资料。从来信中获悉，沈韦韬等认为茅盾“生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失实虚假之处很多，因此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二月十二日 作随笔《茅盾谈话录——随想录一二》，载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摘录茅盾儿媳来信部分内容后表示，我们不当做任何有损于茅公声誉的事，也要对读者负责；同时声明自己“也不能为闲谈中的片言片语负任何责任”。

二月十四日 作随笔《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载五月二日《人民日报》。认为我国历来“以文会友”的精神，正是国际笔会的宗旨。自云要“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才以文学为“武器”。

二月中旬 会见专程来访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负责人孔罗荪，听孔介绍建馆和预展近况；表示除将今后所有稿费捐赠文学馆外，还打算另捐一笔资金。

二月十七日 作随笔《我敬爱的老舍同志》，载三月十五日《文汇报》。倾诉怀念老舍的真挚友情，赞他“正派”、“善良”、“坚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二月二十日晚，与法国驻华大使马乐欢晤，接受对方代表法国政府颁发、由总统密特朗亲笔签字的荣誉证书。

巴金接受法国驻华大使马乐 左 代表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证书。右一为曹禺，右二为巴金侄女李国焯。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二月约下旬 致冰心一封写满了三百字稿纸的“长”信，云“在病房里，常常想起您和调皮的吴青”；又说一年中井上靖来医院三次，“要我参加东京的大会”，在病房中正为这个目标奋斗。

二月二十四日 作《病中集 后记》，初收《病中集》。自云“搁笔的日子近在眼前”，只想把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间”，认为这是晚年“生命的开花”。

二月底 获悉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与苏中友协于二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友谊之家”举行晚会，庆祝巴金八十寿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季娅·尼科利斯卡娅作了关于巴金的生平和创作的报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高世坤等应邀出席了大会。

三月三日 致信李致。请李致转达对张秀熟的感谢，云“去九寨沟我已无勇气和体力”。

三月十四日 上午九时，在医院会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记者谢文芬和福建海峡之声电台记者张晓宇。在谈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时表示：“我觉得台湾没有理由跟大陆长期分离，台湾总要回归祖国的。台湾和大陆都是一家人。但用什么方式，那是以后的事。大家好好商

谈，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一定要统一，统一对双方都有好处。”又回忆当年曾坐飞机到台中、台南，后来从基隆坐船回上海。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在台湾，十分想念他们。本来想有机会再到台湾旅行一次，看看老朋友。现在身体不行了，由此又想到大陆去台湾的人也会想念亲人、想念家乡，希望有一天亲人团聚，老朋友见面；当谈到巴金到国外访问以及《家》等作品在国外受到欢迎时，说“这主要是社会主义中国受到别人尊重，中国的文化受到别人尊重”，又说“华侨总需要一个强大的祖国。祖国强大了，华侨在国外受到尊敬，国家搞不好，华侨头抬不起来。很多华侨都对我们这样表示过。我们要团结起来，为祖国出力”；当谈到对台湾广播小说《家》和《寒夜》时，表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台湾青年了解中国大陆过去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自云“比较满意的是《激流》、《寒夜》和《憩园》”，早年创作的《家》，“一共修改了八次，后来笔用得熟一些了，有一点技巧了。这三部小说都反映当时的生活，都是真实的。写《寒夜》，人物性格复杂些，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性格、感情、内心都有变化，都比较复杂。从人物看作品，说明社会制度要改

革”，认为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和戏剧，“导演一定要进行再创造”；接受谢文芬代表台播部赠送的《台湾小说选》和《吴浊流作品选》时，说：“我也希望台湾作家能到大陆来访问，大陆与台湾作家都是中国人”，大家相互交流写作经验，探讨创作艺术，在有充实的生活的基础上，“都能写出很多好作品来”。最后，应电台记者之约，为今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十五周年纪念题词：“祝贺对台湾广播十五周年，奋勇前进！”

三月十八日 下午二时，在医院会见好友田一文和刘盛亚夫人魏德芳，并赠《巴金散文集》。

三月十九日 托人赠田一文电子笔一支。

四月一日 致信李致。嘱查核稿费是否寄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等。

四月二日 致信李致。告之访日日期；嘱李致让出版社追查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稿费的下落等。晚，在欢笑中观看由曹禺改编、英若诚导演、美国大学生演出的电视片《家》，后对著名演员孙道临说：“开始看觉得滑稽，可是后来慢慢看就不觉得。”认为导演很花功夫，外国人演不容易。

四月初 会见日中文化交流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一日巴金左与日本女作家、《望乡》作者山崎朋子右在一起。



日方代表商谈日程安排时，提出要到中岛健藏墓前献花。

五月十日

上午，驱车前往豪德寺，与在寺外恭候的中岛京子夫人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见面，由李小林和陈喜儒陪同，前往中岛健藏墓前献花。“心里

协会已故会长、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岛健藏的夫人中岛京子。

四月上旬 获悉叶圣陶因患胆结石症在北京医院开刀，遂致信问候。

四月二十六日 获悉孙女李丫之出生，母女平安，甚慰。全家对小丫十分疼爱，有时称她为“狗狗蛋”。

五月初 在医院中作随笔《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载十七日《文学报》。其时巴金作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特邀的“世界七大文化名人”，这是为赴会写的讲话稿。联系广岛、长崎的悲剧和自己的创作道路，认为“所有真诚的作家”尽管“思想信仰不同”，都会“用笔作武器，……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力量，最大的目标是人

类的繁荣”；认为“核时代的文学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亿万支笔”与“亿万人民的声音”“集在一起”，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月七日 会见从北京途经上海出席国际笔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获悉冰心托翻译陈喜儒捎来的口信：“年纪大了，要注意休息，日程不能太紧，不要逞强。”

五月九日 晨，在寓所接待前来送行的著名学者、其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后即率领中国笔会代表团一行十五人飞抵东京，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抵东京后，受到热烈欢迎。下榻京王广场饭店北楼三十九层，高兴地说：“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晚，与

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巴金在墓前默然良久后，又向中岛健藏的墓地虔诚地鞠了一个躬。

五月十一日 晚，赴东京会馆，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井上靖致欢迎词，巴金致答词：“友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念上，这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

五月十四日 下午四时，巴金出现在国际笔会会场时，几十名各国记者蜂拥而至。有的急着提问，有的抢拍镜头，会场上气氛非常热烈。巴金在亲人和友人扶持着坐下时，闪光灯和掌声又将会场气氛推向高潮。之后水上勉曾回忆说：“巴金先生是雄健的鹰，他来了，坐在那里，哪怕



不发言，也是一种威严。”晚，出席日本笔会举行的欢迎酒会。

五月十五日 上午，在国际笔会上作演说，题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同日，下午，在住所接待井上靖。井上靖赞巴金上午的演说“反应强烈”，“真感动人”；寒暄后，与井上靖进行电视对谈，回忆几次难忘的交往，谈对文艺的看法。对谈内容经剪辑，日方电视台播出四十五分钟，巴金获采访费六十二万日元，扣除所得税，应得五十万日元。巴金悉数捐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佐藤纯子婉言谢绝，巴金遂云是“多年的老朋友”，仅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收就见外了”。后由白土吾夫代表协会收下。这次访日，共收到约一百万日元的采访费，

全部捐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银座散步时，仅花了四万日元给外孙女和孙女各买了一辆最便宜的玩具电动喷火妖怪。

五月十七日 上午十时，接待松本清张。后讲谈社来访。中午稍事休息。下午三时，会见时事通讯社采访记者；四时三十分，会见清水正夫、丰田正子；晚七时，会见西园寺公一；……日程安排甚紧，代表团请李小林出面，劝巴金节劳。巴金说：“既然来了，就要多做工作，我是个爱国主义者，累一点不要紧。”

五月十八日 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作家的责任和良心——巴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云《随想录》旨在说明文学是什么，作家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叫子孙后代看看我……做

人和写作是否一致”；认为自己的想法与“原罪”的思想不同，因为“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中国作家有责任把事情弄清楚，使在中国发生的悲剧不再在别的国家发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懂得了自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就不会允许别人侵犯自己的权利”。最后云“相信人民的力量”能“反对核战争”。当日晚，会见一对香港青年，并合影。

五月二十日 乘浪漫号快车去箱根，住小涌园饭店。与同行人员换上和服，摄影。并嘱李小林将这张照片寄冰心，免得她惦念。

五月二十三日 下午四时四十分，与井上靖等在机场依依惜别后，从东京成田机场乘中国民航航班机返沪。六时三十分，抵达



一九八四年五月巴金中在日本期间与《随想录》日文译者石上韶左等在一起。

上海虹桥机场。夜，从《文学报》获悉，瑞典欧华学会理事长黄祖瑜发表公开信，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中的不合理情况，并提出巴金的代表作《家》，应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

五月二十四日 在日本《京都新闻》发表《有朋自远方来——巴金与井上靖的谈话》。云

的悲剧”。将中国“文革”的灾难与日本原子弹的灾难类比后说，“我在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写作，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和人类“不再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

五月三十日 为龚明德提供《巴金文集》第四卷，并在扉页上写“这是第七次修改本。排印

访日日期；嘱李致让出版社追查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稿费的下落；《巴金选集》稿费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查到等。

六月十日 在寓所会见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和他的夫人。得池田赠一枚刻有“巴金”两字的精致别针和一盒笔，遂回赠池田一套《巴金选集》和一节蜡染布。谈青年作家的培养等问题，认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培养作家主要靠生活”。

六月上旬 获悉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宣布今年荣誉学位获得人名单：邓莲如、杨铁梁、李蒂甘、Professor William Watson 及李达三。

六月十一日 在寓所会见香港作家、《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以签名本《真话集》、《怀念集》、《巴金论创作》等相赠。

六月十四日 致信李维永。回答李维永在编辑其父李健吾遗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六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辽宁省作协会员、阜新县文化馆创作员、残疾人作家王占君。王一九七五年双腿残疾，但坚持写作，已出版了七部小说共计一百六十万字。当王妻献上一束鲜花时，巴金很激动地说：“我们都是有伤病的人。今天见到你，对我也是鼓励，鼓励我与疾病斗争。”并回赠《家》、《春》、



一九八四年夏，巴金与艾青在一起。王从德摄，车辐供稿

对朋友“要做到三个字——忠、信、义”；听井上靖说要写关于孔子的小说后云，年轻时“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反感”，《家》中主人公就有反孔思想，但现在应该冷静地、客观地重新研究一下孔子，因为孔子的有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又说准备写的两部长篇小说，“想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

原稿已捐赠给‘北图’手稿部”；又说《家》的各种版本已无法找全，以前收藏的，早已散失，有的也送给北京图书馆和现代文学馆了。建议龚写信给文学馆，可能有些收获。

五月下旬 稍事休息，到医院检查。欣悉病情稳定，可以不住医院。

五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秋》和《真话集》。

六月二十一日 作为首届中学生文学社夏令营名誉营长，在寓所会见该营代表，并接受了锦旗。代表们赠送了瓷寿星和水蜜桃，巴金高兴地说：“希望文学社办得更好。”

六月二十二日 致信吕鸣亚。云写字困难，行动十分不便。

六月二十三日 下午，前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放映间，观看《寒夜》样片。后在寓所会见该片导演阙文和《文汇报》记者罗君。认为影片《寒夜》拍得很好，同时也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六月

在寓所会见来访的艾青等。当有位诗人称颂巴金是大师、泰斗时，巴金云“平生最怕面朝南”，最怕文坛称“王”称“斗”。艾青接过话题笑着说：“‘王’字上还有一点。”巴金颌首同意。

会见香港中文大学派来的代表，读校长马临的亲笔信。答应将于十月中旬赴港，接受该校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证书。

继续整理藏书，第二次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文学资料一百三十一件。

致信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剑波，祝贺卢剑波八十大寿。

再次赠送泉州黎明学园图书

六百余册。

获悉戏剧编导黄佐临将赴烟台市的石岛改编赴日演出的话剧剧本《家》。

七月九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自深圳飞抵上海的李健吾的学生胡承伟，获悉挚友李健吾去世前后的详情，又询问关于深圳的情况，表示如有机会，一定与冰心、夏衍等老作家同行赴深圳。又对胡说不要怕现在深圳没文化。当年的香港，文化也是不发达，后来，文化人去得多了，慢慢就提高了。相信深圳也会这样。后赠《随想录》第三册。

八月九日 在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闭幕式上，被一致通过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文联名誉主席。

八月十一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四位法国小姑娘：十岁的勒罗琦克、十一岁的斯蒙塔、十三岁的卡桑和十五岁的莎薇。她们是法中友协今年举办的“我所了解的中国”绘画比赛中，一等奖和二等奖的获得者。当莎薇把自己参赛的一组连环画复制品赠巴金时，巴金连连称赞她的画有丰富的想象力。莎薇看过法文本《春》，并从中获得了灵感。连环画画了一个旧中国的女子，被迫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而她的女儿在新中国同自己心爱的人幸福地结合了。与她们亲切交谈，并向她们赠送了纪念品。在

赠给莎薇的《春》的扉页上，用中文和法文签名。

八月中旬 会见香港《新晚报》记者谷韦，谈及创作和近况。

八月约中旬 在寓所会见上海市委负责人陈国栋和胡立教，互致问候。

八月二十二日 致信李致。告之，需要好好休息，故今年九月不回四川了。

八月 在寓所会见余思牧。又合家欢聚，欢送儿媳陈晓明赴美国墨西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

九月一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瑞典作家斯蒂格·汉森。谈创作和对当前文坛的看法，并将在东京国际笔会上的发言稿赠斯蒂格·汉森。斯蒂格·汉森热心介绍中国文化，曾两度访问中国。这次系为他编的《中国小说选》的出版，又来上海。

九月三日 作随笔《访日归来——随想录一二一》，载二十六至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访日期间，以日本作家的友情作为“精神力量”，在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中又“积累了友情”。

九月八日 应邀为在沪成立的全国文学创作函授协调中心顾问。

九月十三日 致信岛田恭子。鼓励她为“我们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而“尽力”，

并欢迎她访华和来家做客。

九月中旬 接丁玲来信。获悉丁玲将发挥“余热”，主编后更名为《中国》的大型文学季刊《中国文学》，刊物欢迎“艺术上有创新”、“思想上有创见”的新作，并望将“多余的”存稿寄去。巴金“因为病不能给这座新的建筑物添砖加瓦”，但愿为“新刊物呐喊助威”。

九月二十一日 致信丁玲。认为文学事业的共同目标是“对养我育我的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一座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但道路却是崎岖险阻，要走进大楼多点燃一盏灯更是十分困难”，自叹“已经衰老无力向前”，但并不悲观，因为看见“那么多的人朝着大厦奔去”，“我不过小小的一滴水，在汪洋大海中巨浪奔腾，一滴水也不会干涸”；认为“读者需要，作者支持，刊物就要存在下去，能团结作者，有益于读者，刊物就会发展”；“创作就是作家通过认真的独立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品才能打动读者”。

十月二日 致信唐琼。告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编辑唐琼拟于十六日赴港。

十月八日 中国小说学会在天津成立，被聘为名誉会长。

十月十日 会见中国新闻社



福建泉州黎明大学
校长梁披云。

记者谷苇，告之医生复查身体后，“批准”于近期赴港。

十月约上旬 以名誉董事长身份，为十一日在泉州宾馆举行的黎明学园三周年校庆暨黎明大学首届开学典礼致贺电。云：“因病不能出席庆祝大会，谨向梁披云校长和学校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祝继续前进。”梁披云系澳门侨联主席，又任黎明大学董事长。

十月十一日 致信香港朋友，拟于十六日赴港。

十月十四日 下午，收到冰心托女儿吴青从北京拍来的电报：“好好休息，尽情享受。”

十月十六日 早晨，偕李小棠、李小林及评论家陈丹晨等自虹桥机场起飞。到机场送行的有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学者王元化、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吴强及《收获》编辑萧岱等

人。上午十一时抵港。香港中文大学秘书长陈方正，中文系负责人常宗豪、邓仕梁、吴茂生等，专程前往机场迎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及副秘书长乔宗淮、《大公报》副刊编辑部主任潘际¹、香港《文汇报》副总编曾敏之等亦到机场欢迎。由于腿伤，先坐轮椅前往机场贵宾室休息，并接待记者，云“我只是一个普通作家，现在……是个病人”；又云已二十五年没来过香港，为香港的“繁荣”而“高兴”；云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使“我感到中国人民真正正站起来了的意义”。应记者要求签名留念后，驱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宾馆。又与到机场迎接的福建泉州黎明学园在港董事黄金瑞、张曙生、陈汉明、陈子容、高维新，泉州平民中学校友杨士梦等，互致问候。当晚，收看香港电视台在“台港新闻”栏目播出关于自己抵港时的情况。

十月十七日 上午，会见香港文化界朋友；接受香港三联书店送来的《病中集》；会见《大公报》记者叶中敏。当在座的朋友中提到诺贝尔文学奖时，巴金笑着说：“文学作品是很难有世界标准的。生活培养作家，读者养活作家，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读者买他的书。”又会见《良友画报》编辑部经理和副总编陈培生、执行编辑古钊等，谈



文艺界改革和作家的权利等。云：“我赞成改变，中国非改变不可，非现代化不可。”认为如果作家把自己丢掉，跟着别人走，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主张文艺创作，要通过作者的独立思考。

十月中旬 委托香港三联书店将《病中集》两千元港币的稿费购《病中集》赠送友人。因回赠过多，结算时倒欠书店两百元港币。

十月十八日 下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在该校邵逸夫堂举行的第二十七届颁授荣誉学位及高级学位典礼。港督兼“中大”监督尤德主持了颁授礼，观礼来宾逾一千四百人。在介绍了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后，中文大学秘书长宣读赞词：“为表扬巴金先生六十年来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巨大贡献，为表扬他的道德勇气和求知求真的精神，为表扬他对中国人民在这狂飙激流的世纪中追求进步所作的有力呼吁，监督先生，本人谨恭请阁下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巴金先生。”巴金高兴地穿上博士服，偕同港督尤德、“中大”校长马临和同获本届荣誉学位的博士们合影留念。颁礼结束，与港督尤德交谈，并为蜂拥而至的青年们签名留念，在范克廉楼小憩时，接受了香港著名人士、美国总领事李文的问候，获悉他年轻时候就读过

《家》、《春》、《秋》的中文原著；又接受了英国外交部官员费恩琪及其夫人的问候；还为同获本届荣誉文学博士的著名东方艺术与考古研究学者华威廉教授珍藏了数十年的旧版《家》签名留念；当合众国际社记者岑伟柏问巴金，在许多工作和事情中，你最感兴趣的是何时，回答说：“写作。”在颁授仪式结束后，与一位老太太握手。她曾是巴金作品的读者，特来感谢巴金作品给了她精神力量。回到“中大”宾馆，看到署名“您的忠实读者琴”的来信和复印的英文散文诗《你就永远这样年轻》。“琴”的信中写道：“您不但总是拥有那年轻的热烈爱护生命的力量，而且您的文章、文学作品更叫人年轻起来，充满着信心、干劲、勇毅，我真的很希望跟您见面倾谈，好让我在思想上得到更多的冲击、成长……”读“琴”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在您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您就永远这样年轻。”巴金深为感动：“我感谢那位年轻的香港读者，不仅是为了她的鼓励，还是为了她推荐给我的那篇文章。”又接受菲律宾女画家阿妮塔赠送的画。

十月十九日 在中文大学宾馆会见三十多名记者，回答各种

问题，如创作自由、文学和政治、对年轻作家的态度等。云“文学可以成为政治工具，但它不光担负宣传、教育的作用，它以潜移默化的功能，打动人、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又云作家要敢于捍卫自由，作品对人有帮助，就无所谓危险。表示已写了五十多年，“从来不怕什么危险”。对于年轻作家，巴金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代英雄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当记者问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时，回答说，“从前我的笔写惯了旧时代的黑暗和痛苦，解放后转为写人民的欢乐，但我对新人物、新思想了解不深，写来力不从心。所以我写短篇和中篇居多。”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关于“你信仰无政府主义吗”、“你对‘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怎样认识”等问题时，云：“我年青时候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我同时也信仰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安那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与‘文革’的无政府主义表现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又云：“我解放前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社会主义，但没有学习好。三十年代以后我已改变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会见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外籍教授塔特罗和迪尼博士，讨论有关中国文学发展问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宾馆会见《深圳特区

报》记者吴国全等人，合影留念并赠《病中集》。

十月二十日 与中文大学中文系师生以及著名作家刘以鬯、曾敏之、赵令扬等人座谈，赠送川版十卷本《巴金选集》。表示这次到“中大”访问，将在我的写作道路上“增添一把燃料”。晨，会见在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朝鲜女留学生朴兰英和她的同伴，并亲切和蔼地与她们用朝鲜文交谈，驱除了这两位学生未经学校同意，私自造访的不安和胆怯。朴兰英向巴金赠送了四万字的硕士论文打印稿《巴金的家》的主题思想研究》，并说准备通读《巴金文集》十四卷，撰写评论巴金创作的博士论文。

巴金因为和私自造访的朴兰英谈话，耽误了时间，没有吃早餐。

十月二十一日 应何兆丰之邀，乘游艇观赏香港九龙新建筑。

十月二十二日 川版十卷本《巴金选集》首次在港发行，三联书店又推出一批巴金著译，购者踊跃。忙于为携书前来住所的学生、教师和其他读者签名留念。

十月二十三日 下午，与中国新闻社记者林湄晤谈四十五分钟。云：“有框框的作品，读者不欢迎。以前有些作品简单化，好人出来像个好人，坏人出来像个坏人，千篇一律。”又表示自己已年迈体衰，“文章还没写

完，心里焦急，坐立不安”。临别，赠送《病中集》一册，并在扉页题签：“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十月二十四日 会见诗人周良沛、评论家黄维梁、作家陶然等。谈新时期文学和香港文学。

十月二十五日 致信萧乾，署名芾甘。表示“关于诺贝尔奖我并无兴趣，我早说过我不是文学家”，认为葛浩文说“我的作品译成英文的少而不好，倒是真话”。

十月下旬

读香港某日报关于“写真话”的文章。获悉作者不同意中文大学授奖时的“赞词”，用巴金在“文革”中的事情进行挖



八十一岁生日
前巴金 前左三 与
《收获》编辑部成
员在寓所前合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晚巴金 左二 在香港中文大学
宾馆客厅会见余思牧夫妇 右三、左一。右二是李小林，
右一是李小棠。

苦，证明巴金并不“坚强”，没有“道德勇气”。在“中大”长篇赞词之后，巴金感到“它们好像当头一盆冷水”，但不久“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多了”。因为“过去是抹煞不了的，未来却可以由我们塑造。不坚强可以变为‘坚强’，没有‘勇气’的人也会找到‘勇气’。……我提倡讲真话，正是为了有错就改，也是为了有病就治”。认为那篇短文的作者“把在‘文革’中受尽屈辱、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地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不

关心……他的文章不过是向下一代人勾画出自己的嘴脸罢了”。

十月三十一日 中午，应邀出席中文大学校长马临博士安排的宴会。下午，在中文大学宾馆会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会谈约二十分钟，从许处又了解了香港的一些情况。又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发表《致 中国比较文学 创刊的贺词》。云：对于比较文学，不大熟悉；认为“通过比较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学是有益的”。

十月

在中文大学，为造次来访的

某青年拿来的四本《随想录》签名。签第一本时，把该青年名字中“凡”字误写为“繁”，对方指出后，巴金又补写“‘凡’误作‘繁’，请原谅”，并再一次签名，以示郑重。

获悉被泉州世界语协会聘为名誉理事长。

十一月一日 上午，驱车前往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出席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陈伯坚主持的座谈会，与会者有学者、作家、新闻出版界人士三十多人，如饶宗颐、马蒙、李辉英、常宗豪、曾敏之、唐琼、梁羽生、刘以鬯、施叔青等。当谈到“伤痕

文学”时，表示：“‘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揭露、批判‘文革’的作品应当继续写，但写的目的是为了医治伤痕，而不是人身攻击。目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写出足够深刻的作品。”中午，应邀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宴会。晚九时，在中大宾馆客厅会见余思牧夫妇，这是在港期间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获悉余思牧正在撰写约三十万字的《巴金年谱简编》。他们对内地、香港、台湾出版界的情况作了比较。

十一月二日 晚，会见香港《文汇报》记者周密。

十一月三日 上午，在宾馆会见前来送别的“中大”校长马临。后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陈伯坚、副秘书长乔宗淮、中文大学秘书长陈方正及多位文化界人士陪同前往机场。登机前，当《大公报》记者叶中敏和《明报》记者林翠芬问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回答说“年轻人”；又说，“我是为追求友情而来的，现在我满载而归”；并“希望香港的青年奋勇前进”“努力创作”。同时接受香港《文汇报》赠送的《巴金先生莅港记》一册，这是报社搜集巴金在港访问期间各报刊报道文章的专辑。下午，偕李小林、李小棠、陈丹晨等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与前来迎接的王元化等欢

晤。

十一月八日 始作《幸福》，未完篇。

十一月九日 上午九时，在寓所应约会见唐金海和一起来访的岛田恭子、星合知子。就巴金生平和创作交换了意见，在谈到最近国内发表的一些关于研究巴金青年时代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时，云：“我看得不多，但看过一些总觉得没有讲清楚，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有的距离比较大。我年轻的时候是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读了一些书，但是我一直强调，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一直为我们国家而写作。这个话我在文章中讲过好多次，有些人硬是不注意，就记住那个无政府主义，用它来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欢叙一小时，合影留念。

十一月十日 阴历十月十九日，值巴金生日，除与家人一起吃面外，与往常一样平静地度过了生日。

十一月十三日 上午，会见陈其五的子女陈巧巧等。云患了帕金森病，“倘使身体好一些，一定写文章纪念你爸爸”。下午，在寓所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当谈到改革开放时，巴金云：“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希望建设搞得快一点。现在中国人对前途很有信心。”赠密特朗夫人

《家》、《春》、《秋》。

十一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时，会见香港三联书店版《病中集》的责任编辑梅子，并请他转告南国出版社《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希望再与余晤面，又谈到《家》前后修改的情况，认为作家写出作品之后，那作品自然便是社会所共有的。但作家本人也要对作品负责。一个“作家的艺术水平，不会停滞的”，“作品不是试卷，有不足，作家有权改善”。

十一月十七日 给香港朋友写信。云重来香港，“友谊温暖了我的心”，“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

十一月十八日 下午，赴上海龙柏饭店，参加上海市政协为他举行的庆祝生日的宴会。看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托人送来的生日蛋糕和全国政协送的花篮置于客厅中央，墙上高悬“寿”字和寿星祝画，云：“其实按传统习惯，我是旧历十月十九日生日。但我只承认公历”；当被人问起生肖时，巴金说，“大概是属龙的。比郭老小‘一肖’。”接受其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人的祝贺。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出国访问，给巴金留下一封贺信。巴金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八支彩色蜡烛，兴致勃勃地一口吹灭了生日蜡烛。会见结束后，张承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宗代表市政协设宴为巴金祝寿。夜，续写《幸福》。

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身体不适，往华东医院就诊。

十一月二十日 上午八时，在寓所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与白土吾夫、铃木治雄、竹西宽子和大江健三郎等日本著名学者、画家、作家晤谈。获悉《随想录》一、二、三集在日翻译出版后，深受日本读者喜爱。

上映《寒夜》，电视台将播放传记片《巴金》。

十一月二十四日 会见《收获》杂志社前来祝寿的全体同志，并对编辑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对年轻的编辑作了热情的鼓励。

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晨，会见《现代家庭》杂志社代表，接受了他们赠送的花篮，并谈自己的家庭和婚姻，那时是凭感情结

近不少报纸上大吹“红娘”事，云：“婚姻如果单靠介绍，……是社会的一种退步现象。……我多年来一直反对不正确的婚姻观，不能让我们早年唾弃了的旧东西在当今的社会再出现。”又会见上海文联、作协上海分会、上海各报社及文艺界友人，上海电视台祁鸣录像并记载当日盛况。其间，巴金曾喜气洋洋地对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林伟平说：这一次，这样惊动大家，觉得很抱歉。认为“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他的作品决定的”。“我已八十岁了”，“两部长篇小说，能否写好还没有把握”。晚，看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巴金》。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完随笔《幸福——随想录一二二》，载十二月十二至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用充满感情的文字回忆在香港访问期间获得的友情，称香港一些有志年轻人为“老师”，戏称“他们拿着鞭子在赶我前进”，为此“感到幸福”。

十一月下旬 同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寓所开拍由该厂副总编辑张建珍编导的关于自己创作生涯及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会见前来祝寿的杨静如，得她整理过的数十封旧信，并为她在坎坷的境遇中尚保存完好的三、四十年代的几封信感到惊讶。收



徐开垒
左 采访巴
金 右。

获悉井上靖因夫人患病，不能访华，托白土吾夫转达问候，并取出四川特产泸州大曲，请白土吾夫转赠井上靖。晤谈时，对大江健三郎“希望您能写到一百岁”的祝愿，表示感谢。

十一月二十一日 会见作家徐开垒。获悉新华书店拟举行一次书展，以祝贺巴金生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从《解放日报》上获悉，本市三十家影院

合在一起的，结婚时简单得很，哪像现在这么多“腿”？然而“我们是幸福的”，虽然婚后不久就分开了。但“隔得越远，感情越深”。又从现在青年的婚姻状况，联想到女儿李小林和女婿祝鸿生的结合，称他们是患难夫妻。“他们谈恋爱时，我还关在牛棚里。在患难中产生的感情是真挚的，他们多不容易，这样的婚姻才经得起考验哪！”又针对最



- ⊖ 巴金 左 与李存光 右 交
谈。
- ⊖ 巴金 前坐者 与李秋叶 后
左、李小林 后中 和蒋刚
后右 在一起。

到成都战旗文工团张耀堂制成的《巴金故居复原略图》。战旗文工团住地系在巴金旧居宅地上建筑的，张耀堂在此住了三十年。一九八二年张走访巴金亲友和曾在大院内住过的居民、邻居、老街坊，考察了东、西、北三个“公馆”的变迁史，并研究和对照巴金作品中有关故居的文字记载，历时三年，勾勒了巴金离家前夕故居的旧貌，绘成《巴金故居复原略图》。在此基础上，张准备再设计一座巴金故居的模型。又得泉州黎明学园董事会、泉州黎明大学、泉州世界语学会联合拍来的祝贺八十大寿的电文，并接受了蒋刚代表赠送的三件德化名瓷艺术品。

十一月月下旬 接老舍夫人胡^青贺信，信中有用毛笔工楷书写：“立德立言，于兹不朽，寿人寿世，共此无疆！”

十一月

为下月举办的《巴金同志书刊著作展览》整理出一批珍贵藏书。

获悉上海电视台和兄弟电视台联合录制二十一集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同意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据修改本重排《激流三部曲》并拟将版税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得上海青年作家赵丽宏赠散文集《生命草》，扉页有题词：“敬爱的巴金老师，您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

没有真就没有一切。”

约本月 收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剑波托人捎来的四川“潼川豆豉”和四川点心“杀其马”。

十二月三日

阅当日《文汇报》，获悉《家》剧组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黄佐临任导演。《家》剧组将于明年九月作访日演出。向正式成立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赠送珍藏多年的、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莎士比亚的专著和刊物。

会见李存光。李存光向巴金请教“追随鲁迅的道路”和“写作家传记”等问题。巴金云：追随鲁迅的道路，主要是指“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要“讲真话”、“探索真理”、解剖社会和自己、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把心交给读者”。对作家传记的写作，巴金认为重要的是了解所写作家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要写真实存在的人”，要“尽可能准确些，忠实一些”，并批评“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大符合事实”。

十二月五日 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聘为“中莎会基金会”名誉董事长。前往华东医院作一周一次的例行检查，体弱，病情较稳定。

十二月六日 晚七时，会见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赵兰英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郑丽娟。告之因病不能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年老体衰，为“现在有写得比我好得多的人出来”而“高兴”，文学事业是整体事业，应该一代比一代好；又谈现在杂事太多，不能安心写作的苦恼：“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我说我不想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却不肯放过我。”殷切地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早点办起来；临别，赠郑、赵签名本《病中集》各一册。

十二月七日 在寓所会见刘

心武，谈近几年小说的成绩和讲真话的问题。云：现在的小说创作超过二三十年代，中青年作家有才华、有勇气、也有生活，……自然，“几年以后会有大作家出现，现在是出大作家的时代”。又云：好的文学作品，必定是讲真话的作品，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品。

十二月八日 上午，前往上海文艺会堂，出席由上海市文联、作协、出版局和文化局联合举办的《巴金同志书刊著作展览》开幕式。展出二百九十八种、四百七十二册书刊，其中有不少珍贵的版本。下午，在寓所先后会见吴强、黄裳、姜德明等。谈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时，巴金主张目前不必急于开展研究工作，主要应进行三项基本任务：一是积极搜集资料，像旧的书刊和原稿、书信、照片；二是要整理资料，建立科学的档案和管理方法；三是向社会提供资料。

十二月九日 致唐金海信，答复唐金海撰写《巴金年谱》时提出的若干史实问题。

十二月十一日 作随笔《为旧作新版写序——随想录一二三》载二十至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谈《家》反复修改的情况，重申它在当前仍有反封建的意义，因为“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还在我四周‘徘徊’”；又云《激流三部

曲》的主题是“青春是无限的美丽”。认为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的希望，“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会给年轻人彻底反掉”。

约十二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专程来访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当冯牧请巴金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云身体不好，近来经常到医院看病、吃药，这次会议不能参加了；表示“支持这次大会，支持中青年工作”。

十二月二十日 作随笔《人道主义——随想录一二四》，连载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应该“讲一点人道主义”，“文革”中造反派“兽性大发作”，自己也“身受其害”，表示“有权控诉”；又针对“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的“官腔”，反驳道：“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过宗教、封建的统治，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又列举“文革”中被“兽道主义”迫害致死的老舍、赵树理等作家，云：“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是什么 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因此，“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

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寓所会

见王蒙，就中国作协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有关事宜交换意见。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紧箍咒——随想录一二五》，连载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责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不敢出来为朋友“说一句公道话”，看到“熟人一个个落网”，感到“严冬逼近”，只好用“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反右”后，就建筑“个人崇拜”和“自我保护”的“塔”，

但“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金箍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又谈十年“文革”“揪人的教训”，表示文艺不仅要写“文革”中的“泪”，而且要写“文革”中的“血”，因为“文革”那“死而未僵的幽灵会复活”，进而发出了“人啊，你们要警惕”的呼喊。最后庆幸道“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塌”，不再“迷信”了，因此

“紧箍咒”也就不能“惩罚”我们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接《茅盾研究专集》编者之一唐金海信，慨然允诺提供茅盾书信手迹，李小林遵巴金嘱打电话告诉唐。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午，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作开幕词《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由大会主持人唐达成在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宣读。

十二月三十日 在《文汇报》发表《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巴金在寓所书房里工作。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世界的前列——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认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呼唤“史诗般的杰作”和“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早日问世。

十二月

在寓所会见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和香港记者林湄。接受萧乾托林湄带来的手心按摩器。谈到《随想录》时说道：“这一生除了‘文革’受苦外，还算顺利”，“《随想录》的主题思想是想通过事实辨明真假”。又说：“辨别人的价值，在于：是给予还是获取”。当有人说现在通俗文学“泛滥”时，云：昨天看了《光明日报》，也有篇文章说当前通俗文学泛滥；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即使是锦章书局、广益书局大出古旧小说，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广为推销，形成泛滥。“现在的问题是国营的出版社向钱看，……有些机关拿公家的钱来出书，目的是为了多赚些钱”。又指出：“说说不要钱的漂亮话容易，做起来是困难的。”

因昨天林湄照相机出故障，故同意她第二天上午来寓所摄影留念。早晨，在书房会见谷苇和林湄，当林湄问“您成名后有没有女子向您表示过爱情”时，巴金说：“有。收到信后，我总是回信婉言拒绝。我觉得谈恋爱要负责任。凭介绍不会产生爱情，讲条件也不是爱情。目前中国仍然存在不少封建主义的东西。”

第三次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文学资料一千五百二十四件。



被民主选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张文艺“创作自由”和“无为而治”。

在陆文夫等多位来访作家称赞巴金“提倡讲真话”时，说“我也说过假话”。

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看望患重病的叶圣陶、胡风、周扬、冰心和沈从文。热泪盈眶的周扬“默默地抓住”巴金的手“一小时不放”。

荣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认为“填鸭式教育”后果就是鸭子长肥，最终给人吃掉。主张有理想、有追求和“独立思考”，要在名利、权势和“黄金潮”中“站得稳”。

白云在血与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头都给扔在滚滚油锅里煎了百遍”，眼见人“变”兽、兽“变”人、人又“变”兽的时代，严峻呼吁：“人啊，你们要警惕！”

八十二岁

一月初 因病，在家休养。晚上咳得厉害，人不舒服，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两面翻身，有时睡一个多小时，又会做噩梦惊叫。

一月五日 获悉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宣读了给巴金等老一辈作家的致敬信。在接到《文艺报》记者晓蓉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后，高兴地说完全同意王蒙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话：“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真的到来了！”

一月六日 在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民主选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一月九日 收到美国笔会会长、小说家诺曼·梅勒及其他十四名作家、诗人代表美国笔会中心两千位作家发来的贺电，祝贺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取得成功。

一月约上旬 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云实行“创作自由”，才能“繁荣创作”，“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作家自己的事，应该相信经过社会生活锻炼的中国作家有观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察生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一个好的领导者，可以引导、启发作家，但决不能指令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又明确提出“文艺要无为而治”的主张，认为“重要的是要会‘治’。高明的领导艺术就是善于调动作家自身的积极性。看似‘无为’，实际上是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月十四日 接到苏联作协理事会发来的贺电，祝贺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一月十六日 致信萧乾。云近几年更感到，只有闭门谢绝应酬才能做点事，“最可怕的还是那些来找我题词写字、担任什么名誉职务的客人”；又谢谢萧寄的糖。

一月二十日 致信杨静如。同意杨把多年来自己给她的信编集；又说这次作协代表大会上赞同“作家必须用自己头脑来思维”的祝词很好。

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接唐金海电话，获悉出版《巴金作品评论集》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尚须几张巴金照片，遂同意唐等来訪。

一月二十三日 致信李致。告之“现在就怕开会，更怕开和自己有关的会，无论是批判会或是‘学术讨论会’”。

一月 就唐金海和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中若干史实问

题作眉批。

二月初 收到《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编辑王渝从纽约寄来的信，获悉海外作家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反应强烈；读信中附寄的海外二十四位作家写的《海外的回响：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观感》的剪报，发现海内外作家的想法相差并不远。以此有感，拟作随笔谈谈“创作自由”问题。

二月四日 会见前来上海参加“企业家座谈会”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在广泛地交换了关于文学艺术的若干问题之后，认同刘对文艺现状新成就的评价，同时又为刘针砭的尖锐问题感到不安。

二月五日 上午九时半，在寓所会见前来上海参加“企业家座谈会”的作家陆文夫、刘宾雁、谌容、袁鹰、梁晓声、雷抒雁、茹志鹃、吴强等，以及上海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厚修文、上海铁路分局综合服务公司张黎和沈荣祖等企业家。畅谈中认为“真正的黄金时代是等不来的，还得靠作家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坚信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家；并对梁晓声和雷抒雁说：“中青年作家上来了，这是希望”，但要“虚心”，有“自知之明”，这样就不怕别人提意见了；又坦率对来访者说，“也说过假话”。主张“作家要做自己思想的主

人”，并说在一本书中仅存目录却没印文章的“开天窗”方法“是我向鲁迅先生学的”。谈话对当前理论界的“滞后”和“迟疑”等均感不安。最后摄影留念。同时，又应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慎之约，为《儿童时代》创刊三十五周年题词：“作为一个五十年代的老读者，我祝愿《儿童时代》办得好上加好，在开创新时期儿童文学中作出新的贡献。”

二月六日 致信杨静如。答复杨关于《火》的问题，《火》连载的刊物是《文丛》，《火》中的朝鲜民歌是《阿里郎》；又云编书信集的时候不必每封信后附一篇散文，可以加注。

二月八日 作随笔《“创作自由”——随想录一二六》，载三月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两大“突破”，一是“作家们根据自己的想法挑选‘领导人’”，二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云所谓“创作自由”，就是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认为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传世的杰作，虽然事后会遭受迫害，但他们的作品将会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



巴金 中
在寓所会晤曹
禺 左。

林”。

二月十六日 上午，师陀来访。九时半，又在寓所接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副主任吴志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谢文芬等。获悉《寒夜》已由著名演员孙道临录音完毕，不久将对台湾和上海听众广播。当谈到创作计划时云，不愿意各个报刊都提巴金的名字，“希望大家都忘记我”，以便在家好好写写东西，作家“除了创作外，其他的活动越少越好”。后与来访者合影。

二月十七日 应约为《文艺日记》题词：“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

二月约二十日 得中国作协书记处并机关全体同志写来的新年贺信，“仿佛看见院子里一片灿烂的阳光”。

二月二十六日 致信孟伟

哉。云希望孟在青海创办的《现代人》，“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出人，出作品”。

二月二十七日 作《我仿佛看见一片灿烂的阳光——致中国作协书记处并机关全体同志的信》，载《文艺报》第三期。云：虽然自己是一个衰老的病人，心里却燃着永不熄灭的火，表示愿跟在中青年作家后面“呐喊助威”；清醒地认识到“贯彻‘作协四大’精神，谈何容易”。

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作家白桦及其夫人王蓓，以及稍后来到的作家茹志鹃、评论家李子云。谈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得好”，是有“来自上面”和“下面”的积极因素及对“上面”的“促进”。当茹志鹃和李子云谈到工作上的困难时，表示有时候还需要等待，但“我们的确在进步”，即使“进一步”“退半步”，说明我们还是前进了半步。下午接到

《文艺报》编辑吴泰昌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获悉：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将于六月在北京召开；又悉叶圣陶病危情况已缓解，心中稍安。

二月下旬 晚上看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明知二十年代上海没有这种事，是胡编的，但仍每集必看。

二月 致李致信三封。云寄上《化作泥土》等。

三月四日 致信李致。告之《巴金近作（四）》用何书名由李致决定，嘱为在新疆的萧珊的亲戚购寄一套《巴金选集》等。

三月十一日 会见由上海作协彭新琪陪同前来的著名动画片艺术家万籁鸣。须臾，万籁鸣为巴金剪了两张头像，巴金回赠《真话集》一册。稍顷，曹禺也来寓所。

三月十六日 在寓所会见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林秀清，获悉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筹备组拟请巴金任该会顾问，并请出席三月



二十一日召开的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见到这位萧珊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心中很高兴，托她转告筹备组，愿意成为大家中的一员，但因行走不方便，不能去参加这次会议，愿意给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以精神上的支持。

三月十八日 致信杨静如。

三月二十二日 致信唐琼，嘱他转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打印信一封，云：“凡有付给我的稿费，请径寄：北京八一〇一信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收。备注项请注明稿费，以便查收。”

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乘飞机赴京，出席即将举行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由李小林、李小棠陪同前往。抵京后，第一个电话打给冰心：“大姐，我来了！”

三月二十四日 在北京饭店与前来探望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欢晤，互致问候。下午，会见前来探望的孔罗荪夫妇。

三月二十五日 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开幕式，在主席台就座。

三月二十六日 上午，前往

西郊万寿寺西院，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与代表党中央前来祝贺的胡乔木晤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巴金在讲话中表示，继续愿意为文学馆发展出力，并说“文学馆是个集体事业”，“希望大家出力”。会后约定四月四日上午与该馆负责同志商讨有关“文学馆”的事宜。又见到胡风及其夫人梅志。这是自一九五五年后第一次看见胡风。发现胡风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巴金沉重地说：“看到你这样，我很抱

- ⊖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巴金右 与邓颖超 左 在一起。
- ⊖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巴金 左 探望在医院中的叶圣陶 右 。





⊖ 巴金 左 与女儿李小林 右 探望病中的周扬 中。

⊖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巴金左 在北京看望沈从文 右。



歉。”并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又从与会的作家林林处看到好友丽尼生前的译作《前夜》，俄屠格涅夫著，这是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初版本，曾由丽尼校正后自存，每页上都留有改动的墨迹。翻阅抚摸，谈友人往事。开馆仪式结束后，由夏衍等陪同，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宿舍探望病中的冰心。与挣扎着下床的冰心合影留念。

三月二十七日 上午，前往北京医院探望挚友和老师叶圣

陶，得叶老题签本《叶圣陶散文乙集》，《文艺报》记者山风为二老合影留念；后又到周扬病房探视，见周扬默默地抓住自己的手“一小时不放”，遂安慰热泪盈眶的周扬：“有信心就行，慢慢坚持下去，身体会好的。……春天来了，你的身体会好的。”又让李小林代打电话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约定明日探访。沈夫人担心电梯有时停开，在电话中婉言劝阻。巴金嘱李小林传话，非去不可，没有电梯，拄着拐杖也要登楼访友。

三月二十八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下车后，由吴泰昌、李小林、李小棠陪同，迎着五六级大风，步行二百多米，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教工宿舍五楼，探望病中的挚友沈从文。见沈脸浮肿，因假牙未装，又因病体衰弱，讲话听不清楚。知道了沈从文的实际生活状况后，巴金百感交集。在堆满书的小屋里，病中的沈从文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热情地拉着巴金的手，说长道短了，巴金有一肚子话要说，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喉咙。往事袭上心



头，忆及三十年代中期，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沈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写了《边城》。巴金沉吟半晌，喃喃地说：“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三月二十九日 上午，出席并主持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会议进行时，见胡风由女儿陪同坐在对面的桌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会议快要告一段落时，胡风父女俩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感觉有多少话要讲，更没有想到，这就是两人

见到的最后一面”。下午，在北京饭店会见黎丁、姜德明等，谈及目前出版界对出版纯文艺作品不感兴趣的现状，表示忧虑和不满。

三月三十日

作随笔《“再认识托尔斯泰”——随想录一二七》，载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叙述托尔斯泰始终坚持与教会斗争，用艺术“严肃地探索人生……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一生充满了矛盾”，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同时，对近来一篇攻击托尔斯泰是“俄罗斯西门庆”的文章予以痛斥；认为托尔斯泰始终追求言行的一致，为此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说虽“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而托翁毕



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七年的列

竟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因而决心在今天“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晚七时半，在北京饭店会见作家刘宾雁，赠《病中集》、《探索集》、《真话集》。

三月三十一日 晚，在北京

巴金 中 主持
中国作协四届二次
会议。左为张光
年，右为王蒙。



饭店会见女作家张洁。

四月二日 在住所会见林宁，谈了很久。林宁为与这位三十年代“敬爱的先生”“半个世纪的友谊在彼此心中始终没有泯灭”而感动。又致信李致。嘱十天左右去上海的李致设法代买两套平装十卷本《巴金选集》。

四月四日 上午，由李小林陪同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商谈有关馆藏之事。建议把文学馆办成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又捐赠一笔稿费，并同意筹划迁馆事宜，同意对外征集资金。在北京饭店会见好友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欣接沈从文派人送来的一束鲜花。

四月五日 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录像活动。事毕后又专程访问冰心。

四月六日 在北京饭店会见孔罗荪夫妇。

四月七日 在北京饭店会见女作家张洁。

四月八日 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副主席杨静仁、程子华、胡子昂等共同主持政协六届会议闭幕式。

四月九日 晚九时，观看电视新闻《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由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播出。

四月十日 离京返沪，中午抵达上海，市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等有关领导前往机场迎

接。上海电视台记者前往虹桥机场采访。录像后，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我本来以为自己身体很坏，现在看来我身体还好，还能为国家做事，我很高兴。”

四月十二日 嘱儿子李小棠打长途电话给冰心，询问病情。

四月中下旬 腹泻、发烧。回到上海没几天就仿佛生了一场

巴金荣获的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的证书。



大病，全身无力，讲话上气不接下气，最烦恼的是写字手指不听指挥。

四月二十日 在《文艺报》改版试刊号发表短论《少发空言，多做实事》。对文学创作“攀高峰”和“评奖活动”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作家应该少发空言，多做实事”，“现在空话还是太多”，作家写的作品，由读者评论；评奖要“实事求是”、“要严、要精”，“不要照顾”。

四月二十三日 接王元化电话，获悉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常宗豪、代理主任邓仕梁来沪，遂同意下午在寓所会见常宗豪、邓仕梁和辛笛、柯灵等。

四月二十六日 看《文汇报》，获悉挚友曹禺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四月二十七日 在寓所会见应中国笔会中心的邀请来华访问

的日本著名评论家尾崎秀树。交谈中，获悉尾崎秀树此行是搜集其兄即同鲁迅和“左联”曾有交往后被日本政府杀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朝日新闻社驻上海分社主任尾崎秀实在华活动的资料，准备写一部长篇回忆录。

四月下旬 接到经《少年报》通过作协上海分会转来的信，信是无锡市惠山脚下无锡县钱桥乡中心小学十个五年级学生写来的。获悉这十个“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的孩子，都是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三好”或“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在一切向钱看的现实中，感到苦闷，孤独，成了“迷途的羔羊”，相信“巴金爷爷”“有打开我们心灵窗户的神秘钥匙”，能帮助他们“寻找理想”，因而来信“呼救”。

四月 整理家藏书刊，第四次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文学资料二十九件。

五月初 整理外文图书，准备赠送中国现代文学馆。

五月五日 致无锡县钱桥乡中心小学俞奕信。云身体很不好，写字很困难。倘使能把回信写出来，就会寄去，请“耐心等待”。

五月六日 在寓所会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廖全京等，婉言谢绝参加五月下旬在成都举行的“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

会”的邀请，并云：我写了几十年，写了不少书，有几部读者批准了；但是，现在又老又病，我还要争取时间多写；你们应该多讨论他们几个人的作品。

五月十五日 荣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获悉，不久将在北京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面交的名誉院士的徽章和证书。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团体，至今已接受了七十五名名誉外国院士。这次与巴金一起被授予该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的还有四位世界知名学者、专家。

五月十八日 会见唐金海、张晓云，就巴金的笔名和作品的辨正、作品的思想倾向、作家信仰和理想的内涵，以及《巴金年谱》的撰写作答问。云：“只要是我写的，都可记载。写年谱是个艰苦的劳动，有些事我自己也

忘记了；现在也到了我自己作一生总结的时候了。”

五月十九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来自云南前线的指战员聂勋材、画家王仲清、雕塑家曾路夫等。云抗美援朝过去几十年了，还思念“可爱的战士”，“我的心还同他们跳在一起”；表示还要向战士们学习，像春蚕一样，还想多写一点东西。后赠送《病中集》。

五月约中旬 听外孙女端端因小学功课太重，而自言自语地说“活下去真没劲”后，“不觉大吃一惊”，感到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认为应当让儿童有时间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子了。”

五月二十四日 在寓所会见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和陪同前来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分



巴金 左 会见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右。

会副会长、剧作家杜宣。赞扬中国青年作家队伍，坚信“这个时代是出大作家的时候”。赠韩素音《随想录》、《真话集》、《探索集》、《病中集》和《创作回忆录》。

五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再说端端——随想录一二八》，载六月十一至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教学“用‘饲料’填鸭”，其结果“只是为了让鸭子快快长肥给人吃掉”，因此，培养孩子必须与“‘填鸭式教育’决裂”，应该引导、启发，使他们善于开动脑筋，学会自己思考问题。指出教育不能再走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老路；最后叙述自己在十年“文革”中被“强迫”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背诵、死记“一连串的指示”的情景。

五月二十八日 应聘为“南高”、“东大”、“中大”暨附中校友会名誉会长。

五月下旬 在寓所会见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顾问魏绍昌，谈成都故居变迁的情况。又接到无锡县钱桥乡中心小学十个孩子的来信、照片和《我把秘密告诉你》等五首诗。

六月初 病中提笔给无锡“寻找理想”的十个孩子复信，信较长，因体力不支，时作时辍。

六月七日 下午四时，在寓

所会见香港旅沪学生伍美琴等十人。伍等用粤语演唱《一点烛光》。当听到“盼可将烛火给我，让我也放光芒……心中似暖流，和风对抗”时，颇为激动。最后与伍等合影留念，并赠近作三册。

六月十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魏绍昌和巴金研究者张挺，获悉一部分中青年巴金研究者发起，将于明年后因故推迟在浙江嘉兴举行巴金创作讨论会。又将自己珍藏的《家》修改本赠给正撰写《巴金家修改研究》的龚明德。

六月上旬 获悉胡风于八日病逝，遂打电报托人在他灵前献花圈，心中难过，觉得“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胡风追悼会因故推迟到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

六月二十五日 作完随笔《“寻找理想”——随想录一二九》，载七月十六至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系对无锡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复信。斥责当前因金钱诱惑而贩卖假药和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的坏风气，指出这是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认为，理想就是“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是“集体的幸福和繁荣”。而个人是“一小滴水”“一粒泥沙”；因此，只要“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

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就不会“迷途”，就会在“拜金热和黄金潮”面前“站得稳”，指出，“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不停止追求”，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约六月 《再说端端》发表后，接《新民晚报》朋友信，拟转载该文。考虑到“晚报刊出，读者很多，会使端端感到大的压力，她不愿意我谈她的缺点”。遂回信婉言谢绝转载。

七月十四日 作随笔《“从心所欲”——随想录一三〇》，载二十四至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八十岁后想做什么的事；又想忘掉一切，又想到将来会出现的评论、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种种流言蜚语，再也不能沉默；“在血和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头都给扔在滚滚油锅里煎了百遍”，又看到“当时有一些人变成猛兽，后来又还原为‘人’，而且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但现在“那些还原为人的‘人’在‘不正之风’越刮越厉害的时候却又变成了猛兽”；因此“我提倡讲真话”，为不让“文革”的悲剧再发生尽点力；为了眼睛一闭后令人留恋的“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牢牢记住这样一句名言：‘人啊，你们要警惕！’”

七月十七日 致无锡县钱桥



乡中心小学俞奕等十个小朋友信。云，本想把回信“抄一遍再寄”，因写字实在吃力，又拖了三个星期还开不了头，现在只好把草稿寄上；信中写的“是我的心里话，不一定对，只能供你们参考”。

八月六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日本文化、社会活动家访华团团长古川万太郎、副团长丰田正子。回忆二十几年的友情，为五年前访日时，丰田正子宣读《文学生活五十年》演讲稿一事表示感谢。接受日本朋友赠送的新作，回赠精装本《家》、《春》、《秋》。

八月上旬 会见《文艺报》记者，指出从事文学事业要有高尚的精神，“绝不能把文学事业办成一个单纯赚钱的事业！如果只想怎样赚钱，这个事业就要被毁掉”。

八月十四日 为在龙华火葬场举行的上海政协副主席、著名神经解剖学专家卢于道追悼会赠送花圈。

八月 作随笔《卖真货——随想一三一》，连载于九月十三、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有感于有些人因为“级别高”、“是官”，所以“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话”，都“永远正确”。而“贩卖他们的话”的人，会被当做“靶子”。认为好些年来，“假话多

于真话”，有些人“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指出讲真话需要“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精神”；针对现在不仅讲假话，还制造“假酒”、“假药”，呼吁必须“卖真货”。

九月五日 读萧乾散文《改正之后》和《猫案真相》。为萧受的苦而不平。

九月六日 致信萧乾。云不必为“猫案”“辩护”，“有时器量大总比器量小好”，认为萧有才华，但“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要更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又云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沈从文、曹禺和萧乾三个才华超过自己若干倍。

九月十日 作随笔《再说知识分子——随想录一三二》，连载于十月六至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过去写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而受罪，他们度过了漫长的、可怕的“寒夜”；后来，黑暗过去了，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十年浩劫中，又出现了“焚书坑儒”、“文字大狱”、“个人迷信”等，就是因为“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最后表示要继续“奉献我的知识”，因为“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的人民”。

九月十三日 致信卞之琳。云人老了，又有病，近两年写信极少。“可是思想的活动不会停

止”。

九月二十六日 致信石上韶。告之成都张耀堂绘制的《巴金故居复原略图》“有一些根据，但不完全对，只可作参考用”；并云在复印稿上加了一点说明。

九月二十八日 致信杨静如。表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的是我们国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事业；告之四川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自己的书信集，“派人来找我，我……托济生代我回答，说是可以”；认为“人写信，如果想到要在自己生前发表，那就只会贩卖一些‘大路货’，连牢骚也不敢发了，有什么意思”。

九月 第五次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文学资料六千五百四十件。

十月二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市委副书记和市长江泽民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维明、丁锡满等。江泽民等询问巴金健康状况，并祝愿他率领文学大军团结前进。

十月十五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上海广播电视局、上海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厅、四川电视台的负责人和部分编导。获悉《激流三部曲》将由上海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改编成二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家》为十集、《春》和《秋》各为五集。希望这部连续剧多一点地方色彩，要

符合当时的时代特点。晚，在寓所会见《解放日报》记者毛用雄、吴芝麟，谈与无锡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通信的经过，并对孩子的成长表示挂念。

十月十七日 从《解放日报》上读到记者毛用雄、吴芝麟的报道《“巴金爷爷，我们向您汇报”》。

十月十八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谢·米哈尔科夫和作家叶甫图申科等。他们是时隔二十多年后首次访华的苏联作家。米哈尔科夫赞扬巴金在发展中国文学、翻译俄国和苏联文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巴金相信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会越来越发展。当提到早年翻译的高尔基的《伊则吉尔老婆子》时，巴金深情地说：“我敬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

巴金小说外文译本书影。



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赠高尔基、屠格涅夫等人的六部中文译作集和《随想录》；同时，接受由谢·米哈尔科夫作词的苏联国歌歌本。傍晚，收到无锡来的电报，获悉钱桥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要来访问，感到“不安”，既担心孩子们“耽误学习”，也担心报纸上宣传之后，“孩子们搞起形式主义的东西来”。

十月十九日 下午，在寓所

会见十个“寻找理想”孩子的代表田玲、俞奕、宅海红、刘如岗。在接受他们赠送的鲜花、老寿星、丝绒画，系上他们献赠的红领巾后，云：“你们这一代人更有希望”，现在需要踏实地学习，踏实地工作，多做一点，少说一点；照自己的理想去做，“言行一致”。又云：“表面上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不喜欢，要做些实在的事情”。当听完孩子们为他演唱的歌曲《小草》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江泽民 左一 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 右二 看望巴金 左二。右一为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后，带头鼓掌，并签名赠送十本《童年的回忆》和一件精巧的陶瓷卧牛。

十一月八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乔石、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等，对他们的问候和关切表示感谢。

十二月上旬 为中国第一份盲童文学刊物《中国盲童文学》创刊号写信作文，表示相信刊物会办得成功。我们的社会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刊物。被聘为《中国盲童文学》和《故事·小说·童话》的顾问。

十二月十日 晚，在寓所会见雪天来访的日本表演艺术家杉村春子和她率领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成员佐藤纯子和横川健，中国剧作家杜宣也在座。获悉话剧《家》在日本演出成功，又回忆当年在东京青年会时观看曹禺的话剧《雷雨》的情景。

十二月十四日 在上海的北京饭店会见女作家杨沫。

十二月十七日 作《致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贺信》，指出“‘茅盾文学奖’是我国的文学大奖，国内外都很重视”，希

望通过评奖，使今后的长篇小说创作更加繁荣。

十二月中旬 决定继续撰写《随想录》。自云三个多月没有写“随想”了，原因仍然是写字困难，杂事不少。几位老朋友以为我要搁笔，担心我心上那点余烬已经冷却，也有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找不到题目’”。自云“从来不‘找题目’做文章，只是有话才说，但我也有避开摆在面前的题目不声不响的时候”；因病经常心烦意乱、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题目讲不清楚，不如不写；但为了表示火种犹在，我又带病执笔，“无论如何我总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随想’的计划”。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再说“创作自由”——随想录一三三》，连载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六至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自云解放前写作“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但那时“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又说，后来“我自己的脑子里设置了不少框框条条，到处堆放石子，弄得举步艰难”。认为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

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石上韶。准备明年上半年内“写完第一百五十篇，结束《随想录》”。

十二月底

在寓所会见李存光。

阅香港朋友寄来的刊物《良友》后复信。谈读《良友》一些文章的想法：“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文革”“正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中国确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人“做过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绝不能靠祖宗的遗产过日子”。

赠年历给卢剑波。据卢剑波述，解放后，巴金每年年底寄赠年历给卢。有时巴金忘记了，卢写信去要。



愿意自己的作品“同我一起消亡”，“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因不愿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白云还不是完全的言行一致的人。

“样板戏”在心上烙下了可怕的、抹不掉的火印。

回忆深爱自己的大哥和三哥，因“没有钱”过早死去，而后来当自己有钱可以帮助他们时，却没有机会了。边忆述，边两次痛哭，泣不成声。

为了子孙后代牢记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悲剧不再重演，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认为现在仍要继续发扬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年过花甲时，还坚持洗冷水澡”，“现在不行了”。表示“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以后，只要有我的一两本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

自省自己的被宗教迷信“改造”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到了“文革”十年自己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做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认为“划时代的巨著”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而是“作家和人民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

八十三岁



一月十日 作随笔《全集 自序——随想录一三四》，载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被友人王树基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说服，“答应出版全集”，但精神上“感到压力”，不愿让作品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只愿让全部作品“同我一起消亡”，“化为灰烬，化作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

巴金在家中。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读者忘记”，但作品发表后不再属于作家个人，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自云写作一生“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但“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又云《全集》中的文章会“前后矛盾”，“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一月上旬 接待《中国新闻》记者，表示从今年开始，一、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二、不再为别人题词和写字；三、不会客访友，要闭门写作，但“少数极熟的朋友来谈天是例外”。

一月约上旬 获悉已逝世半年的胡风，几经周折，终于得到较公正的评价，并将于十五日在北京举行追悼会。遂再次请人代为赠送花圈。

一月十一日 惊悉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挚友胡愈之病逝于北京，深感“失去了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

一月二十日 作随笔《四谈骗子——随想录一三五》，载二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骗子”不会自行消亡，现在，“到处都为他们大开绿灯”；他们像“老鼠”、“白

蚁”，啃我们社会的高楼大厦，蛀我们社会的梁木支柱，“已经到了人民与骗子不两立的时候了；呼吁那些“一贯正确的人”，该“睁开眼睛”了。

一月约二十二日 收到挚友卫惠林的小女儿卫缙云从纽约寄来的信，惊悉这位想回国长期工作的女建筑设计师身患晚期癌症。读着信，热泪盈眶。被信中提到愿做“一种沙漠中的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尺，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的话语深深打动。

一月二十五日 作书信《答卫缙云——随想录一三六》，载二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为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的卫缙云，“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又不幸身患癌症而“难过”，又为她在希望濒于破灭之际，还在挣扎，争取生命的延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理想……事业”而“感动”；赞美这种精神是“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生命的花”。自云这样的生命的花是“我追求了一生却始终不曾得到的”；鼓励她用“对祖国、对事业的爱”，去“创造奇迹”。

约一月 拟作《怀念胡风》。胡风逝世半年，“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

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不吐出来感到透不过气来”。

二月八日 旧历除夕，观看电视迎春晚会节目，当听到所谓“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时，就记起一个把知识当做罪恶的时代。“那难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眼前出现了”。以后“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梦见“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牛棚里交代自己的罪行”和“背诵‘最高指示’”，醒后，一身冷汗。“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

二月约上旬 获悉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等犯有“强奸”和“流氓”罪，已引起社会公愤，定于十九日“依法枪决”。

二月约中旬 读各报关于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强奸、流氓犯罪行为的报道，感到“年轻犯人的精神境界”“一片漆黑”，与古代高衙内等“精神状态”一样，“残忍、贪婪、破坏、毁灭、发泄兽欲、占有一切、以损害别人为乐”，为了寻找古今“衙内”出现的原因，重看《水浒》。

二月十七日 致信萧乾。云“旧信处理”，应“受到宪法保护”，“在私人通信中谈些私事，谈些个人感情。写信人同受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上讲话。

信人都有权不让第三者知道，不让别人拿去公开”。

二月二十二日 作随笔《可怕的现实主义——随想录一三七》，载三月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两个作恶多端的高干子弟被处以死刑，联想到几百年前施耐庵笔下的“衙内”形象，感到“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

二月二十三日 作随笔《衙内——随想录一三八》，载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高衙内、杨衙内以及各式各样的衙内都是旧中国封建主义的土特产，因此要搞好清洁卫生，还是要大反封建主义”。

二月二十五日 作随笔《“牛棚”——随想录一三九》，载三月十三日香港《大公

报·大公园》。不同意一位朋友说陈小蒙等“衙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仍“心有余悸”。

二月 得成都老友卢剑波信和电报，获悉卢妻邓天霁去世。

三月五日 获悉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北京病逝，遂托人在十五日举行的丁玲遗体告别仪式上代送花圈。

三月七日 获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北京病逝，遂托人在十七日举行的朱光潜遗体告别仪式上代送花圈。

三月十四日 致信萧乾。云办文学馆，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三月二十二日 致信吕鸣亚。随信寄上“旧照片”。

三月二十六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上讲话。

四月一日 作随笔《纪念——随想录一四〇》，载十三至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传闻有人见电视台连续播放“样板戏”就“连连鼓掌”。甚至“有人再想搞一次‘文革’”；为了“对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负责，呼吁“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四月九日 接唐金海信。获悉由北京、四川、上海的巴金研究者发起，拟召开首届国际“巴金学术研讨会”。后因经费问题而推迟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召开。

四月十日 致唐金海信。云“并不希望你们开那样的会。当然我的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归我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个人所有，……读者有权批判它们，我不能干涉，也不能反对，因此我也不想阻止你们开会研究”；又云“我这个人并不完全否定自己，我并不认为自己白白地活了几十年，然而经过一番‘独立思考’，我又觉得自己在文学上并无什么值得提说的成就”；同时表示“有病”，“不能参加会”，并希望会议“规模小一点”。

四月十五日 在寓所会见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

四月十六日 在寓所会见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表示“总想为国家出点力”。认为中国人是崇尚实事求是的，愿多做一点实事，每天写一点东西。宾主合影留念。

四月十九日 接唐金海信。欣慰对方尊重自己十日信中的意见。

四月二十日 致信唐金海。云如“愿意将我的意见转告北京和四川的同志，我很感谢”。后又获悉，云已与北京、上海、成都、南京、广州几位巴金研究者“通了气”。

四月二十五日 致信卢剑波。云“一天写不了几百字”，忆及“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天祥里第一次看见天裔”以及“六〇年到六一年我回川，住在学道街”，邓天裔“来找过我”的往事；劝慰卢“要节哀，要想得

开”，这样“才能多活。活下去总可以做点事情”，自云“写字实在吃力，希望‘一个字就请当一千字看’”。

五月二日 接待出差抵沪的侄儿李致，就大哥留下的四封信，回答了若干问题，并同意录音。巴金在谈话中，有两次痛哭失声，感情不能自己地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个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希望过什么好的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了……”

五月三日 作随笔《我与开明——随想录一四一》，载十三至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创作生涯中与开明书店结下的友谊，表达了对主任编辑夏丏尊以及编辑索非、顾均正和书店老板章锡琛的感激之情。在回顾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后，表示始终相信未来。

五月十五日 作随笔《我的责任编辑——随想录一四二》，载六月五至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称自己文学创作生涯中结识的几位编辑叶圣陶、胡愈之等不仅是自己“作品”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

五月二十二日 在寓所会见泉州黎明大学教师、《怀念集》主编蒋刚。谈叙了一个多小时，并和他合拍了彩照。

五月二十八日 作随笔《“样板戏”——随想录一四三》，载十五至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从春节电视节目中听了“样板戏”唱段，到回忆“文革”期间被迫“学唱”“样板戏”受到的“奇耻大辱”；忆苦思今，“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提醒人们：“‘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五月下旬 致信严克炎。严克炎是无锡县钱桥乡中心小学教师，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班主任。云：上学念书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取得知识懂得社会、懂得世界、懂得周围的人和事；“还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要把书本、知识、生活连在一起，把学习和做人连在一起”。

五月 会见作家鲍昌。认为当今中国文坛团结和谐的形势很好。

六月九日 作随笔《官气——随想录一四四》，载九月一至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鉴于“‘文革’之后”，“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使人感到“压力”，“觉得透不过

气来”，因而“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

六月十五日 在寓所接待从西欧访问归来的青年女作家，获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城镇中，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创办了“中国‘文革’展览会”。联想到中国的十年“文革”。遂作随笔《“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原题为《“文革”博物馆当建立》，因故初载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后载八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云“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为了不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下午，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上海校友联谊会成立会上，被聘为名誉理事长。

六月十九日 作随笔《二十年前——随想录一四六》，载九月三至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

园》。回忆后半生中一件大事——“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指出要记住过去的教训，才不怕上当，重申“创办‘文革’博物馆”的主张。

六月 作随笔《怀念非英兄——随想录一四七》，载九月八至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回忆三十年代与泉州黎明中学教师叶非英的友谊，叙述叶解放后被错划为右派、殁死劳教场，现经朋友奔走得以平反昭雪的坎坷经历。

七月中旬 会见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认为“坚持对外开放”，宽松、融洽的气氛，是政局稳定的一个表现；认为“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批有思想、有才气、有希望的作家。大作品与大作家就有可能从其中诞生；认为经济开放了，文化不可能不开放，这也是必然趋势。在讨论“上海没出什么‘大作品’”，“上海作家写的作品是不是‘又多又快，不好不坏’”等问题时，表示：“写大作品，要有条件。主要是作家要有那样的经历。我总认为：中国不存在作家队伍‘后继无人’的问题。因为，中国这几十年的生活、斗争，本身培养了文学界的一代新人。”“他们有可能写出大作品，又认为‘要紧的是要严肃、认真对待文学创作’”。

七月二十六日 致信龚明

德。云对龚辑注并任责编的《巴金书简 初编》中有的信件“作了些删节”，因为以前写信议论过事，并不都是自己对，有时也不愿多伤害别人，“估计五年后可出全集本书信集，那时我大概闭上了眼睛，不需要作删节了”；并选了致叶圣陶信一件和致杨静如信的七封复印件寄龚。

七月 见一年多来放弃休息、放弃娱乐的外孙女不能升入重点中学，“挨了妈妈一顿骂”，替她感到委屈；认为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干实事的是他们”。遂作随笔《三说端端——随想录一四八》，载九月十六至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认为教学方法不应该“灌输和死记”，要培养学生“肯动脑筋、会动脑筋”，而培养好的学生，都要靠好的老师。

七月二十九日 作随笔《老化——随想录一四九》，载九月十九至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针对香港《良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上有人撰文否定五四的观点，明确表示：“我是‘五四’的儿子”。充分肯定五四后几代青年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献了自己的热血，提出要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避免“老化”，一定要继续发扬五四提倡“科学”和“民主”的精



神。又作《无题集 后记》，载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自述晚年所作的“随想”，并非消遣或装饰自己之作，而是“一字一字拼凑起来的”“一生的收支总账”，是向读者“告别”的“真话的书”。

和她的丈夫祝鸿生专程到福建泉州拜访黎明学园和黎明大学师生。

八月二十日 作完随笔《怀念胡风——随想录一五〇》，载九月二十至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动情地回忆半个

闻社记者谷苇，告之《随想录》第五集已完成，拟休养一个时期，并云“实在没有精力”进行小说创作了，另外“有些想在小说中说的话，已经在《随想录》的文章中说了”。表示“怀着感激的心”向读者“告别”。

八月下旬 获悉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任白戈病逝于成都，遂托人在九月六日举行的追悼会上代赠花圈。

八月三十日 致信李致。告之因无精力改稿，《巴金译文集》的出版，到明后再考虑；嘱《憩园》稿费代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等。

八月 致函香港及国外一些出版社，请把自己应得的全部稿酬，直接寄往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建馆基金。

九月七日 又一次就唐金海信中提出的有关《巴金年谱》的若干问题作眉批。

九月十一日 致泉州黎明学园教师蒋天化等人信。云“想念你们”。并赞扬黎明师生“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又云最近还要送一批书给黎明。

九月十二日 在寓所会见上海书店几位经理、《文艺日记》编者丁景唐和《新民晚报》记者朱伟伦，接受书店代购的一些旧书和《文艺日记》的样书。

九月约十六日 在寓所会见冒雨前来的上海武警战士，接受



一九八六年夏巴金左与李小棠右在家中。巴金在写作，李小棠在看书。拍摄此照的李舒为本摄影作品命名为“父与子”。

八月七日 任现代著名作家梅林治丧委员会主任。

八月上旬 会见《文艺报》记者时，云“评奖活动不宜太多”，多了，“容易造成‘平均主义’”，认为“现在，还是要提倡作家为理想而写作”。

八月中旬 委托女儿李小林

世纪前与胡风的友谊，为胡风因冤案“由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感到愤懑；同时，对当时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被迫”作出的“违心之论”，表示“不能宽恕自己”。

八月二十一日 会见中国新

- ① 一九八六年九月巴金在寓所。 车新民摄
- ② 巴金 右 与黄源 左 合影于杭州鲁迅铜像前。
- ③ 巴金在鲁迅铜像前。



他们赠送的镶金字的镜框和中秋月饼。云年过花甲时，还坚持洗冷水澡，“如今感到不行了”，原打算写十三本随笔，现在只写了七本；认为“中国人是崇尚办实事的，作家就是要写出作品来”。

九月十七日 致信唐金海。约唐金海、张晓云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钟到寓所来，云交谈一个小时大概能够支持。

九月二十一日 电话通知黎明中学校友李秋叶，请他前来整理赠送黎明学园的书籍。

九月二十二日

在寓所接待李秋叶父子，将赠黎明学园的五百〇一本“质量很高”的书籍取走，并请他们负责将书托运至黎明学园。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唐金海、张晓云，就有关生平、创作、思想、文艺观等若干史实和理论，以及近年来文艺创作等问题作了亲切交谈，并同意唐金海在会客室、楼上工作室、太阳间和花园草坪等处摄影留念。

九月二十八日 口述并由马小弥代笔致信唐金海。告之解放前照片，少数的几张，已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以后找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到有关的照片”再寄去；并告《西班牙的曙光》（画册）和《薇娜》，“过两天找出来再寄”。

九月 会见日本著名电影演员吉永小百合。又应苏叔迁等老编辑约请，参加“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并出席“长宁幼儿园暨托儿所”幼儿入学开学典礼。作为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支持这一自筹资金开办的儿童福利事业；不久又为该幼儿园捐赠一笔钱，并为孩子们的影集题写“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

十月六日 傍晚，乘三一一一次列车抵杭州，在杭休养了十天。

十月约十六日 离杭返沪。

十月约中旬

偕黄源等专程上孤山麓草

坪，拜谒即将揭幕的鲁迅铜像。

返沪后获悉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世界语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震铎先生病逝，嘱人在二十三日举行的追悼会上赠送花圈。

十月二十一日 下午，会见刚从绍兴参加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回上海的周海婴。接受周赠送的泥塑“阿Q”和绍兴特产梅干菜。又悉日前自己偕黄源、萧军等倡议用群众集资的办法在绍兴建造鲁迅铜像之事已落实，绍兴拟成立“鲁迅铜像筹建委员会”。宾主交谈中，巴金一边抽烟，一边思索后，严肃地说：应当有“‘文革’博物馆”，以教育后人。后《文汇报》记者王聪摄影留念。

十月二十二日 致信龚明

德。云对书信集中致余思牧部分“原信我没有作什么改动”。只“改正”和“删去”一些余思牧注释中“弄错”和“似无必要”的地方。

十月二十九日 致信张挺。回答张来信中的问题云至今未读过日本近代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和《春》；云从法国回来后只读了一部岛崎藤村作、徐祖正译《新生》，又云写小说时并未想到岛崎氏的作品。

十月 致李致信三封。云“编写《随想录》太疲劳，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表示“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不修复旧宅”，认为自己只有极少数作品可以流传，以后，只要有我的一两本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巴金在寓所接待车新民并观其所摄照片。车新民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巴金
右二 与胞弟李济生 左一、九妹李琼如 左二、十二妹李瑞珏 右一 合影。

就不会熄灭”；“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请李致出力帮助吕千遗孀任培伯为吕千落实政策平反等。

十一月上旬 告诉上海作家协会，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三日在上海金山宾馆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国际讨论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成都市园林局副局长刘德宽、百花潭公园主任曾润福，以及《成都晚报》记者刘蓉等。获悉拟在位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附近的成都市百花潭公园修建“慧园”，系据《家》、《春》、《秋》中描绘的房舍、园林加工修建。一九八

四年下半年列入基建项目，多次征求沙汀、艾芜和李致等意见；一九八五年五月，按成都市园林局设计室工程师宋梅仪、荣嘉华提供的图纸，制作模型。该园分别由市宗教协会和市财政局集资或无息贷款计一百二十万元，占地面积二十六点五亩。“慧园”，即喻巴金及其作品给人以智慧，又喻此即《家》中主人公觉慧之“家”，并与家人观看“慧园”模型的照片和有关资料、环境的录像。高兴地说，“这是园林工人的创造，弥补了小说的不足”，表示如健康状况允许，“慧园”建成后，“很想回成都看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 接受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赠送的花篮，与家人团聚，愉快地度过了八十三岁的生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芮说：“您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是一代精英，无论如何要保重。”巴金云：“你们工作很忙。上海积累下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前景光明，问题不少。”

十一月 《随想录》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当代中国文坛”专栏节目中对台播出。

十二月三日 下午三时起，在寓所先后会见日本著名画家东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山魁夷、著名戏剧家千田是也、著名女演员栗原小卷等。感谢对方把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介绍到中国来，“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一件大好事”。

十二月五日 作《给李济生的信 代跋》，载《巴金六十年文选》。云从不愿到勉强同意出这本书的情况，着重谈选入书中的旧作《法斯特的悲剧》的组稿、写作、被批判和自己检讨的过程，自责“为了保全自己，……只好多说假话”；并云“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做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十二月十日 被《上海文化年鉴》、《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等十九家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评选为上海文化新闻人物、为中外文学界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人士，名字将被载入一九八六年年鉴。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及《文汇报》记

者刘飞彩等。希望他们“把人道主义的宣传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十二月十三日 在寓所会见李秋叶。获悉蒋天化、盛子诒等人筹办黎明学园及民生校庆的经过。认为泉州朋友具有已故友人叶非英型的苦干精神。

十二月十五日 应邀担任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的名誉顾问。

十二月十八日 致信嘉兴一中教师朱金生。告之自己的高祖李介庵是从嘉兴到的四川，至今已五代；自己一九二三年从四川出来，当年两次到嘉兴，住在一位伯祖家中。并告之“在塘汇有一间‘李家祠堂’”。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李致。云健康情况并无好转等。

十二月三十一日 转请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邵华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开幕式上，代为宣读《致青年作家》的贺信。此贺信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载《文艺报》。云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都是为了寻找一个机会接近人民；认为“划时代的巨著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

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同时鼓励青年作家，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眼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

十二月

获悉《随想录》中“是爱、是火、是希望”等话语，成为青年作家张辛欣主持的电视大型文学晚会《我们与你们》的主旋律。该晚会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冰心、王蒙等知名作家将于三十日晚，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晚会。

出版亲自审定全部选目和书名的《巴金六十年文选》，李济生、李小林具体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收一九二七至一九八六年六十年间的部分有代表性的随想录、杂感、散文和书信等。其中杂感大多数是第一次结集，书信也是第一次收录。



审读《巴金全集》。

在一封给冰心的信中云：一想到知识分子，就会想到“作揖摇尾”的小狗“包弟”，最后仍被“送进解剖室”。

赞“文革”中被“逼”自杀身亡的老舍、傅雷等“有骨气”。

自评《死去的太阳》、《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

在胞弟李济生、女儿李小林陪同下，又回故乡；并弯腰久久地吮吸着百花潭公园内泥土和幽兰的清香。自知年迈体衰，以此行“向故乡告别”。

八十四岁

一月五日 下午二时，出席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巴金与中国文化报告会——庆祝 巴金六十年文选 出版、巴金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年纪念会》，柯灵作了《巴金和我们在一起》的发言，高度评价了《巴金六十年文选》。

一月六日 在寓所接见三名来自云南老山前线“小草”诗社的战士，巴金曾在“小草”诗社成立时亲笔题词。巴金接受了他们赠送的军服、纪念章、用弹壳制作的和平鸽和拐杖，回赠了一些书，并在纪念册上亲笔题词：“永远记住你们。”

一月八日 致信潘际¹。告之近况，托代购港版《随想录》四十册等。

一月十一日 致信孙之龙。告之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能为葡文《家》写序了。

一月十五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了上海市政协主席李国豪、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接受了他们的新春祝福，表示感谢，并谈到病情得到控制，身体较好。双方还谈到关于一国两制、开展海外联系等问题。

一月十八日 致信李致。告之身体不好，觉得疲劳和记忆力衰退，想到孔子说的“朽木不可雕也”，顿觉“有点毛骨悚然”。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一月 致季涤尘信二封。告之托赵丽宏带来的书收到了，有书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屠岸和孟伟哉；将这次《随想录》稿费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等。

二月三日 致信侯志平。告之《中国报道》侯副社长，因身体不好，需要的稿子无法交卷。

二月五日 致信王仰晨。表示《无题集》出版后，总算又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从此可以搁笔好好地休息，认真地思考了。

二月十九日 致信刘麟。告之托人将冰心和李健吾的旧信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二月二十一日 致信季涤尘。请代为查询购书事宜。

二月二十五日 致信姜德明。同意转载以前写的书刊广

告，请姜代将《十年一梦》稿费捐赠文学馆。

二月二十八日 致信赵慕英。告之外文出版社副编审赵慕英，同意该社“请士俊同志翻译《寒夜》”。

三月一日 致信冰心。告之写完《随想录》后准备搁笔，似乎一身轻松，“但想到一些人和一些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邀请冰心到上海小住。

三月十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巴金全集》前十多卷问题不大，但“编下去就会遇到困难，还有日记、书信等等，我也不想在我生前看见它们印出发卖”。请王仰晨将这次的稿费代为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三月十二日 致信李采臣。

同意李采臣所在的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怀念集》，并出增订本。嘱稿费仍汇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三月十四日 致信季涤尘。同意季涤尘选自己的文章编集子。

三月十六日 表示同意让李济生编辑书信集，但因为“我还活着，书信集不妨慢慢地出”。

三月二十日 致信马小弥，告之：“你要什么书只管讲，能给就给，不能给就不能给，反正我的书物一切归公。”

三月二十四日 致信李采臣。告之寄上《怀念集》的《代跋》手稿；嘱购三十本新版《怀念集》，余下稿费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一九八七年巴金为
向国家图书馆捐书在整
理藏书。



三月三十日 致信王仰晨。表示对《巴金全集》第一、第二两卷满意，感谢王仰晨为编《巴金全集》出了力。又致信李致。告之已搁笔，心境平静，以后的两三年用以处理后事，即“除了把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黎明学园的图书资料全部交出外，还有《全集》和《译文集》二种，《全集》由王仰晨负责，《译文集》我自己在整理……这最后两件事，大概要你帮点忙，出点力”。又致信李舒。告之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做事，成了“废人”，心情不舒畅；规劝李舒少抽烟、爱惜眼睛，要争取多活，不要摧残自己。

四月三日 致信李采臣。认为李采臣工作做得细，很好。

四月七日 致信王仰晨，简单地谈编辑《巴金全集》的几点意见。又作《致 散文选刊 评奖委员会》。表示：“我不反对评奖，不过我不希望自己得奖。”愿意用作品去接近读者，而不愿用空话浪费别人时间。认为“只有自己心里燃着爱憎之火，才能使读者热血沸腾”。

四月十二日

致信李采臣。不主张发表《怀念集》的《代跋》，但同意出版社自己联系报刊发表，只是提出不要去找《光明日报》。

致信龚明德。告之《巴金书

简 初编》校样已看完；建议“劝人缓出或者不出我的书信集……我反对出手迹本，因为我的字迹难看”等。

四月十四日 事先托今日赴成都的李济生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给李致等亲属。又致信李致，认为《巴金近作》、《巴金传》暂时不出也好。“我现在思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个人的名利。我们决不能靠说空话过日子。”

四月十七日 致信冰心。云已搁笔，可是脑子不肯休息，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并说一想到中国知识分子，就会想到“作揖摇尾”的小狗包弟，“结果还是给送进解剖室”。

四月十九日 清早摔一跤，受了点轻伤，看医生，吃药，幸无大碍。

四月二十五日 致信谷苇。告之自己摔跤事，嘱不用担心，“我总会活下去的”。

四月二十九日 致信李致。云，写完《随想录》，“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 and 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告之考虑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打算今年秋天，“静悄悄”地回成都看看。

四月三十日 致信萧乾。告之为浪费了宝贵时光而悔和恨，但留下《随想录》，让后人知道

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还指出“一条路，一个目标：讲真话”。并赞扬萧乾“也写了那么些东西，让后人看见你正直、善良的心灵”，并“为这个高兴”。

五月十四日 致信苏叔阳。认为老舍的死，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是消极的，“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表示我们常说“炎黄子孙”，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要是没有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五月二十二日 致信侯志平。告之因病杂志社要的稿子无法交卷。

五月二十八日 在柳亚子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代表巴金向大会致辞。

六月八日 致信蒋刚。同意转载《关于丽尼同志》，告之还有一批书赠黎明大学。

六月十九日 作《随想录 合订本新记》，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八月版《随想录》。自云一百五十篇随笔“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是把笔当做手术刀割自己的心，——因“感到剧痛”，“不敢往深处刺”。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十年浩劫的来龙去



脉。这些随笔，之所以能写出来，是因为自己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后，“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才明白“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感到有责任揭穿十年“文革”的“大骗局”，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即使有“不同政见”那样的恶语中伤和“疾病缠身”的长期折磨，也“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花了八年的功夫”，讲了真话，“这三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

六月二十六日 致信李致。告之《巴金书简 初编》稿费仍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认为日本民族有优点、有缺点，“但比我们更有活力，值得我们尊重、学习”。

六月 与胡愈之、沈兹九、张友渔、夏衍、叶圣陶等联名提议成立中国韬奋基金会，后经中央宣传部研究同意。看到冰心为纪念《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册题词写道“因为《收获》是我的好朋友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巴金”时，遂提笔在两处“巴金”前，添上了“靳以”的名字。往事历历，在北平、在上海和靳以为出版《文学季刊》、《收获》忙碌奔波的情景又浮现在心头。又致王仰晨信二封。谈《巴金全集》编务。告之很疲乏，不打算再写文章

了。

七月十四日 致信谷苇。对三联书店出版《巴金译文选集》表示感谢，认为：“我的译文有个大毛病：它们像我写的文章……译文并不准确，可能还有大错，但它们不会白白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

七月十六日 致信黄源。获悉黄源离休，希望他保持健康，摆脱干扰，把心灵中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七月十七日 作《致信田玲等十位同学》。告之“回答”即《“寻找理想”》已经写好了，因身体不好，只好把草稿寄上。

七月二十五日 审读完《巴金全集》第四卷，作《巴金全集 第四卷代跋》。觉得《死去的太阳》“太幼稚了”，原可审读时有权“抽掉”或“在文字上作大的改动”，但是，正因为它是“失败之作”，才“无权抽去它”。为什么？巴金觉得它可以说明自己的创作，怎样在读者的鼓励和鞭策下走着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摔下去又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另外，巴金也看到了它是“真诚”的。接受上海电视台与四川电视台《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剧组的采访，同意并支持编剧和导演对原作主要人物结局的改动：觉民被捕后，觉新自杀。巴金认为这样的改动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轨迹

的。而在当年写这本书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上海沦为孤岛，人们心理已不堪重负，如果这样结局就太灰暗了。

七月 致王仰晨信五封。谈《巴金全集》编务。其中提出“用《代跋》的形式说明一些事情”的设想。

八月五日 致信李致。告之目前走动十分吃力，但是在“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我想倾吐《化作泥土》的感情”。并同意编辑《巴金近作（五）》等。

八月七日 致信李采臣。告之《代跋》手稿寄上，李小林、李国¹到青岛去了等。

八月十五日 审读完《巴金全集》第五卷，作《巴金全集 第五卷代跋》。对收入第五卷中的五个中篇小说作简单的说明。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因为是让组稿人“逼”着发表的，所以“只好编造故事”；至于《利娜》巴金承认是改写的故事，文章是自己的，但“它却不是‘创作’”。

八月十六日 致信徐开垒。告之《文汇报》纪念文章实在写不出来，以及“题字之类事情我向来不愿做”等。

八月二十日 致信沈毓刚。告之要动脑筋思考，要写书“对子孙后代再讲几句真话”，对“传记”“毫无兴趣……只有自



《随想录》多种单行本出版，深受读者欢迎。

己最后的言行才能取信于读者。花言巧语不如沉默”。

八月 为曾绍义主编《中国散文百家谭》题词：“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又致王仰晨信四封。告之，给李小林、李致和萧珊的信“到最后会拿出来的”，告之拟回成都作“最后一次的旅行”。

九月一日 致信冰心。认为冰心的短文《唯有读书低》文笔犀利。

九月九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拟写《巴金传》的作家徐开垒；又会见创作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作家黎汝清和陪同前往的江曾培等。当谈到黎汝清是通

过自学走上创作道路时，巴金说：“我也是自学，但不成才。现也没学好。”

九月十一日 致信盛子诒。告之“我认真学习世界语是在一九二四年”等。

九月十七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拟返成都“向故乡告别”等。

九月十九日 致信沈毓刚。指出大家习惯于听好话，许多人还把自己宣传和编造的好话当做真理。告之下月初打算去成都“闻闻故乡的泥土味，也可以说是向生我育我的家乡告别”。

九月中旬 收到井上靖来信，获悉日中友好协会拟邀请巴金访问东京。

九月二十三日 致信井上

靖。告之近况，云东京之行恐难实现，老友们的善意只有心领了。

九月二十六日 致信马小弥，告之把原想赠送北京图书馆的《希腊戏剧全集》，签名后赠给马小弥。

九月二十七日 作《关于煤的一点说明》。说明《煤》原名是《萌芽》，后又改为《雪》的经过，并将这份惟一的清样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九月

《随想录》多种单行本出版，深受读者欢迎。致王仰晨信三封。谈《巴金全集》编务，并告之体检后“没有什么大问题”，决定十月三日飞成都。

十月三日 中秋节前夕，在



巴金

的一个世纪



- ① 巴金 左 与老友卢剑波 右 欢聚。
- ② 巴金 右二 与张秀熟 左二、沙汀 左一和马识途 右一 在李劫人塑像前合影。
- ③ 巴金 右三 在成都与家人在一起，左一为侄儿李致、右一为侄媳丁秀涓、左二为侄女李国煜、左四为侄女李国莹、右二为侄女李国炜。
- ④ 巴金 左 与川剧名丑演员周企何 右 交谈。

十月十九日下午，巴金与龚明德谈稿子，右为李小林。 王晓梅摄



胞弟李济生、女儿李小林等陪同下，返回故乡成都。抵达成都机场时，与前来迎接的亲友等人见面，巴金十分高兴。本来不想惊动太多，结果还是受到热烈欢迎，下榻成都西郊金牛宾馆。

十月七日 与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朋友及一些亲戚见面，前往新都县桂湖，游湖赏桂，欢度中秋节。

十月月上旬 会见老友卢剑波。回首往事如烟，岁月催人。互问健康状况，并叙谈别后。

十月十二日 上午九时，在女儿、女婿、侄孙陪同下，抵达成都市学道街七十六号，拜访了九十三岁的张秀熟，稍后，沙汀闻讯赶来，众人品尝了主人准备的成都名小吃赖汤圆。

十月十三日 前往李劫人纪念馆菱窠，面对已逝故人的遗像、遗物，巴金难以克制，用颤抖的手，在留言本上写出对老友的怀念和深情：“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此看望劫人老

兄，我来迟了！”在菱窠，巴金与张秀熟、沙汀、马识途相约多加保重，在七年以后，共庆张秀熟百岁华诞，再在成都欢聚。又致信祝云立。告之想念外孙女端端即祝云立和孙女小丫之，希望她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快乐的少年时代”。

十月十四日 在金牛宾馆与马识途、陈之光、周克芹、流沙河、周企何等朋友、作家及文学新人晤谈。

十月十五日 上午，与家人等乘火车抵自贡。

十月十六日 参观自贡市恐龙博物馆，见到“天府峨眉龙”的标本时，巴金高兴地说：“我是属龙的，我就是这个龙。”晚上，由川剧剧作家魏明伦陪同，观赏了川剧折子戏。

十月十七日 晚，会见四川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的有关领导，高兴地说：“家乡好 家乡人好！”

十月十八日 在金牛宾馆会见四川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当

《四川日报》负责人对巴金曾接受该报记者采访表示感谢时，巴金热情地表示，这是应该做的。家乡来记者、老朋友，能知道家乡更多的事。当四川文艺出版社曹礼尧代女儿向巴金表示敬意时，巴金笑着说：“我这个人缺少知识，写作主要是靠感情，感情是真实的声音，要讲真话，感情是火，我心里的火一直不熄。”巴金的话，引起热烈的掌声。其时在座的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杨宇心认为：“这是巴老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精辟见解。”巴金发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负责巴金研究著作出版的龚明德没有来，向有关人员表示要见龚明德。

十月十九日

上午，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侄儿李致等陪同，前往成都百花潭公园。公园环境优美，绿色葱茏，让巴金顿觉心旷神怡。称赞公园环境优美，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巴金进入



兰草园，幽雅的兰香迎面扑来，他一时情动于衷，弯腰，久久地吮吸着，兰花的馥郁芳菲固然使他心醉，更让他心头颤动的是，和兰香交织在一起的泥土的清醇甜美！这是故乡特有的、独一无二的泥土味，是童年的梦幻，是哺育他生命的根基，是久违了的挚爱亲朋的邂逅，是多少年梦魂牵绕的心结！他动情地说：“我年纪大了，落叶归根，总想回来看看，闻一闻家乡的泥土，要和家乡的禾苗、树木一道，接受家乡的雨露阳光。”百花潭公园内，正在兴建按《家》中提供的场景设计的慧园，巴金不顾路面湿滑，坚持要去亲眼看看慧园的施工现场。他了解了慧园的设计和施工后深赞慧园，表示要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准备把过去保存的一些资料、手稿提供给家乡公园，“作为我支持慧园的心意”。在离开慧园前，巴金再次观看了慧园的模型，说小说中描写的庭园，不一定描写得好，因为我对园林艺术是外行。书中描写的园林景观，归功于我国古老的园林艺术，是它丰富、深化了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最后，巴金提笔签名留念，依依告别慧园。

午睡醒来，见到了骑自行车赶来的龚明德等。巴金高兴地说：“你要的《雪泥集》已印好，但三联的人讲要换上一页才能发行。我要送你一本。”原来

《雪泥集》中有一封巴金给杨苡的信中赞扬了某作家，三联书店要删掉这一句，巴金不同意。最后，双方妥协，书信正文保留了该作家的姓，注释中仍用全名。巴金与龚谈了巴金书信的编印和巴金研究界等情况。

晚，出席四川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的有关领导安排的告别宴会。

十月二十日 下午，在金牛宾馆与亲友话别。五点二十分抵成都双流机场，与前来送行的省委领导、朋友们告别。面对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亲人和朋友，已是耄耋之年的巴金依依不舍。但此时，巴金的心好像湛蓝明净的天空，又印上了故乡最新最美的图画。四川省委领导盼望他再回故乡，他激动地说：“谢谢！我还要争取回家乡。”飞机起飞了，巴金带走了成都市委、市政府送他的一盆铁脚海棠盆景，带走了故乡的雨露阳光和泥土清醇。然而，巴金的心似乎还留在故乡，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泥土、故乡的雨露、故乡的亲情、故乡的变化将永远吸引着他，滋润着他。晚上八时，巴金一行顺利返沪。

十月二十四日 致信李致。告之成都之行是“旧债未还清，我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

去”。寄上六册书给外侄孙宋辉等。

十月二十七日 想起以前答应过要给张弘一张照片，从在成都拍的照片中选出一张，签了名，嘱人送给张弘。

十月二十九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成都之行的“兴奋”和“疲劳”。

十月 在寓所会见受中国文联书记处委托前来看望的舒丽珍和王国胜，听他们汇报了第五届文代会的筹备情况和中国文联的工作。临别时，在门口，巴金看到他们赠送的硕大花篮，由鲜艳的鹤望兰、马蹄莲、长寿菊、火鹤、晚香玉、茉莉、米兰精心制作而成，不禁脱口而出：“漂亮，漂亮，多谢你们！”舒丽珍、王国胜把买花篮时的情况告诉巴金。原来花店老板听说是赠送巴金的，就热情地精心制作了这件艺术品，最后，只象征性地收了十九元钱。老板一家都是巴金作品的读者，看过了《家》、《春》、《秋》，他要通过大花篮表示对巴金的敬意。巴金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放下笔，要继续写出作品来，这是我同读者的惟一联系。”又在寓所接待《巴金年谱》的两位主编，并谈为他们整理的《巴金访问荟萃》修改、增删的情况。

十一月上旬 为纪念《收获》创刊三十周年，著文回顾了

当年和靳以共创此刊的经过，怀念并高度赞扬了靳以的人品和文品；希望‘新的《收获》仍然走着团结作者、为读者服务的道路，严肃沉默地、一步一步地前进’。

十一月十五日 会见老友朱梅特意委托送来祝寿酒的人，原来对方误记巴金的生日为十五日。

十一月十六日 致信朱梅。致谢并告之成都之行。

十一月十七日 致信黎丁。告之寄来的旧信收到等。

十一月十八日 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曹禺发表的《六十年来——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感言》。

十一月十九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关于广告和译文集要来看看，才可以决定要不要收进集子。

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文汇报》上看到萧乾发表的《要说真话——为“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而作》。

十一月三十日 悼念魏文伯逝世，赠送花圈。

十一月 得卢剑波信，获悉卫惠林的女儿卫缙云在美国去世，心中悲伤，为年轻的生命早逝感到痛惜。致王仰宸信二封。谈《巴金全集》编务及云回家乡时间太短。又致徐开垒信二封。告之从成都返沪后，“心里的火一直在燃烧，却没有精力动笔”；约徐开垒和李济生三十日

上午一起来。又应聘担任百家期刊联名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的顾问，全国主要期刊《收获》、《十月》、《上海文学》等都参加，列名为顾问的还有冰心、冯牧、夏衍、张光年、王蒙等。

十二月四日 作《巴金全集 第七卷代跋》。认为“《火》三部都是失败之作”，因为作品是“为了宣传抗战”，“谈不上文学和文艺”，只有“感情”“当时还能打动人”。自云“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作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十二月七日 致信卢剑波。忆及在成都和卢剑波的见面，表示有时想起南京北门桥和上海贝勒路天祥里的那些事情。“我才知道老年的可悲”。又云明年还想回成都。又致信李国炜，署名芾甘。告之侄女很高兴和故乡的亲人摆龙门阵，闻家乡的泥土味和听熟悉的乡音，表示：“只要不倒下去，我会回来的。”

十二月八日 致信李国煜。担心李国煜的健康，告之“想到你们，就有信心、有勇气再回成都”；将寄赠《随想录》合订本，其中的《新记》“是我那永不熄灭的心里的火，希望带一点温暖给你们”。

十二月十三日 致信李致。告之成都之行收获不小，“觉得精力充沛……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还有，我想听听川剧高腔，替我买点录音带寄来”。又致信李舒。认为李舒为成都之行拍的照片不错，但是又为这次没有说服李舒不抽或少抽烟而遗憾。

十二月十八日 作《巴金全集 第六卷代跋》。云《爱情的三部曲》不是成功之作，有一些编造的东西。但是“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他们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東西，它就是——不为自己”。

十二月二十二日 致信刘麟。感谢刘麟托李济生送来的蛋糕；告之将给黎丁写的二十四封信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又致信舒乙。感谢舒乙寄来关于版权的参考文件。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致信李辉。告之寄赠《随想录》合订本一册。

十二月

看到由儿童时代社、香港山边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的第一批《炎黄子孙丛书》后认为，该书系统地讲述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出版得很及时。

致王仰宸信四封。谈《巴金全集》编务。



对当下泛滥的“那些空话、大话、假话”十分生气和难受。

惊悉叶圣陶、沈从文病逝。对传媒冷遇沈从文的现象深感不平。

自云创作的短篇小说“可读的不过寥寥几篇”。

预感“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不开的”。

高兴地收看在汉城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实况转播。

仍然认为而今“封建的幽灵”还在四周徘徊。

八十五岁

一月六日 托儿子李小棠将自己珍藏的两帧父母照片转交唐金海，嘱可以用在《巴金年谱》上卷。

一月七日 致信朱梅。感谢朱梅托人送来一打啤酒。告之“又老又病”，“一点豪气也没有了。端着酒杯也喝不上两口”，示意以后不要再送酒来，但厚意心领。

一月十五日 致信张渭良。同意前志愿军战斗英雄张渭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来访。

一月十六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

一月二十六日 致信马小弥。告之近来“不断地听到那些空话、大话、假话，我不能不生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能靠假话生存，靠假话发达，我坚决地相信”；“想写文章，笔又不听话。不写，火烧着心十分难受。总之，日子难过。……我不能不动感情。我究竟是个中国人啊”。

一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表达了对《巴金全集》第五、第六、第七卷的编辑意见，并告之第四卷后的稿费“直接寄给我吧，我也许用得着它”。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身体不好，但是脑子一直很清楚，感到痛苦的是不能工作。想早点把书分送图书馆等事做完，可以安静地写文章或者翻译；近作十篇齐了等。

在寓所会见已故的中岛健藏夫人中岛京子。

二月三日 致信李致。告之三年内不把《巴金全集》送人的原因：“《全集》是为做研究工作的人用的，收了一部分我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不想让熟人看到。”

二月八日 致信季滌尘。托请代购《随想录》五套。

二月十一日 上午九时，在寓所会见前来祝贺新春的上海市政协主席李国豪等一行，接受了他们赠送的两支人参。宾主笑谈，互致新春的祝福。谈到成都故乡之行，巴金高兴地表示，有二十六年没有回家乡了，这次不仅到了成都，还去了自贡。家乡的面貌变化很大，那里猪肉、水果很多。以后，如果身体好，准备再去看看。巴金还谈到目前自己的健康状况，眼不花，耳不聋，与人谈话也不用助听器，但就是说话感到吃力，走路不太方便。

二月十六至十九日 春节期

间，惊悉叶圣陶在北京逝世。顿时感到：“中国文坛从此又少一人！”回想起叶圣陶决定在《小说月报》连载《灭亡》，担任了《灭亡》的责任编辑，以及后来的五十多年中对自己良师益友般的关爱和友情，心绪难平。北京的一家报社约写文章，希望尽快寄去，却被婉言谢绝。此时此刻，巴金沉浸在友情的漩涡中，仿佛叶圣陶带走了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我所尊敬的人，亲近的人，一旦离去，我从感情上一时总难以写出文章。萧珊去世五年后，我才写了文章。”二月十六日发唁电吊唁叶圣陶。云：



一九八八年春节巴金在寓所与儿子李小棠右、儿媳陈晓明后左以及孙女暄暄合影。



“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晚，与李济生一家老小按照惯例在家度过除夕。

二月二十日 致信沈毓刚。告之：“只要不说假话，我都拥护……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吧。我们都有责任。”

二月二十一日 致信魏帆。告之马宗融的外孙女、文学馆的工作人员魏帆“我的心情不好，仿佛生活在几百年前，仿佛过着中外名著中所描写的瘟疫流行的日子。……只是一场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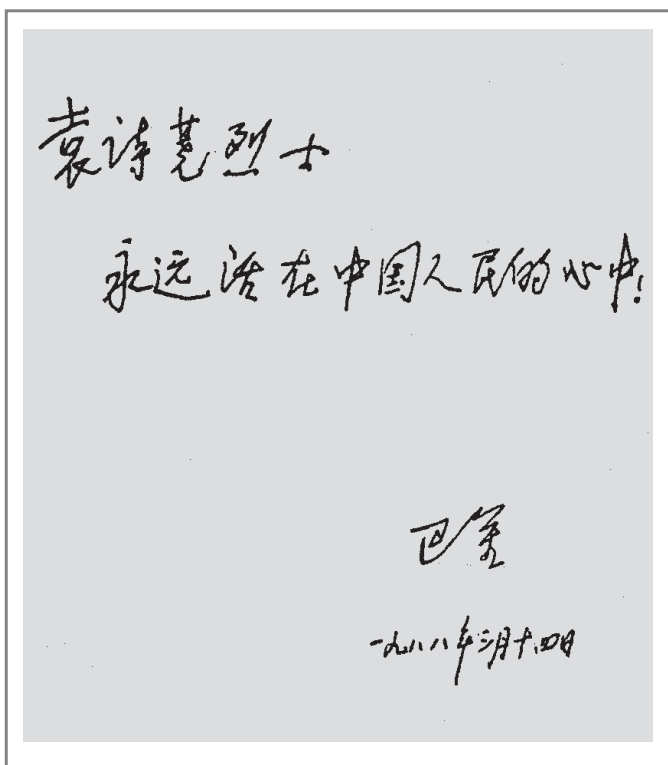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八日 致信盛子诒。请黎明大学派人来取赠书。

二月下旬 接见《文汇报》记者何倩等。谈话中涉及叶圣陶。巴金说：叶圣陶和冰心都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无可估量；文坛上的老人，走一个就少一个，“这是无可抗拒的规律啊”。对叶圣陶，巴金还有一份独特的、珍藏于心的感情：认为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巴金感激叶圣陶，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同时联想到：

叶老走了，我的余日也不多，我要抓紧时间，在活着的时候，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完。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十分痛苦的。

二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对患眼疾动手术的王仰晨十分关心，并委托由王仰晨出面与台湾某图书公司签约，处理该公司出版巴金作品选集事宜。

三月七日 致信季涤尘。告之：“几十年来我自吹自擂，说是反封建，事实上却是封建在反我，高老太爷的阴魂在改造我。



巴金为袁诗荃烈士题词手迹。
傅天斌提供

我必须时时刻刻敲警钟。”

三月九日 致信范用。感谢范用和董秀玉用第一流的纸张和装帧印出《随想录》合订本，云“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三月十日 致信徐开垒。告之徐的《巴金传》“有些事情需要查对，有些事情显然弄错了。”

三月十四日

嘱女儿李小林向柯灵赠送花篮，“祝贺柯灵同志八秩寿辰”。

为去世已六十年的袁诗薏题词：“袁诗薏烈士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三月二十三日 当选为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三月二十六日 致信王仰晨。针对王仰晨来信中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巴金云：“我说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那么首先就要争取多活。我只想多做点事，自己做个榜样，多做点好事。”“我不赞成不顾死活地拼命干……我的工作时间不多……可是我仍然爱惜我的生命，要好好使用它。”

三月下旬 获悉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长纪录片《巴金》，在四川大学举行首映式。《巴金》是我国第一部

拍摄健在的文学家创作生涯的纪录片，它真实地表现了巴金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笔耕不辍、一生探索的足迹和对文学事业的独特贡献。

三月

致李致信二封。告之仍为受干扰，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时间而苦恼；答应将来会将《巴金全集》赠与李致；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把剩下的时间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坚称自己没有才华和学问，是普通人，“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等。

致魏帆信二封。称赞魏帆等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为叶圣陶的丧事出力，并称叶圣陶是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榜样。又告之“这次肝炎恐怖中我们家倒没有发生事故”，并托买维生素C和板蓝根等。

四月十日 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四月二十二日 致信曹禺。告之看到曹禺在北京图书馆展览会上的照片和电视发言等，“真想为你鼓掌”。

四月三十日 致信萧乾。感谢萧乾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力，这是“为我们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

四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以前有些短篇发表时的后记或

保留或列入题注，但不能附在小说后面。

五月七日 致信李致。告之托李舒将李致写的一大包信带去。

五月中旬 收到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发来的电报，惊悉沈从文已于五月十日在京寓所病逝。沉默良久无语。“想起许多事情，总觉得他还和我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辩论。他那温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第二天，给张兆和发了回电：“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将代我在亡灵前敬献花圈，表达我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请保重。”电报中那些极普通的话，却深藏着巴金的悲哀：“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满信心的欢聚的日子，那些奋笔和辩论的日子，都不会回来了。”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关注着关于沈从文的报道，想知道一点关于沈从文最后的情况。遗憾的是，报上找不到沈从文的名字！

五月十五日 致信萧乾。告之自己担心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全民皆商’的浪潮冲击下，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是否能渡过难关”；为沈从文逝世感到难过，也为萧乾和沈从文之间的和解而心安。

五月十八日 看到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发表的《向著名作家沈从文告别》，这篇极简短的报道仅有三四百字！此刻，巴金激动了，他不理解，“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的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而国内的报纸、新华社的记者竟然“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来探望他的朋友告诉巴金，可能是领导没有表态，新闻单位不知道该用什么规格发表讣告，刊载消息。这样的论断并不能使巴金信服，他为敬爱的朋友逝世后，在国内的冷遇深感不平。李小林从北京回来了。巴金终于了解了他敬爱的朋友、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最后的情况：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达官贵人”，来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就过去了。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和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

鲜花和绿树丛中。”事后，又听张兆和说，火化前沈从文像熟睡一般，非常安详。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联想到自己，巴金觉得自己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了一身债。“我可不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五月二十五日 致信刘麟，告之《巴金书简 初编》的“稿酬捐赠文学馆。稿酬数目不大，不过表示我的心意”。

五月下旬 接龚明德信，获悉四川文艺出版社《巴金近作》的责任编辑已退休，出版社决定由龚明德编辑《巴金近作》第五集。但是龚明德不想沿老路子去编巴金的书。因为他刚责编了百余万字的《巴金年谱》，打算把在编辑《巴金年谱》过程中对一九七六年后的由心灵僵硬而逐渐复苏终于舒展自如的巴金形象的理解，融入一部巴金著译全编。

五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巴金全集》第八、第九卷照片安排等事，在二十四日信中表示：“现在出版界情况很古怪，好书出不了，坏书畅销，真是从

‘向前看’走到‘向钱看’了。我们搞了几十年出版工作，看到今天这个局面，实在无话可说。”

六月四日 致信龚明德，谈了五个问题，对龚明德打算编巴金著译全编的事作了回答：对龚的设想表示理解，同意编辑最近十年的文章出一个集子。

六月十五日 在寓所会见唐金海，对有关照片的时间、内容作了说明。又作序跋《巴金全集 第九卷代跋》。云通过编全集，对作品作的种种改动，“可以看到我这六十年来的创作道路。显而易见，失败多于成功。我的短篇小说中可读的不过寥寥几篇”。

六月十八日 致信张兆和。认为沈从文“走”得“清清白白，于心无愧”，只是，心里难过，感到埋葬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然而“眼前多了一个榜样：不声不响做自己的工作”。

六月十九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以及陪同前来的茹志鹃等。宾主互致问候，促膝谈心。当谈到《随想录》，巴金谦虚地说“是小书”。聂华苓认为那是大书，而且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大书，“因为它说真话”。又说：“巴金先生在海外许多人心目中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良心。”

六月下旬 向近日逝世的中国著名外交活动家刘晓赠送花篮，表示悼念。

六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除涉及三卷短篇的具体编务外，还表示：“悲观对谁都没有好处，乐观也是如此……认真对待，认真工作，但也要看得开些，要爱惜身体，作长期打算”；“《全集》出得快或慢都无关系，总之我们尽力而为”；“能多活最好。多活总可以多做点事。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做坏事的，我还有这么一点点自信”。

七月六日 致信冰心。告之将按冰心“只要几句真话”的要求，为卓如写的《冰心传》作序；称冰心为“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赞美她“头脑比好些青年人的更清醒，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有更深的情感”。赞美冰心“那么坦率，那么纯真，那么坚定，那么勇敢，更难得的是那么年轻”。认为：“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七月七日 致唐金海信，让转告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文学院一位教授关于恳请巴金担任名誉会长一事，表示：“挂名的事情太多，对人对自己都无好处，我为此深感苦恼，这次就免了吧。”

七月十六日 作序跋《巴

金全集 第十卷代跋》。感谢编者把解放后编《巴金文集》和《巴金自选集》都“漏掉”的旧作《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保留在《巴金全集》中。

七月十八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及市政协、统战部领导毛经权等。因近来出现持续罕见高温，市委关心巴金健康，前来慰问。巴金说：“我很好，谢谢大家。”并告之：家里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很好，还有“穿堂风”，请大家放心。最后，巴金高兴地收下他们带来的夏令饮料和水果。

七月二十二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将写给沈从文的三封旧信复印寄上。

七月二十八日 作《冰心传 序》。称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我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但是冰心不“老”，因为她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只有“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七月

应邀担任国际电影节——“'88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大奖”评委会名誉主席。赠送花圈，悼念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

获悉卫惠林因病，生活难以自理，决定离开泉州，前往美国

定居，与儿子卫西陵夫妇同住纽约。

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审判》重读了两遍”等，虽然战高温，审读旧稿，但是“《全集》什么时候出齐，我不在乎。我只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帮忙你编好它。所谓编好一是搭好架子，二是改正一个一个的错误，三是补好一个一个的漏洞”。

八月一日 致信姜德明。感谢姜德明“行善”，将一点信息或两本好书告诉了“几乎足不出户”的“我”。

八月八日 下午三点，在寓所会见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董事、泉州平民中学校友会理事长蒋天化即蒋刚。

八月十一日 致信马小弥。希望“爱发议论”的马小弥“还是坐下来，翻译几本书，然后写一点东西”。并决定将自己喜欢的《狄更斯全集》相赠。

八月十五日 致信梅志。告之收到《胡风传》，想起一九四九年和胡风在华文学校一起过的那些日子。“我一直因为不能也不曾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而感到内疚。……胡风冤案平反，大快人心。但对他来说，对你们来说，这二十几年的‘苦难’是无法补偿的”。表示把《胡风传》“当做生活的教科书，要告诉年轻人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八月十八日 致信张兆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答应写关于沈从文的文章，并将沈从文的旧信二封寄上。

八月二十日 致信夏衍。告之《经济导报》也有人来找，因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认为夏衍的谈话精彩、痛快，为之鼓掌。

八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谈到“十卷的照片重复了”等；并规划了明年《巴金全集》的编辑重点是“佚文”、“日记”和“书信”，并告之“第一次入朝日记魏帆已抄毕，共六万字。第二次的她在抄，大约四五万字。手稿都在我这里，但需要整理一下”。

九月上旬 在华东医院住了几天，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

九月十五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以后决定搁笔，否则身体实在吃不消，无法支持下去”。

九月十七日 高兴地收看在汉城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实况转播。

九月中旬 在寓所会见《文汇报月刊》负责人梅朵、萧关鸿等，对一九八〇年创刊、出满一百期的《文汇报月刊》提出希望。巴金还欣然同意担任第一届《文汇报月刊》“双鹿文学奖”评委。又看了由上海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十九集电视剧《家·春·秋》后，对剧组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该剧十月三日起在上

海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播放。试播时，上海文学、评论界人士发表观后感，认为电视剧基本把握了原作精神，又有新的开掘。

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北京成立，巴金等二十四人担任顾问。

九月三十日 为《长河不尽流》作完“代序”《怀念从文》，载一九八九年四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版《长河不尽流》。回忆了与沈从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记述了沈从文和自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或相似的经历，表达了对“正直善良的朋友”沈从文的深切怀念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思索，坚信“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十月中旬 审读旧作《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回忆了一些旧事，感到高兴的是仿佛找回了失去的东西，又熟悉了五十几年前的文笔。

十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云“先把看过的校样和复印件寄上，请审阅”等。在二十八日信中云：“你说这个时候出《全集》不是时候，的确是如此。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你讲究‘认真’，所以苦恼，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认真，能搞出来就很不错了。老实说，因为你要搞我才答应搞的。现在不搞，你我都轻松得多。但是我们都在认真考虑问

题，也认真出了主意，有些事别人不会想到，我看不必求全。我们能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

十一月初 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采访，寄语八日在京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文代会：虽然自己“又老又病”不能前往，但是祝愿大会圆满成功；希望大会不要开得一团和气，大家要说真话，说心里话。

十一月十八日 致信萧乾。告之同意葛浩文将《第四病室》翻译成英文，并寄去授权书。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信王镓令。针对教师王镓令来信中把巴金“文革”中的心情和作品《灯》联系起来的思考，巴金云：“你的理解可以。‘文革’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我当然感到苦闷，但心里也确实存有一点希望，一点亮光。我相信人民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我决心活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 致信李致。告之“在躺倒之前，我还想搞一本《随想录》续篇，也还想回成都找寻我少年时期的足迹。……想同大家再欢聚一次”。又致信李舒。批评李舒抽烟太多，是在拿生命作儿戏。告之可以送慧园和成都市档案局一些资料。

十一月三十日 致信冰心。为近九十岁的冰心能写出“烫手”和有“辣味”的文章，“给中国知识分子增了光”而觉得

“光彩”和“骄傲”。

十一月

从报上获悉埃及著名小说家、七十七岁的纳吉布·马夫兹荣获本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寓所会见谷苇。巴金从医院回到了自己的家，目前说话很困难，想好好休息。他还是有许多牵挂，几年以前说过要写十三本书，结果病了，只写完了七本。他心中不安，辗转难眠，知道来日无多，表示“有些事还是要做完才走”。还有哪些事急着要做呢？他对老朋友谷苇说：其中一件是整理自己的藏书，把它们分门别类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母校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泉州黎明大学和成都的慧园；另一件事就是关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朋友王仰晨编辑的《巴金全集》。巴金“为了向读者负责”，坚持亲自校阅。《巴金全集》估计要出二十五卷，目前只

出到第九卷。巴金怕自己“来不及”。

接待昔日平民中学的校友李振扬夫妇等。李告之，台湾有平民中学的校友逾百，引颈待望巴金赴台。访台是巴金夙愿，但如今自知已年迈体衰，不堪长途跋涉，更难耐访问酬酢之劳，遂婉言辞谢访台邀请。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全集十二卷“代跋”“刚写完，共六页，过两天当抄一份全文寄你”，以及“明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希望《全集》中的那一卷早印出来”等。

十二月中旬 让应余思牧邀请双双赴港的李小林夫妇带去赠余思牧的书和问候。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致信徐成时。告之收到长信，很感动，即使自己快“油干灯尽”了，但是对国家和土地还是有感情，“我还充满留恋”。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曹

禺。告之身体不好，但争取多活，“还想写本小书，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发表一点意见（我忘不了自己是个中国人）”；称赞李小棠充满朝气等。

十二月

会见《巴金传》作者徐开垒，就徐开垒求教关于《巴金传》的若干问题作了回答。认为过去无政府主义反对爱国主义，“但是我后来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谈到关于作家和生活的关系时表示：原来是同意胡风所提出“到处有生活”的说法，但是解放后“我就不敢说了”。这就证明我在解放后自己身上存在“觉新性格”。认为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也不必靠企业家养活。

致王仰晨信三封。云“昨天收到《爱情的三部曲》样书”等。

惊悉老友伍禅已于十一日病故。



腰部和脊椎疼痛，住院治疗。

认为《巴金年谱》“有评论这一条线，内容丰富了”，这是主编的“创造”。

在医院会见从台湾来的、已阔别四十二年的老友吴克刚。

由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协联合主办、上海青浦画院协办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召开。

惊悉北京大学教授王瑶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八十六岁

一月上旬 接受中新社记者谷苇采访，谈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电话，表示可以代办去台湾的手续。电话是李小林接的，她已经把我暂难访台的原因向对方作了说明。谈及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还是要提倡、发扬，这样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与进步。

一月 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谈话》。本文系《巴金传》作者徐开垒根据访谈记录整理。

一月二十三日 致信李斧。告之侄孙李斧“关于家系能弄清楚也好，但也不必花多少时间”等。

一月二十六日 在客厅里坐着，刚从红木椅上站起来，忽然身体顺势慢慢倒下去。外孙女端端第一个发现，大声呼叫，儿子李小棠闻声赶来扶起。巴金脸色发白。女婿祝鸿生给他轻轻按摩，家人们关切地问长问短，外孙女端端唤叫“外公”的声音和五岁的孙女丫丫的一声“爷爷”的呼唤，使巴金感到亲情和温暖。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可一二天后，睡觉时疼痛，用热水敷，还是疼。于是请骨科名医李国衡来家检查，又到华东医院拍片子，证实没有伤着骨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巴金遵医嘱，在家进行中药热

敷治疗。

一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谈及将《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和《俄罗斯十女杰》编在一起，又云：“法国大革命为我们争来人权，法国人干的是严肃的事，他们杀了国王。我们……，结果保留了很多封建流毒。”指出“热昂”应改为“昂热”。告之：“你想把《全集》编得‘完备’、‘完美’，我看这不可能。你求全，就会保留更多的‘垃圾’，其实读者不需要它们，也不愿意重印它们。我认为我们要在编辑上花费点心思，编得好些。”

二月五日 精神渐好，在寓所应约会见新华社记者王齐。在谈到当前的报告文学时，巴金认为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报告文学要比小说来得痛快，相信中国文学会有大作品问世；还谈到自己的打算：抓紧这两年时间整理一下自己几十年来的作品、书信和有关资料，一些交给北京的出版社出版，另一些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除夕之夜，巴金很高兴。家人们忙着准备年夜饭，家中充满了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特别是小孙女丫丫搂着他的脖子，说着悄悄话，更让老人的心暖得似一泓春水。他把朋友送的上好糖果拿出来给娃娃们“打牙祭”，看见端端和丫丫高兴地吃，巴金快乐地笑了。李济生全

家也来了，三代同堂，二十几口人热热闹闹地欢度除夕。

二月七日 晚上，感到腰背酸痛得厉害，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又不愿意惊扰家人。

二月八日 腰部和脊椎疼痛有增无减，失眠、胃口极差，精神渐渐委顿。

二月九日 住进华东医院北楼七〇一室，接受治疗，巴金又开始了与病魔搏斗的漫长苦难历程。

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点，在华东医院会见范泉和黄裳。范泉送来《孤吟》合订本复印件，上面有巴金一九二三年发表的诗作。三天前，看到范泉找到的这些自己青年时期的旧作，巴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想起当年和张拾遗、唐苇杭等热中于新诗创作的往事。他说，当时，受冰心的影响，常常写些蕴涵哲理的小诗。巴金准备将这些小诗寄到北京，收入《巴金全集》。

下午四点，在华东医院会见唐金海、张晓云，在座的还有黄裳、范泉。巴金对唐、张讲了这次生病住院的详情，并问及唐、张撰写的《巴金年谱》：“你们写的书还出得来吧？”唐告之正在看校样。巴金笑着说：“我也许还看得到。是七十万字吧？”唐告之内容实在丰富，已增加到一百多万字时，巴金说：“现在

出书难。学术著作出不来，世界上这种情况也不少，你这本书能出版就很好了。”唐告之《巴金年谱》的体例和全部出精装本，巴金说：“有评论这一条线，内容丰富了，恐怕还是你们的创造。精装本好看，好保存，就是太贵了，读者买不起，出版社赔本多了。”唐又向巴金汇报了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的筹备经过及会议经费已筹集到时，巴金说：“你们开这个会，我没有意见，学术讨论嘛。但是我不能参加讨论会，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你们怎么样评论都可以。我看还是盖棺论定。你们要拍照片，我身体不好，不能到会……”见巴金为难，侄女李国平笑着说：“以后，看身体情况再说吧。”巴金同意唐、张将范泉刚才送来的三首一九二三年发表在《孤吟》上的诗，抄录并补入《巴金年谱》。

三月二日 口述致冰心信，告之因摔伤“至今疼痛不堪，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只有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紧紧抓住我的心。我佩服您，羡慕您。我看得清楚，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您一直在奉献您的一切，我要向您学习”。又口述致萧乾信。告之：“想念你，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作为朋友，我也不会辜负你。”

三月八日 致信朱梅。告之



所托之事“已托吴泰昌找叶至善设法替你办理”。

三月上旬 致信中国现代文学馆，对台湾佛光山和美国西来寺的创始人、国际佛教促进会会长星云大师访问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热烈欢迎。

三月十六至十八日 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第五次会员大会召开。巴金被选为上海第五届作协名誉主席。

三月二十三日 口述致冰心信：“送您一张近照，请收下。”

三月二十四日 致信曹禺。嘱“保重身体，为了我们再见”。

三月二十七日 致信潘际。告之：“我的书出版了，而且卖得不错，但售价也贵得惊人。幸而这是我最后一本书，否则我实在不忍见读者掏腰包，总觉得对不起读者似的。”

三月 病中口述致王仰晨信三封。云：“我已决定《全集》委托你办理，我给你当助手。”告之“关于佚文，长篇我已找到几种”；“现在需要的是收集佚文，散篇的”；“我的病天天有起色，慢，不要紧”等。

四月二十二日 作序跋《巴金译文选集 序》。指出自己的翻译的特点，往往是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翻译和创作分不开，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武器”

巴金的挚友吴克刚。



“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了一生；自己的写作生活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而第一篇翻译作品就是在学习原作者迦尔洵的人道主义。

四月二十七日 在医院会见从台湾来的挚友吴克刚。这是两人阔别四十二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人，双手紧握，凝视默然，似乎双方都在凝听着彼此的心跳。吴是爬山高手，身板硬朗，但是岁月留痕，当年在法国意气风发的两个年轻人，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现在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友情似汨汨流水，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吴看到巴金在病中，想起当年自己在泉州患伤寒的情景，似在眼前。吴希望巴金快点恢复，还特地带来了海外出版的详析帕金森综合征的书，嘱巴金积极配合药物治疗，早日康复。另外，吴觉得练瑜伽功能提高身体素质，还当场表演给巴金看。巴金的心暖暖

的，专注地听着、看着，不时地说：“好，好……”交谈中获悉吴一年前丧偶，现在决定回国定居于江苏无锡。这期间，吴多次往返于上海和无锡之间，多次和巴金开怀畅谈。抚今追昔，让他们都感到年轻起来，觉得还有好多事要做。吴在台湾受黎明校友吴君委托赠巴金一万台币，巴金坚辞不受，建议赠予黎明董事会。此款后来由黎明董事会拨给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让巴金感到遗憾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吴终于因为生活不习惯，放弃了回大陆定居的打算，决定到美国和儿子在一起，聊解孤身一人的寂寞。临别，他们握手、拥抱，一切尽在无言中。心里都清楚，已届暮年，又海天茫茫，何时再相逢？更应互道保重了。

四月 在医院会见伍禅遗孀陈惠英，谈到了伍禅的过去和最后岁月，感慨唏嘘，彼此互道珍重。

五月五日 致信冰心。告



伍禅遗像。

之：“我们昨天晚上非常高兴地看了关于您的电视片，您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七十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

五月上旬 得张兆和寄来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老友沈从文转眼间已经去世一周年了。春天气候多变，乍暖犹寒，最难将息。好在巴金住在医院，一切听从医生安排。只是，长期不能生活自理，不能接触社会，不能自由走走看看外面的风景，难免寂寞。只得每天看报、看电视，巴金对社会动态的了解还是十分直接和及时。社会风潮涌动，一些重大事件越来越牵动着巴金永远燃烧的心。他人在医院，心在社会。一切有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心声，能都引起他的关注和思索。

五月十一日 作《巴金书信集 序——致刘麟同志》。

七月十五日 致信王仰晨。云：“这是几个月来我亲笔写的第一封信”，并简单地回答了关于照片、手稿保存等问题。

七月十六日 致信盛子诒。告之下月出院回家，清理出最后一批赠黎明大学的书，并在黎明大学成立五周年之际，“祝黎明大学在发展中祖国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敬祝梁龙光兄的工作取得更多成就”。

七月二十七日 致信冰心。



一九八九年夏巴金在医院。 李舒摄

告之“怕给您添麻烦，连几句口述也不便寄出。我只是经常问小林：冰心怎样？小林说：她不会有麻烦吧。这句话倒叫我放心了。因为有好些国家的朋友关心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还能做梦……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七月二十八日 作序跋《最后的话（一）》即《巴金全集》的《后记》。编辑《巴金全集》进入尾声，巴金回顾了漫长的创作历程，感到年轻时通过作品和青年读者的友谊在加深；而现在却不被青年人理解，虽然意识到“我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并不遗憾。

七月三十一日 获悉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京逝世。

八月十五日 致信冰心。云：“我写信问候，主要是担心您的健康。知道您‘好’，我就放心了。我的脑子早已糊涂，讲话不清楚，见客还要找小林翻译，解说我的有气无力的四川话。她怪我在信上对您提什么‘病痛’，那是三四个月以前的事，不该重提，让您为我担心。她批评得对，我可能把时间颠倒了，把第二次摔伤初期的疼痛跟病床上的伤痛混在一起。其实现在各种伤痛的人很多。……不写了！李晓救了我，他的小说得了奖，要上京领奖，他一定到府上拜见，把该讲的话都讲出来，还要送本书给您，让您感到烦闷



无聊时翻书笑一笑。”“李晓”即李小棠。

八月十八日 为逝世的中国作协顾问舒群赠送花圈。

八月十九日 电告北京，对中国文联副主席傅钟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赠送花圈。

八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告之《六人》中两篇《后记》都可保留；说明佚文残稿《嘉兴杂忆》中“《杂忆》只剩残稿，但《祠堂》是完全的”；“打算两年内把《全集》弄完，……哪一卷需要《跋》，你不妨提出，我来写”。“我的病情有好转，开始每天可以做点事情……有了开头，总算有了希望了，虽然写字时手抖得厉害”等。获悉《寒夜》被韩国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收入。

九月九日 作《巴金小说全集 小序》。此系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巴金小说全集》作的序。

九月二十六日 作《附记》。表示同意台湾东华书局出版《巴金译文选集》，让这个美丽小岛上的读者读到“我喜爱的书”。

九月二十七日 在寓所接待从成都来沪的老朋友车辐。

九月二十九日 巴金病情好转，又一次取得了与病魔抗争的胜利，终于出院回家。在出院之前，做了体检。做完心电图等项检查，听到医生说心脏蛮好，没什么问题，巴金风趣地说：“就是说我不会因为心肌梗塞什么的猝然死去，还可活几年。”医生回答：“你是个好人，有一颗

好心啊。”巴金、医生、家属们都笑了。巴金回家了，虽然走路还很困难，得依靠助步器，体质比以前差，人也容易疲劳，有时得由外孙女端端代笔写信。但是，他毕竟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作息时问，也可以尽最大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让他特别高兴的是，每天早上，仍然都能听到端端亲切的问候，看到她天真可爱的面庞，另外，可以让儿子、女儿、女婿、侄女安心工作，免除在医院轮流陪夜的辛苦。只是，帕金森综合征依然使他没法写作，还有小几几个月前随母亲赴美，巴金对可爱的小孙女十分思念。又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告之晚年的“工作”，就是亲自处理自己的藏书，并分门别类赠送给图书馆和



巴金 右 与车辐 左 在一起。
车新民摄



香港版《巴金文选》书影。

故乡。

九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校样收到，“你提出的问题我都看过，并作了回答”；“先把你补寄来的校样寄上”等。

水禾田编《巴金文选》由香港专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装帧、印刷精美，李济生曾著文称赞。于是朋友们纷纷索要该书。巴金笑着对李济生说：“这下坏了。书又不多，怎么办 你怎么不含糊说曾经看到过呢”老兄弟俩一高一低的笑声在客厅回旋。

十月五日 嘱人送一只由九十朵玫瑰组成的花篮，祝贺冰心九十寿辰。冰心很高兴，将巴金送的花篮放在自己的书房兼卧室。晚上，看电视和《新民晚报》，获悉冰心在一片欢笑和满屋鲜花中度过生日，很高兴。

十月九日 作《回忆 后记》。同意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回忆》。

十月十二日 致信冰心。

云：九十岁的冰心“并不老”，“您一直是年轻学生的老师和朋友”，“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十月十六日 致信朱梅。告之近况：“病并未治好，我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不过年纪过了八十五，也应该让位于别人了。毫无悲观的理由。”

十月十八日 感冒，服新药后，引起反应，病了几天。

十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在《忆》中把九姑妈漏掉了，五十年未发现，最近翻看《巴金自传》《忆》的前身，无意间找到了毛病，改正了”，请出版社“早点把书寄来”，“《自由月刊》已寄上”等。

十一月八日 致信蒋刚。告之近况，并将一些照片送给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

十一月十一日 作完序跋《巴金全集 第十二卷代

跋》。对收入本卷的游记和随笔编目上的调整 and 变化作了详尽说明，有的是历史、政治的原因，有的是作者的偏激。现在在编全集时，巴金主张恢复作品本来面目，主张“不赖债”，坚持“有错就改”。

十一月二十日 应约会见由唐金海陪同前来的余思牧夫妇，互致问候，并谈到二十一日在上海青浦举行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的议程等。又会见了从泉州赶来参加研讨会的老友单复和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正、副所长方航仙和蒋刚，高兴地说：“我还有一批书要送给你们。”

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 获悉“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青浦举行。巴金由于健康原因，没有亲自参加。大会聚集了中外一百余位巴金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加拿大学者余思牧、日本学者山口进、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以及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及学者王元化、柯灵、庄锡昌、徐俊西、贾植芳、徐中玉、钱谷融、王西彦等，或专程前来参加大会，或致电致函表示祝贺。巴金从大会组织者以及与会的中外著名学者、报刊、朋友们口中获悉大会对巴金六十年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泰斗和杰出的



文学大师，他丰硕的创作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上海作协主席徐中玉发言说：“巴金一辈子追求光明，即便在苦难时，他的理想之光也没有灭亡，始终将那颗燃烧的心奉献给人民。直到今天，八十六岁高龄，他的心灵之火仍在闪光。”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午，《文学报》赠送一只由八十六朵康乃馨组成的大花篮，祝贺巴金生日。巴金对《文学报》社长储大泓、总编辑酆国义、副总编辑曾文渊等表示感谢，对《文学报》将开展少年文学奖征文活动表示支持，他说：“我支持，要关心他们，要鼓舞这一代人的创作热情。”《文学报》赠送的花篮，是巴金收到的第一份公开祝贺寿诞的礼物。而作为亲人的第一份礼物，则是来自大洋彼岸的

小丫丫的贺卡。这是一张别致的音乐贺卡，巴金轻轻打开，悦耳的“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骤然响起，贺卡上有孩子真诚的祝福！于是，巴金的心飞走了，似乎飞到了小丫丫的身边；巴金的眼眶湿润了，又好像看到小丫丫欢蹦乱跳地出现在眼前，正用柔嫩的胳膊搂着老爷爷的脖子，在耳边喃喃絮语。巴金的心融化在对小孙女的思念和疼爱中。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金和他的家人，这几天都忙着接待一批又一批前来祝贺生日的朋友们，接纳各种各样的贺礼，今天估计要达到高潮。巴金从小就有“躲生”的习惯，现在手脚不灵便，想“躲”也躲不脱了。早晨五点多钟，巴金就起来了，他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两棵绿叶婆娑的广玉兰上不时坠下细小的、晶

莹的雨珠。家人们忙着把花篮移到客厅外面，一进门就看到了一条两边摆放着鲜花的路，馥郁的花香把人们引向客厅。上午九点不到，巴金就开始在客厅会见络绎不绝的朋友们，客厅里不时响起欢乐的笑声。会见余思牧先生并接受了他送来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全体代表敬献的蛋糕，还有由青浦画院院长岑振平创作的巴金油画像，旁边是王瑶、贾植芳、徐俊西、徐中玉、王西彦、李济生、陈丹晨、余思牧、山口守、丁口进、李存光、唐金海、汪应果、陈思和、李辉、吴定宇、戴翊、花建等全体与会代表的签名。巴金听完余思牧宣读的全体与会代表的祝寿信后，说：“我做得不够，我做得很少。是读者养活了作家，我永远感谢我的读者。”接着，巴金

岑振平作巴金肖像 油画。



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在上海青浦举行。



又全神贯注地听完余思牧个人给他的祝寿信，双方激动地拥抱告别，互道珍重。接连几天会见川流不息前来祝贺生日的朋友们和各报记者，巴金身心倍感疲劳。但是，与老朋友王元化、于伶、黄佐临、柯灵、曹禺夫人李玉茹、作协主席徐中玉等见面，接受他们的祝贺和赠送的花篮，巴金依然十分高兴。在会见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学者和书法家顾廷龙及新馆长朱庆祚时，获悉顾廷龙和他同岁，巴金感到很高

兴。他让李小林将已经整理好的一批书交给他们，并说：“这是你们帮了我的忙。”巴金欣然答应两位馆长的要求，把更多的藏书捐赠给自己的第二故乡——上海。冰心的礼物很特别，是一只竹编的花瓶，更让巴金动情的是随花瓶而来的冰心的贺信：“这只花瓶代表我向您祝寿！它将时刻代表我向您祝寿！它将时刻站立在你的座旁，你将从所供养的四时不断的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著名漫画家丁聪为巴金

画像，旁边有冰心的题词：“这画画得神似！你是一辈子愿作泥土、追求光明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画上还有夏衍、萧乾、吴祖光、新凤霞、黄宗江、卞之琳、张兆和等二十七人的签名。会见李子云，接受夏衍委托她送来的花篮；接受了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委托作家白彦送来的贺信和花篮。下午，会见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和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接受了市委赠送的花篮和朱镕基送的一棵栽培了三十多



巴金八十六岁生日这一天，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右向巴金左祝寿，并赠不老松盆景。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巴金在家中会见余思牧。

年的不老松。朱镕基说：“从小喜欢文学，初一时就读您的文章。以后读《灭亡》、《新生》、《春天里的秋天》，我崇拜鲁迅，也崇拜您。您为新文学作了伟大贡献。”朱镕基还说道：“上海目前有暂时的经济困难，但我们有信心克服，政治上是稳定的，群众凝聚力比过去增强了。”巴金表示：只要为人民做好事，就有前途。获悉由作协上海分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由冰心题写的“巴金文学创作六十年展览”在北京、成都展出后，今日起又在上海美术馆开幕。又获悉柯灵在开幕式上的演讲，对老友称誉他创作一生是“交出了自己的心”，以及对他六十年创作的解读是：“一路洒满的是汗、是泪、是血、是苦涩

和愤懑，但更多的是爱，是同情，是对祖国和人类美好的理想：一颗火热的心。”甚为感激，感到是知人论文、读文见人的金石之言。金秋时节，巴金的家中成了鲜花的世界，成了欢乐的海洋，巴金成了一种人格和精神力量的象征。

十一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你提到找秘书，我也想过，还在考虑。但也有困难。”“俄文版两卷集序文并无存底，……还有几种《家》的《序》也未留底（如乌兹别克文、蒙古文、越南文）。其实这些序文并无新意，不用也罢。”“那些校样寄回，就照你的说法删改吧。我记得在

王瑶在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



七七年要发表文章就得生硬地加上某些大路货，过一个短时期风向又变，大家便忙着甩掉包袱。这一次只好拜托你了。”

获悉一九八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获得。

十二月上旬

看完了《赴朝日记》之一，现在在看第二部分。因李致愿意做点事情，遂把日记交给他去看，并要求李致明年六月前交稿。

获悉北京大学教授王瑶近几个月十分疲惫，后从北京到苏州参加学术会议，又赶赴上海参加“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这期间，身体更感不适，病情较前加重，经多方联系，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但病情不稳定。遂嘱友人前往探望，带去他诚挚的问候。

十二月十日 致信曹禺。告之“我多么想像从前那样同你畅谈半天”。

十二月十七日 看完中国现代文学馆送来的《巴金书信集》原稿，觉得连同杨苾编的《雪泥集》和龚明德编的《巴金书简 初

编》，以这些为基础编书信全集就不难了。

十二月中旬

惊悉王瑶教授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因为近来身心两方面都感觉不好，有悲观情绪，故常常背诵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或自己的旧作，用来激励和振作自己，并给冰心写信，借以抒发胸臆。

十二月二十日 致信冰心。云：老年人都有苦恼，思想跑得快，行动跟不上，有时是自寻烦恼。时常自问，我还能够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忠厚勤劳的人民做点什么呢？“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常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发光”，认为冰心写的和说的那些句子，“那些辣的、有刺的、响亮的正是我现在需要的，能使我头脑清醒的”。

十二月下旬 获悉冰心于十七日接待成都慧园的工作人员，并欣然题词：“无情反比多情

忙，百岁常怀千岁忧。”

十二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告之：“你身体不好，可以少做点事，《全集》慢慢搞不要紧。”请王仰晨代办购书事；要求将十七卷以后各卷的编目再寄一份来，说明“《我们向全世界人民控诉》这篇反细菌战文章由我起草，用文联创作组的名义摘要作过报道，未全文发表。手稿我一直保存着，‘文革’后找出来捐赠北图或文学馆了”等。

将《怀念从文》手稿等赠上海图书馆收藏。其中有一套《托尔斯泰全集》，据说是国内只有一部半的珍品，那半部就是冯雪峰从苏联带回来的。巴金将《托尔斯泰全集》送给上海图书馆。

应慧园负责人要求，找出一些自己使用过的实物，给家乡人做个纪念，其中有一支自来水笔、一张使用和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小小书桌，还有五十年代访问朝鲜时朝鲜朋友送的绣花坐垫等。



愿通过受苦“净化心灵”，“我的‘主’”就是人民和人类。
 在《讲真话的书》中，巴金写的一篇《“文革”博物馆》仅有题目，正文全部空白。
 接受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
 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之奖状、奖牌和奖金。
 接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带来的中秋节的祝愿。
 到杭州西湖休养，与亲友其乐融融，身心愉快，并云“喜欢桂花”。
 在画家、作家高莽为巴金创作的肖像画上题词：“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认为“五四”的缺点恰恰既未“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又不“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

八十七岁

一月四日 致信许粤华。告之不仅不愿意伏倒在“主”面前，向他求救，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表示：我愿意受苦，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谁赐给我幸福。……我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

一月八日 审读旧作《三同志》后，作卷头语：“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一月上旬 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龚明德的文章《追寻巴金的足迹》，获悉由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龚文认为《巴金年谱》以翔实的史料、创新的体例，记载了巴金八十多年的生平事迹，重现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文学大师的形象。

一月二十日 致信王仰晨。云“目的只有一个：把《全集》编得好一点，对读者更

香港三联版
《巴金译文选集》。



有用处”。

一月二十五日 小年夜，下午，在寓所会见市政协主席谢希德和副主席毛经权，接受他们的春节祝福。

一月二十八日 年初二，在寓所会见前来送感谢信的上海图书馆馆长朱庆祚等。认为书是要用的，捐赠给图书馆可以继续发挥它们的价值。

二月四日 致信萧乾。为不曾想到萧乾的八十寿辰而道歉，并致以衷心的祝贺。

二月八日 致信曹禺。告之“一直在想办法保护自己。跟病作斗争，即使得不到最后的胜利，也是有意义的事。……晚上失眠，想来想去，最后总是背诵自己的文章，用自己的话激励自己”。

二月十七日 致信胡^丿青。云“想念舍予兄”，希望老舍故居早日建立起来。

二月十九日 致信冰心。感谢冰心回信中的鼓励。云：“要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仍然把你当做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

二月二十二日 致信朱梅。告之近况和思念老友等。

二月二十三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托马小弥带去《巴金全集》精装本五卷和《俄罗斯十女杰》的复印件。

三月上旬

抱病校订或重译的十卷本《巴金译文选集》，由北京、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东华书店联合出版。自云是把翻译当做创作来做的，所以格外费精神。

为五日在成都举行的《艾芜文集》出版和“艾芜创作六十六周年座谈会”发去贺信。

三月七日 晚上收看电视新闻，看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卫

星升空的壮观景象：我国自行制造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巴金和家人为我国已经进入国际空间技术商务领域而感到高兴和激动。

三月三十一日 致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告之因病不能出席四月十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五周年纪念活动，请杨犁代为赠送花篮，并说：“只要我的心还在燃烧，我就要为文学馆出力。”信末表示将天地图书公司再版《家》、《春》的稿费捐赠文学馆。

三月 得四川文艺出版社龚明德寄来的信以及龚责编的《巴金年谱》。正巧又接到原在上海市外办工作、现正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的刘秉文的信，获悉刘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急需有关巴金的最新、最详尽的学术著作，于是花了七八十元邮费，托人将一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百多万字的两厚本《巴金年谱》航空寄到法国。

四月十日 从《文学报》、《文汇报》上看到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五周年纪念的相关报道，获悉冰心、曹禺、臧克家等也发了贺信，马烽、林默涵等到会祝贺。又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吴强去世，同意列名于吴强治丧委员会委员名单。

四月十一日 上午十时半，在寓所会见苏联驻沪总领事馆领事斯特罗科等。接受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巴金一身整洁的西装，再佩戴上系着彩色绶带的金光闪闪的“人民友谊勋章”，虽然年迈体衰，依然显得神气和容光焕发。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斯特罗科对巴金说：苏联几百万读者认识你，你的小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财富。巴金感谢苏联人民授予的友谊勋章，表示始终记住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训，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是美的善的。又回忆十四五岁时，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人道主义唤醒了一个中国青年的灵魂。使巴金在几十年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艺术家的良心。直到今天，列夫·托尔斯泰“还是我敬爱的老师”。在友好的气氛中，斯特罗科拿出《随想录》请巴金签名。当晚，巴金和家人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晚间新闻关于巴金接受“人民友谊

勋章”的报道。

四月十二日 作《巴金全集 第十五卷代跋》。对于解放后写的一系列“歌功颂德”的作品，巴金认为开始时“大半出自真实的感情”，“不少热情的场面点燃我心里的火种”，于是写出了一本本“豪言壮语”；后来则成了在“战战兢兢”中生存和“保护自己”的“经验”，书上的“豪情”其实是“空虚”的一种“装饰”。

四月十四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中华老人骑游协会成都分会”的十位老人，巴金由家人搀扶着，和老朋友谷苇等在门厅迎接这些风尘仆仆、从成都骑自行车到上海的乡亲们。当他们问及巴金的健康状况时，巴金说：“不大好。一直不能见客。不过老乡们来了，又是骑车来的，不敢不见啊！”巴金浓浓的乡音，风趣而真诚的话语，把大家逗笑了。骑游队的老人们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五一十地向巴金讲述了他们三月十二日从成都出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巴金被他们老当益壮、不辞艰辛的拼搏精神感染了，由衷地发出赞叹：“你们有劲！你们真了不起！”老乡们问巴金什么时候再回故乡时，巴金说：“落叶归根。总还想回去的。”又说：“一九八七年回去过一次。不过去年又摔了一跤，身体不好。等养好，就回

去！”老人们兴奋地说：到时候我们骑游队全体一百多人骑车来接你！巴金被乡亲们热诚、爽朗深深感动了！告别时，他从老人们紧握不放的手中，感受到一股生命的热力，这是故乡的水、故乡的土培育滋养出来的独特的生命力！

四月二十二日 在贺电中祝愿“深圳创作之家”建成，表示：只要有中国广大作家的努力，有海内外各界友好人士的热心支持，中华民族的文学之树必会花繁叶茂。

四月二十五日 下午三时半应约会见唐金海、张晓云。接受了唐、张赠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年谱》。巴金抚摩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全精装的《巴金年谱》，亲切地对唐、张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实实在在的研究。我接到龚明德的信，以后写第三本，出版社还给你们五六十万字的篇幅……”唐听了高兴地说：“巴老，还要请你继续支持我们。”巴金连声说：“好，好……”巴金听说《巴金年谱》在厦门开书展时，卖三十美金一套，而且一下子就被海外书商买光了，他说：“其实，他们原可以多印一些，再版又要麻烦了。他们送我的那套，我已经寄给在法国的朋友了。”接着，巴金耐心地、坦诚地解答了唐、张提出的若干关于文艺创作、文

艺评论及日常生活等问题。

四月 获悉“创作之家”在杭州落成，这是由中国作协筹建的。得张锬邀请，安排巴金和冰心两位前辈作家于秋天前去小住半月。巴金好长时间因健康原因“足不出户”，加上急着完成《巴金全集》的校阅和撰写部分序跋，他不敢答应，担心体力不济，出游会带来麻烦。决定以静制动，不让自己想做的事受干扰，表示以后总有机会去的。又致王仰晨信七封。告之：《断头台上》已看完寄出、“《炸不断的桥》散文集手稿丢了……《全集》里能保存一个目录便行了”等事。

五月十四日 早晨，在寓所会见中岛京子、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在座的还有谷苇等。巴金听到中岛京子说他看上去很好

时，笑着说：“人不可貌相。去年又摔了一跤。如不见客人，又怕失礼。今天老朋友来了，我还是要见见。我也想念老朋友。”仿佛时光倒流，巴金和客人们不约而同回忆起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特别是讲到和中岛健藏在日本一起喝酒、比赛吃辣的趣事，巴金不禁情动于衷。此刻“友谊是一盏灯”，在他眼前闪耀！李小林和这些朋友也熟识，会见的气氛显得轻松活跃。巴金辞谢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只得向井上靖等日本朋友们致意问好。

五月十五日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唐金海、张晓云，他们遵嘱又送来了五套《巴金年谱》。巴金笑着说：“年谱我在看，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年谱的体例严谨，有新意，有一些东西

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你们帮我找到了。你们在大学里是做学问的，把年谱写成了学术书，很好嘛。今天，我也有书给你们。”说着，巴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巴金译文选集》，亲笔题词签名。这是十册一套装帧精美的书，是出版社祝巴金八十五寿辰、印数极少的纪念册，由北京、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东华书局联合出版。谈话在亲切随和的气氛中进行，巴金讲到了《巴金译文选集》和《巴金全集》等的出版情况。

五月二十八日 致信刘麟。告之两点：一，《巴金书信集》中将给彼得罗夫的贺卡当信发表，这似乎不太严肃，建议删去；二，序不必先在报刊上发表。

五月二十九日 致信舒乙。



巴金 中坐者
与唐金海 左、张
晓云 右 合影。



请舒乙在女作家凌叔华告别仪式上奉献一个花篮。

五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同意将《巴金译文集》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各卷编目由你决定，我无意见”。决定《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不收入《巴金全集》，并提醒“‘佚文’卷中有些文章选入时也希望慎重些，不要让人以为这是我现在的思想和主张”。

致侯志平信二封。请代写致《中国报道》杂志社创刊四十周年贺电，事后改了几个字。

六月初 获悉故乡成都在全省、市委宣传部和市、区（县）教委（局）的领导下，在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及《小学语文报》的支持下，在成都市小学生中开展了“我是巴金爷爷故乡的好孩子”的活动，对小学生的素质教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六月十二日 作《巴金全集 第十七卷代跋（一）》。从全集序跋联想到“文章写得长绝非胜利”，“用不着旁敲侧击吱吱喳喳”，必须“瞄准箭垛”“一字诛心”，自己因一大堆空话，浪费生命，愧对读者。

六月二十二日 在寓所会见阔别上海三十四年的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巴金忘了自己的病痛，向不久前刚出院的“萧老弟”问长问短，还引起对已住院

两年的曹禺的挂牵。当然，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各自的创作现状、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巴金看着萧乾赠送的几部近作，高兴地说：你这几年还是很有建树的。当萧乾说你让我“除了注意身体之外，得多写些东西”时，巴金快乐地笑了。此刻的萧乾像个调皮而听话的小弟弟，巴金则是位严格而可亲的大哥哥。他们的心又回到青年时代，萧乾还是年轻的萧乾，巴金还是年轻的巴金！

六月二十四日 继续校阅《巴金全集》，写完第十八卷的序言。

六月二十五日 会见前来告别的萧乾夫妇，巴金赠送《巴金全集》前十卷，在扉页上签名和题词：“赠炳乾、洁若，我还记得你到燕大蔚秀园看我，一转眼就是五十七年，你也老了！可是读你的文章，你还是那么年轻，你永远不会老。”告别时，巴金由家人搀扶着，步履艰难地坚持送到门口，望着萧乾频频回头、拱手作别的身影消失在铁门外……又作《巴金全集 第二十一卷代跋》。说明收入本卷的三本著作都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写成的，材料来源是共同的，心境是类似的，但是因为“我的生活里充满矛盾”，所以，这些作品也“不能互相启发、互相解释”，也充满矛盾；感谢这个时期“对

我影响较深”的卫惠林和吴克刚，“倘使当初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六月下旬 得曹禺信，感到难过。真想见见他！想到和曹禺一样“来日无多”，但“都想活下去，只好活在工作上了”。

六月 致王仰晨信五封。告之《俄罗斯十女杰》最后一章如需删改，则“不必客气”；编辑中的有些问题“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了”等。应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和上海方法杂志社约请，同意与冰心一起担任“华夏新苗成材之路——青少年写作竞赛”特别顾问。在《文汇报月刊》上发表《答黎烈文夫人信》。

七月一日 会见来拍《上海一日》专题片的记者，按拍片要求，挪东转西，起坐不停，感到不习惯，也感到劳累。

七月二日 去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医嘱住院。巴金怕住院，因为一住院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另外，家人也担心，他的胃口不好，而医院的伙食又偏淡，巴金不习惯，还不如家里的粗茶淡饭可口。经要求，才允许回家。

七月二十一日 向五十年代初因电影《武训传》受批判的著名电影艺术家孙瑜追悼会赠送花圈。

七月二十七日 致信冰心。说明自己为《冰心传》写的序并非空头文章，因为在“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您！”

七月下旬 获悉十九日经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评选委员会决定，与泰国著名文学家、评论家、政治家克力·巴莫、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英国的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东南亚地区问题研究专家矢野畅五人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该奖项目的在于振兴亚洲优秀文化，加强亚洲各国的了解和文化交流，促进亚洲和平事业的发展。九月三日在福冈举行授奖仪式，获奖者被授予奖状、奖牌和五百万日元奖金。巴金接到获奖通知后，给福冈亚洲文化委员会写信表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令人欣慰，很高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这一荣誉。

七月 致王仰晨信五封。谈《巴金全集》编务，希望《随想录》用上和曹禺的合影等。

八月四日 获悉好友卞之琳八十寿辰，“卞之琳创作及译作六十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托朱雯教授带去花篮，表示祝贺。又作《巴金全集 第十六卷代跋》。有感于《随想录》

终于没有“被人暗算，半路夭折”，在“处处时时有人堵我的嘴，拉我的手”和“叽叽喳喳”的“艰苦的斗争”中“收在全集里面问世了”。其经验是有了“斗争的艺术”：必须讲道理，分清是非，不使连载中断，抓紧时间完成五卷，因为“五卷书联在一起才有力量”。自诩《随想录》是“自己使用的武器库”，现在不再害怕，不再是“赤手空拳”，而是“武装起来”，“可以放胆地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了”。

八月八日 在寓所会见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告之近况，觉得太累了。巴金依然在写文章！首先是在审读《巴金全集》时，写一些必要的“代跋”之类的文章；其他的文章都是怀念朋友的。有一篇还是写郑振铎的；有精力，就给朋友写点短信。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把写作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他一辈子都不会放下笔了。因为在他看来，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八月十五日 致信井上靖。对获得“亚洲文化奖特别奖”表示“受之有愧”；感谢日方安排“箱根休养，东京叙旧”的“深情厚意”，并为无法践约而抱歉。

八月十七日 续作《巴金全集 第十七卷代跋（一）》。叙述了编入十七卷的三本画册的

缘起和出版经过，表达了对提供画册原本的庄重和钟时的怀念。

八月中旬 得冰心用毛笔写的一幅字，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巴金老弟留念，冰心一九九〇·八·十·”，十分珍惜和感动。

八月二十六日 致信冰心。云：“您的友情使我的生命放光彩。”又告之由李小棠去福冈代表自己受奖之事。

八月三十日 由儿子李小棠代表自己前往日本福冈接受“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八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提供《巴金译文集》目录等。

九月二日 让儿子李小棠代表他参加在日本福冈举行的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授奖仪式，并代表他宣读了《我和日本》的演讲稿。首先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概括叙述自创作《灭亡》以后，把写作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让自己的痛苦、愤怒、理想和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就这样，我走上了文学道路”的经历；回顾了六次到日本的见闻和与日本作家和人民的友谊；最后表示生命即将走上尽头，愿把余生献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即使我的生命化为灰烬，我那颗火热的心也会在朋友们中间燃烧。”决定将五百万日元奖金悉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筹建中的上海文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学发展基金会，表示自己是一个作家，总想为发展中国的文学事业多做一点贡献。

九月十六日 致信杨犁。告之将这次得到的福冈文学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分赠两个机构：赠文学馆三百万日元，赠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二百万日元，并办好外汇存款手续，嘱中国现代文学馆派人来取。

九月十九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铁迪等，接受了江泽民总书记委托他们带来的问候和中秋节的良好祝愿。又致信马国亮。告之近况：“杂事仍多，精力日益衰退，可悲的是脑子非常清楚，午夜梦

醒，常常想到一个问题：自己将以一个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后人的心目中，是非问题不搞清楚，恐怕很难闭上眼睛。因此，总想再写点东西。”

九月二十七日 下午三时，在寓所会见新加坡作家周颖南和著名画家方增先等。巴金看到了周颖南用几幅巴金不同侧面的彩照，委托方增先作为素材创作的两幅中国画。画上分别有冰心的题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巴金获悉周颖南拟将其中一幅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另一幅自存。遂在画上写“巴金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最后赠周编号为五十二的《随想录》特

装本。又看到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版《讲真话的书》，目录中有一篇印着“存目”的字样。

九月二十八日 决定改变两年来足不出户、保全体力、闭门“苦”干的局面，由女儿李小林、女婿祝鸿生陪同，前往杭州《创作之家》小住。巴金两年来经受了八个月的住院之苦，终于回家了。但是，帕金森综合征依然折磨着他，写作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一篇《怀念从文》就写了三个月；《巴金全集》的审读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精神空间，有时在阅读旧作时，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原则，还得提笔作序跋或注释，还要查找和

巴金在杭州
“创作之家”住过的
八号房间。



- ⊖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金《讲真话的书》。
- ⊖ 台湾东华书局一九九〇年九月印行的十卷本《巴金译文选集》。



核实重要的史实，耗时费力，十分疲劳；此外，又要跟编辑沟通；更让他心神难安的是，尽管想闭门谢客，心无旁顾地抓紧有限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然而事与愿违，社会各界为他祝贺生日，外宾远道而来，各种不得不出面的接待……对他来说既是盛情难却，又不堪负担。家人了解他，也爱莫能助，日益为他的健康担心。上海这年夏天奇热，亏得家人的精心照料，巴金居然没有像往年那样生又红又痒的痱子，但是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精神也委顿起来。巴金也觉察到孩子们为此着急的心情，所以，当张锬亲自来动员他前往杭州“创作之家”度假时，孩子们在征得医生同意后，又再三劝说，巴金始决定前

往杭州。在杭州，建了一座拥有八间平房、一间厅堂的“创作之家”，有山有水，空气清新，可以由孩子们推着轮椅带他游湖、观看秀丽的湖光山色，或是乘游船饱览夜西湖的灯火喷泉，或是去植物园赏桂，或是在窗前看书、看报，让鸟声在耳边萦绕，让花气草香沁润心田，或是让医生推拿，休息、治疗两不误。吃的又是可口的、多样化的精美小吃，巴金胃口大开，精神愉快，不多日，体重也增加了。有一次，该吃饭了，巴金不动筷，要求见见厨师小张。小张师傅来了，巴金说：“小张师傅，谢谢你！”大家被巴金的诚挚之情深深感动了。当然，也有美中不足，就是冰心由于骨折，得不到医生批准，不能同家人到杭州

“创作之家”度假。老朋友在优美的西湖畔见面的计划不能实现了。

九月二十九日 与张锬等畅谈，又与冰心通了电话，晚宴上，巴金和大家举杯祝冰心健康长寿；托张锬回北京时，给冰心捎一封祝贺生日的信和代送花篮。

九月三十日 致信冰心。告之：“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祝您健康长寿，也相信您会健康长寿。”

九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将一九七二年八月摄于上海龙华火葬场，与萧珊最后作别的照片寄给王仰晨，嘱“可以用在十六卷上”，并云：“在这照片上我看见了自已无声的泪”，“这是我的无声的‘控诉’”；要求提前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发第二十一卷，担心来不及写完《代跋》等。

十月初 托专人为冰心五日的九十寿辰送去一封贺信，表达了对冰心的想念和“敬爱”之情，认为冰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十月二日 与张镠、李小林、祝鸿生、外孙女端端等一行人畅游杭州植物园。在占地四十余亩的桂花园，欣赏馥郁芬芳的桂花，品尝酥糯甘甜的栗子羹。习习秋风把金黄色的桂花吹撒在头上、身上、桌上、碗中。当众人在端端带领下，享了口福，专注地数着落在自己碗中的桂花数，不时发出惊喜的呼叫时，巴金也开怀大笑起来。从植物园归来，巴金的心还徜徉在大自然中。他对张镠说：“我喜欢桂花，就是养不好；在上海的家里养了几株桂花，现在只剩下一株了。”由此，想起了生平酷爱桂花的冰心，巴金又说：“这些年，我们那一代老人留在世上的越发少了，我和她的通信也更多了起来。我写字很吃力，写的信比她少一些。她给我的多，有时一周有两三封。我很喜欢读她的信，我有什么事，也愿意同她说。”

十月五日 巴金改变了多年不亲自接打电话的惯例，早上给冰心挂了长途电话：“冰心大姐，我们很想念你，你身体好，

我们很高兴，你要好好保重，祝你健康长寿！”李小林怕冰心听不清楚，接过话筒又字字清晰地转达了“我爸爸向您祝寿，我们都祝您生日快乐”的内容，李小林转告，冰心阿姨说巴金送的花篮是所有花篮中最大的一个，巴金笑了。冰心听孩子们说巴金体重增加了，高兴地要巴金“努力加餐”。巴金听后，又开心地笑起来了。会见张镠，还为张镠带来的苗苗题词：“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写给苗苗。”周围的人笑着说，苗苗今年才三岁，怎能看懂？巴金自己也笑着说：等她长大了再给她看，那时她就会看懂的。

十月十日 晚，李济生乘夜车抵杭州，巴金嘱女婿祝鸿生和祁鸣去接。巴金看了李济生带来的别人写的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文章。李济生已作了删改，最后让巴金过目。

十月十一日 上午，巴金和李济生等出游，参观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根雕展，去花圃欣赏盆景。

十月十二日 与李济生和李小林夫妇等去品龙井茶，游石屋洞，上桂花厅购得桂花糖，最后经满觉陇，在馥郁的桂花香气

中，尽兴而归。

十月十三日 坐车到西泠桥下车，以轮椅代步，在众人陪同下，说说笑笑地绕孤山一周。在鲁迅雕像前注目凝视，默然逗留良久，再去看秋瑾雕像，返回西泠桥下。巴金游兴未了，又请孩子们推车过桥沿湖边缓缓而行，纵览外湖风景。巴金把西湖的历史、人物、风景再一次满载于心。

十月十四日 上午，与年逾八旬、精神矍铄的黄源再度晤面，沐浴着秋日和煦的阳光，两位老人忆往话今，意趣盎然，大家有时被他们的笑声逗笑了，当然，有时也会被他们沉重的叹息震撼：因为他们不会忘记共同的朋友陆蠡、丽尼、鲁彦、靳以、黎烈文、九姑方令孺和巴金至亲至爱的萧珊！这些真诚、善良，在文学创作或翻译领域内卓有建树的朋友和亲人，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十月十五日 在此之前，“创作之家”年轻的工作人员知道巴金今天要走，大家赶着到新华书店买来巴金的书。当大家把书和笔交给巴金时，巴金没有接，一时静场，只听巴金说：“签名书应该由我来买，怎么能让你们掏钱呢？”在场的人为巴金的“幽默”笑开了。“矛盾”很快解决了。巴金告别“创作之家”返沪，在留言簿上弯弯曲曲

写下了六个字：这是我们的家！人们感动了，工作人员更是依依不舍，几位青年人都快哭了。巴金在“创作之家”生活愉快，心情舒畅。他回忆说：中国的地方，我最喜欢杭州，喜欢西湖。一九三〇年他第一次来西湖。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有时是春天，有时是秋天，有时春秋两季都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风尘仆仆，流离不定，和西湖分别了许多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又经常来西湖，差不多每年来一次，多数是秋天。“文化大革命”十年不能来。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又可以来西湖。直到一九八七年，还是每年来一次。一九八七年后，因为身体不好，有四年没来。“今年我是想来向西

湖告别的。来后，觉得身体状况有好转，以后或许还可以常来看看。”一周后，“创作之家”的七名青年工作人员就收到巴金从上海寄来的签名本著作。

十月中旬 获悉著名“红学”家俞平伯逝世。

十月二十二日 致信李芹。告之侄孙女“青春的确十分美好，不要让它白白地过去”，“看来我快要和你们分别了”，“希望有时候想着我”。接受作家、画家高莽创作的肖像画，并高兴地在画上题词：“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十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云“‘爱与憎’的说法是我习用的，可以不改，这意味着我的‘全部感情’”等。

十一月五日 致信侯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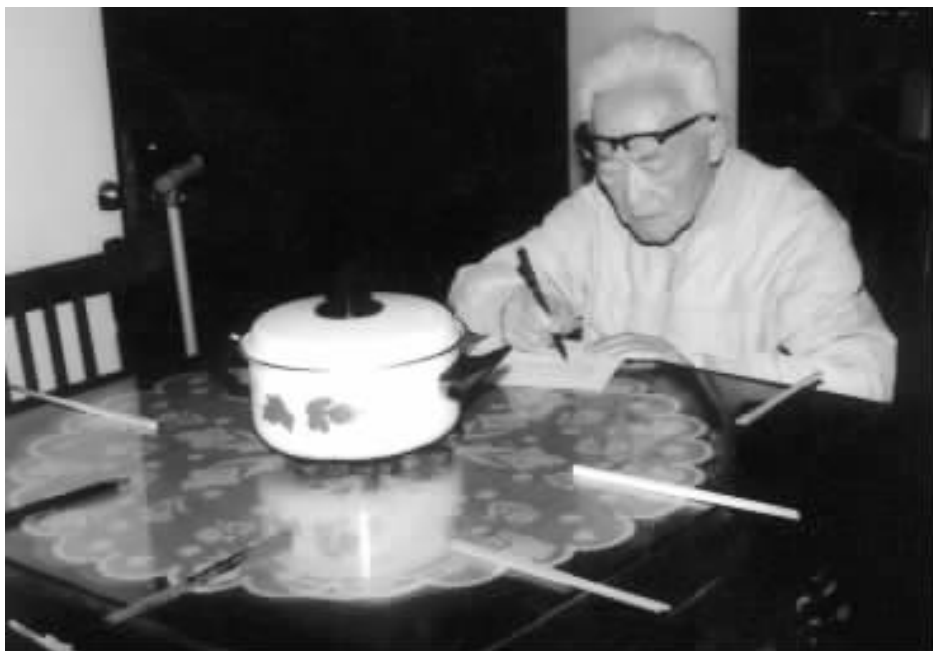
告之请代拟贺电等。

十一月十二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去了一趟杭州，十八天，呼吸了新鲜空气”，井上靖的《孔子》已收到了等。

十一月十六日 致信《世界》杂志编辑部。称赞编辑部人员为宣传、推广、辅导、提高、交流世界语而形成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认为世界语是一项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业。

十一月二十四日 巴金家中又忙开了，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赠送的花篮和贺信络绎不绝，巴金的生日来到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为日本巴金研究专家山口守翻译的《巴金短篇小说集》作序。指出：从前常写序、后记“经常拿自己的主



一九九〇年十月巴金在家中餐桌上写作。 李舒摄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张填满别人的脑子”，想不到有一天会“脑子里装满别人的东西”，还受尽了“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

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信汝龙。告之近况：写字困难，记忆力衰退和过两年出《巴金译文全集》等。

十一月下旬 会见刚成立的成都出版社的负责人，接受了他们赠送的图书，认为家乡成立出版社，是家乡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鼓励出版社好好干。

十一月底 将仿线装的《家》、《春》、《秋》和近年创作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回赠给新成立的成都出版社。

十一月 将画家吴作人一九八〇年所赠《熊猫图》、一件白玉微雕作品——内容为朱镕基、陈至立向巴金祝贺生日，以及早年用过的一副眼镜等三件物品捐赠给成都的慧园。又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加购《巴金全集》，送外孙女和小孙女；建议将《书

信集》安排在《巴金全集》的最后，原信和《巴金全集》手稿将来“一起捐赠文学馆”等。

十二月七日 致信马国亮。告之因为有病，希望“静养”、“仔细思考”后，再“从容执笔，比较清楚地讲出我的意见”；“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障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

十二月八日 会见王元化。

十二月九日 致信冰心。告之：在杭州想吃、想动了。再活两三年，也可以多写点东西。“有人不喜欢我的文章，就让他们多发点脾气，这怪他们器量太小，不能容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信成都和平街小学的小朋友。表示“我不是什么‘民族的骄傲’，我只是一个中国人”，并表示寄希望

于他们：“我家乡的孩子们，奋勇前进吧，愿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人民的‘骄傲’！”

十二月二十八日 致信阮思聪。感谢阮思聪小同学期待他回乡的真诚，但是因健康原因和“害怕出席大场面”，不能回乡参加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

十二月底 托侄孙李舒到北京看望因病长期住院的曹禺，带去了许多自己和家人的近照，曹禺十分感动。获悉曹禺因为没有保存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同名剧本《家》，正在请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代找时，巴金将自己收藏的剧本《家》托人带给曹禺。曹禺在该书扉页上签名，并特意注明：“该书是从巴金处寻来的。”此书现已珍藏于慧园。又陆续收到成都和平街小学学生和家住慧园附近的小朋友的来信，孩子们真诚的心使巴金感动。

十二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考虑到王仰晨的健康，建议《巴金全集》的工作暂停等。



明确表示，《讲真话的书》中“‘开天窗’不是我的意思”。

不赞成为了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出资设立翻译巴金小说的基金会。

在友人纪念册上题词：“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写作也是为了自己。”

给敬仰他的家乡孩子们回信表示：“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决心用行动来补写因年老体衰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对近年报纸批评和影射“讲真话”的文章作回应和批驳。

表示做梦都想回家、回成都过生。

读偏向于自己的评语感到“惭愧”。

签名售书以赈济灾民。

推崇“治学有骨气，做人有骨气”的境界。

八十八岁

一月二日 会见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龚明德，收下老友钱君匋托龚明德带来的印谱一本。巴金对龚明德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讲真话的书》中关于《“文革”博物馆》一文，曾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说‘存目’就‘存目’吧。”

一月三日 致信许粤华。对满怀好意说服自己信基督教的许粤华明确表示：“没有主，也没有我，只有我活着的八十几年间的爱与憎不会消灭。……在我，主已是多余的了。我不想‘死后复活’，也不希望‘永远不死’。”

一月初 在寓所的“太阳间”会见谷苇。表示今年主要的工作还是编全集，希望全集的编辑王仰晨能早日康复。又对谷苇说：有一件事未了，就是至今没有落实长远性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址和合适的房子，经费也不足。相信只要从上而下都认真去办，还是可以办好的。

一月六日 致信吴朗西、柳静，署名芾甘。告之因“语言障碍，记忆力衰退”等，

一九九一年



谢绝日本友人的采访，仅在信中简短地回答了关于武田博的三个问题。

一月九日 欣闻老友朱雯教授八十寿辰，有关单位为其举办祝寿及从事著译、教学生涯六十年周年纪念活动，派人赠送花篮，表示祝贺。

一月十一日 与于伶、王元化共同发起并任会长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冰心、夏衍、赵朴初等为特邀顾问。巴金已将获得的“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中的二百万日元捐赠。

一月二十一日 致信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戴安常。告之已

让来沪的该社编辑龚明德带回一本签名本《讲真话的书》。

一月三十日 作《吊唁井上靖》。表达了“惊悉”井上靖去世的“悲痛”和“三十年深情厚谊犹在我心里燃烧”的心情，相信他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中日人民友谊万古长青”。

一月 在寓所会见美籍华人记者、作家黄运基，并赠一本有编号的《随想录》合订本和两瓶酒。又致王仰晨信二封。认为编《巴金全集》“消耗”了王仰晨的生命，从而感到内疚等。

二月四日

儿子李小棠赴美探视妻子和

爱女丫丫也捎去了老爷爷对孙女的思念和疼爱。

在寓所会见李存光，向李存光出示一九二七年所写《春梦》片断手稿。

二月七日 作《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二）》。改变了收入全集“越少越好”的编辑主张，同意“尽可能地把以前扔掉的文章收进去”，因为这些都是写作道路上的脚印，不应该逃避责任。

二月九日 获悉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路遥等五人的五部作品获奖。

二月上旬 与柯灵、陈国容



⊖ 巴金 右 为唐金海
左 签名赠书。
⊖ 巴金 左 与李存光
右 在一起。



夫妇，并家人一起在寓所欣赏由袁国英和张名煜表演的《爱情书简》，观后“很感动”。

二月十日 致信石成泰。同意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石成泰等将《春天里的秋天》初版序译成世界语。

二月十一日 在寓所会见唐金海、岑振平，看了岑振平创作的两幅巴金油画像说：“很好。”巴金的两位妹妹也连声说：“像他，画得好。”李小林看了根据“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期间绘制的原作复制的那幅说：“这一幅画得更好。”巴金站着和客人们在画像前合影。最后，赠唐金海《讲真话的书》，赠岑振平《随想录》合订本，并分别亲笔签名。

二月十四日 为李存光编选的《巴金谈人生》作《前言》。回顾八十六年来“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我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热切地希望：“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二月二十六日 作散文《怀念井上靖先生》，载日本三月六日《产经新闻》晚刊。叙述了和井上靖三十年的珍贵友谊，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坚信中日人民的友好事业会永放光芒。又致信白土吾夫。告之悼念井上靖的短文写成寄上，稿酬十万日元，请代

买四篮鲜花，奉献于中岛健藏、龟井胜一郎、野间宏和井上靖墓前。

二月

获悉著名作家李準出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致王仰晨信三封。

为《讲真话的书》增订再版本补充漏编的作品，告之关于《三同志》等还要写“代跋”等。

约三月上旬 接马小弥信，征求巴金意见，要求巴金说“行”或“不行”。原来她早受吴克刚的委托，协助几位长辈找到高水平的出版社和翻译人才，由台湾筹建的基金会出资，翻译出版巴金作品，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三月十一日 致信马小弥。表示不赞成设立基金会请人出钱把自己的小说译成外文，然后“到外国推销，争取什么奖金”。认为，一是没有这样方便的奖金，二是自己创作的小说是给中国人看的，三是自己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的也已不少。

三月十六日 致信石成泰。告之索非简历。

三月十九日 致信冰心。云：“情绪不太好，……当然我还在挣扎。”“想到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

三月中旬 致信人民文学出

版社，祝贺建社四十周年。为《文学报》创刊十周年纪念题词：“祝文学报越办越好，越办越精彩。”

三月二十九日 致信朱梅。告之有还不清的文债，有许多未了的事情等。

三月 致王仰晨信六封。告之现在要懂得保养身体，注意劳逸结合。致信阮思聪。告之收下了阮思聪寄来的红领巾，退还了人参，并赠《巴金文选》。

四月五日 致信山口守。在这万家扫墓的日子，委托山口守将短篇小说集的版税买三篮鲜花献给已故的松冈洋子、有吉佐和子、石上韶。

四月九日 致信王仰晨。同意将致彼得罗夫的三封信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

四月十五日 遵医嘱在杭州“创作之家”休养半个月。期间会见专程来访的谷苇，并由谷苇和家人陪同，作了一次“风雨桐庐行”。后来，答应为谷苇的纪念册题词。

四月二十一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最不高兴的是被人当做‘名人’……好像很受人尊敬，其实，谁也不了解你。托尔斯泰晚年的痛苦我现在了解了”。

五月初 自杭州返沪，自我感觉良好。

五月八日 会见由千田是也



率领的“一九九一年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七人。交谈甚欢。巴金清晰地记得：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新侨饭店与千田先生见过面，当时同去的有曹禺。一九八四年在东京又与千田先生见过面，当听到千田出生于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时，巴金幽默地说：“那是哥哥了，我是十一月生的。”众人高兴地笑了。下午，用黑色水笔为谷苇的纪念册题词：“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写作也是为了自己。”

五月九日 因感冒发烧引起气管炎，咳嗽，不舒服。

五月十五日 致信成都东城根街小学学生。信中说收到了孩子们寄来的四十封信，感谢“家乡的孩子们”“给我这个老人带来温暖”；为了不使“家乡的孩子们失望，我终于拿起了笔”，“让这封信代替我同你们见面吧”；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老老实实、平平凡凡走过一生”，“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寄语孩子们爱惜时间、好好学习。

五月十六日 会见谷苇，将纪念册给他，除五月八日题词外，另有一幅墨迹未干的新题词：“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

五月中旬 接中国作协四川

分会发来的两份电报，邀请巴金出席四川省召开的作协四川分会会员代表大会。获悉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将于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向大会致电，寄语青年作家：“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五月二十三日 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告之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并表示“长期‘脱离’生活，又没有资格发言。请原谅我的沉默”，“我相信只要不脱离社会，不忘记人民，只要真诚地追求，只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大家都会在创作上开花结果”。

五月二十四日 致信朱梅。嘱病中的朱梅多多保重。

五月下旬 原以为是小感冒，结果拖了好久。后来不能吃东西，没有力气，上楼也很困难，觉得人似乎走到尽头了，被家人送进华东医院。

五月二十八日 致信许祖云。告之寄上在《嘉兴日报》上发表的《祠堂》复印件。

五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日记待李致看后，“我看一遍即可发排”；对于十八卷“收容佚文，请你把关，一定要严格”等。

六月一日 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于今日开始实

施。巴金感到高兴，知识分子现在对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终于有法可依了。

六月二日 四川召开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圆满结束，被代表们推举为名誉主席。

六月五日 从报上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想起“四人帮”在“文革”时期的倒行逆施，想起那些年民族的苦难，想起自己和许多朋友家破人亡的悲剧，巴金陷入沉思。又作完《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代跋（一）》的前三部分。对《炸不断的桥》手稿丢失“毫不惋惜”，“欠债”的感觉少了，心头轻松了；认为《三同志》是写不熟悉生活的“废品”，但是对战士“仍有无限的爱”；叙述两次入朝的经过。

六月中旬 收到参加成都市首届“巴金杯”少年儿童作文比赛的全体少先队员的来信，为孩子们正在探索“生命开花”的真正意思感到高兴。

六月二十日 上午出院回家休息。获悉李济生的病也慢慢好起来。又致信冰心。倾诉被人当做“买空卖空‘名人’”的痛苦、又不愿伤人只得委屈自己的矛盾和烦恼。

六月二十五日 致信白土吾夫。告之因体弱多病，不能应邀

巴金 右二 与汝
龙 左一、黎丁 右
一 和李小林 左二
合影。



访日。

六月二十八日 作《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代跋（一）》。告诉王仰晨《炸不断的桥》中五篇未发表的旧稿和《春天的来信》的改订稿在“文革”后劫余生，但在编《巴金全集》拿去复印时，终于丢失。觉得“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好像搬开了心上的石头，反而轻松了。

六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这次生病“差一点精神上垮掉”，现在“难关好像已经过去了”；同意将《炸不断的桥》编入第二十卷。

七月五日 作《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代跋（二、三）》。叙述两次入朝的经过。

七月上旬 巴金依然体弱多病，深居简出，但是他的心却是和现实生活紧紧相连的。文坛的潮起潮落牵动着他的敏感的神经，有的报刊开始批判一些著名作家，有的报刊发表“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之文章的矛头指

向，也开始从“小道”转为公开。

七月中旬 接汝龙夫人文颖信，惊悉汝龙病逝。消息来得突然，又一次经受回忆的折磨。

七月二十日 致信文颖。希望对方节哀，建议汝龙的书可以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汝龙文库”等。

七月中旬 收到舒乙介绍访苏见闻的信和从老托尔斯泰墓上摘下来的一株花草。

七月二十五日 致信舒乙。告之“年纪越大，越想了解老托尔斯泰”。看到了这株花草，“仿佛又接触到新的生命”。

七月二十七日 致信马小弥。感谢马小弥在翻译家汝龙去世后，帮忙解决一些问题，并提醒捐赠基金，不能影响他们家的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 作完《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代跋（四）》。重申写《创作回忆录》“是替几位朋友雪冤，洗掉污泥浊水，让那些清白的名字重

见天日”。

七月二十九日 下午会见成都“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派来的代表谭兴国等。当谭要求巴金九月去成都，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讲话时，巴金笑了，表示一听到开会就紧张，说国际会就更紧张。因为不会讲话，才拿起笔来的。写文章不同，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慢慢写，不紧张。巴金的真诚和坦率使在座的人很感动。听谭讲了大会筹备的情况后，巴金表示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自己写了六十年，成绩不大，“我自己说文集不再印，把十卷版选集印一下就可以了”。“以后写东西恐怕不行了”，但要用行动证明，这一生到底干了些什么？到底是真是假？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要用行动来补写完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表示最佩服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追求。他到八十岁的时候从家里出走，病死在火车站。“我以前不大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最近才懂得了，他也是为了



做个言行一致的人。自己写的，自己用行为证明，说的是真话。”对于近年来报上关于批评和影射“讲真话”的文章，巴金做了回应和诠释：“我提倡说真话，不是说我说的真话都是真理，我是说，我心里想的什么就讲什么。”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品和人品一致”。表示“到最后盖棺论定，请读者给我一个评语，那是真正的评语，我想说的是这个，我追求的也是这个”。

七月三十日 作《我要用行动来补写》即《“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这是为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写的信。在两张信笺上，是竖排的字体，说明有病，不能出席大会，强调“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了还不清的债”。晚上，把信装入信封，写上谭兴国的名字，并让李舒打电话，通知谭次日来取。

七月三十一日 上午八时，亲手把《我要用行动来补写》交给谭，稍后，会见《巴金传》的作者徐开垒和《巴金年谱》的主编唐金海，然后，由上海电视台的祁鸣制作录像，递交大会。巴金不习惯面对摄像机，有点紧张。巴金重申了致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信中的主要观点，最后深情地表示：“对家乡我也有无限

的爱，我做梦都想到回家。我要把身体养好，争取活到九十岁，九十岁回成都去过生。”

七月

受回忆的折磨，难以抑制怀旧的思想活动，眼前出现一张张亲切的脸。还做过一个愉快的梦，在一间有纱窗的、木板壁漆成绿色的书房里，他和三哥李尧林站在书桌前听二叔讲书。醒来后，二叔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忽然想再翻一遍《春秋·左传》，托老朋友黄裳买了一套。看《春秋·左传》，想起了二叔对他人品和文品产生的深刻影响。

致王仰晨信三封。

建议《嘉兴杂忆》“不加什么，不要说明”等。

八月初 收到萧乾寄来的信和为出席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的长文《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巴金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上的功绩》。文章引起了巴金对往事的回忆和思索，他想到了当年共同奋斗的挚友郑振铎、靳以，想到了为文学出版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散文家陆蠡，想到了才华出众的曹禺、萧乾、李健吾、丁西林、胡风等。同时，觉得萧乾文中“对一切事情都是往好处解释，也可以说是偏向着我”而感到“惭愧”。

八月四日 致信萧乾，署名芾甘。告之读了萧乾文章后觉得

“惭愧”的感受，常有“再活一次”的想法。答应稍作休养后，为《萧乾研究资料专集》撰文。指出萧乾“聪明过人”“处处显露锋芒”，以致“受了多少委屈”。

八月五日 从电视新闻、报纸上看到全国不少省市，洪水肆虐，泛滥成灾。上海也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关于青浦县莲盛乡人民顾全大局，决定炸坝泄洪，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的报道，更牵动了巴金的心，他睡不着觉。他想他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托人将五千元人民币送交徐汇区民政局，捐赠给青浦县莲盛乡受灾人民。此事，原无外人知晓，只因在民政局的捐赠人签名栏，留下了地址和“李尧棠”的姓名。民政局的干部不知“李尧棠”是谁。事后，他们按图索骥，来给“李尧棠”送感谢信时，才被朋友发现了这一秘密。

八月八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代跋》手稿在《全集》出齐后由你捐赠给文学馆”，《成都日记》已答应捐给成都档案馆。

八月十九日 从新闻中获悉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停止履行总统职务，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称戈氏领导的改革政策已“走入死胡同”。巴金关注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展，关注

着苏联人民的命运。下午，会见英国华文协会会长陈伯良，接受邀请，同意担任英国华文作家协会永久名誉顾问。

八月三十日 同意将部分作品参加“上海百名作家赈灾义卖签名本”活动。这天清晨，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聚集了数千名读者，等候书店开门，争购一百〇九名作家的签名本。由于书少人多，义卖以协商的价格出售。巴金的签名本义卖特别安排在书店会议室里举行，《巴金散文选》率先被人以三百二十元买走；接下来，十卷本《巴金选集》破了一千四百元大关；《家》、《春》、《秋》被人以二千元捧走；《随想录》特种本的义卖高潮迭起，由九位读者进行竞价，最后买主以一万三千元的买价夺冠！购得此书的吴淑芳和凌意清夫妇并非暴发户，丈夫凌意清是木器厂管仓库的工人，他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事后，巴金被读者对灾区人民的爱和对他的感情感动了，于是在另外送给他们夫妇的一本香港版的《巴金选集》的扉页上签名题词，表示“我不是文学家”。写作是用作品来表达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无穷无尽的感情。为了满足另一位读者的要求，经书店出面恳请李小林同巴金商量，拿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随想录》签名本，以五千元成交。至此，巴金将七种

二十四本著作义卖所得一万九千〇四十元悉数捐赠给了灾区。

九月八日 作随笔《向老托尔斯泰学习》。认为自己一生借用文学作武器，“奋笔前进”，现在“老了”仍然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仍然是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

九月上旬 让出席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李济生带去珍贵物品赠送慧园。

九月十八日 下午二时半，会见谷苇。谷苇参加“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返沪，带来了李舒在杭州“创作之家”为“叔外公”巴金拍的照片集。看到了在杭州小憩时，和老朋友黄源、邹荻帆、著名画家叶浅予见面时的留影，看到了和家人特别是外孙女端端的合影，巴金笑了。后又听谷苇介绍了“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盛况。会见参加“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抵沪的韩国南惠田专门大学的教师朴兰英。她正在准备写《巴金的“火”与他早期思想的研究》。当朴兰英讲到巴金的思想与托尔斯泰是相通的时，巴金回答：“我是受他的影响的。”认为托尔斯泰为追求“言行一致”这个目标，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九月约下旬

从返沪的李济生口中，听到十二至十六日，成都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详情：参

加大会的学者有来自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的，也有国外如日本、南朝鲜、美国、加拿大、西德的。大会由中国作协、四川省社科院、省作协、文化厅、四川大学等联合举办，盛况空前。巴金还听李济生介绍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研究成果，看到了冰心、曹禺、沙汀、艾芜、张秀熟、马烽等的贺信和贺词：“巴金是我最敬爱的一位世界闻名的中国现代作家”（冰心）、巴金是“我国新文学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的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等。

九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告之“书信卷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不嫌多……加注越少越好，因为目前无人能注，连我也注不起来”。

十月五日 致信许祖云。告之同意将《怀念胡风》中的片断收入为南京师大附中校庆九十周年而编的《校友回忆录》。

十月十五日 从《文汇报》看到冰心的《再写萧乾》，为冰心大姐对他和萧乾二人的情谊感动，也被她轻松、幽默的文笔逗笑了。在冰心眼中巴金和萧乾“都是我最疼爱的老弟。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由此，巴金想起了十年前，社会上谣传他将再婚的事时，冰心就对朋友们



巴金

的一个世纪

说：“不会的，巴金不是这种人。”下午，致信冰心。告之尽管“讲真话”，会得罪人，但是，看了“您那些在暗夜里闪光的文章，我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为不做名人而奋斗！当然要奋斗到底了”。

十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坚持《巴金全集》的佚文把关“紧一点”。

十一月八日 致信《新民晚报》记者，被《新民晚报》编辑加题为《珍惜前人精神财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载九日《新民晚报》，呼吁“徐家汇藏书

楼”应该“保存”。

十一月十五日 作《怀念二叔》。回忆往事，感到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叔侄二人推崇“治学有骨气，做人有骨气”的境界。

十一月十八日 致信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表示“我的心是永远和世界语者在一起的”。

十一月十九日 致信文颖。嘱多多保重，认为汝龙在翻译契诃夫作品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十一月中旬 社会各界一年一度为巴金祝寿的活动又将进入高潮，巴金“躲生”“躲不

脱”，家人们又忙于接受花篮、贺信。冰心早早地托人捎来珍贵的礼物：用古昆虫生物化石雕成的一只双耳瓶，巴金十分喜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十一月二十三日 收到泉州黎明大学董事会、全体师生、巴金文研所的祝寿电文。电文中云：“您的爱国精神和文学殊勋，必将世代传诵，永放光芒！”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金生日，满屋鲜花，馥郁芬芳。茶几上放着各种礼品，精制的蛋糕、精美的点心、家乡的土特产，还有一些工艺品。记者早早赶到，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巴金在家中与客人交谈。



老朋友陆续来访，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饱经风霜的巴金沉浸在真情友爱的氛围中，接受各界及读者、朋友们的祝贺。

十一月三十日 致信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告之因病不能出席“祝贺沙汀创作六十年暨沙汀作品研讨会”，认为沙汀是“我钦佩的当代我国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精品”。

十一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建议王仰晨作书信卷的主编，自己愿意帮忙；坚持“反右派的文章一律不收进去，我今天仍为这些文章感到痛苦”。“研究的人毕竟是少数。出《全集》也不是为了研究者。我看该删的还要删……许多署名的大批判文章都不是我写的”。

十二月初 收到编号珍藏本《巴金散文精编》，分别签名赠送亲友。

十二月五日 致信冰心。云有人“讨厌我……爱说真话，其实，我讨厌自己，正是因为我那些年假话讲得太多，……想不到还债的办法，而感到苦恼！？我痛苦，但是我并不悲观”。

十二月十四日 致信谷苇。谢谢谷苇提供了赵家璧的地址，解答了杨静如信中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五日 获悉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十二月二十六日 获悉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手通过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又致信王仰晨。告之寄上旧信若干等。

一九九一年内

巴金从一九九一年起，陆续向上海档案馆捐献他本人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致波列伏依的信、《随想录·创作自由》的手稿、旅法护照、身份证和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当选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书以及一部分重要著作等。



与从美国旧金山回沪探亲的孙女欢聚一个月，尽享天伦；作别时，觉得孙女“几乎把我的心带走了”。

认为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

表示自己的作品“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汇合”。

自云青年时代也受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影响。

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太坏，对于金钱的疯狂追逐有点变态”。

盼九十岁时能“最后一次探望家乡”。

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收获》编辑部所有人的名字，并盛夸靳以和萧岱对《收获》有大功，也赞许李小林为《收获》付出的心血和辛劳，以及李小林身受的酸甜苦辣。

认为冰心是中国知识界的良知。

八十九岁

一月九日 致信萧乾。告之“我很想去的地方是成都，叶落归根的时候到了。我并不悲观，即使有各种叽叽喳喳把我送上西天，我也不会再进‘十年大梦’的梦乡”。称赞李小林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收获》上，认为《收获》办得不错等。

一月十二日 致信文颖。告之汝龙的译作可通过南京的杨静如与译林出版社联系。

一月十六日 会见谷苇和高莽，宾主叙谈甚欢。中午时分，高莽正欲告辞，忽然拿出速写本，要求巴金给他两分钟时间。只见他“刷，刷”几下，就画好了。高莽让巴金签名，巴金接过一看，高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最后还写了一句：“我说像我。谢谢。”巴金的风趣，让谷苇和高莽笑了。

一月二十六日 致信谷苇。建议正在酝酿中的第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迟两年也行。

一月二十八日 致信魏绍昌。赠魏绍昌签名本书三册。

一月二十九日 在寓所会见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政协主席

谢希德等，接受了他们的新春祝福和赠送的年礼。听完吴邦国介绍上海的经济情况后，巴金高兴地表示：“现在这样做很好，只要实实在在地做了，老百姓就会相信，就会感到高兴。”还说到上海已经几十年了，“对上海是有感情的，希望上海有更大的变化”。

一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打算将来《巴金全集》再版时，写一篇类似年表的东西等。

二月三日 除夕，接受了成都正通顺街小学的小学生们寄来的信、图片、字、画和土特产，高高兴兴过了个“四川”年。

二月十二日 致信张彬英。劝朱梅遗孀张彬英节哀，感谢她寄来毛一波写的纪念文章等。

二月二十四日 会见赵超构，赠《讲真话的书》。

二月二十八日 致信沈^丕云。告之唐弢夫人沈^丕云，不能参加“唐弢学术研讨会”，但是“很喜欢他的散文和杂文”。

二月二十九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从赵超构的突然去世，感到死太容易，联想到自己也可能“突然消失”，希望再加一把劲，早些搞完《全集》；建议佚文集不必求全，也可以删去日记和书信中的一些字句等。

三月八日 致信成都正通顺街小学的孩子们。云：孩子们的信“把我的心引到了我念念不忘

的家乡，我的老家。……你们都在我的心中，我的眼睛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给家乡的三个小学分别寄赠一套《中华子孙丛书》。

三月十四日 致信姜德明。告之“我的时间不多了”，“愿为您的藏书尽一点力”；为唐弢、赵超构、汝龙的逝世而难过，但是“我不悲观，现在在料理应当做好的一件一件事情”。

三月十八日 致信文颖。希望汝龙的译文集能早日出版。

三月 获悉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和珠海市文化局、文联、作协等单位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创作生平展览”，巴金赠送二十五本签名本《随想录》表示感谢。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谈散文》中关于会见彭司令员的部分，跟随彭德怀政治地位的变化而被删增的经过等。

四月十六日 致信文颖。告之已托朋友为出版汝龙的译作《契诃夫文集》“打招呼”，认为现在出版社要求作家补贴印费和包销自己的书，是文化界中“稀奇古怪”的事。

四月

将《答井上靖先生》、《怀念胡风》等八篇手稿赠送泉州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这是巴金第十一次向该研究所赠书。

致王仰晨信二封。看《全

集》第十八、第十九卷校样，认为“不认真校对，就对不起读者”等。

请马绍弥代笔致蒋刚信二封。回答有关问题，如“从未写过旧体诗”等。

五月月上旬 会见黎烈文的儿子和儿媳，仿佛回到了与黎烈文相处的日子，回忆起许多事情，增加了生活的勇气。托他们带去雨花石，表达“不变的友情”。

五月九日 《巴金影集》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收巴金的照片一百七十三幅。

五月十二日 惊悉毕修勺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出席上海文史馆为毕修勺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并赠送花圈。

五月十五日 致信成都市和平街小学的小朋友。告之寄上《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等书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孩子们会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正在对你们微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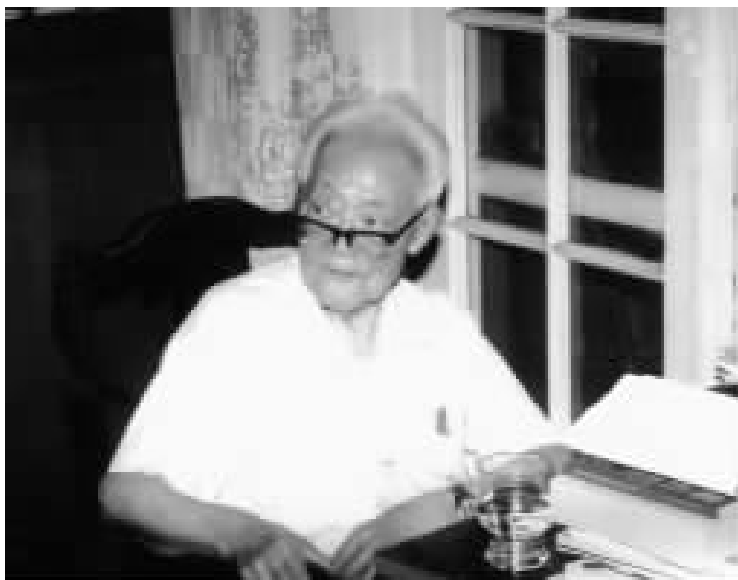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六日 致信藤井省三。告之“《神》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

五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

六月十一日 孙女^丕子个人从美国旧金山飞沪，祖孙相见，合家高兴，巴金的心沉浸在欢乐中。巴金每天与^丕见面、交谈，觉得八岁的孩子在“支持”自己。



巴金在家中。



六月十八日 致信文颖。愿为出版汝龙的书“呐喊”，相信总会出齐的。对目前卖书的人不懂好书的状况不满。

六月二十七日 作《吊唁卫惠林》。向卫惠林之子卫西陵表示：“惊悉惠林兄逝世，深为哀悼。惠林兄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对我的思想的发展与人格的成长都有帮助。我忘不了他。谨电吊唁，并致慰问。”

六月下旬

获悉冰心于二十九日为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出版的《巴金研究资料》题词：“《巴金研究资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工作！”

前往华东医院探望病中的孔罗荪，见他说话困难，遂亲笔手

书一文以共勉。

六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

七月九日 作《巴金全集 第十九卷代跋》。回顾自己在“大批判”中“成长”的过程，建议“让批判与佚文共存”；声明不是文学家，却是“用文学打动人心的人”，所以要掏出鲜红的心来。

七月十二日 与飞回旧金山的孙女丫丫作别，很难过，觉得丫丫几乎把我的心带走了”。

七月十七日 致信文颖。表达对亡友汝龙的思念之情，希望文颖能代丈夫做完未了的事。

七月十八日 作《巴金全集 第二十卷代跋（二）》。说明《杨林同志》是根据杨林的事迹创作的短篇小说。

七月二十日 祝贺贺绿汀音乐生活七十年暨九十华诞，赠送花篮。

七月二十二日 事先同意将《第四病室》手稿，由上海图书馆托裱装订成为线装本，并于今日在该馆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陈列室”展出。

七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赞成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巴金全集》出版合同等。

八月二十九日 致信文颖。告之自己的病情在发展，打算《巴金全集》搞完，真的搁笔了。

九月二日 作《巴金全集 第十八卷代跋》。全文分三部分：一，自云把曾经丢失或当初有意扔掉的佚文保留在全集

中，准备“再接受一次更大的批判”；二，针对有人“叽叽喳喳，明枪暗箭一起出动，想堵住真话的路，让大家说假话过日子”，明确表示“批判并不起作用。我还是要讲真话”，保持艺术家的良心；三，把“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作为“座右铭”，希望读者“理解文学，也理解我”。

九月二十日 看《文汇报》上龚明德发表的《说真话，认真地活下去——重温巴金 讲真话的书》。龚明德在文章中讲述了《讲真话的书》编辑和出版经过。巴金觉得龚明德的文章写得

有感情。

九月二十五日 作序跋《巴金全集 第二十五卷代跋》。认为收入《全集》的日记是为自己服务的“备忘录”，而《随想录》才是“我的真实的‘日记’”，是希望别人理解的“忏悔录”。

九月下旬 仍忙于校阅《巴金全集》的校样。会见了特意从深圳飞抵上海的周明、张锲和晓慧，获悉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文联对杰出的高龄作家的关心，恳请巴金前往杭州休养。同去的还有夏衍。巴金放不下手头的工作，但是经不住女儿李小林和上

海作协有关人员的劝说，终于同意前往杭州“创作之家”休养。

九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劝告带病工作的王仰晨多保重，表示“我的那些佚文、日记、书信印不印都无所谓”。

与从泉州返沪的李济生见面。听李济生讲述黎明大学“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盛况。巴金表示写了几十年，不是想成为文学家，只是有感情要倾吐；又表示，研讨会要有不同的声音。

十月三日 由李小林夫妇陪同前往杭州“创作之家”休养，拟二十日返沪。巴金在杭州，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夏衍游湖、畅谈，置身于他毕生钟爱的西子湖畔，身心愉快，高兴地说：“这次疗养真是太好了，难逢，难得。”

十月四日 早早托人把红玫瑰花篮送到冰心家，祝她生日快乐。后又致信王仰晨。仔细看完了龚明德九月二十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后，在给成都亲戚写的信中写道：“告诉龚明德，陈沂同志读了他的文章以为我病危，马上到我家探望。港台记者也打电话来采访。……龚的文章写得不错，有感情，他要我发表意见，可是我没有力气，连一封信也写不了。”

十月五日 致电冰心，祝她生日快乐。

十月上旬 收到冰心托人送来的礼物：一张设计别致、构思独特的贺卡。这是冰心的朋友为祝贺冰心九十二岁生日专门设计的：粉红色的贺卡上是一个“寿”字，右下角印着谢冰心，下面写十月五日，贺卡一共九十二张，都编了号。冰心很喜欢，珍藏着，只送巴金、费孝通、雷洁琼、赵朴初等挚爱亲朋。又获悉有关单位举行“钱君匋从艺七十年”纪念活动，赠送花篮，表示祝贺。

十月中旬 获悉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对记者说：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文学

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进一步活跃和繁荣。

约十月

在“创作之家”接待专程来访的陈丹晨，分几次作了长谈，并有录音。巴金表示愿意和朋友谈谈天，能多想些事，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巴金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汇合”，而“不完全是无政府主义”。坦诚表示“我是受了刘师复的影响”。他又对陈说，刘师复重视道德，他办了个杂志叫《民生》，后来他生了肺病。临终前，友人劝他把印刷机卖了来治病，他不肯。“我记得刘师复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倘《民生》呜呼，余又成为不治之痼病，刘师复与无政府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表示自己有痛苦才写作，也“不怕挨骂”。在谈到随着东欧、苏联的变化，社会上出现的迷惘和信任危机时，巴金表示：“社会主义总要实现”。苏联“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难说。以前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家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苏联的解体，“是个教训”。在谈到某些社会现象、道德、文化的堕落时，巴金说：“现在社会风气太坏，对于金钱的疯狂追逐有点变态。有些人的生活已经有点荒淫无

耻。”“现在到处有损人利己的现象，假货可怕。从前人讲‘人先要积德，为来世享福’，现在可不一样了，只顾赚钱。”“‘文革’中宣传知识是罪恶的根源，这样的民族怎么得了 没文化的人对同样一件事的反应就不同，处理一件事情，都是为自己，大家都自私自利，这样太可怕了。”他又说：“领导应该重视教育工作，要多关心教师的生活，使教师看到希望。经济发展当然至关重要。但是，没有文化，经济怎么发展”

为由香港校友倡议、海内外校友出资赞助，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盛杨教授设计的巴金青铜头像题词：“掏出来”。尽管家里人不太同意，巴金还是表示“人应该说真话”。这尊青铜头像，在十一月南京师大附中九十周年校庆日举行揭幕典礼。

十一月十一日 致信许祖云。告之南京师大附中在校庆九十周年前要矗立巴金的青铜雕像，是好意，但是，自小就害怕各种仪式，现在“拿我立像示众”“不能不心惊肉跳”，和“惭愧”。

十一月十五日 会见从四川来的朋友谢荣和丁黎，接受了他们带来的双目失明后的沙汀盲写的“祝福”二字，巴金很感动。当获悉沙汀已渐渐摆脱失明带来的精神上的阴影，高昂的医疗费

已得到妥善解决，又开始用口述的方式写出了文学创作回忆录时，巴金说：“难得啊，谢谢沙老对我的祝福，我也祝福他勇敢生活和创作，健康长寿。”“一个人失明了，比什么都可痛，更何况他是个作家，作家更需要用眼睛啊。”“沙老的精神，我是十分赞赏的。”当巴金听他们谈到艾芜时，高兴地表示：艾芜的《南行记》我是每集必看，拍得很好。在客人谈到巴金女儿李小林认真编《收获》和儿子李小棠成为著名作家时，巴金笑着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志向和选择。人年纪大，有子女在一旁帮助你，继承你，这是很好的事。但“孩子们有自己的心愿，不必难为他们”。当谈到故乡时，巴金表示：“要养好身体，争取在我九十岁的时候，再去一次成都，看来，那将是我最后一次探望家乡了。”最后，巴金高兴地接受了客人带来的成都花茶。

十一月二十一日 从《文汇报》上获悉首都各界在全国政协礼堂集会，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发表讲话，指出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越，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又作《巴金全集 第二十二卷代跋》。建议将书信集放在全集的最后：“我默默地献出最后的一切，让我的生命也开一次花。”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事先获悉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大型摄影集《巴金对你说》发行仪式。该书汇集了巴金的三百〇六幅照片，正如柯灵在“序言”中所说：“《巴金对你说》是一本形象的作家传记，也是一册现代中国的历史风情画。”巴金同意捐献十本亲笔签名的编号本《巴金对你说》，在适当的时候参加有关单位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一如既往地表示拍卖所得悉数捐献。

十一月二十四日 接到冰心打来的祝寿并问安的电话，会见提前来祝贺“米寿”的柯灵、辛笛、王西彦、黄裳、冯牧、贾梦龙等老朋友。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大早，黄佐临让人送来了一盆苍翠的松柏，杜宣和文联的同志前来贺寿，并赠送红玫瑰花篮，上海作协送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以及王元化、张锲等委托赠送的七八个花篮，少年儿童出版社、《收获》编辑部、各报记者、电视台的采访人员把巴金的客厅挤得满满的，香气四溢，笑语满屋。巴金高兴地与前来祝寿的《收获》的编辑们一起分享快乐。年轻的朋友们无拘无束地和巴金谈笑时，青年编辑还给巴金出了一道“难题”——让巴金说

出围坐在身边的《收获》编辑们的名字。让这些年轻人吃惊的是，巴金竟从容自如地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大家为巴金真诚的友爱和惊人的记忆力而叹服。其实，巴金对《收获》及对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关注，岂止归功于他的记忆力！自《收获》从一九五七年七月创刊以来，历经停刊、复刊的曲折，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编辑部人员的新老更替，巴金的心何尝离开过《收获》？巴金多少次看见《收获》的副主编即女儿李小林埋头审阅每期四十万字的稿子，弄得头昏眼花，颈椎疼痛；多少次听到李小林在电话中和作者谈修改意见或者和编辑们商量工作；多少次看到编辑部的人来找李小林送稿、取稿，解决组稿、发稿、纸张、印刷、出版、发行中出现的种种棘手难题；又有多少次听李小林讲述编辑部内发生的新鲜事……巴金从不对李小林和编辑部指手画脚，但是他总是和李小林、和《收获》编辑部全体人员，在思想感情上苦乐与共，在精神上给予支持和鼓励。

当巴金经李小林介绍认识前来探望的青年作家马原时，巴金笑着说：“你在西藏呆过，听说上次你的小说出了点毛病？”马原为巴金对他的关心深深感动了。巴金后来又表示，他高兴地看到《收获》在发展，刊物办了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三十五年嘛，靳以和萧岱对《收获》有大功，又自谦地说：“我什么都没做，对《收获》没有贡献，但我支持它！”后来，巴金作为“主角”，面对镜头，参与了青年作家马原主持的《中国文学梦》的拍摄，巴金、马原、李小林在镜头前谈文学、谈历史、谈冰心、夏衍，谈沙汀、艾芜等，一室欢乐，满室阳光。巴金虽感疲劳，却沉浸在幸福之中。

十一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建议三卷书信放在《全集》的最后；告之书信集的《代跋》随信附上。

十二月八日 作唁电《吊唁艾芜》。向四川省作协表示：“惊悉艾芜同志不幸逝世，不胜哀痛。……我也是《南行记》的爱读者。艾芜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请代我向他的遗体献上花圈……”

十二月十三日 在寓所会见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以及中国教育报记者等，接受了李铁映代表孩子们赠送的鲜花。当李铁映要求巴金给孩子们讲几句话时，巴金说：“教育很重要。教育应该改革。”“我年纪大了，喜欢孩子。儿童时代应该活泼，要给他

们一些时间。孩子们的书包太重了，总看见他们一天到晚忙得很。”“年轻人应该首先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不要完全靠父母。应该启发孩子们多动脑筋，多想想。什么事情都弄明白一个道理。”“还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读书，读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应该怎样做人。从小弄清楚公私关系。”巴金的话，引起了李铁映和陈至立的重视和共鸣。

十二月十五日 作唁电《吊唁沙汀》。向四川省作协表示：

“惊悉沙汀同志病逝，深为哀悼。文艺界失去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我失去一位真诚的朋友……”

十二月十八日 托人为在北京中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的“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纪念会赠送花篮。

十二月二十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沙汀、艾芜相继逝世，我这几天心情很坏。……但我要说服自己，存在就是力量。我争取多活。”

十二月二十四日 作为“冰心研究会”的会长，巴金在今天成立的“冰心研究会”上发表贺电：“冰心大姐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她写作了将

近一个世纪，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她以她的一生呕心沥血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是中国知识界的良知，我敬重她的人品并以她为榜样。”

十二月底 获悉北京市有关部门将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址另作他用，巴金对此事极为关注，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会因为无处存身而自生自灭，巴金和冰心商量后，决定分头给江泽民总书记和邹家华副总理写信呼吁。

一九九二年内 年迈体衰，仍为整理、编辑和校对《巴金全集》劳心劳神。当协助他编辑的陈思和“竭力主张”将他写的唯一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编入全集时，巴金略加考虑后，表示同意，但“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当获悉被出版社审稿时将这本书删去后说，看来“我们太书生气了”，还是出版社责任编辑“有经验”。



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致信江泽民总书记，并很快获得批准。

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

撰文认为“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赞扬四川省作协筹巨资印行全省一百三十位中青年作家代表作的盛举。

获悉家乡的四川作协文学院值十周年之际已更名为“巴金文学院”，并设立“巴金文学奖”。建议以沙汀和艾芜的名字命名。

李小林陪巴金远眺白浪滔天、气势壮阔的钱塘潮胜景。

很喜欢采用宣纸直排繁体印刷的线装本《巴金随想录》：装帧典雅，宋锦函套，印有冰心的题词和印章。

将一九八〇年版的布封面的《激流三部曲》拍卖所得四万五千元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自云“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九十高龄的巴金又一次呼吁“作家，记住，要讲真话”。

九十岁

一月三日 致信江泽民。云：“尊敬的江泽民同志：最近我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来信，讲文学馆目前遇到的困难，我感到很不安。归结起来，最迫切的是解决馆舍的问题，这件事已经拖了好几年，但至今尚未落实。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它眼前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盼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在新馆址未落实之前，希望仍一如既往让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我又老又病，写字困难，请原谅。一切拜托了。敬候批复。”

一月五日 作完《最后的话（二）》即《巴金全集》《后记（之二）》。表示“我要为自己写的东西负责”，“即使我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我的感情是真诚的”，《随想录》是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



最后对敬爱的读者表示：“我爱你们。”

一月十九日 上午，在寓所会见上海市政协主席谢希德、副主席毛经权等，和他们高兴地谈到这几年的变化，并告之目前正在抓紧时间审阅《巴金全集》。

一月三十日 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庆红同志电话，获悉江泽民总书记已收到信，并交丁关根同志办理。让巴金、冰心等放心。

一月 致王仰晨信四封。承认过去“战斗过，我也投降过”，又寄出《巴金全集》最后一篇后记等。

二月上旬 会见孟波。谈到经商和教育的问题时，巴金对目前报上宣传搞第二职业，鼓励教师摆地摊的报道不满。他说：现在赚钱好像很容易，万元户不少，但对有些农村教师却发不出工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但如果没有文化知识，经济能搞得上去吗？教育涉及人的素质，不重视教育是个大问题。

二月上旬 从中国现代文学馆处获悉国家计委与北京市领导正在协商，计委投资司、社会司以及中央思想工作领导小组，陆续取走了中国作协为建新馆而提出的列项申请报告。

二月十日 在寓所会见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并合影留念，巴金还在照片上题词：“想念贺

老！”

二月下旬 获悉冰心二十二日致邹家华副总理信的内容，冰心在信中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的老朋友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我是他的热情的支持者，文学馆很需要一个新馆舍来收藏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我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成果。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窗口，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巴金十分高兴地获悉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批示，中国现代文学馆获准建立新馆。原来江泽民总书记在收到处理情况报告后，又亲自写信给邹家华、陈希同：“家华、希同同志：现收到对巴老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望能关心予以落实……世界不论哪个国家，总是要拿点钱出来支持文艺工作的，务望予以继续支持。”于是国家正式决定投资九千六百万，在北京建设总面积二万四千平方米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

二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建议书信卷的注越少越好；认为有的注简直是在揭露别人的伤疤等。

三月上旬 打电话慰问重病在广州住院的国家副主席王震。

三月二十四日 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排的话剧《家》题词：“家 青春是美丽的！巴金，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五日 事先获悉“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在湖南常德桃花源召开，特意托人打电话祝会议圆满成功。

三月三十日 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寓所会见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等，接受他们的祝贺。

三月 整理出一批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刊，并接待了专程来取书刊的唐文一等。从唐文一处获悉，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了纪念胡风逝世八周年，拟筹备“胡风生平与文学道路展览”。该展览得到胡风夫人梅志的支持，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文学馆也做了大量的征集工作，只是，在筹措展览资金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幸亏有一湖南作家和一位医生的赞助，才解决了难题。但是这两位赞助人，很想得到巴金题签的《随想录》。巴金立即答应此要求，同意签名。唐文一坚持先去买《随想录》，然后再请巴金题签。巴金一再嘱咐，要是买不到书，仍要回来。结果，唐文一跑了许多大书店，《随想录》确实一本难求。巴金再次会见前来辞行的唐文一等，获悉他们准备回北京买《随想录》，巴金说：“两本书算什么，我这里还有，你们办的是大事，这就是该用的地方。”遂让李国^①拿出两本《随想录》，签名后交给唐文一，并嘱咐：回北京后，不用

没有神

巴金

我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
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
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
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
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
会再做梦了。我不曾忘记自
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
变为兽，无论谁打着鞭子
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
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
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
是人。

七月六日

巴金《没有神》
手迹。

再买书寄来了。

四月四日 由女儿李小林代表在作协上海分会会议厅出席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举行的颁奖仪式，接受了该基金会董事长及团长林忠民颁发的敬慰状和敬慰奖。奖状上写着：“巴金先生著作等身，作品广受读者喜爱，历久不衰，堪称文坛瑰宝。”李小林遵巴金之嘱，向访问团每位成员赠送了签名本《家》、《春》、《秋》。

四月上旬 获悉香港著名实业家、中华文学基金会顾问庄重文逝世，发唁电并嘱人送花圈。

四月二十一日 为端端编《巴金散文选》作《小序》。

四月 会见华夏出版社编辑夏宗禹，同意该社与浙江富阳古籍印刷厂出版线装本《巴金随想录》。中国作协创联部得到出线装本《巴金随想录》的消息，立即向各地会员发出征订通知，按

成本收费。因巴金的《巴金随想录》虽然有九种版本，但是远远满足不了广大读者的需要，经常出现一书难求的情况。这是第十种版本，创联部的通知发出后，出版社收到许多读者汇来的书款。又致王仰晨信四封。告之三卷书信集校样已看完；书信卷增补由王仰晨安排，以及将编印《全集》用过的资料开列清单等。

五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同意作《秦牧全集》顾问；十二妹李瑞珏患糖尿病到了晚期，病情得到控制，但是脑子有问题；主张文章要少讲废话，能删就删等。

六月二十一日 致信王仰晨。感谢王仰晨为《巴金全集》花费的心血和精力。

七月六日 作随想《没有神》。云：记得自己曾经“由人变兽”，而今“我不会忘记自己

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也不再相信梦话！”认为“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七月十九日 作线装本《巴金随想录 后记》，说明这是《随想录》的第十种版本，增补了《怀念从文》和《怀念二叔》。

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 巴金关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获悉大会通过的《向巴金同志的致敬信》，音乐家朱践耳当选为文联主席。

七月二十五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等《巴金全集》出齐，再看一遍，从佚文集中删去一部分，抽去一些违心之论和豪言壮语；版权和稿费问题还未能决定。面对披上“社会效益”的“拜金主义”，声称“我的心从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

八月二十六日 获悉中国作协理事、作家温小钰病逝，发唁电并嘱人代送花圈。

八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寓所会见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草婴，接受了他的新译作四卷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此刻巴金十分高兴。他一直关心和支持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全集》的工作，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珍藏的英文版的托尔斯泰作品借给草婴参阅。

八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

九月十七日 为今日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的“胡风生平与文学道路展览”赠送花篮。

九月十九日 夜，作完讲话稿《致四川作协文学院成立十周年》。认为四川作协在“严肃文学面临困境”情况下，出巨资印行了全省一百三十位中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是“高瞻远瞩”的行为，表示作为“一个文艺战线老兵”、“一个家乡的同行”而“感到光彩”；希望中青年作家“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不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九月二十六日 致信吴克

刚。云过去的事还能记得，只是长期生病，身体更差，现在“讲不清楚，也写不出来了”，建议吴克刚写。又回忆一九二七年二月与吴克刚在巴黎结下的友情，表示“我受过你和卫惠林不小的影响”。还忆及当年三人喜欢辩论的情景，发出要是“能再吵一吵多好”的感叹。

九月下旬 应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邀请到汪庄休养。汪庄是著名安徽商人汪裕泰茶庄的旧址，濒临西湖，景色宜人，花草繁茂，树木葱茏。当年毛主席到杭州也下榻于此，现在已对外开放。巴金原想住“创作之家”，只是盛情难却，拟先住几天再



一九九三年十月巴金 前 与女儿李小林 后左、外孙女端端 后右 在杭州。



⊖ 巴金在秦松、王氏跪像前。
⊖ 巴金在杭州“创作之家”晨练。



说。巴金住的是一幢平房，既能一览西湖胜景，屋前又拥有他极喜爱的金桂、银桂和珍奇的丹桂。其实，巴金到汪庄，不仅是为了休养，他在离开上海前，就对李济生说了心里话：“这回去清静清静，要好好想想，思索一番。”李济生理解四哥即巴金的杭州之行，更多的是想在独坐幽思的孤独中，领悟人生，回忆既往，以鉴将来。

九月三十日 中秋之夜，与曹禺通了电话。听到病中的曹禺声音响亮、中气十足就放心了。巴金高兴地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曹禺回答：“我们共吃一个月饼。”巴金笑了，曹禺笑了，身边的亲人们也笑了。有谁知道，这是巴金最后一次听到曹禺的声音……

九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巴金全集》书信卷可以由王仰晨继续编下去；决定将《成都日记》手稿捐赠成都市档案局等。

十月初 接意大利蒙得罗国

际文学奖评委会负责人和终身主席兰蒂尼的邀请信，获悉中国作协荣获“意大利蒙得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该奖旨在表彰中国作协在促进中意文学交流中作出重要贡献，巴金作为中国作协主席，被邀请前往直意大利领奖。

十月二日 在汪庄会见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获悉国家计委批准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九千六百万已经列项，可以分期使用了。新馆馆址选在亚运村附近。巴金很

高兴，新馆的建成是他晚年关注的一件大事。

十月三日 上午，应浙江省委的邀请从汪庄乘船游西湖。同行的有李小林、张锲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巴金穿一件咖啡色茄克衫，下穿蓝布裤，脚登一双运动鞋，更显得精神矍铄。接待处的张处长说：巴老来了，天气就好了。巴金说：“不是我来了天气就好，是你们选了个好日子。”西湖的天气，雨雪阴晴都有特点，都有看头。游湖时，巴



金心情舒畅，谈兴也浓，他说三十年代来杭州时，每次不过三四天，最喜欢的是登山走路。南高峰、北高峰、五云山、龙井、虎跑、云桥、天竺，都去过。每天一早，几位朋友一起，带足干粮离开旅店，一直走到傍晚。那时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有时一边走，还一边商谈着各自的文学计划。巴金的心和西湖、和友情、和怀念交融在一起了。这天是农历八月十八日，李小林提出要和爸爸一起去九溪附近的珊瑚沙观看钱塘潮。巴金欣然答应。下午三时，巴金和大家登上了珊瑚沙附近一家民居的三楼阳台，居高

临下，远眺天下著名的钱塘潮胜景。只见珊瑚沙畔人山人海，潮头迭起，欢声雷动。巴金全神贯注地看着白浪滔天、波涛汹涌、气势壮阔、呼啸而来的江潮。大自然的磅礴雄浑，仿佛给九十岁的巴金注入了顽强的生命力！夜，致信兰蒂尼。信中提到意大利的樊塞蒂即凡宰特说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能得到发挥”对自己的影响，巴金云：“这段话使我非常激动，讲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已变成一行行铅

字留存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里。我在序言里称樊塞蒂是我的先生……”

十月十三日 因健康原因不能去意大利领奖，遂委托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巴莱莫市领奖。

十月二十日 获悉四川省作家协会举行文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和《文学院丛书》首发式，四川文学院更名为“巴金文学院”，该院将建立“巴金文学基金会”，设立“巴金文学奖”，鼓励巴蜀青年文学创作。

十月二十六日 致信四川省作家协会。云：自己只是一个普



巴金 坐者 与杭州灵隐寺根源法师 左 在一起。“寿”字为根源法师书赠巴金的生日贺礼。

一九九三年十月
巴金 坐轮椅者 在岳王庙。



通的文学工作者，现在将“巴金”和家乡的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并表示“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极力推荐以沙汀和艾芜的名字来命名。

十月二十八日 嘱人为在福州举行的“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赠送花篮，表示祝贺。又为安葬于成都的艾芜的墓题写“艾芜之墓”。

十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关于日记手稿的处理意见：《赴朝日记》原件捐中国现代文学馆，抄件给上海；《成都日记》原件捐成都市档案局，抄件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日记》原件捐上海，复印件捐中国现代文学馆及慧园。又获悉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得。

十一月七日 巴金事先捐出了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布封面《家》、《春》、《秋》，在书上分别签名题词，并同意将这套书参与今日上午在东湖电影院举行的“当代著名作家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著作义拍”活动。结果，这套书从三千元起拍，经过三十二轮竞拍，最后拍得了四万五千元的高价，得到这套书的读者尤伟庆说：“因为我从小热爱巴金的为人和爱读巴金的书。”义拍所得，巴金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十一月十日 为期七天的“把心交给读者——巴金”摄影展，今天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开幕。这次展览由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举办，王元化主持开幕式，徐中玉宣读开幕词。巴金观看了当晚的电视新闻，为络绎不绝参观者的热情所感动。

十一月十四日 会见华夏出版社的编辑夏宗禹及浙江富阳古籍印刷厂的同志，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特意赶制出来的两套线装本《巴金随想录》样书。该书收录了《随想录》中的一百五十篇，又增补了《怀念从文》、《怀念二叔》和巴金新写的后记，内容丰富。线装本《巴金随想录》采用宣纸直排繁体印刷，装帧典雅精致，外加宋锦函套，印有冰心题写的书名“巴金随想录”，并有冰心鲜红的印章。展开函套，重叠的五本《巴金随想录》鲜红灿烂，喜气盎然。巴金很喜欢这套书，在拿出的第一本书上签名题赠冰心，题词中有“冰心大姊，谢谢您的信，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字”，并立即致函向冰心致谢。夏宗禹等见巴金十分喜爱这套书，打算以后再编印一本大字本的。巴金笑答：“那我得鼓足劲再写两篇加上才行。”得到巴金认可，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十分高兴，决定将一千册书在二十五日前全

部赶印出来，送到读者手中，作为祝贺巴金九十华诞的贺礼。

十一月十八日 会见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时表示：“我这人讲了多少真话，都很难说，但我努力不讲假话。”

十一月二十日 上午会见上海歌剧院老院长张拓和中央歌剧院演员李元华，观看了他们带来的歌剧《鸣凤》录像。把《家》改编成歌剧《鸣凤》，李元华八年前就和张拓一起来征求过巴金的意见，巴金同意授予她改编权，并提出在鸣凤投湖时要增加“咏叹”的具体意见。遗憾的是文艺团体经费拮据，李元华多方筹措，历时八年，才在广东惠州首演成功。巴金看了录像后说：“我写鸣凤，是控诉封建社会。曹禺是我的好朋友。他改编的话剧《家》中，鸣凤也有一段独白。曹禺的台词写得好，像散文诗一样。比我的写得好。”“每个人都有权利向往明天，歌剧把这一点唱出来了，可以！”李元华准备把《鸣凤》列入《中国歌剧欣赏》大型纪录片中，巴金听了很高兴。

十一月二十日 祝贺巴金九十寿辰的朋友和读者已经开始“提前行动”了，送来的鲜花、花篮从客厅向过道、门厅、走廊、花园延伸。冰心嘱人送的由九十朵红玫瑰组成一个大“寿”字的大花篮抬进门时，巴金高兴



地看着红色缎带上写着的“巴金老弟九十大寿”笑了，还站在花篮前照了像。曹禺及其夫人李玉茹共同完成的书法作品“壮心超百岁，热情暖人心”，也让巴金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午，会见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长黄菊和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时，巴金主动提出要修缮作协资料室，保护珍贵资料的要求，还建议扩建福州路文化街等。市政府领导都答应了巴金的要求，接

受了巴金的建议，他们还希望巴金明年春暖花开时，去浦东看看。中午，会见《文汇报》记者沈吉庆，接受了萧乾托他带来的三件礼物。一是萧乾手书的四个巴掌大的毛笔字：“真话万岁”。记者说，萧乾最怕写毛笔字，只是人们总认为毛笔字更能表示出敬重，所以，他就献丑了。巴金听后不禁笑了。二是萧乾的近作《关于死的反思》，扉页上有题词“让我们活得更潇洒自如”等。三是萧乾从夏天就四

处托人，甚至登报，最后还是托沈吉庆设法买到的治疗仪。巴金仔细地看、听着，心里涌动着暖暖的友情。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早，巴金身穿紫绛色的茄克，安详地坐着，沐浴着阳光。红润的面庞，一头白发，更映衬出老人的睿智。最先到的当然是文化新闻界的朋友和记者，巴金在充满喜气的客厅里，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祝贺。巴金说：“我活了九十岁，主要靠读者，是读者养活

巴金手捧鲜花与前来祝寿的人们一起欢笑着，喜度他的九十大寿庆贺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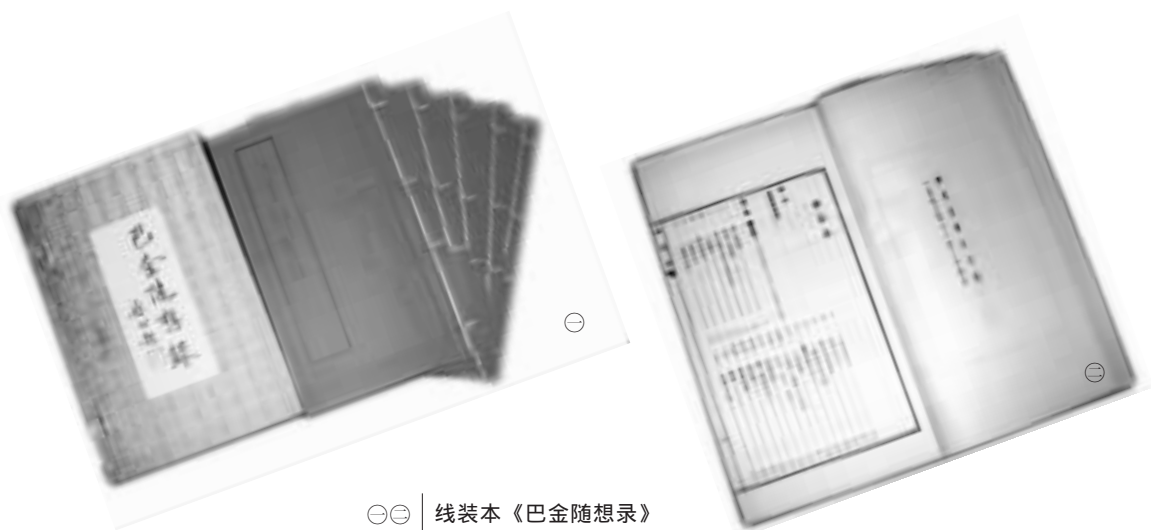


褚钰泉在《百寿图》上签名。

我。读者要是不看我的书，我也不会活到今天。我又老又病，没有理由庆贺，要是我能再活一次，再从头学习，那有多好。所以，我羡慕你们，你们都比我强。我是最值得庆贺的人。”一时间，镁光灯在不停地闪烁，掌声经久不息地在客厅里回响，欢声笑语飞出窗外。巴金还对新华社资深记者赵兰英等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写信或写文章表达我的谢意。只能请你们转达我的这份感情。”老作家马识途来

了，他代表四川乡亲向巴金祝福，还带来了巴金爱吃的家乡菜——豌豆尖和地道的四川腊肉，还有一双精致的红木筷子。当马识途说道，红木筷子是让巴金努力夹（加）饭菜时，巴金高兴地笑了。又与前来祝寿的陈荒煤、冯牧、潘际¹等欢聚，看到冯牧代表巴金去意大利领奖和在佛罗伦萨拍的照片，连说：“照得好！”会见了《小伙伴报》的主编张琳小朋友，接受了她代表一百二十万小读者的祝贺，巴金慈

祥地说：“谢谢小朋友的关心，我没什么可送你们的，但有一句话，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学做真人。”巴金接受东方电视台采访。当看到《收获》的编辑捧着祝寿的大花篮进来，巴金微笑地对着话筒说：“我要对读者说的话，我在《巴金全集》最后、在《收获》上，发表了《我最后的话》，就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人要有未来，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



线装本《巴金随想录》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



巴金手迹。

巴金与陈子善在一起。

按惯例，巴金和《收获》的编辑们在一起拍了“全家福”，吃蛋糕，分享生日快乐。还会见了前来祝寿的《文汇读书周报》褚钰泉等编辑人员，接受了他们赠送的花篮，兴致勃勃地问起该报的近况，高兴地告诉褚钰泉等，他看到许多海外报刊转载《文汇读书周报》的文章。巴金也称赞《文汇读书周报》办得内容丰富，又正气又生动，又有深度。巴金同意《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他的《我最后的话》。下午，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董寅初，接受了他们赠送的一尊“老寿星”。钱正英代表李瑞环致贺词，盛赞巴金的“作品和人品赢得了文坛与世人的共同尊

敬”。巴金在答词中说“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十一月 又向黎明大学赠送一批珍贵的中外文图书共五百五十三册，其中有曾对青少年巴金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二十年代由李石曾翻译的《夜未央》、巴金签名收藏的《鲁迅书简》等。至此，巴金已为黎明大学捐赠了十一批，共计七千〇七十三册书，为此，黎明大学设立了巴金赠书库，创建了巴金研究所，出版了《巴金研究》季刊。

十二月九日 致信王仰晨。请王仰晨将西班牙画册两本代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十二月约上旬 收到留法学

者、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顾问刘秉文女士的贺信。获悉她的心愿是让巴金亲眼看到法国大作家伏尔泰、卢梭、左拉等的手稿；并随信附上左拉一封信的复印件作为祝贺巴金生日的礼物。盛赞《随想录》“将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奇葩永放光彩，世代相传”。又为谷苇题词：“讲真话！”并对谷苇说：“作家，记住，都要讲真话。”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会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学者陈子善，叙谈甚欢。



“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出齐。
 巴金轻轻地抚摸着李小林精心编完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更加思念饮恨而逝的爱妻萧珊。
 赞沈从文有很高的才华，“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为香港和澳门回归欣然题词：“人民的意愿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
 在有百位教授、作家、学者、编辑和评论家签名、钤印的《百寿图》一侧留影。

九十一岁

一月十二日 获悉三联书店版《随想录》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图书有五卷本《管锥编》、十二卷本《莎士比亚全集》等一百三十五种，《随想录》名列榜首。

一月十九日 获悉吴组缃逝世，遂嘱人前往八宝山吴组缃灵堂敬献花圈。

一月二十日 在寓所会见前来拜早年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

一月二十二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最后的话》可能是绝笔了。

二月五日 在寓所会晤陈思和、李辉。

二月九日 除夕，合



高莽作巴金像
及冰心题词手迹。



巴金

的一个世纪



陈思和右在一起。
巴金左与李辉中、

家团聚，高高兴兴迎新送旧。

三月十四日 得见冰心一月三日在高莽作巴金画像旁重书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题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赠巴金。”巴金看后签了名并钤印。

三月十七日 在寓所会见《文汇报》驻京记者陈可雄等，收到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文艺界委员王蒙、黄胄、戴爱莲、吴冠中等三十三人的联名信，接受了他们的慰问和敬意。

三月二十一日 让李小林通知上海市作协资料室保管巴金捐赠书籍、手稿的陆正伟来寓所取书。这次捐赠的有巴金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的日记手稿和《随想录》的十三种版本、一九五四年一月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颁发的特别通行证等。

三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同意编辑《巴金译文全集》，但是由于疲劳，决心又动摇了。

四月二日 致信欧阳小华。

云欧阳小华的父亲阳翰笙“是我敬爱的一位朋友，他对我国革命文学事业有大的贡献”。

四月三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同意王仰晨提出的赠书目录。

四月十四日

事先获悉北京今日举行“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托与会的同志去看望了冰心、曹禺、孔罗荪等老朋友。研讨会由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华文学基金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云南玉溪烟厂联合举办，十四至十六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致开幕词，冰心、夏衍、曹禺、艾青、柯灵、萧乾、张光年等为研讨会题写祝词。全国文学界及日本、韩国等二百五十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巴金后来观看了研讨会的录像。

获悉大型摄影图片展览“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在北京展出。

二十六卷本《巴金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出齐，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译文全集》十四卷，“因精力有限，原来的译作不准备大动了，让历史来评判吧”。

四月

在和萧珊结婚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女儿李小林实现了母亲的遗愿，编完了《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作为一份迟到的礼物，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都是萧珊生前珍藏的，她按时间给这些信编了号，准备晚年时编一本巴金和她的书信集。遗憾的是，她的愿望再也无法亲自实现。值得庆幸的是，萧珊的这一遗愿由女儿李小林完成了。当巴金答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要求，翻阅一封封的家书时，让萧珊带走了的他的一部分生命又复活了，他们的生活、爱情、友谊又如此真切地展示在眼前。然而墨香犹存，斯人已逝，巴金的心又一次沉浸在无言的痛苦和愤懑中……目睹这一封封的家书，巴金的愤怒在心中升腾。书信曾被“造反派”当作“罪证”反复翻阅审查，画上红杠杠，打了各种各样的记号，至今还一处处尽显“造反派”狰狞的面目，他们是把巴金和萧珊往死处逼！如今巴金已以自己的心和笔，赢得世人更大的敬仰，《家书——巴金萧

珊书信集》业已焕然问世，而萧珊却饮恨长眠！她去世时的凄凉、绝望、孤独、屈辱、担忧，连同那生命之火逐渐熄灭的一双大眼睛……历历在目！女儿李小林不忍爸爸再承受感情的痛苦，为了表达对母亲永不忘却的纪念，决定和丈夫祝鸿生将家书一封封认真抄写、核对，并写了辞真意醇、感天动地的《后记》。巴金流着泪看完了李小林写的《后记》。女儿对母亲一片深挚真情的流露，字字句句敲打着他的心。他默默地点头，郑重地将《后记》放在家书后面。他轻轻地拍着厚厚的书稿，仿佛在和萧珊低声细语。

会见严麟书，将《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全稿正式送交浙江文艺出版社。

认真校阅《巴金全集》的艰苦劳作，使巴金近几年来身心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中。现在《巴金全集》已出齐，加上因武康路寓所要大修，巴金无法继续在家工作，只得听从家人苦劝，到杭州汪庄休养。巴金到汪庄后，心情放松多了，每天静静地坐在窗前，将西湖的“浓妆”、“淡抹”尽收眼底，情趣盎然地“读”着西湖，“听”着西湖，“梦”着西湖，和西湖絮絮地、倾心地聊着。西湖在他心中有时碧波荡漾，明净如洗，有时却波浪起伏，潮头迭涌……当然，最高兴

的是每天两次，坐着轮椅去西湖边散步，让掠过湖面的风轻柔地梳理他的白发，让簇拥着湖边的绿色滋润着他青春常驻的心。他享受着家人和朋友的亲情和友情，也珍惜与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的邂逅。巴金和年轻时一样，对西湖的情爱经久不衰。

五月四日 在端端从上海带来的《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扉页上作《西湖之梦（一）》。回忆六十八年前第一次游西湖、五十年代与萧珊游西湖以及现在游西湖的不同感受与心境，充满了对西湖的爱和眷恋。

五月六日 在赠端端的《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扉页上作完《西湖之梦（二）、（三）》，回忆了三十年代与从法国回来的詹剑峰，前往杭州与卫惠林夫妇欢聚的情景。回忆了一九三七年与卞之琳、师陀在杭州天香楼并相约十年后重聚的往事。

五月十二日 作为黎明大学名誉董事长，巴金在泉州市东郊印海寺西侧，黎明大学新址第一期建设工程奠基典礼上发表书面《贺词》：“欣悉新址第一期建设工程奠基，因病未能参加典礼，特电致贺，千秋大业，永世其昌。”

五月十四日 巴金就要离开汪庄了，客房部经理拿来精美的签名簿，巴金见前面已经有李岚清、姚依林等国家领导人用毛笔

在留言簿上的题词，于是一改往日用钢笔的习惯，嘱人拿来毛笔，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巴金感谢你们”，表达了对汪庄的服务员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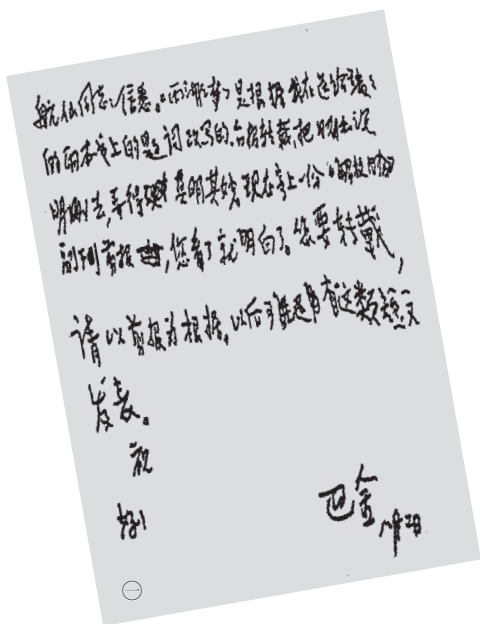
五月十五日 在有关单位的安排下，巴金终于“登”上了玉皇山顶，俯瞰杭州全景，西湖像一面镜子，镶嵌在绿色葱茏的城中。此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巴金心旷神怡，不禁遥想六十多年前初登玉皇山的情景：“都是从石阶上走上去的，那时年轻气盛，也不觉得累。一九九〇年，我又来过一次，汽车在半山腰停了下来，由于山顶风很大，所以没上去。”而现在，九十高龄的巴金终于又“站”在玉皇山顶，他脸上洋溢着纯真、欢乐的笑容。

五月二十日 作《关于全集书信编》，载十一月八日《新民晚报》。回忆因在信中讲了真话，在“十年浩劫”中被朋友揭发而写“交代”的经过，以及真相大白后对朋友的原谅，因为巴金思考的根本问题是：“责任在谁？”又作散文《关于克刚》。重申在巴黎时受到吴克刚和卫惠林的影响，自己才有今天。又作散文《怀念亲友》。认为自己“精神的发展和成长少不了亲友的慷慨帮助”，抒发了对逝去的濮季云、吴先忧的怀念和



巴金

的一个世纪



①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巴金致方航仙书信手迹。
② 卫惠林。

感激之情。

五月二十八日 作序跋《巴金译文全集 序》。云：尽管有人听见“真话”就头痛，仍表示“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认为构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译文“都是真话”。

五月 致王仰晨信三封。告之决定将编辑译文集的事托给王仰晨；编好了译文集目录、写完了译文集序言初稿等。

六月一日

获悉老朋友、著名戏剧家黄佐临病逝。

巴金在杭州休养，坐轮椅外出散步时，巧遇上海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柯立克。柯立克高兴地说：这“使我终身难忘”。原来

柯立克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曾研究过五四新文学，读过中文版的《家》和英文版的《春》、《秋》。巴金高兴地和柯立克交谈，并合影留念。

六月中旬 获悉著名作家骆宾基病逝，内心悲痛，于是挂电话，请中国作协代送一个花圈。接着，又打电话，请中国作协向骆宾基家属转达问候。

七月初 获悉中国现代文学馆杨犁病逝，嘱人代送花圈。

七月二十九日 作完随想《怀念卫惠林》，载八月十三日《文汇报读书周报》。回忆了从一九二五年认识卫惠林，到“卫惠林走了”的几十年中两人的友情。巴金深感“倘使当初我的生

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七月 致王仰晨信二封。告之寄上《西湖之梦》剪报，以及体检结果无大问题等。

八月二日 致信《巴金研究》主编方航仙。云“《西湖之梦》是根据我在送给端端的两本书上的题词改写的”，并建议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西湖之梦》原文“为根据”“转载”。

八月

得到严麟书送来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校样。酷热难当，李小林认真校对后，巴金又亲自校对一遍，发现了不少排错之处，并亲自改定。

致王仰晨信二封。发现应该

收入译文集的《卖鱼人的生活故事》，却已收入全集；告之徐成时愿意为译文集帮忙等。

九月十二日 致信王仰晨。谈译文集目次问题。

九月底 由李小林安排与李舒等一起去杭州过国庆。

九月 为祝贺《文学报》出刊八百期题词：“繁荣文学创作。”获悉冰心的题词为“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都读文学报”、曹禺的题词为“文学之树常青”。

十月四日 从杭州给冰心发了生日贺电：“祝你生日快乐！”

十月五日 惦念着今天是冰心的生日，中午让家人拨通了冰心家的电话，遗憾的是，冰心家里没有人接。巴金心中不安，事后获悉冰心因患糖尿病和心脏衰竭，已住进北京医院。

十月八日 致信冰心。这是巴金花两天时间写成的短简，告之近来“手又不抖了，自己感觉精神良好，乐观起来，常常做同您见面的梦”。

十月十日 在丁聪《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 选刊》上发表对沈从文的评介：“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十月十五日 作散文《我永远忘不了他》（原题为《敬祝大会圆满成功》），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学报》。认为靳以是“深受读者敬爱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表示永远忘不了他的正直善良、热爱生活、勤奋写作和那颗热烈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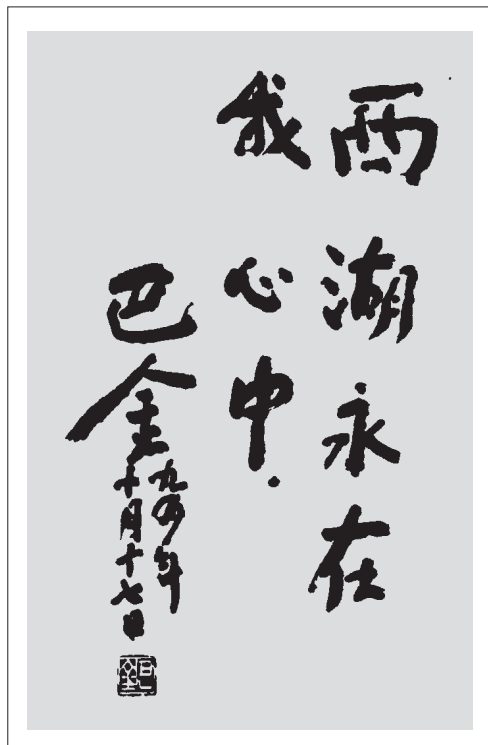
十月十七日 用毛笔为浙江省公安厅的陈福兴处长题词：“西湖永在我心中。”

十月十八日 在杭州，托人给住院的冰心捎去一封信。云：“没有想到五日那天您到医院躲生去了。不能让您听到我的声音，也没能听到您那风趣的讲话，不用说，有点失望，但也可

以说抱着更大的希望：明年想个法给您拜生、给您祝寿吧。”

十月二十七日 获悉孔罗荪的女儿星期天要用轮椅推着父亲来看自己。当天下午，在巴金坚持下，亲自去了孔罗荪的家。巴金由大家设法帮助上了楼，被人扶着，艰难地走到孔罗荪的面前。经受着小脑萎缩症和老伴去世的双重折磨，眼前的孔罗荪早已失去昔日的风采。巴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颤颤巍巍地说：“罗荪，你回来了。”孔罗荪也竟然开口回答：“你好！”他的女儿急忙问：“认得吗？”罗荪回答：“认得！”流出泪水。此时，巴金已经坐在孔罗荪身边，

巴金为
陈福兴题词
手迹。





依然紧紧握着他的手。两位老人，热泪盈眶，默默地坐着，进行着无声的心的交流，几十年的相识相知，荣辱沉浮似烟云升腾，搅动着他们的心。这是巴金和孔罗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巴金和孔罗荪的诀别。

十月二十九日 致信王仰

晨。泛黄，声气渐弱，孩子们再三劝他去看病，他摇摇头，又埋头看起校样。

十一月九日 致信王仰晨。告之同意王仰晨关于《巴金译文全集》的编排法。

十一月十一日 在寓所会见王蒙、陈丹晨等，就目前的创作和文学事业的现状、前景等问

的“狗狗蛋”孙女丫丫将从美国飞来祝贺爷爷生日，巴金十分高兴。

十一月二十日 巴金疼得坐也不是，睡也不是，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连躺着睡也不行了。其实前些日子，巴金由于忙着审编《巴金译文全集》，伏案时间过长，已感到腰背酸痛，但是他想挺一挺，因为一到医院检查，就会被医生安排住院，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更重要的是丫丫马上就要回家了，巴金的心早就充满了祖孙团聚的渴望和欢乐，他可不愿意在这时住进医院。现在，他心头明白，看来“硬挺”是挺不过去了，于是盼望天亮，到医院检查。

十一月二十一日 巴金一早就去了华东医院，检查结果是“老年性骨质疏松”引起胸脊椎第八节压缩性骨折。于是巴金进入和病魔抗争的艰难时期。每天平卧在床，睁眼看到的就是白色的天花板。幸好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蒋焕孙专程从杭州送来了《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巴金用手抚摩着散发着油墨香的书，仿佛萧珊又坐在身边向他倾诉心扉；耳边传来上海市作协的陆正伟朗读李小林写的极有感情和文采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的《后记》，减轻了病痛带来的痛苦。孙女丫丫按时由美国赶来为爷爷祝寿，有她天天陪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巴金 坐者在寓所会见王蒙 右 和陈丹晨 左，中为李小林。

晨。告之以后“编辑译文集有问题我们商量解决”等。

十一月一日 为港澳回归欣然题词：“人民的意愿一定要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十一月上旬 睡觉时感到背部疼痛，好几个晚上睡不好。但是，不愿去医院检查，早上起来后，仍忍痛坚持校阅译文全集。几天折腾下来，巴金的精神萎顿了不少。看见他眼皮浮肿，面色

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摄影留念。

十一月十五日 事先获悉今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靳以诞辰八十五周年座谈会”、开放“靳以文库”和“靳以生平与创作”展览，巴金遥寄了《敬祝大会圆满成功》的两页文稿：“我永远忘不了他，看到他的作品，我还感觉到他那颗热烈的心在跳动。”

十一月中旬 获悉全家疼爱



- ①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巴金在《百寿图》前。
- ② 巴金与华东医院医护人员合影。
- ③ 巴金 右 与陈至立 左 在一起。



伴，巴金的心境平静而快乐。端端也成了巴金的好帮手，赠书扉页题词的事，由巴金口述，端端代笔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 会见唐金海、张晓云。接受了唐金海书写并征集百位教授、作家、学者、编辑和评论家签名并钤印的《百寿图》和余思牧先生委托他们送来的生日蛋糕。并云：“你的信

我看了，你们好吗？还在写书吧。你们来了，我很高兴。……余先生好吗？听说他身体不好，他年纪还小，身体要注意。我腰疼，晚上睡不好，没精神，医生说要两个月出院……我写字不方便，代我问余先生好，问他太太好……”还先后会见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副主席石祝三，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副

部长徐俊西等，接受了上海市委的生日祝贺。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满屋鲜花的喜庆气氛中，会见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大家还一起分享生日蛋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会见靳以的女儿南南，接受了她的祝福。巴金让李小棠取出《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代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为签名，又让李舒印上了名章。这是巴金十分珍爱的一枚印章：小小的，铜质的，上面镌着“靳以送”。巴金见南南接过印章，一边看，一边热泪盈眶，他也不觉情动于衷。当年靳以在北平办刊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想不到一眨眼靳以已去世三十几年了。南南慢慢地打开巴金赠予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萧珊的第一张照片上，大家知道，南南是想起了自己的干妈萧珊。巴金把目光移向窗外，默默地听南南说起，她家的影集里，也曾经有过萧珊的这张照片，但是，在十年浩劫中不知去向了。在那炼狱般的日子，不要说作为“罪证”的照片，就是照片上的亲人也在十年浩劫中含冤饮恨而逝！

同意捐赠三十本签章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参与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的认购活动，参加捐赠认购活动的还有冰心和柯灵。每本书以一百元价认购，所得书款，捐赠“希望工程”。

十二月 由上海市作协安排，在医院会见了电影《英雄儿女》的主要演员刘世龙、刘尚娴。当他们贴着巴金的耳朵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时，巴金笑了，笑得那样纯真和幸福。



一九九五年

躺在病床上，对柴可夫斯基的话产生共鸣：“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间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里中也仍然存在着欢乐。”

巴金、李济生、李采臣老兄弟三人与孩子们及其余亲人一起度除夕。

坐轮椅到虹桥宾馆出席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云已年过九十，做不动了，“只能无力地为你们摇旗呐喊”。

将四千册异常珍贵的外文书籍捐赠上海图书馆。

以九十二岁高龄为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逐一作跋。

喜获据屹立在联合国大厦前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世纪宝鼎”原型缩小精制的“青铜宝鼎”时表示：“我永远是普通的中国人。”

白云早年留学法国，吃惯西餐，以后几乎成为习惯。

九十二岁

一月五日 从《文学报》上看到流沙河、白士文合著的《三鬼图幽默文集》选载，看到有关巴金一段，有会心之慨。流沙河曰：“巴金返里，晤蓉城大小头面于金牛坝省招待所。诸公祝愿巴老长寿，有人云：‘巴老，你脸色很红润，非常健康！’巴金回答：‘虚火上冲。’表情严肃，端坐不动。”

一月六日 获悉夏衍病逝于北京，想起去年夏天和夏衍在杭州“创作之家”相处的日子，心中默然。

一月十二日 为《再思录》口述序言，由李小林笔录。白云躺在病床上，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间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里中也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因为，序言中引用了柴可夫斯基的话，严谨细心的李小林回家找出原文查对，发现九十岁的父亲记忆力惊人！



因为，巴金脱口而出的那段话和译文仅有“如果”和“假若”的不同。

一月二十二日 为“希望在行动”捐赠签名本《随想录》，参加“义拍”活动。《随想录》、《冰心文集》等参加“义拍”的十三件作品，共得二百七十四万三千元，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又会见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等一行。朱训亲切询问了巴金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况，并转达了李瑞环和全国政协对巴金的新春祝贺。巴金请朱训转达他对李瑞环和全国政协的感谢。

一月下旬 住院三个月来，巴金积极配合华东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日前已逐渐康复，医生宣布可以下床，巴金很高兴，穿着硬邦邦的“钢丝马甲”就下床，终因久卧人虚，引发疝气，立刻躺下。

一月二十九日 巴金戴着疝气托，穿着“钢丝马甲”，终于“站”起来了，他乐了，笑容也浮现在家人们的脸上。自此，巴金开始认真地做医生规定的“功课”了：扶着助步器，在家人的监护下，一步一步在病房的长廊里走着，上午、下午，都要在长

廊里走两个来回。巴金坚持不停下自己的笔，坐在轮椅上，用既僵又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实在写不成字，就口述。

一月三十日 除夕。巴金面色红润，心情舒畅。李采臣从宁夏银川赶来，加上李济生，老兄弟三人和孩子们过了个高高兴兴的除夕。

二月初 获悉李采臣受宁夏人民出版社委托，约请巴金编一本杂文集。巴金同意并委托李济生代为编选。对李济生当面提出四点要求：一、多选未曾收过集



一九九五年春节巴金在华东医院。李舒为他拍摄的这幅照片命题“重新站立”。

中国作家协会 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巴金
左二 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

子的文章；二、选目最好前后关照，使能体现出它们中的一致精神；三、字数不宜过多，限二十万字；四、书名定为《巴金杂文选》。

二月六日 作唁电《致沈宁》，载二月九日《文学报》。此电为悼念夏衍而作。云“夏公的精神长留人间”。

二月十九日 在北京举行的夏衍遗体告别仪式上，赠送花圈，遥寄哀思。

三月九日 致信王仰晨。

三月上旬 审阅李济生列出的《巴金杂文选》篇目并认可。让巴金满意的是，李济生完全按照自己提出的四点要求，九十余篇杂文，恰好二十万字。从内容看，涉及政治生活、社会现象、文化、艺术、教育和出版等方面，全是自己想告诉读者的真

话。李采臣携稿北上，巴金与他依依惜别，嘱李济生代为送行。

三月二十四日 会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锬等，获悉张锬正为华东医院会议室太小，容纳不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而犯愁时，巴金表示：“在医院开会，会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还是我去大会场吧！”后来，在巴金坚持下，张锬等与院方慎重研究，基本上同意巴金的意见，特批两个小时假，并委派特别护理人员随时应急照料。

三月二十五日 由李小林陪同前往虹桥迎宾馆，出席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当满头白发、身穿绛红色上衣、胸前佩带“代表证”的巴金坐着轮椅出现时，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中国当代文坛的精神旗帜巴金致意，巴金也向大家挥手致意。

他宣布大会开幕后，用极富韵味的四川话，缓缓地说：“同志们，今天能参加这个会议，我很高兴。”因为讲话困难，就请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代读他的讲话稿。表示赞成“团结、鼓劲、活跃、繁荣”作为会议主题的提法。希望作家们团结，团结才能稳定。有一个和谐宽松的气氛，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发展，文学创作才会繁荣。“我已年过九十，又疾病缠身，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做不了多少事情了，只能无力地为你们摇旗呐喊。但是，我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两小时后，巴金与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以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锬、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中国作协顾问黄源等握别。虽倍感疲劳，但看到与会者的精神面貌



巴金 前排正中坐轮椅者 与出席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的人员合影。

和蓬勃朝气，坚信文学事业大有希望，自己也就倍感欣慰了。

三月二十七日 在医院会见筹备大会的几位会务人员，接受了他们送的花篮。巴金获悉大会通过了《无愧时代，面向未来，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局面》的决议。高兴地祝贺大会顺利闭幕，并称赞会议安排得很好。后来，还高高兴兴地与吴殿熙、孙德全、朱晓岭等合影。吴殿熙讲起杭州“创作之家”的情况，引起了他的兴趣。巴金觉得住在那里离西湖很近，建议维修、扩大，要接待作家。巴金答应今年还去杭州小住，当知道吴殿熙要给他安排到刘庄住时，巴

金笑着说：去年我可写过“创作之家”是我的家的呀！最后亲笔签名赠送每人《随想录》一套，当家人告诉他把人名中的“岭”写成“龄”时，巴金抬手，摘下眼镜，又在书的右上方，依然艰难地一笔一笔地写下了：“请原谅我写错了你的名字。”朱晓岭捧着《随想录》，感动得哭了。因为过度劳累、兴奋和紧张，巴金血压猛降，出现了从未发生过的昏厥，而且接连两次。后经医生检查，心脏功能还好，是植物神经紊乱所致，虽无大碍，但得静卧休息。原定四月赴杭州休养的计划取消了。

三月 会见谷苇，告之在医

院里，七时起床，早餐后，在护士或者家人帮助下，扶着助步器在室内或者走廊里“散步”，午睡前后看电视，或者与亲人聊天，晚上八时半睡觉。苦笑着说：“生活很有规律，就是不能做事。”同意将《随想录》完成以后写成的《巴金全集》的所有“代跋”、怀念文章等收入《再思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四月十三日 获悉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访问团抵沪，施蛰存、柯灵、辛笛获该基金会颁发的敬慰状和敬慰奖。

四月二十一日 获“彩虹翻译奖”荣誉奖。该奖是英籍华人

女作家韩素音首倡的，旨在奖励从事文学翻译成绩斐然的翻译工作者。在北京文采阁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巴金和冰心等十七位资深作家和翻译家获荣誉奖。

四月二十九日 从电视里观看“第十届文汇书展”签名售书情况，看到读者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排队购票进入书展展厅的盛况，十分感动。这次巴金的签名本《再思录》和萧乾、王元化、杨绛、张中行、邵燕祥等的签名本同时限额发售。在接待记者访问时，巴金欣然同意再增加一百本，以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

四月 应约为浙江省文联、作协二十八日将举办的“祝贺黄源九十寿诞和从事文艺活动六十五周年”祝寿题词。同意台湾导演雷骧拍摄自己的纪录片，这是《中国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中

的一个单元。该片介绍、探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生平、风貌、文学道路及其成就，与巴金同时入选的作家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张恨水、许地山等。在拍摄过程中，巴金配合导演安排，有一个场面是巴金和李小林、李小棠在一起，巴金正全神贯注地听李小棠用四川话朗读自己的作品。

五月上旬 会见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负责人，接受了他们专程送来的三万多港币的稿费。等来人离开病房，巴金立即嘱咐家人将这笔钱送往市“希望办”，捐给“希望工程”。

五月九日 巴金终于可以出院了，他想念离别好久的家，花园里的玉兰树和绿茵茵的草坪会让他感到安宁，家人们的话语随时在耳边萦绕，让他感到亲切。

总而言之，经过长达五个月的离别，终于又一次战胜病魔，即将回到自己的家，巴金大有重获“自由”的欣喜！按事先安排，巴金先去杭州汪庄休养。下午巴金坐在轮椅上出现在西子湖畔，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和医院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巴金喜形于色。在杭州疗养期间，像在医院里一样，有按时吸氧的规定。巴金看见氧气瓶，就联想到住在医院里的情景，似乎随时会进入抢救状态，心头不高兴，拒绝吸氧。后经医生说明和李小林劝告，明白吸氧的目的是为了保健，避免脑部供血不足，这才同意配合。

五月中旬 会见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等，证实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立项终于促成的好消息，新馆址选在北京亚运村正东方的慧忠庵，建筑面积二万四千平方米。巴金很高兴，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快有自己的新“家”了。巴金表示：“现代文学馆的事很重要，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我要亲眼见到新馆的落成，到那时我还要去剪彩呢！”

约五月 获悉纪念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三毛乐园”将在浙江海盐县落成，应邀欣然为园内的“张乐平纪念馆”题写馆名。

六月二十三日 经李小林转告，获悉姜德明想请自己为他的《十年一梦》增订本作几十字的

巴金《再思录》书影。





巴金 中坐者
与李小林 右、李
小棠 左 在一起。

短序。下午睡不着，一口气写完了序言，后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序言云十年“文革”中受尽了折磨，想念失去的萧珊和被迫害而死的一些友人。自云“不是战士”，却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下午，与从上海来杭州的李济生见面，听到他带来的新消息。李济生和孩子们为巴金的脑力仍健、思路清晰高兴的同时，也劝他注意休息，适可而止。巴金想起自己生病给家人带来的焦虑和担忧，点头应允。高高兴兴地和李济生、李小林等在园中散步。

六月二十五日 巴金见李济生小住两日即回，嘱他下次来要多住些日子。

七月十二日 会见姜德明。

听他介绍了在上海文庙寻觅旧书的趣事，获悉冰心、夏衍都采用吸氧作为保健措施等。

七月十九日 作完序跋《巴金译文全集 第一卷代跋》。通过翻译出版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的种种经历，让巴金回忆起“有血有肉的日子”和吴克刚等一些“久别的朋友”，最后表示“将这本书献给”翻译家汝龙。为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逐一作跋，是巴金以九十二岁高龄、深受帕金森综合征折磨的病痛之身，对生命的勇敢挑战，是巴金又一次对读者作出的真情告白。巴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一丝不苟地通读自己的旧译作，有时累得连书也拿不动了，只得请别人代读。至于巴金为旧译逐

一作跋，则更为艰难。在轮椅的扶手上搭一块木板，就是他病房中的“书桌”，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驾驭了多少年的笔，就是不听使唤，想写的字变得歪歪扭扭，有时还成了墨团团。巴金在痛苦中坚持着，默默地坚持着。有时一天才能写几个字！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思想还是巴金自己的。他更多的时间是默默地注视着天花板，或是窗外的流云，让自己的身心再“年轻”起来。当年翻译时的林林总总似飘散的烟云，向他聚拢；许多在他翻译时倾注过热情和帮助的朋友的友情在心中复活。他在心中“写”下了一篇篇完整的“代跋”。当这一个个、一行行积累起来的

“字”，被家人誊清，再读给他听，最后完成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篇篇思路清晰、感情如火、往事重现于眼前、友情叩击着心扉的美文！巴金将他生命的热力，将他对读者的忠诚，再次凝集在他九十二岁开始写下的《巴金译文全集》的十篇代跋中。

八月十七日 作完《巴金译文全集 第二卷代跋》。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的经过，并从父与子的“代沟”想到，至今“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

八月二十六日 在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福建长乐市人民政府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冰心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发表贺信：“一代

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八月二十七日 作完《巴金译文全集 第三卷代跋》。叙述了翻译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的坎坷经历，想起了五十八年前和陆蠡、丽尼分工翻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情景。表示“亡友”虽已“远去”，但“友情永远不会消失”。

九月四日 惊悉中国作协理事、著名诗人邹荻帆病逝于北京。

九月五日 惊悉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冯牧病逝于北京。

九月十八日 会见杜宣，高兴地告之近况。巴金笑着说，他至今还能背诵杜宣创作的悼念梅兰芳的诗。

十月上旬 从杭州回家，与久别的家人相聚，巴金心里感到亲切、踏实。没几天，又开始“忙”起来，其结果是生活规律被打乱，血压不稳定，只得重新回到华东医院检查，幸无大碍。

十月十六日 作完《巴金译文全集 第四卷代跋》。谈到了在翻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过程中与翻译家项星耀、臧仲伦以及责任编辑周朴之结下的友谊，表达了对《巴金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的感谢。

十一月二日 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刘白羽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暨《刘白羽文



巴金 右 与杜宣 左 在一起。



集》首发式”致贺电。

十一月五日 获悉由中国福利会、上海市作协联合主办的“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在上海开幕，请人赠送红玫瑰花篮致贺。

十一月中旬 因严重的气管炎，呼吸困难，再次住进华东医院。住院那天上午，约请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全部外文藏书捐赠。

十一月二十日 上午，应约会见唐金海等一行数人，接受了嘉丰公司赠送的一尊庄重而古朴

的“青铜宝鼎”。巴金获悉该鼎是根据屹立在联合国大厦前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世纪宝鼎”原型缩小而成，说：“很感谢你们送来的礼物。我是受之有愧……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今后能继续活下去，也还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 高高兴兴地品尝了“红房子西菜社”总经理徐勤德和厨师长专程送来的西餐，有巴金喜欢的烤鸡、焗明虾、洋葱汤等几道美味佳肴。陪同前来的魏绍昌告诉巴金“红房

子西菜社”要搬迁了，这是该店特意为住院的老顾客巴金和朱岷瞻制作的。巴金高兴地说：“我早年留学法国，吃惯西餐。我本来住在淮海路，上海作家协会又在巨鹿路，常去两处的‘红房子’进餐。‘文革’前有一段日子，我每逢周末从作协出来，总要到‘红房子’，几乎成为习惯。”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金九十二岁寿辰，在华东医院提供的大厅里，放满了鲜花和花篮，冰心让女儿吴青专程送

巴金 右 与刘白羽 左 在一起。



来的花篮放在醒目的地方，上面写着：“祝巴金老弟生日快乐。”

在华东医院会见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等，接受了他们的鲜花和贺卡。巴金看到贺卡上的题词：“愿你的生日充满阳光、欢笑和种种快乐！”快乐地笑了。巴金听陈至立谈到要把上海建设成一流城市，要具备一流的文化时，高兴地说：“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很重要。”又接待了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张锲，接受了张锲转交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的贺信。在听张锲谈中国作协近期的工作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情况时，巴金表示：“中国作协预定的十件大事要抓紧做。现代文学馆要争取明年动工，动起来就好办了。希望中国作协维护好团结的局面。只有团结，才能繁荣。”接待了络绎不绝前来祝贺生日的朋友和读者。接待了专程前来祝贺和赠送《刘白羽文集》的刘白羽。接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香缘——作家捐书题词集》，该书收集了巴金、冰心、夏衍等一百四十七位为支持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而捐赠图书的作家的小传、主要著作、题词手迹等。售书所得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十一月二十六日 同意捐献签章后的三十本《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参加浙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新华书店联合举办的“浙文新版书上海大联展”。联展单位以每本一百元的价格让读者认购，所得书款，悉数捐赠“希望工程”。

约十一月 得邹韬奋女儿邹嘉骊赠送的十四卷《韬奋全集》。又委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向在沪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地区儿童文学大会”赠送花篮，并表示祝贺。

十二月七日 作完《巴金译文全集 第五卷代跋》。谈到了翻译高尔基《草原故事》的经过，并通过翻译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认为书中的短篇实在是“真正的精品”。在谈到译作《文学写照》时，表示同意高尔基的观点：托尔斯泰夫人是托尔斯泰的“亲密的、忠实的”、“唯一的”朋友。最后，表示将这卷译作献给自己的“第一个引路人”表哥濮季云。



赞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中关于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将自己奉献给人民的观点。

女婿祝鸿生病逝，悲痛中又宽慰亲人。

表示“现在中国人可以抬起头了”；对当前一些贪污腐败现象，认为“这里糟”，西方“更糟”。

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文呼吁共同创造内容和艺术精湛的“传世之作”。

获悉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题写馆名揭幕仪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仪式举行时，表示“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并希望“快一点建好”。

九十三岁

一月十二日 作完《巴金译文全集 第六卷代跋》。谈到了“靠翻译来学习”的独特感受：或是被原著的“人道主义思想”所感动，或是理解了原著人物的无私助人品德，或是醉心于原著清丽的文笔和纯真的感情，或是领悟“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一月二十四日 致信余思牧。寄去两份用圆珠笔写在稿子上的题字：“作家冰心”。并告之：“这就是我目前写字的水平，能用，你就用上去，不能用，就算了。余先生，你就看着办吧。”

一月二十九日 作完《巴金译文全集 第七卷代跋》。通过本卷翻译的世界语原著，表达了对世界语的感情和信念，并祝福“世界语的前途无量”。

约一月 获悉女婿祝鸿生住院进行肺切除手术，颇为担心，仍宽慰女儿李小林。并与手术后疗效较好的祝鸿生相约，四月同去杭州休养。

二月四日 因实在无法握笔，只得口述《巴金译文全集 第八卷代跋》。为本卷中《地下的俄罗斯》中俄国青年男女“献身革命”的精神感动，也曾为《我的生活故事》中凡宰特的冤案而“揪心”，而《西班牙问题小丛书》，则让巴金想起“身经百炸”的抗战经历，从而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巴金长期住院，体质渐弱，又惦记着许



- ⊖ 巴金一九九六年二月接受赠书。
- ⊖ 巴金 右 与侄孙李舒 左 同观李舒为巴金拍的照片。

多没有做完的事，因为无法握笔，说话也出现障碍，不得不采取他极不愿意的方式：口述，由李小林记录。

二月十二日 口述《巴金译文全集 第九卷代跋》。谈到本卷中的译作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柏克曼的《狱中记》和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都是革命家写的“真的诗”、“好的散文”。巴金承认自己写散文“很受”妃格念尔的“影响”。

二月二十三日 口述《巴金译文全集 第十卷代跋》。赞同本卷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中的主要观点，并认为：“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一

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

三月上旬 委托侄孙李舒清理一批珍藏的外文书籍，大约四千余册，准备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捐赠前嘱李舒将自己特别喜爱的几套书带到医院里来，他要和这些陪伴他多年、被视为精神“珍宝”的书作别。这批书中有一九〇〇年出版编号为二十九的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有法文版的《忏悔录》，除了作者是巴金景仰的卢骚、作品对巴金产生的深远影响外，书的扉页上保存着诗人梁宗岱一九二六年为诗人邵洵美的亲笔题词：“洵美自英返国，途经巴黎，特赠此

书，以寄托我对祖国的相思之情。”这是巴金在重庆一家旧书店购得，经历了多年战乱和十年浩劫，得以保存，实属不易，现在又加上了巴金的藏书章，更为珍贵。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豪华型本《托尔斯泰选集》，这是巴金早在五十年代中期，花八百元的高价购得的。这套出版于一九一二年的书，是巴金藏书中的珍品，上面有他的俄文签名，还加盖了私章。翻译家草婴听说巴金要将这套《托尔斯泰选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特意赶到医院，向巴金把书借回家，请著名摄影师把书中二百多幅插图和封面拍下来，准备用在自己翻译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中。据草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婴说，这套书是无价之宝，国内只有一套半，还有半套是冯雪峰从苏联带回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八八八年意大利文版的《神曲汇注本》，巴金在“文革”的深重灾难中，悄悄地抄一段《神曲》，藏在口袋里，有空

悟、共鸣都凝结在每一页纸上。现在，巴金已经为它们找到新的家，让它们成为更多读者共享的精神资源和财富。

三月约十五日 经过家人和医生反复研究，决定将女婿祝鸿生病逝的消息告诉巴金，并制订

握着爸爸的手，把噩耗告诉老人。巴金颤抖着双唇说：“我以为我会走在他的前面……”在一旁的李舒赶紧说：为了李小林，你要尽快过好这一关。半晌，巴金回过神来，强作平静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经受得住。

……我身经‘百炸’和‘百斗’没有什么可怕的。”然而，李舒发现，这天晚上，巴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巴金疲惫地对李舒说：“终于过关了！”为了女儿李小林、为了端端，他得撑住……

四月三日 在华东医院接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亲切慰问。当李瑞环嘱医务人员要精心护理巴金，又希望巴金安心休养时，巴金表示感谢，并云年老多病，做不了什么事了。

四月 应约为新建的上海图书馆新馆题词：“散布知识，散布生命。”

五月下旬 终于取得医生同意，到杭州休养。

六月中旬 与赴杭的李济生欢聚。看到李济生带来的《巴金书话》样书，获悉冰心近况和她的问候，很高兴。每天照例坐在轮椅上和李济生、李小林等出去



李瑞环前往华东医院看望巴金。

就拿出来念一段，从中获得力量。巴金在医院中，轻轻地掀动着书页，仿佛在和自已相识、相知了半个多世纪，又共同度过了艰难岁月的挚友们作深沉的交谈，他多少次，在精心研读时，把心灵深处的欢乐、痛苦、顿

了应急措施。早晨，决定由两位内科主任例行查房，大家陪着巴金聊天、读报，让他精神放松。轮椅已悄悄放低到躺卧的位置，预防老人脑缺血引起的休克。然后，李小棠进来，大家屏息敛声，静极了。李小棠快步走近，



巴金青铜塑像。

散心，听健谈的李济生谈书、谈人、谈事，心情舒畅。有时，在桂树二度开放的清香中，听李济生讲起老家后院的银桂树盛开时，家人用腌渍的糖桂花、猪油加在五角形的蒸蒸糕上，将米糕蒸熟。当又甜又香的米糕端出来时，兄弟姐妹们放下课本，争吃米糕的情景，巴金笑了。李济生绘声绘色的叙述，带着老哥儿俩，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仿佛出现在老家的院子里，耳边也清晰地回响起大门外韵味悠长的“卖蒸——蒸——糕——”的吆喝。有次听李济生讲一本某老干部回忆“大跃进”时期前前后的书时，巴金竟笑颜大展。只是语言障碍严重，声轻气短，家人们都得耐心地听和辨识口形。有一次，他亲切地对李济生说：“你有什么问题，记起了，尽管

问，我会尽力答复。我的时间也不多了。”一席话，说得乐观开朗的李济生顿时眼眶湿润，动了感情。

六月十八日 与返沪的李济

生暂别，老哥儿俩相约，半个月后上海见。

六月下旬 与受出版社重托专程赴杭的李济生见面，巴金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真想有个人跟我谈谈话，不然我怕以后连话都不会讲了……”爽朗明快的李济生果然让巴金获悉了不少消息。当巴金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修建了希望小学，并希望他书写校名时，当即同意。李济生劝他等秋天，精神好点再写不迟。谁知第三天上午，巴金就动手写起来，怎奈只写了两个字，手就不听使唤。他又急又痛苦，还是李小林安排得当，改在下午继续写，终于写就，交李济生带回出版社。

九月十八日 获悉将由上海



一九九六年夏巴金在杭州写作。李舒摄



作协转交上海能源化工总公司赠送的“巴金青铜塑像”一尊。这是由上海敦煌国际文化艺术公司创意、倪巍设计的。巴金半身青铜塑像高零点八零厘米，配有将军红大理石底座。

九月二十四日 事先委托中国作协的吴殿熙，今天早早地将一只硕大的花篮送到曹禺的病房，祝贺他八十五岁生日。曹禺穿着病号衣，高兴地在花篮边留影。仍托吴殿熙将照片带给巴金。巴金从《文汇报》上获悉，与冰心、柯灵等签名盖章的《走过半个世纪》一书，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首届上海图书节”上拍卖成功，读者傅明伟以三万元的高价竞拍到一号珍藏本。能为“希望工程”又一次添砖加瓦，巴金心中高兴。

九月二十九日 下午，高兴地会见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和

陪同前来的吴殿熙。巴金早就希望张光年来聊聊天了。他们先谈到彼此关心的事，表达了对预定在今年十二月要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估计和期望。巴金思路清晰，只是声音细弱。他吃力地说：“会开好了，有利于大局。”此时，巴金再三强调自己又老又病，不能做什么事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人选应当另作安排。而张光年却转达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意见，认为巴金在世界文坛和中国广大作家心目中威望很高，在创作繁荣、日趋多元化的形势下，希望巴金继续起表率 and 旗帜作用。为了中国作家队伍的团结，为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希望巴金继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坚辞再三，沉默良久。最后，在张光年推心置腹的交谈中，巴金

和张光年相约，可以有三个半天见面，每次半小时。但是，九十三岁的巴金和八十四岁的张光年，谈得高兴，就忘了“约法三章”。

九月三十日 上午，接受了推拿治疗，坐轮椅去湖边散心，馥郁芬芳的桂花香，让巴金心旷神怡。特别是一株枝繁叶茂的丹桂，更让巴金留连忘返，他告诉陪同的李小林等：“四川老家也有这样的一棵丹桂树。”看来，此时此刻，巴金似乎回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下午，精神比较好，按原定计划接待张光年。小林推着轮椅，巴金和张光年等在飘散着浓郁桂花香的西湖边交换了对大局的看法。听张光年谈到中央的部署，再经过十几年的团结奋斗，国家还会前进一大步时，巴金说：“现在中国人可以抬起头了。”在谈到当前社会上

巴金 右 与前来祝寿的王元化
左 在一起。



中国现代
文学馆新馆奠
基仪式。



的贪污腐败，分析文艺界某些负面影响，联系到西方世界的一些情况时，巴金说：“我们这里糟，他们那里更糟。”对于文学创作前景的展望，巴金基本上同意张光年的意见，认为目前“传世之作”的产生，还需要作家提高修养，站在中外文化的高度，看得深、想得深和写得深才行。他们坚信中国迟早会孕育出动人心魄的大作品的。

十月一日 上午，和张光年到汪庄一游，欢度国庆。巴金用颤抖的手，在《巴金七十年文选》扉页上题字和落款，并将书赠送给张光年、吴殿熙。巴金和张光年在桂花盛开、香气袭人欲醉的汪庄度过了快乐、轻松的一

天。晚上，还一起乘“腾龙号”夜游西湖，静静地欣赏夜西湖迷人的风景。下船后，他向张光年问起冰心和曹禺的病情，知道他们目前病情基本稳定，才放心了。临别时，托张光年捎去对冰心、曹禺等京中老友的问候和思念。

十月五日 一早，让李小林拨通了冰心家的电话，请冰心女儿吴青向冰心转达生日的祝福和深切的思念。

十月底 从杭州返沪，因肺部轻度感染而入华东医院治疗。

十一月下旬 开始进入接受祝贺生日的忙碌和劳累，尽管巴金和家人仍然设法让巴金“躲生”，但是，还是躲避不了熟悉

的记者。巴金表示还要多做一些事，用行动来答谢读者。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事先就获悉“巴金文学院”接受了华西药业集团捐赠的二十万元，于今日正式设立“‘诺迪康’杯文学奖”。下午会见上海市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生洪等一行，接受了他们赠送的花篮，并表示感谢。

十一月二十五日 穿着李小林送的绛红色茄克，由家人推着轮椅出现在摆满鲜花的会议室，与前来祝贺生日的领导和朋友们见面。会见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接受了他们赠送的鲜花、贺卡和问候。

十一月 事先获悉由江泽民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总书记题写馆名的揭幕仪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奠基仪式即将举行，遂写信致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在北京元代土城遗址北侧，占地四十六亩，建筑面积二点四万平方米，将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专业文学馆。在奠基仪式上，宣读了巴金和冰心等的贺信。巴金在信中表示：“我因病不能远行，但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拜托了！”

十二月中旬 关心十四至十五日在京举行的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会和十六至二十日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名于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常务主席名单。

十二月十六日 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迎接文学艺术的新世纪》。充分肯定大会“在我国当代文学艺

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坚信“伟大时代”“应该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艺术家”。

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陆正伟带来上海图书馆新馆的签名簿，巴金应约作为该馆的第一位荣誉读者，签上了“巴金”两字。巴金知道第二天是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的日子，就让陆正伟把李小林前几天从家里带来的那套书一同送去。那是一套八卷本德文版的《斯托姆全集》，是一九一七年为纪念斯托姆诞辰一百周年出版的珍本。

十二月二十日 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巴金因病不能赴会，并一再表示又老又病，已不能工作，希望朋友们的原谅，但会议选举结果，巴金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会见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和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接受了他们的祝贺。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文学报》上发表《热爱人民，深入生活——祝贺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对大会表示祝贺和敬意的同时，认为作家“必须把感人肺腑引人向上的作品”、“把内涵丰富艺术精湛的作品献给人民”；作家“要成为读者的朋友，用真诚的语言同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鼓励作家“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望，肩负着历史的光荣使命，去迎接文学艺术的新世纪”。

一九九六年内 得台北文化名人、八十九岁的张佛千寄赠嵌名联一副：“‘巴’水长，‘巴’水回，无量寿。‘金’钢坚，‘金’钢固，不坏身。”后托友人赠签名本《巴金七十年文选》致谢。



给一套为儿童提供真、善、美精神
食粮的长篇小说题写“金太阳丛书”。
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惊悉曹禺病逝，一言不发，一声长
叹，握笔还未写，热泪已长流。
感动地接受了江西一位古稀老人以
四年时间用楷书抄写的《家》、
《春》、《秋》。

九十四岁

一月二十三日 会见前来“拜早年”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

一月三十一日 会见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委托前来祝贺春节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朱作霖。并高兴地说：“也请你代我问候他。”



三月上旬 获悉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创
意出版一套为儿童提供真、善、美精神食粮
的长篇小说，应约欣然题写书名“金太阳丛
书”，并电传给出版社。

五月六日 下午，征得医生同意，终于
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去年开馆
的上海图书馆。当马远良馆长向巴金献花并
表示感谢时，巴金笑着说：“我是一个中国

巴金在用餐。



在杭州期间巴金右与黄源左在一起。



巴金 正中坐轮椅者 与杭州汪庄管理人员合影。

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巴金坐着轮椅，参观了近代文献阅览室、金石书画室和名人手稿室，见到了陈列着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茅盾、郭沫若、老舍的作品手迹和墨迹，也有巴金自己的《第四病室》、《随想录》、《李大海》等手稿，还高兴地从电脑上看到

自己各个时期的作品、图片和手迹。

五月八日 巴金又向医生“请假”半天，由李小林和医护人员陪同回家。巴金进了阔别两年多的家，玉兰树枝繁叶茂，草坪葱绿水灵，家人亲切的乡音在耳边萦绕。巴金来不及享受家的温馨和宁静，就让护理员小吴把

他推到内阳台堆放的一大堆书旁，又让人帮他打开书橱找了半天。最后经李小林提醒，让人从三楼搬下不少书，把小客厅几乎堆满了。这些外文书和画册都是捐给上海图书馆的。巴金这才松了一口气，人显得疲惫不堪。

五月十六日 巴金前往杭州疗养。

六月 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最高奖“杰出贡献奖”。当上海市领导和各新闻媒体前往华东医院病房，向巴金祝贺时，巴金表示：“我感到很惶惑，我没有写过多少好作品，我写文章主要就是表达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七月中旬 惊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著名画家沈柔坚突发心肌梗塞去世，让家人打电话和送花圈表示哀悼。

八月一日 为新近落成的“冰心文学馆”题词：“愿冰心大姐一片爱心感动更多的人！”

八月十一日 上旬惊悉老朋友、著名艺术家钱君匋于二日上午去世，今天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嘱家人送花

圈表示哀悼。

九月十六日 时值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在杭州与汪庄工作人员合影

九月二十二日 中旬惊悉上海市作协主席、著名诗人罗洛在华东医院去世，嘱作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代送花圈。

十月十五日 惊悉茹志鹃去世，默然良久，后嘱作协在今天举行的追悼会上代送花圈。

十月 由李小林转达了导演冯小刚拟改编和重拍《团圆》的构想，获悉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为明年建国五十周年筹拍的献礼片，冯小刚拟将新片的重心移到王芳的身上，不仅突出表现父女情、兄妹情，而且还有王芳的战

地之恋，新片继续展示人物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还努力表现战争题材的人性美。巴金听后，表示同意。冯小刚日前已买下小说《团圆》的改编权。

十一月上旬 在医院接待了著名歌唱家王昆，欣然接受了记录她从艺六十年来大型画册《王昆》。从画册中，巴金看到一九五七年和王昆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时的合影。临别时，王昆凑近巴金耳朵，为巴金唱了一首《南泥湾》和一首四川民歌。最后，王昆祝巴金健康长寿，巴金高兴地说：“好，好，好，下次再听你唱歌！”



巴金 左
九十四岁生日
这一天与王仰
晨 右 在一
起。



一九九七年
冬，巴金在医院口
授，李小林笔录。
李舒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获悉为纪念自己九十五岁生日，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作协、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巴金著作版本展览”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目录大厅举行。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华东医院会见了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委托前来祝寿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泰丰、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等。巴金说：“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感到高兴！”并说：“我争取健康长寿！”还让家人拿出了他最近拍的照片给大家看。祝寿现场，欢声笑语，济济一堂。鲜花如锦，堆满了大会议厅。特别引人注目的仍然是冰心送的全部由康乃馨组成的大花篮，写着“巴金老弟生日快

乐”。让巴金和大家感动的是，来自江西的七十岁老人王恒生，向巴金递上了用楷书抄写的整部《家》、《春》、《秋》，这是他用四年时间抄成的。巴金接过头抄本，抚摸着、翻看着，感动地对古稀老人说：“谢谢，谢谢，这样太劳累了。但我的作品值不得花这么大的心血。”

十二月十三日 李小林获悉曹禺于黎明时分病逝于北京。赶紧打电话到医院，让值班的陆正伟千万不能告诉巴金，设法拖着，等她下午回来再说。下午，李小林赶到，见巴金午睡后，精神不错，才告诉他曹禺“走了”。噩耗来得太突然，一屋子肃穆的气氛。巴金听后一言不发，注视着窗外。过了好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无法思索，

无法开口……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巴金悲哀并惋惜地对李小林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十二月十五日 上午，搁笔已久的巴金突然说：“拿笔，拿纸，我要写东西。”巴金握着笔，还没写，泪水早已流出来。李小林轻轻地拭去他的泪，却没有劝他放下笔。她知道，爸爸必须用笔来倾吐郁积于心的感情。于是，巴金艰难地在纸上画出一个个字：“中国文联转李玉茹、万方，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巴金十二月十五日。”



高烧难退，大脑等器官功能衰竭，病情危急，惊动上下，全力抢救，得以控制。——但老人自此进入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历程。

久病卧床，为已不能写作、“成为大家的包袱”感到极度的悲哀。

病中背诵唐诗宋词，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

出现返老还童的奇迹，巴金原来满头的白发中生出了些许黑发。

九十五岁

乾：
信收到，谢！一连读到你好几封信，我想念你，我担心你的身体，又悔恨自己没有力气给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读书看报，一切都要靠别人，想起来实在心烦，你的信又好像来得正是时候。

就像你站在我的面前，指着我说：“我做得对，你也应该做到。”我写了四十几篇文章，你呢？说真话，我赶不上你了。我抽屉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账太多了，但是，我写字太困难了，请你原谅我，问候文洁老。
巴金 廿三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巴金写给萧乾的最后一封书信的手迹。



巴金九十五岁生日这一天，接受王安忆的祝福。

约春季 久住病院，近来时时“胡思乱想”，尤其是时常在梦幻中梦到已故的亲人，还有老友先后一个个去世的噩耗，以及医院、家人、社会方方面面为重病的他操劳，为使别人和自己解脱，曾一度想到“安乐死”。对亲人和医生已表露过这种念头。一次又对非常熟识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说：“我半夜睡不着觉，就胡思乱想。我想我的前程很悲哀，我是一个废物，成为大家的包袱了。”虽然病重期间，巴金多次对医护人员提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今后不能再写作了，就不要用好药了。”但是，每天清晨，当年轻的小护士走进病房，拉拉巴金的手，亲切地问一声好时，巴金总是微微点头致意。他翕动着嘴唇，正在努力背诵唐诗宋词，用以锻炼自己的脑

力和记忆力。

三月 由于手抖，写不成字。语言出现障碍，嘴巴翕动半天，才能发出点声音，经亲人辨读，一天也不过“说”几十个字。巴金坚持着，努力着，几乎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倾吐出对挚友的怀念和深情，终于口述完二千七百余字的《怀念曹禺》，回忆了和曹禺六十多年来的友谊和文学交往，钦佩曹禺的才华，为曹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而痛惜。

夏 获悉十卷本的《胡风全集》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意担任顾问。又悉王仰晨编的《巴金书简》出版。

十月六日 下午，见到了从上海赶来的李济生，听他转达了家人和朋友们的问候，听李济生讲起上月去大别山参加“上海文

艺石关希望小学落成典礼”的感人情景，听他朗读了孩子们写给巴金爷爷的两封信，接受了孩子们签名的红领巾，巴金断断续续、艰难地说：“还是你代我写封回信谢谢他们吧，说我长期生病，手发抖，笔也拿不稳，无法写字。十分抱歉。祝贺他们有了新的教学楼，希望他们认真读书，好好学习。”

十月中旬

在汪庄会见张光年和黄叶绿，听张光年朗诵“邀笔同行跨世纪”、“中年遗憾晚年补”时，巴金脱口而出：“你还是乐观。”

后来，还会见了专程来访的王元化、于光远、陆文夫、徐俊西等，巴金高兴地听着、说着，感到友情的温暖。

十月十七日 晚，在汪庄湖

边，与张光年等欣赏“国际烟花节”的盛景。巴金高兴地看到夜空中彩焰升腾，绚丽夺目。

十一月下旬 巴金继续接受理疗，医生看着气色不错的巴金说：“真不错，胖了不少。”侄女李国¹¹发现巴金满头白发中竟然长出一些黑发，对四爸说：“你返老还童了！黑头发多起来了！”巴金听后，高兴地笑了。此时，正在采访巴金的新华社资深记者赵兰英等都快乐地笑了。当赵兰英问及巴金在完成了《巴金译文全集》的编校工作后，还有什么心愿时，巴金立刻说出“文学馆”三个字。赵兰英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已于去年动工，巴金认真地说：“那是奠基，只有建立起来了，才会真正高兴起

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病房，摆放着冰心、张光年、张锬、王元化、杜宣等赠送的花篮，接受了家人和柯灵、辛笛、黄裳等少数朋友为他举行的简单而隆重的“九五华诞”的生日祝福。会见了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泰丰，接受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问候和生日祝福。听翟泰丰说：“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享誉海内外，享誉全球。……祝您快乐，健康长寿。”巴金翕动着嘴唇说：“争取健康长寿。”

十一月下旬 获悉上海图书馆举办“巴金作品版本展览”。

十二月 病情趋于稳定，每天可以坐在轮椅上活动。每个星

期天与李济生见面，听他讲谈新闻和朋友们的情况，还能品尝他带来的川味浓郁的菜肴。下旬，会见新华社记者赵兰英，获悉她要写一篇采访报道，马上着急地表示：“不要，不要。你看我，天天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有什么好写的。我晚上睡不着觉，就在想，我欠读者太多太多了，我再也不能写作，是个废物，成为大家的包袱了。”

年末 接待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巴金欣然同意在舒乙从商店买来的橡皮泥上按下自己的手模。结果，这次录制的巴金手模带到北京后，因为橡皮泥变形“不翼而飞”。

巴金 右 与老朋友柯灵 左 在一起。





病重病危，开始承受人间苦难，多次死里逃生。

发自肺腑的心声：“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挚友萧乾、冰心相继病逝。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门前的巨石上刻有巴金写下的话：“新文学是播撒火种的文学，我从它们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

“巴金星”诞生了，金光永驻。

九十六岁

一月一日 元旦，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

二月三日 在“’99老舍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贺词：“老舍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活在人民中间。”因为写字困难，题词中的每一个字都有一寸见方大小。

二月四日 在萧乾文学创作七十年暨《萧乾文集》首发式上发表贺词。

二月中下旬 春节前几天，因流感盛行，而前来探望的人过多，过于疲劳，抵抗力弱，引发高烧。住入华东医院治疗。因呼吸道感染、呼吸不畅、缺氧，导致脑和一系列器官功能衰竭，病情危急。李小林、李小棠、李国^①每天焦急地守护在监护室外，一张接一张的病危通知让他们担忧。巴金病危的消息也传到中国作协、中宣部、中央保健办等单位 and 中央领导耳中。远在北京的朋友如张光年、刘白羽等，只得通过李小林、李小棠等家人了解他的病情。后经抢救性治疗，巴金的病情才得到控制。但是，巴金自此进入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历程。据主治医生崔世贞主任说，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臼。医生只得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巴金要说话，得先用特制的薄膜把气管的切口封住。另外，还要经受胸刺的折磨。特别是打针，由于血管

细而难找，吃的苦头更多。巴金多次险象环生，但都被抢救成功。巴金清醒后，被亲人，被医生、护士，被众多社会友人的真诚照顾和关注感动了。同时，看到自身眼下的处境，感情上有些接受不了，内心烦躁不安，觉得病到这个地步，全听他人摆布，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有违自己的心愿，产生了拒绝服药的冲动。他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表示：自己欠读者的太多，以后也不可能写作了，要求不要再用好药了。后来，听李小林含泪朗读了张光年写来的长信，词恳意切，请他务必与医生配合，打赢这一仗，闯过这一关。巴金被李小林、李小棠、李济生等身边亲人的深情打

动了，被医生和护士的真情打动了，也被张光年等挚友的话打动了，他久久地注视着焦急、疲惫的女儿和儿子，在医生表示照顾好他是自己的责任、他们坚信他能够坚强地活下去时，巴金动情地翕动着嘴唇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华东医院，我愿意为大家活着。”他的情绪开始稳定，心情渐渐平静，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肉体上的痛苦，承受着不能写作和表达的精神上的痛苦，与病魔展开了持久战。精神好的时候，为了锻炼脑力，背唐诗，请人读鲁迅的作品。每天，他点头示意，请护士把床位摇高，收看电视新闻。自此，医院规定，严禁外人前往，防止带入病菌，连

胞弟李济生也被“禁令”挡在外面，轻易不能探视。就在巴金病重期间，萧乾在北京去世，由李小林等代表巴金向萧乾夫人表示慰问和哀悼。另外，冰心也处在病危中，冰心的女儿吴青和李小林互相通报冰心和巴金的病情，互相劝慰。

二月二十八日晚九时，冰心病逝于北京。李小林接吴青电话，眼泪直流，眼前的巴金还睡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李小林不能也不敢将噩耗告诉爸爸，只得以巴金的名义赠送花篮。花篮由一百朵红玫瑰组成，挽联上写着“冰心大姐安息，巴金”。

三月一日得王院长通知，巴金终于又一次闯过难关，病情

冰心一九九三年在众多学者拟送给巴金的《百寿图》上签名钤印。





巴金

的一个世纪

有所好转，可以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寒暑变化，多少回病危通知，亲人们仿佛已习惯了，但时时刻刻还是揪心地牵挂，既为巴金所承受的极大的病苦而难过、动情，又为巴金一次次渡过险关而祈祷、庆幸。

三月初 下午，巴金午睡醒来，嘴唇蠕动着，李小林凑近，仔细辨听才明白，巴金在说：“给……冰心……打个电话……”李小林只得推说病房里没有电话，等她回家后再打，谁知巴金却坚持说：“不，现在就打！”事后，李小林等才知道，巴金坚持要给冰心打电话时，正是冰心的家属将她的骨灰从八宝山护送回家的时候！

四月 巴金终于逢凶化吉，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人也慢慢地从昏睡中清醒过来。

五月中旬 巴金终于又一次征服病魔，从重症监护病房“突围”出来，被转入到内科病房，继续接受治疗。巴金向李小林表示，要和李济生见面。

五月十六日 巴金等围在身边的医护人员检查完毕，睁大眼睛，终于看清睽别多日的胞弟李济生站在身边，笑了。他照例翕动双唇，抖动着，依旧吐不出声。李济生见到大病后的四哥，心中既高兴又难过，但是，担心对巴金康复不利，又不敢过分挨

近，连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巴金静静地听着。——沈从文夫人来信说：我很希望知道巴金兄的消息，希望巴金兄长寿，希望能告诉我真实情况，因为巴金兄是我最关心的老友了。老作家碧野表示：巴老已九十六岁，他的高龄不仅有助文坛的正气，也是广大中国读者之福，我尊敬巴老，祝他永远健康！江西的读者、老人王恒生打电话来问候，并说他还在用小楷抄写巴金的作品……李济生念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巴金的心复活了，他的感情和海内外朋友们的友情又融为一体。慢慢地，巴金又昏昏睡去。李济生静静地观察着四哥，心中默默地

祝福四哥早日康复。

八月中旬 见李小林近几日未到病房，心中焦急不安，当获悉李小林患流感，怕传染他后，稍稍安心，但仍表示思念。

八月二十四日 下午，由于这几天恢复得好一点，巴金可以由家人和医护人员照顾着起床了。他穿着长裤长袜，拄着手杖，坐在床沿。只是，心中惦念生病在家的女儿李小林。正盼着有家人来时，精神矍铄、乐观健谈的胞弟李济生来了。李济生快人快语，高兴地说：“四哥，你能坐起来了，好极了。你高兴吗？我实在替你高兴啊！”巴金也露出笑容，嘴唇抖动，只是发不出声。怕巴金累着，李济生让



江西王恒生手
抄本《寒夜》。

护理员小张先安顿巴金躺下。巴金努力再三，终于吐出“李小林……”几个字。晚到一步的侄女李国^①赶快回答：“李小林热度已退，人好了。明天上午就会上医院来看你，放心吧。”此时，巴金才安静下来，听李济生带来的不少消息。老哥儿俩又可以摆“龙门阵”了，照例是李济生用极富韵味的川音，绘声绘色把朋友们的问候与情况一一转告，巴金听得津津有味，有时笑，有时

点头。此刻寂寞的病房生活，顿时有了生气。

九月六日 接受上海市档案馆颁发的档案收藏证书，巴金自一九九一年至今，已陆续捐献了他个人的档案二千二百八十二件。

九月十一日 在医院会见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

九月十八日 在医院会见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王力平。接受了他的节日问候和鲜花、月饼等礼物。

九月 照例按时收听广播，对正在连播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颇为关注。

十月十一日 上午，会见由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徐俊西陪同前来的翟泰丰等，获悉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竣工落成，并收下了落成时的照片和录像带。巴金一张一张仔细地观看照片，看到其中一张，久久不愿放手。原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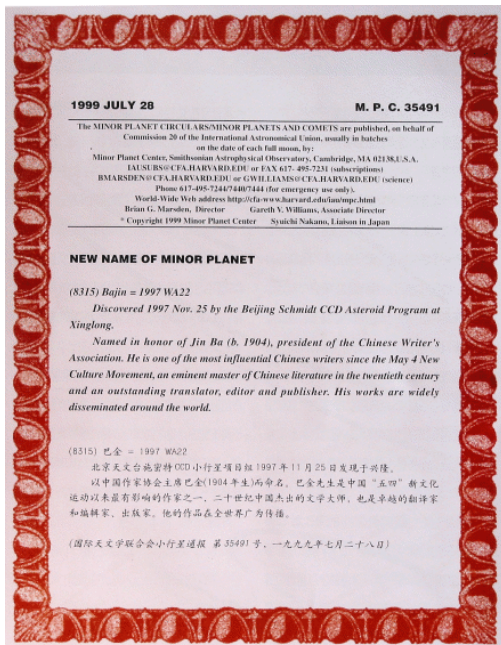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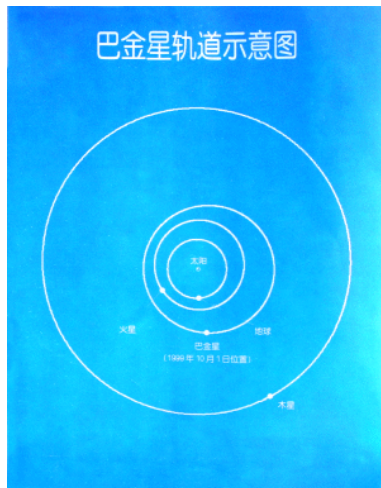
- ① 巴金高兴地笑了。李舒摄
- ② 置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门上的巴金手模。
- ③ 建成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名由江泽民题写。馆前石碑上镌刻着巴金语录。
罗韵希摄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片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正门上印有巴金的手模，这是舒乙第二次专程由北京到上海为巴金录制的手模。吸取了上次的经验，这次专门请雕塑家同行，用专用水石膏制作而成。门前的巨石上镌刻着巴金的两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播撒火种的文学，我从它们中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巴金耐心地听翟泰丰等谈了中国作协今年的工作，获悉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力争今年年底开馆，巴金高兴地笑了。

十月十二日 获悉列名于主任委员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评奖结果揭晓。

十月十六日 重阳节前一天上午，在医院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接受了他代表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问候和赠送的花篮。

十月十九日 事先就获悉“第五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襄樊召开，讨论会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上海市作协、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襄樊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筹备召开。

十月二十五日 午休时，由李小林代巴金会见了记者陶世隆，从陶世隆处获悉将以巴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的消息。这颗即将被命

名的“巴金星”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发现的，以文学家名字命名行星，在我国实属首倡。前来探望巴金的潘际¹听了连声说好：“像巴金这样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小行星，就是让世人铭记，让思想永恒。”午睡醒来后，在病床上会见《大公报·大公园》专栏的资深编辑潘际¹，紧紧地握着潘际¹的手，努力说出“保……重”两个字。

十月二十六日 “巴金星”、“陈景润星”、“袁隆平星”和“光彩事业星”的命名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 CCD 小行星项目组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而正式命名的。巴金以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的名义，与著名数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景润、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水稻专家袁隆平等分别获此殊荣。“巴金星”的编号为“8815”。

十月 会见曾随巴金访日的陈喜儒，表示想念水上勉先生，请代问候白土吾夫先生、佐藤纯子女士并向日本朋友问好。后来，巴金就收到白土吾夫十月二十七日来信，告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近况，并向巴金始终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亚洲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奔走的行为表示

崇高的敬意。获悉一对高达三米重约一吨、有数千作家签名的巨型艺术花瓶将运抵北京，陈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大厅，祝贺新馆即将开馆。

十一月六日 收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光年、副主席王蒙《致巴金主席的贺信》，认为“相信天上的与地上的巴金星光永驻”。还看到张光年附在信中的诗《咏巴金星》，赞扬“巴金星”就是巴金的“心”和“真诚”，将鼓舞我们像你一样“把心掏给读者”，“永远炽热、平实、真诚”。

十一月八日 上午，会见王力平、朱达人等上海市委及政协领导，接受他们的祝贺：愿巴金的艺术青春犹如太空中闪烁的星星，永恒、常在。

十一月中旬 嘱女儿李小林，将一批自己的作品盖上印章，寄赠给甘肃高台县新建的图书馆。

十一月二十三日 接中国作协贺信。接刘白羽贺信，相约在杭州，共同携手进入二十一世纪。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会见王力平、朱达人等，接受了他们代表上海市委所致的生日祝福。接人民文学出版社贺信，云巴金是“文苑宗师”、“时代巨匠”，是“世纪的良知，民族的骄子”。接《文学报》贺信。

十一月二十七日 会见江西读者王恒生，听他讲了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借来的《家》，解放后用第一笔工资买的书也是《家》，退休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小楷抄写《家》。巴金感动地说：“不值得花那么大的精力，你很有毅力。”

十二月 获悉《家》世界语版由魏以达翻译、世界语出版社出版。巴金很高兴。他曾对魏以达说过：“我个人的心愿并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魏以达同志替我做了。”

十二月三十日 接受神经内科主任邵殿月安排的检查，经医疗小组会诊，认为巴金身体的所有情况都比较好。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巴金近来很关心庆祝新千年的活动，天天看电视。今天下午就好好地休息了几个钟头。夜，看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后，就寝。由李小林陪同送走了一九九九年，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正式开馆。

华东医院医护人员轮班折叠成的一千一百二十五只彩色的纸鹤“飞”到了巴金病房雪白的墙壁上，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心”字，当中一个大大的“寿”字。

医护人员称赞巴金是“最听话的病人”、“是好老头”、“是个好人”。

以鼻饲滴液维持生命，以听萧邦、贝多芬等音乐和看新闻、听亲人读信读文章为精神食粮。

终于进入了新千年。千万份贺卡、贺电、贺信、贺礼从祖国和世界各地“飞”来。

九十七岁

三月 在病房会见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当昔日熟悉的赵兰英趋前向他问好时，他温和的目光，一直直直地凝视赵兰英，嚅动着双唇，发出“噢，噢”的应声。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巴金病情比较稳定，收看电视新闻，看了“两会”结束前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直播，还看完了京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

五月二日 看言兴朋的京剧录像带《上天台》，听到李济生进病房朗声叫着：“四哥，我来看你了。”巴金的喉管插着吸痰管，不能说话，只能将头努力地朝李济生站的方向侧了一侧，然后睁大眼睛看着李济生。家人们知道巴金身体不能动，不能说话，但是头脑清醒。这是对亲人的招呼作出的最努力的反应了。李济生连忙制止，叫他不要动，然后，将李采臣、杨静如打来电话问候的事告诉他。后来，由护士用棉花签蘸了点果汁，滴进巴金嘴里，算是“点心”。接下来，为巴金擦身、洗头，到下午五点半，照例用鼻饲法，滴入营养液，巴金的“晚餐”就算“吃”过了。

五月十四日 依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喉管里插着呼吸器，发烧，昏睡。李小林告诉新华社记者赵兰英：都快半个月了，烧还是不退。赵兰英就目前媒体关于巴金拒绝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询问李小林。李小林告之：“这不属实。父亲的病情不稳定，

已出版的巴金书信集三种。



根本不知道诺贝尔奖提名的事。连今天刚收到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寄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的《提名巴金先生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邀请及致敬信》都要等父亲健康状况好转时才能告诉他。”

五月二十日 收到中国作家协会报告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于二十三日正式开馆的来信。巴金的“梦”终于成真了。

五月二十三日 巴金事先已委托翟泰丰在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开馆典礼上，代表巴金宣布开馆。巴金观看了电视新闻，还聆听了徐吟朗读的报道。后来，巴金还看了新馆开馆的录像带。

五月二十五日 获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江泽民晚上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展览，鼓励有关人员将新馆办好，努力为促进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六月十九日 晚上，巴金正一边插着鼻饲管，一边坐着看新闻联播。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进来了。巴金获悉自己的病情惊动了中央领导，曾庆红是受江总书记、李瑞环主席委托前来问好时，巴金翕动着双唇，努力表达出谢意。

十一月十二日 在医院会见前来探望的胡锦涛等。

八月 获悉巴金和王蒙等二十五位作家著作权侵权案了结，由吉林摄影出版社赔款六十八万元。

十一月二十四日 获悉今日举行陆正伟撰文和摄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

《世纪巴金》的首发式，李济生应邀出席。巴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大型画册《世纪巴金》。正如李济生在《世纪巴金》扉页所记，这是陆正伟从他近十年来随侍巴金左右所摄取的照片中选取的精华，这是一本富丽堂皇、诗情浓郁的巨型画册。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金的病房里“飞”来了一千一百二十五只彩色的纸鹤！它们“飞”到墙上，组成一个大大的色彩斑斓的“心”字，还配有英文：祝你生日快乐。中间还有一个大大的“寿”字。这些都是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利用一周时间轮班折叠成的。大家精心地叠着，把它当做一种荣誉，一份对巴金的敬意。风吹进来，纸鹤似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乎要“飞”，巴金安静地躺在喜气洋洋的病房里，护士稍微摇高一点病床，巴金就能久久地凝视着彩鹤和“寿”字，他的心又一次融化在浓浓的友情中。

巴金在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心目中是“好老头”、“亲爷爷”、“最听话的病人”，他们把对巴金的爱倾注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七十四岁的神经内科主任邵殿月，在巴金身边已经工作了十八年，她为有机会成为巴金的主治医生而自豪。心内科主任崔世贞从一九九三年起，已经为巴金担任了八年的主治医生。她和邵殿月退休后，依然关注着巴金的治疗工作，成为不在编内的工作人员。谭护士长，从退休后就在巴金身边工作，一晃眼已经六年了，她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巴金对各种稿费、慰问金，看都不看，就嘱咐李小林或作协的工作人员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救灾抗震单位，每次到杭州疗养，巴金都坚持超标准地支付食宿费。巴金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动着她，她要一辈子干下去，多年来她认同而且内心感知：“巴金是个好人！”

青年医生尹曙明为巴金对他的信任而更加尽职尽责，护士小许更是细心体贴，特意买了编织书和丝线，在巴金生日前赶出了亲手编织成的喜气洋洋的“中国结”。

……

巴金周围，有浓浓的友情包

围着、滋润着。让“好老头”巴金进入百岁老人的行列，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会见王力平、朱达人等上海市委领导，接受了他们带来的生日祝福和花篮。

十二月三十一日

会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接受了他的祝贺：跨入新世纪。

今天，巴金和往常一样，通过三次鼻饲，吸入一千五百卡热量，还有精心配制的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等。他气色和精神不错，比以前还略胖了一点。早晨醒来后，体温正常，九点三十分进行推拿，十一点三十分到下午三点午睡，晚上八点入睡。巴金的娱乐是听音乐，他从青年时代起，对古典音乐、交响乐就有浓烈的兴趣，现在，柴可夫斯基、萧邦、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成了他百听不厌的乐曲。巴金每天的“功课”是听广播、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听家人或朋友读书信、念文章。他听完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陈寅恪的二十年》和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等。

这几天，巴金和往常不一样。他依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是他心中升腾起绚丽的火焰，因为浓浓的友情之舟将载着他 and 亲人、朋友、读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病房的窗台上、书桌上的贺

卡层层叠叠，源源不断地流淌着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越南、朝鲜、西班牙、奥地利、新西兰等外国友人、作家和学者的祝福；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安徽、宁夏、四川、甘肃、广西、广东、湖北、浙江、江苏、泉州、台湾、香港等国内各地众多朋友的新年祝福。

“当您收到我这封信，……相信您正在微笑着迎接这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新年。……我国文坛上，自鲁迅以来，直到今天的巴金同志，这些二十世纪的文学巨人，他们呕心沥血的光辉成果，都成为光照人间的精神财富，留给一代一代读者们吸取教益。”

“灿烂的新世纪阳光定会驱逐病魔，您会健康起来的。”

“这世上有许多人愿帮您撑伞，和您共渡风雨难关！知道吗，这世界因为有了您而显得更加可爱。”

“巴老，我们还等着看您的新作品——《与病魔挑战录》……”

“敬爱的巴老：越千年，跨世纪，祝您新年快乐、健康、幸福、长寿。”

“邮递员同志：……由于不知道详细地址，希望劳驾你们替我把这封信寄到巴金先生手上。相信我们怀有共同祝福的时候，起航的祝福定能达到目的地，谢谢！”

……



巴金卧病在床，新世纪第一缕金色的阳光洒在老人清瘦、慈祥的脸上。

有六十多年友谊的老友来访，久病失语的巴金竟奇迹般地发出了“想念你”的声音。

嘱托弟李济生代表自己赴京出席由中国作家协会为他举行的生日庆典。

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九十八岁

一月一日

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射进病房，年轻护士亲切的问候在巴金耳边响起：“巴老，新年好！昨晚睡得好吗？”年轻、柔软的手和巴金相握，她多少次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对巴老的敬意和祝福。巴金默默地接受着这真诚的友情，每天，他的生命随着这亲切的问候和轻巧的一握，掀开了新的一页！

巴金微微点头，脸上浮现出微微的笑容，他翕动着双唇，没有声音。但是小护士已经读懂了巴老想说的话，快乐地说：“新年好！”

巴金笑了！巴金新年快乐！

坚强的老人——巴金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以九十八岁的衰老病弱之身，仍有勇气跨入新世纪！

一月二十四日

大年初一，巴金气色不错，面色红润，精神很好。上午，会见前来拜年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金炳华，接受了由金炳华转达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

二〇〇一年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的问候和花篮。听金炳华介绍了中国作协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情况，以及中国作协对今年工作的部署，号召广大作家以文学创作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等。巴金听着，注视着金炳华，有时还会意地点点头。

另外，巴金还听金炳华介绍一月十八日去探望臧克家、张光年、刘白羽等的情况。刘白羽说：上海的老朋友，最挂念的是巴金，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友谊了，和巴金的感情很深，去上海，在巴金身边坐一会儿，握握手，也算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了。张光年说：最关心的是巴老的身体。……北京朋友们的思念，让巴金感动。

当获悉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希望巴金继续列入中国作家协会

主席候选人名单时，因为帕金森综合征而表情呆滞的巴金，竟然长时间紧紧地皱起眉头，双唇翕动，发出低沉的音节。女儿李小林和儿子李小棠熟知这是爸爸表示内心痛苦的表情和“言语”。李小林早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就耳闻目睹了爸爸和张光年的对谈，知道爸爸早就表示要辞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职务。此刻她深知爸爸皱眉的分量，也“读”得懂爸爸发出的音节的内容。比起四年前，巴金的健康每况愈下，又老又病的进程不可逆转，怎么还能继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呢？李小林和李小棠一边安慰巴金，一边征得巴金同意，不止一次地找到有关领导，转达了巴金坚决辞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职务的要求。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央领导认为，巴金德高望重，只要健

在，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合适人选。李小棠则表示，巴金现在是“在”而“不健”，只是一息尚存，所以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小林和李小棠将一再要求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巴金。

二月八日 同意就《家》的著作权等，与韦韬、傅敏等十四名作家和著作权继承人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中国出版社和北京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在二〇〇〇年十月非法印刷出版发行《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这是新世纪首起作者与出版社联手向侵权盗版者宣战的官司。两个月后，此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成功，对方停止侵权行为，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十五万元，赔偿巴金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初，巴金胞弟李济生 右出席第六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日本学者坂井洋史 中合影，左为坂井夫人。罗韵希摄



巴金亲属撰述出版的部分有关巴金的回忆、研究专著。

等十四位作家五十六万元。

二月上旬

获悉四川正式立项兴建巴金文学院，院址拟定于成都近郊的龙泉驿。

获悉上海一些作家、评论家建议上海设立“巴金文学奖”，让它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国际文学奖，以此促进高层次文化交流，遂多次向亲人和友人示意，以他的名字命名文学奖不好。

三月中旬 会见从北京专程来访的刘白羽，双手紧攥着刘白羽的手不放。久病失语的巴金，竟奇迹般地说：“白羽，我也想念你！”刘白羽感动得眼泪几乎流下来。

六月二日 在病床上，会见了冰心的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巴金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在不停地无声地翕动着，艰难地表达着见到小辈的欣喜，或是在表达对冰心的惦念……

十一月二十三日 同意由李济生代表自己前往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中国作协为他举行的生日庆典，转达巴金对大家的问候。读者赠送的九十八朵红玫瑰盛开着，当李济生将蛋糕切开时，大厅里演奏了巴金爱听的《如歌的行板》，接着，举行了“把心交给读者——巴金作品朗诵音乐会”，由苏民、谢芳、崔道怡等演员或作家朗诵了巴金的《家》、《怀念萧珊》等作品。最后，“走近巴金——大型图片展览”开幕。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金度过了九十八岁寿诞。病房里一个个“寿”字、“福”字的中国结鲜红亮丽，彩色缎带牵动着花球凌空摇曳，病床前悬挂着象征走好运的小红鞋和红灯笼，弥漫着浓浓的喜气；满屋的花篮层层叠叠向长长的走廊延伸，香气馥郁。巴金会见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丁关根、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上海市副市长周慕尧、上海市政协主席王力平等，接受了他们的祝福，并伸手表示感谢。还有许多老朋友、青年朋友从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等地打来电话或寄来贺卡。

十二月二十一日 发表讲话《新世纪的祝愿——在全国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的开幕词》。为“新世纪……带来新的无限广阔的创作资源”而高兴，相信“生活总是美好的”，“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新文艺，一定会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时代一道前进，迎接灿烂的未来。”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巴金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王蒙、金炳华等十四人当选为副主席。



家乡投巨资，动工建设“巴金文学院”。

巴金已成为当代作家心中的精神象征。

九十九华诞，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众亲友的亲切关爱和深情祝福。

九十九岁

三月 获悉四川投资二千多万元，拟建成四川省十大标志性文化工程——巴金文学院，作为明年向巴金百岁寿诞的献礼。

八月中旬 获悉广东美术馆在广州举行“走近巴金——大型图片展览”。参观者在入口处可以和巴金“握手”。原来，入口处陈列着巴金的手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今年七月永久性赠送给广东美术馆收藏的，现在允许参观者触摸，于是观众带着对巴金的喜爱和敬仰，一个个地和巴金“握手”。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收获》创刊四十五周年、巴金九十九华诞庆典。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发来贺电，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表示祝贺。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发言，贾平凹买来九十九支蜡烛，与会作家们将它们一一点燃，大厅里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正如贾平凹所说：巴金已成为当代作家心中的精神象征。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华东医院新南楼，巴金住的病房宽敞明亮，全无“病房”的沉闷、单调。只见窗外绿意葱茏、生机勃勃，室内鲜花似锦、喜气洋洋，巴金沐浴在欢乐的气氛中，迎来了他



- ⊖ 巴金亲自编定的十卷本《巴金选集》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由家乡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
- ⊖ 女儿李小林亲吻病床上的爸爸巴金。这一天，是巴金九十九岁生日。
李舒摄

九十九岁的生日。

医护人员是巴金朝夕相处、知心知意的朋友，让巴金闯过一关又一关，让巴金进入百岁老人的行列，是他们对老人的最诚挚的祝愿，也是他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他们的心比巴金更激动，更充满了欢乐，于是大家把巴金的生日会营造得红红火火，让这个和病魔顽强拼搏的好老头，高高兴兴地长大一岁。于是，众人尽心尽力，围绕“祝福巴金”贡献高招：在床头闪烁着九十九颗纸叠的启明星，用红丝线编成长生果，一个

大大的“寿”字，端坐在中间；室内有飘荡的彩球，有喜庆吉祥的红灯笼。巴金像长者，更像孩童，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地忙着，发出会心的微笑，安详地享受着浓浓的亲情、友情……

李济生、李小林、李小棠、李国^①、端端不断带来好消息，那些从海内外飞来的贺电，通过他们，一一传入巴金脑中，多少祝福、多少景仰在家人们韵味悠长的四川乡音中滋润着老人的心：他看到了四川骑游俱乐部的老乡，单骑飞车六千里为他送来书写着“寿”的竹编；他听到了

少先队员们朗读《繁星》时的纯真和美好心灵的跳动；他看到了梦魂牵绕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日长夜大，欣欣向荣；他分享着昔日“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如今长大成才的喜悦……更令举世瞩目的是，那满屋的鲜花、飘带、彩球、贺卡、信件……带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爱和祝福，带来了国泰民安的喜庆和祥瑞，带来了亿万国民和同胞创造幸福、奔向理想的热情和精神……



喜逢吉祥年，百年寿星巴金安度除夕。

要像巴金那样珍爱书籍。

我始终只是一个作家，不希望被“神化”。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并获证书。

一百岁

一月三十一日

除夕。上海的内环线之外，鞭炮声此起彼伏，迎接羊年的喜庆气氛充溢在申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相信象征吉祥的“羊年”会带来好运。虽然内环线之内禁放烟花爆竹，但是喜庆的气氛照样在每个家庭、每个善良的人心中弥漫，如此浓烈，如此温馨。街上夜色迷蒙，巴金病房的客厅里却灯火辉煌，喜气洋洋。海内外亲人、朋友、读者的贺卡贺信像往常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亲人们的由衷祝愿，华东医院巴金医疗小组全体医护人员的责任心，每一个爱巴金的朋友和读者的祝福都聚焦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让羊年的第一缕曙光照进巴金的病房，祝祷巴金顺利地步入百岁老人行列……

医院食堂的老师傅们为巴金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家人们团聚在他身边，举杯祝福，每个人亲切地在他耳边叙谈，把最高兴的事输入他的心中。巴金和往常一样平静、安详地躺着，呼吸机把清新的氧气源源不断地送入，营养液一滴滴地滋润着他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吸痰器置于病床一侧，以备不时之需。巴金绵软无力的手被亲人暖暖地握着……挚爱在彼此心中流淌。

巴金是痛苦的，巴金也是幸福的。

巴金在亲人们的陪伴下,在医护人员一如既往的精心护理下,终于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和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一起进入祥和吉利的羊年,和所有百岁老人一样,步入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的征程。坚强的巴金,百年岁月在他心中翻卷如画,在他的作品中熠熠生辉。

三月 获悉四川电视台到上海、北京、法国拍摄巴金大型纪录片,李小林、李小棠向摄制组转达了巴金的一如既往的意愿,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不信神,当然不希望被“神化”。

四月 SARS病毒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肆虐,巴金病房进一步成为医院重点监护对象,巴金虽然有时有炎症,但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和家人的密切配合下,他远离“非典”,平安无事。

五月 当巴金部分外文版赠书从国家图书馆流失到书贩子手中,成为牟利的商品的消息和事实公诸于世,顿时引起舆论哗然:读者气愤,学者痛惜,家人惊讶。读者和学者不满的信息不断地传来,于是深知爸爸一生爱书如命的李小林和李小棠联名致函国家图书馆,要求国家图书馆对此事作公开的回答,向广大读者有个明确的交代,也为病中的巴金讨个说法,让巴金爱书、赠书、保存珍本孤本的初衷和传播知识的善良愿望得到应有的尊重。研究巴金的专家学者,也把

巴金一辈子为搜集藏书、珍爱藏书,晚年又历时十余年不顾老病之躯、不惜花费最宝贵的写作时间,为他的藏书寻找最合适的“家”,让藏书永远传播知识、启迪智慧而呕心沥血的贡献之举述诸笔端,呼吁人们要像巴金那样纯洁、善良,让他矢志不渝的、重在给予和奉献的生命之花灿烂开放。任何个人或单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利,有意无意地亵渎巴金的灵魂!

六月中旬 四川省作家协会在龙泉驿修建“巴金文学院”,将于今年十一月前交付使用,作为家乡献给巴金一百岁的礼物。家人们深知他们的“四哥”、“爸爸”、“四爸”、“外公”、“爷爷”会感谢家乡人民的厚爱,他们更深知巴金不要豪华、不要铺张的希望。他一辈子是个作家,是通过作品向读者交心的普通的人。同时巴金希望更多地研究李劫人、沙汀、艾芜等川籍作家的作品,更精心地搜集、整理和保存这些作家的资料。因为巴金一直认为李劫人、沙汀、艾芜等都是家乡和文坛的瑰宝。

六月二十日 巴金青铜像在成都百花潭公园内慧园广场落成。铜像高二点一米,重约一吨。青铜雕塑的巴金,身着中山装,脚穿老式方头鞋,戴眼镜,围围巾,拄竹拐杖,眼看前方...据雕塑家严永明说,这是作家巴金“休闲”时给他留下的印

象。著作等身、驰誉中外的巴金和休闲时的巴金那样和谐,奇迹般地激发了雕塑家的创作灵感。铜像努力表现出巴金的凝重、深邃和平易、朴实的气质,以凸现巴金独特的精神内涵。

七月 四川文艺出版社派员遵有关领导之嘱,赴上海向巴金亲人和巴金研究者通报即将在本年十一月于成都举办的“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具体筹备的情况。时值酷暑,热浪蒸人,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为病中巴金平安度夏、消除近日出现的炎症精心治疗,全力护理。与巴金手足情深、现已八十七岁高龄的胞弟李济生,以及数年如一日朝夕陪伴病中巴金的李小林、李小棠、李国¹夜不安眠。十分了解四哥的李济生、素知爸爸对研讨会一贯态度的李小林均表示:巴金一直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就是在倾述自己的感情,把心交给读者,和读者交流,所以,不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什么“泰斗”,巴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作家;别人要讨论他的作品,他没办法反对,就是不要都是讲好话,要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意见的交流,才是真正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规模要小一些,也要生动活泼一些,不要惊动太多的人,规模大了,排场大了,就要劳民伤财,怎么对得起家乡人



民 近来又发生了泥石流自然灾害等，更应该省出些钱来用在抗灾救民上。已有七八年了，尤其是近三四年，巴金几乎每日、每时都受着衰老病痛的折磨，但深谙巴金内心的李小林等家人和亲人知道，即使在炎症又一次折磨施虐的现在，巴金始终是清醒的，他内心和本意依然会一如既往：想念家乡，感谢读者；要开就开个真正的学术讨论会；规模不要大，不要惊动太多的人；……我始终只是一个作家。

八月五日 由娱乐公司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复排话剧《家》的演员在申城亮相。演员们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艺术团体，由孙道临饰高老太爷、王诗槐饰觉新、奚美娟饰瑞珏、凯丽饰梅表姐、程前饰觉慧、许还山饰冯乐山等。话剧《家》将于十一月九日起，作为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献演于上海大剧院。

八月六日 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六届四次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炳华透露中国作协为世纪文化老人巴金准备了丰厚的百岁“寿礼”：一是在成都举办“巴金论坛—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二是与中央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在上海联合举办“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三是在上海举办“巴金百岁图片及作品版本展”；四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巴金百岁纪念艺术展”；五

是几部关于巴金的专题片、纪录片届时在电视台播放。

八月三十一日 上午，在病床上接受来上海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慰问和敬意。李小林、李小棠代表父亲巴金与温家宝亲切交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市长韩正一同来看望。

九月 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了巴金的二百多件手稿以及巴金与鲁迅和夏衍通信的手迹、巴金使用过的文具用品奖状奖章图片等，特别珍贵的还有一九三六年巴金修改《家》的手迹，与成都市建川博物馆联合举办《走近巴金》大型展览，在澳门举行首展。

十月 《世纪巴金》大型展览在成都举行。展览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将把所有参展的图片、巴金的手稿和实物赠送给巴金文学院。

十一月十五日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开幕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致贺词。展出的五十五幅中外名家以巴金为主题创作的油画、彩墨画、浮雕、书法等艺术珍品，描绘了巴金各个时期的肖像、思想语录等。艺术展画册和开幕式录像作为庆祝巴金百岁诞辰的礼物将送

到上海。

十一月十六日 《生活中的巴金》摄影展在上海半岛艺术中心举行。近百幅特制放大的彩照都为祁鸣二十余年在巴金身边的精心之作。巴老量体裁衣、理发、修脚、按摩以及回乡吃赖汤圆、与外孙女端端和与孙女丫丫的亲昵欢笑等一一生动感人。摄影展由老画家程十发题词，唐金海、张晓云应邀为摄影撰写说明文字，著名书画家和艺术家曹用平、王兆荣、丁羲元等前往参观，赞巴老是“人民的良心”。

十一月十八日 国务委员陈至立前往上海华东医院亲切看望巴金，预祝巴金百岁华诞。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巴金论坛·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四川省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省巴金文学院、成都市作家协会承办。研讨会的主题是“巴金与四川”、“巴金研究成果评析”、“巴金与我们”等。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致祝词，盛赞巴老是“人民作家”。同时又言简意赅地指出，巴金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祖国和人民不懈奋斗的革命历程”的一生。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有深入

的分析、有热烈的争议、有新发现的史料、有更深入研究的良好建议。会议还向巴老发出了致敬信，一致认为巴老创作的“厚重和深刻的《家》、圆熟和精深的《寒夜》以及真挚和老到的《随想录》等杰作已永留史册”，巴老的精神和人格之光，巴老“那颗燃烧着的丹柯式的心”，“将永远照亮无数读者的人生道路”。

巴金文学院在成都落成。它是四川省十大标志性文化建筑之一。这是家乡人民为巴金百岁寿诞献上的厚礼。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长张中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副主席金炳华，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巴金文学院院长马识途，巴金亲属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剪彩，一时间鞭炮齐鸣，掌声欢腾，绚丽缤纷的彩纸随风飞舞，一百只飞鸽蓝天展翅，家乡人民和读者将深深的祝福遥寄巴金。当人们步入展览大厅时，刚揭幕的全国最大的巴金铜坐像赫然耸立。铜像高二点五米，巴金亲切深邃的目光投向每一个参观者。他背后高五米、宽三点六米的汉白玉墙面上镌刻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名言，仿佛巴金在用富有韵味的成都乡音在向人们倾诉他心中挚热的情怀

……

巴金的儿女最理解爸爸，此时此刻，他们深知巴金的心依然和读者紧紧相连，依然和家乡的父老乡亲紧紧相连；他们更谙熟爸爸感谢读者友情的方式，就是再一次把心交给读者。于是，女儿李小林征得爸爸同意，将《怀念振铎》的未完稿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作为《收获》副主编的李小林与编辑部的同仁们商定，最近一期的《收获》增加了印张，但是不加价，作为对热爱《收获》的广大读者的小小回报。

发表《怀念振铎》（本文一九八九年春动笔，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修改和续写，终因病辍笔，为未完稿），载《文汇报》、《文汇报读书周报》。文章回忆一九五八年获悉郑振铎遇空难时的悲痛，同时，回忆一九二二年七月和九月，在郑振铎任编辑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以佩竿为笔名，先后发表第一首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和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的情况，表示最早介绍他进入文坛的是郑振铎。文章认为郑振铎很少动怒，办事认真，并为自己当年不理解郑振铎“‘抢救’古书”的“爱国心”而写批评文章的事深感内疚。文章又联想到郑振铎如果活到“文革”，他“也过不了那一关”；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巴金自省道：“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接着又袒露：“文革”十年，“我低头弯腰”受尽屈辱，表示只有“忍受奇耻大辱”，才能过关，而“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

国家邮政局在上海艺海剧院举行发行《世纪巴金》纪念邮票首发式。整版邮票由巴金的十二幅照片组成，邮票上方饰有鲜红吉祥的中国结，三枚一组，均以巴金手迹“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串联。同时，久居成都的著名老作家王火以深情精辟的四言诗《敬寿巴老百岁》表示祝福：“时光如水，巴金是金。真心真爱，深意深情。大智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家，淡泊宁静。……”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上海市作协接受了宜兴市人民政府送来的巴金紫砂半身雕像，该雕像系著名紫砂工艺大师徐秀棠用三个月时间精心创作；温州市文联和作协专程送来了巴金的发绣像；常州大学机电学院送来了两千多名师生签名的横幅，上面写着“祝贺巴金百岁诞辰，海屋添筹，巴老，您是青年人永远的导师、永远的朋友”；无锡市钱桥中心小学的师生代表朗声祈福“让风儿、鸟儿、太阳代他们转达对巴金爷爷



巴金

的一个世纪

的美好祝愿……”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噙着感动的泪水说：虽然爸爸有病，但他是和读者心心相印的。

晚，中国作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巴金文学之夜》朗诵音乐会，为百岁巴金献上真诚的祝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及首都文学界的两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朱琳、方舒、陈铎、谢芳等著名演员朗诵了巴金的部分名篇佳作。情深音亮，艺术家以抑扬顿挫而又圆熟得体的语调将巴老流畅真挚的文字传入听众的心田。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书城、东方书城以及东方书城的东南店和淮海店设立“把心交给读者——庆贺巴金百岁华诞”图书专柜，集中展出三十多种版本的巴金作品和有关巴金的传记、评论集、图册等，广大读者踊跃购藏巴金各时期的代表作品。上海音像公司出版发行《巴金文选精品》配乐朗诵双CD。这套CD采用木盒套装，封面有巴金的手迹“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弥足珍贵的是CD收录了一段巴金的原声录音，只要播放碟片，巴金柔和的川音就声声入耳：“我写作品，主要问题我说过，我是为了这个以文艺作为武器，想改变社会，想改变环境。过去写东西是写了不少，我并不是都不满意。其实说呢，严格说起来作家

对自己，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巴金文选精品》则由著名播音艺术家陈醇、丁建华朗诵。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大厅里，祝福巴金百岁华诞的礼物源源不断地到来。千姿百态的花篮仿佛把大厅装饰成绚丽而喜气融融的寿堂，特制的一百把“百岁巴金壶”汇集了紫砂制作艺术家的巧妙构思——壶高一百毫米象征一百岁，长七十六毫米象征巴金写作了七十六年，宽五十八毫米象征巴金在上海住了五十八年；壶身正面有高莽的巴金速写，反面有老画家王康乐题写的“百岁巴金”四字，还有匠心独具的笔筒、镇纸、砚台；上海市公安局《东方剑》杂志社编号“100”的一枚大铜章赠送给巴金，铜章镶嵌在水晶玻璃里，正面为巴金头像，背面是“巴金星运行轨迹”图，下端镌刻着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李小林接过一件件礼物，仿佛代爸爸触摸到一颗颗火热的爱心，她激情难抑，噙着泪花激动地说：“感谢社会方方面面以各种方式向我爸爸祝福，我爸爸现在不能写字了，但他不会忘记读者，他人虽然在病房，心永远和读者在一起。”

下午，《巴金在上海——巴金先生百岁华诞图片文献展》在

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开幕式，盛况空前。百余幅放大精制的照片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照片和不同时期的手稿，真实而形象地再现巴金创作和生活的轨迹，陈思和撰写了图片的文字说明。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致开幕词，向巴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祝福。赞扬了巴金在文学事业上的卓越成就，勉励文学工作者向巴金学习，做人民信赖的作家。杜宣、徐中玉、钱谷融为展览会剪彩，钱谷融在“我对巴金说”特制签上写道：“巴老，您是一个最真诚的人，而真诚是作家最可贵的品格，我由衷地敬佩您！”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金在病房迎来了百岁华诞。老人在华东医院居住的321房间外的走廊两侧，早几天就摆满了鲜艳多彩的各式花篮和各种祝福吉祥物。近几日，巴老仍习惯于清晨五点左右醒来，护理人员温和地为老人更衣，轻轻地为他擦脸擦手。年轻的护士拉开窗帘，让晨曦、蓝天、白云映入老人的眼帘，有时也会适时地播放老人喜欢听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古典音乐等。今天，巴老似有感觉，……在华东医院巴金特别护理小组医护人员的精心调理下，巴金一次又一次地度过危险期，配合医护人员，达到了跨世纪、跨百岁的治疗目标，目前体

温、痰量和颜色都较正常，X光摄片结果，两周前出现的肺部感染和炎症渐趋吸收，病情好转。巴金的病室中，一百个大红的中国结、一百个笔画结构迥异的寿字散溢出温馨和喜气。他床头挂着的两个特大的中国结和一个大大的寿字，更饱含了亲人们、医护人员由衷的祝福和深情。今天是百岁华诞之日，巴金面色红润，神态安详，在亲人和医护人员悉心营造的静谧喜悦气氛中，他照例静静地听新闻、听电视节目、听音乐、听京剧，有时还尽量睁大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他不能说话，不能写字。为避免他心情激动，大家虽然没有告诉他今天是他的百岁华诞，但是巴金的心是和大家相通的，他的确“能感觉得到”。与巴金朝

夕相伴的李小林等亲人们说，巴老会从浓浓的无尽的爱意和友情中感受到百岁生日的快乐。巴金是李氏家族中第一个百岁寿星，家人当然想高高兴兴地为他祝贺，但是，大家知道他不喜欢张扬的个性，于是各自以特别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八十七岁的弟弟李济生刚从成都参加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回家，不顾旅途劳顿，一早就乘公共汽车赶到医院向四哥祝福。侄儿李致也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赶来，带着老家亲友的祝福，将画册《老巴金》送到“四爸”病房。《老巴金》是巴金侄孙李舒陪伴巴金期间，精心摄下的巴金生活中珍贵的瞬间，感情丰富，情深意长。本书为了摒除商业炒作，谢绝了赞助，完全自费出版。图册扉页，

钤有鲜红的印章“巴金百岁华诞李尧枚家人敬赠”。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和家人则定做了一百颗寿桃，简朴而诚挚地表达了对爸爸、对外公、对爷爷、对四哥、对四爸的爱和祝福。另外，李小林和李小棠特别感谢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对巴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护理，邀请他们一起为老人祝寿，吃特制的蛋糕。这别具滋味的“寿宴”既表达了人们对寿星巴老的美好祝福，也表达了李小林、李小棠对关爱他们爸爸的人们的无限感激，更是人们与巴老的感情和心灵的交流。

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陪同前来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李长春是代表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来探望巴金的。李长春带来了国务院授予巴金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李长春 右三 等在巴金病房，右二为李小林。 李舒摄



巴金

的一个世纪

“人民作家”的荣誉证书，并向巴金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的祝福，祝巴金“生命之树长青，艺术之树长青，精神之树长青”。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和上海市市长韩正陪同出席了颁证仪式。李长春说：巴金“是新文学的开拓者，是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巴金的人品和他的文品一样为人所景仰。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祖国和人民怀着无限的忠诚和热爱，对文学事业不懈地耕耘和追求”。李小林代表巴金和家人感谢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二〇〇三年内

李小林和李小棠把寄给巴金的稿费——告诉爸爸，仍然按爸爸的既定意愿，悉数捐赠给“希望工程”、中国现代文学馆等。

已过古稀之年的王蒙，欣逢

巴金百寿之庆，作文祝贺，认为巴金的作品“都流露着真情”，“他提倡说真话”“是他本人的生命体验”；赞颂巴金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为青春，为幸福，为光明和真理而文学而艺术”，同时“寄希望于青年，于文学。这样的心胸是伟大的”；巴金，“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巴金百岁，牵动了海内外万千读者的心，人们用传统而富有特点的方式，向这位在文坛辛勤耕耘一生的作家表达自己由衷的祝福和景仰。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巴金的生日，也是热爱巴金的读者和朋友大欢乐的日子。

巴金早已掏出自己的心，奉献给读者，百十部抒真情辉耀中外，千万言反封建警鸣古今。如今，巴金难言，不能再汨汨如流

水般地向读者和朋友袒露心声，但他的千万言著译和“讲真话”的呼吁，却依然叩击着读者的心扉；巴金多思，他的精神人格永远在历史长空闪耀；巴金有爱，他的心依然和读者的心脉一起跳动；巴金重情，他深深地眷恋着家乡和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人们仿佛听到了百岁老人发自内心的声音：

——“谢谢！”

——“我只是一个作家。”

——“把心交给读者。”

——“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

巴金的“笑声”和“眼泪”

代后记

唐金海 张晓云

读

了几十年的书 越来越觉得文字的神奇。——好比谱曲时，有限的七个阿拉伯数字的不同排列组合，能谱成千变万化的旋律那样，仅仅几个极普通常见的汉字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就能表达万千不同的、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蕴含万千不同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音乐和文学虽各有质的规定性，但在这一点上，却正显示了它们共同的无与伦比的神奇的魅力。它们令人如入林莽、如登群峰、如近兰桂、如沐春风，因而能让入堂奥者久久萦回、久久思索。

写完《巴金的一个世纪》，有一句巴金翻译的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中的话，那四五十个常见的文字神奇的排列组合，一直凸现脑际，积久日深，愈发令人回肠荡气。

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巴金曾多次表示过对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及其著作的喜爱和敬意。他多次撰文“承认自己的错”，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遵命”写批判几位友人的文章，为的是“使自己过关”；也多次“谦虚”地自白，说自己千万言中如能有几部作品可读可传，已觉欣慰，因为“我不是文学家”；也多次对研究者表示，不必在文章中再点提“文革”十年时对他投井下石的友人的姓名，对一些老友在十年浩劫中对他“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的个人的言行表示理解和“宽恕”……自然，在一个世纪的长途跋涉中，巴金虽然有忧郁、痛苦和愤怒，也有过欢乐、荣耀和“大笑”——但确如赫



巴金

的一个世纪

尔岑所言，巴金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是的，也许人们对此并不理解，心存疑惑。幸运地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巴金已“不能言语”，早几年就已多次向医生和亲人示意“我是为别人活着”。但他漫长曲折而又辉煌的一生言行和足迹，却真实地向世人和后代展示了：他的确是个“坚强”的人，而他的“笑声”也的确“常常近似眼泪”。在二十世纪出现和成名的所有作家中，包括五四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基本被公认的文学大师中，甚至包括鲁迅在内，也没有几位作家能有巴金今天这样的“笑声”、这样的殊荣，没有今日巴金头上那样多的金光闪闪的光环：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家》（原名《激流》）在《时报》上连载时，巴金被传媒称为“新文坛巨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先后任“文化生活丛刊”、“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烽火小丛书”等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际，他荣幸地受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看红旗翻卷，听万众欢呼；此后至今数十年（“文革”十年例外），又任影响深远的《收获》的主编；一九八〇年被选为世界中国笔会中心主席；一九八二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一九八三年获法国“荣誉

军团勋章”；一九八四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一九九〇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同年又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一九九三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一九九七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最高奖——“杰出贡献奖”；一九九九年又获“巴金”小行星命名证书；他多次倡导、呼吁、捐资新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获准坐落在北京；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近二十年一直被全国作家选举连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的《家》等主要著作，七八十年来一版再版，又被改编成多种文艺样式问世，深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如此辉煌，举世瞩目。

我们从巴金的作品、巴金的照片、巴金的一生行迹中，能看到巴金青年和中年时代的笑，尤其是能看到他耄耋之年的“大笑”，笑得那样坦诚、纯朴和幸福。而他开怀大笑的“笑声”中，却饱含着人生的各种辛酸、忧虑和苦难，确乎“常常近似眼泪”……

童年时代，最疼爱他的母亲过早逝世，他十岁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较他年轻的亲人和挚友也

先他而去——而巴金又是极重情义的人；在异国思乡的寂寞中开始的文学创作，又充斥着追求强烈救国救民真理的苦闷，而在严酷的现实中又日渐感到原先执着的信仰的苍白和与现实的矛盾，同时又自始至终混杂着自感写作的空虚和实践自身信仰的软弱——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的、精神的、性格的痛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名后不断遭到某些作家以及极少数文人的误解和攻击，甚至有人愤激地表示对所谓“眼泪文学”的作家“该捉来吊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走红”的同时，又不断遭到批判，甚至要把他当做“白旗”“拔掉”；“文革”十年，只能写检查，不能搞创作，被“押”到全市电视批斗会现场“示众”，被“押”到工厂、学校批斗，又被“抄家”、被“隔离”、被“押”送去喂猪、担粪，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尤其是朝夕相濡以沫、多年患难与共的爱妻萧珊被迫害致死，巴金的灵魂、精神和人格被长期折磨、污辱，一夜间白发如霜，时有噩梦和怪梦，多种疾病缠身；在劫后余生的二十多年，因写作《随想录》，“挖出了自己的心”，惊动国中上下，震撼海内外，在荣誉接踵而来的同时，因长期遭受的精神、人格等积难已“难”入膏肓，巴金依然常有噩梦和怪

梦，长期卧病，粒米不进，以输液维持生命，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遭逢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生不如死”的悲哀命运。更有甚者，还常有“噤噤喳喳”的暗示、警告和利用，也时有文坛某些人的误解、苛求、责难和过誉映入他的眼帘和传入他的耳鼓……

巴金的“笑声”确乎“近似眼泪”。但巴金毕竟是“坚强的人”——在如此漫长、如此沉重、如此“全面”的灾难面前，巴金跋涉过来了，而且已跋涉了一个世纪！百年沧桑，百年风雨，百年荣辱，百年毁誉——却也是百年辉煌。笑声和泪雨齐飞，泪雨和笑声长存。

坚强的人——巴金 精神永在。

巴金的家乡是博大深厚而又美丽重情的。值巴金百寿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命题《巴金的一个世纪》，由该社龚明德任责编，嘱我们撰写并应期交稿。十余年前，曾因主编百余万言的《巴金年谱》与四川文艺出版社结下深厚的书缘，而今又蒙青睐，我们固因前缘乐而从命，又因社领导及责编的眼光、魄力和学识，更因我们共同敬爱、世人敬仰的巴金百寿诞辰，故殚精竭虑，日夜兼程，又大体按出版社定下的体例，历时三年而勉强完工。其间得到巴金亲人如李济生、李致、李小林、李小棠、李

国士等的大力支持，允诺使用有关巴金肖像的照片，提供巴金近况的信息，借阅书籍、解答疑难等；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服务部、上海图书馆业务处、上海档案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有关部门，慨然提供查找巴金重要文献、著作珍贵的初版本和文学活动时的珍贵照片；现仍在美国加州学习和工作的作家唐涛和诗人唐澜，多年来陆续提供了不少巴金在海外的文学活动史料。此外，黎明大学谢俊如、方航仙、梁燕丽和董欣胜、赖锦标等老师，有的提供丰富的史料，如泉州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数十本《巴金研究》；有的在电脑技术上大力协助，耗费了很多精力。唐金海的博士生张喜田、苏永延、荣耀民等，在繁重的学习之余，或协助我们用电脑处理疑难、打印参考文献和资料目录，或进入浩如烟海的书库查阅有关资料等，废寝忘食，辛劳之至；画家岑振平、摄影师陈章以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岑沫石等，精心为数百幅巴金著作版本、手迹和文学活动等拍摄照片制作光盘；……值此书稿杀青之际，当书此存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巴金研究与鲁迅、茅盾、周作人、冰心、沈从文、老舍、曹禺和张爱玲等研究相似，

都取得了振聋发聩的成就。我们撰写《巴金的一个世纪》，自然得力于数十年尤其是近二十余年来几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前辈教授、学者和作家的著译，得力于才华横溢、思精虑锐的海内外中青年教授、学人和作家的著译，还得力于敏于世事又埋首书案、下笔千言的众多记者和编辑，也得力于祁鸣、陆正伟、李舒、陈思和、李辉和四川美术出版社艺术地摄制和精心制作的图文并茂的巴金画册和珍贵的照片。——谨此一并恭手敬谢。本书原稿编有一份长长的本书引用的论文、论著目录。责编看后，认为几乎就是已有的全部巴金著述史料和巴金研究史料，建议删去，以节省篇幅。谨此说明。

疏漏、讹误和不当处，恳请巴金先生和他的亲友以及巴金研究专家和海内外贤达、读者赐教。

辛巳—壬午—癸未年冬夏春秋，
于上海浦江之滨“凉城”——“阳光苑”——
“文化佳苑”之
旦复旦草堂